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82 ·

歷史・地理類

五十回憶

黃紹竑著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再版

五十回慮

上下二冊定價國幣二千元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著者 黃紹竑

發行人 羅明湛

承印者 上海世界書局

發行所 雲風出版社

杭州三元坊三元里三號

五十回憶引言

「人生七十古來稀」，這話，雖然沒有科學的根據，至少可算是中國數千年來從實際經驗上得來的人壽紀錄標準。假定這種標準是比較正確的話，那麼，年過半百的人，所剩下的生命，至多也不過十幾年二十年。可以說是「去日苦多來日少」！

我現在已經是過了五十的人了！過去的五十年中，在國家的歷史上，經過了滿清的專制和民國的革命。在世界的歷史上，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個人的歷史上，經過了從軍，從政，辦實業，辦工程，和其他許多雜亂無章沒有系統的事情。中間因時代的演變，無論是本省外省，國內國外，都起了異乎尋常的變化。凡是生在這時代的人，無論是私的生活，公的事業，都會受到這種繁劇變化的影響。就我本人說，過去五十年中，剛巧生活在這個時代裏。對於許多繁劇的變化，不但耳聞目見，並還親身參與了若干部分的實際工作。這不僅我個人認為幸運，咤為奇遇。我更很不客氣地說：「這許多變化的情形，實際的工作。無論對過去，對未來，對現實一切，都可作為憑弔借鑑的史料。同時對本人，對社會國家，以至整個的世界，也都具有一些記載的價值。」

我不是史官，我不必亦且不能作正式的本國或世界歷史。我希望和可能寫的，亦祇是本人五十年來由兒童生活到現階段止，這一時期中，就本身的立場，寫我個人要寫的幾種事實。論性質，像個自傳，又有些像筆記。論體裁，像個稗史，也有些像漫筆。這在中國文化史上，好像還沒有這一種前例。但我並不希望合於那一種的文章體例，我不用自傳筆記稗史漫筆那些名目。因為生平懶寫日記，簡直是沒有日記，一切一切，全憑回憶，而所寫的，又是個人過去五十年的事情，所以乾乾脆脆地，定名曰「五十

問」。

一個當代的人，要寫許多與當代政治有關的史實，是太困難了。中國歷史上關於這種性質的文字，不知發生了多少文數。所以中國歷代的歷史，大都是當朝的官文書，或者是後人撿拾遺聞的補綴作品，很少見到當時有關係的人物所作的真實記載。即使有一二人想作這種記載，而處於專制淫威之下，亦祇好是寄託於詩詞，或其他文藝之內，隱隱約約的，稍露一些痕跡。反使後來讀者，作似是而非的揣測或探索。這真是中國過去私人對於有政治記載的困難，亦是這種記載的最大缺陷！

現在雖然是民國時代，人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但是仍然懷着歷史上的恐怖。一則恐怕觸犯了當局，二則恐怕得罪了生人，甚至恐怕得罪了與死人有關係的生人。所以要寫起真實的史事來，的確有許多為難的地方。古語所謂「蓋棺論定」，照我另外一個解釋，是要等這個人死了，才好把他的事實記載出來，公開批評的意思。這種歷史遺留下來「恐怕得罪人」的心理，漸漸變成社會上對人消極的道德觀念，想起來真有些可笑！

我是一個當代的人，而且還是一個與當代政治頗有關係的當事人。在滿清時代生長，而參加滿清的革命。在廣西舊軍閥或下官軍閥，而起來推翻舊軍閥。曾與中共合作，而又與中共作戰。曾擁護中央，而又反對中央，後來仍然擁護中央。在許多人的方面，或者由朋友而變成仇敵，或者由仇敵而變為朋友。中間的變化，是太多了。若果普遍的觀點來看，簡直是一種兒戲。但是事實的演變，確實是如此複雜。這種情形，非身經其事的，不能知道，也不能描寫出來。事情是這樣的複雜，即使有一個知道很詳細，而又是後來的局外人，要描寫這一段歷史，已很難着筆。何況是我，在自己方面，就有很多不同的立場。在人家方面，又有很多不同的關係。要處處顧到自己，又要處處顧到人家，真是要比沒有關係的局外人，難以着筆得多。

但是我必先自己設法解除本身的束縛，同時預先要求讀者，也解除歷史上的束縛，然後我本人可以寫出正確的事實，讀者也可以得到正確的認識。

第一、關於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記載，我認為過去對於「正統」與「順逆」的觀念，是太重視了。當局者或勝利者，都是要把自己的一方，看作順天應人的正統。而把對方看作大逆不道的反叛。把自己一方面的事實，就是極壞的，都渲染得正大堂皇。把人家的事實，就是極好的，也抹殺得乾乾淨淨。一篇李秀成的供狀，都要改得他恭恭順順，把大好的真實史跡，弄得完全變了個樣兒。此外許多乘筆作史的人，也總是先有了他自己的「正統」和「順逆」，然後依着這種標準，寫出文字來，因而使得一般讀者受到先入爲主的影響，而失去他客觀的理解。我不願再蹈這種陳套，我沒有「正統」「順逆」的成見。因爲我自己就是一個在正統順逆中間，顛來倒去的人啊。

第二、對於人的關係上，我認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怕得罪人」與「故意得罪人」。因爲怕得罪人，所以許多的重要事實，就要因人而隱諱，不敢公然宣陳。因爲故意得罪人，許多並不重要的事實，也就無中生有，肆口謾罵。這種不誠實不坦白的態度和作風，都是作者主觀生出來的結果，並不是絕對不能解決的問題。在我們這一般人中，過去無論是由敵而友，或由友而敵，現在都在國家統一之下，成爲工作的一員。以前的事實，照我看來，已無彼此隱諱的必要。即使以後尚有爲敵爲友的變化，亦是時勢使然，於現在的記載，並不發生直接的關係。若果我們不論以前站在任何方面，都能坦白敘述出來，不作損人利己的想頭，常懷揚善存真的觀念，即當事人讀了，既可作爲追思借鑑之資，並可作爲見而時彼此笑談材料，亦無傷於情感也。

第三、關於事的方面，我認為以往對於事的敘述，太重視事的正面，而忽略了事的背景。往往將許多事的起因，歸之於人。所謂「一失當，則舉天下之鉅，皆歸諸其人之身。」因人諱事，人與事之間，

不能得到平衡。非爲事而犧牲人的和諧性，即爲人而犧牲事的真實性。殊不知事與人皆各有其時代背景與社會背景，我們若不能將時代背景與社會背景明瞭看清，則事與人的是非糾紛，將一切無從判析。所以，我對於事與人的關係，看得輕一些，對於背景的關係，看得重一些。希望讀者同此見解，以免這種癥結，永遠不能解除。

根據以上三點見解，作爲我寫述的立場。但是寫述的技術上能否盡如吾意，我尚不敢自信，還望讀者有以教之。

此外我尚須聲明者，我這寫述，僅是就我自己參加過的一部份問題爲範圍。在此範圍以外的問題，除了較有密切關係者，不能不附述一二，其餘一概不談。而且這是僅憑回憶的寫述，脫落錯誤，在所不免，尤望讀者予以原諒。

黃紹竑

五十回憶目次

引言

上册

一	童年生活	一
二	離家求學及隨軍北伐	一一
三	在陸譚部下當下級軍官	三三
四	百色失敗與新軍合流	四九
五	出兵梧州奉命討賊	五九
六	統一廣西各戰役	八一
七	兩廣革命的統一與出師北伐	一一三
八	廣西政治設施概況	一二九
九	十五年的黨務及當時民運情形	一六七
十	新粵桂戰事	一八七
十一	海外閒散生活	二一三
十二	內政部工作時期	二二九
十三	長城戰役	二四一
十四	宜慰內蒙	二六三
十五	籌備遠征新疆	二七九

下 册

十六	第一次主政浙江	二九五
十七	調主鄂政與廬山訓練	三一七
十八	抗戰開始與山西之役	三三三
十九	重遊浙江	三五五
二十	八年來浙江軍事	三六九
廿一	幾個政治問題	四〇五
廿二	戰時行政舉要	四二三
廿三	教育年	四七五
廿四	戰時經濟種種	四九三
廿五	所謂游擊區	五二三
廿六	業餘生活的興趣	五四九
廿七	五十的一年	五八三

附地圖七幅

- (一) 統一廣西各戰役圖
- (二) 粵桂戰事圖之一
- (三) 粵桂戰事圖之二
- (四) 內蒙各盟旗圖
- (五) 遠征新張路線圖之一
- (六) 遠征新張路線圖之二
- (七) 山西戰役九略略圖

寫後的話

五十回憶

一 童年生活

【我的故鄉】我的故鄉容縣，係廣西舊梧州府屬的一個縣。在唐代即已設治，名容州，置經略使。縣域名勝鎮武關，又名經略臺，爲唐代建築物，至今尙堅固完好。縣境位於西江支流北流江之上游，亦即北流江之主要發源地，環境多山，勾漏山脈由西而東，爲粵桂兩省之分水嶺。縣境之南，與廣東信宜縣交界，我家住容縣一里的山咀村，（本縣分十里，山咀村屬於一里。）到廣東的邊界，不足十里。

【祖籍溯源】自始祖釋養公至今，已十有六世矣。照族譜所記，我先祖源出中原，因滿清入關，明社不保，乃避亂南遷，至廣東之珠璣巷，由珠璣巷再遷入廣西。始祖釋養公兄弟二人，長兄道真公落籍廣西博白縣之車田墟，人口亦甚繁衍。釋養公則落籍容縣，至今彼此尙有往來。

珠璣巷在小梅關南麓，（梅關即梅嶺上之關隘，土人稱小梅關。）是南雄縣極北的小鎮市，實爲北人南來渡梅嶺後的第一宿站。過此則分往各地，故兩粵客來之民，問其始居之地，多以珠璣巷對，因為在他們祖先入粵以前，遷徙的經過，多難記憶了。我於民國三十三年夏，經過其地，曾下車訪問吾族故鄉，雖市井依然，而三百年前之事，已不知淪桑幾變矣！因偶成鷓鴣天一闕，以誌感慨：

五十江湖作漫遊，珠璣巷溯源流，沾身粵海絲絲雨，極目中原點點愁。尋舊迹，幾荒丘，老鴉啼徹破牆頭。欲知數百年前事，梅嶺花開幾度秋。

我族初到容縣時，當地人口，極爲稀少，隣村各族姓可考的僅有敬家，亦大都自異地遷來。康熙乾

隆以後，人口漸增，讀書之風頗盛。我族世有科名，因而開府作宰，亦代不乏人，我黃氏遂蔚爲縣中之望族。

先祖印川公，諱金韶，生子五人，女一人，先父少顯公，諱玉梁，爲先祖父之第三子。吾母出同里鍾姓，生我兄弟五人，紹端、紹彥、紹崎、紹棟和我，及姊二人，妹三人。我生於前清光緒二十一年，時正甲午中日戰爭的後一年，吾父穎悟過人，幼年爲邑秀才，光緒丁酉年（二十三年）舉孝廉不仕。家居除孝親教子外，則博覽羣書，並習農工百藝以自娛。蓋憤異族之侵凌，仕途之污濁也，故號少顯。又悔誤拾科名也，別署中變，都是表示不入仕途的意思。吾父精醫理，嘗說：「良醫之功，婢於良相，爲用雖殊，其救人濟世之義則一也。」對於求醫的人，人不分貧富，時不分晝夜，無不隨請隨往，且不受診金，貧苦無力的，並贈以藥品。應診數十年，活人甚衆。曾有鄉人和吾父過去有些怨隙，患病甚重，許多醫生，都束手謝絕，請吾父前往診治。當時有人說：「此人對君無情意，可以不必理他。」父拂然曰：「是何言也？醫乃仁術，未有仁而見危不救者，彼雖對我有小怨，我決不能在他病時，存報怨的心思。而且行醫的人，對於人家的病，和自己的病一樣，自己生病，能不急急求治麼？」隨即迅速前往，診察安慰，倍加用心。這人病愈後，感激涕零，前陳盡泯。其在鄉間行事，大都如是，至今鄉人猶懷念不忘。

「庚子國變後容縣興學情形」光緒二十七年，吾父遊廣州，適值庚子八國聯軍入京，辛丑辱國條約簽定的時候。當時輿情憤激，維新四強之議，又囂然而起。清廷亦痛定思痛，於是年秋下詔興學，稍改戊戌政變後的復古風氣。吾父知科舉將廢，新學必興，乃在粵聘教帥二人，回鄉教學，設館於故居之萬松山房，而自爲館長，以譚師荔垣課國文，羅師子岳課英文算學。譚羅兩師在粵頗負時譽，常作革新的言論。設館後，邑中風氣，爲之不變。不僅吾族子弟受其薰陶，就是閭閻邑後進，聞風嚮往的，亦踴躍相

接，實爲吾邑興學之嚆矢。後該館改爲學校，梧州府守某會題「容第先聲」之匾額致贈，現還懸在校中。越年，鄉間鼠疫流行，譚羅兩師的家屬，也間有死亡，乃解館回粵。譚師後任兩廣高等師範教員，羅師後任美洲某國公使館參贊。抗戰後，廣州失守，羅師會偕其家屬避居吾鄉，這時他年已七十餘歲。每述及吾父，頗深知己之感，而於其生平行事，有爲我們所不詳知或所知不甚確的，得其補正不少。後以老病，卒於吾鄉，及今思之，實不勝其今昔之感也！

吾族當每代祖先死後，必爲立祠置產，以供每年祭掃及分卹族中貧苦孤獨之用，在宗法社會中，實是一種良好的風俗。吾父則爲預防養成子孫倚賴祠產而乏獨立進取之精神，又慮因此而釀成族間子弟爭分祠產之惡習。爰于光緒二十九年向族中父老建議，劃祠產大部份，辦理學校，定名私立珊粹學堂。吾父自任校長，擔任教務的，多爲前在萬松山房會受中英算教育的學生，或轉送到廣州日本再受短期教育的優秀分子。山咀和珊粹同音，吾父因爲山咀兩字太俗，乃改用珊粹二字。珊粹的意義，至今我還不得其解，殆爲山咀之諧音，而暗示其屬地意義與族姓意義乎。後又改爲珊粹高等小學，隨辦初級中學及高級中學，已成爲鄉間教育的中心。但因學校擴充，而學校經費，則日益困難。近年由三兄仲庵（紹靖）主持其事，提議盡將各代祠產，撥歸學校，祖祠祭掃，則由學校主辦。以前因學校爲黃氏私立，學生僅收黃氏子弟，或其姻戚子弟，今則無分族姓，無分省縣，皆一律招收。本來是祠堂管學校，今則學校管祠堂，以前爲私立，今則爲公立。這種演變，亦化私爲公之別開生面者，吾父有靈，亦當含笑九泉呢！

【先君對於兒童教育的見解】吾父對於兒童心理和兒童教育，尤獨具見解。當我兄長輩在萬松山房讀英文算學的時候，我雖六七歲，尚未啓蒙，每天但跟隨父側，吟誦韻字。吾父常說：「兒童讀書，不可開始過早，尤不可督教過嚴。過早過嚴，皆易傷身心，喪個性，長大必無所成。應等他年齡稍長，智

誦經圖，然後隨其所喜，而善加誘導，總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我啓蒙時，所聘塾師，皆寬厚和平。吾父並勸他體不輕施夏楚。所選課本，都是確淺近而易於記憶的。我啓蒙後一兩年間，僅讀了幾篇三字經，和一本史記節要，其餘的經書，吾父皆認為無用，尤其不適於兒童心理，並不強我誦讀。所以在歲數很小的時候，心中，我是讀經書最少的一個，亦為受鞭撻最少的一個。至今思之，實為幸事！我幼時，很會淘氣，有一次，將先生的小花瓶裏放些水，再用紙團堵塞瓶口，放入火籠（鄉下人冬天取暖之用）燒乾，水沸氣漲，砰然一聲，紙團飛躍而出，離瓶甚遠。同學多拍手嘻笑。於是把水加多，並將紙團嚴密堵塞，而置於烈火之上，料想必有更大的響聲，與更遠的飛射。不意火烈水沸，瓶子爆炸！先生聞聲前來，見而大怒，拿了一根粗繩，對我重重的鞭撻，我痛不能忍，先預希圖閃避，後來便抵抗還擊。先生恨極了，立刻報復我父，並說要辭館回去。在尊師重道的當時，我本人也感覺得當前情勢的嚴重，還不敢得我父要作怎樣嚴酷的懲罰，憂懼之至，甚至暗暗打算自殺的計劃。我父察知其事，便對先生說：「童子無知，痛極反抗，亦人情之常，既然畏罪而圖自殺，即是他悔過的表現。而且兒童無隔宿之仇恨，先生不必動怒，請放假三天，讓我作些好菜與他吃吃，讓他自己去玩，三天之後，自然一切舊事都忘記了。先生再慢慢的教導他能。」先生如言，三天後，仍教讀如初。此事留給我一個極深刻的印象，使我終身不能忘！至今體驗當年的情景，方覺我父對於兒童教育方法的成功，及其精神的偉大，同時亦非常記念我那位勇于受勸真誠教誨的先生。

「先君對於兒童心理與生理之認識」我父對於兒童的個性與生理，至為了解，一任他們作正規的發揮，毫不加以阻礙，其見解亦多與世俗不同。嘗謂飲食男女，皆生理所必需，男子成年不娶，必自求其時愛而繼之，為父母者有及時為之嫁娶，否則或有逾越禮教之情事發生，父母應負其責也。我有一個兒子，已滿成年，尚未結婚，不免發生戀愛的行為。我父知道了，並不加以責備，但很迅速的有一兩月內

，就替他完婚。在舊禮教束縛很嚴的當時，竟有這樣開明的作風，這使我們回想起來，是多麼的難得啊！我父富於常識，對農工百藝，都感興趣，晚年并借此消遣。我也常常跟着學習，往往弄得汗泥滿身，弄傷累累，吾父並不稍禁，但隨時加以指導。我又喜游泳、打獵，及攀高樹採果實，登樹頂探鳥窠等，視為無上之樂。雖屢遭危險，我父亦僅僅予以指示，使知所提防，絕不因偶遇危險，而永加禁止。彼認為危險乃是旁觀者的一種主觀揣測，而未必即是主觀者（即當事者）的必然事實。有一次，我潛伏水底，用手去摸石罅裏的魚，偶不小心，身體爲水所浮起，手却被石隙軋住，不能脫出，不由自主的飲了許多水。在這一剎那間，急中生智，竭力使身體下沉，然後將手拔出，雖幸脫險，手背上已傷了好幾處。後來爲我父所見，問悉原由，僅謂下次要小心，遇到意外，尤宜更加鎮定，並無其他呵責。諸如此類危險之事，在我的童年時代，遇到很多，亦從未因此而爲我父責罰與禁止。蓋兒童敢於作某種冒險，即是他對於某種行動，具有若干把握，既有把握，則危險自不易發生，彼自身亦不感覺到有何危險。我父對於我幼年之冒險行爲，不加以過分之拘束，自有其正確之見解。這對於我以後之做事，得到極大之裨益。

在鄉下的兒童羣衆裏面，無論是在這一村裏的，或者是那一村裏的，都各有他們的希望和目的。爲達到這希望和目的，自然會發生個人的或羣衆的競爭或鬭爭，因而無形中產生了組織和秩序的行動。同時也就產生了一個領導者。我在鄉下的兒童羣衆裏面，不論年紀比我小，或比我大一些的，我都可算是一個領導者。我之所以能夠取得鄉下兒童的領導權，完全由於我有一些技術，和敢冒險，肯努力。當秋天以後，山上野生的菓實如野柿野梨之類，都已經成熟。當然那些易於摘取的，已經爲人摘盡，剩下來的，祇是生存高樹，不易採取的一部分。這一部分食品，雖然兒童們都很垂涎，若是沒有人能登高攀摘，亦祇有望洋興嘆而已。我因爲能攀登很高的樹，所以這些主要任務，大都是由我包辦，而他們祇是在

地面上作那拾柴或剝壳等輕鬆工作。此外孩子們想吃一個痛快的野餐，須要把小河裏的魚捉上來，或是把樹上的鳥打下來，或是把田地裏蕃茹芋頭燒熟來吃，都要有人能夠將這些目的物取到手裏，才有辦法。我會潛水捉魚，我會用槍打鳥，我也會砌結焙燒茹芋的竈灶。這些困難工作，都是我自告奮勇努力地擔任。他們祇是做些拾柴取水等輔助工作。因此我有極大的權威，不但可以支配他們的工作，而且可以支配各人應得的收穫物。還有這一村的孩子，與那一村的孩子，並不一定是很和睦的。時常因為小事爭執，而發生很大的衝突，甚至互相毆鬥，我也很勇敢地以身率先，帶領和指揮他們去鬭爭。所以現在我的臉上，還有很多處打傷跌傷的痕跡，左手上面還有十處被刀斧砍傷的疤痕，這更是我取得小孩子們領導權的代價。我現在想想，在小孩子羣衆裏的行動，從大人們看來，也許認為是頑皮，是胡鬧，而在小孩子們，確實有他天然的意識和秩序。可是大人老人們，往往不能了解孩子們青年們的運動。也可以說大人老人們忘記了他自己孩子時代和青年時代的一切。

我在萬松山房讀書的時候，正值地方不靖，盜賊四起，不但較遠的地方有明火打劫的強盜，就是我們村莊附近，偷竊的事，也不斷發生。那些無業爲生的人，不是偷人家的牛，就是偷砍人家的樹木出賣，所以弄得附近一帶，都變成重山疊嶺。這等偷牛偷樹的賊，如果被人家拿着，就要受遊村的刑罰。此種私刑，比官刑慘毒得多。事主將竊犯細綁起來，滿村牽着走，執行的人，手裏還拿着一面銅鑼，一條藤鞭，敲一聲鑼，就要那竊犯將自己的姓名及偷某家的某物，高聲報告一次。如果不肯報告的話，那藤鞭就在他背上無情的打下去，打得他報告爲止。那時鄉村裏除了人命官司，或是抗糧造反之外，官府的法令人員，是不容易到達的。一切的權威，都操在有錢有勢的紳士手裏。這種作法，也不知相傳了多少年代，也許以前要比那時更爲慘酷。有一日，我們聽了鑼響，跑出去看，看見那被判遊村的竊犯，就是我們遠房的伯父，已經六十歲了，他的身上已是一條青，一條紫，被打得狼狽不堪。他的兒子正在我家裏

幫工。我們對他說：「你還不去救救你的父親麼？」他說：「偷是真偷的，我無錢代他賠，又沒有力量和他講人情，叫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實在爲那老者抱不平，恨他兒子太無用，於是同他到我父親面前，要求向事主方面講情，才把他解救下來。後來我父親邀集里中人士，訂立一個保護森林的公約，有主的林木，是禁止偷竊砍伐的，但是祇限於砍伐樹木，至於斬攀樹枝，及掘取已經砍伐的樹根，不在禁止之例，不能作爲盜竊的行爲。一方面是顧到貧窮的鄰人，不至絕了他們生活的路徑，一方面那些樹枝樹根，橫豎都要斬伐掘去的，山主的損失，極爲有限。自此以後，附近的森林都茂盛起來了，偷盜的事件也就不再發生。十七年，我回鄉下去，山上合抱的樹很多，青蔥可愛，與以前大不相同了。又一次，我自己的木山起火，燃及鄰山，鄉公所判處我家受罰。管家的人對我講，我說：「豈有此理，自己受了損失，還要處罰，我一定不服這個公斷！」管家人說：「如果因爲我們有勢力，就不受鄉約的公斷，這鄉約就要破壞了，以後誰還肯服從呢？而且這是老太爺手訂下來的。」聽他說的理由很充足，使我不能答復，祇好照公斷受罰。我現在想想：鄉間自己訂立的公約，比省政府頒下的「放火燒山者槍斃」的命令要有效得多！這就是地方自治的真諦，自治的基礎工作。此事雖然很細，擴而充之，即是民主自治的精神。

【初進學堂】光緒二十九年，我到族立瑞粹小學讀書，由初小而高小，在同輩的孩子中，我是舊書根底最差的一個。他們以前請的是舊式塾師，對於四書五經，多半背誦得很熟。很多人爲我擔心，恐怕功課跟不上。但是幸運得很，學校裏的課程，剛巧改變。課目雖不完全，而修身歷史地理算學等都有了，讀經也有一科，我的經書，（書經孝經）還是在入了學校後才讀的，比較趕不上人家。但其他功課都很不錯，時時考到第一名。我想這是我受鞭撻不讀死書的好處。而他們呢，却没有使我這樣活潑靈敏，也許是受了舊式教育的影響吧！在那一兩年內，族中的長輩，有的是從日本或其他各處留學回來，有的

還在留學，因乘暑假之暇，回到家鄉來。他們受了文明的洗禮，唯一的特徵，是將那垂在背後的辮子剪去。但其中亦有少數保留着的。他們或者我們的心目中，對於這些留學回來還留着辮子的少數人，都認為是頑固的分子。他們對我們說：「辮髮就是滿清奴隸或漢族唯一的象徵，也就是外國人賤視中國人的唯一原因，在外國，祇有獸類中的豬狗牛馬，才拖着一條長尾巴！」這些話，對正在學堂裏讀書的小朋友講，是太動聽了。於是他們問我們：「願意不願意剪去這條尾巴？」自然多數都是贊成的了，即有少數不贊成的，也都不敢提出反對的表示。於是他們在口袋裏取出剪刀，把十幾個小朋友的辮子，都剪去了。有一二個內心不贊成的，也被強迫剪去，這伸手一摸，辮子沒有了，不覺放聲大哭起來！我因為恐怕父母知道了，要不容應，當夜是偷偷的捏着已經剪斷的辮子睡覺，心裏盤算着：明早如何去見父親和母親，如何答復他們的盤問？當然，這是沒法遮掩的事情，也沒有話可以分辯。次日一早，這事已傳遍了全村。動手替我們剪辮子的兄弟，也不知躲到那裏去了。我母親急得哭起來，她說：「沒有辮子，便不能下科場，入學，中舉，中進士，一世的功名就算完了！」她一定要找到那位剪辮子的人負責纔回來，就是續不回來，也要照着原來蓄辮的樣子，把餘髮理成前邊短後邊長的樣子，等他長起來，仍舊可以梳回一條辮子。正在難以解決的時候，父親過來了，他並不發怒，但也不見得很贊成。祇是對母親說：「既已剪斷，續是續不回了，剪了也省得你朝朝為他們梳頭而傷氣。頑皮的孩兒，梳頭是一件苦事，第一是費事費時，不能忍耐。第二是頭髮隔三幾日不梳，結子很多，勉強把他梳通，有些頭髮就得硬生生的把他拔下來，使孩子們感到痛苦。男子的梳頭，與女子的纏足，都是男女孩們不願立的事；而做母親的必要認為這件是她對子女的日常工作，結果弄得雙方都感覺麻煩，實在也是無謂。」這一席話，把這場剪髮的風波，就解決了。

「故鄉鼠疫流行與大哥之死」光緒三十二年，我的大哥患鼠疫死了，這是我父母晚年最傷心事！

大猗名紹端，字佩方，聰明極了，十五歲即考取秀才。後來在萬松山房讀書，英文算術，亦爲同輩之冠。當年父親即送其到日本留學，回國後，即在家族小學當教員。他：我父親唯一的愛子，亦是我父親唯一的助手。他患病時，父親用了全副精神替他醫治，結果是沒有效力。那時候，鼠疫尚無特效藥品，真正染到者，無不迅速死亡。但是在我父親的腦筋裏頭，總以爲是自己用錯了藥，所以不能治愈。他對於這事，特別的痛心，令他精神失常，甚至忽然暈倒過去。他後來常常說：「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良醫之子，多死於病！」不知是他自慰的意思呢，還是他自怨的說法？

【當時防治鼠疫的方法】鄉間的鼠疫也太可怕了！前後繼續發生了二十多年，直到民國十年之後，才告絕跡。當時蔓延甚廣，每一個鄉村，都被波及，究竟死了多少人，在那時人口生命尚無統計，自不知道確實的數字。不過據我所知，數目是相當的大，有些是全家人都染疫死亡，致令鄰近的村坊，都失去繁榮興盛的氣象！據說：「其時廣州正有鼠疫發生，或者有人傳染了回來，或者：老鼠疫蚤隨貨物過來，而由容縣城間接傳到了鄉間。」鄉下人對於鼠疫，沒有近代的科學知識，從事防避，多半藉鬼神以驅疫，所以死亡特別的多。但鬼神的說法，若以科學的眼光來分析，亦有很多地方與近時防疫方法相近似。譬如說：「疫鬼是怕白色的，家中如發現鼠疫，必須滿地灑石灰，疫鬼即不敢到來。」又說：「疫鬼是不敢上樓的，有疫人家，必須樓居，晚上要把握梯抽去，最好在屋柱上綑以有刺之樹葉，則疫鬼也不敢近。」這是現時防疫防蚤之最好方法。其所謂疫鬼者，實即今日所知的疫鼠疫蚤也。凡發現鼠疫的人家，必須立刻搬遷，及至無死鼠發現後，始能搬回。故當時鄉間空曠之地，臨時住屋甚多，皆爲避鼠疫而造者。富有之家，甚至有二三處者，以便再次遷避。至鄉間舊例，死人必須停尸三日，候親屬到臨舉哀，但對於患鼠疫死者，在病重時，即須隔離，死後即殮即葬，並不等候親屬到來。舉凡種種防疫辦法，雖皆以鬼神爲對象，而實多合乎科學的道理。想神道設教之用意，無非爲使無知愚民易知易行耳。

但不知此種方法，爲何時何人所發明，而當時更無人能以科學的道理解釋而充實之，這實在是一件可惜的事情！

【投考陸軍小學】光緒三十四年，我已十三歲，那年桂林陸軍小學招生，父親的意思，是叫四兄天擇（紹竑）去考，他年齡比我長一歲多，身體也比我壯健，頗合應考的條件。我對陸軍也極感興趣，要求父親准許我同去，父親因我年齡不足，身體太小，未即允許，而我去志甚堅，爲此哭了一日，飲食也不進。父親見我意志堅決，不忍過於渴抑，也就答應下來。但我兄弟二人，剛到容縣城，光緒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繼崩逝之耗，即傳至鄉間。父親因恐有事變發生，派人到城，追我兄弟回去。旋薄儀繼統，父親知時局已安定了，乃於宣統元年春，命次兄永邦（紹彥）攜我兄弟同赴桂林。以上所述，爲我的家世及我幼年時代可以回憶的種種事實。

二 離家求學及隨軍北伐

【初到桂林】由容縣去桂林，在我童年時代，走的都是水路。從縣城坐北流江的民船，順流經藤縣，入西江，而到梧州。再換桂江民船，逆流而上。大約需要二十餘日，方可到達桂林。沿西江一帶人士到桂林，都叫做上省，到廣州都叫做落省，蓋一則順流而下，一則逆流而上也。

桂林是廣西的省會，爲全省政治的中心。但是廣西的經濟中心，却在梧州。因此梧州一帶的人，在前清時代，除了趕科舉的秀才，及考學堂的學生之外，很少有人到桂林去。我們去桂林的時候，正是宣統元年的春天。桂林山水甲天下，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尤其在春天，桂江碧綠的水，與兩岸秀拔的山，交相輝映，而更覺其美麗。二十多日的逆水行舟，應該越久越覺得氣悶，可是在桂林的江上，是越到最後越覺得有趣。所以在桂林江上坐民船，時間雖然長一些，也並不見厭煩。船到了陽朔，奇峯起伏，江水盤迴，舟子指東說西，滔滔不絕，使你耳目應接不暇。想起「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的話，是相當正確的。我們到了桂林，陸軍小學新生考期已過。其他的學堂，尙未招考。日中無事，就去遊山。獨秀峯是首先登臨的目標，這裏可對桂林的輪廓，先得到一個印象。其餘如風洞山、七星岩、象鼻山、伏波岩、月牙山、老君洞、天子田等，都是初到桂林的人，半月裏就要遊遍的。那時桂林的客寓，約分爲客棧與試館兩種。客棧是按日計費的，住者多半爲臨時過往的客人。試館是按月計費的，住者多半是比較久留的客人。試館的意義，是爲來省考試的秀才童生而設的。後來科舉廢了，試館便成爲通學學生的宿舍，因此就有改用學生寄宿舍的新名詞，以廣招徠的。我們一到，便租試館來住。那時生活程度極低。普通的試館，每月食宿僅費毫洋二元七角，最貴的不過三元六角，就很講究了。一個學生一

年全部的費用六七十元，已很充裕。較之今日桂林生活費之昂貴，真有天淵之別。

〔考取分澤高等小學〕到桂林不久，天擇四兄考取了桂林中學，我考取了分澤高等小學。桂林學校，辦理較遲，光緒三十年，南等小學，祇有三所。臨桂兩等爲縣辦的。蒙泉高小，在城南蒙泉書院；分澤高小，在北門之鐵佛寺。這兩校係由提學使直接辦理，似屬於省辦者。但課程設備，比到我們族中的瑯粹高等小學，似乎還趕不上。全校僅有教師二人，爲莫師如清如達兄弟。後來鐵佛寺改爲模範監獄，該校又遷至後貢街之大佛寺。蓋當時桂林除陸軍小學外，還沒有一所新建的小學校舍，大概皆由廟宇臨時改用的。我進分澤小學，半年計，分澤與蒙泉兩校合併爲廣西模範小學，校址設於皇城內，係將舊貢院全部拆去，而重新建築者。除中間留作廣西諮議局外，右邊爲模範小學，即現時廣西綏靖公署地址，左邊爲初級師範，即現時廣西省政府地址。規模之大，爲全省冠，亦可見當時地方當局對於舉興學校之熱心也。

永邦二兄送我們去考學校，等我們考取之後，他就回去了。臨行時，祇交下毫洋三十元。他說：「要用到暑假，家裏才有錢寄來，你們要節省點使用。」在以前，一切的用費，都是由他經理，每月要用多少錢，我們一些也不知道。現在離開了家鄉，幾換了環境，當然更不曉得每月開支的數字。對於他的吩咐，祇好接受下來。於是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子，就單獨的開始學生的異鄉生活。同我一齊考入分澤小學的，還有我一個堂兄次軒，他僅比我大幾個月。到了學校裏，認識兩個藤縣的同學，一個叫葉聖球，一個叫何強，整個學校裏，除了我們四人是說白話的下府人，其餘的都是說官話的桂林人，或湖南人。語言是人類的界限，我們少數孤立的，就往往要多數的欺弄奚落。但我在兩三個月內，已經迅速地學得很好的桂林話，打破了語言的界限，情形也就好轉起來了。那時都是走讀，我住的地方，離學校還有兩里多路。朝去晚回，在晴天雖不覺得怎樣，但在春天，桂林的雨特別多，連日不斷的下來，我祇有一件

藍布的長褂子，算是當時的制服，（那時不准穿短衣上學）每天都得穿出去，弄得泥漿滿身。當晚那來洗滌功夫，次早帶濕，也得穿去上學。我們住的自然是那三等的試館，公共伙食，比之現在抗戰期內的公務員雖好得多，但是刻板的幾樣菜，吃久了，也要生厭。一個禮拜內，拿一角錢加炒一大盤酸菜牛肉，或兩三角錢買一個鷄吃吃，也是不可少的。那時桂林尚未有戲園，有兩個桂林戲班，一個叫人和班，一個叫瑞祥班。唱戲都在各省的會館內，這些戲班，都是供各省在桂的官員或商人燕會時之用，（即堂會）但却是開放的，任由老百姓前去看戲。遇到禮拜日，我也常常去看，有錢時，就拿一個銅板買一個高凳位子（係私人出租的）坐著看，沒錢時，便在人叢裏擠來擠去。看戲雖然不用錢，但看見西廂上戴著綢帽穿著袍褂的官，坐著吃著的看，心中却有些不平與難過！到了宣統二年，桂林最早成立的景福戲院開幕了。（在鳳凰街的橫巷內）這些班子都歸到那裏去唱，出錢買票，才有戲看。從此這種平民的利益，就完全被剝奪了。那時候瑞祥班有一個花旦，叫做「鴨蛋」，我總以為他的面孔生得像鴨蛋一樣，所以叫做「鴨蛋」。前幾年到桂林，與馬君武等看桂戲，說起「鴨蛋」的事。他說：「因為他唱得最好，長得最漂亮，能壓倒一切的花旦，所以叫做「壓旦」。「鴨蛋」與「壓旦」同音，你聽錯了！」我不覺大笑。他說：「這人姓林，已六十多歲，還健在。」有人提議要他出唱一次與我看看。我說：「人老珠黃不值錢，而且要一個六十老翁在台上男扮女裝，作那扭扭的姿態，來娛我們的耳目，不但不雅，亦且不忍。」這個提議，就打銷了。

我們的三十塊錢，不到暑假，早就用光了！還欠一個多月的房飯錢。試館老闆對我們說：「再不交錢，就要停公食了。」這個最後的警告，迫得我們走頭無路。幸虧堂兄次軒他還有兩件綢緞的衣服，祇好請老闆帶他去上一上當舖，渡過這個難關。距暑假還有兩個多月，家裏又沒有錢寄來，怎樣辦呢？不得已找一個同鄉，在另外一個小學教書的梁朝輔先生處，借了二十元，這是我生平向人借錢的第一次。

在未開口之前，心裏非常難過，總怕人家不肯。即使肯了，又怕家中不認帳。但是事情出我意料之外，一說就肯了。他並且說：「你們的錢，的確不夠用，應該早些寫信回家，說明詳情，一定會寄來的。」他爲我們解釋了中心的疑慮，解決了當前的困難，直到後來，我還時刻記得他。因爲那時候，我對於這事的印象，是太深了！

廣西諮議局係於宣統二年成立，這是滿清實行立憲的初步準備。地址設於皇城正中，建築極爲莊嚴，實足象徵民意之光明正大。各縣皆舉有議員一人，容縣議員爲黃用溥先生，新學非常淵博，極爲青年所信仰，亦最爲頑固派所反對。他與藤縣議員蒙民偉先生所提之遷省南寧案，在當時曾發生重要爭辯。議長爲岑溪陳太史竹銘，我於民國廿九年回桂，參加廣西省臨時參議會，開幕時，陳太史擔任副議長，與民元後之省議會議長姚健生張一氣兩先生，同爲參議員。聚清末及民國二十餘年之歷屆議長議員於一堂，亦議壇之佳話也！

「廣西興學的兩大紀念」廣西創辦最早之學校，要算桂林文昌門外體用學堂，又名大學堂。顧名思義，當係採取維新初期的口號「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意思。當時內容，頗爲簡單，制度亦未確定，宣統後，乃改爲優級師範。在廣西興學初期的教師，多爲該校所養成，對廣西教育貢獻頗大。此係光緒二十四年桂撫黃槐森氏所創辦。其次則爲二十五年梧州中西學堂，胡漢民先生曾在該校任教席，實爲廣西興學之兩大紀念也。海豐張鳴岐氏，於光緒三十二年撫桂，被曾任兩廣學務處督辦，對於廣西學務，進行甚爲積極，提學使李翰芬氏，對辦學亦有計劃。計先後由其完成及創辦者，有法政學堂、警察學堂及警察教練所、典獄學堂、農林學堂、優級師範、模範小學、陸軍小學、幹部學堂、陸軍測量學堂等，都在光緒末年及宣統元二三年，相繼開辦，規模皆頗宏偉。尤能於省外國外，延致名師，擔任教授。對廣西教育基礎之建立，自具相當功績。正在興學高潮膨脹之際，忽有恢復科舉之傳說，其原因爲宣統元年舉

行最後之拔貢考試。一時熱中科名者，無不彈冠相慶，實爲興學期中之一樁趣聞。

【容縣學風興盛的地理原因】容縣在桂林讀書的學生很多，所以有「無容不成校」之語。不但省內如此，卽在省外國外，桂籍之留學生，亦以容縣人爲多。究其原因，爲容縣興學，得風氣之先，光緒三十二年，已成立六十餘校。其次則因地少人多，（據最近清丈，全縣耕地僅二十四萬畝，人口則有三十二萬。）謀生不易，不能不向外以求發展。當光緒中葉時候，有許多窮困的人，因迫於生計，流爲盜匪，地方發生紛亂。清廷派酷吏鮑某茹某，前後來宰邑，皆以嗜殺著名。因而稍涉嫌疑之貧窮丁壯，則流走南洋，以謀生路。留縣之小地主自耕農，鑑於耕種之不能溫飽，乃多變產令子弟外出求學，以圖發展。父兄對此，必先估計子弟求學時用費若干，畢業後每年收入若干，多少年後可以將所變之產業贖回，皆有預定計劃，按步實施。所以容縣學生貧苦者佔多數，而成功者亦以清寒子弟爲多。但當時在桂林容縣之學生雖多，而在衙門做事的極少。據我所知，僅封勵吾、封濁吾、葉君國三人，彼等皆留學日本，在提學使司充當類似督學之職務。後來封勵吾先生派充模範小學校長，我隸其門下者約半年。

【考取陸軍小學】宣統二年春，陸軍小學第四期招生，我去應考。僥倖錄取了。以前我痛哭絕食，要求父母到桂林的唯一目的，終於達到了。當時我是如何的快活呵！但是臨入校的時候，卻又起了徘徊不定的念頭，和莫名其妙的悲感。好像入了陸軍學堂就與父母永遠不易會面的樣子！後來經好多人勸導，我才入校。這是我一生事業起點的學校。地址在文昌門外，一切建築，都早有計劃而很宏偉的。可惜學校停辦以後，這座莊嚴的校舍，却逐漸崩壞了。我時常懷念着，前幾年曾向李德鄰（宗仁）白劍生（崇禧）諸兄建議，應就學校舊址，建築忠烈祠，爲我們軍事的母校留一個永遠的紀念。

【滿清的陸軍教育制度】滿清的陸軍建設，極有步驟。單就培養陸軍幹部而言，能從基本着手。陸軍小學卽是培養軍官的基礎，三年畢業後，升入陸軍中學，又兩年，畢業後，再入伍半年，升入保定軍

官學校，開始分科教育，一年半畢業。合計由陸軍小學至軍官學校畢業，需要整整七年的時間。中間幾經選拔和淘汰，最後才造成一個下級軍官，自然健全可用了。這種制度，不但滿清承數千年積弱之後，應該如此，就是現在，我也主張如此。因為外國的陸軍，無不有其百數十年的久遠歷史。再加以近代國民教育的普及，與國民體格之健全，自無須再由陸軍小學入手。中國陸軍基礎尚未建立，而又加三十餘年的內外戰爭，無論在國民教育方面，國民體格方面，都受了極大的阻礙，影響於軍事幹部之基礎甚深。故今後建軍工作，仍須在深培基礎上注意也。

我在陸軍小學一年多當中，除了精神生活習慣，日漸軍事化之外，軍事學術，是很簡單而膚淺的。而普通的課程却居於主要的地位，其程度約等於普通的舊制中學。原來設立陸軍小學，有兩個目的：第一是鍛鍊學生的軍人體格精神，與生活習慣。第二是培養學生將來在軍事學術上必須具有之自然科學基礎。此兩種目的，由陸軍小學直到陸軍中學，都是一貫不變的。

【廣西初期革命情形和建軍歷史】在學校期間，我平日耳所聞與目所見的，無非當時在桂林之新軍人物。除了本校的長官之外，如兵備處督練公所幹部學堂學兵營等，都是這些新軍人會集的機關，而彼此接觸的機會也很多。所以對於這班新軍人物，無形之中，起了兩種感想。第一是他們外表上都很精神，富有朝氣，與舊軍防營的腐敗軍官比較，自然要敬此而惡彼。第二是認為他們都是革命黨，到廣西來，是陰謀革命推倒滿清的，自然更合青年學生的口味。因而許多青年人物，都在不知不覺間，和這班新軍人物，融合同化起來，終於成為廣西革命的導火線。在這裏，我得回溯一段廣西革命初期的情形，和新軍建立的歷史。張鳴岐氏年少有為，引用的新人物中，如胡銘盤治警政，朱文劭任司法，都是當時知名之士。尤其注重的是廣西軍事的改革，以莊蘊寬為兵備處總辦，鈕永建為幫辦，擬定建立新軍的計劃。莊鈕二氏復派王勇公招致許多軍事人才。屬於士官派的，有孫孟戟、陳之蟻、趙炎午、覃德森、田

稼軒、雷壽榮、楊會蔚、唐之道、孔庚、尹昌衡等。屬於國內派的，有呂公望、冷禦秋、劉建藩、耿毅、何遂、錢謨、林之淵、楊明遠等，共計二十餘人，皆少年新進勇於任事之輩，實爲廣西革命最初發動之人物。但這班人到了桂林，莊鈺二人，因和張鳴岐意見不合，先後去職。繼其任者爲按察使王芝祥兼兵備總辦，而會辦一席，則由新到的楊會蔚接任。他們對於建軍計劃，先辦幹部學校，以陳之驥任校長。繼又成立學兵營，任孫孟戟爲營長。其餘和楊陳同來的人，分配學校及營部，擔任教職員。

張鳴岐雖具革新政治之心，對革命排滿，却無此大志。但彼時革命思潮，日漸高漲。莊鈺雖去，他們所招致的一班新人，大都和九龍香港一帶的革命黨人黃興趙聲等，暗通聲氣，祕密進行革命工作。原定俟幹部學校舉行畢業，正式成立新軍時，開始發動革命。不料在此期內，接連發生幾樁事情。第一是辦報被封，尹昌衡、覃蔭鑫、呂公望和先時隨鈕永建同來的趙正平等，出版指南月刊，爲廣西最早的定期刊物。覃、尹、趙等分任編輯撰述，呂爲經理。第一期出版，銷三千餘份。因言論激烈，被巡警道胡銘盤封閉。又改出南風報，亦祇出了一期。因刊載石達開「揚鞭慷慨蘆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攪轡悲羸馬，萬衆棲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的詩。尹昌衡並在封面插畫的竹子葉裏，暗暗畫成「民族革命」四字。旁邊還有一個公雞，像在啼叫的樣子。題爲「雄雞一鳴，天下震動」。又被胡氏覺察，仍行封閉。他們又改出南報。胡氏見他們這樣倔強，因自己是嘉興人，呂公望是永康人，乃以浙江同鄉之誼，邀呂前去晤談，餉以盛餐，勸他們自動停版，不必以腦袋相拚。呂再三要求，乃以先送檢查，然後付印爲條件，准許他們出版。言論既不自由，辦報問題，已實際等於失敗。第二是何遂任幹部學堂隊長，在操場演說革命，一時情緒熱烈，羣衆歡呼。何忽舉手指場中天橋，高呼：「有志革命者，可跳此天橋，以示勇敢！」一個學生因跳橋不慎，傷及腿部，事遂外洩。而幹部學校，亦便成爲政府監視的目標。第三是張氏宴請尹、楊、孫、覃等，席間

，張自言：「革命並不是一件奇怪或可怕的事情，本人有志革命，刷新軍政，即是廣西革命領袖。」說畢，又拿出他新置的手槍，給大家傳觀，說是革命武器。尹昌衡接槍在手，連放三響，將窗上玻璃聲碎。這等舉動，原沒什麼意義。但從假革命的張氏有來，多少有點刺目。當時微笑不語，散席後，每人還致送安南刀一把，以示聯歡之意。一班青年人，感情本易衝動，得此異數，還以為張氏真能贊助他們革命，情緒愈加激昂。不料張已暗約龍州講武堂堂長蔡松坡（鏐），及前任陸小校長被學生轟走的蔣伯器（尊簋）祕密到桂林。派蔡為幹部校長兼學兵營營長，以去陳之驥、孫孟戟、楊會蔚、王勇公、孫孟戟四人，在芝祥。并以隨蔣同來的董吉生（紹箕）為陸小監督，斯變磬（烈）為提調，而將原任陸小監督的雷壽榮，和兵備處經理料長孔庚，先後拘捕扣押起來。一班青年志士始知上了張的大當，一時大為不平。王勇公時任幹部學校教員，竟赴兵備處，與蔣力爭。蔣至撫署謁張請示，不得要領。張并言，明日當開軍法會審。此信傳出，羣情愈加憤激。呂公望晝夜見蔣，長跪兩小時，力求轉圜。蔣說：「大帥已吩咐下來，明天要砍幾個腦袋給大家看看，恐怕不易挽回。」呂涕泣陳詞說：「我輩在浙江時，聞秋瑾女士說總辦是革命同志，所以全體熱誠擁護總辦。現同志們有殺身之禍，無論如何，要請總辦援救。」蔣沈思良久，乃言：「我實沒有辦法，你可去求求王芝祥。他的資格比我老，或者可以說話。」呂復約同王勇公、孫孟戟、陳之驥三人，連夜謁王，苦求設法。王先有難色，後來見他們懇切情形，心為之動。即毅然說：「難得你們有這樣義氣，好好，排我老面子不要，替你們去碰一碰看。」漏夜赴撫署，和張氏磋商良久，議定條件。限這班青年於兩月內全部離桂。特別指定陳之驥、楊會蔚、王勇公、孫孟戟四人，在三天內先行離開桂林。王將此意轉達，並勸他們服從，一場風波，也就此消弭。但廣西革命，經這班人的鼓動提倡，一般青年，尤其是學兵營及幹部校學生，腦海中已注滿了革命思潮。都在磨拳擦掌，等待時機的到來。

【一個革命的小團體】辛亥宣統三年，首有溫生才之炸廣州將軍鳳山，繼而有三月廿九日廣州起義七十二烈士的成仁。消息頻傳，益發震動了桂林每一個青年學生的腦筋。在陸軍小學學生裏，由於平時言論意志之相同，進而爲團體之結合。我與胡馳冀、夏威、黃廷鎮、黃克綏、馮鎮邦、陸受祺、粟鎮國等八人在近松園小酒館內，經過了一次插血式的痛飲，組成了一個小團體。後在城北荒僻的園中租了一個小房子，作爲一個聚會處所，每星期大家都要到那裏去集會一次。一班小孩子，既無憑藉，又鮮經驗，除了酒酣耳熱，作一些慷慨激昂的言論外，也想不出好辦法。但這也算得我等未來獻身國家致力革命的一個起點。這年的暑假，我約同夏威君同去廣州灣一行。目的在廣州灣可以運軍火，且由容縣經高州、化州到廣州灣，路近我等家鄉，而又偏僻，不易爲人注意也。回到家裏，支支吾吾的對父親說，要去廣州灣的話。經父親一再盤詰，遂以實告。父親說：「革命革命，不要把自己的頭先革去了！十幾歲的小孩子，就講革命，究竟懂得什麼叫革命。」其時三兄仲庵正從日本回來。從旁說：「聽說凡是從日本回來的士官學生，都加入了革命黨，革命是一定要爆發的。」父親不再說什麼，我要到廣州灣的意思，亦無形中取銷了，仍舊回桂林去，照常上課。

【廣西宣布獨立】中秋後，武昌起義了。首義的是第八鎮的新軍和陸軍中學的學生。這消息傳來，自然全個桂林都震動了。在以前社會上本來都把新軍及陸軍學生一概認作革命黨。由於武昌首義的參加者，更證明以前的估計非常正確。而新軍及陸軍學生，亦多以此自命。其時桂林的革命行動，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武昌方面，有陸軍中學同學代表任道方李作勵兩人，秘密回到桂林，報告武昌起義情形，人心更爲浮動。這時張鳴岐已升任兩廣總督，繼任桂撫沈秉堃，和藩台王芝祥及廣西諮議局議長等，見大勢所趨，合議響應，乃於九月十七日（農曆）宣佈廣西獨立。由諮議局推舉沈秉堃爲廣西都督，王芝祥陸榮廷爲副都督，定期舉行慶祝大會。

廣西自創辦新軍後，舊軍非常嫉視，宣佈獨立，舊軍多有不贊成者。其中一部分，計劃乘慶祝大會的機會，攻擊新軍和陸軍學生。天將拂曉，陸軍小學學生整隊入城，參加慶祝典禮。行至文昌門，突遭城防的舊軍開槍襲擊，乃退集於李家村。連台新軍與叛軍對峙。結果，叛軍是被解決了。但從此新舊軍意見日深，無法泯除。適湖北方面告急，漢口漢陽，相繼失守，希望獨立各省，派軍赴援。而沈秉堃王芝祥等亦以新軍若出，則舊軍易安，因此力主北伐。同時在新軍方面，本多革命青年分子，羣以參加北伐爲榮。乃任命趙炎午爲廣西北伐軍統領，率廣西混成軍入湘，直趨武漢。其實當時廣西混成協僅有步兵三營，騎術工輜等營隊，實力並不充實。

【參加學生軍隨軍北伐】自廣西宣佈獨立後，陸軍小學已無形陷於停頓狀態。我們學生當中，有主張請軍政府繼續辦理者。我等則主張全體組織學生軍，隨軍北伐。結果，各行其是。願意留校的，任其留校，後來加招新生，改爲廣西陸軍速成學校。願意北伐者，則組織學生軍北伐敢死隊。除陸小一部份同學外，其他中學師範法政各學校之學生參加者，極爲踴躍。因經費及槍械所限，僅組織一隊，共一百二十八人，由梁潤軒先生任隊長，馬英武馬子駿封高英鄧紹伊任排長，黎福楨任特務長。彼等皆係在陸軍小學時任學長助教等職，而爲學生所信仰者。陸小同學分任班長，我亦爲班長之一。我兄天擇以及平時友好，大都參加這個組織。在隊員當中，我今日尚可記憶的，爲胡馳翼、白劍生、呂演新、伍展空（廷賜）、夏威、黃盛垣、俞作柏、梁潮嵩、黃晉、龐海鯤、李雅齋、黃遠鎮、李偉英、呂煥炎、余志芳、梁朝鸞、梁啓生、李少漁、李浩時、秦銳、秦益厚、翟宗保、陸受祺、甘象賢、宋豫章、李朝芳、蒙志、梁薰、白雲亮、劉崇、黃序達、黃良、唐瑞菁、鄭昌珩、邱錦源、葉青、梁希斗、羅傳英、尹振、陳德、梁、陳鴻、封傳鑑、馮曉籟、吳子等數十人，其餘多不及記憶矣。當我兄弟參加學生軍戰死陣時，陸軍政府通知我家。我母非常着急，主發電追我兄弟回家。我父則曰：「彼平日爲國死，命」

清時何能再阻止其參加，聽其自去可也。」

學生軍成立後，經過一個星期的訓練，即隨軍出發，並歸趙統領炎午指揮。當出發時，桂林各學校排隊歡送，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概。乘民船經祁陽、衡陽、湘潭而至長沙，換乘輪船，至洞庭湖，入長江，至湖北省會武昌西南六十里之金口鎮登陸。時清兵已據漢口漢陽，與武昌革命軍隔江相峙。廣西北伐軍奉令擔負左翼軍的任務。由金口渡江，經大集鎮、旬，威脅清軍側後。旋清軍向孝感撤退，我軍更渡過襄河左岸，經漢川縣茅神渡，折而向東，直趨孝感縣。至時，清軍已退至武勝關以北矣。這時南北議和，我軍停止於孝感附近。和議告成，民國成立，軍事行動，乃告一段落。

計自十月初旬，由桂林出發，沿途都沒有停滯。在不滿兩月的時候，軍行三千餘里。其赴援之急，士氣之旺，可以想見。尤以學生軍係臨時組合者，多數為普通學生，事前皆未經訓練，沿途稍待休息時間，即為補助訓練機會，比到同行的新軍，其裝具武器之貧荷，行軍程途之遠近，及一切任務之擔任，各事都是一律，並無些微差別的地方。在整個過程中，我學生軍無一落後者，即生病者亦絕少。此皆由於革命精神所驅使，而不由自主者也。這次，廣西北伐軍任左翼，除了前哨一二次小接觸外，未有大規模的戰鬪，自無若何戰績可言，大家都認為非常可惜。在軍紀方面，比之其他軍隊，一般都好。所以沿途民衆對廣西北伐軍都很歡迎。不過在當時軍隊方面，尚無政治工作人員的組織，所以民衆對於軍隊，僅是一種消極的好感表現，而不是積極的援助。也許是民衆在滿清數百年積威之下，對於革命尚未完全醒覺的緣故。

【和議告成由武漢轉赴南京】南北和議告成，湖北方面的廣西北伐軍，及我們學生軍，奉令調到南京。在民國元年的一月，由孝感縣乘火車到漢口，我們這些廣西的孩子們，都是第一次見火車，第一

次乘火車，大家都感覺得非常驚奇與快樂。武漢是革命首義的地方，而又為中國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以前都深印在每一個人的腦中，一旦到來，自然都要多方的瞻仰。其時租界尚不許帶武器的（即帶刺刀）士兵進去，我們僅能在中國地界裏行走。又因作戰時，房屋多為清兵所焚燒，除了很少的一部份外，其餘都是殘碑破壁，滿目蒼涼。劫後的市民，正在瓦礫堆中，搭起臨時的家屋，以重建他們的生活基礎。在他們的心裏，對於清兵固然痛恨，而對於革命軍，亦不見得很歡迎。因為他們的財產，是由打仗而犧牲的呀。我們過江，到武昌城，第一個遊覽的目標，就是黃鶴樓。這是武漢間在歷史上富有詩意的名勝，在小時讀詩的時候，就留有一個深刻的印象。登樓四顧，「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的詩境，畢現眼前，胸襟為之一開。尤其對於武漢三鎮煙囪林立的工廠，望得神。聽說這些工廠，多半是南皮張之洞所手創，無形中就對他起了衷心的景仰。第二個目的，就是起義門。這是由湖南方面第八鎮新軍及陸軍中學生首先進入武昌的城門。在其右側的楚望台上，曾經架炮轟擊兩湖總督衙門，掩護步兵進攻。致使兩湖總督瑞澂倉皇逃走，完成武昌城的佔領。這種歷時不久的革命史跡，是多令我們注意與懷念啊！在漢口停留三兩日，乃坐長江的民船，用輪船拖帶下南京。沿途浩浩蕩蕩，每經過一個名勝地點，如田家鎮、湖口、小孤山、采石磯等處，都使我發生一種歷史的回想。到了南京，這種感想，就更加興奮了。南京是前明及洪楊時代民族革命的首都，今日又為民族革命的首都，其意義之重大，與名勝古蹟之多，又遠非武漢所能及。我隊初到，駐在小營，即陸軍小學舊址。後又遷至鼓樓南小桃園之端方公館。一個滿清顯宦的安樂窩，忽然變作我們小兵的住所，真是革命軍人最得意的報酬了。日常無事，則結隊遍遊城隍城外之勝蹟。明故宮、明孝陵、靈谷寺、雨花台、莫愁湖、鷗鳴寺、秦淮河、清涼山等，都為我們初到時首先瞻賞之地。

廣西北伐軍隨後出發者，尚有南部：一為陳裕時統率之龍龍兩標，（每標約等一團）此部係蔡松坡

在桂時，以舊防營設爲新軍者，龍觀光陳炳煥曾任標統。因分駐於南甯龍州兩地，故以舊標龍標稱之。這兩標係由西江乘船至廣州，再乘海輪北上。到達南京，在我們之前。會參加天寶城之攻擊，以勇敢善戰，爲當時所稱許。另一部爲潘台王芝祥統率防營六大隊（每大隊約五百人）係由湖南湖北沿江而下者，到達南京，在我等之後。因紀律不佳，在小營被全部繳械。其後以各部桂軍合編爲陸軍第八師，由陳之驥任師長，趙炎午陳裕時分任旅長，此即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時死守南京馳譽全國之八桂子弟也。

〔度過流浪生活後再進陸軍預備學校〕廣西學生軍敢死隊以任務完畢，宣告解散。全體隊員轉送入南京入伍生隊，以爲升入軍官學校造成軍官之準備。但隊員中有許多普通學生，不願從軍而仍願繼續其未來學業者。故在南京入伍者，僅半數有餘耳。南京入伍生隊爲各省學生軍合併而成，共約一千數百人。沈靜氏（靖侯）爲總隊長。分步騎砲工輜各科。我分在騎兵科，入騎兵隊。不久，因隊中官長多爲他省陸軍小學的同學，學識與我差不多，而且又沒有部隊之實際經驗。全部僅有馬數匹，設備多不完全。所以我到前途，非常失望。乃請求退出廣西學生軍隊員，同時請求退出者甚多，四兄天擇亦其中之一也。我自退出入伍生隊，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既無書可讀，又不能做事。而我又意願在一無成就之時，回到老家去，致愧對我的父母。甚至我所需用的旅費，亦不敢在家信中提及。在南京流浪了兩三個月，情緒至爲無聊。其時我族兄劍鳴及陸軍中學同學朱良祺李孟庸等，同在湖北都督府當參謀。我毫無目的，又跑到武昌去，同他們住在蛇山南麓的兩廣會館，仍舊過着流浪的生活。他們一個月祇有二十串錢的薪水，而且是一月拖一月的，才能夠領下來。自己已經困苦，再加一供應我的食用，自然更困難了。是以常常弄得朝不保夕，有飯無菜的過着艱苦的日子。到了秋天，南京入伍生隊奉令改爲陸軍第二預備學校，設在武昌南湖。以前湖北南京清河各陸軍中學未畢業學生，改爲陸軍第一預備學校，設在清河（北平北四十里）。南京入伍生都到武昌集合，劍鳴兄亦準備北上入學。我這時才追悔當時不應該流浪

請退，以至弄到進退維谷。後來田劍鳴兄設法，並得李抱冰先生的幫忙，乃得復學。數月來流浪生活，始告結束。而我在這流浪期間所受之教訓，亦最深刻。所以我入學之後，就抱定宗旨，不開風潮，不參加政治活動。一直到軍官學校，我這宗旨，都未變過。因為我會經受過深刻的生活教訓，自己學業未成，不特不能遂行自己的主張，即生活亦要受種種壓迫也。

陸軍預備學校即以前陸軍中學之變相，課程有國文、歷史、地理、物理、化學、辯論、圖畫、幾何、三角、代數、步兵操典、外國文（分英德日法俄五種，任擇一種），其程度約等於今日高中及大學的第一年級，兩年畢業。因入伍生隊的學生程度參差不齊，有陸軍小學未畢業，或僅高等小學程度者。乃加三個月之補習課程，並舉行甄別考試，始正式上課。一切設備，皆極完全。教員亦多飽學之士。所以在短短的兩年當中，將全部課程教完畢業，考試時，全般的成績，亦都不壞。這不能不歸功於師長之熱心教導，和軍事管理的嚴密了。

我在陸軍小學時，學的是英文。到了陸軍預備學校，因羨慕德國的陸軍，乃改學德文。起初教我們的是一個德國人格拉氏先生，當我二十六年主政湖北時，他尚僑居武昌，曾來看我，已是七十餘歲的老翁了。以前陸軍學堂對外國文非常重視，由小學中學，一直到軍官學校，外國文都佔很多的鐘點，用意是在養成能通達國際形勢的國防幹部。可惜同學中精深的很少，而我更是中途棄置，及今思之，尚深悔憾！

國文也是學校裏很重視的一科，但是課本的取材，與教授的方法，是太不合理了，我記得在陸軍小學的時候，開講頭一篇國文，就是太史公的「項羽本紀」。到了陸軍預備學校，頭一篇是莊子的「秋水」，其餘都是唐宋各大家的古文。教授這種文字的意義如何，現在想起來，還是莫名其妙。當時教授國文，大約是明理第一，文法還在其次。我對於古文，也曾下過苦功去揣摩簡練，想仿效某一家某一篇的

作法，但是畫虎不成，反而類狗，白費許多腦筋，總不能有所進益。後來隨便讀些散文，隨着自己意思，自由寫作，倒反覺得易於進步。那時候，新文化運動尚未發生，一切的記述，都要帶些古文意味，才可入眼。有一個同學名叫黃良，他把校長金永炎先生的訓話，用湖北的語調，或北京調，描寫出來，裏頭有很多「咱們」、「你家」、「要不得」、「麼子」等字樣，這篇詳盡而很生動的日記，呈上去，教官看了很多的叉叉，同學們當作一個笑話來講。現在想起來，實在倒是語文先鋒的記錄。

人類的意識，多是後天環境形成，而不是先天所具備的。我之所以反對舊學，信仰新學，是因為我自小就未讀過舊學，而接近新學的原故。有些人已經讀了舊學，因為受到一種新的實際的刺激，而感覺到舊學的空虛無用，而從事於革新運動。但是他所受的損失與困難，就太大了，即就新學中各種科目而言，學生對於某一科的興趣與認識，都是先由於環境的被動，而轉變為內心的主動。我在陸軍預備學校的時候，因為聽見很多人說國文、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的重要，所以對於這幾門功課，多用一些功夫。到了軍官學校，對各種兵的分科，也是聽見人說步兵範圍廣大重要，所以就志願學習步兵科。這並不是我不宜於其他各兵科，而是被動的走入步兵科裏面去，並認為其他的兵科，都沒有很大價值的緣故。所以我以為國家社會及學術界的先覺者，必須造成一個進步的正確的環境及事實，使後學者有認識，有遵循，而後才可大量發展他們的天才。天才不過是事後的比較表現而已，決不是先天注定某一個人宜於某一種學科，而不宜於其他學科的。

在陸軍預備學校的兩年當中，校長換了四位。第一任為金永炎先生，第二任為應龍翔先生，第三任為史國鈞先生，第四任是解朝東先生。學生對於學校，總是不滿的，總以為換了校長，就可以滿足所望。但是結果往往適得其反，伙食是愈換愈壞，教育用品是愈換愈少，弄到最後，大家都不希望改善，祇是希望能夠早一些畢業就算了。後來到了軍官學校，亦是同一現象。這種情形到處皆然，我不知是中國

辦事的必然趨勢呢，這是學生觀念的錯誤？這真是建國前途的極大障礙！

武漢爲革命首義之區，亦爲事變最多之地。我在那裏住了兩年多，中間經過好幾次紛擾。武昌長街樓鼓洞時時見到血淋淋的人頭，掛在那裏示衆。有一次，一個湖南人姓蔣的同學，也因爲謀亂而被槍殺了！幾幾乎危害到全校，在我當時，因爲抱定宗旨要把學業修讀完畢，所以對於這種變亂的前後因果，一些也不過問，一些也不知道。好在這等變故，結果總是政府當局勝利。所以學校也就平平安安的過去了，我也得順利的讀完三年的功課，而至畢業，真是大幸！

【心神不安與回籍奔喪】民國三年的夏天，學校考期已畢，就要放暑假。我忽然感到心神十分不安。同時非常想回家去一趟。而暑假的日期祇有二十日，計算來回的時間，無論如何是不夠的。又恐怕逾期，就要受開除學籍的嚴厲處分。但是這種顧慮，終遏止不住我的歸心，弄得我好似發狂的樣子，遂不顧一切，而自行南歸。及回到寧縣城，方知我父已於半月前逝世了！我得到這個噩耗，痛不欲生！自從我出門求學之後，祇回去兩次。每次見我父親，時間都是很短。不料這次短別，竟成永訣。悶極之恩，遂無從報告矣。諸兄因我畢業在即，假期有限，不欲我回來，故不電知我。我亦不自知得何暗示，而毅然過歸，於盡喪葬之禮，亦事之不可解者也。留家僅數日，告窆而成，即行起程返校。由我家到武林口乘輪船，約三百餘里，費兩日時間，就趕到了。沿途不停的，由香港到了上海。其時正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戰爭爆發，協約國在黃浦江之海軍兵艦，戒備甚嚴，即行嚴者，亦有所感覺。到武昌時，已逾假數日，學校因戰爭延長假期，我遂未被開除，可謂不幸之幸！

【畢業後的人伍生活】民國三年冬，我畢業於陸軍第二預備學校，成績僅屬平平。奉令由漢口乘火車到北平入伍，一個嶺南山國的人，初次走進中原的地域，在一望無垠的大地上，馳驅了兩千多里，處處都感覺得胸懷的舒服。到了北平，我分發在北苑的陸軍第十師入伍，師長是盧永祥，後來他調到上海

任淞滬鎮守使，不久，又做了浙江省的督軍。有些同學，則分發在南苑的陸軍第八師，或者是在保定。在各師入伍的同學，並不是集合在一起。而是每一連內，分插數人，與連內的士兵共同生活。但陸軍部對入伍的教育，並沒有一個計劃，祇是任各師官長隨便規定。甚至是毫無規定，祇是隨隊出操上課堂。而且當時各師長官，尤其是下級官，大多數是行伍出身，根本就不能教育或認真管理我們。各下級官對我們的態度：第一種是客氣。因為我們入伍是暫時的，犯不着認真。第二是妬忌。以為我們將來畢業後，就要爭奪他們的飯碗。第三是輕視。他們自己以為有了許多平時戰時的閱歷經驗就夠了，學堂裏的科學，在軍隊裏，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所以我們入伍，得不到什麼良好的效果，僅僅對當時軍隊裏好壞的情形，知道一些，就算挨過了半年入伍的階段。

那時的北江陸軍，多半是袁氏小姑練兵時候，將舊軍改變而成，在編制與形式上，倒是很整齊劃一的。但是內容與技術上，却是很陳腐腐敗。高級的將官固然大多數是短期改造的舊軍官，中下級幹部亦都是隨營學習或行伍升充的。我們在隊伍裏所最恐怖的就是每一個營連部門口，掛着半截紅半截黑的兩條軍棍（又叫火棍），和兩個空牌，差不多每日都有人要嘗着軍棍的滋味。視罪過的輕重，定打數的多寡，有的打得要死，人半個月不能將養復元。我們那連的連長，也時常挨打。他被打之後，還笑嘻嘻的對我們說：「今天又領了一打，」在他們的心目中，對於挨軍棍是很平常的事情，好像每月領餉一樣，習為慣常，行所無事。有些甚至對我們及士兵說：「那一個大官不是由軍棍打出來的？」我們想：「這種不知羞恥的軍官，怎能為國效死力呢？」但是這種刑罰，也有因人而施的模樣。學校出身的人，受到的極少。曾聽見說：「有一個學生出身的軍官，因被打軍棍而自殺！」想這就是由於學生能毅自尊自愛的原故。

袁世凱要做皇帝，在北洋的軍隊內，很早就做了政治工作。我們在隊伍裏，每星期必有一兩次的講

道。講道時候，把袁氏的大照片擺在講台上；講道的人，都是穿長袍馬褂的文人。講的內容，都是袁氏已往的功業，及在高陽被人炸斃不死，可信天命攸歸等神話，以及對民國創造的功績。這種講演的用意，在我們心裏，自然明白。而一般頭腦簡單的北洋官兵，則不免受他的麻醉。此外還編有一些鼓詞歌曲，專門詆毀國父及南方反抗他的革命黨人。我們聽了，不但生氣，而且感到肉麻！但就此種辦法而論，實開軍隊政治工作之先河。在袁氏則叛國稱帝，倒行逆施，終無補於失敗耳！

民國四年五月九日，我們幾個同學正在閒談，忽然同學尹作翰哭喪着臉，跑來告訴我們說：「政府對日本所提二十一條款，已經承認簽字了！」好些人聽了這話，跟着痛哭起來。我很嚴正的對他們說：「哭有什麼用處？我們應該拿出自己的力量，來挽救國家的命運。」於是我們這班同學，就開始對袁世凱起了痛恨的心理。等到他改元稱帝，反對就更加堅決了。

【升入保定軍官學校】我們在四年六月間，入伍期滿了，升入保定軍官學校的第三期。我學的是步兵科，這時的校長爲曲同豐先生，教育長是楊善德先生，他是老辦教育的，相當得到我們學生的信仰。那時在校的學生，有第二第三兩期。大多數都是南方人。而且大多數都參加過辛亥革命軍事的行動，因此袁政府非常不信任。遂借故將曲校長更換，而調派他的親信軍官模範團團附王汝賢先生來繼任校長。軍官模範團團長，則由袁氏自兼。團附及幹部，皆爲其親信之高級軍官，學兵皆由北洋部隊保送，或在北方招考者。其目的在養成帝制之陸軍幹部，以替代軍官學校，袁氏死後，始解散。一部改爲保定軍官校之第三期。

王校長不學無術，而具有十足官派。初到校，很想討好學生。對於伙食，十分注意，稍有不好，即行批責廚司。在那時飯食一項，真可說是「空前絕後」的好，是值得我們贊美的。後來因爲一位同學偷看順天時報，被他查出了，便引起一場很大的風波。原來順天時報是日本人在北平所辦的報紙。日本政

府暗地裏慫恿袁氏稱帝，而他們所辦的順天時報，却明顯的反對帝制。用種種方法，挑動中國的內戰，以遂他吞併的陰謀。王校長以爲看順天時報的人，便是反對帝制的革命黨，於是集合全校學生，將那看順天時報的學生，大打軍棍。同學大憤，鬧然喊打。王校長見勢不佳，退入校本部，並用電話調附近的陸軍，將全校包圍，所有的槍枝，都繳去了，大砲亦繳去砲門。每一班都派兵一排，武裝監視，情形嚴重已極。一直監視了一個星期，見我們沒有什麼舉動，才把兵撤退。從此我們學校就成爲一個無武器的軍官學校，一直到袁氏死了，才把武器發還。

袁氏死後，王校長也隨着調開。繼任的校長是由教育長楊善德升充。自從學校繳械風潮發生，有些同學跑到天津，從事反對帝制的運動，我雖然知道，也有人邀我去，但是我立志要待畢業後，才參加各種工作，都一一婉言辭絕了。袁氏死後，跑到天津的同學，也陸續回來。有的因爲曠課過久，而被延期畢業。

「求學時代得失的檢討」民國五年的冬天，學校舉行畢業考試，我也僥倖得到一張畢業文憑。從此我的學校生活，便告終結。若講到學問方面，真是慚愧極了！原來我在陸軍預備學校，就沒有好好將各種自然科學的基礎打好。及到軍官學校，更懷了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爲一個將領，祇要勇敢不怕死，戰略戰術運用得確當，便可以克敵制勝。而忽略了科學技術，與工業物質，乃是國防軍事的基本條件。不但我們學生多數如此，即我們的教官先生，也都祇見到一科的方面的技術問題，而缺乏全般的綜合的基本指導，這真是數十年來中國國防軍事不能進步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在軍官學校的時候，對於含有自然科學性的幾門功課，都非常疏忽。比如兵學，祇認爲是學炮兵科的專門技術，而不了解武器在軍事上有決定勝敗的意義，凡是每一個軍官，尤其是高級將領所必須注意研究的；單就一門兵器學它所需要的自然科學，就包含物理化學數學氣象學地形學等許多基本的學識。若更推想及兵器製造及其來源，則

科學的範圍，更是廣大而重要了。

如右所述，我的觀念雖不免有錯誤的地方，但是對於戰略戰術，確曾用過一番苦功。不但對學校所定課程，精心研究，即當時出版之此類書籍，我都瀏覽殆遍。我的戰術戰略課程，不是分數主義，而是問難主義。有時教官被弄得很為難。這使我後來應用上，得到很多的益處。至於其他的課程，就完全是分數主義了。必定到了臨考試的時候，才會來翻一翻，把他的要點，加以強記，來應付考試。有些教官，甚至說：「祇要你不交白卷，總可給你及格的分數。」可以想見我們的乖謬。而擔任本課程的教官，亦陷於同樣不重視其所授課程的毛病。其實他們的目的，祇謀課程紙面上成績的好看，對於學生真正的學業，根本是不負責任的。

先生授課的熱情與學生的學業，關係是很大的。我回想由陸軍小學而陸軍預備學校而軍官學校，許多的教官與先生，除了他所擔任課程的基本學問之外，還要有豐富的熱情。如果沒有豐富的熱情，即使有很好的學問，也，容易使學生領受。記得在預備學校的時候，有一位數代數的崔朝慶先生，他的數學，在當時是很有名的。但是他已過六十多歲，熱情是很低落了。一口揚州話，不易聽得懂，而貌又怪可怕的。結果，學生都不願聽他的課，自然得不到很好的成績。反之，另有一位先生，他的學問並不見得很高明，但富於教授的熱情與方法，學生都十分願意聽他授課，而收到極好的成績。因此，我覺得一個好學者，並不一定是一個如先生，學校所需要者，乃是好先生，並不一定好學者。這種情形，在高中以下的學校，尤為顯著。

【學成回里】畢業後，照例要分到各省各部隊去當實習官。分發的地方，雖說由各人志願，而大部分發回本省。因當時陸軍部對於造就之陸軍學生，尚未有一個如何使用的計劃，而且北洋政府對於軍官學生，根本上就不信任，所以分發到各省去，任由各省當局，自由錄用。亦即任由這班學生自尋出路的

意思。

我於民國五年的年底，乘津浦鐵路南下。此路通車不久，一切都極簡陋，行車時，顛簸頗爲厲害。以與後來行車設備比較，真是差得太遠了！到南京，轉車到上海，完成了一次新的陸路旅行。到了上海，改乘輪船，直駛廣州。這時的廣東督軍爲陸榮廷氏，是不久以前從擁護帝制的龍濟元手內奪來的，曾經過大半年的戰事，戰爭停止，尙未很久，是所謂討龍之役。我到家時，已經臘盡。遠方遊子，千里歸來，天倫之樂，真非筆墨所能形容！我目宜元年負笈遠遊，至是整整八年，中間雖經過不少的困難波折，而在學業上，總算告了一個段落。這不僅是我個人稍可自慰，而對我泉下的父親，及堂上的慈母，更給予莫大的安慰啊！

三 在陸譚部下當下級軍官

【晉省報到】我在家逗留不久，就動身到南寧去報到。南寧是廣西新遷的省會，古稱邕州，在邕江的北岸。有小汽船，東通梧州，西通龍州與百色，交通頗爲方便。這是我第一次去新省會。由我家鄉到南寧，多半先到梧州，再搭輪船西上，經過藤縣平南桂平貴縣橫縣永淳等縣，全程約五百公里，爲西江上游最長的航線。可是沿途風景，比之桂江，覺得太平凡了。河道亦平暢易行，祇有橫縣下的伏波灘，最稱峻險，破舟傷生之學，時有所聞，行旅至此，多有戒心。灘下常設救生公所，我在十四年時，亦曾於此遇險，其救護至爲得力。岸上有馬伏波廟，上下船隻過灘後，必鳴號以致敬意。馬伏波將軍在廣西之偉績，僅在一個河灘上，爲旅行人所景仰，亦可謂徒見其小耳！

廣西遷移省治之事，在宣統三年，諮議局已有人提議。其理由是桂林太偏東北，交通不便，軍事政治都難顧及。全省贊成者，多爲大河一帶的（卽梧州潯州玉林南寧龍州百色等府屬）議員，此爲當時諮議局一個重要的爭辯案。後因政局改革，遂無結果。民國二年後，陸幹卿（榮廷）主政，乃將此案重提。陸氏是南寧武緣縣（後改爲武鳴）人，主張遷省致力，省會乃隨其人而遷至南寧。迨二十五年，又遷回桂林。桂林失去其省會資格者二十三年，至是始又恢復其地位，亦一歷史故實也。

【陸榮廷在兩廣勢力的發展】在未述我在陸譚部下充當下級幹部的情形之前，先得將當時廣西的軍事政治，作簡單的說明。陸幹卿在民元未改革以前，已至提鎮地位。當民族革命高潮澎湃的時候，思想上少要受到一些影響。廣西之宣佈獨立，他自然是一個重要腳色。鼎革之後，各省對於岑風使航宣佈獨立的滿清大吏，多不滿其所爲，而攻之使去。彼輩亦甚願趁此下台，作保存生命財產之計。故沈炳堃

王芝祥之離桂，實勢所必然。（沈以湘桂聯軍總司令名義領軍出發，至湘，即逗留原籍。王率兵至南京後辭職）而陸氏以副都督之地位，又爲本省人，其受桂林人之擁護而得任都督，亦爲非常順利之事，而無待強求者。同時廣西內部情形，原極單純。辛亥後，新軍及合省之新舊人物多已離桂，陸氏以舊軍之領袖，經民國元二三四四年之經營，自可成立一個完整之力量。不但爲本省所擁護，亦爲外間所重視。

袁氏帝制發生，龍濟光盤踞廣東，逞兵殘暴，效忠袁氏。當時唯有陸氏之力量，足以討龍。唯有廣西地位，易於攻擊。所以胡展堂梁任公諸氏，不惜風塵僕僕，遠道入桂，無非要利用陸氏之力量與地位，以討袁計龍。遂啓陸氏軍隊入粵之始。龍氏既去，陸氏勢力，乃更伸張，而至掌握全粵。及護法軍興，力量更發展到湖南。此爲陸氏之黃金時代，亦爲粵桂戰事之開始時期。我認爲此種歷史之演變，不是出於陸氏等某一個人之本身，而是環境和機會造成之事實。古人所謂時勢造英雄，就是這個道理。我在陸譚（浩明）部下當下級官，由他全盛時期一直到其崩潰時期，雖然處在一個很微末的地位，不能全般明瞭當時之內幕，但自己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對於他們命運，都有相當的關係。

其時廣西督軍爲陳炯明氏，省長爲李靜誠氏。陸氏於是年春間，入北京親見黎大總統。出京後，即奉令爲兩廣巡閱使。在表面上雖爲輔其討龍及擁護共和之功績，其實兩廣區域，盡在其個人勢力範圍之下，亦等於順水人情耳。陸氏回粵後，乃以譚浩明氏爲廣西督軍，陳炯明則調廣東督軍，旋又調兩廣護軍使，而以莫榮新氏爲廣東督軍。

陸氏都是舊軍出身的人物，他們的部隊，自然以舊軍爲主。舊軍的編制，即係前清所遺下的巡防隊的組織。統制統轄，營至六營，統制轄兩營至五營，營帶統轄一營至三營，營帶統轄一營。每營分前後中左右五哨，每哨官兵一百名，設正副哨官，下設哨長，每哨八棚，正哨四棚，副哨四棚，五哨爲大營，二哨爲小營，邊防用大營，內地用小營。以後復將統領等名稱改爲正副司令。民國初年，編

爲軍混成旅。嗣後又增編爲兩個師。皆係將原有巡防營改換名目而已。第一師師長陳炳琨，後改陸裕光。（陸氏長子）第二師師長譚浩明。因爲編制複雜，卽在同一隊部中，其官兵多寡，亦有不同。所以陸氏當時有多少實力，確數很難知道。不過據估計，民五以前，全部至多不過兩萬人，民五以後，在粵逐漸擴充，共計過五萬人。這是陸氏兵力的概況。

陸氏時代的政治情形，更無足稱述。民元，陸氏以督軍兼攝民政，民二至民五之巡按使或省長，如張鳴岐，田承斌，王祖同，皆爲袁氏北洋政府所任命。僅張鳴岐任期超過一年。張氏爲陸之舊上司，陸氏對之，尙相當敬服。其餘任期，皆爲數月。且多承陸氏之意旨，以爲大留。民五以後，如陳炳琨，劉承恩，李靜誠，皆爲陸之私人，去留動作，皆唯陸氏之命是聽，真如告朔之餼羊耳。

【我在桂軍第一師見習】我們第三期的畢業同學，都分發在廣西陸軍第一師見習。當時廣西的軍隊，以陸營佔大多數。陸裕光的陸軍第一師雖號稱新軍，亦甚腐舊。旅團長及許多幹部，都是舊軍翻新的。而且組織不健全，人數不充足，不單第三期新畢業回來的軍官學生，無可工作。就是畢業了多年的第一第二期的同學，亦仍在那裏充當見習官。所以大家對於前途，非常失望。

一個剛由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總是自視很高，時常抱着一種學校裏能課程萬能的觀念。及到了部隊裏去，無論是好部隊壞部隊，都有許多實際問題，與實際生活，是學校裏所沒有的，非得細心去學習不可，部隊長官亦有領導教育的責任，見習的意義就在於此。可是你到一個不健全的部隊裏去見習，部隊長官總是採用放任的態度。聽由你自己去摸索，結果，弄得有些人僅是學得一些軍隊實際生活，甚至是一種惡生活，而反把學校中所學的基本學術，都荒廢了。這種情形，不但我們那時所感覺到的，就是現在，亦是如此。真是國興個人的極大損失，以後應當如何去設法補救才好。

【和盤珠祁談治軍】我在見習期間，因爲空閒無事，常到我同鄉盤珠祁先生處聊天。他是前清的秀

才，後來到美國去留學回來的。一個秀才，又是一個西洋留學生，很引起我的崇拜。我會請教他對於修習學問的方法，並介紹一些增長學問的書籍來看看。他答復我說：「學問的範圍太廣泛了。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一不包。含有極大之學問。你不要以為我留學回來，便有什麼了不得的學問。其實我僅僅是學了一些農業的專門智識，其他學問，種類繁多，不論泥水木匠，和一切農工商礦人等，都各有其專門學識，不是一個人可統統學得了的。正如你在軍官學校畢業，在我看來，你就是一個軍事專家。但是我相信你在軍事範圍之內，就未必學得完全，何況其他部門。我以為研究學問，切切不可把學問當成一個神靈，一個偶像，對他迷信，向他膜拜，而祇是向很平凡的生活中去追求。能夠體察日常生活中的種種道理，便是很高深的學問了。你更不可以為我是一個秀才，便有很多中國的舊學問。秀才不過會做兩篇八股文章，根本談不上什麼舊學。但即使舊學精通，而此等學問，亦祇是在倫理上有一些當時的時代價值。但是到了現代，還有價值的是太少了。你說要介紹學問的書籍，我實在不能指定某一種書可以介紹給你。歸根一句話，你所需要的學問，是要你自己在實際生活中去追求。」我聽了他這一番理論，細細體味，覺得頗有至理。這於我以後為學做事，有極大的裨益。

「陸軍模範營成立我開始帶兵」是年夏間，當局擬創辦陸軍模範營，為改造舊軍之基礎。同時因尚有陸大及保定軍官學生，也藉此設法安置，適馬曉軍先生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來，頗為當局所重視，令他負責主持其事。當時廣西士官學生，僅彼一人。彼嘗以唐人詩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自譽，蓋舊軍多綠林出身也。

後來模範營遷於廣西之軍事改革，貢獻頗多。而陸譚政權最後之消滅，多出當日陸軍學生及模範營份子之手。則滿清創新軍而覆亡於新軍者，如出一轍。則又非辦理時始慮所及，殆亦為新陳代謝自然之理歟！

陸軍模範營成立，即任馬曉軍爲營長。馬子駿爲營附，羅經爲副官，朱爲珍、曾致沂、黃旭初、蕭端爲連長，我與白劍生、徐啓明、余志芳、鄭昌燊、許漢深、夏威、周已任、張守義（即張淦）、陽鑑、況永、陽應照、李先復、潘啓堅、杜柏、楊幹、況淑、廖先、梁朝璣、黃中聰、徐耀祖、馮毅剛、黃駿等爲連附。這種不按編制的許多連附，完全爲安置無工作的學生而設的。招考學兵六百餘人，多爲高小畢業生。並由第一師抽調優秀士兵，先期加以訓練，派充班長。故幹部士兵程度，水準頗爲整齊，實不愧爲當時之模範也。

我在第三連充當連附，連長爲黃旭初。李先復、潘啓堅、杜柏、況永、楊幹、況淑也都充當連附，同在一連，這是我帶兵生活之開始。那時我無論在管理方面，訓練方面，都很用心去研究學習，經驗學術，增進不少。所以在短短的三個月中，頗能把握士兵心理，而得到其信仰。同時由於自己肯勇於負責，故亦頗得同事們的敬佩。

〔模範營參加護法戰爭〕是年的秋天，模範營奉命出發湖南，由南寧乘汽船到平南藤縣間之濠江圩登陸，經蒙山、荔浦、陽朔，而到達桂林。在桂林稍事休息，再經靈川、興安、全州，而到達湖南之零陵。本營因成立未久，訓練未完。而學兵皆爲學生，年輕體弱，官長經驗亦少。在長途之強行軍中，自然暴露很多的缺點，而以士兵落伍爲甚。到達零陵後，奉令留駐永州，繼續訓練。在永州訓練期中，營內增編機關槍一隊，我與白劍生夏煦蒼（威）自己請求調爲該隊隊附。因隊長無適當人選，遂不設置，凡事皆由我們三人商量辦理。我們因歷年同學，而又見解相同，辦事頗爲順利。實開部隊無首長之先例，亦爲奠定此後統一桂局合作精神之基礎。不久，三四兩連調駐祁陽，我乃離隊，仍回第三連服務。

護法之役，原起於北洋政府之毀法。一部份國會議員南下，以護法名義，在廣東組織軍政府。而出兵湖南，則由於湘軍之驅逐湖南督軍湯壽潛。湘軍力薄，屢戰不利，被迫退到寶慶及湘南一帶，乃聯合

兩廣桂軍，卽利用護法名義，出師北伐。兩廣桂軍亦恐北洋勢力南下，危及兩廣之根本，同時亦可再向湖南發展其勢力。所以願意和他們合作，雙方真意所在，固不關護法與毀法也。湘軍得兩廣桂軍之增援，將北洋軍隊及湯薌銘驅逐，收復長沙，挺進岳陽以北。譚浩明氏以廣西督軍之地位，率兩粵桂軍入湘，一切均由其支配。到零陵後，被推爲護法軍湘粵桂聯軍總司令，實由其本身力量所造成也。

譚氏抵長沙後，因原有衛隊皆爲防營舊軍，難免貽笑大方。其左右獻議，聯軍總司令部應有訓練成熟紀律良好之隊部，作爲衛隊，以壯觀瞻。乃令模範營開赴長沙，改爲湘粵桂聯軍總司令部衛隊第一營。升任馬曉軍爲副司令，兼該營營長。陸軍模範營名目至是取銷。我營到長沙，除擔任警衛之外，就是糾察市區之軍風紀，頗得市民好評。

我在長沙不久，湘粵桂聯軍就在岳陽羊樓司附近敗潰了。潰敗的原因，據說第一是吳佩孚部隊的增援。吳氏原駐長江上游，對湖南地盤，早思染指。因礙於湯薌銘，而不能下手。湯既被逐，卽乘機南下。吳氏所部，號稱能戰，粵桂聯軍，自難抵禦。第二是由於內部意見不和。蓋譚氏不學無術，徒以桂軍勢力，遽臻聯軍統帥地位，自難得湘軍之擁戴。加以內幕人才缺乏，對於政治軍事，多屬外行。因而入湘後種種措施，每爲湘人所不滿。聯軍戰線，遂形瓦解。自岳陽潰退，直至衡山，方能收拾隊伍，略事抵抗。吳軍節節進迫，佔領衡陽後，復追至祁陽與零陵間之黃姑嶺，始行停止。

我營因係衛隊，皆未參加戰鬪。由長沙經湘潭、衡山、衡陽、祁縣，退駐零陵之東湘橋。桂軍自經此次失敗，始漸感舊軍之不能作戰，對新軍觀念，稍爲改善。因而由營調去很多學兵，到舊軍去充當教練，並調若干官長到部隊去當參謀。於是我營人事，頗多更動。黃旭初升八營附，白劍生升爲第一連連長，張守義升爲第二連連長，我升爲第三連連長，廖光升第四連連長，夏照蒼升機關槍隊隊長，營長仍爲馬曉軍。此民國七年四五月間事也。

東湘橋爲零陵全州間之一小鎮，我們在那裏駐防訓練的時間甚久，也就是我們在軍事上建立基礎的時期。軍民相處，猶如家人，毫無隔閡。民國二十七年，我與白劍生由南岳回桂，同到該處，訪問士紳徐敬安等，相隔二十年，瑣事猶可記憶，彼此皆不勝今昔之感也！

民國八年的三四月間，據說吳佩孚和陸榮廷彼此獲得了諒解。吳軍退出衡陽，桂軍退出桂境。一場護法戰爭，無聲無臭中，就算結束了。我營亦於五月間回桂林，旋又開回南寧。我們平日無他嗜好，唯愛馬成癖，視馬匹無異良友。當排長時，我與白劍生夏煦著等，人各一騎，互相競賽。照陸軍規則，步兵下級軍官，本不准乘馬。馬營長因爲取締乘馬，甚至說要拿刀來斬我們的馬腳。但是我們仍多方設法，得以保留。其後在柳州附近，我復以重價購得駿馬一匹。由柳州至南寧，沿途多係丘陵波狀地，道路寬廣，甚合馳騁。我和白劍生並轡前驅，行至牛峯圩附近，適值大雨，山洪暴發，路被水淹，有如湖沼一般。我們仍涉水前進，愈進愈深，竟至三頂。劍生先我出險，我本能泅，但因全身武裝，無由用力，浮沉者再，乃大呼求援。劍生喘息之餘，亦爲武裝所累，不能下水。岸上牧人見我求救，反而逃避。我見救援無望，忽生急智，乃閉氣下沉，幸足可到地，將武裝解除，游至對岸，始得脫險。現在回想，岸上的人見我呼救，反而走避，真是怪事。那裏的人，對於見義勇爲捨身赴難的精神，實在太少了。

〔進剿左江土匪〕當時左江土匪猖獗，同正、扶南、左縣、崇善、綏緣等縣情勢甚急，乃派馬曉軍率隊進剿。初到時，因諜報佈置未妥，地形不明，無從着手，土匪劫掠如故。地方人士對於陸軍學生所訓練之新軍，多認爲不能剿匪，而橫加譏笑。同時各縣土匪，總數雖僅有數百，而分枝十餘，日散夜聚，最不易找到攻擊目標。尤其是在駐有軍隊附近的匪幫，早已散而歸農，無從分別誰是匪，誰是民。我們費了一個月的工夫，將匪情弄清楚。並想出最有效的剿匪方法，是夜間遠襲。因爲日間進兵，匪皆閉風避去也。第一次夜襲，就選擇離我們駐地四十餘里從未有軍隊到過之匪窟昇午岸郭爲目標。隊伍在夜

裏十一時出發，經過許多崎嶇危險之山隘，到達目的地時，已將拂曉，數十名土匪正在夢中，無法抵抗，而被我們攻破。匪衆都匿於附近山地，乃黃昏以後，復集合起來，向我駐地襲擊。幸警戒嚴密，不致爲其所乘。在很短時間內，就將其擊退。但是土匪僅有數十人，而我們使用的兵力，却有三連之多，雖勝不武。次日，在匪村內搜得破槍數枝，並捕獲匪的村甲長數人。而我們長官與當地的縣長，乃多方煊染，向軍政當局報捷，竟邀嘉獎。我心中不免暗自叫聲慚愧。從此也就清楚地方政府及防軍剿匪，是怎樣的以虛僞的情節，向上峯邀功的辦法了。不過經此役後，我們知道這種夜間遠襲的方法，對剿匪確屬有效。土匪根本不能與官軍作正式之抵抗，從此乃更不敢與我隊伍對戰。以後土匪愈避愈遠，我們的部隊，遂以連爲單位，分開使用，範圍亦愈襲愈遠。記得有一次，我親率本連，在一夜之間，行軍九十里，遠襲匪窠，將其匪首拿獲。次日仍回到駐地。所以各連在駐地周圍六七十里半徑之內，祇要偵實股匪蹤跡，皆用此法襲擊，使股匪不能防備，不能逃避。在兩個月之間，就把五屬的土匪全部肅清。我們紀律很嚴，第一是不准燒房屋，第二是不准亂開槍，第三是不准擄財物，當軍隊入屋搜查時，必要保甲長隨同監視。待任務完畢，在未離村之前，必將隊伍集合，召集村民，公開檢查後，方率隊回防。所以人民對於我們部隊，非常信任。一有匪蹤，無不立刻報告，亦無不立刻派隊圍捕。統計是役，我營未燒過一間房屋，未妄殺過一個人，未擄過一分財物。而所有土匪頭目，除了兩個遠走之外，都擒獲正法。五屬自此以後，平靜數年。當我們部隊開回南寧時，五屬人民皆派代表到營，舉行盛大之歡送。甚且有爲馬營長建生祠者，亦可見人民對我部隊印象之佳且深矣。

新軍不能剿土匪，爲當時社會上之誤解。蓋舊軍軍官及士兵多有綠林出身者，對於匪情，自然熟悉而易於辦理。新軍軍官皆爲學生出身，士兵皆爲安分良民，不能稔習匪情，當然不易着手。甚至如武建聲（前清光緒年間湖北軍隊調廣西剿游勇）之進剿陸王發，幾至全軍覆沒。其實，舊軍剿匪多與匪通聲

氣，兵來匪去，兵去匪來，爲彼此會心的作法。官軍則藉此而邀功，人民乃因此更受其害。最後的辦法，則爲招安。所以匪愈剿愈多，從來未有過徹底肅清之事實。我們亦深知此次爲新軍剿匪之嘗試，若不努力得到良好之成績，則新軍名譽，更難建立。故在奉命之初，無不兢兢業業，慎重將事，初期亦頗感困難。及後地方情形，日漸熟悉，股匪情報，日漸明瞭，工作亦日漸開展，竟收到良好之效果。亦爲此後肅清廣西全省匪患之基本實驗也。我營自此次剿匪成功後，頗得當局信任。乃升馬曉軍爲陸軍第一師第二團團長，與該營原來之兩營，共編爲三營。仍由馬兼任我營營長，開赴柳州，駐防訓練。此民國八年冬間事也。

【當時桂軍一般的風紀】我們在柳州駐訓，不到兩個月，又奉命開赴廣東的肇慶。原因是桂軍在粵，時遭粵人與粵軍之反對。自陳炯明被迫率部赴閩邊後，繼任省長爲李耀漢氏。亦因種種關係，和桂軍不睦。因此桂軍乃派軍隊向李氏之家鄉新興縣進攻。東江方面亦步步增兵，防陳氏之率粵軍回粵，我們調肇慶，就是爲接替林虎所部的防務。我到肇慶的時候，派去新與天堂打李耀漢的軍隊，已經勝利回來。他們每隊都擄了很多的戰利品，衣服布匹，家私用具，豬牛雞犬等，莫不應有盡有。我會聽見第二軍（林虎所部稱第二軍）一個軍官說：「從前討龍之戰，有護國軍的名義，入湘之戰，有護法軍的名義，師出有名，所以官兵都很勇敢，紀律亦易維持。這次作戰，沒有什麼名義可言，祇有准許他們『發洋財』（即是任意擄掠），才可以鼓勵士兵的勇氣。」我當時聽了他這番理論，對於軍隊要師出有名，士兵才能勇敢作戰，軍紀才能確切維持，這一點，甚表同意。至於要以「發洋財」來鼓勵士氣的辦法，未免太矛盾了。我不免爲在粵的桂軍起了一種憂慮。雖然李耀漢的問題，表面上是解決了，但照這樣的作風，如不急加糾正，怕的是沒有問題的事情，也要發生問題出來。這位軍官的見解，真可代表當時駐粵桂軍的風氣。後來東江之役，也因同樣的作風，引起東江人民之強烈反抗，而與粵軍聯合爲敵，以致全局失

敗。所以我認為桂軍在粵的失敗，不是在兵力的不足，而是在軍紀的太壞。不過我得聲明，當時桂軍亦有一部份軍紀是好的。我在廣州撤退途中，第一軍的士兵，因為掘取人民的蕃薯，而為軍長馬濟氏所槍決。這等軍紀，的確算得嚴明。不過壞的軍隊太多，即有少數好軍隊，亦被反對者一筆抹殺了。

【桂軍在粵失敗的情形】當時桂軍在粵共有三個軍，第一軍馬濟，駐省城附近。第二軍林隱青（虎）駐肇慶西江一帶。第三軍沈鴻英，駐東江一帶。此外尚有劉志陸申葆藩等粵籍桂軍。粵軍回粵，沈鴻英首受打擊，其餘各軍，亦都開赴東江增援。

粵軍總司令陳炯明氏，於民國九年秋，率師自漳州回粵，倡言粵人治粵。粵人久處桂軍積威之下，皆起而響應。桂軍中之粵籍部隊，大都脫離陸莫之關係，而倒戈相向。莫榮新氏自動去職，桂軍在粵之勢力，遂告瓦解。

我們在肇慶住了大半年，約莫中秋節的左右，忽然奉命開赴廣州。這是我第二次到廣州，與前數年的景況，是大不同了。路面寬闊，交通便利，市面也驟然繁榮了許多。這都是楊暢卿（永泰）魏邦平等不顧一切阻撓開闢馬路的功績，中國歷史上許多奇蹟，都是在不顧一切困難的努力中得來的呀！在廣州市內住了一夜，第二日的夜裏，我連又奉令開赴東郊的農林試驗場已取消的軍政府內，向瘦狗嶺石牌方面，擔任警戒。蓋當時東江方面桂軍着着敗退，廣州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矣。我在廣東大約半個月的時間，東江潰敗的桂軍，已退到廣州附近。將帥意見分歧，兵無鬪志，已不能再戰，乃分路向北江西江撤退。我們沿粵漢鐵路，經軍田銀蓋坳，過四會縣，向肇慶退却。不意在四會肇慶間之蓮塘坳附近，即遭遇粵軍之截擊。但旋即為我前方友軍擊退。我軍退至肇慶峽附近，該處有林隱青所建之洋灰鐵筋堅固工程，原擬憑險固守，因粵軍尚有一部，從四會，經石狗，出綠步圩，包抄肇慶之後路。於是又奉令向梧州撤退。此時各高級軍官皆乘船先走，各軍隊伍混亂已極，但我營紀律，仍舊很好。到肇慶峽附近時

，住在一個鵝棚內，該處人民，以養鵝爲業者很多。一棚之內，養鵝數百。後奉令移去，我們第四連一個士兵，將一個鵝活包在軍毯內，希圖果腹。爲廖連長所察覺，而大打軍棍。但隨後到來之友軍，則將鵝棚的鵝，全數擄殺。鵝槍響，成爲奇觀。兩軍相距不遠，相形之下，真使我們啼笑皆非也。入夜，友軍駐地火光熊熊，到處都是，不稍隱蔽。我對團附黃旭初說：「這算是什麼？」他說：「這就叫做露營火。（陣中要務令術語）」大家相顧而笑。行至綠步圩附近，已有粵軍佔領綠步圩東南端高地，阻斷我們退却路線。未能通過者，尚有萬餘人，多係由下級官長統率的隊伍。我營除第二連及機槍隊外，第一連第三連第四連皆未通過，我們三個連長（白黃廖）商量結果，決意由右翼向敵側後進攻，協同正面攻擊之韓彩鳳李宗仁等友軍作戰。激戰至黃昏時候，始將敵擊退，全部安全通過。這次戰事是模範營成立後之首次作戰。除第一連因作戰時更較長，略有傷亡外，其餘皆全師而退。當日間作戰之時，聞空際有嗡嗡之聲，沿江而上。及近，始知爲粵軍之飛機。飛行甚低，速度甚慢。機上既無機關槍，亦無炸彈，僅用木壳槍向我們疎落的射擊。因此我們不受一些損害，亦不覺得有什麼了不得的威力。這是我見到軍用飛機的第一次。後來飛到德慶附近，爲桂軍散兵用步槍擊落。可見當日飛機在構造方面，技術方面，尙在幼稚時期，決料想不到其在今日軍事上，會有如此重大之價值。

我們進到綠步圩時，已是黑夜。敵人雖然退去，而大火正在燃燒着，把街市的道路阻塞了。成千成萬沒有隊伍沒有官長的兵伕都混做一團。老百姓一個也不見。打門破扉的聲音，與槍聲火聲交響着。我當時覺得通過這屋焚人亂的火線，比通過敵人的火線，還要困難。萬一敵人夜裏反攻，情況就不堪設想了。這時我連與同營的第一第四兩連，都已失去聯絡。於是我整頓自己的隊伍，官兵手拉手的，緊挨着前進。在我前面的大部隊伍，雖已勉強通過了。但隊尾及我，終於被大火所隔斷，不能不繞道圩後，以致與隊伍脫了一節。當我深夜重復回到所取之道路時，在路旁找到了自己的部隊。他們正以整齊的隊

伍，在那裏等待着。我問他們：「爲什麼還停留在這裏不前進。」他們說：「在連長未曾找到之前，我們不能丟開連長而擅自退却！」我在這次退却中，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而且很知道我的隊伍可用，自信平時的紮御訓練，是相當成功的。

次日，我們退到悅城圩。這裏有座龍母廟，是廣東第一個迷信的淫祠。每年陰曆五月間的龍母節，東西北三江，以及廣州香港的善男信女，都要到這裏來進香。相傳最靈驗是求子嗣。無子的人，飲了一碗龍母水，就會生子。無論男女，皆有效驗。所以龍母廟井水，每碗要賣一毛錢。這年的龍母節，我正在肇慶，在那三數天內，把東西北三江的輪船拖渡，不下二百餘艘，都集中到那裏去。輪船上滿載進香的人，省港澳的大輪船公司，也加開進香專輪。船上鼓樂喧天，笙歌聒耳，把一片廣闊的江面，擁擠得水洩不透。眞是我所見的空前熱鬧。他的號召力之大，恐怕要超過抗戰後的總動員！據說那幾天進香的人，總有三十萬左右。他們直接間接的費用，也就難以計算。尤其廟祝們收入的數目，更當非常可觀。據說：這個賺錢的如差使，必須出很多的錢去奔走鑽營，才可以得到呢！

我們那時覺得非常詫異，因爲沿途的市鎮，都遭受了兵劫，獨有悅城是例外。不但那個龍母廟，未受士兵糟蹋，就是鎮上亦絲毫沒有損失，那些散亂無紀律的士兵，到了那裏，也就自動的拘束起來了。當地的老百姓，更是神態怡然，一些沒有驚慌的現象。他們以爲這是洞天福地，龍母會保護他們。因此我深深感覺到中國神道設教的力量，要比政治的力量強大得多。政治的革命，要從迷信的改革着手。換言之，欲完成國家建設，若不在教育和科學的根本上加緊努力，則一切均落空談，而無裨於實際也。

【調駐百色】我們沿西江撤退，到了粵邊的都城，精神上才脫離了粵軍的威脅。其實當時粵軍亦沒有能力追至綠步圩以上。其他入粵各軍，在是年年底，都退回廣西邊境，重新部署改編。我們第二團起初調駐桂平。不久，調駐百色。百色是廣西西北方面一個衝要的地方，爲通雲南貴州兩省商業上的重要

口岸，亦是滇黔兩省煙土及貨物入口的集中地點。我們揣度當局調遣新軍到百色去，其用意有二：第一、當時販運鴉片，表面上仍是禁止的，或者需要新軍去作禁煙的工作。但是當局絕無澈底禁煙的意思。第二、當局懷疑這部份新軍人員，會與粵軍勾結，所以把他們調至滇黔邊境，使與粵邊隔絕。這個用意，後來證實了。當民國十年，粵桂戰事吃緊的時候，祇把原來第二團的兩營調去作戰，而把一個馬團長及原來的模範營，仍留百色。並且派蒙仁藩的舊軍，同駐一地，形同監視。

當時的百色，是一個最污濁最黑暗的地方，無論什麼隊伍到來，駐防不久，即有許多商家，或商會會長士紳等相與應酬。在應酬場中，花酒煙賭，是必不可少的。其目的是要得到軍隊的允許，或協助他們販運煙土，他們可以給與很大的報酬。甚至可以答應你在運出大批煙土之後，以一小部分作為公開的報酬，使你在公事上講得過去。百色有句民諺：「無煙不成商，無商不是煙。」的確，右江好多條小河輪船，由前甯到百色，終年都載滿了各種外來品入口。但是由百色出口時，却都是空船。其實並不是空船，而是將煙土秘密裝在船的夾層裏。所以百色這個地方，從表面上看，一般商業情形，簡直是難以維系的。但是他的情形特殊，永久是這樣維持下去。無論商人及水陸運輸的工人，靠煙土生活的太多了。煙幫有他的組織，有他的自衛武裝。由百色出發，至雲南或貴州時，都是大批棉紗布匹及其他工業品，浩浩蕩蕩，在白天公開的作合法的行動。由雲南或貴州回來，就帶了大批煙土，偷偷摸摸，在黑夜裏秘密的作違法勾當。他們在途中，如遇到小的阻力，即以武裝強行通過。碰到大的阻力，則用賄賂疏通的手段，或繞道通過。有時還會勾引士兵，盜竊槍械，來加入他的集團。我們的第一連，就發生過這種事情。我同白劍生費了很多的時間，很大的力量，才把逃兵的槍枝，追了回來。

百色的瘴氣，也非常厲害。滇黔的商人，都要等到秋末才敢到來，春末就要回去。據說：從前有一個鎮台，帶了兩三千湖南兵，來駐百色。一兩年後，調防他處，僅僅剩了幾個吹號揀旗子的人。不但百

色如此，即龍州方面，亦是如此。記得我前一年在左江剿匪，第四連廖連長頭一日通報我說：「士兵病了三分之一以上！」過了數日，接到他的第二次通報，說：「病了三分之二！」不久，又來第三次通報說：「全部都病了！」請我派兵幫他警戒。隨後我第三連的士兵，病的死的，也就不少。於是不能不將隊伍撤退。那次我們在左江剿匪，沒有一個士兵陣亡。而病亡的，却在百人以上。我們因為左江有了經驗，抵抗力已增強了許多，所以到了百色，染病固仍不免，而死亡率就大為減低。其實這不是瘴氣，而完全是惡性瘧疾。各地瘧蚊，非常之多，一到夏天，即行繁殖。所以滇黔商人，春末回去，原為逃避瘧蚊。冬初再來，則瘧蚊已絕跡也。（惡性瘧疾對於外來的人，特別容易感染，其死亡率也特高。本地人因天然之抵抗力較強，為害較輕。）

【革命軍西征陸譚政權崩潰】自桂軍由粵敗退，除了一部份粵籍軍官所統率的部隊，投降粵軍外，其餘撤回桂境的，尚有數萬人。以廣西之貧乏，當然養不起許多軍隊，而且戰事雖一時停止，政治上根本的矛盾，無法解決。甚至日益增加其程度，潛伏下次戰爭之機。本來陸氏對北洋政府，早有默契。自此以後，乃更投入北洋政府之懷抱，以自促其最後之崩潰與消滅！

民國九年的冬天，國父開府廣州。欲率兵北伐，因桂軍與北洋政府勾結，恐其乘機進襲廣東根據地。為免除後患計，乃徵調粵黔滇之兵，先行討桂。桂軍方面亦積極部署，以陳炯明出駐梧州，當西江方面。譚浩明出駐玉林，當南路方面。以沈鴻英駐賀縣，當北江方面。各路共計尚有四萬餘人。雙方厲兵秣馬，一觸即發，粵乃以革命為號召，師銳氣旺，桂方則師出無名，意志消沉，識者早知其不敵也。民國十年四五月間，陳炯明親率粵軍第一軍，附以江防艦隊，及飛機數架，溯江西上，集於都城（粵垣梧州下九十里），首破大坡山桂軍防線，直趨戎圩（梧州上游十里）。陳炯明因梧州腹背受敵，無險可守，不能再戰，倉皇逃遁。所部韋榮昌等，稍抗即退。劉震寰率數百人擲附，梧州遂為粵軍佔領，

爲時僅十餘日耳。北江方面，許崇智率粵軍第二軍及滇軍一部，向富賀西進。沈鴻英首鼠兩端，通電請陸榮廷下野。蓋欲取而自代，以周旋於粵桂之間。但內無應者，而外又受粵軍之壓迫，乃率部逃入湖南，依附吳佩孚。粵軍遂進駐平樂桂林。南路方面，桂軍雖一度攻至高州化州，後亦挫敗，退回桂境，粵軍遂乘機滲入。陳炯明既佔梧州，復揮軍西上。祇在藤縣稍遇抵抗，遂直追桂小貴縣。陸氏見四面受敵，孤立無援，乃放棄南寧。率其親信，退保龍州，其餘則聽其各自爲謀。桂局至是，遂形瓦解。駐南寧桂軍將領韋榮昌黃培桂等見大勢已去，爲維持地方計，遣使行成。粵軍乃不費一彈，不傷一卒，從容入駐南寧。委韋黃分任善後督辦會辦。但後來又將他們所部，包圍繳械。他們還有許多部隊，散處各地。見韋黃繳械，乃益走極端，遂至無法收拾矣。

〔我們脫離陸譚走上新的坦途〕我們當時遠在百色，對於這次的戰事，僅知其大概。及至南寧陷落，馬君武充任省長，劉震寰充當桂軍總司令。委馬曉軍爲田南警備司令，將我們原日的部隊、及由南寧退來平日意氣相投的工兵營、韋雲淞、水警隊管帶陳秉文，及陳濟桓等部，合編爲三營。我當第一營營長，白劍生爲第二營營長，夏煦蒼爲第三營營長，韋雲淞爲工兵營營長，陳傑夫爲機關槍連連長。此外復收許炳章一營，共約五營多的兵力，駐紮百色城及附近各縣。自此之後，我們便脫離陸譚的部屬關係，而轉入一個新的前途。

陸譚的政權，雖然是崩潰了。而我對於他這一段歷史，因爲知道較詳，就純客觀的看法，其盛衰興亡，都是很自然的。他們能使廣西的老百姓，很平穩的過了九年。雖然沒有什麼建樹可言，在歷史的觀點上，却不無可原諒的地方。尤其對於帝制之反對，共和之擁護，亦有不可掩沒的功績。至於因入粵之演變，而致全局消敗，八桂同遭浩劫，這是他們本身知識水準問題，在那一個時代裏面，全國各省，都無例外，自不能單獨對他們有所苛責。這是我寫完這段經過後的一種感想。

四 百色失敗與新軍合流

【黔軍東窺百色】我們在百色易幟後，所有的部隊，都集中城區附近，對於各方面的情形，多不很明瞭。在這年的六七月間，突然有貴州的隊伍，由南籠、八渡、羅里、陵雲，向百色開進，計三團，共約三四千人，由旅長胡瑛率領。據說是奉令入桂，討伐陸譚者。但我們事前並未得到南甯方面的通知。其實當桂局潰亂之際，鄰省軍隊欲乘機向桂省發展者，實不乏人。而且百色爲滇黔烟土出口要地，極易引起軍隊之垂涎。討伐陸譚，祇是一種表面文章，藉以對外標榜而已。當其到達時，陸譚已經下野，我們亦已易幟。雖無所藉口，而彼我戒備，非常之嚴，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後因黔軍兩團長陸西川劉幸園，皆爲保定軍官同學，彼此因學誼關係，感情日漸融洽。同時粵軍蘇廷有所部，同駐百色，互爲排解。且陸譚舊部，紛紛向百色方面集中，雙方同感威脅。乃將相併之意，化爲相倚之勢。黔軍在百色，適值夏秋之間，病死半數，所餘者亦皆病兵，已不能行軍作戰。乃奉令由水路乘船開柳州，轉回貴州。在途復遭陸譚餘部襲擊，打死病死者甚多。聞到柳州時，僅餘八百餘人，亦云慘矣！

【進剿陸譚殘部】自南甯陷落，陸譚殘部都向龍州及南甯以北之思恩府屬退竄。有一部數百人，竄至東蘭縣，散兵無餉無食，劫掠自所難免。東蘭屬田南警備範圍，我奉令率本營及新收許炳章一營，馳往剿辦。當地人民因久受散兵之蹂躪，對於進剿部隊，非常幫忙，伏役飲食，盡力供應，情緒之熱烈，實爲我帶兵以來所僅見！我在中途墜馬，受傷甚重。然仍扶傷進剿，蓋不負人民之渴禱也。在東蘭附近經過數小時之激戰，卒將散軍驅逐。因尙有其他方面散軍，多向百色集中，復奉令回駐百色，以固根本。撤回時，人民恐慌萬狀。蓋深恐以前歡迎熱烈之程度，卽爲散軍復來報復之藉口。人民在無政府保障

狀態之下，其啼笑皆非的情形，真堪令人浩歎！

【我們在百色的失敗】我率隊回駐百色以前，駐百色的粵軍，已退回下游。而散軍之聚集百色附近者，約五六千人。有由南甯思恩方面竄來者，有由龍州靖西方面竄來者。因粵軍正從那兩路進攻，使他們不能立足也。散軍首領爲劉日福、陸雲桂、馬玉成等，初到時，因彼此同屬桂人，尙覺相安。但新舊之見極深，尤以我軍易幟，爲彼所最恨。而南甯方面，亦派代表前來，接洽收編。彼等原無誠意，起初則虛與委蛇，後來散軍愈集愈多，我軍更形孤立，而且我新收各部，及臨時補充的新兵，大多傾向舊軍。劉日福見有機可乘，乃將我軍包圍繳械。當時我軍數量，相差太遠。加以內部軍心不固，竟至不能抵抗而瓦解，這是我們帶兵的最大之失敗與恥辱！究其原因，第一、對彼我之力量，毫不顧及，既不能以力取勝，又不肯退避以保存實力。第二、一般心理不明瞭。陸譚雖下野，但多年歷史情感的關係，不但舊軍懷念故主，憎恨粵軍。即我們自己的部隊，在平日既不能作公開之反對，改編後，亦未有新的認識。一旦形勢轉變，自難把握得住。第三、劉日福以舊軍宿將，欲強其在新進者之下，收編就範，實係妄想。有此三大錯誤，因而招致失敗受辱，亦可謂咎有應付，非偶然也。

【廣西自治軍之產生】劉陸等既將我軍繳械，並將兩寧代表驅逐，自稱爲「廣西自治軍」。由各散軍首領公推劉日福爲自治軍總司令，組織總司令部，進兵平馬（恩隆）。與思恩方面林俊廷、陸福祥、陸雲高、蒙仁禔等相呼應，勢力頗爲浩大。

桂軍雖屢次戰敗，除了劉震襄所部及我們所部接受新政府編制之外，其餘皆散處各地，數量並未減少。復因粵軍在桂，紀律極壞，燒殺極慘，致使人民憤恨。廣西民槍極多，一經團結，立可起事。廣西自治軍之名義與組織，亦遂應時產生。所資以號召者，即爲反對客軍入境，共圖自衛自治。當時發展非常迅速，數月之內，遍及全省。粵軍無法收拾，被迫撤退廣西。在這種混亂局面之下，復經過數年之

與。

「自治軍的敵對目標」所謂自治軍者，雖以自衛自治相號召，實際不過地方強烈仇恨意識的表現，並無真正的自治主張與計劃。他們第一個敵對目標爲客軍。粵軍滇軍黔軍等，皆無妥協餘地。其次，則爲受革命政府任命之人物及改編之隊伍。馬省長君武爲當時一省人望，亦幾遭不測。餘如劉震寰馬騰軍等，及其所部，皆爲彼等欲得而甘心者。其他如唐紹慈（伯山）、譚元翰（伯章）、甘尙賢、甘振賢、黃彤階、何其多、梁培、譚葆謨等，皆與陸譚有鄉土的私誼，與多年部屬的關係，因陸譚已潰，不忍地方糜爛，與新政府接近，而有意收拾改革者，皆竟爲譚浩清等所殺。彼等對這班人統名曰「反骨仔」（即反叛的分子），得之即行殺戮。我與白劍生亦曾爲彼等所獲，竟能脫險，真是萬分僥倖的事！

「我們脫險與會師百色」我軍除大部駐在百色城之外，尚有工兵營及第二營之一連，分駐百色通貴州的各路。當城中部隊被繳械時，白劍生、夏煦蒼、陳傑夫皆先後脫險，奔聚於工兵營韋雲松駐所。並率殘部移向黔南之坂壩鎮，暫避其鋒。劉日福亦派隊至西舊州一帶追堵。我爲自治軍所獲，監視極嚴。陸雲桂本有將我槍斃的意思，後來想盡種種方法，始得隻身逃往離百色百餘里的黃蘭鄉下。身邊僅有士兵二人，木壳槍一枝。此時黃蘭上下皆有自治軍把守，不能再進與白夏等會合。就在黃蘭附近，糾合凌雲西林紳士岑學三黃炳煊等，將民團編爲隊伍，不久即集合了二三百人。事爲自治軍所聞，乃派人四出緝拿，我夜行晝伏，艱苦備嘗，幸未再爲所獲。同時西隆方面，發現自治軍與白夏所領部隊作戰，亦幸將其擊退。白劍生因夜裏巡查步哨，失足墮崖，竟將膀骨跌斷，不良於行。這時粵軍因劉日福自治軍聚集百色，並進駐平馬，與林俊廷等部相呼應，乃派熊略爲總指揮，率兵向平馬百色進攻。並令馬司令曉軍隨往，率領我軍，會師百色。我軍奉令向凌雲縣附近集中，糾舊有與新收，不過八九百人。乃分爲兩個統領，每人領三營。我爲第一統領，轄馮春霖、黃炳煊、岑潤博三營。白劍生爲第二統領，轄吳威、

陸炎、韋雲淞三營。我們以新軍的典型，一變而爲民軍的作風，至今回想，覺得多少有點滑稽。

當我軍在凌雲集合時，適唐繼堯率兵回雲南，驅逐顧品珍，亦路過凌雲。我軍派代表和他連絡，因得知其概況。原來顧品珍回唐後，唐部將師鄭成勳率部由川經貴而入柳州，沿途集合流散，爲數尙屬不少。唐氏到柳州後，即誓師回滇。由柳州經慶遠都安東蘭鳳山等縣，而至凌雲，人數號稱數萬，但至多亦不過萬餘人。除一部尙稱精練，槍械亦較爲整齊外，其餘多爲附近糾合之衆，武器亦甚窳劣。然而入滇後，卒將顧氏驅逐，其中原因甚多，頗難盡述。

【由百色退至南寧】我軍開抵百色時，劉日福自治軍已爲陸部擊潰，分向各邊地逃竄。我軍進駐百色城。並另委莫某爲田南警備司令。馬曉軍亦奉委爲第五路司令，調駐平馬。我軍到平馬後，白劍生因足傷，乘船赴邕，轉廣州醫治。途中爲自治軍所獲，幾遭不測，所部皆爲我一人統率。在平馬駐紮不久，粵軍復全部撤回南寧，左江方面，交由馬司令與莫司令負責。莫司令全無基本隊伍，所收部隊，時在動盪之中。馬司令所部我軍，亦甚殘缺。所以粵軍退後，各處自治軍，復紛紛起來，希圖重佔百色平馬兩地。其一部且迫近平馬北面的七里圩。我率馮春霖營將其擊退，但上至百色，下至南寧的道路，皆被他們斷絕，糧餉無着，形勢非常危急。當時曾有人建議馬司令，改換自治軍旗幟，反擊莫司令，而佔領百色，既可見諒於舊軍，復可得一餉源充足的地盤，爲我所反對而未實現。這時全省各地自治軍風起雲湧，普及全面，粵軍僅能在一點駐守，各方交通，全被梗阻，應付非常困難。復以陳炯明阻撓北伐不遂，稱兵背叛。粵軍內部問題發生，勢不能不全部撤退。（此時馬省長亦早乘船回粵，中途爲自治軍伏擊，死其愛妾，他本人亦僅以身免。）南寧方面，僅留劉總司令震寰所部駐守，兵力單薄。乃調我軍及龍州方面之黃明堂所部回邕。我軍自平馬沿江東下，經果化、果德、隆安，沿途爲自治軍攔截，非作戰不能通過。到達隆安縣時，自治軍據城阻塞，士兵積數日之怨憤，於攻入縣城時，大肆劫掠，我未能即予

制止，實爲當時惟一憾事，亦爲我此後決心整飭軍紀之主因。隆安縣以下，一日須經二三次戰鬪，始能到達目的地。我軍一方面須掩護船上之行李眷屬，一方面又要作戰，行程甚緩。退至三江口時，（左右二江會合處離南寧六十里）兩岸皆有敵人，又無船隻可渡。而後面自治軍，仍緊追不捨。真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情形危險已極。我乃下令全部反攻，將追兵擊退。然後退集兩江間的狹小正面，扼險防守，等待行李船隻的到來。入夜後，抽選精幹官兵，由我親自率領，乘行李船隻，秘密渡過右江左岸，將士兵一字排開，齊上刺刀並禁止開槍，向敵人所佔之山嶺進撲。自治軍本烏合之衆，警戒毫無，當我軍到達時，彼輩尚在夢中。除擒獲擊斃者外，餘皆棄衣潛逃。我軍乃確實佔領該山，掩護其餘各部渡江。渡完天方黎明。

我軍既渡過右江，即向南寧進發，沿途尙有小接觸。到達西鄉塘附近，（距南寧西南十里）停止候命。馬司令同我入城，謁劉總司令震寰指示。這時自治軍林俊廷、陸福祥、陸雲高、蒙仁潛等，自武鳴方面進攻南寧，劉部節節敗退。敵軍先頭已抵三塘，城內可以聽到槍聲，各方面皆開始準備撤退，秩序非常混亂。我們此來未得要領，并見大勢已去，急急歸隊。下令徵集船隻，由西鄉塘渡過邕江南岸。那時隨隊的高級官長祇有我同章雲淞、馮春霖、陸華甫四人，其餘皆因事因病，不能相隨。這是我由百色退至南寧的經過，時民國十一年三四月間事也。

【我軍放棄南寧與馮營長陣亡】我軍退過邕江南岸後，劉總司令所部及黃明堂李蔭軒所部，亦同時撤退，南寧遂重爲自治軍所佔領。次日，我軍本擬同劉部向欽州廉州前進，但行至綿羊吳村圩以後，我見隊伍混亂，紀律毫無，人民逃避。而且餉項全無，沿途伙食，亦成問題。乃決心轉而東行，經那馬圩、那樓圩、太平圩、陸屋圩而至靈山縣城暫住，稍爲整頓休息。可是行至那馬圩時，自治軍之追兵已到，前面爲水所阻，適雨後山洪暴發，涉渡甚爲困難。乃令馮營長春霖率其所部，拒止敵人，掩護渡河。

全部將次完畢，馮營長於最後渡過時，爲敵狙擊，覆舟陣亡！

馮營長爲廣西橫縣人，畢業於廣西陸軍速成學堂。旋至桂軍唐伯山部下，充當下級官，以驍勇善戰聞。桂軍潰敗後，輾轉退至右江一帶。因不欲與舊軍合流，率部投我爲營長。相從患難流離之際，不以挫折而稍變其志。自平馬回邕，沿途作戰，多賴其力。中途收仁，至堪倬敬。而我軍卒賴以脫險，其功尤不可沒也！他的幹部如劉劍奇等，後來對於統一廣西，亦各有建樹。

【我軍經粵境赴玉林途中】我軍渡過那水後，進入粵境。自治軍亦不再越境追擊。是夜宿於粵邊之那樓圩。雖去敵軍之威脅，又增餉食之憂思。蓋孤軍退入異省，既無負責之長官，亦無從依賴政府設法籌措，其窮迫之情形，與新敗的淒楚，大有石達開所謂「萬衆棲山似病狼」之威。實非我今日筆墨所能形容也！我乃不顧一切，仍向靈山前進。每日到宿營地時，必整肅軍容，申明紀律，並嚴爲戒備，使人民不恐怖，不逃避，然後派代表向商會或士紳說明原因，請其資助。要求數目不多，僅以官兵兩日所需伙食爲限，一次乞作兩日食。軍隊食用有着，紀律甚佳，人民負擔不重，故樂於相助。計自南寧退出，直到玉林爲止，軍行數百里，歷時一月以上，皆用此種方法來維持。途次陸屋圩，我派陳傑夫去欽州見劉總司令，請示以後行動，及補助餉項。據告，彼部即開梧州，希望我部亦同行。至於餉項，則謂自顧不暇，愛莫能助。我見彼既不肯切實負責，祇好自己打算。我對於回梧州，甚有決心，因離我家鄉很近，多少可以想點辦法。不過我決單獨行動，以防被吞併我的部隊。我們許多同志，五六年心血之積聚，數千里顛沛流離，僅剩下這一點的基本，我不能不盡力負責保持也。

隊伍到了靈山縣，在那裏休息整頓了半個月。然務經由北寧圩、武利圩、張黃圩、公館圩、白沙圩山口圩、青坪圩而到江城。本擬再經高州、信宜縣城，而折入桂境邊界之黎村圩，這是我家的家鄉，再沿桂邊經岑溪縣而達梧州。到廉江城附近，忽然碰見四兄天驛。我覺得非常詫異，不知他無緣無故，到

廉江來幹什麼，當衆又不好問他。到了晚上，他才悄悄對我說，是受了李德鄰的委託，來這裏等候我。他在李處不負任何職務名義，（此後一直到現在都未受過政府任何職務和名義）爲了朋友之誼，和手足之情，特地祕密來此等我。又因不能確實知道我行程的緣故，已在這裏等了好多日子了。他又告訴我玉林方面的情形，與那些朋友盼望我回去的好意，使我非常的感動。我於是召集我重要幹部會議，將情形告訴他們，都一致贊成。議決之後，祕不宣布。次日，仍不動聲色的向信宜方面前進。那晚在石角圩宿營，第二日，我忽又下令向廣西博白縣的車田圩前進。變更路線的原因，不能不向部隊扯一個謊。說：「粵軍對我不懷好意，要繳我們的械。」的確，我到廉江城時，駐軍不許我進城，祇准我們駐在城外，而且戒備很嚴。自然這是對付潰敗下來的軍隊應有的辦法。經我說明要到廣西境內暫避的理由，他們也很相信。於是在很緊張情形之下，渡過了正在漲大水之石角河。不久，就到了廣西境。是晚，宿營於車田圩，那裏附近人民多是姓黃的，就是我始祖釋養公同胞兄弟的後人。四兄與族中叔伯兄弟都認識，他將我到來的經過，告訴他們。他們極表歡迎，予我種種的幫助。並且陪了我去祭祠堂，拜祖坟。在離亂飄泊之中，不期而然的到了祖宗廬墓所在的老家，使我格外增加了游子天涯之感！

【我接受了李德隣的委任】李德隣繼續派夏煦蒼送伙食來接濟，並且委我爲第三支隊司令。此事除了幾個重要幹部知道大概之外，其餘尚未清楚其中内幕。至是我不能不向大衆公開宣佈。內中有與我部同時退出南寧的陸統領清，是廣東欽州人，亦革命老同志。我們在粵境回桂途中，得其助力不少。我事前既不能將實情告知，此時他自然有些不滿，說我騙賣他。我在當時情勢之下，爲防萬一起見，不能不將該部百餘人繳械。又有馮營一個班長，帶兵數人，自由行動去了。我派人追去勸他，他說：「如果要廣西當自治軍，就不必退出南寧，行乞到這裏了。」這事，我至今猶耿耿不忘。因爲他們的見解，是有相當理由的啊！

李德隣爲陸軍小學同學，由陸軍速成班畢業後，一向在林隱青部下工作，以勇敢善戰聞。身受兩傷，於民國八年，已經升當營長。原來在舊軍裏面，非有特別的關係，就須有超越代價的功勞，才可以得到營長的地位。所以他在我們一班同學中，也算是一個特殊的人物了。民九桂軍由粵回桂，又升爲幫統。想係報酬他歷次的戰功，以及在綠步之戰，擊退粵軍，掩護許多友軍安全通過的緣故。民國十年，桂局瓦解，彼率殘部回駐玉林。粵軍委他爲粵桂邊防第三路司令，已經接受委令，後來粵軍知道他部內有山炮兩門，視爲至寶，一定要他繳出。他知道粵軍對他並不信任，一味敷衍拖延。同時請馬君武省長維持。及至粵軍退出廣西，他也與自治軍聯絡，并被舉爲自治軍第二路總司令。後來因見自治軍各將領爭權奪利，全無政治頭腦，復與脫離關係。所以，那時既不是自治軍名義，亦不是服從粵軍，而祇是一個地方性的司令。所部分兩個支隊：第一支隊李石愚，轄二個統領，第一統領爲俞作柏，轄兩營，李明瑞、林竹舫。第二統領鍾祖培，轄兩營，劉志忠一營，自兼一營。第二支隊係何武，第一統領爲伍屨空，轄尹承綱一營，自兼一營。第二統領爲陸超，亦轄二營。及我回去，遂編爲第三支隊，不設統領，直轄三營。第一營夏煦蒼，第二營陸華甫，第三營韋雲淞。這是民國十一年六七月間的事。後來德隣統率的部隊，又改編爲獨立第五旅。三個支隊改爲三個團，我是第三團。這個番號的由來，連我也不清楚。

【六年艱苦的收穫】計自民國六年陸軍模範營成立，我廝身軍旅，隨軍征伐，北至長沙，西至滇黔，南盡海國。地經數省，跋涉數千里，在六年的時間當中，歷觀軍政局勢之轉變，親嘗種種艱難困苦，犧牲不少忠勇同志。所收穫者，則爲殘破不全之部隊與官兵之寶貴經驗耳！

內各處陸軍幹部學校畢業之廣西學生，在陸譚時代，因遭舊軍嫉視，極難發展。全省部隊中，陸軍學生稍爲集中，而能直接帶兵，略有實力者，祇有模範營，及林隱青所部之一部。民十桂局崩潰，雖經

困敗，仍能掌握一部份實力。更能於流離顛沛之中，合而爲一。正似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殆造物者將以統一廣西之大任降於其身，故折磨之，困憊之，使其有動於心，能忍其性，以完成其偉大之使命，非偶然之故也。

〔駐防容縣〕我部自陸川改編後，即開至容縣駐防。容縣爲我的家鄉，我一到來，地方父老首以剿匪爲請。蓋本縣自民九以後，股匪蠭起，縣城東北，很多鄉鎮，爲股匪所佔據。劫掠財物，坐收行水（土匪設卡收稅謂之收行水），到處皆是。我無論在公的方面，私的方面，都義不容辭。首先對於力量最大之吳亞龍一股，我親率韋雲淞營，將其圍困谷底孤立之家屋內。照我在左江剿匪之經驗，自可一網全擒。但該匪沉着異常，歌唱自若，當我軍接近其屋時，始開槍還擊，傷亡官兵頗多，無法攻破。乃取久困辦法，使其坐斃，但在夜間，仍被突圍逃竄。經此役後，始知以前在左江剿匪的方法與經驗，多不適合於容縣。蓋各鄉富戶從前多築碉樓以自衛，民十以後，私人之防衛力量，多爲土匪所擊破。土匪反恃佔領此等碉樓，與我軍頑抗。我僅憑步槍火力，實無法擊破。後雖用土砲轟擊，命中亦屬不易。此時軍隊中尙未有手榴彈，我用毛竹筒在兩節中間，實以火藥，插入一條很長的藥引，燃着後，投入匪屋，不久，轟然作響，尙有相當威力。這是我因爲剿匪而對於武器研究之開始。但這種毛竹彈，對於堅固的高樓大屋，極少作用。相持甚久，仍不能攻破。後來調軍中僅有的兩門山炮去轟擊，始將其擊潰。但所得效果，僅是將容縣部份，驅逐出境，而岑溪縣蒼梧縣之匪，以後還費了很大的力量，與很長的時間，才得肅清。我們各部目經多次戰鬪，槍枝損失，子彈消耗甚多，補充至成問題。當時在容縣，玉林各處，都有單響步槍製造廠，所出的單響步槍，都是用極簡單的土法製成，子彈係用舊壳翻造，火藥起初用黑土藥，後來由廣東方面運入一種白色的硝化棉來充用。彈頭由鉛質、或銅質，祇要似一枝槍，似一顆子彈，能夠打得響，就視爲至寶。至於他的效能，與其安全的程度，都不計及了！這種困難情形，與這種

幼稚的方法，都是後來我們自己設廠製造槍彈的動機。

【中立的玉林集團】當我回到玉林之後，除了梧州仍爲粵軍駐守，其餘都是自治軍的旗幟。表面上是林俊廷當自治軍總司令，其實僅僅名目相同，內容都各自爲政，各不相下。大家奮着割據地方，魚肉善良，對於廣西之政治軍事，並無全盤的打算。尤其是沈鴻英所部，分佈桂林平樂一帶，已公然反對陸譚之系統，而欲自露頭角。他對於桂方則自認桂人，對粵又自認粵人，此種騎牆作風，無非想同時取得粵桂地方主義者的擁護。同樣也派代表到吳佩孚處，希望得到北洋政府的援助。玉林方面這時介於自治軍與粵軍之間，無形中成爲保境安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中立者。故對兩方面都敷衍。兩方都派人來聯絡，大有舉足輕重之勢。我記得陳炯明派某君代表持函到玉林，希望我們出兵打滇軍。並答應在梧州給我們十萬發子彈。並不談名義和隸屬問題，祇是利用廣西反對客軍的心理，幫他牽制滇軍。我方則以得到子彈爲目的，也不管他什麼作用和企圖。於是派陸統領超帶兵出岑溪，去接護子彈，不意空跑一趟，毫無所獲，真是失望極了！

滇軍是楊希閔、楊如軒、楊池生、范石生、蔣光亮五部合成，由楊希閔統率。當時稱爲三楊范蔣，人數約有兩萬左右。於民國十一年秋天，由貴州方面，轉入柳州。他們入桂的原因，大約是唐繼堯回雲南後，被迫而出走的。到柳州後，奉孫大元帥之命，入粵討伐陳炯明。經過桂境時，廣西自治軍不明真相，以爲又是客軍侵略，一路皆有無組織之戰鬪。即玉林方面亦派俞作柏參加。後來交涉明白，始行停止。滇軍力量頗強，自非自治軍所能擊敗，但沿途作戰，亦不免飽嘗痛苦矣。

我在玉林方面的時間，約爲八九個月。在這個團體裏的人，都希望做好，不要錢，不怕死，有血性，富進取，是他們的長處。至於政治軍事方面，除了努力剿匪，使人民得以安居，財政公開，使部曲苦樂平均之外。其餘一切，或限於時間，或限于環境，並沒多大成績可言。但僅僅這一點，也就樹立了以後成功的基礎。

五 出兵梧州奉命討賊

【出兵梧州的動機】梧州處於西江上游，是兩粵交通之咽喉，是廣西全省經濟之吐納口。在軍事上，無論桂圖粵，或以粵圖桂，梧州都是必爭之地。當我離開南寧，即決心退至梧州。並不是我那時便有掌握梧州經營八桂的企圖，因我回玉林後，雖然將以前的名義改變，但是我的主張，並未改變。在容縣駐了八九個月，起了很多的感想：第一、玉林五屬及容縣的收入，雖然可以勉強養活我們的部隊，但是要發展則很難。尤其是槍械子彈，無法補充。第二、保境安民，形同中立，終久不是個辦法。我們必須有光明的途徑，嶄新的作風，才能開展。第三、我受自治軍的恥辱，亟思打倒他們。認定梧州是有為的地方，廣東方面，也總要比自治軍好些。必須出梧州，才可以接近廣東，才可以打開新的局面。但是我懷着這些念頭，並不敢貿然表示，貿然行動。我必須待粵方的聯絡成熟，並且要等候時機的到臨。

白劍生去年就到廣州養病。陳傑夫後來也到廣州去。當時大家雖沒有若何約定，但我相信他們必定能為團體而努力，並且是朝着新的方向努力，我必須等候他們的信息與意見。因為這個團體，歷來都是我們幾個人支持的，而且是相當民主的。不久，他果然有信來。對於我暫時率部回玉林是贊成的，同時希望有機會同李德隣全部出梧州。廣東方面，由他擔任聯絡，並取得名義。這階段經過，我是否向李德隣表示過，現在已記不清楚。但是我會對伍展空、俞作柏談過，他們都很贊成。

【偽投沈鴻英】這時，適值沈鴻英勾結吳佩孚，出兵粵。沈鴻英由西江，方本仁鄧琢如軍由北江，會攻廣州。梧州為沈之後方基地，派師長鄧瑞徽駐鎮。但主力總在前方作戰，梧州極為空虛。沈氏不特志在廣東，對於廣西，亦時刻不能忘情。故極力拉攏廣西部隊，以圖擴充實力。其時我族兄紹愷在沈

幕內作秘書。他知道我有些力量，由他介紹於沈，委我爲第八旅旅長，希望我帶部隊到梧州。

我當時判斷沈軍攻粵，遲早必敗。當戰爭緊急之時，梧州部隊必盡調前方，我若於此時進駐梧州，乘其敗而襲之，不但可佔領梧州，並且可獲得許多械彈輜重。同時，我對於革命工作，亦可有所表現也。待時機相當成熟，我才將此中經過，及我的判斷決心，向李德隣詳細商談。他的意思，以爲任何人賦予名義均可受，惟有沈鴻英賦予的名義，萬不可受。因沈反覆無義，人所共棄，一旦受了他的委任，則沾上了終身污辱，不易洗磨得去。其次，沈鴻英未必即敗，我之如意算盤，未必打得得準。萬一事機不密，沈多疑好殺，反遭其害。他以仁厚長者的性格，發爲正義誠摯的理解，使我非常感激。但我的見解，以爲任何人給我的名義，均須考慮，才可接受。沈鴻英賦予的名義，我竟要毫不考慮的接受下來，因爲我根本是要借他的名義，來打擊他呀！至於我的判斷，能否正確，必須事後才可以證明。軍事上的行動，也祇好就判斷來決定。雖有「計出萬全」的古話，其實那裏有一定萬全之計。至於個人危險一層，更非我所顧及，有謀人之心，而先慮人之害我，必致氣餒膽寒，而無事可爲。他對於我的解釋，仍舊懷疑。我最後表示堅強的決心，並請求他兩點：（一）我如果失敗時，設法收容我的部下。（二）在我未曾得到着落時，一切的給養，仍照常撥給。均蒙他答應。

【我與白陳的密議】我辭他回到容縣，就準備出發。祇帶了一個營去，暫留兩營在容縣。這時由容縣經岑溪，藤縣到蒼梧境內，股匪多如牛毛，每日都要開火，才能通過。到了離梧州五十里的新地圩，土匪將我包圍於圩內，希圖繳械。我營皆久經戰鬪的官兵，沉着緊守，絕不隨便開槍。候匪十分接近，衆槍齊發，擊斃甚多。隨即向外追擊，將其衝散。自此之後，股匪聞風逃避，不敢同我對戰。首先樹立我的軍威。次日，到達戎圩，將隊伍嚴密佈置，以防萬一。我則單身赴梧州，由族兄介紹見鄧瑞徽，鄧希望我迅速全部開往梧州。這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遂滿口應承，他也十分滿意，盛筵款待。席間稱揚

我如何忠實，如何勇敢善戰。我心裏非常好笑，於無可如何之下，亦惟有盡情作虛偽之應付而已。駐梧有馮旅長葆初，據他自稱，他的槍械非常精利。他希望與我換帖，結為異姓兄弟。其實他換帖的兄弟，不知多少，他專以這種辦法來拉攏一班人，作為他的黨羽。我心裏想：「換帖換帖，不久你的槍枝，我就要來接收！」我在梧州住了數日，白劍生、陳傑夫由廣州到來，在我族兄的公館內，祕密將廣州的情形告訴我。並說大元帥委我為廣西討賊軍總指揮。原來是委為廣西討賊軍第一軍軍長，手令已經下了，後來白劍生覺得不妥，又到石龍去見大元帥，改為總指揮。並希望我們迅速佔領梧州。（廣西討賊軍第一軍軍長的手令，廣州淪陷後，散失民間，為廣西銀行重價購得，民三十三年我到桂林，才見到。現在由廣西銀行保管，此係國父遺墨，擬獻呈黨史委員會保存。）關防委狀，都由他們隨身帶來。我當時非常着急，覺得太危險了！萬一洩漏，不但全盤計劃，都要失敗，大家的性命，也要難保！那日正是端午節，在族兄家裏，很匆忙的吃了飯，我們便搭船回戎圩。族兄還要留看龍船，不知我們心內懷着鬼胎，那裏還有這種閒情呢！原來我內心的計劃，總沒有向族兄表露過。事後，他很埋怨我，以為是我騙賣他，使他幾乎陷於致命的危險。其實這種陰謀反叛的事，那裏可以隨便告訴一個不同意志的人。況且他是信仰吳佩孚、沈鴻英的呢！幸而在相當的時機內，他也離開梧州，不致發生意外之事。

我同白劍生仍回容縣去，陳傑夫是否同行，抑或仍回廣州，就記不清楚了。我回到容縣，一切的經過，都由白劍生向李德隣陳述。但是我約同俞作柏伍展空兩位的隊伍出梧州的事，並未得他同意，這點曾引起很大的誤會，其實這事也確難報告，并也確實難以得到諒解。後來經了很長的時間，這種誤會，才算消除。

我的隊伍全部出發。俞作柏的兩營，伍展空的一營，也先後跟着出發。俞部出發的情形怎樣，我已記不清楚。伍部在出發前，是公開向李德隣報告過。但也僅僅是報告，而沒有奉到他的命令。這種自由

行動的行爲，就軍隊紀律上講，實在有些不大合理。李德隣身爲長官，當然是不允許，不願意的。但是事實已經如此，亦就無從阻止。好在我們的結合，都是在患難之中，在感情上，道義上，都不致劍拔弩張，武裝相見。李德隣並派李司令石愚隨同出發，負聯絡調處的任務。其寬厚大度，有非人所能及者，真使我感佩萬分！

我的計劃，是先將部隊秘密集結在戎圩（梧州上游十里）新地圩附近，等候時機。一方面使人與鄧瑞徵敷衍，並要求他補給彈藥餉項。在那時候，『走民軍掇』（從事民軍活動收編之謂）的習慣，凡來就編的人，總說自己的人數如何的衆多，槍械如何的犀利，戰鬪力如何的堅強。等到真正點驗起來，人數槍枝都要大大折扣。自然鄧瑞徵未必十足相信我族兄及我說的那樣好法。我爲堅定他的信念起見，特別挑選一連最精銳的官兵，下梧州去，請領餉彈，並且請他檢閱。這連人，不但在我部是精銳，就是在整個廣西軍隊裏，也要算是極出色的了。他見到了，自然很喜歡。並且開動了梧州城，都歡迎我的部隊到來駐防。因此就接到許多餉彈子彈。他希望我立刻通電就職，並將隊伍開往梧州的前方。我始終以後而部隊尚未到齊，萬一通電就職，必使玉林方面懷疑而不能行動這些鬼話相推託。他也頗爲相信。其實我的隊伍早就到齊，正在那裏等待發動的時機呢。

【乘機解決沈部】沈鴻英在廣東，終於不出我的所料，被革命軍打敗了。他的部隊分由西北及廣寧懷集兩路退却。在梧州方面，已有好些輜重船隻退到。我們認爲機不可失，即時發動。當時在戎圩同駐的，尚有沈軍旅長黃炳勳所部約五六百人。在一天拂曉，將他全部繳械，無一漏網。於是我們將梧州上游的水路交通斷絕，凡是經過的船隻，一律扣留。由梧州上來的船隻，多半是沈軍的行李輜重，一併爲我們所獲。並且派俞作柏率兵一部由陸路進至撫河（桂江）右岸，將沈軍向平樂桂林退却之水路截斷。鄧瑞徵知我軍有變，一面通知沈鴻英及其部隊，不可向梧州退却。他自己也就向賀縣、八步連夜逃走，

我的部隊沿江而下，到達三角咀（蒼梧城撫河對岸）。遙見下游方面的粵軍兵艦，及運輸軍隊的船隻，正沿江上溯至鷄籠州矣（梧州下游七八里之小洲）。

【以梧州爲中心的革命勢力】是時我先行派員前往聯絡，隨後親自督謁魏指揮邦平於永翔兵艦（即中山姐妹艦）。陳傑夫亦隨軍同來。我與魏以前雖未相識，但頗耳其名，相見之下，其亢爽的性格，與活潑的風度，爲我初次與革命軍方面人物接觸時，發生與舊軍不同的感覺。其參謀長爲保定戰術教官楊言昌先生。經其介紹，彼此即儼如一家，不因初次見面而稍存客氣與隔閡。其後續部隊與長官，亦陸續到達。計有陸軍第一軍軍長梁鴻楷，第一師師長李濟琛，第三師師長鄭潤琦。而陳銘樞、陳濟棠、張發奎、鄧演達、戴戟、繆培堃、黃鎮球、薛岳、徐景唐、蔣光鼐、李揚敬、李漢魂、嚴重、錢大鈞、陳誠、黃琪翔、何彤、李文欽、鄧世增、馮竹萬、馮竹賢、香翰屏、蔡廷楷、陳勁節等，皆爲當時革命軍重要幹部，因到梧州會師而相見者。海軍方面則有陳策、金彥文、孫祥夫等。彼此皆以除舊革新爲目的，故相見之下，備極誠摯。又因多數係前後同學而更加親密。此於後來兩廣局面之發展，有極大之關係。

這時廣東滇軍雖驅逐陳炯明，擊敗沈鴻英、方本仁、鄧錫如。然而革命軍之基礎，尙未穩固。一般革命軍人認爲廣州之局面，尙須改造。而苦於實力未充，時機未到，必須有適當地方，補充整理，方能發展。在西江方面之部隊，實粵中之精華。他們最後目的，爲廣東全省之革新。故對於梧州之進駐，僅爲暫時，而非對於廣西有何野心。同時對廣西必須得到一個可靠有爲的朋友，乃無後顧之憂，並可收彼此相助之效果。在我們方面的目的，是在廣西之改造。我們必須以梧州爲根據，逐步向西發展，以完成革命政府所賦予之討賊任務。我們對廣東，決不求敵而須求友。同時我們的力量太單薄，亦必須求得有力之朋友，予我們有力之幫助，方能使我們的工作順利進行，而有恃無恐。雙方在此種共同意志與各別的情形之下，遂無形中成爲以梧州爲中心，彼此背靠背而不可分之團結。故在梧州的廣東同志，隨處皆

以客體自居，凡事予我助力。而我們亦能盡地主之誼，禮遇賓客。此種情形，完全基於革命同志間之互信共信而分工合作，此為歷史的際會，於以後革命進展，關係非常重大。三十二年我赴重慶開會時，以前在酉江共事過的同志，多為今日之顯要，曾舉行一次大聚會，彼此相見之下，實不勝其今昔之感也！

【組織廣西討賊軍總指揮部】我軍到梧州後，乃實行組織廣西討賊軍總指揮部。我任總指揮。白劍生自回隊後，雖然未曾露面，而一切參謀規劃，都由他主持。至是乃推他為參謀長。黃玉培為祕書長，龔傑夫為參謀處長，呂凱秋為副官處長，白博九為軍法處長，黃維為軍需處長，胡宗鐸為參議，陳傑夫為粵州代表。部隊則編為三團，俞作柏為第一團團長，伍展空為第二團團長，夏煦者為第三團團長。這是我軍初出梧州時之主要陣容。

我們這時的名義是討賊。我們的任務，亦是討賊。所謂賊者，自然是指一班反對革命之自治軍，與殺人越貨的主匪。我們祇知秉承大元帥與革命政府的意旨，作軍事上之努力。對於政治的理解，還很幼稚，更談不到有什麼主張。不過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條，就是力反陸、譚、沈及自治軍之所為，創立我們的新作風：第一、是整肅軍風紀。我們的部隊，一向都是依附在舊軍閥面生活的，自然會傳染一些不好的習慣。自從脫離舊軍的關係，在一個大大的變動中，一切的紀律，自會發生廢弛的現象。在百色南寧轉進的中間，我自己的軍隊，曾經發現過很大的劫掠行為，我不能及時制止，是我治軍一個最大污點。由卡林參加的部隊，多為前桂軍第二軍所改編，中間也不免有敗壞紀律的地方。所以到梧州後，我們對於紀律的整頓，認為首先之務，決定作為治軍建軍的中心工作。一次有個人，犯了軍法，這人的哥哥，是我們重要的幹部。我防他來說情，立刻將這人槍斃。從此以後，紀律日漸嚴肅。我們更不斷的在訓練方面，執法方面，繼續努力。才將十數年來沿習的壞風氣，轉移過來。第二、是重質不重量。我們對於散軍土匪，不主張收編，而實行剿辦繳械。即使一時收編的部隊，如果他的質不合我們的要求，亦不

因顧全小信而不加改編改造。所以量的發展非常緩慢，而質的方面，則漸見充實。尤其是高級幹部，不務虛名，不作大官。俞作柏、伍展空、夏煦蒼等，除了臨時賦予指揮其他部隊名義之外，一直到廣西統一，他們都是當團長。這三個基幹部，負擔一切的重要任務，形成了我們中堅的力量。後來雖然增加幾個團，仍舊是本着這種作風去建立。所以到廣西的統一成功，我們建軍的基礎，亦就鞏固了。第三、是武器彈藥的製造。我們認為戰爭之勝敗，人的因素，祇佔一半，物的因素，也佔一半。數年以來，飽受彈械缺乏之痛苦，雖然我們一向都以「拿前方補充向敵人奪取」的口號來作鼓勵，而收到相當的效果，但是亦須要自己有充分的力量，才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在玉林、容縣，雖然有土造槍土製彈的設備，但是技術上、質料上，都不合要求。到梧州後，對於製藥製彈造槍種種條件，都相當具備，而須努力進行，以為長久補給計劃。第四、是官兵共同甘苦。我們對於歷史上的名將，如吳起、岳武穆之與士兵同甘苦，至為景慕。對於舊軍高級長官之窮奢極慾，不恤士兵的情形，深表痛惡。而我們當時以經費的困難，更無多餘的款項，作為軍官的薪俸。所以我們規定士兵的伙食餉項為毫洋二角，官長不分等級，每日餉項伙食為毫洋四角。這種生活，自到玉林之後起，一直到廣西統一止，足足維持三年多，而未變更。第五、是培育幹部。「幹部決定一切」的理論，當時我們已有深刻的了解。而舊軍的失敗，多半是由於幹部的腐敗。這種事實的教訓，更加深了我們對於幹部重要的認識。我們的幹部，雖然有許多的陸軍學生，以及一些受過新軍教育而富有作戰經驗的行伍軍官，然猶認為未足，此後跟着局勢的開展，更須大量的補充。除了設法招致陸軍學生外，更創辦幹部之訓練機關，不斷的培育訓練。我們對於支配幹部的共工作，及階級之升遷，一概都以人才為標準，而不稍存私意。平時幹部的選拔，都採納最高級幹部的共同意見，及一般的評論。第六、是財政公開。財政不公關，是使團體離心離德的重要因素。我們所有的部門，都是採用公開的投標商辦制度。因為在陸障時代一切稅收機關，都作調劑私人之用，任其中飽，

不加釐整。在人的信用尚未建立，監察制度未臻完善以前，投標商辦，一則可予各人有競爭參加之機會，而免個人支配之嫌疑。一則可以由私人屢次競爭，而使公家得到較大之收入。這種辦法，在當時確有其相當之價值。至於支出方面，則各高級幹部，皆本其良心，不敢尅扣中飽。第七、對陸譚不作譴罵攻擊，對自治軍不作全體之敵視。因廣西軍民對陸譚九年來之過去，尙多懷戀，若譴罵攻擊，易引起粵軍入桂時同樣的反感。假以時日，使彼稅政的害處暴露愈多，人心愈厭惡愈甚，可不攻而自破。當時我軍之力量有限，舊軍之勢力，十數倍於我，若全體爲敵，不但難以制勝，且易招致極大之危險。惟遠交近攻之方法，最適合於當時之形勢。記得當初起草討陸譚的宣言，總不免蹈以前徵文捏造事實信口譴罵的陳套。我將文字改了又改，始成定稿，原稿是我的秘書長撰擬的。這位秘書長，是我的叔叔，舊學根底是相當好的。他對人說：「我的文章，他（指我）也要一改再改。」意思表示我這年輕的老粗，不配改他的文章似的。我轉告訴他：「因為我是總指揮。」第八、對廣東方面之友軍，除形式上很顯明的站在同一陣線之外，並力求彼此之衷心諒解，而達到互信互讓互助之目的。蓋我軍力既屬有限，地盤亦僅雙方共有之梧州。互信不堅，則互相猜忌，而不能對外。稍不相讓，則互起爭論，而自相火併。尤其在我們，必須得到友軍之幫助，方能發展。第九、是養成各人自尊的人格，各盡各人應盡的責任。我們是各方集合而成的團體，在表面上雖有階級之分，而實際上許多重大的問題，大家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但是到了決定之後，大家都能就自己範圍之內，盡其最大之努力。所以在整個過程中，絕少用過很嚴厲的命令。大家都是本著自尊的心理，發揮自動自覺的精神，任何決策，無不貫徹實施，收到完滿之效果。以上所述各種方針與措施，雖未明定成文之政策，建立具體之制度，而在當時情形，必須如此，則爲我等所深刻瞭解。故此種方針與措施，一直到統一廣西的時候，未嘗改變。亦可以說這是廣西統一成功的主要因素。

【初見李任潮】當梧州會師之後，我方與粵方彼此的感情上雖極融洽。但軍政號令，尙未有統一的規定。此時魏邦平總指揮已回廣州，其他部隊，亦多東下。大本營乃任命李任潮（濟琛）爲西江善後督辦，設督辦署於梧州，並留第一師之大部駐梧州。李督辦爲梧州人，在粵革命軍中，有悠久之歷史。我們素不相知，更未曾謀面。我心裏想，在那粵桂交關的時代，一個廣西人，怎能在粵軍中取得領導的地位。待會面之後，才覺得他的人格偉大。欽慕之心，油然而生。我現在回想，假使當時駐梧州的粵軍首腦，不是他而是別人的話，廣西統一的局面，未必能如此順利進展，甚至還要影響到整個革命的進展。他雖然沒有直接參加廣西統一的工作，而實是幕外最關重要的人物。因爲他和第一師重要幹部，對於廣西之改革皆非常關切，得其助力特多。更難得的，他除了幫助之外，一切都尊重我們的意見，任由我們去進行，不稍加干預與掣肘。這是廣西改革史中的重要關鍵，而使我對於他這種偉大精神，永難忘記的。

【計擒馮葆初】當粵我兩軍會師的時候，原駐梧州之沈軍旅長馮葆初，因不能撤退，而且不願放棄梧州的地盤，不得已向粵方投誠。馮爲人善於取巧拉攏，此次投誠，非其本意。其所部數量相當的多，而紀律甚壞，留之必爲後患。我乃密請李任潮，將其繳械。馮部多駐城市，又恐戰事發生，市民遭受損失。遂用誘擒之法，迫其下令所部繳械，以免發生戰事，驚擾市民。當時共同密議者，僅李任潮、馮竹萬、鄧演達、黃鎮球及我數人而已。其時鄧演達爲廣東陸軍第一師第三團團長，率其所部，擔任梧州軍警督察處的任務。乃假傳命令，將鄧團調回廣州，而以我部代其任務，進駐梧市。蓋我部以前尙駐於三角咀及戎圩附近，特設此烟幕，以掩飾其行動，不使馮部見疑也。部隊佈置就緒，於花舫中設宴，爲鄧餞行。並邀馮及陸海軍將領商界領袖作陪。梧州花舫皆集中於撫河裏面，爲當時一般商人及軍政人員遊宴應酬之所。入夜，水碧燈紅，笙歌聒耳，實爲黑暗世界中別一天地。兩軍將領雖抱革新之志，而對於數千年遺傳之酒色英雄的舊觀念，尙極濃厚。故當時上面將帥，下面紳商，一切公私應酬，多在此中舉

行，而恬不爲怪。我前年與黃琪翔兄談及此事，彼深覺以前這種生活的腐化。我說：「這也許在當時是一種正常的娛樂。因爲這是封建社會必然產生的畸形現象。封建社會裏的舊禮教，對於男女授受不親，講究太嚴，所以就有娼妓的出現。而一般人反以爲娼妓是正常的，合法的，對男女的自由戀愛，反認爲不道德的有爲。又如前清北平官僚，法律禁止他們玩娼妓，但又允許他們玩相公。實際是越防閑，越橫決，所以必須在道德的根本上，有了合理的解決，這些腐化生活，才可革除。否則在那一個階段裏，他們是正當的。」其航的宴會，皆在午夜舉行，有至通宵達旦者。我們原擬將馮葆初羈縻到拂曉，等我們都睡飽了，再行宣佈，將其扣留，並迫他令飭所部，自行繳械。不意事機不密，正在飲酒的時候，他已得到報告，決意與辭離席。經多方解釋挽留，都屬無效。我見時機已迫，即起立拔槍相向，要他與馮身俱赴幽。並請將李督辦扣留之命令宣佈。彼等毫不畏懼，向我力撲，奪我手槍。我這時既無官印命令，機會，不能開槍將其射殺。蓋原意乃在生擒，不欲致之死命。而當時陸軍將領等隨從之武裝士兵很多，佔滿左右。我若開槍，彼等不知原委，必至互相射擊，而同歸於盡。同席諸人除鄧演達外，其餘的人，又皆不知內容，疑爲酒醉互毆，均來勸解。後經鄧演達說明，並率同衛士，將馮擒住，加以綑縛。一箭城內我軍進攻，與馮部抵抗的槍聲，亦若斷若續的響着。幸馮已被擒，所部指揮無人，至抵城，已爲我軍所解決。我與鄧演達巡視城內，見商民尚未受到若何損失，頗爲歡慰。事後同席的人，很埋怨其事先告知他們，幾至釀成極大的危險！也有人說：「這種措置，太過冒險。身當一部主將，萬一有變，則全部將受挫折。」我對於前者的責備，自願接受，而頗覺抱歉。但我當時確有不顧一切衝動的步。對於後者的說法，我認爲一個人做事，先顧慮本身的安全，固然是應該的。但這祇是其中一種狀態。若是超過了這個限度，則變成了自私畏縮的行爲。所以我對於他們這種見解，是極爲不滿。而以前經過的事實，在某一種狀況之下，對於本身安全，均未嘗顧慮。因此而得到

很多人的敬仰，尤其是幹部與士兵。這就是我成功的一個因素。

鄧演達無論當時在梧州粵軍將領中，在以後的革命過程中，都是一個令人注意的人物。他有魁梧的體格，飽滿的精神，處處表現勇敢負責革新邁進的氣概。自從同我擒拿馮葆初之後，更增加了友誼的深切。後來他離開了第一師，到蘇聯去。在出國之前，曾有一封很長的信給我。從歐洲的文藝復興，談到中國的改革。他不但不滿意國家現狀，並且不滿意廣州，及他自己。所以他要到蘇聯去，充實自己，然後回來改革中國。很多的理論，雖也有獨到的地方，但總有點過火，或不切實際。

【攻佔藤縣】自從馮葆初解決後，梧州已成爲很純粹的革命策源地。廣東第一師的重心，向肇慶移動，其目的在廣東之改革。至於我軍目光，則向梧州上游移轉，而展開軍事行動。這時藤縣城（離梧州九十里）附近有自治軍旅長盧得洋及司令黃超武駐紮，而平南、桂平、貴縣沿江，更有陸雲高之主力。我第一期作戰目標，必須將這些部隊解決，佔領沿江富饒的縣份，以充裕我的餉源。並且可與玉林李德隣方面水陸打成一片，然後再作第二期的打算。於是我們首先作進攻藤縣之計劃。

藤縣城在大河（西江梧州以上之總稱）與北流河之合口處。依山濱水，形勢至爲險要。盧得洋黃超武等部進駐該城，即爲扼守大河水道，阻止梧州方面之進攻。故由水路正面進兵，殊覺不易。若陸路進攻，則須渡過大河北流河，亦非易事。且遠道行軍，敵軍將先爲準備。我們再三籌議，用陸軍由水道並進。這時正值仲夏，河水大漲，即較大之輪船，亦暢行無阻。我方汽船及拖輪甚多，乃將全部軍隊，用船運送。並請粵方派小兵艦兩艘爲掩護，先在戎圩附近集中，於次日半夜，順一三團之次序出發，期於黎明到達藤縣江。我與白劍生、俞作柏、夏賡蒼等，皆隨隊出發指揮。船隊到達縣城下游附近，乃下令將船靠江之左岸，開足馬力，向敵人火線衝過。軍艦兩艘則列於船隊左側，實行掩護。並發砲向岸上守軍轟擊。時常拂曉，多數敵軍，尚在夢中。先時我軍願慮船隊通過火線時。若受敵軍密集射擊，必多損

害。蓋以當時火力非常薄弱，且水漲江闊，步機槍火，全無效力，不易抵抗也。可是因為時機適當，乘隙進襲，不為敵軍發覺，竟能毫無傷亡，就在敵人火線正面，安然通過。船隊超過藤縣城五里附近，已進入敵陣後方。令各靠岸部隊，一湧登陸，佔領城後一帶高地，背水為陣。士懷必死，勇氣倍增。城內敵軍見後路為我所斷，慮得洋率部出城，向我迎擊，為我擊敗，慮亦陣亡。殘部希圖奪路向上游逃走，為溪水所阻，被我部隊追及，將其全部繳械。乃將城裏敵軍黃超武所部圍困，準備攻城。黃超武與我有一面之交，且屬青年，有志上進。當派代表出城，表示願意收編。我見其頗具誠意，准其投誠。編為廣西討賊軍第四團。此役自午前八時開始，至午後四時結束。將自治軍二千餘人，全部解決。除收編者外，逃脫者僅數十人。繳獲槍枝及戰利品甚多，戰果非常完滿。其原因，第一為敵人對我企圖行動，不甚明瞭，且太恃正面江河之險阻，而疏忽側後陸上之警戒。我軍反利用多數船舶運糧，衝這正面火線，在其側後登陸，殊出彼等意料之外。第二，我軍蓄銳既久，官兵初戰，皆如出林猛虎，遠非散漫無紀律者所能抗拒也。

【赴廣州謁見總理】佔領藤縣後，我將各種事務，處理完畢，仍回梧州。溯我軍在梧州舉義兩三月間，初解決馮葆初，繼解決盧得洋黃超武，佔領藤縣。頗為各方所重視。陳傑任駐粵代表，由廣州來，建議我到廣州去見孫總理，及中樞各要人。並請接濟械彈餉項，以為第二步討賊工作之準備。我對於他這種意見，甚表贊同。而在梧陸海軍將領，亦多主張去廣州，向總理報告討賊經過。乃乘海軍差遣艦東下。同船有海軍代表孫祥夫，總參議胡今予及陳傑夫等數人。時正夏秋之間，江水陡漲，黑夜行船，方向難辨。行至東西馬寧附近，忽然轟聲大作，船身震動，將我等摔移數尺。船上燈火，盡皆熄滅。繼而槍聲突起，我等出艙查問，始知係與另一差輪相遇，因各不相讓，以致互撞。此處為匪船出沒地點，往往黑夜騎劫商輪。雙方又皆誤為匪輪，開槍互擊。追問明原故，始行停止。我輪船擊力猛，

尙無大礙，彼輪則船破人傷，擱淺江邊矣。

我到廣州，首先去見廖仲凱先生。他當時爲財政廳長，我們以前很多事情，都是向他交涉。他對於我們，也非常關切。隨後由他介紹去見 孫總理於河南士敏土廠。總理身着中山裝，態度和藹嚴肅，令人一見，卽爲其偉大精神所感召，自然起景仰之誠。我將過去革命討賊之經過，作概要報告，並請求接濟與指示。仲凱先生並從旁加以補充。總理聽完我的報告，頗爲欣慰。並加指示：「革命黨是不是一切憑藉的。一切都靠自家去創造，自家去發展。革命主義、革命精神、革命黨員就是本黨一切力量的源泉。你們決心參加革命，首先要明白這道理，其餘的問題，可與廖先生去商量。」我聽了這偉大的指示，就同廖先生與辭退出。這就是我第一次看見總理的情形，也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總理的情形。因爲自是年的冬天，總理北上，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北平逝世，就永無見面的機會了！在過海電船中，廖先生曾告訴我，廣東財政困難的情形。言外之意，財政並不在財政廳手裏，而是在滇桂軍隊的手裏。在這種困難情形之下，廖先生仍然撥助我兩萬元。並另外設法，撥我兩萬發子彈，盛意真可感謝。前年（三十二年）我在重慶，與羅翼羣先生談起往事。他問我：「還記得民國十二年在廣州撥你兩萬元的事吧！你不要以現在眼光，看這兩萬元。當年我們不知費了多少方法，才能籌到這筆款子。當時的價值，恐怕比現在二千萬還要大呢！」那時羅先生協同廖先生，辦理財政，參與此事，故知之頗詳。我在廣州，曾經會見粵軍總司令許崇智，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桂軍總司令劉震寰，及大本營秘書長楊滄白，軍政部長程潛。無非是照例的應酬。不久，就回到梧州去。

【與李氏合力解決陸雲高部】這時在平南、桂平、貴縣、賓陽、橫縣等地之陸雲高所部，大有進犯梧州之勢。而且扼守全省交通重要的地區，實爲我們當前的最大阻礙。陸氏爲以前廣西第一師的旅長，他的部下，有兵三團，約五六千人。而且槍械相當的充足整齊，且有若干經過訓練的隊伍，實力自非虛

得津、黃超武等可比。我們自度力量不能單獨取勝，乃有聯合玉林方面，協助進行的計劃。我軍自出梧州，迭獲進展。但對玉林李德隣處，尙未正式派人報告解釋，此時我便派伍展空到玉林，向他說明過去的一切，並商量合力解決陸雲高問題，獲得他的諒解和同意，並派鍾祖培與伍展空同到梧州報請聯絡，順便觀察實際情形。兩方合作的形勢既成，對解決陸雲高的計劃，亦經商定。當時陸的部隊，東至平南之大安圩，西至賓陽橫縣，沿江數百里，盡爲其所霸佔。我們乃決計將貴縣以東，先行解決。因其主力在桂平江口之間也。玉林方面由興業縣進兵貴縣，然後順流東下，直搗桂平。梧州方面，則沿江而上，會師桂平。分爲兩路：一由夏煦蒼指揮第三第四兩團，及機炮連，由藤縣循陸路，直趨大安圩，撲滅當前之敵，然後向平南前進。一由白劍生指揮第一第二兩團，乘輪溯江而上。在白馬附近登陸，向平南進攻。夏部到大安，敵軍不多，稍戰即退。遂亦沿江，與白部會合，向平南搜索前進。到平南後，偵知陸部全部集中江口，希圖與我作孤注之一擲。我乃乘其部署未定，急行強襲。陸軍初由桂平到達，猝未及備，倉皇應戰，不久即行潰敗。這時李軍已佔領貴縣，襲取桂平。陸進退失據，乃引殘部向蒙山方面逃竄，復遭我第一團俞作柏在馬練圩附近阻擊。陸與旅長張春如，轉入鵬化，據險頑抗。兩軍乃會師攻擊，將其擊潰。陸率少數殘部，向潯山逃永安，往依沈鴻英。此役我俘獲大砲九門，大鵬兵艦一艘，陸部營長蒙志、王繼斌、王飛虎皆率部向我軍來歸。軍隊傷亡逃散者，共約半數以上，從此遂一蹶不振矣。

鵬化在桂平、平南兩縣的交界處，距江口平南桂平皆數十里，洪楊起義的金田村，即鵬化附近的一個村莊。該處教堂擁有教徒甚多，傳係洪秀全在此傳教所致，至今父老尙有能述述當年遺事者。我們此次戰事，頗與金田起義時情形相似，陸雲高、張春如的地位，猶如洪、楊，我們的地位，猶如烏蘭泰，然而時異勢殊，師有曲直，勝負之數，遂亦不同矣。

我軍自兩次勝利之後，聲威大振。大河一帶的散軍，紛紛請我收編。我們對於這些善意來歸的人

，自然不能完全拒絕。於是將他們編爲游擊隊部，以示與基本的團部有區別。計有第一游擊司令馬夏軍，第二游擊司令何正明，第三游擊司令封輔年，第四游擊司令蔡振雲，第五游擊司令黃桂丹，第六游擊司令陳錦華，第七游擊司令盧文駒，第八游擊司令陳濟桓。這些人都是以前的老軍官，或是當心有武力的士紳，乘時崛起，聚衆以附者。其人數或千餘人，或數百人，多寡不一，槍枝亦參差不齊。就此可見當時民軍名目的衆多，與情形的複雜。但在戰事進行時，若善於運用，亦能搖旗吶喊，幫助聲勢不少。此外尚有游擊司令羅經，爲初到梧州時所收編者，羅爲模範營的營副官，係我們的老同事，不幸在容潭剿匪，（藤縣附近）中彈陣亡，這是我們高級幹部中最先陣亡的一個。

【解決陳天太部】這時廣西在粵部隊，除劉總司令震寰之外，還有直屬於大本營的第七軍軍長劉玉山。他也是廣西革命的老同志。所部師長陳天太者，實力頗爲充足，以在粵不能發展，久懷回桂之心。尤其梧州是其主要目標，志在奪取，苦無名目進行。乃假借開赴南路爲名（粵之高雷欽廉），暗將部隊集中梧州下游的都城。（粵境市鎮距梧州九十里）並約自治軍陳先覺等爲內應，既無大元帥府的命令，都城又不是他們南下必經的地點，我們及粵軍第一師，先已接得情報，至是更明瞭其陰謀。李督辦與我商量，決心會同將其全部解決。粵軍第一師及海軍由都城下游登陸進攻，我軍由梧州向都城進攻。我於是將梧州上游部隊，盡數調回戎圩集中。並請李德隣派得力部隊，到梧州增援。我軍除以伍展空第二團駐守梧州，防陳先覺外，其餘皆向大坡山（戎圩都城間圩市）集結。隨分三路，向都城進擊。以俞作柏所部第一團擔任右路，夏煦蒼所部第三團擔任中路，白劍生指揮黃超武所部第四團，及蔡司令振雲所部，擔任左路。我在中路指揮。次日黎明，各路皆到達都城以北地區。中路因路程較近，接觸最早，節節進展，已迫近都城。左右翼未能趕到，陳天太見我中路突出，乃集中兵力，三面向中路猛烈反攻。我前頭部隊兵力既單，立脚未穩，遂被擊退，傷亡極大，一直退至我指揮所在地位。這時我僅有預備隊一連，

乃就地展開抵抗，以掩護由前頭退下之部隊。陳天太率隊緊追，距離不過一二百米達，彼此面貌，皆可辨認清楚。若再退却，敵將中央突破，轉而繞攻左右兩路之側後，必至全軍潰敗。其時右路已在相持，左路及粵軍第一師，尚未到達。我既認清當前情勢，且斷定白劍生一定可以依預定時間到達，相去祇一小時。在此一小時內，無論如何困難危險，必須盡力支持，方能等待左路及粵軍趕到，發揮分進合擊之效。故決心與敵作最後之搏鬥。於是令衛士廿餘人展開，我自己亦加入火線，敵方人數衆多，攻勢猛烈，向我陣地之鞍部隘路，屢次衝鋒，皆爲我軍遏止。我當年槍法極準，射殺甚多。手槍損壞，乃執士兵步槍，繼續射擊，敵人攻勢頓挫，遂成相持狀態。此時遙見左路我軍已到，並分向敵後挺進。敵軍乃不得不抽調主力，向左路迎擊。且料我傷亡重大，決無反攻能力，僅留一部與我相持。我見敵人動搖，乃親率未傷亡之官兵，竭力反撲。隨同我最先前進者，僅連長李耀宗、馮璜及衛士長牛得才，衛士莫世才、廖正光五人而已。夏煦蒼將收容餘部，及右路我軍，亦隨我跟着反攻。敵軍不能支持，向都城方面潰退。此時粵軍第一師亦由下游迫近都城，陳部及其官兵多爲桂人，陳天太乃率殘部突圍，向梧州方面逃竄。

我佔領都城後，查點衛士傷亡十餘人，第三團亦死傷過半，戰鬪可稱激烈。中路之挫折，由於攻擊時機過早，致使敵人得集中全力反攻。而粵軍又因爲溪水所阻，不能及時由後側夾攻，各方失却聯絡，幾致全軍潰敗。然始終信任友軍，以少敵衆，拚命支持。等待友軍到達，反敗爲勝，亦云幸矣！

敵軍既向梧州方向逃竄，我亦急由都城趕回梧州主持。但因連日作戰，體力疲憊。第三團傷亡過重，須加整理。於是先率第三團乘船回梧州，而以白劍生任追擊指揮，率左右兩路，及粵軍第一師一部，跟蹤追擊。敵竄至大洲圩附近，飢疲不堪，復爲我民團所阻，我追擊部隊，亦隨後追到，乃全部繳械。除天太及其剩餘全營官兵二千餘人，盡爲我俘獲，解至梧州。除士兵分發各部補充外，對陳天太及其高

級官長，特加優待。並發給川資，放回廣州。我次年到廣州，在東亞酒店，復遭其襲擊，幾至喪命，可謂以怨報德，小人之尤！此時尚有一事值得紀念者：當事機緊急時，我因兵力單薄，電請李德隣協助，蒙派鍾統領祖培，率部星夜馳援。在途中得知陳部已完全解決，即折回桂平。玉林與梧州兩方，表面雖是分立，但患難之際，則互相援應，實爲合作統一之先聲也。

「肅清大河一帶土匪」這時大河一帶，自貴縣以下，雖盡入玉林及梧州方面之掌握。而散兵土匪，橫行各縣，民不聊生。梧州至藤縣，水程不過九十里，土匪收行水的關卡，亦有數處之多。有一次，我與孫祥夫乘海軍內河兵艦，由藤縣下來，亦爲土匪所擊射。經船上開砲，始將其擊退。其他商輪，不納「行水」者，無不遭其轟擊。傷人劫貨，殆爲常事。我與李督辦商量，趁軍事稍暇，實行全面進剿。蒼梧境內，由粵軍第一師之一部擔任。藤縣江至岑溪一帶，由我第三團擔任。藤縣以下，至梧州水道，由第二團擔任。藤縣以上至平南，由第四團及蔡司令擔任。匪幫佔據堅固民房，頑強抗拒，非逐屋進攻，不能將其掃除。步槍火力不及，則繼以手榴彈火砲。往往匪在炮樓之內，將其頂樓轟毀，則退守二樓。二樓再毀，則在地上掘壕，在牆腳開砲眼，仍行抵抗。被困甚久，既不遽竄，亦不投降。火攻不可，乃用救火洋龍，以水注射，始得退出。尤以藤縣之波塘村，有碉樓十餘座，房屋至爲堅固，圍困竟達八十餘日。後由韋營長雲淞用各種障礙物，將其封鎖，然後掘坑道至碉樓下面，用火藥轟炸，土匪數百人，盡行殲滅。自此之後，匪乃不敢固守，而終被肅清。總之，當時土匪竭盡其防守之能事，而我軍之攻擊，亦用盡各種方法。在這剿匪期間，工作之困難，與官兵傷亡之大，實較以前各次戰事爲甚。卒使土匪認識官兵之不可抗，土匪之不可爲，實爲奠定以後治安之最大收穫。同時我軍亦獲得實地之演習，與戰鬪之經驗，裨益以後作戰，更屬不少。

「槍械彈藥補給的來源」在這一年中，因作戰而損耗彈藥極多，無法補充。我們雖然以「在前方補

充」的口號來鼓勵士兵，但是以前廣西並無製造彈藥之廠場。陸譚時期，積聚一些子彈，都在歷年的戰爭中散失或消耗。與我們對戰的軍隊，彈藥缺乏，比我們還要厲害。前方補充，既不可能，祇得向後方請領。而廣州方面情形，也復如此。不得已祇好自己設廠製造。中國內戰時代，本來就是外國的軍火市場。在國際條約上，軍火雖然是禁運品，但祇是表面文章，中國商人與外國商人，自有方法，逃避國際條約的約束，而做成他們的交易。拿子彈來說，他們可以把子彈頭、彈壳、火藥三樣拆開，將彈壳的底火除去，以彈頭彈壳作廢銅鐵發賣，大量的公然運載入口。無烟火藥，亦可用其他方法運進來。據說，這是外國已過保管年齡的廢品，照例是要銷毀的。他們却賣給我們，換取我們的金錢。而我們則視為至寶，作為利器。我們得到這些現成製品，祇將底火重新配好，火藥彈頭重新裝上，就是一顆可用的子彈。後來我覺得無烟火藥運比較困難，而且往往霉壞。於是自己設廠製造，由主應榆兄主持其事。因製造彈藥的原故，繼續設立了硫酸廠硝酸廠，以自製彈藥的原料，從此槍彈補充，遂不感困難。

【我研究槍榴筒的開始】我們因作戰剿匪，極需要砲彈，與手榴彈，我們在敵人手裏，奪獲好多門舊式藥包山砲，但是砲彈極少。砲兵營長詹乾能將磚炸砲彈，製出試用，頗為滿意。但炸藥又成問題，無炸藥雖有，不能作爆炸之用，黑色炸藥亦成威力不大。遂聘請三個德國人，一個叫做雪倍，他曾在石井兵工廠做過工程師，其他兩個名字不能記憶。這三個德國人，都是化學的專門人才，由他們擔任製造高級炸藥皮克林酸（即黃色炸藥）。有一個因失慎，炸斷右手，成為殘廢！我們有了炸藥，不但砲彈有法補充，並能製造手榴彈。不過當時並無新的式樣，祇是在鐵壳內充滿炸藥，並插入慢燃導火索。用時，將火索燃着，然後投擲，這雖是很簡單很拙劣的方法，然而在當時內戰及剿匪，都收很大的功效。後來還試驗過從手榴彈後面加一條尾巴，插入槍管內，用子彈射出，有時射得很遠，比手榴彈效力好。但是往往把槍管炸壞，並炸傷射手，以後就廢止了。這是我研究槍榴筒的起點。

至於槍枝之補充，亦同樣困難。廣東石井兵工廠雖有槍枝出產，但是不易領到。我們用了很多人情，出了很高價格，才買到很少數目。此外還向中國軍火商設法向外國購買。但是騙局太多，我們很困難的節下來十萬元港幣，被一個姓彭名競武的一騙就騙去了。此事係白劍生的姪兒某經手。他的確被騙，而當時紀律很嚴，軍法官竟將他處了三年的徒刑。後來我們便自己購置機器，設法製造。以上所述，爲我們當時槍械彈藥補給情形，隨時都在艱難困苦中經營創造。雖規模簡陋，出品未精，而在軍事上之收穫則頗大。亦爲廣西軍事工業之萌芽時代也。

『我們的五項財源』當時我們的財源，大概可分爲五種：第一爲防務經費。兩廣人民好賭性成，民元以後，賭風大開，城市鄉鎮賭館林立。有番攤館、寶館、山票、花會等等名目。不論輸贏，皆抽征什一。美其名爲防務經費，實則賭捐也。此爲歷來收入之大宗，我們亦不能即時禁絕。此種賭餉，皆係招商承包，按期繳送。第二爲保護費，即係對商船商幫，派兵保護其運輸，不致爲土匪劫掠，其征收方法，則爲按貨收費。當時土匪橫行，肆意打劫，勒收「行水」。保護費的辦法，頗與行水相似。不過商人僅繳納一次，即可免土匪之劫掠，與繳多次之「行水」，故亦樂於輸納也。此種收入，多由軍隊直接辦理，繳呈公家。第三爲禁煙督察經費。民元以後，煙禁已弛，雖表面上仍維持禁煙名目，實則藉以籌餉。廣西爲雲貴兩省煙土出口必經之地，除在地銷售一部份外，大多數皆向廣東方面運銷。禁煙經費，分爲兩種：一爲煙土過境費，就運輸過境之煙土，每兩收費若干。一爲煙燈捐，即本地吸食者，按月納捐若干。此項收入，爲數極鉅。廣西統一後，全省統計年達千餘萬元，可知雲貴煙土運銷於兩廣者，年達數千餘萬兩之多。爲害之烈，自不待言。而飲鳩止渴，亦屬不得已也。第四爲釐金，援滿清前例，設關收稅。我到梧州後，改爲商包，收數增至三四倍，而包商仍有利可圖。商貨受其苛抽，則自所不免。第五爲各縣糧賦。廣西田賦額甚輕，而當時所轄者僅梧州五縣，故爲數不多。以上所述，各種收入，爲全部

軍費之來源。皆由各收入機關，直接解繳指揮部軍需處，隨收隨用。收支既無一定預算，會計審計，亦無制度可言，僅憑人的信用而已。斯亦草創時期之必然現象歟。

〔陳天太的暗算〕自從我到梧州不滿一年，前後幾次戰事，皆獲全勝。力量日增，各方皆極注意。而在廣州之桂軍，製造謠言，謂我與北洋政府聯絡，反對革命。或謂我爲一個地方主義者，祇知有廣西，有個人，而不知有革命政府。這種謠言，皆爲陳天太所散播，意圖中傷我們的。這時我尚未入黨，尤爲攻擊的主要理由，粵軍第一師許多朋友，都勸我到廣州去解釋，即在廣州入黨。我服從總理出兵討賊，已有半年，入黨自不成問題。但我顧慮陳天太在廣州，尚有武力，即其他桂軍對我亦無好感。他們都以爲自己是廣西革命先進，廣西的事，應該由他們來包辦，而今反由我這年青後輩，佔有廣西富庶衝要的地盤，駁駁有統一廣西之勢。因妬生恨，自屬意中之事。我如赴廣州，祇能帶少數人員同往，對於個人安全問題，實不能不顧慮及之。許多朋友中，陳伯南主張我赴粵最力。並謂第一師第三團駐廣州，其他粵軍，爲數更多。他本人並陪我同往，安全問題，絕對負責。我雖知必有危險，而衆議難却，遂毅然起程，用小火輪拖帶花舫東下。同行者有陳伯南黃劍靈（鎮球）陳傑夫、葉潔如諸人。行至德慶附近，天黑風大，航線難認，所拖花舫，誤觸礁石之上，黑夜沉船，方向不辨。伯南、劍靈、傑夫、潔如雖幸獲救登陸，然均飽嘗水中滋味。我本會游泳，但黑夜中不敢下水，乃堅踞船頂，船未盡沉，我亦安坐無恙。次日，改乘他船至三水，搭車到廣州，由陳真如伴我到各方行動。午後，真如有事，又由伯南伴我到胡展堂先生公館。其時總理已經北上，由其代理大元帥職務。同座談話者，有許汝爲、廖仲凱兩先生。我除將經過陳述外，對廣西以後問題，亦經談及。彼等對以往一切，甚爲了解。希望我此後對廣西問題，多負責任，以鞏固兩廣革命基礎。廖許並答應爲我入黨之介紹人，定次日同到中央黨部填表宣誓入黨。談話完畢，我與陳伯南同回東亞酒店二百零五號房間寓所。蓋在梧州時，彼答應擔負我的安全責

任，故日夜皆與我同伴，以防不測。此種誠意，真使我永難忘却！我隨身僅帶衛士六人，皆久經戰事，而忠實勇敢者，住於我之前房。這時已是十二點鐘，我回房後，甫卸衣機。忽聞槍聲大作，向我房射擊。衛士長牛得才腿部中彈，尚臥地還擊。其餘衛士亦仍相繼開槍，幸不爲所衝入。我這時已知爲陳天太所暗算，情勢危迫中，惟有督率衛士，堅決抵抗。而對方人數甚多，（事後查知爲三十人左右，附近各方俱已佈滿。）攻擊猛烈。在狹隘的地方，衛士僅能死守房門，無法回旋。幸我當時極爲鎮定，雖變起倉卒，仍能沉着應付，毫不驚慌。並知旅館房屋，皆鋼骨水泥所造成，衝之不破，火之不能，即刺我一人一槍，亦尚可與之相持，若能支撐到天明，則粵軍必來救援。如此激戰達數十分鐘，伯南已偵知從後窗可以翻過先施公司後樓。並謂：「既有路可避，死拼實爲不智。」遂相偕翻越鐵棚，進入先施後樓，適爲公司職員高君義安夫婦之臥室，彼等先開槍聲，已極驚惶。繼見我兩人持槍闖入，以爲行劫，戰慄不能出聲！我等乃將事由說明，請其帶路，至潮音街警察區署。這時我兩人身着睡衣，無鞋無襪，至爲狼狽。經以數十元向工友購得便衣鞋襪，化裝步出。夜深人靜，彼輩僅向前方進攻，後方並無攔阻。我們到達區署後，伯南即打電話報告粵軍總部，旋即派汽車來接我等到舊省議會內粵軍總部，至是乃告脫險。我等行後，衛士等尚繼續抵抗，但敵人太多，前仆後繼，仍然圍攻。衛士見我已出險，遂亦由後樓退出。衛士長牛得才身中十餘槍，當場陣亡。衛士覃立佳，身負重傷，仍能跑至高第街辦事處報告，隨即倒地身死，忠勇殉職，至堪悼念！其餘皆人槍無恙。後查悉兇徒三十餘人，傷亡十三人，並誤傷茶役李牛一人。戰鬪自十二點鐘開始，至三點多鐘才停止。這可算得廣州市內的一場小激戰。

【宣誓入黨】我到粵軍總部，次日，軍政要人皆到來慰問。劉震寰見面時，握手大笑道：「我早防到此事，好在你已脫險，事情你也明白。不然，這個膏藥，又要貼在我身上了。」范石生說：「廣州太不成樣了！諸如此類的事情，發生不止一次。我們已司空見慣，所以昨夜的槍聲，大家並不覺得驚奇

「許廖並問入黨是否即舉行？我含笑答道：「祇我尚未死，一定入黨，決不因此而稍有猶豫。」彼大加贊許，謂這樣才是革命者的態度！於是填寫入黨表及志願書，由許、廖簽名介紹，在大禮堂舉行宣誓儀式，由胡展堂先生監誓，並拍照留為紀念。是晚，胡、許、廖為我設宴、招待、洗塵、壓驚、歡迎的意義，兼而有之。同席的除各軍政要人外，還有蘇聯的總顧問加倫將軍。這次的菜肴中，有蛇肉一味。加倫將軍大概是初次嘗食蛇味，食後，許汝為先生問他：「好不好」？他說：「很好」！然後告訴他這是蛇肉。他很驚訝！加倫將軍並出示蔣先生致許先生一封很長的信，內容怎樣，我不知道，祇聽得他們說：「介石的理論，自然是不錯，但是事實上，恐怕一時做不到！」這時蔣先生正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並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函內所說，想係軍事改革問題。

〔在黃埔初見蔣先生〕次日，我起程回梧州，許總司令派龍驤兵艦送我回去，由粵軍總部至東山碼頭，皆由我軍特別戒嚴。許先生同我乘汽車登艦，並陪我到黃埔，在一個陳設很簡單的房屋內，會見蔣先生。這是我同他初次會面，當時感覺他的態度嚴肅而剛毅，與其他的軍事長官，頗有不同的地方。他將辦理黃埔及建立革命軍的意義，很簡略的告訴我。我因急於回梧州，不及參觀，乃與辭而出。自己乘艦到肇慶，改乘他輪，回抵梧州。此事經過，我雖處之泰然，而部屬與相不明，焦急萬狀。我回來後，彼等始覺放心。我這次赴粵，性命幾遭不測，承粵軍將領，患難與共，並得其種種關顧，不僅私交上成為莫逆，在公誼上亦更增密切關係。而當我加盟入黨之時，竟遭逢此種險惡風波，在我個人歷史上，亦為值得紀念之事件也。

六 統一廣西各戰役

【玉林與梧州之合作】玉林與梧州兩方，因已往出兵梧州問題，彼此總不免存有多少芥蒂，後來雙方屢經派人疏通，因而有解決陸臺高、陳天太兩役之合作，不但前嫌盡釋，而且充分表示患難與共的精神。雙方根本上之主張，與敵對目標，亦益趨一致。不過在方法和手段的運用上，彼此略有不同而已。民十粵軍入桂，因紀律太差，遭桂人的全體反對，和民九桂軍入粵，遭粵人全體反對，如出一轍。因此凡接近廣東方面者，無一不受桂人及自治軍之盲目攻擊，劉震寰的不能在桂立足，馬曉軍及我等亦幾為衆矢之的，都是這個緣故。

玉林方面對於自治軍，尙無若何的惡感，若用粵方名義，則必增加他們的反對。雙方爲求工作進行之順利，名義雖異，而相約互爲表裏。對廣東，由梧州出面負責，對自治軍，則由玉方出面敷衍。在實力未充，時機未到的時候，用這種手段，分途並進，目前既可減少反對之目標，事後仍可收統一之效果。故玉林方面自稱爲「定桂軍」，以示與梧州方面之受命討賊者有別，李德鄰自爲定桂軍總指揮，並以黃旭初爲參謀長，黃子敬爲秘書長，李石愚、何武分任支隊司令。兩軍既名義各異，所用旗幟，亦各不同，討賊軍用白邊紅心的方形旗幟，中書白地「黃」字。定桂軍用黑邊紅心的方形旗幟，中書一黑地「李」字。這是沿用舊軍的封建習慣，各以主官的姓字，代表其所領率之隊伍也。

兩軍各有其防地，定桂軍爲玉林、北流、陸川、博白、興業、貴縣、桂平等七縣。討賊軍則爲蒼梧、藤縣、容縣、岑溪、平南、信都等六縣。兩軍在自己防地內，不論軍事上政治上，凡用人行政，各有其系統，各有其作風，而不相統屬。但彼此在此階段中，對於共同之主張，和共同的目標，著本其團結

精神，爲最大努力。其在軍事上所表現之合作的事實，比到同名義同系統者，無稍遜色，或更過之。此爲當時之特點，實爲以後統一之基礎。

「我們的政略與戰略」我們估計自己的實力，與陸榮廷，沈鴻英兩大舊勢力相比，所差甚遠。我們對於整個政略戰略原則之決定，爲先陸後沈，各個擊破。第一個階段爲聯陸制沈，第二階段爲聯沈滅陸，第三個階段爲滅沈。所以當我們出兵梧州襲擊沈軍時，陸氏方面並不作任何攻擊，且由玉林方面，對他們竭力敷衍。陸氏當時亦當引以爲快！

民國十三年春，陸氏受北洋政府任命爲廣西善後督辦，由湖南回駐桂林。沈氏自民九以後，早欲脫離陸氏，而自樹一幟。這次陸氏重行回桂，有久駐桂林之意，沈軍防地被佔，遂發生利害上之衝突。沈乃率兵圍攻桂林，彼此以城爲戰，幾及半載，桂林人民，乃飽受其荼毒。而在我們方面，則認爲各個擊破他們之大好機會。並計及陸若得勢，他在省內之號召力量，比沈氏要大得許多。如前所述，我們在政略上，必須制止陸氏之復起，而在戰略上，則須聯沈以敗陸。沈氏對我，雖恨之切骨，今既目標相同，自然極表歡迎。故我之聯沈敗陸計劃，自有其最後之目的，而在表面上，則做得頗爲自然，使人看不出我用意所在。因此社會上有一些人深爲詫異，對我與沈氏合作的舉動，頗有非議。

我在政治的立場上，對陸氏已往，並不採取文字譏罵的攻擊，而是對於其新受北洋任命，自毀其辛亥首義與反對帝制的歷史，深爲惋惜，勸其勿再作馮婦，而見機勇退。在陸氏能否感動接受，固不可知，在我們則不欲落捏造對方罪狀抹殺事實的檄文陳套，而予其餘衆以反感。我們在軍事上之計劃，是先佔領南甯，把握全省政治中心，使陸氏不能再藉此以爲號召。蓋陸氏在桂，一般人民對他並無十分惡感。若果軍到南甯，號召力自必更大，故須趁其與沈軍在桂林相持不下之時，先發制人，將南甯佔領，使其陷於進退維谷境地，然後方易將舊勢力分別掃除。我們當時的「討陸宣言」，僅是輕描淡寫，很簡單

的幾句話：

各縣知事轉地方團體父老公鑒：我桂受兵禍十三年於茲矣！往昔客軍入境，幾同竭澤而漁，因之羣盜滿山，直爾安巢無鳥！補瘡孰從剜肉，同室忍再操戈？乃者，百色重鎮，大劫揚灰，八桂舊都，無端流血。摘瓜豈將抱蔓，折枝甯不傷心？某某早鑒覆車，力圖保境。覺迷途其未遠，冀省治之重光。何其人面不同，魯難未已！僑將被壓，號慮先亡，民其何辜，各將誰屬？用是會師邕莞，謀庇本根。杜彼政參，歸諸民治。所願邦人厭亂，多福原在自求！須知天道禍淫，惡力終歸自殺。即時大覺，還我太平。謹掬苦衷，敬祈亮督！總指揮黃梗印。

〔我軍驅陸和會師南甯〕自陸氏在桂林與沈鴻英發生衝突，相持不下，陸氏向北洋政府請援，北洋政府派湘軍一旅入桂。旅長桂人葉琪，是我們同學，彼亦不願捲入陸沈旋渦。師次全州，即不復前進。陸氏所部，乃不得不向柳州方面集中，欲與沈氏爭一日之短長，而不虞吾等襲其後也。當時，他們的軍隊，如譚浩明、韓彩鳳駐柳州、慶遠，陸福祥駐遷江，賓陽，林俊廷、蒙仁潛駐南甯，劉日福駐百色，譚浩澄、譚浩清駐龍州，總數不下三萬人。但分駐各處，每處皆係數千人。而當時我們討賊、定桂兩軍，合計可用的兵力，不過八千餘人，故必須集中使用，先將南甯方面擊破，然後再分向柳州桂林進擊。

戰略既定，乃於民國十三年五月間，將兩軍主力，在貴縣附近集中，隨分爲左右兩路：左路軍由李德隣指揮討賊軍伍展空、夏煦蒼、蔡振雲所部，定桂軍李石懸所部，沿江而上，直攻南甯。右路軍由白劍生指揮定桂軍何武、鍾祖培所部，討賊軍俞作柏所部等，攻擊賓陽遷江之敵，佔領賓陽、遷江、上林之後，乃轉向武鳴、南甯，與右路軍會師。我則指揮其餘各部，作爲策應，兼顧後方，仍駐梧州。左路軍於六月四日佔領南甯，擊斃蒙仁潛。林俊廷率殘部逃往那馬、都安，省長張其鏞亦棄職潛逃。南甯自民國十一年五月間爲自治軍盤據後，已整整兩年，至今乃獲解放。右路軍方面戰事，雖較激烈，但進展

亦極順利。攻佔遷江、賓陽、上林各縣後，陸福祥率其殘部與由南甯北潰之林、蒙殘部，退據武鳴以北之都安縣一帶，與柳慶方面之譚浩明、韓彩鳳仍連成一起，與我對峙。

我軍會師南甯，能如此迅速順利，一則由於自治軍之散漫頹喪，各自爲謀。陸譚雖同桂號召領導，仍不能團結振奮。二則由於陸沈相持，彼所注意者，爲當面之沈軍，對我們並不十分重視。不料我異軍突起，竟覆其根本，使其進退失據。三則由於我們用兵秘密而神速，集結而銳利，使其戰前不知預防，戰時不能援應。這是我們與陸譚正面衝突的開始，而即獲此重大之勝利，對未來桂局關係的鉅大，自不待言。

【以情感作用造成軍政統一】當定桂、討賊兩軍會師南甯之後，許多複雜問題，亦即隨而發生。第一，關於政治的，南甯是全省政治中心，對於政治應如何處理，不僅有關整個對外的號召力量，亦爲自己內部極容易引起磨擦糾紛的原因。而事實上，我們內部因財政和稅收機關問題，各級幹部已發生權利衝突，幾置當面之敵人於不顧，而劍拔弩張的在那裏拚命爭奪。這是我們到南甯後，急待解決的事件。第二，關於軍事的，以前一時的局部的合作辦法，已難應付此後複雜而擴大之局面，故必須有統一的指揮機構，才能集中意志，集中力量，進行全省的統一工作，而且兩軍幹部以前的芥蒂，亦須由指揮機構之統一，方可達到澈底泯除之目的。李德隣身當其衝，非常焦急。乃電我前去商量，我趕到南甯，一切問題都尚無頭緒，而敵軍與我正在相持狀態之下對峙着，情形頗爲嚴重。於是先商討軍事統一指揮問題，決定組織定桂討賊聯軍總指揮部，由李德隣與我召集兩軍重要將領會餐，席間，我起立說明必須組織聯軍總指揮部之理由，並推戴李德隣爲總指揮，我自願爲副指揮。並說：「我原是李德隣部下，因爲出兵梧州，權宜自樹一幟，今既會師南甯，正宜乘機回復舊時組織，以期統一指揮，進一步而統一廣西。要是彼此不能相下，必至自相火併，而與舊軍閥無異。我們今日幸乘陸、沈相持，佔領南甯，獲得勝利

。陸、沈前軍之轍，是不可再蹈的。故我們無論在任何狀況之下，亦祇得服從李總指揮，方為合情合理。我的部下，如有不服從李總指揮者，即等於不服從我一樣，必為團體所共棄。」我並且瀝酒為誓，表示誠意。大家見我如此，自然一致感動，毫無異議。繼由李德隣起立致訓，勉以精神團結，共成統一廣西之大業。次日即於當年的督軍府內，成立定桂討賊聯軍總指揮部，並任白劍生為參謀長兼前敵總指揮，黃旭初為副參謀長，胡宗鐸為總參議，俞作柏、夏煦蒼、伍展空、蔡振雲、李石愚、何武、鍾祖培等為縱隊司令，而繼續進兵，展開以後的各戰役。這件事實為玉林、梧州兩方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的經過。其間並沒有什麼命令法律的依據，而完全由於我等之情感作用。我現在回想此種舉動，好像梁山泊裏衆義士推尊晁蓋的情形一樣，自吹自擂，滑稽好笑！但在當時，亦確非如此做法不可。這就是統一廣西的一個最重要關鍵。

至於政治問題，我們以為在這階段內，尙是軍事時期。一切政治的建設，尙談不到。第一是我們對於政治無經驗，無興趣。第二、我們都要親自指揮部隊，與敵入拚死拚活，那有工夫分身去管理政務？倒不如在省內物色較有名望的文人，去當省長，以避免所謂軍人干預政治之指摘。那時廣西尙有一個省參議會存在，議長張一氣氏，聲望尙孚，於是由省參議會推選他擔任廣西省長，負行政上的責任。實則廣西省長，在陸譚時代，已如告朔餼羊，無一不在軍人支配之下。此時未脫軍人割據時期，張氏雖坐上這把交椅，實際他的政令所及，真限於極小的區域而已。

【決定第二步作戰計劃——先聯沈討陸】自軍政機構組織完竣在南甯成立後，省內人士，觀感於之大變，我們在軍事政治上的地位與聲望，也自然增高了許多。同時自治軍內部的心連，日漸動搖，我們必須趁此時機，加速進擊，以促其瓦解，而收拾亦比較容易。隨即決定第二步作戰計劃，將軍隊分為三路：左路軍由白劍生指揮夏煦蒼、何武、鍾祖培、章肇隆等部，並與沈軍聯絡，進攻柳州。這時陸沈正

在桂林相持，陸氏主力，大部在桂林附近，柳州守兵不多，我軍遂於八月十一日佔領柳州，敵向慶遠逃竄。次日即向柳城、慶遠追擊前進，追師次柳城，偵悉陸系健將韓彰鳳，率譚占榮、黃日高、鄧定邦等數千人，由桂柳，希圖襲取柳州，夾擊我軍，已經到達中渡東泉附近。白劍生乃停止西進，轉而向東迎擊。韓軍知我回師，乃佔領上雷、大茂橋一帶陣地。因韓氏爲上雷附近人，既佔地利，又得人和，所部本極耐戰，我軍攻擊至爲艱苦。最後，白劍生親率衛士，加入火線，始將其擊退。彼此傷亡，皆甚重大，其激烈情形，實與都城之役相髣髴。韓軍雖敗，仍退集於大浦、沙浦之附近，扼險固守，以待由慶遠方面來援的部隊到達，再行反攻。此時我軍在柳城附近，處於前後受敵之形勢，不得已遂撤回柳州。

【陸系健將韓彰鳳之敗】沈軍師長楊子德、旅長沈錫剛。駐軍鹿寨附近，持觀望態度。一因沈軍對我本無好感，此次因一時利害關係，聯合作戰，實欲收漁人之利。其次爲沈軍對韓軍頗懷畏懼。三則韓沈兩軍所部，多爲柳城人，皆有鄉土的關係，不肯輕於破面。且沈軍志在佔領柳州，現柳州已爲我軍所有，大失所望。我軍當時，以大敵當前，沈軍又居心難測，形勢至爲不利，故必須使沈軍積極參加作戰，方能化險爲夷。我們的計劃首先須使其知道韓軍已爲我所敗，以減除其畏懼心理。但正面通告，難以取信，白劍生乃使彼此電話線接在一起，使他們從偷聽中得到實況，並且答應解決韓軍之後，以柳州歸其管轄。彼見有機可乘，有利可得，遂接受指揮，進兵中渡，向大浦、沙浦攻擊韓軍的側翼，我軍同時由正面猛烈進攻。韓部受創實重，乃向慶遠潰竄；我軍跟蹤追擊，將其圍困於慶遠城，旋即攻破，俘獲甚多。陸氏在柳慶勢力，至是完全崩潰。韓彰鳳治軍頗嚴，能與士兵同甘苦。民國九年，桂軍由肇慶撤退時，高級將領不脫離隊伍者，僅韓氏一人。且沿途作戰，皆極盡力，各軍卒賴以安全退回梧州，及陸氏完全失敗，乃率殘部退入湘境，始終不肯投降改編，其忠貞亮節，在對人的舊觀點上，是值得贊美的。十六年以後，解甲爲農，安貧守法，不因私怨而稍有越軌行動，公私分明，恩怨不苟，誠爲舊軍人中

之模楷。我於三十三年路過沙浦，見其墓木已拱，追思往事，彌深景仰！

【收編劉日福部】中路方面，由俞作柏率其所部討賊軍第一縱隊，及討賊軍第四縱隊蔡振雲等部，由武鳴出發，向那馬都安進攻，肅清當地之敵後，再轉向果化恩隆，肅清右江之敵。這時，林俊廷及陸氏心腹健將陸福祥，與蒙仁潛殘部四五百人，盤據都安那馬一帶，常有乘隙窺伺南甯的企圖。右江方面，劉日福亦擁衆數千人，佔據百色，態度模稜不定。南甯爲我政治中心，右江爲我餉源要道，故必須將他們殲滅，以解除南甯的威脅，保護右江的餉源。八月初旬，俞指揮親率所部，向那馬進攻，陸福祥亦親臨督戰，憑險頑抗，戰事極爲激烈，雙方傷亡，皆頗重大，後陸福祥腿部受傷，卒至潰敗。我軍乘勢追擊，再戰於都安，又將其擊敗，林俊廷率殘部退都安以北貴州邊界一帶，我軍乃捨而不追。陸福祥率殘部經果德渡過右江逃鎮結靖西，而隻身入安南，不復再出。我軍尾追陸福祥，佔領右江沿岸的果化隆安兩縣，轉向上游的恩隆進逼。劉日福見大勢已去，乃向定桂軍投誠。劉爲人頗誠實，無野心，頗得百色一帶商民愛戴。我亦不欲再向西深進，卽將其收編，仍令其負右江一帶的治安責任。於是中路軍旋師南甯，右江軍事，遂告結束。

【兩譚潰敗逃入安南】左路方面，由胡宗鐸指揮討賊軍呂煥炎所部，及定桂軍劉權中所部兩縱隊，溯左江而上，直搗龍州，並與進入右江方面的蔡振雲縱隊，取得密切聯絡。由果德鎮結向都安，以切斷其向靖西逃走的道路。這時，盤據龍州一帶的陸譚殘部，爲譚浩清、譚浩澄所率領，二人都是前督軍譚浩明的昆弟，花花公子，全不知兵，而且暴戾殘忍。唐紹慈、甘尙賢、譚元翰等比較進步的人物，皆被他慘殺。在地方上更是任意妄爲，無惡不作。所以我軍一到，除了崇善縣附近稍有戰鬪之外，皆望風逃竄，或投誠收編，兩譚皆隻身逃入安南，他們早在那裏備有退避之所。胡指揮遂於八月中旬，進駐龍州，右江軍事，至是亦告結束。當委胡爲邊防對飭督辦。這個名義是前清以來就有的。除督辦之外，並在

重要的地方設對訊員，係專管廣西安南邊境人民往來之查驗與治安的責任，似有國際警察的性質。

『陸氏二度下野』我們第二步的軍事行動，自五月間發動，至九月間全部結束。十月，陸氏在湘發表下野通電。在這短短的五月中間，我們以八千多人的兵力，掃蕩三萬餘的優勢敵軍，雖然尚不能算根本肅清，但已使其從此不能作有組織的抗拒。這樣，便底定了廣西四分之三的土地，（除桂柳平三屬外），奠定了廣西統一的基礎。這不能不歸功於政略戰略的配合適宜；而兩軍在名目各殊系統各別的情形之下，能毅精誠團結，同仇敵愾，兩軍將士亦能戮力齊心，勇敢犧牲，皆為成功的最大因素，亦為廣西統一上的奇蹟。

陸氏在桂林既為沈軍所困，南甯及左右兩江各地，又為我聯軍所佔領，知事無可為，乃再作第二次之下野，仍由湖南退走滬上作寓公，以終其餘生。其所部除馬濟率領一部入湘之外，留桂者逐日漸解體，不復有組織之行動矣。

『陸氏在桂的行政實況』陸氏之政治生命，既告終結，他的生平事蹟，自有其時代的背景與價值。我在當時，雖處敵對地位，但未嘗謾罵詆毀。今日回憶往事，亦雅不欲多所論列。然而對於當日他們的行政實況，則須略為敘述，以供後人之參考。總括一句話：在陸氏主持桂政的一個時期中，雖談不上如何建設，而廣西人民却得到八九年的安定生活。究其原因，約有三端。

第一是用人行政問題。當民國元、二、三、四年間，全國統一局面，尚未打破，袁氏的中央政權力量，尚能到達各省。除擁有兵權的督軍任免稍有顧慮外，各省省長（先稱巡按使）皆由中央任命，且定軍民分治之制，以防武人干涉行政。民二、三、四年之廣西省長張鳴岐、王祖同兩氏，皆前清疆吏出身，對陸氏有部屬與舊誼關係，不致過分干涉其職權。張氏在宣統元、二年間，對廣西銳意興革，已稍具規模。到他再度來廣西的時候，雖當鼎革之後，權力財力皆不能運用自如，然猶能維持現狀，不致過越

常軌。即以縣知事的任用而論，對於資格與政績，均尙相當注意。並確定署理期間爲一年，期滿按成績之優劣，再定實授與否，仍循前清之舊例。民國五年後，省長爲李靜誠氏，此時中央權力，國家制度，已不是省長所能憑藉和運用，而但憑陸譚兩氏個人之意志爲從違。最重要的縣知事任用，其署理期間，雖仍爲一年，但極少由署理而獲實授的。因他們都把縣知事一缺，作人事上應酬之工具；知事的任期愈短，更動愈快，則應酬之機會亦愈多。（這在當時，固不免引起多少的物議，然猶有一年的確定時間，較之以後的一年數換者，又勝一籌矣。）我在當時，聽到一般當過縣知事的談論，多認爲這是上官予他們生活的調劑，而不是做事的機會。的確，在一年的時間裏面，一縣長官是不能有什麼成績做出來的。所以，主張縣官要久任，但也要有個任期，到期嚴予考績，以決定其連任與否。此即古人所謂：「三載考績之意。」

第二是金融貨幣問題，廣西原無本省鑄造的貨幣，以前社會上所流通者，都是廣東所鑄的毫洋。陸氏時期創辦的廣西銀行（係以前清之官錢局所改組者），曾發行一元、五元的紙幣。當時信用頗爲堅固，不但在桂境內通行，而且隨着他制軍事勢力流通到廣東、湖南。廣西原爲貧窮省份，清代皆向廣東協餉，財政不能維持。民元以後，協餉來源斷絕，省內支出，固賴銀行紙幣以爲補助，即陸氏的入粵援湘，亦全賴紙幣的運用。民國十年的冬季，陸氏勢力崩潰，廣西銀行發行的紙幣，即隨而破產。後來粵軍在桂，曾發行軍用鈔票，亦因粵軍勢力的動搖而不能通用。最後沈鴻英、林俊廷相繼發行軍用票，同因軍事失敗而失其價值。人民痛遭損失，對於紙幣毫無信用，相反的，對於硬幣信用日好，於是各方皆減少成色，私鑄銀毫。初則廣西僞毫與廣東銀毫價格相去頗遠，繼則廣東僞毫亦充斥市面，商民無法辨別，於是相率拒用。此爲廣西金融混亂時期，陸氏在民十以後，雖屢次對外用兵，而廣西人民的負擔，並不加重，卽爲人民所懷念。陸氏歿後，辜太炎替他作傳，有「不加稅而費用足」之語，卽是指陸氏發行

紙幣之功。然而民一後，紙幣破產之損失，則爲桂人重大之負擔，陸氏仍不能不負大部份的責任也。

第三爲地方治安問題。廣西素稱多匪之區，但在民十以前，全省人民皆能安居樂業，並不是當局對於地方治安有何贊助的設施。最大原因，還在收撫土匪。民五以後，陸氏勢力正向外發展，其兵員之補給，除招募無業壯丁之外，即爲收撫土匪，編成軍隊，而開出省外。因而省內受土匪之騷擾較少。然而爲匪者，既不以匪爲可恥，亦不以法爲可畏，反而視此爲進身之終南捷徑。民十以後，此種份子隨陸氏之失敗而重回廣西，「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仍舊在廣西各地，幹他本來的勾當。自民十以至民十四，所謂自治軍者，無非是此輩借自治名目，作爲害地方的行動。我們之統一革新運動，即完全以他們爲對象，艱辛剿辦，一直到民十五年，才將其肅清。不特地方得以安全，而社會觀念，亦賴以糾正。

以上所述，用行政，貨幣金融，及地方治安三項，爲陸氏政治方面頗足稱道的成績，而比較有利於地方者。但皆僅爲一時的，而非永久的。同時利之所在，弊亦隨之，爲功爲過，正復難定。要之，身歷其境的廣西人民，當必有正確的認識耳。

【沈軍三路反攻與我方對策】自陸氏再度下野，桂林、柳州、平樂各地，遂盡爲沈軍所獨占。陸氏餘部，亦多爲其吸收，勢力日益強大。沈氏明知與我勢不兩立，而且梧州爲全省經濟中心，民十二年爲我襲取。一段舊恨，時刻不能忘懷。此時見我軍西越南甯，認爲奪回梧州的最好機會，乃秘密將軍隊分向賀縣及柳州蒙山三處集中。賀縣一路，出信都攻羅梧州，由其子沈榮光指揮。柳州一路，出武宣攻擊潯州，由鄧瑞徽、鄧右文指揮。蒙山一路，出濠江截擊平南、藤縣水道，由陸雲高、陳春光指揮。我等對於沈軍的計劃，早在意料之中，而其軍隊之行動，亦不斷得有報告，便用最敏捷之戰術，攻佔南甯，肅清左右兩江。除一小部駐守南甯及各要點外，其餘主力，皆調回梧州潯州。蓋我們早料沈軍必有此一着險棋，而預爲佈置也。

「聯軍總部取銷後的統一新陣容」自民十三九月間，陸氏在湖南通電下野，軍事暫告結束，我們在廣西的聲勢，甚為各方所注意。各方面都有代表，同我們聯絡。我們也不能不派代表和他們敷衍。這在那時環境，是不得不如此的。因為討賊定桂兩軍的名目不同，聯軍總指揮部的組織，亦是權宜的辦法，特別引起廣東方面許多謠言與誤會。十一月間，胡展堂、許汝為兩先生，曾有電邀我同李德隣赴廣州，有所商洽，當時由我代表前往。同時，大本營方面，對於我們的發展，極表欣慰，並希望我們在革命政府之下統一起來，將聯軍總指揮部及定桂軍討賊軍的名義取銷，由大本營另給名義，以示統一。商量的結果，委李德隣為廣西全省綏靖督辦兼廣西陸軍第一軍軍長，我為會辦兼第二軍軍長，於十二月一日在南甯宣誓就職，隨即將以前定桂軍的隊伍，改為第一軍，以前討賊軍的隊伍，改為第二軍。一幕梁山泊式的趣劇，至此改易面目，另換一個新局面。左表所列即為我們那時的陣容。而真正實力，每軍不過七八千人。表列各番號，亦有大小強弱的不同。

廣西全省綏靖處督辦

李宗仁

廣西全省綏靖處會辦

黃紹竑

參謀長

白崇禧

警衛第一團團長

郭鳳岡

警衛第二團團長

陶鈞

第一軍軍長

李宗仁兼

參謀長

黃旭初

第一縱隊長

李石愚

第二縱隊長

陸超

游	邊	邊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參	第	司	統	第	第	第	第	五
擊	防	防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謀	二			六	五	四	三	十
司	第	第	縱	縱	縱	縱	縱	縱	軍	軍			縱	縱	縱	縱	周
令	二	一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長	長	令	領	長	長	長	長	館

陳秀華	何正明	馬夏軍	龍得雲	徐啓明	羅浩忠	呂煥炎	蔡振雲	夏威	伍廷颺	俞作柏	白崇禧	黃紹竑	劉日福	封高英	韋肇隆	何中權	劉權中	鍾祖培
-----	-----	-----	-----	-----	-----	-----	-----	----	-----	-----	-----	-----	-----	-----	-----	-----	-----	-----

統 領

盧文樞

余志考

封輔軍

陳先覺

黃桂丹

岑孟達

陳濟恒

支 隊 司 令

【聯合粵軍消滅沈部】我們兩軍的兵力，合計起來，還不及沈軍的半數，如果要和沈軍開火，獲勝的把握，是很少的。這時粵軍第一師，尚有一部留駐梧州，沈軍若將我軍擊敗，粵軍亦難立足，並且影響廣東甚大。我乃商准李任潮增援，共同出兵。以粵軍第一師第二旅及我第二軍夏煦蒼所部爲右路軍，向賀縣、八步之敵攻擊，由陳伯南擔任指揮。第一軍主力及第二軍呂煥炎所部，爲左路軍，向武宣、柳州之敵攻擊，由李石愚擔任指揮。第二軍俞作柏、黃超武等部爲中路軍，向蒙山之敵攻擊，由俞作柏擔任指揮。李德鄰、白劍生皆親赴潯州，指揮中左兩路，我則率領其餘部隊，擔任各路策應。沈軍對我仇恨既深，蓄力亦久，來勢至爲兇猛。而我方將士，都知此役爲生死存亡關鍵所繫，無不勇敢奮鬥。在幾度艱苦危難之情勢下，卒將各路敵軍擊敗，節節進展。

右路軍方面，佔賀縣、八步之後，隨向平樂進攻。中路軍佔領蒙山後，隨向荔浦進攻。敵軍希圖在荔浦附近，再作抵抗，我中右兩路會合，將其擊敗，敵遂向桂林方面潰退。粵軍第一師抵達平樂後，即班師回梧州。此役得他們助力不少，公誼私情，至今猶難忘懷也！

左路軍自武宣附近激戰後，續向石龍柳州城追擊，敵軍因主將鄧右文陣亡，兵無鬪志，便放棄柳州

，分向桂林及長安方面潰退。我乃重新部署，以自劍生爲前敵總指揮，率第二軍之主力及第一軍之一部，向桂林攻擊，在桂林城附近，復將其擊敗，乘機佔領桂林城，沈氏乃率殘部向全州湖南邊境潰退。我們爲徹底解決起見，由白劍生率兵直追至湖南境內之城步附近，再將其擊散，沈氏僅率其少數親信逃入湖南，投依吳佩孚。這一段工作，完全由白劍生負責，中間還經過不少的艱苦鬭爭。因我未嘗在前方親自參加，現在也無從詳細追記了。我們另以李石愚率領一部追擊向長安逃竄的沈軍，直到貴州邊境。自此以後，沈氏在廣西之軍事勢力，亦繼陸氏而宣告終結！

【擊敗自治軍殘部】當我沈兩軍正在激戰的時候，南甯一帶自治軍林俊廷等殘部，由都安、武鳴方面向南甯進迫。我守軍伍展空所部，人數無多，竟被團圍困。當時我沈兩軍相持甚苦，勝負未決，不能抽兵前往增援，祇好令其固守待援。迫我軍各路已獲勝利，我乃親率徐啓明、何正明兩部，乘船到貴縣，由陸路向賓陽、南甯前進。林俊廷知我援兵將到，乃解圍退去。我回到南甯的時候，大約是十四年二月下旬，不久，又回梧州，因桂柳方面的軍事尚未結束也。

對沈軍的戰事，發生於十四年一月下旬，我們到處都是採取主動的攻擊，所以很快就將其擊敗。到了二月中旬，他的主力已經完全崩潰。雖然殘部還待肅清，但已經不能爲我們大礙了，我們所以要那麼迅速的作戰，固然是用兵的原則，應該如此。同時也爲我們還有一個更大的敵人，更大的戰役，緊隨在後，不容我們稍有猶豫。這敵人，就是唐繼堯及其派入廣西的滇軍。

【唐繼堯派人游說】十三年冬天，我在梧州，忽然由雲南方面來了一個姓文的同學，並帶有唐繼堯的信件，信內無非是些應酬聯絡的話，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表示。但我却料定他此來用意，志在窺察兩廣方面的情形，當時也祇好同他敷衍一會。不久，又派一個姓高的同學，帶有川滇黔聯軍總司令的委任狀，擬委德隣同我爲他的部屬。並且同我商量，共同出兵入粵，解決在廣東的滇軍。同時還帶着煽惑恐嚇

的口氣說：「沈軍和在粵的滇軍桂軍內部，都已有秘密的聯絡。」態度非常傲慢，令人難堪。而且開口「聯帥」，閉口「聯帥」，好像我們已經是他部下似的。我們那時因對沈的軍事，正待發動，也祇好隱忍在心，和他鬼混。同時密電廣州方面，預籌對策。等到對沈軍事發動，那姓高的知事無可望，乃蕭然溜往香港，而滇軍亦即由滇黔各地分途向廣西進發了。

【粵方派范石生部協助討唐】廣州方面接得我的報告，亦認為情形非常嚴重，若待滇軍迫近廣東，始行派兵堵擊，則內部問題必多，反難着手。即徇我們的請求，派滇軍第二軍軍長范石生，率部援桂。蓋范氏主張滇軍回滇最力，反唐亦最堅決。若能在桂將唐軍擊敗，自可長驅回滇，以遂其願，故以范軍援桂驅唐，實在是最妥當合理的辦法。

原來唐氏自四川失敗之後，為顧品珍反對，一度下野。民國十一年，謀刺顧品珍成功，重獲雲南地盤，但對四川已不敢再事問津。同時貴州方面，也和他處於敵對地位，而且地方貧瘠，不能發展。他雖然自稱為川滇黔三省聯帥，實際僅祇有雲南一省歸他統轄，當然不能滿足他的野心。正值國父孫總理逝世後，兩廣局勢混亂，不覺動了染指之心。以為失之川、黔者，若能得之粵、桂，未嘗不可稍償其願。便以解決粵滇軍為名，（三楊范蔣皆為顧品珍所部，因反唐而入粵者。）定假道桂省，進取廣東之計。同時夜郎自大，料我憾於聯帥威名，必能受其委任，就彼範圍。並以為陸、沈餘部，尚有很多力量，即不能兼收並蓄，總可得一方之用。殊不知廣西軍民，對客軍入境，已深惡痛絕，我等負責本省軍事，豈能容他竄入。況陸、沈殘部，已為我解決，能為其利用者，僅零星之雜色部隊，發生不出什麼力量，這是唐氏始料所不及的。

【唐師東犯與我方部署】唐氏侵粵入桂的部隊，用建國滇軍的名義，分為兩路；唐繼虞為第一路總指揮，約三萬人，號稱五萬，由貴州之榕江，向桂邊桂林進發。第二路總指揮龍雲，約三萬五千人，亦

號稱五萬，分由百色龍州，向南甯進發，聲勢甚爲浩大。第二路軍在十四年春天進迫南甯時，南甯守軍，仍爲伍展空所部，僅二三千人。我軍主力則在湘桂黔桂邊境，追擊沈軍，正當九仞一簣之際，抽調尙須相當時間，乃用省參議會及民衆團體名義，去電拒止。唐氏復電，有「本帥大計已定，師行在途，不便中止。」等語。那時形勢，至爲危急！我等仍竭力隱忍，除暗中積極準備外，一面暗示民衆團體，和他敷衍。一面令伍展空保存實力，待彼軍迫近時，即行退出南甯，向賓陽方面逐步後撤，不必和他破裂。務使他們不明我的態度，以長其一戰而定廣西的驕志。要是破裂太早，彼必積極進攻，我軍部署未安，自難和他應戰。同時，並令俞作柏部由桂林方面，星夜向遷江集中，和伍部取得聯絡，一面電大本營，促范軍迅速西上。唐軍見我撤退，仍步步進逼，前鋒直抵賓陽附近。此時俞部已什遷江相近，和伍部取得聯絡。范軍亦由梧乘船西上，至貴縣集中。我率羅浩忠、鄧竹林等部，與范石生同抵貴縣，會商作戰計劃，並發表討唐通電，時五月九日也。原電錄下：

（銜略）去歲曹吳未滅，我大元帥孫公，以北伐討賊爲職志，東撤惠博之圍，予陳炯明以自新；西頒副元帥之命，予唐繼堯以振拔。陳既負固東江，不自悔悟；唐復按兵滇境，嚴拒寵命。及至曹吳覆滅，我大元帥簡從北上，號召和平，爲國憂勞，以致薨逝，正舉國地裂山崩，痛悼哀毀之際，唐繼堯乃敢妄冀非分，擅自尊，出兵邕龍，圖佔桂粵，希冀顛覆我革命政府，搗亂我西南和平。凡有人心，莫不髮指眦睨！本月佳日，奉讀譚、楊、許、程諸公江日通電，殷殷於繼續大元帥遺志，努力革命工作，並力闢唐假借名義，禍國叛黨。足徵整飭紀綱，義正詞嚴。宗仁等不敏，誓當督飭滇、桂子弟，力從諸公之後，爲擁護我黨主義，先驅殺賊。海枯石爛，此志不渝！謹佈區區，諸維亮察！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范石生、楊泰同叩。（按此電爲石生親擬，彼固好弄筆墨，常以「軍中一范」之圖書示人，亦可見其抱負也。）

「我軍圍攻南甯失敗」我軍由賓陽以北，范軍由賓陽以南，向唐軍包圍攻擊，彼方知我兩軍兵力，僅五六千人，乃向賓陽以西之山地撤退，在高田圩附近，據險扼守。我伍部亦跟蹤前進，於高地圩附近，展開激戰。我到前線視察，認為正面山高地險，不易進展，即令俞作柏率一四兩團，由右翼繞攻古滿關，直搗崑崙關，深入其側背，敵軍乃倉皇撤退。我軍銜尾直追，至八塘，又與其增援部隊展開激烈戰鬥，雖又將其擊敗，但雙方傷亡，均極慘重。同時接得李德鄰電報，謂唐繼虞、吳學顯等滇軍三萬餘人，已由貴州開動，向廣西邊境前進。沈軍殘部，復由貴州邊界回竄。柳州兵力單薄，囑我抽兵回柳。此時范石生及其所部，亦陸續到達，我即同他商量，希望他接替我軍，繼續向南甯攻擊。范部久未經戰，驕氣逼人，彼見我部兵力不强，槍械又非犀利，亦能獲得勝利，可見唐軍戰鬪之力薄弱。以彼軍人數衆多，（四個旅約萬五千人），械彈充足，自不難一鼓而下南甯。因此對我之要求，並無難色。並謂桂軍祇要留少數到南甯，足能維持治安的兵力即可，其餘儘可抽調。我即時下令俞作柏所部，開回柳州，僅留伍展空、羅浩忠、鄧竹林等部，作爲第二線，協同作戰。唐軍由八塘撤退，至二塘附近，與南甯部隊會合，重新部署，拒險防禦。范軍自晨至申，尙未能將其擊破，馳文通報，希望我部參加攻擊。至翌日午後四時，始將敵人驅入南甯，據城固守待援。我與范軍追抵城下。南甯城南北狹長，南端面臨邕江，北端與長崗嶺上之鎮寧砲台銜接，城之週圍，皆有壕塘，敵軍據守鎮寧砲台，我向城垣攻擊，至爲不易。范軍擔任東門北門及鎮寧砲台之攻擊，我軍擔任南門及水閘門之攻擊。圍攻半月有餘，因缺乏大砲，僅賴步兵進攻，雖屢薄城邊，終於無法攻破。而且傷亡極大，相持日久，唐軍援兵胡若愚部萬餘人，已進入桂境，向南甯前進。我得報後，急電李德鄰，仍將俞作柏所部，由柳州調回。俞部尙在途中，胡若愚的軍隊，已先到達南甯。守城唐軍得到援兵，乃由鎮寧砲台及北門方面突然出擊，將范軍擊敗，旅長楊昉陣亡，官兵傷亡慘重。長崗嶺一帶高地，皆爲其佔領，將我范兩軍壓迫至邕賓路以南及邕江以北地

區。范軍隊伍，非常混亂，情形頗爲險惡。沿江河港甚多，退却極爲困難，幸當日唐軍因激戰之後，不敢猛追，因此我軍尚有整理佈置之機會。否則，全師潰散，不堪收拾了！

【再度圍攻邕城唐軍】當時，我退到離南甯七八十里之蒲廟圩對岸，和范石生及其總指揮楊泰會商，認爲我軍應即渡過邕江，到南岸稍爲休息整理。因我控制輪船極多，渡河極易。萬一追到，彼無涉水工具，亦唯有望河興嘆而已。范、楊對我計劃，極表贊成，乃分配船隻，分別渡河。我的部隊在黑暗裏很靜肅迅速地退到南岸，范軍則燈火燭天，擾攘終夜，直至次早方能渡完。我對范軍，當初頗信其能作戰，自經二塘之戰，邕城潰退，蒲廟渡河，乃深知其將驕卒惰，軍紀廢弛。而且高級將領以至士兵，多染有烟癮。我從前看我佛山人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其中描寫滿清時代綠營的腐化，說是一個兵有兩枝槍，是大槍、烟槍。當時以爲必無此事，不料十四年所見的滇軍，也竟有這等同樣情形。而且滇軍每一士兵，還帶着一盞烟燈，在黑夜行軍的時候，活像一個提燈隊，行列漫長，煞是好看。這是當時滇軍的「特色」。由此亦可測知他們的前途。

唐軍知我范兩軍，已渡到南岸，沿河船隻，又盡爲我控制，昆追無益，乃退回南甯城。復由城南架浮橋渡江，沿江南岸向蒲廟猛追。我們本擬在蒲廟附近，佈置陣地，再行迎擊。經我和楊泰同到前方視察的結果，見敵軍先頭部隊，已漸逼近，而范軍佈置尚未完畢。要是輕率從事，貿然接觸，必至隊伍散亂，難期良好的戰果。於是我復提議：兩軍連夜渡至邕江北岸，並由我部輕裝連夜進襲南甯城，范軍跟隨前進。因唐軍主力已離南甯城，由南岸向我前進，城內必然空虛。我由北岸偷襲，沿途皆無阻礙，若能偷襲成功，則可反客爲主，我即固守南甯城，將敵逼退。即使偷襲不成，彼主力必須回救，也難再向我追逼了。計劃既定，我軍由伍展空親率襲擊隊，星夜進行。於次日黎明，到達城門附近。城內敵兵雖少，但閉門防守，一時亦不能衝進，遂在城郊附近，再展開攻城戰。范軍亦接續趕到，重將南甯城包圍。

，敵軍進撲蒲廟，空無所有，及知我軍圍攻邕城，亦遂急由南岸救援。數日之間，我軍在邕江兩岸，旅進旅退，使唐軍往返追逐，捉摸不定，好像迷藏兒戲一般。而唐軍反因此不敢再行離城追擊，一直相持到中秋後撤退爲止。其實，我范兩軍，久戰疲勞，傷亡亦大。攻城既不可能，又須抑止其順流東下的企圖。乃採用這種避實擊虛的戰法，使敵不能判明我的實力和企圖，攻勢便因而頓挫。此種戰術，固極巧妙，而危險程度亦很大。不是我熟悉地形，情報確實，亦不敢出此險着的。

正當我軍再圍南甯的時候，俞部亦由柳州趕回，但仍未能將南甯攻破。我們恐頓兵堅城之下，仍照上次失敗的覆轍。乃採用楊素之計劃，將南甯城東南之圍撤去，轉移所有兵力於城的西北方高峯嶺至甘圩一帶高地，擇險扼守，並遮斷唐軍對百色、龍州之交通路線。此計劃之特點：第一、我將正面放開，唐軍若不顧我而東下，則我攻南甯而蹙其後，成爲前後夾擊之姿態。第二、唐軍若向我攻擊，即使能將我擊退，甚至向我追擊，我軍可向西北撤退，則唐軍反因追我而趨向西北，與其東下之目的相反。第三、地形險要，兵少易守，可以休息整頓，維持一個相持的局面，而使我軍在其他方面有迴旋轉動之餘暇。這個計劃，可說是相當妥善的。

范石生因上次的失敗，深知自己部隊的不能作戰，乃竭力整頓軍紀。先作戒煙運動。范楊等高級官長，以身作則，首先戒除，然後及於下級官長與士兵，收效頗大。其次，爲整訓工作。范楊等親自朝夕督率，極爲認真。可惜積習太深，改變不易。而楊素尤操之過急，處罰不當，致結衆怨，爲其部下所刺殺，深堪惋惜！

【柳州解圍】這時我因身體不好，回梧州休養，由李德隣親率鍾祖培前來換替。回梧不久，柳州又告吃緊，唐繼虞、吳學鼎兩部，先後由貴州進入桂邊，李司令石愚率部在邊境阻拒，因衆寡不敵，節節敗退。我急電白劍生率部由湘桂邊境趕回柳州，並電李德隣將伍展空、鍾祖培所部由南寧調柳州，電李

石愚縮短防線，固守柳州待援。不幸李石愚中彈陣亡，僅有張任民、石紀龍、石楚琛等一班幕僚，在柳主持。而白劍生所部，又僅有呂煥炎縱隊趕到，主力尚在途中。我因柳州指揮無人，兵力單薄，情勢已危險萬分，不得已力疾從戎，由梧州乘輪趕赴柳州。此時吳學顯部七八千人，已圍攻柳州數日，我並偵知唐繼虞主力已到達長安附近，距離柳州不過四五行程，形勢愈加險惡。幸伍、鍾兩部，已由南甯趕到，我遂決定計劃，不待白劍生所部到來，先將吳學顯敵軍擊破，以解柳州之圍。這樣，我的兵力始能活動。若遲延時日，唐軍主力到達，即使白部到齊，勝利仍無把握。我本南甯攻城失敗之教訓，料定敵軍攻城日久，兵心已懈。且不知我援軍到達，必無準備。乃不稍猶豫，當晚即下令出擊，以一部由柳江南岸，繞至馬廠附近渡河，向他們側後進攻。其餘主力，於拂曉時，分兩路突圍而出。敵軍猝不及防，倉皇退走，爲我擊斃甚多。後經我馬廠附近之部隊包圍伏擊，遂潰不成軍，向沙塘沙浦逃竄，與唐繼虞主力混合。是役我以迅速之時間，密集之兵力，突破敵陣地之一點，收獲極大之戰果。敵軍傷亡被俘者，達半數以上。

【沙浦大捷】我判斷敵敗退之敵軍與其主力會合後，必來再攻柳州。爰以一部仍固守城防工事，其餘伍展空、鍾祖培、林竹舫、呂煥炎等部，由我親自指揮，向沙浦追擊。進至上雷附近，知唐繼虞主力已過長安，向柳州前進。因留一小部份軍隊，向沙浦方面警戒，與敵保持接觸。同時以主力轉向東泉推進。因當時我與白劍生尚未取得聯絡，若再向沙浦前進，和敵人接觸過早，敵我兵力懸殊，不免被他各個擊破。故暫停追擊，而以主力轉向東泉，期與白部靠攏。如果敵人不發覺我主力所在，而直下柳州，我城防守軍，定能和他抵抗相當時間。我以主力後面夾擊，自可將其消滅。要是敵人不向柳州，而向東泉進攻，我與其文持若干時間，白劍生所部，定可趕到，亦可兩面夾攻，將其擊破。戰略既定，開始動作，到達東泉的第二日，白劍生才率部趕到中渡縣，敵人先頭亦將到達沙浦附近。當日晚上，我走了三十

餘里的黑路，與白劍生在電話中商量。他的意見，是要把他所部由中途迂迴至沙浦的後面，作大包圍的態勢。這個意見，未嘗沒有理由。但我以為敵人力量，遠過於我。且我軍歷經作戰，傷亡亦多，萬一正面先被突破，此種迂迴戰術，不獨無效，反要遭受危險。彼此爭持甚久，最後我要他尊重我的意見，以主力向沙浦前進，以一小部作小迂迴，向沙浦後方配合正面攻擊。

這次我與白劍生在作戰上意見的爭執，恰如我們兩人平日下圍棋一樣。他一向用的是包圍戰術，總是喜歡把對方包圍殲滅。我是慣用突破戰術，看準對方的弱點，突破後而反包圍之。自然這兩種戰法是沒有絕對的利害的，所以我同他下棋，總是相互的大勝大敗，不是我被他包圍得水洩不通，便是他被我突破得零落不堪，從來就不易得到平手。但是用包圍戰術，要有優勢的兵力，而我們當時却是劣勢。所以我同他爭執得很厲害。

當晚回到東泉，已是午夜一點多鐘，即下令向沙浦攻擊，以鍾麗培擔任左翼，林竹舫擔任中央，伍展空擔任右翼，呂煥炎為總預備隊。自次早七八時起，即在沙浦以南地區接觸，戰事非常激烈。中央林部為敵人抑制於小河溝之下，情形頗為不利。右翼伍部與敵人爭奪白馬山，五得五失。自晨激戰至午後兩點鐘，總預備隊亦使用淨盡，情況未有進展。敵仍不斷渡過沙浦河，向前增加。午後三時，白劍生之先頭部隊夏照蒼兩團已趕到，即令其增加右翼，始得確實佔領白馬山。此時我炮兵亦已趕到，在白馬山上放列。我與白劍生皆親至砲兵陣地指揮，即下令全線進攻，並令左翼鍾麗培分兵一部，由沙浦下游渡河，繞攻沙浦之後。同時發砲將敵人所架之浮橋擊斷，並轟擊其增援部隊，砲彈皆極準確。敵見左右側後皆為我包圍，正面攻擊又非常猛烈，遂不支潰退。及至河邊，浮橋已斷，被迫下水，淹斃者二千餘人，繳械被俘者二千五百餘人，死傷於陣地者亦千餘人。我軍傷亡亦極慘重。此實為廣西統一戰史中最激烈之戰鬪，亦為俘獲最多之戰鬪。唐吳殘部，乃向長安沿路逃竄，因時已入夜，亦不便追擊。這時，南

甯范軍，因氣候不宜，病死甚多，亟欲得雲南子弟補充。我打電話告訴他，擄獲二千五百雲南兵，送他補充。他當時頗不相信，還以為我是哄他的呢！

柳州地形，易守難攻，因為柳江由北向南，至此忽作一百八十度的彎曲，轉而由南向北流去。流域中間，形成一個狹長半島，柳州城就在這半島的尖端上面。城北兩江間之距離，不過兩三公里，是最適宜於少數兵力防守的地方。我們將他從沈軍手裏奪過來的時候，就知道這裏是桂林南甯間的樞紐，在軍事上有重大的價值。所以早把防禦工事，建築起來，除內外戰壕之外，並在四週地面深插尖銳的竹籤，作為副防禦工事。這是我們歷年用以圍困土匪有效的障礙物，現在利用作為自己的防禦工具，亦同樣奏效。南方部隊向來都穿草鞋，對於埋在草地內之竹籤，既無從認辨，又無從躲避，隨時有被戳破腳底的可能。唐軍首先吃了這種苦頭，便被我們阻擋，而不得進展。但是後來我軍出擊，也費了很多的方法，才得通過（係由木板敷在上面由板上通過）這種障礙地帶。有很多粗心的士兵，腳底也吃了這等竹釘的虧。

沙浦勝利，真使我興奮極了！拼命苦戰，數晝夜不得眠息，仍不覺疲倦。大家手舞足蹈，幾把平時下棋的姿態，都能盡情流露出來。我對白劍生說：「看誰的棋子厲害？」大家狂笑，以鳴得意。甚至老百姓更是成羣結隊，不遠數十里，跑來看俘虜。因為他們也知道這是決定廣西命運的戰役，而他們是首先得到解放者，從此可不再受客軍蹂躪的痛苦了！當初，他們還不很相信有這樣大批的俘虜。有的人說：「就是蝦蟆（即青蛙）也不能一下活捉得這許多！」

柳州沙浦之戰，為當時廣西全局勝敗存亡之關鍵。我很自負的說：「這是我指揮的敏捷和謹慎，未曾發生若何錯誤，有以致此。」然而不是我軍官兵之勇敢犧牲，將領之協同無間，亦不能收此偉大的效果。民國三十三年，我與黃旭初伍展空兩兄同到沙浦視察水利工程，戰場憑吊，感慨滋多！二十年前將

士之碧血，今竟化爲人民生產之甘泉，亦差可告慰我泉下先烈之英靈矣！我並提議在白馬山水間處，立一沙浦戰役紀念碑，以垂永久。並題「破陣子」詞一闕，以寄興云：

二十年前戰，追懷往事甚驚。白馬嶺揮兵督陣，沙浦河掩唐氏兵，蟲沙白骨撐。放馬歸牛及早，從來夢幻功名。莫再任光陰浪擲，五十猶餘人半生，蕉田正待耕。

〔唐軍殘部回竄雲南〕唐吳所部滇軍，自經此兩次失敗之後，死傷失蹤和俘虜，約在半數以上，但殘部尙近萬人。他們退到長安附近，因爲貴州的周西成對他們素表反對，不敢向貴州境內退去，而轉向慶遠西竄。我們忖度他的企圖：第一、向南甯與龍胡所部會合。第二、由河池、東蘭、鳳山、凌雲竄回雲南。最可慮的，是他向南甯與龍胡會合。所以我們不再尾追，將主力撤回柳城，在其南側並行西進，以截阻其竄往南甯之路。我到達柳城，舊病復發，將前方指揮任務，交由白劍生負責。白劍生對我說：「敵人雖然敗了，但是剩下的力量，尙不可輕視。必須再有一二次激烈的戰鬪，才可將他殲滅。我不是推卸責任，恐怕你回去之後，士氣要受影響呢！不如你帶病在前方，由我負責實際指揮的責任。」可見我們對滇軍並未一刻輕視。後來，果然在慶遠、懷遠等處，尙有兩次激戰，我們復將其擊敗。敵人殘部不過五六千人，由東蘭、鳳山、凌雲逃回雲南去了。

十四年七八月間，我由柳州乘船回梧州，固然是因病，但糧餉械彈，也得我回去籌劃。途中腹部疼痛不堪。又不知是什麼病，應吃什麼藥，祇有不斷注射嗎啡針，麻醉自己的知覺神經，以減少痛苦而已。到達梧州，入思達醫院檢查，才知道是盲腸炎。經醫治調養，不久即告健復。

這時，慶遠方面，仍繼續作戰，南甯方面，敵軍又死守不退，而餉精浩繁，羅掘俱窮。各處請餉之電急如星火，真是「韓信前方叫，急得蕭何要上吊。」我們數年以來，一向保持不向人民借錢、借米，不向商家羅派款項的宗旨。除了一些各地捐稅來源之外，真是一籌莫展。我正極度困難的時候，恰好南

甯漢軍，偷運出一大批鴉片烟土，約有二十餘萬兩，爲我截獲，得以渡過難關，豈非天助？

以前由雲南向外省出發的部隊，軍中都帶有大宗的鴉片烟土，不但是隨軍事的進展而獲得極大的利益，並且就以烟土作爲糧船，發給士兵，叫做「黑糧」。我想甯漢的滇軍，也許是因爲我們把東南正面的圍撤去，所以趁此機會，將隨軍帶來的「黑糧」運出變賣，以充餉項。戰爭時期，作戰部隊的武裝走私，今昔中外，似乎都是一樣的。

「桂境客軍的肅清」固守甯漢的滇軍，自從我們改變圍困的方法，既不敢東下，又不敢向我新陣地攻擊。猜度他的用意，大約先是期待柳州方面唐吳軍的勝利，再行發動。等到唐吳在柳失敗，又想等待唐吳殘部來甯會合。不料唐吳又被我軍敗於慶遠，殘部已向滇邊逃竄。而且廣西西部氣候惡劣，至不適於滇、黔兩省士兵的生活，我們移軍作久困的計劃，而不急於攻城，也就是要等候惡劣季節的到來，使他們爲病魔所困，而日漸死亡，自己消滅。我們軍中盛行的一句話：『等到吃黃瓜，送你回老家。』就是說：夏天時候，黃瓜旺盛，夏秋之交，惡性瘧疾，便流行了。滇軍愛食黃瓜，食後便爲病死。其並不是黃瓜會害人，而是黃瓜旺盛的季節，便是惡性瘧疾最猖獗的時候。在六七月間，我們就接得報告，滇軍在南甯病死的很多，商會代爲埋葬的屍體，已有四千多具。後來染病的人越多，病死的人也越多。到了八月間，情勢更爲危險，若再坐困下去，必至死亡淨盡而後已。於是不能不棄城狼狽逃回雲南。我們遂於十四年的八月中旬收復南甯。一面派兵分途追擊。這時，他們在右江方面的退路，早爲我所遮斷，而駐在百色、平馬的自治軍劉日福所部，亦爲我所收編，劉亦做了我軍的旅長。所以滇軍僅有龍州一路可以退走。龍胡所部三萬餘人，經先後戰死及病亡，退走時，不到半數，亦云慘矣！

范軍分由龍州百色兩路尾追龍胡殘部，我方亦派劉日福等部協同追擊，直至逼離桂境而還。至是侵入廣西之客軍，始完全逐出境外，而內部之自治軍及沈軍等殘部，亦解決者解決，改編者改編，僅餘極

少部份，乃逃入湘境。不久以後，亦相率就範。廣西自民十以後，整整的混亂了五年，我們以微弱的力量，崛起於玉林梧州，經五年之艱苦奮鬥，卒將客軍、自治軍、沈軍陸續驅逐和消滅，廣西統一，始告完成。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兩個巧合的趣事】當十四年春，我正要出發攻擊南甯滇軍時，曾找一占牙牌的人，預卜前途勝敗。其卜語曰：「倒退如牽上瀨舟，黃楊厄閤苦虔劉，須知柳暗花明處，乃在山窮水盡頭。」我當時具有勝利的自信心，對這種卦語，僅以一笑置之。誰知始而南甯失守，再而圍攻南甯不下，繼而柳州告急，真如倒退之上瀨舟也。而是年舊歷，適有閏五月，我們所遭遇的艱苦戰役，皆在這一個月內進行着。黃楊樹逢閏而厄，戰事亦竟逢閏而苦於虔劉。我們那時，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忽而反敗為勝，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造成統一廣西的新境界。真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實這種占卦或扶乩，所得的迷信詩句，都含有正反兩面的意義，而機稜其詞，使適合於任何事件。人們事後推詳，往往斷章取義，以彰其靈異。即就上面的卦辭而論，前兩句是正面的意思，後兩句是反面的意思。不過這次戰時的經過，恰巧與這個詩意差不多，故事後頗覺其靈驗。其實任何一次戰事，何嘗不是先難後勝呢！此外尚有一個故事：在我未出發以前，那個卜卦的人同我看相，我問他前途勝敗如何，他說：「勝是勝的，總要到八月以後。」我大不以為然。因為我們每一次戰爭勝敗，都是三四個月就解決了。所以對滇軍的戰事，也是同樣的打算。他見我不以為然，就說：「我等到八月中秋以後去南甯領賞，但是要加十倍的賞錢。」我也有口無心的回答：「好！好！好！」他就回去了。等到克復南甯，他果然來了。我祇好補給他五百元的賞金。其實這些走江湖的人，他看事也有些眼光，而且當時我至多給他五十元，如果他的話靈驗了，就可收到十倍的利益。這種放長江釣的辦法，何樂而不為呢？這都是在那次戰爭時期的趣事。

【拒絕川軍假道】當我軍驅逐滇唐部隊出境之後，境內戰爭，已告結束，本來可以很多的力量，幫

助范石生回滇，將唐氏根本剷除。可是八月間，就接得情報，說是駐湘、黔邊境的川軍熊克武部，已向湘黔桂三省邊區移動。我們對於這個態度不明向我邊界移動的部隊，自不能不加注意，而妥爲防範。所以當南甯克復之後，即將所有部隊調回柳州方面，對於助范回滇這一個道義的任務，祇能責成駐在百色的劉日福部去擔任。而當時范軍見唐軍殘敗，尾追不停，亦似不甚需要我們幫助，即可單獨入滇。可是後來在滇境復爲唐氏所敗，重行退回桂境，因此對於我們不無怨懟情形。其實我們亦是屢戰之餘，疲憊無力，本來也不能越境作戰。加以川軍壓境，自顧不暇，確無餘力助人。這種苦衷，當時亦正難得人諒解呀！

熊克武係國民黨的老前輩，自十三年在四川失敗後，率部寄駐於湘西黔東邊境。十四年八月間，就將部隊向湘黔桂邊境移動，並派代表來桂洽商假道入粵。據說係奉中央命令，其內幕究竟如何，我們亦不甚明瞭。拍電請示廣州的大本營，亦未得到確切的答復。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祇有一面作軍事上的佈置，同時以滇軍初退，地方瘡痍未復爲詞，拒其入境。熊軍見我防備甚嚴，亦未敢作過分之要求與深入，而祇是由桂北之三江、全縣、興安、濱陽轉入湘南之道州、藍山，而入駐粵北之連縣、陽山。我們對於過境的客軍，一面盡地主之誼，一面盡防衛之力，這一個川軍過境問題，總算很順利的結束了。

【廣西統一後首次越境驅逐川軍】這時，廣東方面，情形極爲複雜，外面則陳炯明在東江之勢力未消，內部則楊、劉正醞釀着事變。川軍駐在粵北，對各方影響非常之大，熊氏在廣州，忽然被大本營扣留起來，其中的原因，我到此時還不很明白。他的部隊由湯子模羅觀光統率，復向湘桂邊界回竄。大本營派軍由北江追擊，並電廣西方面出兵截擊。我們奉令後，即派夏熙蒼、鍾祖培、蔡振雲三縱隊及陶鈞郭鳳崗兩警衛團，由白劍生指揮，分爲兩路，一由賀縣出桂嶺連山，一由富川出江華，向其退路截擊。熊軍亦頗能作戰，在二三次接觸之下，彼此都很有傷亡，但熊軍以避戰爲主，我軍亦不欲深入湘境。熊

軍遠遁後，我軍亦班師回桂。這是我們在統一廣西時期中，第一次的越境作戰。這一次戰役，雖然是奉令進行，但我們軍隊的作戰精神，就不如在省內各戰役那樣自動的犧牲了。可見戰爭要有自動自覺的內在要求，才能發揮高度的戰鬥能力，這是一定不易之理。

【奉令協助粵軍肅清粵境叛軍】十四年冬天，大本營以廣東東江的叛軍已次第肅清，而南路的欽廉、高雷、兩陽、三羅、尚為陳炯明餘部及由廣西竄入之陸譚餘部所盤據。其將領鄧本殷（總指揮）申葆藩（副總指揮）尚擁衆兩萬餘人，為革命軍的障礙。乃任李任潮為粵桂軍聯軍總指揮，分四路進剿。以陳章甫為第一路，自肇慶三羅進攻。以陳興如為第二路，由新會向兩陽進攻。俞作柏為第三路，由陸川向高雷進攻。以胡宗鐸為第四路，由上思向欽廉進攻。第一第二兩路為粵軍，第三第四兩路為桂軍。

此次戰役，除俞作柏進攻高州城較為激烈外，其餘皆順利進行。蓋此種殘餘軍隊，無組織，無團結，械彈又極缺乏，一經接觸，即行敗退，紛紛請求收編。故經過時間甚為短促。至此，兩廣舊軍之殘餘，乃告完全肅清。這是我們在統一廣西戰役中的第二次出省作戰，亦為陸譚殘餘勢力的最後消滅。蓋鄧本殷、申葆藩等，那時雖為粵軍粵人，而以前皆與陸譚有甚深厚之關係也。我們的部隊，自軍事結束後，立刻班師回桂，地方政府問題，皆由粵方處理，絲毫不加干預。一則不欲留給粵人一個不好的印象，二則本身亦急待整理也。

【統一廣西後的感想】我自民國十二年六月間出兵梧州起，至民國十四年年底止，不但把在廣西省內的陸沈舊勢力及散兵、土匪肅清，同時將包藏野心據桂窺粵的強大唐軍擊敗，驅逐出境，完成廣西的統一。並且協同廣東驅逐川軍，底定南路。在這短短的兩年半中，經過了五次的大戰，差不多平均每半年便碰到一次。而零星小戰，則多至不可勝計。我們在這個時期內，不論是高級的長官，或下級的士兵，無一不是時刻過着單純而緊張的戰鬥生活。也可以說：「這緊張而單純的戰鬥生活，便是完成廣西統

「工作的一個潛在而偉大的力量。」

一個正在衰退着腐化着的舊勢力或舊組織，其當局者也許知道他的本身已到處都是弱點，到處都在腐爛。也許完全不感覺到他自己有弱點，自己在腐爛，而依然泄泄沓沓的過日子。此種舊組織或舊勢力，往往以其一貫的舊方法，來挽救其垂危的命運，其結果一定是愈弄愈糟，終至一敗塗地！所以我們在中國四五千年的歷史中，所見到的「中興事業」，真是鳳毛麟角，這便是一般都逃不了前面所說歷史公例的緣故。即使我們的歷史上有漢光武唐肅宗那些輝煌的中興事蹟，而其中興的主角與其所用的方法，必與舊的完全不同。昔人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種撥亂反正的工作，非新的人物與新的方法，決不能有所成就。所以這也祇可以說某一舊朝代的中興，而不是某個舊人物的中興。漢光唐肅都是承前代之敝，當衰亂之後，困心衡慮，舉賢授能，研求前代所以衰敝亂亡的原因，一反其道而行之。政治循軌，民心歸順，師行所至，無不壺漿以迎。所謂「以至仁伐至不仁」，纔能收撥亂反正的效果，亦所以造成一代中興的偉業。陸唐兩氏，欲以其正在崩潰腐爛中的舊基礎，與曾經失敗過的舊方法，妄冀東山再起。縱然給他一度的重張旗鼓，結果祇等於迴光反照，仍逃避不了敗亡的劫運。這決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必然的道理。再從反面說來，一個面對着正在崩潰腐爛的舊組織舊勢力之新的集團，其結果所獲，恰恰與此相反。凡是舊的方面認為沒有辦法的地方，正是新的方面最有辦法的事情。如果新的方面時常針對着舊的方面的弱點，去追求新的方法，來健全自己，並對着敵人的弱點進攻，這就是革命成功最有效的。

我們這一羣，當初不過是幾個二十七八歲尉官階級的陸軍學生，行動上既無組織，社會上也沒有甚麼地位與威望。各人祇是具備一副純潔的胸懷，熱烈的情緒，與敏銳遠大的眼光而已。我們在極端腐敗的舊環境中，不會為它所融化，而是深邃的審察環境，不斷的陶鍊自己，使自己不斷的獲得進步。我們

的結合，是偶然的，也可以說是必然的。因為那時由於各方面的壓迫，使我們不得不結合在一起，以求自存，其中雖因出兵梧州問題，而發生類似分裂的現象，然終於在會師南甯的時候，把它彌縫過來，成為更雄厚更堅固的團結。這是雙方共同一致的密切聯合，而不是一方面的單獨企求。回憶我們在初期複雜的結合，與複雜的環境之下，不免有少數人發生自私的權利意念和行為，我們都是以善意的自然的方法，逐漸予以革除，隨時予以糾正。所以在這一個階段裏，雖然淘汰了很多，但均係自然的落伍，而不是勉強犧牲。所以我們一方面得到人事上的調和，同時亦不妨礙我們順利的進行，而尤其使我念念不忘的，乃是李德隣的仁厚坦白、公正誠懇、不念以往之瑕疵，力求事後之改進。當兩軍復合之後，對於自己所部之陳舊落伍份子，盡力淘汰，絲毫不存私意，使彼此成為嶄新的進步的整體。這真是他最偉大的地方，值得我們欽佩的！

講到我們那時的力量，實在是太渺小了。當初，我在梧州帶出來的部隊，不過一千人，槍枝又不齊全，即使和玉林方面聯合起來，亦不過二千多人，不足二千枝槍。而這時，我們對敵方面的力量，多至二十餘倍。可是我們並不自餒，且具有「自反而縮」的勇氣。我們對於龐大的敵人，真是莊子所謂「目無全牛」的精神。照我們所定的計劃和步驟，一塊一塊的把他支解下來。雖然我們也費了很大的心思，與很多的時間，終於把衆多的敵人，完全殲滅。而我們的鋒刃，不僅不使其稍挫，並且不斷的鍛鍊，不斷的磨礪，以加強我鋒利的程度。我們是一面打仗，一面整軍，整軍一次，打仗一次；打完一次仗，又整一次軍。到了戰事終了，我們的整軍工作，也大致完成了！總計近十萬名的敵人，到了我們掌握最後勝利的時候，加以整編，連我們原有的力量，合計起來，也不過四萬人左右。我們的不需多兵，和屢次的以少克多，都是因我們的力量是整個的、團結的，在任何一個場合裏面，固然是各人各盡其當前所負的責任，然而並不是祇顧自己，坐觀勝敗。遇到友軍危急的時候，便不等上級的命令，而自動的去協力

援助，盡其最善最大的努力。我們上自總指揮，下至士兵，沒有一個不是戰鬪員。每當危急的關頭，我與德麟、劍生，都免不了手執火器，親冒鋒鏑，同士兵一樣的在火線上作最後的搏鬪，決不稍存顧惜自己的打算。這都是我們優於敵人的地方，也即是我們獲得勝利的圭因。

我們在用兵方面，決不單靠精神的力量，對於物質亦非常重視。在這短短的兩年半時間之內，建立規模相當完備的製彈廠，造槍廠，製藥廠，炸彈廠，是以我們的槍械彈藥，雖因不斷的作戰，而大量消耗，但仍得不斷的補充，不斷的殺敵。當時，我方彈藥的儲備，比任何一支敵人都來得充足。這也是我們以少勝衆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我國地理上言，重要河流的發展，都是由西向東。而翻開中國近百年來的社會進化史來看，文化的發展，則是由東而西的。廣東處於珠江下游，也就是廣西的東面，首先接受了西洋的物質文明。陸氏雖以一時的武力，侵入廣東，可是因為不能順應世界潮流，求其本身的進步，以之改造廣西，遂陷於敗亡的結局。這是我們所親見的。假使我在當年不出兵梧州，就不能接受向上流發展着的新文化，也就不能發生革命的新力量。可是我們在當時已正確的認識，不再像陸氏那樣祇求武力的向東發展，與文化革命的潮流相背逆，而必須順應文化革命的潮流向西挺進，以求廣西的改造。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當革命的初期，在封建的落伍的舊眼光看去，雖然有許多不習慣不順眼的地方，因而引起若干不良的批評，或足以引起各方指摘的不良事實。然而革命的前途，始終是光明的，革命的工作，畢竟是進步的。那些不正確的批評，和若干必有瑕疵，是掩蔽不了它的光芒，阻礙不了革命的進步的呵！當我出兵梧州接受了革命的使命，不但廣西那些舊軍人，要責備我出賣本省，就是玉林方面，在當時也未必能完全諒解。處在這新舊潮流匯合的箭頭的尖端上面，雖然我的箭頭是正確的向西進指，但是在某一時期，與某種場合之下，就不能不作適應的迴旋，藉以減少可能避免的障礙。否則不顧一切，逕直衝去，也許要因各

方的不認識，不諒解，受到極大的挫折，而不能順利的到達目的。而這種迴旋的手腕，無論是對舊的方面，或新的方面，都是一種極困難的工作。革命的力量，實在是太偉大了！他賦予了我百折不撓任勞任怨的勇氣和精神。不論物質的，精神的，有形的，無形的，一切困難，都爲我所克服，一切勝利，都爲我所掌握。我始終不忘在梧州與粵軍將領的合作，得到他們很多的助力。尤其是李任潮的寬厚明察，他對廣西沒有私心，他不拘束我，不干涉我，任由我自己的發展，比之用實力幫助，尤爲偉大。固然在私人情感上，是值得紀念的事，而處在潮流順逆革命成敗的關鍵上，尤爲值得記載和稱頌的事實。此外，我們那些幹部，始終是追隨我們，奮鬥到底，中間祇有來歸的人，而沒有離異的人。無論任何一個戰役，他們無一不盡其最大的努力，而繼之以犧牲。中間沒有那一個人，從戰事中發了財，或得到了僥倖的際遇。都是由同甘共苦奮鬥而造成他必然的地位。後來雖因清黨及外界的誘惑，一時有極少數的幾個人離異了，但不久仍又團結回來。這不僅是一段完全的歷史，他們亦都不愧是明大義全始終的人物。這都是使我最難忘懷的啊！

總之，廣西統一運動之能迅速成功，固不僅限於上述的幾點意思，而上述的道理，亦不止是廣西統一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實爲整個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我在寫完統一廣西各戰役之後，特將這幾點重要的意義敘述出來，亦兼作這個重要階段的結論。我想人們一定不會批評我有所誇飾罷！

七 兩廣革命的統一與出師北伐

【李任潮等由粵來邕的兩重使命】當我軍克復南甯，廣西全境軍事政治已告統一的時候，廣西革命政權的本身，正在醞釀着重大的變化。而廣西的統一，又在廣東之先，自邀得各方非常之重視。大本營特派西江善後督辦李任潮同馮竹萬、鄧世增、李民欽等到南甯。這大約是十四年九月間的事。他們此行的意義，公誼私交，實兼而有之。私交方面，為訪問慰勞性質。公誼方面，則含有兩項使命：第一、因為廣西的高級將領，除了我個人之外，其餘大都尚未加入中國國民黨。而當時在廣東方面的桂軍，如劉震寰、劉玉山等部，以及幹黨務工作的桂籍人士，兩三年來，隨着我們勢力的發展，散播了很多的空氣。不是說我們是聯省自治派，就說我與段祺瑞等北洋派有勾結。並指我同李德鄰分別用着討賊軍定桂軍的旗幟番號，表面是分道揚鑣，實際却都是狼狽為奸的做法。在羽毛尚未豐滿的時候，就用我來接近革政府。現在廣西統一，力量已經充實，不久一定是要背叛革命的。這些說話，歷年以來，我們聽得很多。因為要拚死拚活不斷的與很多的敵人打仗，那裏有閒工夫去理會他們。至於革命政府當局是否會聽信這種謠言而懷疑我們，就無從知道。在這等環境之下，我們只有竭盡自己的力量，為革命盡其最大的貢獻，所謂「知我罪我，在所不計。」不過他們所放的空氣，也有一部分很易使人信以為真。即如我們為應付起初艱難的局面起見，梧州與玉林，確曾採用兩面不同的作風。不但是對省內如此，就是對省外亦是如此。因為在那個縱橫捭闔的時候，自己的力量，又那麼薄弱，稍一不慎，必將招致極大之挫敗。到那時又有誰來同情我們，援助我們呢？而我對於那時在粵的桂軍，及吃黨飯的桂人，也確是太冷淡了。使他們的面子過不去。他們因為這個關係，便播弄出許多是非來中傷我們。其實我們在那時，對

他們既難敷衍，也不願敷衍。因的彼此利害的衝突，好像敵人一樣，他們事事中傷我們，破壞我們，甚至我的性命，也幾乎傷在他們的手裏，那裏還談得上敷衍兩字呢。

李任潮及粵軍第一師的將領，是我們最相得的朋友。他們不但在軍事上以實力幫助我們，而且還替我們向各方解釋許多誤會。可是萬一我有了什麼相反的轉變，他們對於革命上所負的責任，也就太重了。所以李任潮在公誼私交，都得來南甯一行。他們是希望我們將整個的廣西統一在革命政府的旗幟之下，改變以前兩面不同的作法。其實我們自廣西內部肅清後，對於那種作法，已成過去，對統一原則，一致表示贊同，入黨則更不成問題。

李任潮來邕第二項使命，則為商量共同出兵解決盤據廣東南路的鄧本殷、申葆藩的軍事問題。鄧、申原為舊粵桂的殘餘勢力，盤據粵省的三羅、兩陽、高雷、欽廉、瓊崖各地，合起來也有近兩萬人。他們在那裏苟延殘喘，等候捲土重來的機會。在廣西未統一以前，由廣東出兵南路，有很多不便的地方。現在廣西已經統一，自然是解決南路最好的時機。這種義務，是我們最願意履行的。因為南路的粵桂舊軍勢力一日不清，則廣西邊界，一日不安。而且粵軍第一師以前給予我們的幫助，我們還時刻不忘，出兵南路，正是我們報答他們的最好機會。我們本來要派白劍生赴粵報聘，並作具體的商量。所以李任潮等此來，我們至表歡迎。可是不幸的廖案發生，他們又奉命匆匆回去了。繼之又有出兵東江及楊、劉事變，以致統一及其他許多問題，又延擱相當的時候。

【中央軍政制度的革新】十四年年底，廣東方面討伐東江南路及楊、劉、川軍等軍事行動，皆已結束，胡漢民、許汝為同時出國，中央對黨政軍制度，大為改革。在軍事方面，舊日之粵、桂、湘、滇、鄂等地方性之軍隊番號，一律取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計六軍，何應欽為第一軍軍長，譚延闓為第二軍軍長，朱培德為第三軍軍長，李濟琛為第四軍軍長，李福林為第五軍軍長，程潛為第六軍軍長。此外

復設置黨代表及政治工作人員，各師皆採用三團制，將旅的一級廢除。蓋採取蘇聯之編制也。政治方面，則將一切權力，集中於中央軍事政治委員會。但對於地方的政治制度，尙未有明確的規定。汪精衛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中央軍事政治委員會主席，實爲當時惟一之軍政首腦。

【汪譚甘來梧的任務】十五年一月間，中央派汪精衛、譚延闓、甘乃光三委員到梧州來。他們屈駕降臨，使我們非常的惶恐。於此亦可見中央對於廣西的重視。我同李德鄰等，由南甯趕到梧州歡迎，他們乘坐的是江防艦隊的江防兵艦，當兵艦入口時，岸上排立着很多的行列，及看熱鬧的民衆，數年來梧州因受軍事的影响，景况非常慘淡，至是才充滿和諧活躍的革命新空氣。這一個歡迎，也就是梧州空前未有的盛會了。他們這次來梧，表面上雖然未曾明白表示有什麼使命，似乎是一種訪問巡視的性質。其實他們此來的主要目的，是欲促成廣西對於革命統一的表面化、具體化。其次是商談出師北伐的根本問題。這都是我們正在準備着期待着的幾件大事。當時尙有唐孟瀟的代表葉琪，及貴州方面的代表龐漢章，在那裏一起見面，於以後革命的進展，有很大的關係。

在梧州並不舉行何種正式會議，而是分別的商談。我們對於統一與北伐，都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的意旨。可以說他們的目的，已完全達到了。他們在梧州逗留了兩日，除了商談議會之外，大部的時間，都用在宣傳式的演講上面。這時梧州人民團體的組織，已相當發達，工會、農會、商會、婦女會，無不應有盡有。此外還有軍政機關的職員，無一處不開會歡迎他們去講演，他們也無不應邀出席。講演的內容，無非是三民主義與當時本黨的三大政策（聯俄容共農工）以及本黨的革命歷史，國民革命的前途等。這些題材，在現在看來，好像已成爲刻板的革命八股，無足希罕。但在那時候，却是非常新穎，極受民衆歡迎與擁護的。

汪精衛先生之名，我已久聞，這次來梧，初次晤面，見他魁偉的丰采，委婉的言辭，熱烈的表情，

再加上那一幕親自拿炸彈去炸攝政王的動人的革命史劇，自然能博得許多人，尤其是一般青年的欽仰。誰也想不到後來當全民族抗戰的嚴重關頭，汪精衛突於二十八年十二月間，背叛黨國，出走河內。使我想起了這一段歷史，不禁於感慨之餘，同時覺得有些滑稽好笑！

譚組庵先生以前在廣州的時候，我會見過幾次。這次更多接談的機會。他爲人幽默圓到，使人很願意和他親近。有一次，在宴會席上，他問我：「你這個大名的竝字，爲什麼不用英雄的雄字呢？」我說：「這是我父親命名，取任重致遠意思。」他又問我父親在前清有沒有功名？我告訴他，是丁酉科舉人。他哈哈笑道：「我也是丁酉科舉人呀！我現在同你，不但是革命的同志，還與你合算是滿清的同年呢。我一見你用這很冷僻的竝字爲名，就猜想這位命名的先生，對於舊文學，一定有很深的修養。現在果然不出我所料。」有一日，在一個小花園裏，叫做同園的地方議會。汪、譚兩人的酒量均宏，但在那次狂歡痛飲之下，都醉了。席散出門時，汪問我向左還是向右？我說：「向右邊走。」他說：「你認錯路了。革命那裏會向右走的呢？」結果，他向左邊走去。但是向左的路是走不通的，引得大家都笑起來了。甘乃光先生是廣西岑溪人，一向在廣東讀書。在廣東做事。彼此都不甚熟悉，而同我還是初見面，大家好像有些陌生的樣子。他這次回來，對於黨務方面所負的責任，比較多一些。因爲廣西當時的黨務，尚未展開，需要他來指導。他們本來還想到南甯去，因爲冬天水淺，舟行往返，需要近十日的時間。汪譚因職務上的關係，不能久留，就回廣州去了。留下甘乃光一人，同我們去南甯。甘乃光到了南甯，也同在梧州一樣，開會演講，幾無虛日。直到他害了肺炎，口啞聲嘶，才停止。總之：他們這次來桂，就各方面來看，都是很成功的。尤其是一般民衆，自民國十年飽受粵軍的痛苦以後，以爲那時候的粵軍，就是革命軍，而革命黨的言論行動，就如洪水猛獸的可怕。這次汪、譚、甘等到來，民衆見了才知道所謂革命黨，也不過和普通一樣。革命的理論，很合乎人情，切乎需要，不特使無知的人民，感情

改變，而於此後廣西黨務的展開，亦有極大的關係。

他們三位到梧州來，雖然是半公半私的詢問性質，但他們都是中央特派大員，汪氏又是國民政府的主席，中央黨部政治會議的主席，自然算是國家元首的地位了。那時我們對於此種接待元首的儀節，並沒有正式的規定。但是我們却是衷心表示得非常隆重，在燕會席上，我們的軍樂隊奏起以前袁世凱時代「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的國歌來。汪對我說：「這國歌是舊的！」好似表示不相宜不接受的意思。可是他又說不出一個新國歌來。因為當時不但「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尚未製定，即在廣州最流行的「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歌，在梧州也尚不很通行。祇好將舊的拿來應付應付。現在回想起那個「卿雲爛兮……」的國歌，的確內容沒有什麼意義，但是那個調調兒，却頗有些悅耳的地方。

「白劍生赴粵報聘並商談統一」汪、譚、甘回粵之後，我們在南甯召集重要的幹部會議，對統一問題，加以討論。并推白劍生前往報聘，同時商量一切具體聯合的態度。於是他便提出了徹底統一的意見。中央亦因此專設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處理這個問題。他並將經過情形，電告我與李德鄰云：「吾省軍政前途，今後亟須上革命軌道，前電經已略陳，諒為鈞座所明悉。欲負擔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務，在理論與事實上，均非將軍民財三政與廣東鑄成一片，直受中央支配不為功。政治關係省內，抑亦關係全國，自成風氣，實不可能。軍隊更改編制，尤與財政關係密切，即以軍隊而論，廣東革命軍確實注重改良士兵生活，月餉十元至十二元，吾省若將財政自理，對於士兵生活問題，必難解決。結果必有貌合神離之象，而於政治建設方面，結果亦將演成閉門造車之境，將來必為革命之阻礙，而吾國家之命運，亦必因而延滯。連日與中央諸公磋商，若吾省能將軍隊依照廣東編制，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財政交中央支配，則一切問題，當能與中央合轍，由中央統同籌劃，互相調劑。此後對於革命任務，因屬共同負

擔，而於補助接濟方面，亦已痛癢相關，不能秦越相視矣。禱知兩公對於革命重要，早具深刻認識！對於革命工作，已有堅確決心。歷年奮鬪，其目的在救中國，非救區區之廣西也。禱抵粵以來，見中央對廣西，僅抱聯合的態度，一切設施，規模太小，目光在粵省，不似統一全國機關，於將來革命政府之發展，諸多妨礙。已對汪、蔣、譚諸公自動提出，先將兩廣確實統一。此種主張，駐粵各方，極端贊許，想兩公必然贊同。現因體念上級官長，以圖節省電報來往時間起見，由汪先生發議，組織一中央特別委員會，討論兩廣統一辦法。先將軍事財政統一，次再及其他各件，議決案由禱帶回南甯，交兩公核奪認可後，交中央軍事政治委員會議決，由國民政府執行。巧日開始討論，兩公有何意見，請速電示為禱，白崇禧叩皓印，「我們當時復電同意，但是問題尚不能很痛快地解決，於是他就回來了，他在這個皓電上所述的主張，在粵不但不能徹底的解決，反而生出若干的誤會。其主要的理由，就是財政的統一，與軍餉的提高問題。因為廣西是一個窮省，滿清時代素來是受外省協餉的省份。那時廣西的士兵月餉祇有六元六角，官長不論階級，一律十三元二角。如果要士兵提高到十元至十二元，差不多要增加三分之一以上的開支。官長的薪俸增加數目更鉅，在廣西當日的收入，自然負擔不起。而廣東當日的財政，比廣西還要困難。自顧尚且不暇，何能再有力量來負擔廣西的軍費呢。因此就有人誤會我們的目的，在要求增加廣西的軍費。所以到後來財政統一軍餉劃一的問題，就根本不談了。北伐軍出發，廣西軍隊（第七軍）的軍餉，完全由廣西負責，士兵的餉項，亦與各軍不同，就是這個原因。」

【統一下廣西方面的五個問題】白劍生回南甯後，我們再從長討論那許多問題。關於統一的原則，我們早已同意，不必再去考慮。但是尚有幾件重要事項，亟待研商：第一是全省軍事機構的名義問題。自楊、劉事變之後，粵軍、桂軍、湘軍、滇軍總司令等含有地方性的軍事機關名義，已一律取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二、三、四、五、六等軍，直屬於軍事委員會。廣東既沒有全省性的軍事機關

，廣西能否單獨設置，殊成問題。李德鄰的意見，廣東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在地，各種問題，可由軍事委員會負責處理。廣西情形不同，如果沒有全省性的軍事機關負責辦理，則全省治安，以及軍隊整理，都有許多困難。故竭力主張設置廣西全省善後督辦，來擔負這種責任，理由是充足的。第二是軍隊編制問題。我們的部隊原來由定桂討賊兩軍組成，後來又改為廣西陸軍第一軍、第二軍。我們仍希望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第八軍。第三為行政機構問題。廣西民政長公署本來是我們自己設置的，祇要中央行政制度確立，即可取銷。在中央行政制度未確立前，暫仍其舊。第四是財政統一軍餉劃一問題。財政統一，軍餉劃一，這個原則，我們十分贊成。如果中央對此尚有顧慮時，則仍由廣西自行負責統籌統支。第五是黨務問題，此後廣西的黨務，自然要竭力的展開。我們所願應者，是以前在廣西沒有信用的人，回來把持，不但黨務無從展開，而且還要引起內部軍事上、政治上的許多糾紛。總之在一個大的轉變之下，一切枝節問題，自所難免。好在我們大前提已經決定，那些枝節，亦祇好隨後陸續設法解決。於是改由我負責代表到廣州去，進行這個革命統一的工作。

【我赴廣州續商統一問題】我於民國十五年的三月裏，偕同內子蔡鳳珍，及秘書黃華表等，由梧州乘輪赴三水，再乘廣三鐵路火車，到了廣州。我自十三年東亞酒店被陳天太襲擊之後，差不多兩年沒有到這個地方，現在那裏的風氣，是大大改變了。自從駐粵的滇軍、桂軍，相繼解決之後，所有以前市內各省各色各樣的隊號旗幟，已沒有了。武裝擁護馳驅過市的要人汽車，亦很少看見。這種風氣的改變，恐怕不單是廣州市民的心理上，要覺得輕鬆一些，就是我也感到非常愉快！相反的鬧市通衢上，增加了許多遊行民衆的行列。因為自十三年之後，各種民衆團體組織，非常發達。加以這時香港大罷工風潮，尚未解決，市內的工人特別多，真可算是勞工神聖的黃金時代。在遊行的羣衆裏，手裏拿着五顏六色寫着標語的紙旗，口唱着「農工兵學，農工兵學，要團結，要團結，大家堅持到底，大家堅持到底，必成

功，必成功」的歌聲，與高澈雲霄的口號聲，相間而作。而且隨處都可以聽到，又使我感覺到一種特殊的刺激。

我們住在長堤的廣西會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部裏面。第四軍由粵軍第一師所擴編，李任潮擔任軍長。他要我住在軍部裏面的原因，不但是盡他招待的厚意，還含有爲我戒備的作用，恐怕住在旅館裏，又會演出十三年東亞酒店的故事。

【五項問題順利解決】在初到廣州的兩三日內，都是和各方面口頭接洽，或是參加會議。中央對於廣西統一的問題，以前白劍生來粵時，曾設有一個特別會議來研究解決，但迄未作最後的決定。我到來之後，繼續參加這個會議。第一對於設置廣西全省善後督辦問題，頗多紛議，因爲中央方面認爲善後督辦這個名字，是北洋軍閥常用的，革命政府不宜採用。十三年中央所委任的廣西全省綏靖督辦的名義，當時我也費了很多的唇舌，才核許的。這次提出這個名義，其中善後兩字，又與正在從事革新的當時情形不甚相符，自然更難適用了。後來經我婉曲的陳說，才改爲廣西全省軍務督辦公署，以李德鄰任督辦，我任會辦。第二對編成兩軍問題，更覺爲難，他們雖然未說出不能編爲兩軍的理由，但我很明白他們的意思，如果廣西編成兩軍的話，即無異佔有國民革命軍全部四分之一的數量。後來汪精衛這樣說：「第七軍的番號，已經決定了，自然無問題。若再要編一軍，因第八軍的番號已決定給唐孟瀟，此外又不好再編。」這個理由，實在勉強得很。而我們確擁有兩軍實力，原來已有兩軍番號，如果要併爲一軍，也有我們的困難。而且這一軍的軍長，由李德鄰擔任，抑由我擔任，也頗難安排。我見他們內心爲難情形，就自動的提議請編爲一軍（但軍器共編六個師）。以李德鄰任軍長，我自願擔任黨代表的職務。譚組庵聽了我的提議，拍掌贊成。說：「這才是真正革命者的態度啊。」我之所以自動提出編爲一軍，一來固然爲解決當前會議席上困難。同時我鑑於已往兩軍間，總不免有彼此的界限，不如趁此機會，混編

一起，不特前隙盡除，此後必可更加團結。我自己雖不任軍長，但我過去的歷史，同德鄰私人的關係，擔任黨代表，還不是同軍長一樣的麼。第三對於行政機構問題，因為中央整個行政制度，尚未確立，目前祇要中央加以委任，就算了事。等到制度確立以後，再行改組。第四對於財政統一軍餉劃一問題，那時的財政當局，祇要求接受中央的法令統一，在中央財政系統之下就算了。因為他們明知統一以後，於中央是沒有好處的。如果財政統一軍餉劃一，還要使他們增加負擔，這正如一個窮人要同有錢的人，平均家產一樣，有錢的人，一定是不肯答應的。我體念到對方的困難，也就不再勉強要求。仍由我們自收自支，以免引起中央的誤會。第五對黨務問題，自然完全統一，照中央規定辦理。而中央亦允許時顧慮地方情形，並尊重我們的意見。各種問題，於此便獲得順利的解決。

【出席中央紀念週的報告】我們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既獲有相當結果，中央便指定我出席下星期一中央黨部總理紀念週，報告統一的經過情形。那次紀念週到場的人，特別衆多。由汪精衛主席，行禮如儀後，汪即介紹我登台報告。我首先將奉總理任命討賊起，與李德鄰合作，肅清陸沈，驅逐唐軍川軍，出兵南路至統一廣西保障革命策源地，作一個簡要敘述。其次，說明我這次來廣州的使命，是要求革命的統一，加強革命的力量，以求革命的成功。以前廣西一般工作同志，在廣西與舊勢力苦鬪了三年多的時間，才把革命的障礙剷除，完成廣西全省的統一。這不是爲個人佔領地盤，作軍閥式的割據，亦不是僅僅爲了廣西，使它成爲一個獨立的省份。而是想將廣西的一切力量，整個的貢獻給中國國民黨的革命政權。在廣西革命障礙未完全掃除以前，我們不願作誇大的不現實的表示。現在廣西已經統一了，所以我們才敢對中央作切實的報告，對社會作公開的宣布。接着將統一內容，作概要陳述，並表示我們祇是磋商事實的解決，並不作爲相對的條件之要求。自今日以後，廣西的黨務政治軍事，均唯中國國民黨及革命政府的命令是從，李某黃某祇是奉行黨及政府命令的人員云云。報告完畢，博得熱烈的掌聲。

。汪並作補充的說明，才告禮成。廣西統一問題，至此就成為具體化了。我回到廣西會館，接着就有許多報館記者，與民衆團體代表，到來訪問。我又將在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的大意，作成一個書面的談話，交各報館發表。這段經過的事實，就成為那時候新聞的最重要資料。

第二日，蔣先生從黃埔到廣西會館來看我。這次我到廣州，因為頭幾天事情很忙，尚未得暇去拜望蔣先生，而蔣先生却先枉駕造訪了。我將這次商談統一的經過，向他陳述。他表示這次廣西統一的意義，非常重大，這是主義信仰的結果，不是革命武力的結果。以主義的力量收服人心，比之用武力去征服一省兩省的地盤，價值偉大得多。他又問起我未回廣西做事前求學時期的情形，我將在陸軍小學參加辛亥革命學生軍敢死隊的故事，說了一遍。蔣先生即告別而去。他這時已辭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的職務，擔任國民革命軍總監的要職。這個名義，不很公開，而且時間也很短，所以知道的人是很少的。

「汪譚對我留鬚的趣談」我在廣州的那一段時間，應酬很多。不是這裏開歡迎會，就是那裏請客。記得某一次大譚會上，大家都有一些酒意。我對汪譚都非常敬重，稱之曰汪先生、譚先生，他倆說：「此後大家都是同志，不要太客氣了，你就叫我們精衛組庵吧。」那時我的鬚鬚很長，汪問我多少年紀？我回答他是三十一歲。他笑着對我說：「我以爲你快到五十了。」他又問我，爲什麼這樣年輕，要留起鬚子來？我說：「因爲民國十年被自治軍繳械，是我莫大的恥辱，我立誓要把自治軍肅清，才剃鬚子。現在已經五年了，未曾剃過。」他說：「你現在可以剃去了，」我揣測他的意思，必以爲革命是要青年的，他比我年齡大得多，還沒有一根鬚鬚，我那滿面長鬚，看起來，確實有些礙眼。譚先生很幽默地說：「留起來，也很美，你須知道有些人是愛好這樣的美呢。」說得大家都笑起來。

中國國民黨自十二年改組，即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選舉第一屆執監委員。十五年一月，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同李德鄰都被選爲中央監察委員。

「參加北伐會議」我這次到廣州，也是首次參加中央黨部的會議。此外並參加最重要的北伐會議，係在大東路體育場對面汪精衛公館舉行。會議廳的兩端，相對地掛着兩幅大照片，一邊是總理遺像，一邊是列寧的遺像。這好像是聯俄容共政策之下必然的格式。到會的人員，除汪精衛外，有蔣先生，蘇聯軍事顧問奇山加將軍，此外則為重要的中央委員及各軍軍長。由汪主席。在討論的時候，雖然也有人認為時機太早，力量太薄，希望慎重將事的。但經蔣先生及奇山加分別說明後，這一個出師北伐的大題目，終於決定了。在隨後問我：「廣西可以出多少兵？」我同說：「當時可以編成三個師的一軍，即係全省部隊的半數。若稍假時間，將地方治安辦好，部隊編整完畢，尚可陸續增加。但對於雲南方面，不能不留多一些隊伍，以為防備。」大家亦甚以為然。

「鄧演達的最後會面」這時鄧演達已由蘇聯回來了。在黃埔軍校任教育長，好像還兼任了其他的重要職務。他邀我去參觀黃埔軍官學校，到了學校門口，最觸目的是「真革命的站攔來，不革命的滾開去」這兩條好像大門聯對式的大標語。回來的時候，我們坐在一艘很快的小汽艇上，看見前面同方向去廣州的車船，（係民船，無槳櫓，在尾後裝有拍擊式的車葉，用數十人輪班踏轉，鼓盪前進。乃廣州附近介乎輪船民船中間的特種船隻，每小時可行十五六里）一步一步的落後了。他說：「中國與外國相比，就好像這船中那艘車船一樣，真是落伍得太遠了。許多人在那裏出了死力，流了臭汗，結果還是趕不上人家一副小引擎。」他暢談蘇聯革命建設的情形，語意中似乎主張中國革命，也非採行蘇聯那樣的方法不可。我回廣西的時候，他還很懇摯的走來送我，這就是我和他最後的一次會面了。

「回到廣西」我在廣州逗留了兩個多星期，才回廣西。來的時候，隨帶人員很少。回去時候却多了，內中有蘇聯的軍事顧問，政治工作人員，及黨務人員，男男女女，差不多坐滿了一個內河電船。這些男女青年的工作同志，都是那個時代的革命者解放者。在船上談談笑笑，歌歌唱唱，在長途的水程上，

打破了旅行的寂寞。把我幾年來戰事緊張的孤獨生活，也改變了許多。我回到南甯，將在廣州所決定的情形，向李德鄰及重要的幹部報告，他們當然都是同意的，而且表示非常的高興。

【我們的新的努力】我們的精神和工作，立刻又向新的方面活躍起來了！的確，自從統一廣西的軍事結束之後，我們的敵人已消滅了，目的已達到了。此後無論團體方面，個人方面，都失去了目標，如果不能迅速地找新的共同方向，新的共同目標，就會弄到各走各的路線，而把團體的力量漸漸分散起來。到那時候，就極容易發生不幸的事件。這種情形，在歷史上不乏先例。所以要求一件事業成功，在每一個階級內，都得要詳細的考慮，謹慎的安排，繼續的努力，不斷的前進，才可以順利的得到最後的成功。我們對廣西統一，雖已達成任務。如果沒有革命的統一與出師北伐兩個大目標，那麼我們的後果，是否再會發生不幸的變化，就很難逆料。

【出師北伐前的軍事部署】我們在軍事上首先着手的工作，就是改換名義，改組部隊。以前我們是在全省綏靖督辦之下，分置第一第二兩軍。現在廣西全省綏靖督辦公署改為廣西全省軍務督辦公署，祇換了兩個字，再把以前定桂討賊兩個總指揮部的老班底充實到軍務督辦公署裏面去，機關改組，就算完事。此外復另行編組一個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部，準備於出師北伐時，負指揮的責任。在後方，概以軍務督辦公署來處理全省的軍務，（十六年後全省軍務督辦名義取消，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軍部），這個易名改組的工作，很迅速地完成了。至於我們的部隊，在統一戰事結束之後，差不多已整編完成，一共爲九個旅，二十一個團，及砲工等營，第一旅旅長俞作柏，後來改任李明瑞。第二旅旅長白崇禧，兼第三旅長劉日福，第四旅長黃旭初，第五旅長伍廷黻，第六旅長夏威，第七旅長胡宗鐸，第八旅長鍾祖培，第九旅長呂煥炎。第一團團長李明瑞，第二團團長龔壽儀，第三團團長陳恩元，第四團團長蒙志，第五團團長張國柱，第六團團長許宗武，第七團團長葉叢華，第八團團長李孟蓉，第九團團長陸受祺，第十團團長梁朝璣。

，第十一團長韋雲淞，第十二團長李朝芳，第十三團長陶鈞，第十四團長楊騰輝，第十五團長周祖晃，第十六團長尹承綱，第十七團長楊義，第十八團長林竹舫。獨立一團長陳濟桓，獨立二團長羅浩忠。伍生團長呂鍾存，砲兵營長羅傳英，工兵營長馬典符。這就是我們在三四年間將廣西所有的舊軍，與入境的客軍十幾萬人，或予以消滅，或予以擊潰，經幾次淘汰整理，所剩下來的精銳。這些幹部，除了二三人外，都是正式軍官學校出身。全部官兵，約在四萬人左右。

當我們的部隊接到中央命令出師北伐的時候，因時間短促，未及照新編制編組就緒。即調第一第二（後改韋雲淞為旅長），第六、第七、第八五個旅長，率領第一、第三、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及獨立第二等十一個團參加北伐。其餘各旅團，仍留廣西。後來前方各旅，改編為三個師，以夏威、胡宗鐸、鍾祖培為師長。後方各旅，亦改為三個師，以伍廷賢、黃旭初、呂煥炎為師長，這是軍隊編配的情形。

【黨代表制度】在軍黨代表之下，設政治部，各師亦設政治部，團設政治指導員。黨代表及政治部為當時新創設的制度。黨代表與軍長，處於同等之地位。對於部隊，代表中央黨部，有監察的責任，軍長所下的一切命令，都要黨代表副署，才發生效力，可說這完全是採蘇聯的辦法。這個制度，在若干部隊裏，部隊長官與黨代表，往往會發生嚴重的衝突和磨擦，而在第七軍裏面，德鄰和我，却精誠相見，毫無隔閡。從全軍的官兵看起來，名義上雖有不同，實際上也是一樣的服從。他在前方，可以帶着我的圖章，代我行使黨代表的職權，我在後方，也能夠帶着他的圖章，代他行使軍長的職權，一點沒有窒礙或發生阻力的地方。這種和諧的精神，完全是公私歷史造成，而不是其他所能做到的啊。政治部的主任，係由總政治部派充。第七軍政治部主任黃日葵同志，很坦白，一見我，就說，他戴的是紅帽子，他祇是幹他責任以內的工作，絕對服從我的意旨。的確，他是一個很有能力的工作者。自從政治部成立之後

，各部隊的精神生活，表現得非常活潑，北伐之所以順利的成功，部隊政治工作的成功，占很重要的因素。蘇聯顧問也是國民革命軍改組後必須設置的條件，第七軍的蘇聯顧問，叫做馬邁也夫。原是一個打鐵工人，後來投入紅軍，經過軍官的訓練。據說當過一任旅長，在克里米亞作戰時，曾經受傷。這人頭腦簡單，在軍事上也不見得有何特長，不過在當時祇要能夠把一些很膚淺的技術，或新式的編制，介紹給我們，也就算無忝職守了。記得他初到的時候，祇和我談過三三制師的編制問題，以後並無若何的建議，在軍隊裏面，彷彿是一個備員而已。

「出師北伐」我們軍隊部署完畢以後，接着就要商量由何人率領的問題。北伐是一個新工作目標，有遠大的前途，各級幹部，都是爭先恐後的，要求參加，不願意留在後方。幾經斟酌，才決定了前面所述的這個安排。至領導的高級將領呢，白劍生因為蔣先生要他去擔任副參謀總長的任務，必然的要離開我們的部隊。我因為要主持廣西全省行政事務，事實上也很難離開廣西。所以領導廣西軍隊出師北伐這個任務，祇有請李德鄰擔任了。李德鄰自民十以後，從未到過廣州。這次出兵北伐的大題目，雖然是決定了，但是關於軍事上還有許多枝節問題，非他自己去與中央方面詳細商量不可。於是在四月間，就同白劍生前赴廣州，當然又有一番熱鬧的場面，這裏不便細述。他不久也就回來了。七月九日，廣州舉行北伐誓師的隆重典禮，蔣先生擔任國民革命軍的統帥，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等六個軍，進行北伐，在青天白日的革命旗幟下的軍隊，除了第四軍之一部，（李任潮奉命留守鞏固革命根據地）第五軍（好似亦有一小部參加），及第七軍之半，留在廣東及廣西，保障革命的大後方，其餘全部出發了。這是中國國民黨革命過程中一個最重大關鍵，不僅是震動兩廣社會的霹靂，也就是北洋軍閥的喪鐘啊！那天，我們在梧州，也開了一個極大的出師北伐大會，由李德鄰親自主持。到會的人，非常擁擠。一般民衆對北伐的官兵，寄予無限的期望，與歡送的熱情。廣西的社會，從此又

改換了一副新的面目，發皇着一種新的空氣！我們的部隊，早就準備好了，集中桂林，陸續北上，展開了廣西部隊光明燦爛的革命歷史的新頁！

前方的進展，與後方息息相關，參加北伐的部隊，固然負荷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後方的工作，亦極度緊張。第七軍北伐的部隊，所需要的糧餉被服械彈等，都是由廣西自行籌劃接濟，飛藹挽粟，人馬補充，工作繁重，概可想見。廣西自民十以後，禍亂頻仍，地方元氣大傷，但對於革命的貢獻，不敢稍落人後。一直等到革命軍進展至武漢南京之後，這種負擔，才得減輕。但因前方的勝利，使後方的民氣，更加發揚。同時主持的人，亦愈覺易於推動。革命初期的軍隊與民衆，是真正的打成一片。所謂軍民合作的精神，在那時候，可說是達到最高度了！

八 廣西政治設施概況

【民選省長】我自民國十二年六七月間出兵梧州，至民國十四年九月間，統一廣西全省，爲時二年又兩個多月。在這一個階段內，每天過着緊張的軍事生活，不斷的從事戰鬪的工作。除此以外，實在也沒有時間去過問政治，與研究行政上的種種問題。所以在那個時期，我們祇是提出一些有關軍事的膚淺的政治主張，與配合軍事需要的行政要求，其他則並沒有什麼政治或行政上的成績表現出來。至於各人防區之內的各縣行政工作，也祇是剿辦土匪，籌措軍餉和協助軍事這三個簡單的項目。在我們的機關組織上，既未設有管理行政的機構，一切全憑我們的意旨，由各縣知事負責辦理，縣級行政官署與我們之間，並不發生組織上的關係。而那時的縣知事，亦大都是沒有什麼政治素養與行政經驗的。到了十三年夏天，佔領南甯之後，這是廣西全省政治的中心，於是不能不有行政機構的設立。但是我們仍專心致力於以後軍事方面「發展，不願意過問政治。所以把地位崇高的省長，棄而不做，而由省議會議選舉當時的議長張一氣來擔任。我們對於這位民選的省長，很尊重他，凡是省長分內的事，都不加干涉。但是在那個時期，政治離不了軍事，所以我們雖竭力尊重省長的地位，而省長却不能不倚賴我們的武力。張一氣對於我們，固至如李靜誠等當省長時那樣完全仰陸譚的鼻息。但事實上他如果不得我們的輔助，一切政令，便也無法推行。

【廣西省政機構的崩潰與再建】十四年一月間，滇唐軍隊侵入桂境，進據南甯，張省長杳然離去，不知所往。他在職的時間，不過五個多月。十四年一月以後，至九月以前，廣西又陷於無政府的狀態中。十四年九月，我軍克復南甯，統一廣西，一省的最高行政機構，又不能不重新組織起來，以擔負主持

全省行政的責任。那時我還在梧州，李德鄰來電，邀我到南甯商量這件事。大家的意見，都希望我出來擔當這個重任。我雖竭力推辭，終以沒有相當人選，而不能不勉任其難。其實我在當時，對於政治工作，那裏有什麼研究與經驗呢？

【我開始主持廣西政務】一個全省行政長官的重任，出乎意料的，落到我的身上來。「初生之犢不怕虎」，我是大膽地接受了。但是這等於法無據的任務，並且在無法可據（那時還沒有被我們認為一種合法的法令）的時候，我這個全省政治舞台的主角，應該以何種方式出場，以何種名義出演，又成為麻煩問題。北洋政府，我們是不承認的。他們固然不會委任我，我也萬不能接受他們的委任。由省議會推舉吧，雖有前例，亦頗困難：第一，當時省議會的議員，已是散各地，一時不能召集。第二，張省長是由議會推舉的，他既未曾向議會辭職，似不便要議員另選。第三，省議會的議員，可說已是「三朝元老」，不能代表革命的民意。而且這個時候，廣州正在多事之秋，劉楊事變後，又發生廖仲凱被刺案。革命的中樞，尚未建立政治制度，地方政府自更無從遵循。因此我主張不稱省長，而以「廣西政長」名義，暫負廣西全省行政的責任，既免當時各方的指摘，以後如有什麼更改，亦較有迴旋的餘地。大家都以我的意見為然。於是我即用白銀鑄造了「廣西民政長」的印信，於民國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宣佈就職，開印視事。一切的組織都由我自行擬定：民政公署裏面，設政務會議，下設內務、財政、教育、建設四廳。所有人員，均由我任命：以梁威為內務廳廳長，蘇紹章為財政廳廳長，甘浩澤為建設廳廳長，盤珠那為教育廳廳長，朱朝森為政務會議秘書主任。這個「自立為王」的政治機構，一直到次年六月兩廣統一，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省政府委員組織省政府之後才結束。那顆自鑄的「廣西民政長」的銀質大印，亦由我自己保管起來，它倒不愧是廣西政治史上一件「替天行道」式的紀念物。可惜歷年奔遷，不知失落到什麼地方去了？

【過渡時期的行政設施】在這一個過渡時期內，行政上自然還談不到如何的設施，而祇是從事那種過渡的統一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政與財政的統一。以前在討賊定桂兩軍的防地內，民財兩項政務各有各的系統，到了聯軍總指揮部與綏靖督辦公署的時期，隨着軍事的進展，而逐漸統一起來。所以在十四年一月以後九月以前，雖然沒有全省的政治機構，凡是我們的力量所到達的地方，各項行政已統一在軍事機構之下。因此民政公署應行掌理事項，祇要向督辦公署方面接收過來就是了。不過行政系統中斷已久，好多法令規章已不適用，而當時中央又無法令頒行，足資遵循。於是訂頒了一個行政會議條例。這個條例的本身，固然也沒有法律的根據，但是沒有這個無根據的根據，則其他的法令規章，更將無所依據，而一切不能運用。所以這個行政會議條例，在當時就算是我們自行創制的母法，其他法律規章，都從這裏產生出來。這是我們大膽的創作，以現在的目光看起來，自然是很可笑的，不合法的。但在革創的時期，除了這樣便宜行事，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原來革命就是破壞陳腐的現狀，建立適應時代潮流的新秩序。這種創制，正是我們革命過程中的一種主要的工具。

【財政廳長辭職的兩個原因】民政公署成立不久，財政廳長蘇紹章呈請辭職，由我自己接替兼任。蘇廳長辭職的原因：第一、因為軍費需用孔亟，支應困難。同時全省稅務機關，雖已由督辦公署方面接收過來，而其下級機關，仍多為有力者所把持，而不易控制得住。所以蘇廳長辭職後，非由我親自兼理，難期澈底的統一與整理。第二、為了祭孔問題。自從民十以後，本省軍事，擾攘不定，祭孔典禮，停頓已久。全省統一後，好多人提議恢復祭孔，其中以蘇廳長主張最力，他並且要由我主祭。我對此事，本是無可無不可的。等到祭孔完畢之後，南甯民國日報乃大肆譏評，認為這是復古的舉動，不是革命的行爲。蘇廳長為前清的拔貢，是我的父執輩，對於尊師重道，非常認真。他看了報紙上批評孔子，認為是大逆不道的事。他說：「辦報的都是讀書人，我不料讀書人首先把自己的祖師反對起來，這簡直是忘

本！人心變得這樣壞，還成個什麼世界？」說時慷慨激昂，形於詞色。並要求我立即懲辦那報館的主筆陳勉恕。我對於祭孔，也是初次參加，著了長袍馬褂，必恭必敬的行完了三獻禮，足足費了兩三小時，這種繁文褥節，感覺非常麻煩。如果年年這樣行下去，我也不耐煩參加了。所以我對他的要求，並不十分贊同，祇是答應語誠報館，此後不再作類此的批評。他大不以為然，帶着責備的口氣，說道：「你父親也是一個讀書人，有過前清的功名，你雖然是一個武人，也曾讀過孔子的書，你縱然不禮重先師，難道就不體念你先人禮重先師的意思麼？」其實，我父親並不是禮重先師孔孟的人，我更不知道那一套。我聽了他這番教訓式的話，又好笑，又好氣，不過他總是我的前輩，在舊的觀點上看，他的確也是一時的人望，不願使他難堪。但也不能因此而改變我的主張，遷就他的意見。於是他就憤而辭職，我也祇好由他自己離去。這一點小問題，在那得竟會釀成一個很大的風波，可見政治革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從此以後，祭孔這件事，也就無形廢止。而且後來還把莊嚴的孔廟改為中山公園。然而時至今日，全國對於孔子，還是那樣的重視。國家特設官階很高的奉祀官，由孔子的後裔世襲其位，每年在國庫中支出一筆可觀的經費。而擔任奉祀官的及在奉祀官府有職司的，大多是年輕學淺的人，連孔子的學說是怎樣的，不知弄得清清楚楚不清楚。我在浙江見到孔子南宗後人，完全是一個毫無所知的平庸百姓，可是他卻懂得遇到變亂，可以向中央請發應變費，逢到災歉，可以向中央請發振濟費，要求的數目，不是十萬，就是五萬。保守着一尊孔子的楷木像，當作他的吃飯傢伙，視為傳家至寶，輕易不肯給人一看。偏偏還有許多人亦視為傳國至寶，威儀肅穆的前去瞻仰。這等崇拜偶像的舉動，實在有些可笑！因此我對於紹興的大禹後裔，及龍虎山張道陵的『第幾世祖師』，頗替他們有些不平。

【整理廣西金融】廣西自陸譚崩潰之後，以前所發行的紙幣，已成廢紙，無法維持。加以民十後，兩廣各地私鑄銀毫甚夥，成色低劣，價格混亂，我認為非立加澈底整理不可。於是在梧州設立造幣廠，

鑄造兩角的廣西嘉禾銀幣，統一形式，劃一成色。一面將以前各種形色不同成色參差的雜幣，按其成色，分別收回改鑄，共計鑄造了六百萬元。並於十五年五月間，在梧州成立廣西銀行總行，委黃維、廖喬松爲正副行長，發行五元、一元、五角、二角的紙幣，即以所鑄銀幣爲發行準備金。數年以來，人民既苦於陸譚紙幣之貶值，復苦於偽鑄私毫之充斥，自經此次整理之後，廣西境內流通之貨幣，遂有劃一之價格。貨幣在民間之信用，亦重復建立起來。廣西貨幣之整理，與廣西銀行之設立，對於以後廣西的各種政治建設，幫助極大。而貨幣之信用卓著，一直到十八年事變，才大受打擊。在這一段整理貨幣的經過中，尚有一件趣事可以敘述的：我既決定了整理廣西金融的政策，便開始鑄造銀幣，成立銀行。可是又從那裏去籌措這筆必需的資本呢？原來在那個時候，廣西境內的鴉片烟，是公運私禁的。當軍事初定的時候，私運鴉片，在所不免。但是一經緝獲，即予充公。駐在百色的旅長劉日福，恰在那時候緝獲了一大批私烟，約有一百多萬兩。劉氏以前爲自治軍領袖，曾經繳過我的槍，我還做了他的俘虜。他歸編我軍之後，對我們非常恭謹，緝獲了這大宗私貨，絲毫不敢截留，全部繳解政府。我除了照例犒賞他的部隊之外，即予變賣，得價二百多萬元，全數作爲造幣及通貨發行基金。以黑貨變成白銀，作爲銀行的資本，使廣西金融基礎奠定下來。飲水思源，劉氏是大有功績在裏面。我於此就想起現在的某大銀行，好像也有過性質類似的事情，這也算得「無獨有偶」的趣事。

「我們任用縣知事的標準」我們自出兵梧州，到統一全省這個階段中，對於各縣的吏治，始終未曾注意。一縣政治的良窳，完全繫於縣知事個人的身上。當時我們遴選縣知事，有兩個條件：第一是要他在地方上有聲望，最好還具有相當的經濟基礎，能在我們軍需孔急的時候，設法週轉或籌墊。第二是要在地方上擁有相當的武力，而且還要有膽量，與地方的民團要有良好的關係。並能隨時呼應，遇到匪警，或有軍事行動的時候，能協助軍隊，剿辦土匪，不致聞風膽落，棄城先逃。因爲要求具備這兩項條件

，首先便打破了規避本籍的慣例。固然我們並不一定要避派本籍的人充當知事，但在這種要求之下，在半封建的社會裏面，不豪爽則不能領導羣流，非精神則不能孚洽衆望，所以豪紳在某階段內，是有他存在的地位與必要的。後來革命的口號是要打倒「土豪」「劣紳」，好像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樣子。這種看法，實在有欠公道。即就我們那時候的縣知事人選來說，自然有好些是要不得的，但是也有若干是良好的。在那時候，貴縣的知事劉晉臣，就是一個很好的豪紳，也是一個很好的知事。他一面能達到我們的要求，一面又能顧到老百姓的利益。而他自己呢，不但沒有貪污的行爲，并且把一份很大的家當，都賠光了。所以不僅我們要派他主持一縣的行政，連老百姓也一致希望他當縣知事啊！

【當時的縣制】到了全省統一，上述的作風，便改變了好多。首先規定縣知事人選，要迴避本籍，非萬不得已，不用本縣人。但是機關編制與人事銓敘的制度，都未建立。縣以下各級幹部的任用，及用人的多少，都由縣知事作主，上級官署，並不過問。縣知事以下的人員，大都是世代相傳的書吏房科，一部份是縣知事隨任來去的師爺官親。可以說由前清而至民國，由陸譚而直到我初任時期，都是陳陳相因，尙談不到制度的改革與建立。縣公署的經費是採用包辦制度的，那時規定每月大縣五百元，中縣四百元，小縣三百元。在各縣應行解省的稅款項下，每月照縣的等級，扣除這個數目。縣公署的費用，不論薪俸公費，都由縣知事全權支配。此外縣裏自己徵收的雜捐，及其用途，祇要經縣參議會通過，即可動支，省裏亦不去過問。至於各縣徵收田賦，縣知事照例坐支八厘徵收費，有的提出一部份補助機關的經費，有的是完全放入私人的宦囊去。我現在想想：這種舊時代的縣政，雖然有很多的缺點，但是在上的監督機關，既可執簡馭繁，在下的縣知事，亦可自由的發揮其才能。祇要縣議會健全的話，一切的弊竇，亦不致發生。現在的縣制度，對於縣政府是束縛得太厲害了。不但省要管，中央亦要管，將來縣參議會成立之後，民意機關更要管，縣政府就要成爲一個三管的機關。縣是一個自治的單位，抑是一個多

治的機關，就有些費解了。

我是一個對於政治毫無研究與經驗的人，一旦肩負起這個重大的責任，祇好一面做，一面學，有時自己在暗地裏摸索，有時請教請教自己的僚屬。在那時候，自己祇有負責的勇氣與毅力，並不顧慮自己身體的辛苦，與責任重大的危險。現在回想起來，將一省政治的重責，放在一個毫無政治素養與行政經驗的青年軍人的兩肩，由他去摸索試探，是何等不合理而危險的事情啊？固然，這在那一個階段裏，是無法避免的事實。而在今後，我們須要從事現代的國家建設，若政府不注重保育政治人材，個人自己不注意政治修養，國家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這是我「過了橋才知道過橋危險」的說法，不知道未曾「過橋」的人們，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廣西省政府成立】十五年六月，廣西省政府正式成立，就將過去「自立為王」的民政長時代結束了。省政府設省務會議，為全省行政最高權力機關，下設秘書處、民政廳、財政廳、教育廳、建設廳。國民政府任命我為廣西省務會議主席兼財政廳長，粟威為民政廳長，甘浩澤為教育廳長，盤珠祁為建設廳長，朱朝森為秘書長。這是國民政府首次公佈的省制度。而廣西省政府又是國民政府統治之下，最先成立的省政府，（那時廣東省政府因種種關係尚未成立）當然我就是國民政府最先任命的省政府主席。我們以前在軍事時期，對於省內各項大事的處理，都通過合議制的形式。民政公署成立後，設立政務會議，已具合議制的雛形。現在省政府的組織，也採取合議制，我們施行起來，自然感覺得很順利。不過一切重大問題，都由主席決定，會議不過是集思廣益採納大眾意見的集議機構而已。

【破除迷信運動】這時政治改革的洪流，已滲透了全省各地。在各種政治建設尚未開始之前，首先對於迷信的破除，下了一番極大的工夫。是年七月，我通令全省各縣搗毀寺廟偶像，以祛除社會迷信。除孔廟關岳之外，一律不准保存。這個破除迷信的社會運動，係白劍生所首創。他在一月間驅逐川軍出

境之後，駐軍桂林，便下令給各部隊官兵，將桂林城郊附近的寺廟會館所有的佛像，一概搗毀。他曾對我說過一段趣話：「當搗毀城隍菩薩的時候，那些士兵，都有些畏懼，但迫於命令，又不敢不打，當執行之前，有些士兵上了香，磕了頭，口裏喃喃自語：『城隍爺爺不要怪我，我是奉了軍令，身不由主的啊！』這可見軍令的威嚴，亦可見迷信的力量了。」

然而迷信的力量，畢竟敵不過軍令的威嚴，城隍爺終於被打倒了。自從省政府通令破除迷信之後，全省各地，除了鄉僻地方仍有未能徹底執行外，大多數寺廟裏的偶像，尤其是城市的都已不存在了。記得那年回到鄉間，我母親對我說：「你連年在刀槍炮火裏過日子，我非常擔憂，曾在關帝菩薩面前，許了好多福（即許願），保佑你逢凶化吉，身體平安。現在你平安得勝回來，我已燒全豬，為你還福，你可同去叩謝菩薩。」我聽了她的話，為難極了。要想向她解釋，這是迷信吧！他已這樣年邁，那裏會聽信我的話，如果遠拗她吧，心裏又實在不忍。只好含糊答應說：「我心到就是了，菩薩我不要拜，陪你到那裏去玩吧！」她心裏也許不很喜歡，但也並不十分勉強我一定要拜。到了那一天，陪同她到鄰近的關帝廟去，見那關帝神像的身上，已換上了一套華麗的新衣，神龕上面，張着一幅極大的彩緞橫額，題着：「佑我平安」四個大字，下款寫的是「黃門鍾氏敬獻」等字樣。我母上了香燭之後，不管我拜不拜，自己恭恭敬敬的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禮，口裏喃喃的念着聽不清楚的話。我在旁邊忍不住的笑，但是又不敢笑。等她向各處一一叩拜完了，才陪她回來。那時我心裏想：好在是關帝廟，不然我對於自己所發布的命令，簡直要成為立法犯法的罪人了！我現在回想起來，好些過去我們所頒行的事，以至現在一般軍政機關所頒行軍令政令，在倫理上或心理上，不免要遭遇到多少的障礙或阻難。上述趣事，即是一個例子。

【出巡滬州】自從李德鄰、白劍生他們出師北伐之後，省內的黨政軍一切的工作，都由我兩人負責

。平日除了處理蟄集的經常事務之外，忙於應付的，就是開會演講。那時的民衆團體及機關，常常召開大會或舉行會議。每一個機關團體的集會，都待要我去主席或演講，我自己也以爲非親自出席不可，好像一切的革命工作，都須透過開會演講這些程序，否則就像沒有盡到革命者應盡之責任一般。如此日積月累，我的身體漸漸的支持不下了，患了高度的神經衰弱症。醫生勸我少做事，每日學打網球兩小時，來調節精神與肌肉。我之打網球，就是在那時開始學習的。醫生又勸我到外縣巡視，以轉變生活的環境。

【巡視龍州的三項工作】於是我就決定在八月間出巡龍州。我之所以選擇龍州爲首次巡視的目標：第一、因爲龍州是陸譚系多數人物的家鄉，自他們失敗以後，多半避居安南，並不時在中法邊界上滋擾，須親去察看情形，以定應付方針。其次，廣西各重要地區，都有我的足跡，祇剩下龍州，尙未去過。第三、龍州係中法交界之區，自從我們統一廣西之後，安南政府尙未澈底的了解。尤其是本黨的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府，所最表不滿，亦最畏懼的。所以我去巡視龍州，確實含有政治、軍事、外交各種的意義。所謂游歷地方轉變生計環境，反成無足輕重的問題。同行的除少數行政幹部之外，大都是黨務宣傳人員。他們都視龍州爲廣西神祕的地方，男男女女一大羣，都爭着要去。到了龍州，第一項工作就是召開民衆大會。我在大會裏報告統一廣西的經過，與參加革命的必要。並宣佈此後的行政方針。那些同行擔任宣傳的工作同志，便分頭的在各種民衆團體裏活動宣傳，使龍州人民的見聞大開，並引導他們的思想走上新的大道。其次，招待法國領事，龍州海關稅務司，及外國商人。這個宴會，在對汛督辦公署內舉行。當時的對汛督辦是呂煥炎，那位法國領事，和那些外國商人，對於我們初到龍州那兩日的舉動，似乎頗有懷疑與害怕的樣子。我對他們解釋，中國國民革命的目的，是在打倒軍閥。廣西統一之後，中越的邦交，必比以前更加親睦。他們提出當時所唱的革命歌裏：「打倒列強」

這一句話來問道：「列強是不是都要打倒？中國能不能夠打倒列強？」我祇是很勉強的回答：「所謂打倒列強，是要打倒侵略中國的列強，而不是世界上的列強都要打倒的意思。至於侵略中國的列強，能不能打倒，你祇要看我們打倒廣西軍閥的例子，就可以明白了。當初陸譚的勢力很大，為什麼終被我們這小小力量所打倒呢？革命的勢力，是不可以尋常的方法來計量的啊！」我雖然這樣的解釋，而他們的心裏，總是懷疑着。過了幾年，仍未了解。民國十九年，李明瑞俞作豫在左江宣佈實行共產，因此安南政府就將邊界完全封鎖起來，斷絕桂越的交通，至幾個月之久，這是以後的話。在當時他們心裏，雖存懷疑，但在宴會席上，總是很快樂的樣子。他們說：「在龍州住了好多年，從來沒有和中國的小姐太太太過席，今天是破天荒第一次，在法國交際的宴會上，沒有女人，簡直是罪過。中國的革命，能使男女社交公開，真是極大的進步。」法國的白蘭地、葡萄酒、香檳酒喝得太多了，大家都有了醉意，法國領事起來要求同席的幾位女同志跳舞。那幾個女同志都未曾學過這一套，亦居然有勇氣，不成步法的跟他們跳舞起來，這可算是廣西省內國際社交的新紀錄了。

我在龍州的第三項工作，就是視察鎮南關要塞防務情形。廣西省與安南接壤之區，約有四百餘公里，中間犬牙交錯，關隘甚多，自東南至西北，有鎮南關、平而關、水口關、巔湯隘、巔洞隘、平孟隘、白懷隘、枯柴卡、弄江卡、每關或隘卡，因交通的重要，設有對汛員或對汛兵把守，屬於廣西邊防督辦署管轄，專司兩國人民在邊界上之往來交通稽查治安事宜，近似邊防警察的性質。在中法戰爭前後，各關隘皆駐有軍隊，執行國防的責任。各重要關隘，皆建有要塞砲台。以目前的形勢來說，自然以鎮南關為最重要。因法國的鐵路（狹軌），已築至離鎮南關五里外之同登，由同登入關，有汽車路直通龍州，於是鎮南關便成交通上、商業上、政治上、軍事上的重要地區。鎮南關離龍州約五十餘公里，汽車一小時可達，我們到了那邊，先登大連城小連城兩要塞，這是各個要塞之中心，控制關的南北兩側，形勢至

爲險要。要塞上面，有很多堅固的工事兵房，但是年代久遠，多已崩壞。還有好多門德國克虜伯廠一八八八年製造的要塞大砲，其口徑有二十一生的，有十五生的，但皆鏽廢不適於用，亦無人管理，至堪嘆惜！清末中法戰役，提督馮子材，即以大小連城爲反攻諒山的據點。當戰事初起的時候，我軍先受挫折。馮氏持槍佩刀，在此督戰，終於反敗爲勝，在我國邊防史上，留下極光榮的一頁。其後提督蘇元春，銳意經營，購砲築壘，完成沿邊各要塞。到了今日，這種要塞，固已陳舊得不堪使用，但在五十餘年前，則確有其重大之價值。蘇氏鞏固邊陲之功，亦至值得後人稱道。雖然他後來爲奸佞所參，死於天牢，然而他留在邊塞之遺跡，是永久不會湮沒的啊！

【害盲腸炎赴粵就醫】我由龍州回到南甯，這時國民革命的北伐義師，已由長沙岳州，進佔武漢，捷報傳來，羣情歡忭！便舉行了一個大規模的祝捷大會。在一個慶祝宴會席上，同席的范軍長石生，前由雲南敗退回來，殘部駐在平扁，這時特來南甯，與我商量接濟善後種種問題。他觸景傷情，想起我不能全力助其回滇，中心非常憤懣。雖沒有說出對我不滿意的話，但我可以從他的表情上體察出來。而我呢，又不便向他訴說我的苦衷，求其諒解。在飲酒的時候，他一定要和我對飲一大玻璃杯的茅台酒，那時我尚有相當的酒量，本來可以應付。但這一天我已喝得差不多了，如果再來道一大杯，頗覺無此勇氣。我便要他先說明必須對飲的理由，並希望減少一些。他激昂的說：「我和你同過戰場，共過患難，難道這一杯水酒，就不能同飲下去？你若不飲，就夠不上朋友了！」我知道他心中正在煩悶，要將這一杯烈酒，來澆他胸中抑鬱。便不再推辭，也就借這一杯烈酒向他表示歉意，希望將彼此不能以言語形容的芥蒂，都溶浸到酒杯裏去，乃各舉杯一飲而盡。真是「入口如醇，入腸如火」，當場就支持不住，扶醉回到家裏，腸痛大作，體溫亦突然增高。次日請小樂園的美國醫師來診治，毫不見效，病勢有增無減。我問那位醫師：「是否盲腸炎？」他說：「是的，而且快要化膿了！」我又問他：「能不能在南甯開刀

？』他很坦白的回答：他是一個見習醫師，不敢施行這種大手術，而且他的醫院裏，也沒有大手術的設備，力勸我趕快離開南甯，到廣州或梧州去，才有辦法，我很感謝他誠懇的態度，不像一般江湖醫生，一點本領都沒有，却不顧人家的死活，專誇包醫疑難雜症。其人格之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了。我於是在兩點鐘之內，就乘了最快的江鳳輪船動身。巧值江水大漲，不過卅二小時，就到了三水，轉坐火車到廣州，暫住亞洲酒店的樓上。即請德國醫生盧美林過來診視，後來又入頤養院醫治。那時我的體溫到了四十一度，夜裏神經已發生錯亂，亂說話，亂打人。我的妻子蔡鳳珍亦正在那裏就醫，醫生對她說：「病已萬分危險，一時不能開刀，因患處業已化膿，開刀更屬危險。祇好用水袋及退熱藥劑，希望將熱度降低，才有辦法。萬一腸膿一潰，當立刻開刀，以盡我最後的人事，但願上帝保佑！」到了第三日，熱度漸漸降低，神志也清醒過來了。醫生很是開心，但說還要過很久的時間，精神恢復一些，然後再開刀去膿，作根本的治療。所以我在廣州頤養院，住了四個多月，直到年底方回南甯。當我在廣州養病的時候，有許多人來慰問我。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當時國民政府的蘇俄政治顧問鮑羅庭，他在我病房中，大談廣西社會的經濟情形，尤其注意資本家大地主。我說：「廣西根本沒有資本家，一般都是小商人，最大的地主，每年的收入，至多亦不過一兩千擔租穀，而且這樣的地主為數極少。」他很不以爲然，駁復我的話道：「廣西一共有多少家當舖？那些都是剝奪農民利益的組合。大地主雖然沒有廣東那麼多，但是廣西的耕地，也比廣東少得多。那些擁有一兩千擔租穀的人家，已可算是大地主了。」我很爲詫異，他對於廣西一般的情形，都很明瞭，也許比我所知道的還多一些。末了他請我注意農工的利益，與農工的政策。此外還有政治部代表許紹棟等來慰問我，那時我正在病中，印象非常模糊，到了浙江之後，我與許君閒談之間，提起以往的情形。他說我的外表與以前完全兩樣了。從前身體很弱，鬚鬢很長，不多說話。那時我的確是這個樣子，因爲正在大病之後，精神體力，自然都要差一些。害病本是一格極痛苦

極危險的事，又因在廣東養病，而捲入廣東軍事政治的漩渦，以後不斷發生比害病更危險更痛苦的問題，真是料想不到的啊！

【省政府改組】自從十五年六月，廣西省政府成立後，至十六年五月又重行改組。中央任命李德鄰、白劍生、粟咸、黃薊、伍展空、俞作柏、雷沛鴻、朱朝森和我等九人爲廣西省政府委員，我和粟朱二人爲常務委員，我任主席，並兼軍事廳廳長，粟咸兼民政廳廳長，黃薊兼財政廳廳長，雷沛鴻兼教育廳廳長，伍展空兼建設廳廳長，俞作柏兼農工廳廳長，朱朝森兼司法廳廳長，並兼省政府祕書長，這是國民政府在省制上一個重大的改革，把軍事司法行政皆統屬於省政府之內。（但高等法院地方法院之訴訟判決。仍是獨立的，不受行政的拘束。）使全省政治軍事司法皆爲省政府組織之一部，而形成類似中央政府之形式。（此時中央五院制尚未成立）我以爲這種省政府組織法比較合理，因既名省政府，就是整個國家組織中之第二級政府，其內部的機構，應爲中央政府的具體而微。後來省府組織，幾次演變，成爲今日之狀態，稱行政院分部，尙且不可，而仍名之曰省政府，未免名實不符。現在若干政論家或政治家，對於省政府之名實問題，發生很多議論，而終不能獲得滿意的結論。因此回憶往事，認爲頗可作爲我們的參考。十六年公佈的省政府組織法，並未持久的徹底實行，軍事廳司法廳不久就撤銷，農工廳在清黨之後亦撤銷，其業務歸併民政建設兩廳辦理。若干省份還設立土地廳，但不久亦都撤銷。廣西省政府的人事方面，不久亦有更動；教育廳戶口沛鴻辭職，出洋考察，由黃華表繼任，農工廳長俞作柏辭職，由蘇民代理，旋即撤銷。雷俞等皆因十六年清黨之後意見不合，而自行引退的。

【舉辦縣長考試】廣西的省政機構，經過三度改革後，規模已甚完備，各項政務之推行，亦極順利。民政方面，於十五年八月間，成立課吏館，但規模簡陋，並不招收固定的學員，而是將那些類似候補縣長的失業人員，每月命一兩個課題，責任他們自己去用功研究。既無一定之授課時間，亦無一定的講

師指導，祇就他們所呈之課藝，作文字上的考核，或口頭的詢問而已。究竟他們的課藝是否自做，抑或請人捉刀，當然無從查考，也沒有人去查考，所以談不上什麼效果。遂於十六年三月間改為廣西地方行政人員講習所，我自兼所長，招收學員，集中管教。規模雖稍完備，但所收的學員，教育水準很低，大多祇能充任縣以下各級幹部，其中才能卓異，堪任縣長者，殊不多觀。辦了兩期之後，亦即停辦。省政府為慎選縣長人才，決定辦理縣長考試，於十六年十月成立縣長考試委員會。我為委員長，各廳長為委員。考試於十七年春間舉行，這是國民政府成立後最先實行國父遺教的一次縣長考試。但是考試的結果，令我非常失望。應考的雖有一百多名，錄取的僅十五名。（廣西大事記上記載錄取六十五名想係訛誤，尙待查考補正。）考其原因：第一有資歷有學識的人，大都已有固定工作，而不願參加考試，或學殖荒疏，而不敢應考。第二那時正當新舊時代交替之際，新的人才，尙未培養起來，舊的人才，多已落伍。而那些應考的人，則多半是落伍份子，希望於此中僥倖博取資格，以為進身的階梯。察閱試卷內容，多是一些光怪陸離不合時代的陳腐濫調，實在無法錄取。那個考第一名的是陸川人，姓羅，他的名字，我已記不起來了。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語體文很好，近代知識亦頗豐富。其餘的也都是富有新知識的青年，榜發之後，那些落第的舊人物，見錄取的都是幾個「黃口小兒」，忽視了他們的「真才實學」，認為有失公平，這也只好由他們去。但平心而論，考試制度，不過是比較客觀的一種選拔人才的方法，並不是絕對的能選取真正人才。尤其是單憑幾篇一問一答的文字，來決定優劣與前清科舉時的八股考試，也相差無幾。我以為必徹底推行考試制度，必須經常的舉行各種測驗，以鼓舞一般有志從政青年治學的興趣，好像清代士子應考那般的狂熱起來。同時在考試的方法上，應加以改進，使學識、才能、品德各方面的高下，都能衡量出來，而不僅憑書面文字的優劣為標準。能夠如此，考試制度庶可成為選拔英才最有效的方法。那次考試錄取的十五人，並不即以縣長任用，而是先分發他們到各縣去見習。見習期

滿，考核他們的心得，再分別予以實際的工作。現在這幾位考試及格的人員，還在廣西服務，聽說那姓羅的榜首，尙著有相當的政績呢！

【改土設縣】廣西境內，還有許多未曾設縣的地方。這些地方，都由土司官在那裏治理。有的於土司官之外，復由省另派一種土司彈壓委員，相當於各省設治局的性質。土司官完全是封建時代的遺制。相傳宋朝時候，狄武襄征服儂智高，那時南甯的西北兩方，多半尙未設縣，狄武襄卽劃土分封，給隨征有功的將士，以爲酬庸之具。在劃封的地域內，由受封人全權治理，這便是他的封邑。此後凡是他所需要的，無論公用私用，皆向區域內的土民攤征。對於上級疆吏，除年終貢獻一些土儀之外，沒有其他的關係。所有人民生殺予奪之權，皆操之土司官之手，其黑暗自不待言。世代相傳，以至於今。好多人以爲土司都是土人，其實土司之祖先，皆爲北方人之隨軍南來者。但因年湮代遠，都已土化了。「改土歸流」爲歷朝治邊的一貫政策，由滿清末季而至陸譚時代，都向實行這個目標進行。到我任裏，尙有好幾個土司區域，未曾改縣。考其原因，不外兩種：第一、因地廣人稀，改縣後經費入不敷出，不免要加重省方的負擔。第二、以前省之權力，尙未能達到那些偏僻的地方，而土司官世襲迄今，已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惡勢力。如果治理不當，極易引起反抗，所以歷來對於改土歸流的工作，皆採漸進的政策，而不敢孟浪將事。我主政後，深知這種殘餘的封建勢力，已到了沒落時期，決無復興的可能。而且在革命政府之下，更宜及早革除，使得被土司官壓迫着的人民，早日獲得解放。目前雖加重了省府負擔，但事關施政大計，亦不必多所顧慮也。於是將忻城土司改設忻城縣，太平、安平、下富三土司，併置雷平縣，上龍及金龍崗兩土司，併置上金縣，這都是十七年上半年的事。

【辦理移民教育】廣西尙有兩種原始的民族，卽獠民和苗民。這些原始的民族都是散居山僻高地或邊鄙小縣的高山上，而以平南、桂平、武宣、象縣、修仁、蒙山六縣交界之大獠山，爲獠人最集中之地

區。在廣西地圖上，特別用空白來表示獠山的區域。就是因爲山高地僻，獠民與外間往來極少，外人無從詳悉其內幕，所以不但外省人以爲這是一塊神秘的地方，就是本省人也有些莫明其妙。苗獠大都住在高山的上面，度其極艱苦的原始生活。有人說：「他們因爲受不了平原上的熱氣，所以要住在高山上，那裏的氣溫，比較涼爽，才能適應他們的生存。」這種說法，是不成理由的。我以爲往昔他們都是平原曠野的主人翁，後來漢人南下，他們在經濟上文化上，都不能相與競爭，於是不能不退到貧瘠的高山上以圖苟延殘喘，後來便成爲山居的習慣。這總逃不了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天演公例，想起來是很可怕的啊！據劉介氏 著《廣西特種民族的研究》的調查：廣西境內的獠民苗民，約摸有二十餘萬人，這些可憐的原始民族，在民族平等的原則之下，政府自應設法教育他們，開化他們，使均能進步，成爲中華民國的一員。所以廣西省政府於十七年五月間，通令全省有獠苗縣份的縣長，參照前清平樂知府歐陽中鵠創辦獠學計劃，辦理獠民學校，即由劉介氏主持其事。現這個學校，尙繼續辦理。我於卅三年回桂時，問及劉氏。據云：「獠民受教，成績頗佳。」可見「有教無類」的道理，是十分正確的。

【廣西語言的分析】廣西的人民，除了上述的獠苗之外，如果要詳細的分析起來，還可以由語言及其居住的區域，而得到許多顯明的區別。廣西的語言，可以分爲土話（即鹽話）、官話（即普通話）、白話（即廣東話）、挨話（即客家話）四大類。土話爲土著原有的話，這種人是住在廣西最早的人，後來由東北的湖南方面，及東南的廣東方面，到來許多外省人。時代愈久，移來愈多。這些外來的人，文化水準，自比土人爲高，而且還有經濟與政治的軍事力量爲其後盾。昔日的土人，自難和他們競爭，祇好向西北方面敗退。儂智高與狄武襄的戰爭，即是土著人民反抗外來人民的武裝衝突。南甯龍州一帶姓農的極多，原係有人旁之「儂」，據傳即儂智高之後裔。不幸儂智高失敗了，因而更受壓迫，千餘年來，在中原的政治文化統治之下，表面上雖稱同化，但仍保存着固有的語言。此種土著言語，又可分爲

兩種：一是平話，是土話白話混合而成的。通行於南甯附近的鄉下，及左右兩江的沿岸地帶。一是純粹的土話，僅存在更偏僻的地方。官話是湖南以北傳入各省不同的方言，在桂林省城地方，起了一種中和的作用，經歷代演變，而成為桂林官話，亦即為南方官話的正宗。腔調平和，字音正確，很容易懂，亦很容易學，由桂林為中心，一方面沿漓江（即桂江）向平樂發展，南至荔浦、修仁、蒙山、昭平之間，東至賀縣、鍾山、富川。在這個官語交界的區域內的人民，都是官話白話併用，甚至與挨話並用。一方面向柳州發展，南至武宣，西至南甯，都是官話白話兩用的地方。白話的發展，完全以西江為主流，由下游而漸及上游，以梧州為起點，沿江兩岸的區域，如蒼梧、藤縣、容縣、岑溪、懷集、平南、桂平、貴縣、北流、興業、橫縣、永淳、賓陽，以及沿江的各縣，都有一大部或一小部是說白話的地方。它一面是溯江而上，一面是沿江的兩岸向兩側深入。此種白話，是廣東原來的語言。年代最早，其向廣西進展，自較官話為先。而且西江水道交通方便，故「白話佬」向廣西移民，要比說官話的人來得早，來得多。挨話又名客家話。客家話的意思，無論在廣東或廣西，都是表示由外省遷來不久的客人的言語。據傳客家話本發源於河南，後來逐漸向東南方面發展，如江西的贛南、福建的閩西、廣東的北江、東江都是客家話盛行的地方。並循海轉到南路的欽州、廉州、化州等處，再由江北的連縣、陽山而轉入廣西的賀縣、信都、昭平、蒙山、平南的北部，桂平的北部，武宣的南部，此為客家話進展的北路。更由此而滲入柳慶各屬之一部。另一方面由欽州、廉州、化州向北至廣西之博白、陸川兩縣的全部，北流、玉林、興業、永淳、橫縣、南甯、上思、綏濠、各縣的一部，皆為客家話的區域。「客家佬」入廣西的時期，比較的遲，所以純粹客家話的區域，都在邊境的地方，或是官話白話交界的地區。但是客家人刻苦勤勞，富於冒險精神，竟有少數滲入，直至雲南貴州邊界上面。他們的生殖力與進取力，亦極為迅速。

我雖以語言的不同，來區別廣西人民來源的差異，但是並沒有什麼種族的觀念，或種族間的問題。

祇是藉此說明廣西人民在歷史上地理上變動與分佈，和語言生活習慣上差別的情形。我們在這裏，可確實知道，兩個或數個語言習慣不同的人民，因經濟交通的關係，彼此會逐漸溶冶，而形成另一種混合的產物。所以現在廣西，有好些地方，通行着二種或三種言語。這些地方，必將產生出另一種混合產品的語言。今後交通日益方便，經濟關係，日益密切，則此種變化的更迅速，更複雜，不似以前那樣的單純而易於辨別，殆為必然之事。

【禁止公娼與解放婢女】十六年五月，通令全省，廢娼及解放奴婢。本省原有花捐收入，全年達二十餘萬，我不稍顧慮而全部放棄，另籌抵補辦法。娼妓是肉體的買賣，奴婢是人的買賣，在人類平等與道德的觀點上說，都是非及早廢止不可的。政府更不應該以那種錢，來充行政經費。我們在那個革命高潮澎湃的時候，首先實行了這個主張。但是效果並不十分圓滿，事後反引起許多的批評，所以民二十年以後，就局部的恢復起來了。一般對於廢娼的批評，主要的理由，是公娼雖然廢了，私娼却盛行起來。政府對於公娼，可以集中管理，而私娼的管理，則更為困難。因為良賤不分，花柳病的傳染，更加厲害。而公娼廢止後，娼妓的生活問題與嫖客的性慾需要問題，未得適當解決，仍非合理的辦法。這種說法，表面上雖未嘗沒有若干理由，殊不知有公娼的時候，私娼也是一樣的盛行。如禁了公娼，而不禁私娼，那是關大門開後門的辦法，不在進一步禁止私娼方面着眼，而徒謂公娼之不應禁，是無異提倡設娼，而不是主張禁娼。至於私娼能不能禁，那是方法的問題，而非與否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的。就方法來說：男女生活和性的需要，都是必要的條件。政府對人民，尤其是女子職業，要有解決的辦法，同時對男女的性生活，要使他們得到正確的觀念，然後禁娼問題，方可迎刃而解。中國的娼妓，可說完全由失業造成。因失業而生活困難，不得不出賣婦女們的皮肉，以維持必需的生活，所以人民，尤其是婦女職業的解決，實在是根絕娼妓的基本辦法。單言禁娼而不從這等基本問題着眼，當然不能達到澈底禁絕

的目的。但因職業問題一時不能解決，而諱言禁娼，則近於因噎廢食，必致流弊更甚，爲害社會亦愈大。我那時見解如此，現在的認識仍如此。如果職業問題解決了，男女雙方本着性的需要，自可以正當的途徑，求得共同的解決。關於解決這一問題，本來比較容易，但在中國舊社會的觀念，還有必需加以糾正之點。原來男女雙方爲求滿足性慾的正當行爲，不能與買賣式的玩娼嫖妓相提並論。可是社會上一般的觀念，却認爲娼妓是正當的營業，而對於男女爲滿足彼此性生活的自由戀愛，無論爲臨時的或由臨時而變爲永久的，都是不道德的行爲。記得在民國十五年的時候，有兩個青年男女工作同志，在梧州北山公園有些戀愛行爲，爲人發現，引起了一場很大的風波。因爲這個男的青年，是做工人運動的，那些有錢的老闆及紳士，平日都非常忌恨他。現在發生了這個事實，便認爲這是敗壞社會風氣的大逆不道，全體聯名要求政府懲戒他們，以維持社會道德。而我駐梧州的高級軍官，與勞資兩方，素無關係，也加入了紳士老闆的一方，一致主張幫同紳商們出氣。可見舊的道德觀念，對於男女自由戀愛是認爲不當的行爲，而對於一般人進撫河裏的烟花館，與娼妓公開的飲，公開的唱，公開的嫖，反覺得是正當的，道德的。而且他們自己也大都在那裏度這種荒淫的生活。如果這種基本觀念不改變，反對廢娼者，自得有所藉口，提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以阻撓廢娼工作的進行，這實在是不揣本而齊末的胡鬧舉動。

【解放婢女亦與廢娼的情形差不多】記得小時候，我家裏也養了好多婢女，尤其是某一個大荒年，賣女作婢的特別多，祇要六七千文錢，或兩擔穀子，就可以買到一個七八歲的婢女，有的還祇有四五歲。這樣小的年紀，不易找到買主，他的父母，情願白白地送給人家作奴婢。這些孩子們的父母，往往對人這樣說：「不賣她，無力養活，終要餓死。賣了她，不但她得活，連我們也得活了。」出賣女兒的人，除了因女兒生離，天性上受了一些痛苦之外，祇是自怨命苦，決不會怨收買的人，甚至反而感謝他們。所以收買婢女的人，亦都自命是一種慈善的行爲，並不是不道德的事情。因而有人對於政府的解放婢

女，認為無異是一種虐政。的確，如果政府沒有善後的辦法，這事要澈底實行，是不容易的。因為一方願賣，一方願買，不會有人來報告，也沒有人願意檢舉。政府自然不能派許多人去稽查，即使不顧一切的強制執行，也決不會得到良好的結果。但是政府如果知道賣兒鬻女的，僅是少數人，而他們所欲得的，祇是維持一家性命的人肉代價，為數並不很大，那末用政府的力量，加以救濟，也並不是一樁很困難的事。如果政府能指導人民，在農業或工業的技術方面，加以科學的改良，以增加生產，使人民生活得以充裕，就根本不會發生這種悲慘的問題，這都是政府應盡的責任啊！香港政府執行婢女解放，非常認真，家庭查出有婢女，一定要吃官司。婢女如向香港政府控告，官司一定是贏的。所以居住香港中國人，對於婢女，都以義女的名義養着，不敢過於虐待。香港政府解放婢女的政策，雖不能澈底實行，但是住在香港的婢女，已經得到很大的恩惠。因此我常時感到一個政府，如果不能解決人民的職業，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一切冠冕堂皇的政令政策，都是紙面文章，無裨實益。豈僅廢除娼妓與解放婢女兩事為然？我檢討本人以往的行政設施，所以事倍功半，或未著成效者，其主要原因，亦在於此。

【禁止賭博】許多人以為賭博是兩廣人的特殊嗜好。的確，兩廣社會的賭風，是比他省為盛。我小孩提粗識事務以來，就知道我們很偏僻的鄉下，風行着各式各樣的賭博：如花會呀，播三萬呀，（係以五個銅錢，由一定的高度擲下，着其正面與反面，取三勝二負制）打天九呀，（即打骨牌）開肉飛呀，（係以不知重量的豬肉一方，懸於當衆，賭者納票底後，即猜其重量，以數目最接近之前數名為勝利而攤分其票底之所入）番攤寶館，閩姓山票，以至鬪鴿，鬪蟋蟀，鬪畫眉，莫不應有盡有。麻雀牌還是光緒三十年才傳來的。本省的禁賭，我記得以前曾厲行過一二次，但所禁的祇是雜賭。閩姓山票，番攤等，一般認為是「正當的賭博」，不在禁止之列。而且禁止時候，也很短促，至多不過一年或幾個月，就開放了。禁令也不嚴厲，在城市裏不過徒具形式，鄉間仍和不禁一樣。民國以來，這種賭博的規費，竟

視為正當的餉源，而且是極確實極容易籌集的餉款，乃美其名曰「防務經費」，公開徵收，全省每年約有三、四百萬元之鉅。就是到了我們的軍事時期，亦是以這種收入為軍餉的重要來源。十六年我會訂定分區禁賭的辦法，於十七年元旦，通令全省施行。除在梧州、南甯、桂林、柳州、平樂、玉林、龍州、百色這八個城市中劃定區域，准許開設番攤、寶館兩種賭場外，其餘各縣以及上述八縣的鄉間，無論何種賭博，都在禁絕之列。這種辦法，在當時，就表面上觀察，自有其特點：第一、賭的範圍及區域縮小了，易於管理，而「賭稅」收入，並不減少。第二、其餘大多數的城市鄉村，不致再蒙賭博的害處。所以我離開廣西之後，這個辦法，還是繼續實施，直到抗戰之後，才行廢止。我現在回想起來，這並不是一個根本解決的好辦法，而無異於承認一個正當的賭區，與合法的賭博。比到以前的情形，祇能說此善於被而已。

「十七年的大飢荒」十七年廣西大旱，災區約佔全省之半，尤以毗連貴州邊界一帶為甚。以前雖連年遭罹水災旱災，但災區都沒有這次的廣大，而且在那兵馬倥傯之際，實在沒有機會與款項去設法賑濟。省會各界特組織籌賑會，向各方募捐。省府並通令全省公務人員減薪助賑。但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慶遠、河池、南丹、一帶米糧沒有了，繼以草根樹皮，最後把農民賴為生產動力的牛隻，都吃光了，而仍不免於死亡。有些偏僻的山村，直到好久，才發現村子裏的人，全都死光。一個房屋裏或帳子裏，都是餓死的尸骸。我們駐在那裏的部隊，都要到柳州以下來運糧補給，糧船到了飢荒區，那些飢民，有的手裏執着板刀，有的是徒手，蜂湧着要來搶糧。官兵告訴他們：「我們手裏有步槍機關槍，你們這個樣子，可以搶得到糧麼？」飢民說：「希望你們開槍，把我們擊斃，否則就要把糧給我們吃，我們寧願槍斃，不願餓死！」人類是有同情心的，官兵在戰陣上無論如何的勇敢，但是對於這手無寸鐵的飢民，是不肯忍心將他們擊斃的，結果是分了一半給飢民，安慰他們回去。這個官長的處置，我認為很得當。

記得小時我父親對我說過：「在大飢荒的時候，飢民聚衆鬧倉，（即將富有的倉廩打開搶食）是不能算做犯罪的。」我當時不能了解這個道理，自經此次大飢荒之後，才恍然明白，在現代法律上，因正當防衛而至殺人，是沒有犯罪的。這等法意，實在很合理。多數的人，因為要救自己的性命，被迫而犧牲一些食物，確是一種正當的防衛。而且保障人民生命，是政府的最大責任，政府既不能達到自己的責任，還要以法律去懲治他，理論上也覺得說不過去。回憶我父親這個啓示，使我在政治上了解不少的真理。

（創立村政學院）縣政基層組織的重要，我在那時也已經注意到了。為培植縣政基層幹部起見，於十七年的九月，創設村政學院於桂林良豐，聘劉仁航為院長，這是廣西村政建設之開始。在此以前，鄉鎮組織及幹部，都是沿用舊的方式與舊的人員，自然不會有若何進展。以後又因不久即發生十八年的變亂，以致村政學院僅成爲一個始基，而未著宏效。而且就我的觀察，劉仁航一流人的學問道德，雖然很好，但所講述的理論，未免近乎迂闊，更談不上實際的經驗。他們是純粹的村治主義者，將上級的關係，看得很輕，似乎近於「無政府」的主張，所以即使有機會實行起來，收效如何，也是一件沒有把握的事情。

（組訓民團）十九年因軍事的挫敗，亟思統一組訓全省的民團，以爲軍事的補助。四月間成立全省民團總指揮部於南甯，我任總指揮，白劍生任副總指揮。全省劃分爲十二區，設區指揮官副指揮官各一人。各縣派民團司令、副司令、副司令各一員，以縣長兼司令，這是廣西統一辦理民團之始。經以後多年的改進，成爲以民團爲中心的廣西縣鄉組織。但是我擔任總指揮的時間甚短，而且並不切實負責，以後的改進工作，都是白劍生、黃旭初、雷殷三氏董成其事，與我並無多大的關係。

（創設行政督察委員制度）廣西地面遼闊，人烟稀少，加以那時除了幾條勉強通行的河道之外，陸

路交通，十分艱困。省會南甯，地位偏處南隅，省政府對於全省九十餘個縣單位的指揮監督，自感困難，尤以桂林、柳州、田南（即百色）鐵南（即龍州）各區爲最甚。陸譚時代的道尹制度，於民國十年的時候取消，要使他恢復過來，固有困難。而且距離省府較近，及交通便利的地方，也無須乎要加多這個中間的行政組織。所以我那時爲暫時權宜計，特於距離省會遼遠而交通困難之區，設置行政督察委員。因爲我覺得前清的府道及民初的道尹，都是固定的官制，未免呆板了些。既經撤廢，自不必再行恢復。而廣西若干地區，在那時候，又確實需要一個中間組織，以補省政府耳目所不及。經再三研究的結果，乃改用行政督察委員的名義，爲監督考察邊遠地區各縣行政的負責者。這實在爲現時各省行政督察專員制度嚆矢。不過那時的組織很簡單，祇是一個在特定區域設有機構的視察員而已。不料由我創立的制度，今日竟通行於全國。這個制度決定以後，即委張任臣爲桂林行政督察委員，諸桂林、平樂各縣。黃爲柳州行政督察委員，轄柳州、慶遠各縣。鄭承典爲鎮南行政督察委員，轄龍州、太平各縣。馮冠倫爲田南行政督察委員，轄百色、恩恩各縣。直到十八年全省的交通網大致完成後，始行撤銷。

「整理財政」廣西是素號貧瘠的省份，前清一代，均賴廣東協餉以維持廣西行政支出。民十以後，全省分崩離析，財政更混亂不堪，非經澈底整理，決不能平衡收支。尤其非稅收合理，不能減輕人民負擔，消除人民痛苦。在十五年的時候，第一件重大工作，就是整理貨幣。第二件重要工作，就是統一全省收支，大致已如前述。但這不過是初期的基本工作，尚談不到財政本身的整理。到了十六年，我才決定廣西財政整理的方針。第一、探用量出爲入與量入爲出的平衡原則，就是說政府爲進行各種新建設，不能不有新支出，而種種支出的來源，同時亦須顧到人民負擔的能力與收入最高的限度。第二、實行全省一次徵稅，裁撤重複的稅卡，停止重複徵稅。第三、廢除不正當不名譽而害民之收入。第四、實行專賣及保護稅。第五、廢除包商及比較額，實行實收實解。第六、收入一律改用大洋，以毛洋加二五

伸算。第七、頒定新稅則，採用從價徵稅。這幾個重要方針，雖然決定了，但是在準備上，執行上，尚有很多的工作。於是首先成立整理稅務委員會，以財政廳長黃郛爲主任委員，指定對稅收有成績有研究之稅務人員數人，及地方公正士紳商人數人爲委員。於十六年春在梧州舉行稅務會議，研究討論，決定各種進行辦法，於七月一日逐步實行。在實行以前，先由政府提出支出之需要數字，然後由各重要稅務機關之負責人，如白錚九、黃子敬、蒙飛鴻、李德輔、黃仲庵等，就當時之稅則，加以整理，以測定收入之最高限度。如果尙不能適合政府之要求時，則按其差額，以爲加稅之標準。同時將全省原有三十個徵收機關，應徵之數目，併裁於十六個機關徵收。這十六個稅務機關，皆置於全省貨物進出之重要口岸，凡出入口之商品貨物，完納一次稅捐之後，即可通行全省，無稍苛擾，實爲省境統稅之濫觴。此辦法實行後，稅收增加一倍有餘，而人民負擔，並未加重，商民則皆稱便。在前清各種稅卡，徵收額均有規定，能徵收足額者，實所罕見，能徵解七八成者，已認爲達到要求。其實真正的收入，要比規定額高得多，超過定額之數，皆爲徵收官吏所中飽，爲數極爲可觀。陸譚時代，仍緣此例辦理，所以許多稅收機關，皆爲其親信獨佔，或作爲一二特別權要者之酬勞。所以那時候，一任收稅官吏，莫不夏屋渠，腰纏累萬。我們在軍事時期，曾改爲投標商包，收入較以前比較額，超出一兩倍，因比較額皆爲前清光緒年間所規定，現時商業發展，其應收數目，自不止此也。那些稅務的包商，大都是與我們的幹部有關的人，他們的盈虧，我不是很清楚的。盈收的數目，有的比繳解政府的數目還要大得多，真正虧負的是絕少的。我見如此情形，乃決定廢除包商，實行實收實解，嚴其人選，密其監督。在那整理的時期，曾經檢點一個人，監禁了好幾人，然後始獲良好的效果。我記得有一位素爲我敬仰的先生對我說：「水清則無魚，官清則無人，你如此辦法，恐怕無人肯爲你辦稅務了！」我說：「我情願水清無魚，決不任他們混水摸魚。」亦可知那時一般人對於辦稅的觀念是怎樣了。但是這個說話的人，他却是善意的。

【創辦煙專賣與保護稅】其次，是實行專賣保護稅。這件事舉辦以後，就牽涉到外國商人的身上。我們辦理專賣事業，先由紙煙做起，將所有入口的紙煙，一律交由政府貼從價百分之七十的專賣印花，再交煙商分銷出去。那時廣西的入口紙煙，以英美煙草公司的出品，占大多數。而華商的出品，如華成煙草公司，南洋煙草公司，僅佔一小部份。這個辦法，一經施行，英美煙草公司就派代表來質問。我回答他說：「捲煙專賣各國都有此辦法，即便沒有前例，我認為這是財政上的合理措施，也要如此做去。」他說：「我的煙已在上海納了統稅，不能再納第二種稅。」我說：「你納的是上海稅，我收的是廣西稅」。他對於我這種強詞奪理的態度，竟毫無辦法。最後帶着挾的口氣說：「我的公司要撤退了，聽候帝國同你中央去交涉吧！」並送我一大箱三炮台香煙，因為我好吸此煙，好像表示英美公司撤退之後，我就沒有三炮台煙可吸了。我說：「謝謝你：你們如果真的撤退，我就自己開廠，自己製煙，不再需要你的出品了。」結果英美煙草公司自動撤退了，華商屈服了，我自己的菸廠，也開設起來了。委薛汝益為廠長，出了兩三個牌子的香煙，後來因為專賣也等於收稅，反而要貼許多印花，費多少手續，索性改收保護稅，值百抽七十的稅率，比以前增加十倍有奇。這是在稅收上首先戰勝外國人的一件事。但是外來煙稅收得那樣重，而我們自己的菸廠，並不因此發達起來，也不能大量賺錢，這完全是管理與技術及原料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要求自己工業的發展，對於保護稅的實行，固然是緊要的事，而講求科學技術與工廠管理，實為最基本的條件啊！

【火油征稅】再次，則為火油納稅。我在梧州的軍事時期，對於各種貨物通過，都要收保護費。因為各處的土匪甚多，沿途設「卡」，商人付了「行水」，才可以通過。我之要收保護費，就是用武力保護商貨安全通過，不許土匪勒收「行水」。但不許土匪收「行水」，而自己反收起保護費來，似乎是換湯不換藥的做法。其實我收的費很輕，而且是有規律的，負責任的，因此商民都很願意繳納。即當時的

外商火油公司，如亞細亞、美孚、德士古起初亦對我抗議。我說：「問題並不是我一定要收保護費，而是你們要不要平平安安的做生意？」他們聽了我的話，也都樂意繳納，歷年都無異議。可是到了政局統一整理財政的時候，我要正式征稅，他們就不願意了。又向我提出抗議。我說：「你們以前不是一樣的繳納麼？為什麼現在又要翻悔呢？」他們說：「以前因為有土匪，才收保護費，現在時局太平，為什麼還要收費？而且保護費是臨時的，稅是永久的，我們無論如何，不能答應。」我說：「假使你們堅持不肯納稅，時局馬上就會不太平。無論那一個國家，商民納稅的主要目的，都是希望時局太平，惟有時局太平，才可以賺錢呀！」隨後我又說：「假使你們不願用保護費或稅的名目，最好是將全省經銷火油的代理權，交我政府辦理，我可以在那裏加價，抵補這筆數目。」他們一想，這樣更不合算，便要求國府命令制止，我仍不予理會，爭持到最後，他們是屈服了。我不過在稅率上減輕一半，終於獲得了勝利。

「捲烟專賣和火油征稅」，兩次對外國商人交涉的勝利，固然由於我蠻幹的結果，同時也因為那時「風便舵」，給他一個硬幹，畢竟得到了勝利。可見一個國家的外交，確是需要民氣和國力做後盾的。

「禁烟收入為廣西大宗財源」那時廣西財政的最大來源，要算禁烟的收入了。所謂禁烟，仍是軍閥時代寓禁於征的辦法。鴉片來源，並不在廣西境內，因廣西土壤氣候，不適宜於種植鴉片。在箇南方面，烟土產地，都在四川、雲南、貴州三省。牠的出路，一是由長江銷行下游各省。一路出廣西，銷行珠江流域，甚至港澳南洋各地。所以百色、龍州、柳慶都是雲南烟土必經的要口，全年通過各路路線的，總在二千萬兩左右。歷年加以轉運，收入達一千萬元以上。這兩千萬兩的烟土，如以兩廣四千多萬人口之分配，平均每人可得半兩，為害之大，可想而知。「飲鴆止渴」，雖知其害，而竟樂為之，其造因固不自今日始也。鴉片戰爭為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侵略之開始，而提倡種植鴉片，則為中國民族自戕之開始。

。以林文忠公則徐之卓識遠見，竟不能挽黑禍之橫流，豈獨滿清政府應首負其責，即民國紀元後中央及各地政府，亦不能辭其咎也。敘述至此，不禁悚然自愧！

「田賦之清理」在前清時代，廣西的田賦收入，不過五十萬兩。及民國四年六月，舉行全省清賦，以財政廳長田承斌爲總辦，朱新模爲駐局總辦，各道尹爲會辦。取銷以丁折米舊制，改兩爲元，厘定產谷百斤，征銀一角，雜糧百斤，征銀六分，（旋將雜糧免稅）實爲廣西田賦改革之開始。經此次改革之後，每年增稅一百五十餘萬元，至十五年全省田賦收入，全年亦不過二百餘萬元。此種改革，不過征收方法之簡化，尙談不到地籍之整理，田畝之清丈，而歷年來因人口之增加，新闢之土地，亦不在少數。我任內，鑑於各項不正當之捐稅，將來必須廢除，不得不在田賦方面加以澈底之整理。乃於十七年八月間，成立清理田賦總局，以財政廳長黃薊任局長，全省清賦所經費預算，約在二千二百萬餘元。係用實地丈量法，預計三年內完成，不幸十八年政局變動，清丈工作亦就中輟。但在南寧局部清丈所得的結果，並不十分正確，蓋創始辦理，技術與經驗，皆尙欠缺也。就我現時所知，全國各省對於土地之清理，皆以財政爲目的。所用之方法，如土地陳報，土地編查，皆係速成辦法，而非科學的根本辦法。一面要省經費，一面又要省時間，既不儲備人材，又無精密機械，草草從事，錯誤至多。照此辦法，不知何年何月，全國才有正確的地籍呢？

廣西財政，自經十六年後之不斷整理，已日上軌道。至十八年，我離職以前，都能維持必要之支出，而使各種建設，得以齊頭並進。二十年後，仍本此基礎，維持迄今，使廣西建設得更進一步之發展。飲水思源，實不能不歸功於當時的財政廳長黃薊氏呀！

「增籌教育經費」廣西教育，素稱落後。在民十以前的陸譚時代，既不重視教育，民十以後，又經過五個整年的軍事擾亂，匪特不能進步，反多所摧殘。到十四年省政統一，乃於十五年召開全省第一次

教育會議。這個會議，開創了廣西教育的新紀元，除了討論恢復原有的學校之外，即爲力求擴展與充實。因此寬籌教育經費，便成爲會議中的重要問題。當經決定在全省田賦內，附加一部份，充作教育經費。這個主張，出席人員，自然一致贊成。而在政府方面，因爲這是國家的百年大計，也就毫不考慮的核准了。廣西的田賦額，本來很輕，加了一倍，也並不覺重，所以在人民方面，亦認爲這是應有的負擔。會議閉幕以後，接着舉辦教育行政人員養成所，將各縣教育局長召集訓練，期由教育行政基層干部的健全，以促進地方教育的發展。

【創辦廣西大學】十六年的冬天，我任省府會議提議，創辦廣西大學。當時雖有人以廣西的中等教育尙未發達，似不宜即辦大學爲言。但我覺得一省裏面，沒有一所大學，以領導促進文化的責任，總是一個缺憾。而且廣西學生要進大學，非到廣東或北平上海不可，也就太不經濟太不體面了。所以我不顧他們的議論，而逕行決定。先成立廣西大學籌備委員會，我自任委員長，教育財政建設各廳長，及省內外的桂籍有名望的人士爲委員。由省政府即撥一百萬元爲建築費，五十萬元爲設備費，一切建築都是新的，絲毫沒有利用舊物。校址勘定在梧州三角咀的蝴蝶山，取其交通便利，本省學生皆可順流而下，外籍教授亦可溯西江而直達。同時因爲那裏是我進兵梧州的登陸地點，可作爲廣西改革之紀念也。十六年三月間，我親到梧州，舉行奠基典禮，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是年九月間，大部建築已完成。乃聘馬君武博士爲校長，盤珠祁碩士爲副校長，於九月十三日舉行開學典禮。第一期招收學生二百八十餘人，內分農學院、理工學院及礦冶專科，文法學院則付缺如，因廣西貧瘠，亟欲由農工礦之發展，以救濟其窮也。學校雖係初創，然以建築之新穎，設備之完全，加以馬校長之學術名望，不特可招致省外之教授，且可吸引外省之學生。抗戰後，校舍一部份被敵機炸燬，乃分遷桂林、柳州，並由省立改爲國立矣。我每到桂林，校中必請我講話，我亦樂於前往。卅二年到桂林，馬校長已逝世數月，我到良豐，佇立於

他巍巍的墓碑之下，默念這廣西第一個出洋留學生，第一位德國工科博士，第一任廣西大學校長，他爲革命而努力，爲學術而努力，爲「西大」而努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感念之餘，實不知涕淚之何從也！而「西大」已由嬰兒而少壯而成長，育成之材，亦已數百千人，爲地方爲國家，必能繼馬校長之遺志而努力。馬校長九泉有知，亦可以瞑目矣！培育後生，本爲前人應有之責任，我不敢以此居功，但回憶往事，亦有足以自慰者。

「幾項重要的教育文化活動」是年夏間，省政府在桂林舉行夏令講習會，聘請省內外學術名流，前往講演。並令全省中等學校校長、教職員，各縣市教育局長，前往聽講，各界民衆，亦可自由參加。「桂林山水甲天下」，廣西又是正在革新的省份，所以到來講學的名流學者很多。如馬君武、邱大年、黃賓虹、丘景尼、唐慶增、陳欽仁、陳定模、陳鍾凡、陳柱、姜琦、白鵬飛、鄭彰成等，皆不遠千里而來，實開桂林文化運動之新紀元。他們對於草萊初開的廣西，寄予無窮之希望。秋間，又在梧州舉行第一次全省運動大會，到各縣運動選手千餘人，廣東及駐在梧州之外兵，亦派選手參加表演，情形至爲熱烈。以上所述，都是廣西革新初期的教育文化活動。中間雖經十八、十九、二十三年的軍事行動，而稍有停頓，但風氣已開，基礎稍立。民二十年以後的廣西當局，更加努力進展，尤其是提出「寓將於學」的口號，實施中等以上的學生軍訓，實開全國國民軍事教育之先河。但廣西現時的教育，量的方面，尙可步武各省進省份之後，而在質的方面，則相差尚遠。據我所知，即以「西大」而論，每次招考新生，外省學生錄取者日多，本省學生考取者日少，這就是表示廣西省中等教育的缺點。又聞各級中學招考時，投考的學生，非常之多，而可能錄取者則甚少，這也足以表示廣西小學教育的缺點，而有待於今後努力改進者。

「公路建設的開始」廣西的河水，都是由西北向東南流的。廣西全境面積六十餘萬方里，地面上的

水流，都是經梧州出口，甚至貴州南部雲南安南東部的水，也都是經由梧州出海的。所以梧州水位的高低，相差甚鉅，最高紀錄爲民國二年之七十三英尺，其餘五六十英尺，三四十英尺，也都是常見的。這樣鉅大的水位差，不但使農田人畜釀成極大的災害。即在交通方面，水涸則船隻難行，水漲則覆舟傷命，予行旅及貨物運輸，以極大的困難與威脅。且因河流的方向，都由西北而東南，所以由西北至東南的交通，尙稱便利，而東北至西南的交通，就十分困難了。我對廣西的建設，首從發展交通着手，關於全省公路網計劃之決定，一方面是根據省內河道交通的分佈，另一方面是根據隣境之需要。如上述省內河流情形，對廣東方面的交通，暫且利用西江，尙稱便利。而對於湖南、貴州、雲南、安南則非開發陸路交通不可。在陸譚時代，全省公路，僅有南甯至武鳴之五十餘公里，及龍州至鎮南關之五十餘公里，這兩段短短的公路，與我們當時的需要，相差很遠。因省會在南甯，就以南甯爲起點，決定建築四條大幹線：（一）東北幹線，自南甯起，經賓陽，遷江，柳州，荔浦，桂林，全縣，直達邊境黃沙河，與湖南銜接，中間以柳州爲中心。一經宜山，河池，南丹直達桂邊之六寨，與貴州相銜接。一經沙浦而至長安。一至石龍，達柳江之下流。一以荔浦爲中心，一經蒙山至潯江，與西江水運相接。（此路現尙未通）一經平樂，而至賀縣，八步。再一方面接至廣東之連縣、陽山。（此係抗戰後才修通）一方面經信都，而至梧州。（此路興工不久即停止，現尙未通）（二）東南幹線，由賓陽，經貴縣，玉林，容縣而至梧州，中間一以玉林爲中心，經陸川而達廣州灣。一由玉林至博白。一以容縣爲中心，經六陳大安全至武林，以溝通西江水路。（三）西南幹線，由南甯經綏寧上思恩樂寧明太平而至龍州。（四）西北幹線，由南甯經武鳴，都安，果德，思隆而至百色，再由百色接至貴州之坡脚，雲南之富州，與雲貴兩省銜接。此路在我任內，並未動工，民二十年後，由現政府築至百色，但尙未至雲南邊界。以上所述的計劃，除西北幹線外，其餘皆在十七年底十八年初完成通車，約共長五千多里。除一小部份係由人民自辦者外，其

餘皆係政府撥款辦理，由建設廳長伍展空主持其事。記得有一次我在廣州政治分會報告廣西築路情形後，戴季陶先生說：「古稱有道之邦，廣西現在真可算得是有道之邦了。」的確，那時候廣西的公路，要比同時期的任何省份爲多。又有一次，一個美國駐華的商務參贊安德森氏至南甯考察，他對於廣西公路之迅速發展，除了表示驚訝之外，還發表了許多關於交通建設的意見。他不贊成我再發展公路交通，而主張建築鐵路。他說：「陸地的交通一定要以鐵路爲主，必須鐵路交通有了基礎，公路交通才能發生他的補助效能。鐵路是一條大動脈，公路好比許多細血管，假使祇有公路而無鐵路，是不合理的。因爲公路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消費，尤其是中國，既沒有汽油和橡膠的生產，又不能自己製汽車。現在公路上所用的一切，除了泥土磚石木材之外，無一不是需要外國的東西。如果五千多里的公路，充分利用起來，數年之後，它的消費就可築成一條很長的鐵路了。廣西現在還沒有一寸鐵路，而公路却有了五千多里，這是一個很不經濟的辦法。」我那時聽了他的話，頗不以爲然。我總覺得修築公路輕而易舉，而且就當時廣西的商業交通情形，有了公路交通，已儘夠用了。同時建築鐵路，需費大，需時久，那裏有公路這樣迅速而省費呢？可是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他的意見，非常正確。他並不是爲汽車公司、煤油公司、鋼鐵公司推銷的廣告宣傳，而完全是就理論上說話。假如我那時候採納他的意見，竭我的全力，未嘗不可以完全數百公里的鐵路，決不致增加後來浩大的消費了。中國初期的建設，多半是犯了避重就輕的毛病，固不止我一個人爲然。這個失敗的經驗，真可作爲前車之鑑啊！

「市政建設概況」廣西的都市建設，實起始於梧州。十三年冬天，大火燒去了梧州全市精華的十分之五六。燃燒得這樣熾烈，固然由於風高物燥之故，而街道狹窄，施救不便，亦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事後我就提議要把街道放寬，被火區域的重建，固然要如此，就是完好區域，也一律要重新改造。贊成者均自動照辦，不願意者，就派兵強制執行。爲辦理這件事情，乃成立梧州市商埠局，主持其事。十六

年五月，又改爲梧州市政委員會，以蒙民偉爲委員長，十二月成立梧州市政府，蒙民偉接任市長，下設公安、衛生、工務、財務等局，凌鴻勳、趙祖康諸氏，均曾在工務局工作。街市的規模，皆依照廣州市。十七年年底，自來水電燈等工程，統已完成。昔日卑濕黑暗污穢混濁之舊梧州，至是完全改變其原來面目，以嶄新之姿態出現矣。繼梧州之後，則爲南甯、柳州，這兩地的市政建設，皆於十六年九月開始，先成立市政工程處，開築馬路。十七年冬柳州發生大火，燒去市房十分之七，男女居民，燒死三百餘人，乃將全市澈底改造。省府因南甯過偏桂南，遂興遷治柳州之議，以其地點適中，水陸交通又極便利，因而對柳州之市政府，特別注意。除將舊城方面之災區重新建築外，並在對河荒郊外建築一百尺寬之馬路，爲將來新市區之基幹道路。並建築規模宏大之物品展覽會，全部建築費共八十萬元，擬俟展覽會閉幕後，省會卽行遷移柳州。展覽會全部房屋，卽作爲省政府辦公之用。旋因十八年事變，始告中止，展覽會房屋的建築計劃，未能完成。但其餘的市政建設，則於民國二十年後，仍由伍展空繼續完成其工作。至於桂林及其縣城，及大的圩市，在民二十年後，廣西政府當局，差不多全部督導改造竣事。街道寬闊整齊，平直亢爽，實爲廣西市政建設之一大特色，而非目下他省所能及者也。

【廣西的礦藏】廣西因爲革命統一成功較早，政府的權力集中，社會關係簡單，所以在十五六年的時候，已着手各種建設。此時其他各省，或在軍閥手中，或正在軍事擾攘未定之際。所以國內很多專家，如地質學及礦學家丁文江、李四光，農業經濟專家鄒秉文、莫定森、鄧植儀、趙俊聲、辛樹幟，工程工業專家凌鴻勳、趙祖康、陳琮、張季熙、邢士廉，均於十八年一月間，應廣西建設廳之聘，參加在柳州召開之全省建設會議。他們有的是來廣西考察的，有的是在廣西工作。此外更有許多華僑團體不時回來考察，想從事實業的開發。我們特在梧州設立一個華僑招待所，來招待他們。但是這些專家和華僑到來之後，大多感覺有些失望的地方。這不是政府的禮貌不好，招待不週，而是他們認爲廣西的先天條件

與後天條件均感缺乏，恐怕不能有很大的發展。我還記得丁文江氏曾在南甯以東地區普遍考察，據我派去隨從他的人回來說：「丁先生正像一頭穿山甲，無論走到一個礦圃，或見到一個山洞，他都要親自進去探視，弄得一身污泥才出來。就是沒有洞的地方，他也要找人掘一個深洞下去，看個明白。遇到一個地面的斷崖，他就徘徊不捨的在那裏察看。終日不是拾石子，就是檢泥巴，好像一個鄉間頑皮的孩子，又好像一個地理先生。他平時那副文質彬彬道貌岸然的樣子完全變了。」我聽了也覺得有些好笑。丁先生考察回來，我和他作過一次詳談。他說：「廣西的地下，各種礦苗都有一些，可是樣樣都不很豐富，尤其是沒有很豐富的好煤，也沒有豐富的好鐵，而且分佈得非常散漫。這於將來工業的發展，不免受到阻礙。金礦雖有很多地方發現，但粒小脈微，還不能用機器大量生產。而且金礦在世界上並不佔重要的地位。錫的藏量，僅次於湖南，但用途小，價格低，目前尚無開採的價值。只有錫的藏量，雖不算很豐富，但集中易採，是目前廣西最有價值的礦產。」他還說：「廣西一定要修築幾條鐵路。一條由桂全至湖南。因為長江以南的煤田，以湖南寶慶為最有價值，可用火車運到廣西來應用，或者銷到廣東香港去。另一條北由柳州經河池、南丹而至貴州、四川，南經貴縣、玉林而至廣州灣。四川出海的鐵路，以此線為最近，全程不過二千多公里，而且工程上比任何一線為容易。四川的農產都很好，貴州的礦產亦有希望，如果這條鐵路成功，對於廣西經濟上有大很的益處。」我聽了這番宏論，總覺得有些近乎迂闊而玄妙。我心裏想：「你這樣在地面看一看，難道就可知道一切了麼？你的眼睛難道可以看透地層？」我問他：「會不會在很深的地層下面，發現同煤礦一樣多的金礦，或其他重要豐富的礦苗？」他笑着回答道：「也許會有，但是世界上尚未有過這個例子，也許現在的地質學，尚未研究到最深的地層裏面去。但是目前的地質學，在一般原則的應用上，是可以作為開礦的指針，當不致使人們亂投資本而得不到效果。」我對於地質學自然是一個門外漢，他也知道我是一個老粗，不願多爭執，祇是婉轉的對我解說，

使我領悟。最後他說：「我不過勘察了一個概況；而且南甯以西的地域，還沒有看過。那裏的山脈，來自雲南和安南，安南與廣西交界不遠的地方，有很好的煤礦，可能的在南甯以西，留有很大的希望。最好組織一個地質調查所，從事詳細的調查，便能明瞭一切。」現在我回想起來，很佩服他的學問見解，與儒雅的风度。可惜他早已死了，真是國家的大損失！

【初步的建設事業】在農業方面，那些專家也提出了兩點重要的意見：第一、廣西的地層，多半是石灰岩構成的，（尤其是柳州一帶）下面滲漏的太厲害。廣西的雨量，本來並不算多，所以土地很容易受到旱災的威脅，而且所施肥料，都被滲漏而不得積聚，不但不能變換土壤，反而一年年的枯瘠下去，所以廣西的農產品，大多數是不很豐厚的。第二、柳州的土壤多半是石山的風化層，酸性太重，有些植物不能長成。而且害虫甚多，不易治理。要補救這個毛病，惟有人工儲水與大量的製造化學肥料，因為天然肥料很缺少，不夠土壤的消耗也。當時我們本想利用梧州的硫酸廠的硫酸，作為製造化學肥料的基礎，但是省內又無磷酸礦石，終於不能實現。這都是一般學者所謂廣西先天不足的原因。至於那些回國考察的華僑，論調可不同了。他們本來都是不學無術勤儉起家的人，所希望的，是馬上可以賺錢。而一個將要開闢的局面，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很多的顧慮，當然也不願他們辛苦得來的一些資本虛擲下去。他們在以前，都是隻身冒險到南洋去謀生活，好容易從豬仔（被賣身的華工名曰賣豬仔）苦力的地位，掙扎起來，變成一個小資本家。自然是小心謹慎的，不再像以前一無所有的時候，具有冒險精神了。他們認為那時候的廣西，尚不夠投資開發實業的條件，便都望望然回去了。我們站在政府立場，不管先天不足也好，後天失調也好，並不因此灰心，而仍舊是勇往直前的做法，希望人定可以勝天。所以對於他們的種種說法，均當他是不正確的批評，而不自假意志。在那短短的時間內，工業方面，完成了三酸廠，酒精廠，機械廠，製革廠，機器廠，磚廠，紙廠。農業方面，成立了全省農務處，各區設置墾殖局及兵

農委會，實行兵農政策。以伍展空氏擔任兵農工作，並提倡植桐，通令全省每人每年植桐十株，列爲縣長的考成。全省的公務員，均須身體力行，首由省級公務員做起，我親自率領墾地植桐，在南甯開有一個廣大的公務人員桐場。全省上下，熱烈進行經濟建設的工作。但事有出人意料外者，正當我們興高采烈的時候，突於十八年春，接到廣東方面的電報，說是李任潮在南京被扣，要我立刻到廣州去。當時我正率同成干以上的公務員，揮鋤掘地，立刻拋下了鋤頭，踏上了汽車，放棄了一切的工作，重復走入政治戰爭的漩渦。廣西建設的工作，便從此停頓下來，又受了幾年的磨折。這不知是廣西的損失呢，抑或是國家的損失？是一方面的罪過，還是多方面的責任？這問題就難以解答了。

所幸這種初步的經建基礎，尙未摧殘淨盡，二十年以後，仍由現在的廣西當局繼續舉辦起來，並有許多擴展。在生產上，無論是公是私，都得到了利益。三十五年我與黃旭初伍展空劉柳桂一帶去視察，「西大」的農學院師生要我講演。我說：「一個人無論讀書或做事，都不是單純爲了自己，爲了目前，而是要爲了衆人，爲了將來，這樣才有偉大的成就。現在假使我是附近的老百姓，來批評今日在座的人，我一定首先擁護伍廳長，惟有他是最成功的一個。因爲沿公路幾十里的大樹，幾百萬株林，幾萬畝農田的水利，都是他十幾年前墾闢種植經營的成就呀！但是在當時，政府說他用錢多，而不見遠效，老百姓說他霸佔牧地，壟斷水源，幾乎弄得他無處容身，而苦求擺脫。現在呢，綠樹成蔭，沃野阡陌，這個地方，不但成爲很好的農業區，而且成爲一個幽靜的文化區。這不是他偉大的成就麼？現在他雖然不在本省作事，我想好多人一定在懷念他。古人說：『前人種樹，後人遮蔭』，我們何必一定爲了自己要遮蔭，才去種樹？我想凡是學農的人，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那末將來他的事業，才有所成就。」

【主桂四年的三個感懷】自十四年的九月到十八年的五月，我主持廣西政治，一共三年九個月。以一個年青而又無政治經驗的軍人，來負擔全省的政治責任，這是何等不合理的事情？縱然自己有勇氣來

負責，但從老百姓及旁觀的人看來，一定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冒險，不但爲我個人擔憂，更爲他切身的利益而害怕。而我呢，祇是一面學，一面做，戰戰兢兢，小心謹慎地幹着。還算倖倖，在這三年零九月的時間，不但沒有超越，還勉強得了一些微小的成就。這些成就，祇可以說我在政治實驗學校所得的一點試驗品，而不是一個正式技師的製造品，其粗糙拙劣，不美觀，不合用，自然可想而知。但是以一省的大地方，一千萬人民的生命財產，來作一個武人的試驗場，真是太危險太不經濟了！古人說：「馬上得之不能以馬上治之。」我們既是馬上得之，而更是馬上治之，其不致顛覆者，亦幸矣！這等情形，在革命初期，固屬必有的事實，而今後之建國工作，其艱鉅必十倍於往昔，國家固然要培植保育健全的政治人材，個人亦更須力求本身之充實健全，珍惜其用重大代價所獲得之經驗，而配合國家之需要。否則革命時代之損失，就無從補償了。這是我寫完本章的第一個感想。

在革命的過程中，一方面是用革命的方法來破壞，一方面是用革命的方法來創造。創造的力，超過了破壞的程度，革命才能成功。中國國民革命的破壞工作，我覺得是不夠的，尤其是對於舊的觀念方面，未曾澈底掃除而竟致妥協了事，因而創造的力量，亦無由發揮盡致，使以後的建設工作，受到極大的障礙。廣西在革命初期，雖將舊的人物完全剷除了，但是社會上一般的舊觀念，依然存在，新的創造的觀念，事前既未培養成熟，脆弱的革命銳氣，一經舊思想的衝擊，便漸漸的衰退下去，而仍舊捲入循環內戰的漩渦，不能堅持創造的意向。縱然在一時期內有若干的進展，也祇是曇花一現而已。而在那一時期期的進展，的確是革命力量所推動的濤浪，可惜這濤浪沒有繼續的力量去推動他，反而變成一個相反的方向，在那裏不斷的波動。中國歷史上，每次鼎革之後，都有一番安定的工作，這個所謂「安定」，並不是進步的，而是消極的。並不是利用破壞力量來領導進行更大的創造工作，而是想要求這股力量，停止不亂，大家坐享太平。結果不是消極的無爲頹廢，就是不幸的漸漸的走上新的破壞過程。這種傳統的

舊觀念，今日還深印在人們的腦海中，成爲中國國民革命不能迅速成功的主因。這是我寫完本章的第二個感想。

廣西本來是一個經濟貧瘠文化落後的省份，要以自己的財力，自己的人力，來完成革命的建設，本來是不很容易的。因而在創造財產培養人材方面，必須特別注意。在那天下未定廣西先定的時期，國內有很多技術學術的人才，來到廣西，願意參加我們的建設工作，這是廣西建設最好的機會。可惜我們祇延納了一部份，不能儘量聘請。而這一部分的人才，又因十八年的事變而星散了。至於培植本省人才，雖然仍任努力，但是這努力的程度還不夠。廣西人不免有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心理，既不能很迅速的接納人家的長處，也不能很迅速求自身的進步。在革命初期，人家尚未着手建設的時期，正可以借用外才，盡一時的努力，以完成初步的建設。若到了人家也同樣進行建設的時候，就無人可用，而日見落後，這正是很可惜的事情。至於先天不足，生產不豐，既不可心存失望而自餒，自應加倍的自奮自勵，盡其在我的力量。同時追求他人之所長，補救自身之不足。能如此，則再經若干時期之努力，未始不可與他省作進步的角逐。我雖然離開了廣西的工作崗位，但就我往昔在廣西工作的許多實際經驗，加以體會，和現在從旁觀地位，清晰觀察，認爲本省還要十年以上的艱苦工夫，才可以奠定堅實的基礎，這是我寫完本章的第三個感想。

九 十五年的黨務及當時民運情形

「梧州初期的黨務」我出兵到梧州，除了受命 孫總理討賊軍總指揮名義之外，對於黨務尚未發生一些直接的關係。以前廣西的老黨員，如馬君武，劉玉山，劉震寰，劉湘，楊恩公等，不是在廣州擔任軍政的要職，就是住在廣州或其他的他地方，也未嘗直接辦過廣西的黨務。後來梧州一帶，入了革命軍的掌握，同時當十三年春天，中國國民黨改組之後，那些老黨員，也好像是有些落伍的樣子，而代以一班不見經傳的新進青年，首先成立的梧州市黨部，是中央直接派人辦理的。因為當時廣西尚未有省黨部，這就算是廣西最早的黨部了。他們不但與我不發生什麼關係，即在粵軍第一師方面，也不見得有若何的關係。當時在梧州辦黨的人，現在可以記體的，男的有周濟，甘立申，龍啓炎，李血漢，李家驥，黃昌佐，粟丰，女的有李立羣，李聯羣，李愛羣，黃若璠等，是社會上活動的份子。同時并辦理一個梧州民國日報，亦要算在廣西最早的黨報。在當時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之下，一切的工作人員，還都是很親愛的同志。雖然知道其中很多都是紅色朋友，但一時亦不厭覺得有若何不安地方，而在工作方面，自以盡力發展農工的組織為中心，而尤以工會的組織發展更為迅速，所以要求加增工資與罷工的問題，就不斷的發生。這都是由廣州而傳播到各方的運動，並不是梧州獨有的事件。

「收回梧州英領署」在十四年的「五三」慘案紀念日，很多的事業，對駐梧英國領事署，作了一個示威的大運動，所有在英領署工作的華人，一律都辭退出來，弄得英國領事很驚慌的逃下兵艦，退回香港，以後一直不敢回來！英政府因此常川派有兩艘小兵艦，駐在梧州，保護他的僑民。十五年六月間，駐梧英國海軍司令費志傑，因為要派兵艦搭拉士拉號到南甯游划，須僱用帶水（即內河的領江人），我

酒工會禁止工友去受僱，因此不能開行。費志傑大怒，乃用武力將梧州港口封鎖，斷絕交通二十四小時，後來經雙方協議：以後帶水工人，要由工會派定，兵艦不能自由私僱，價錢亦由工會規定，這事才算解決。自此以後，梧州以上的領江權，就操在我們的手裏，而外國兵艦到內地游划的機會，也就少了。因為工會派出的帶水，他們不很相信，防到這等帶水的人，萬一有意將他的兵艦向暗礁岩石上撞去，可以便他們發生很大危險的緣故。我爲此事，曾把費志傑武力封鎖梧州的經過，親自撰稿在一張塔拉士拉號的照片上面，分發全省機關團體，作爲一個國恥的紀念，以資策勵。但此事梧州雖然遭了英人一個極短時期的武力封鎖，對方也並不見得有甚麼便宜。可見民衆組織的力量，作非武力的抵抗，在某一時期，是有效力的。英國領事署的案件，英政府雖屢次向我交涉，但是理由總說不過我們。因爲我們的民衆，並沒有直接侵害他們的行動，而祇是在外面示威，在領署工作的中國人，也是自動的退出，並沒有什麼脅迫的情形。那時的英國領事，一方面因爲害怕，一方面因爲沒有中國人的幫助，尤其是住在那相當高的山頭上，食物挑水，都成問題，即使不退出，也無法在那山上生活，所以兩年多都不敢回來。房屋園林，沒有人管理，一日日的崩敗荒蕪起來。到了十七年年底，廣州的英國總領事，到我廣州葵園的公館，同我交涉，願意將梧州領事署交還中國，但是要廣西省政府貼回建築費港幣二萬五千元。並說：「這都是二三十年以前的價值，有當時單據爲憑，沒有一點浮報，」我因事件總有一日要解決，英方既願意讓步，即等於英國的政治勢力退出了廣西，豈不是外交上一件很有體面的事麼？隨即命隨從人員當面點交港幣二萬五千元，中間有五百元的，一百元的，十元的，五元的，包了一大包。他覺得很難爲情。要我改用支票，我說：「鈔票和支票，不是一樣麼？而且這都是陸軍銀行發行的鈔票，不會有假的，你也省得到銀行去支取，豈不更便利些？」其實，我那時的確還沒有款項存在外國銀行，那裏開得出支票呢？他很慚愧的收下了，於是大家簽了字，我並收回了地契。他臨去時對我說：「平生交涉的案件，這

是最痛快的一次。當場現貨成交，好似一場買賣。」他這些話是譏諷我呢，還是的確的事實，那也用不着研究了。我打開地契一看，係當時一個痞棍所寫，僅得了二十四千銅錢的地價，就把三個山頭一大塊土地賣給外國人了。我想這等事情，豈但廣西如此，就是全國各省，何嘗沒有同樣情形？那些教會洋行，都是利用當地的痞棍，來偷買土地，所費的價值甚少，而得到的地面很大，當時的政府，還蒙在鼓裏呢！唉！以往中國的政府，辦理對外交涉，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啊！

【廣西省黨部的成立】到了民國十四年，中央對於廣西的黨務，才有具體的辦法，派李德鄰和我爲廣西省黨務特派員，指導廣西全省的黨務進行。並派覃超，梁六度，周錫桓，黃家植，陳立亞，劉百授，石楚琛，覃時宜，陳勉恕等爲籌備委員，分別組織黨部，指導民衆運動，宣傳三民主義。並在梧州辦了一個宣傳工作人員養成所，以楊文韶爲所長。招收青年學生，加以黨的訓練，作爲黨的基層幹部。畢業後，分派到各縣，從事宣傳組織工作。到了十六年，又改爲黨務學校。我自兼校長，李天和，張少傑先後擔任教育長。

十五年一月，召開全省代表大會，會中最重要的決議案，爲撤銷省議會縣議會，而以省黨部縣黨部代行其職權。理由是：這些議會，都是陸譚時代遺留下來的機關，內容太腐敗了，既不足以代表民意，還不如乾乾淨脆廢代之以省縣黨部，工作方面，也比較順利一些。這事，並沒有法律的依據，大約是根據本黨總章，「省代表大會即爲省的最高權力機關」那一條產生出來的。雖然解釋得很勉強，但爲遷就事實起見，也沒有什麼人提出反對。省縣黨部成立之後，就將以前省縣議會的經費，會址，移轉過去，不用另外籌劃，一切都很利便。代表大會選舉的結果：我和陳立亞，陳協五，黃家植，覃超，梁六度，陳勉恕，劉百授，周錫桓等九人當選爲廣西省黨部第一屆執行委員，李宗仁，黃植溪，張任民，麥煥章，陳錫光，雷沛濤爲廣西省黨部第一屆監察委員，並由執行委員互選我爲組織部部长，兼宣傳部部长，陳

勉恕爲青年部部長，陳協五爲農民部部長，黃家權爲工人部部長，陳立亞爲商民部部長，劉百葵爲婦女部部長。但劉氏却並不是一個女人。

【初期廣西黨務的複雜】在當時，廣西省縣黨部的幹部和黨員，多半是雜湊起來。一部份是以前曾經與黨（同盟時代）發生過關係，但是後來又脫離或中斷了的。一部份是省縣議會的議員，臨時投過來的。一部份是十三年廣州方面派下的。我們在以前終年都是打仗，對於黨務根本就不很注意。到了那時，雖然形式上是我在領導，但是內部意見，非常紛歧。大凡曾經與同盟會發生過關係的老黨員，就倚老賣老的，在那裏講資格，稱前輩。與中央接近的，就以中央爲後盾，在那裏談革命。議會派的，倚仗地方士紳勢力的背景，專講法律問題。彼此之間，已顯然有了很深嚴的壁壘。我記得在梧州會議時，譚祖庵私自對我說過：「廣西好像一張白紙，你們要寫什麼文章，畫什麼花草，都由你們自己作主，要是弄得複雜，將來問題就多了！」蓋有感於廣州黨務的複雜情形而發的。但他却那裏會知道廣西當時的情形，已複雜得和廣州差不多呢！

【當時的工農運動】那時候的黨務，自以宣傳與組織兩項工作爲首要。宣傳工作，在表面上固以三民主義爲依歸，但是在當時真正了解三民主義的，是沒有幾個人。中央黨部對於主義的宣傳，亦沒有系統的指示。而且在中央方面的情形，比廣西還要複雜得多。派到廣西指導觀察黨務的人，各有各的說法，使得我們實有無所適從之概，所以在廣西各地的宣傳工作，也就極不統一了。有些別有用心的人，言論更爲歪曲。譬如對工的宣傳，就以勞工神聖爲他們唯一的宣傳口號，認爲其他各界都不及勞工地位的高貴。我記得在某次民衆大會裏，一個女同志出來演講。她說：「工字是不出顯的。工人一向吃人家的虧。現在是工人世界，工字要出頭了。以前是資本家說話，現在輪到工人說話了。」我站在旁邊聽了很好笑，我想：「工」字如果寫出了頭，不是成了一個「土」字了麼？其幼稚的情形，概可想見。在農民

方面，自然以「耕者有其田」爲最重要的口號，好像一切土地的所有權，全歸屬於耕田的農民。於是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和行動，就隨而發生。弄得社會上很不安起來。在十五年七月間，因爲北伐軍急於出發，需要的伙子很多，軍隊一時僱不及，在南甯附近，就發生拉伕的問題。（按：廣西軍隊，在省內作戰時期，拉伕是極少的事。）有個工運同志，名叫陸幾沉的，奔走獻汗的來報告說：「因爲軍隊拉伕，工友非常憤恨，就要罷工暴動，請立刻設法制止。」我說：「你們沒有盡到優伕的責任，使工友很踴躍的擔任革命北伐軍的運輸。我現在就派你負責辦理這件事，如果你不能盡到這個責任，就不能禁止軍隊拉伕。因爲他們是爲了革命北伐，而急於出發，爲完成革命工作，而勉強少數的人去擔任運輸工作，那是應該的事情呵！」他說：「他們要暴動怎麼辦呢？」我說：「暴動！這是你說的話，或者是你要他們暴動，你不要以黨的立場來打壓黨的最重大的革命工作，更不要拿這些話來恐嚇我，我不是這些話可以恐嚇特倒的呀！」自此以後，工人的氣焰，（其實是那些工運人員的氣焰）低了許多。在農運方面，就更成問題了。廣西貴州邊界上的東蘭縣，有一個名叫章拔羣的，一向在廣州中學讀書，受過農運的訓練，他並不經過廣西省黨部省政府的許可，暗地回到東蘭，組織農民協會，並且是有武裝的組織。於十五年一月七日，將東蘭縣城攻破，放走監犯，縣署被劫一空，並且慘殺地主，實行土地農有的辦法。那時廣西軍事，剛才平定，這種突起的異軍，我祇好派兵進剿。由駐百色的劉旅長派團長龔受儀與縣長黃守先將縣城收復。章拔羣退入武篆山內，仍舊在那裏煽動農民，等到軍隊撤退，重復集合千餘人，再陷東蘭縣城。並以東蘭農民協會名義，電國民政府，說是：土豪劣紳勾結縣長，壓迫農民，槍殺黨員，要求中央電令廣西省政府查辦。其實那裏的土豪劣紳，已被他們殺的殺了，趕的趕了，縣城也被他們佔領了。在當時容共農工兩大政策，正在實行的時候，不但廣州方面對他們這種舉動很爲重視，就是在本省的黨部裏面，也有很多人與他們表示同情的。我爲審慎起見，乃由省政府電黨部第七軍

軍部各派員組織調查委員會，前往調查，共同處理。並定出解決東蘭農民協會苛拔羣等之農紳鬭爭辦法八條，這八條辦法的全文，現在雖然記不清楚，但總是遷就農民方面利益的居多。這等辦法，無非爲息事寧人，不願事體擴大，求得一時相安而已。自從東蘭農協問題解決之後，其他各縣的農民協會組織，乃日加擴展。尤其是特別武裝的組織，着着進行。南甯附近的農協，是直接受省黨部農民部指導的，當時幾百幾千人，肩着刀矛鋤頭，到南甯來開會。農民部長陳協五，是前清末科的一個舉人，已經四五十歲了，終日背着一頂箬帽，穿着一雙草鞋，扮成農民模樣，同他們混在一起，他對我說：「農民已經武裝起來了，你有洋號，我有螺角；你有洋槍，我有刀矛，不但地主土豪劣紳奈我不得，就是一萬幾千軍隊，我們也不怕！」他這種說話，好像是一種示威和恐嚇。我心裏想，你怎會變得這樣快，又怎會有這樣的幼稚？我有六七年來的鬭爭經驗，難道就被你嚇倒了麼？因爲他是一個鄉黨的前輩，他正染着了民衆萬能的狂熱病，我祇好笑矣，不和他分辨什麼。

「宣傳鬭爭的激烈」黨的宣傳工作，都以民衆爲對象，而事實上無論口頭的宣傳，文字的宣傳，各人有各人的說法，却是彼此針鋒相對地，在那裏爭論。民衆聽了宣傳者的講演，有沒有了解所講的意義和發生什麼感想，演講的人也未必知道。但是民衆都是一樣的拍掌，一樣的吶喊。有人說：「民衆的意識和行動，多是被動的，盲從的，宣傳的效果，就是從這裏發生出來。」這話不無相當理由。梧州的民國日報是中共份子龍啓炎、周濬主持的。對於農工政策，自然竭力宣傳。後來省黨部宣傳部又辦了一張農民日報，好像是專門以農民爲宣傳對象的報紙，但是大家就打起筆墨官司來了。大家都以宣傳農工政策爲中心，而說法却完全兩樣。南甯的民國日報，起初是中共份子陳勉恕主持，因爲祭孔的風潮辭職了。省黨部改派毛飛去當社長。他的太太唐竹村及現在東南日報的社長劉湘女，都在那報館裏擔任工作。宣傳理論的衝突，是國共分裂的先聲。我記得有一次何民魂寫了一個宣傳的小冊子，封面的標題上側，

作了一個這樣符號似的「十」圖案，在省黨部委員會議裏，陳立亞委員就提出質問，說這是右傾的宣傳表示。我那時正擔任宣傳部長。對他說：「是不是它的內容有什麼不妥的地方？」他說：「不管內容怎樣，那東西向右，就是表示右傾，廣州方面出版的冊子，那東西「十」都是向左的，」他要宣傳部將封面式樣改過。我說：「你立在正面上看，不是向左的麼？」我不管他怎樣，把他發行出去，弄得他們很不高興。其實我心中並沒有左和右的問題存在。寫的人也未必有左右的意思存在，而他們就在這小問題上着眼，好像汪精衛醉後要我向左邊走，走到路不通行一樣的有趣，這就可見那時鬭爭的尖銳化了。

【新舊思想的衝突】青年運動也是那時候的一種社會狂潮。不過知識青年畢竟是理智的，他們雖然力求思想的解放，但是除了少數地方發生罷課風潮之外，都沒有很大的問題。而且解除禮教束縛的運動，已不自那時始，在社會上也不覺得怎樣稀奇。不過一班男女青年工作同志，對於戀愛問題，要比以前更解放些。記得在梧州北山公園，有兩個青年男女同志，因戀愛行為，被人撞見，起了一次很大的風潮。老一輩的人，尤其是反對本黨及各種民衆運動的人，都起來抨擊。甚至駐在梧州的軍事重要幹部，也捲入糾紛的旋渦，這本是一個私人的平常問題，但是廣西的風氣，比不得他省的開通，更比不得外國的開通，男女雙方，公然在公園裏發生戀愛的行為，總不免有些驚世駭俗，難怪會鬧出很大的風潮來！自從這個問題發生之後，無論工農和青年，都有一個新舊對峙的壁壘。尤其是農地地主士紳來得更厲害，他們不但有勢力，而且有武力，政府若不善為處置，則像東關那樣流血的事件，就可以到處發生。我處在這種環境當中，應付頗為困難，費了許久的考慮，認為應先就領導的人事上，予以調整，則下層的糾紛，自可減少。於是不動聲色的選擇那些最易引起問題的人，組織一個北伐軍的慰勞隊，不論其背景如何，一起放在裏面。由第七軍政治部主任黃日葵率領他們出發，到武漢去慰勞，順便就留他們在前方工作。這樣，在本省境內便少了許多事情。但是仍有許多不肯出去的，他們是沒有什麼名義，而仍是隱

藏在工農的羣衆裏，更積極地繼續幹他們的秘密工作。

「我對於中共份子的態度」那時，廣東方面的情形，比廣西更爲複雜。北伐軍雖然佔領了武漢，而國共的裂痕，更因此加深，已經成爲公開的事實了。我在廣西方面的態度，對人，無論國民黨的同志也好，共產黨的同志也好，我都是一樣的親近。除了他自己公開承認之外，根本不去研究他的背景。對事，祇要是合理而做得通的，我也不論誰的建議，都一樣的採納。所以中共份子，有許多關於他們內幕的話，也肯對我說，也許是有拉攏和利用我的企圖，存乎其間。當武漢圍得最厲害國共分裂以前不久的時候，有一個中共的份子秘密對我說：「你不想比蔣介石享受更大的名譽，得到更多人的擁護麼？」我聽了，愕然不知所謂。他說：「現在具有完全統治一省能力的人，祇你一個，廣西內部的問題，一切都由你主宰。你要如何做，就如何的做，祇要你下一個命令，實行 孫總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則廣西極大多數的人，都要真誠的擁護你。你簡直同蘇聯的列寧一樣的偉大。而且廣西是一個貧窮的省份，現在一切經費的來源，以烟賭捐的收入爲大宗，這在革命政府的財政上，是不應該的。如果不要這種收入，又無其他的抵補，則廣西建設，即絕無發展的可能。如果能夠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由農民手裏徵收百分之三十的生產稅，農民一定是很願意的。廣西全年土地的生產額，照人口推算，約爲五千萬擔至六千萬擔。則政府每年至少可收一千五百萬擔穀子，每擔以三元計算，可得四千五百萬元，比你現在的收入要增加兩倍，豈不是一切建設的財政問題都解決了麼？」他這番話，乍然聽了，不無相當理由，並且是相當動聽的。我並不立刻回絕他，祇是拿事實問題來反問他。我說：「廣西全省有幾多地主，有幾多自耕農，有幾多個農，你可知道？」他說：「不很詳細，但據估計，總是佃農最多，自耕農亦不少，地主最少。」我說：「地主要反抗這個政策，是不必說了。就是自耕農，也不會服從的。因爲過去的糧稅，至多不過十一之徵，現在忽然要做到十分之三，他們願意麼？這班自耕農，多是與地主站在一條

戰線上的，他們的力量，也是不可輕視的啊！」他說：「各地農民協會，多已組織了，爲他們本身的利益，一定能夠受我們的指導，而拚命奮鬥。此外，還有政府的軍隊，作他們的後盾。那些士兵，都是個農的子弟，也一定要爲他本身利益而努力。所以這種政策的推行，是沒有問題的。」我說：「據我所知，廣西的自耕農很多，要是和地主聯合起來，總要佔全農民的半數，而且他們本身的勢力武力，比到佃農，不知要強到多少倍。士兵當中，也不能說完全是個農子弟，還有很多自耕農的子弟。同時，士兵們對於階級鬥爭是毫無認識。歷史養成的服從長官命令的習慣，一下子那裏就會得改變過來。至於官長呢，十分之九是家裏有幾畝田的小地主子弟，其餘十分之一沒有土地的長官，既然當了官長，也想置幾畝田，作他下半世的生活基礎。必不會盲目服從我的命令，去毀滅他們既有的生活基礎與生活的希望。甚至因防我剝削他們的權利，而仇視我，反抗我，到那時候，我又怎樣辦呢？我本來也是一個小地主，縱然我能超階級的不顧成敗的做法，他們就肯跟着這樣做麼？恐怕於事無濟，反要弄到遍地流血，全省紛擾，比民十至民十五間的情形，還要混亂得多呢！你要知道，我們經過五年的苦鬥，才得到今日這個局面。萬一因此而再鬧出四分五裂的慘禍，這個責任，我能負得起嗎？」這番話，說得他無話可說。但我對此事，祇當作一番有價值有興趣的辯論。對他本人，根本談不上什麼善惡惡意的。

【與李任潮秘密赴上海】到了十六年的二三月間，情形更惡化了！東蘭革拔羣的案件，確定了八項的處理辦法，祇能夠苟安一時。至是他更露骨的宣傳共產主義，實行共產主義。本縣及鄰縣未曾參加的人，都紛紛電請剿辦。我仍令縣查辦，得到許多事實的證據，與他們電控的事實完全不同，而我們的黨內意見，更爲紛歧。無論那一個民衆團體，與政府機關都暗地形成兩個戰線。我個人站在兩條陣線的上面，可以說那時候雙方都擁護我，雙方都懷疑我，因爲他們都不能透澈明白我的最後態度，大約是十六年四月的一二日，李任潮有一個急電給我，要我立刻到廣州去。我不知發生什麼急變，亦不能查閱甚

麼理由，便立刻專輪到達廣州。那時，我的妻子正是生產大兒德芳不久，住在珠江頤養園。所以我到廣州，並不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到後與李任潮見面，他很秘密的出示蔣先生由南昌來的電報，要我們到上海和他見面，商量重要問題。電文內雖不說明什麼問題，但問題的輪廓，我們都已知道了。李任潮問我的意見，我將廣西內部現時的情形告訴他。他說：「到香港上海的船票，都準備好了，下午就要動身，」並關照我有跡要非常秘密。我回家對我妻子說明要立刻秘密去上海的話，她說：「你那滿面的長鬚，那一個不認識你？掛一個招牌在面上，還說什麼秘密的行動呢？不如就將鬚鬚剃去吧！」我聽了她的話，覺得很有道理，於是匆匆忙忙的將鬚鬚剃去。這六年多相隨不捨的東西，至是不能不割棄了。心中不免有些難過。我對妻子說：「把牠保存起來，作爲一個紀念物。」她說：「還保存什麼，扔到江中就是了。」他的心中好像同我是另外一個想法啊！

【在上海舉行清黨會議】我上了省港輪船的泰山號，李任潮已在船上了。同行的似乎有馮竹萬、陳孚木兩人，此外還有一兩個隨從，開船後，夜裏十點多鐘就到了香港，當時就船過船的搬到比亞士總統號船上。我自民國四年冬天南回時，經過了香港，已經是十二個年頭，沒有再到此地，不知它現在有了什麼進步？又不知在大罷工風潮之後，受到什麼影響？可惜沒有機會去玩，祇能站在九龍碼頭船上甲板，遠望香島的山光水色而已。船在第二日十點多鐘開行了。我當學生時代，來往港滬，坐的都是太古仔（粵語太古一二千噸的小船）。一出鯉魚門，就感覺顛簸不堪，現在坐在一二萬噸的總統號船，比較平穩舒適得多。一方面是物質的進步，一方面是生活的變化，就覺得前後完全兩樣了。船上的侍役告訴我們：「洪兆麟是在清船上被刺死的，道行刺的烈士，叫做草德，他刺洪之後，就舍槍自盡。他刺洪的動機，有的說是激於義憤，有的說為報私仇，究竟爲的什麼，他已身死，也就無從確定了。」他的同行們（有些）都非常敬重他，在他們公共集會的場所，還懸着他的照片。輪船到了上海，大約是四月的

七八號，船尚未靠碼頭，就有上海市長張伯璽（定璽）乘了一個小火輪，並有些武裝兵到來接我們。我們過了小火輪，他說：「現在情勢非常緊張，不可到租界裏去住，以免發生意外！」即將小火輪一直開到高昌廟的碼頭，然後乘汽車到兵工廠內北伐軍東路軍白劍生的前線總指揮部裏面。李德鄰也住在那裏，大家見面之後，自有一番款敘。那時蔣先生亦已由南昌秘密到達上海，駐在什麼極秘密的地方，沒有人知道。不久，蔣先生也到東路前敵指揮部會面。當時，除了我們報告一些兩廣的情形之外，對於清黨問題還未有如何的決定。約摸是第二日或第三日吧，就在離法租界不遠的舊市政府內，舉行清黨會議，由吳稚暉、蔡子民、張靜江、李石曾等四監委，提出一個對共產黨破壞兩黨團結的彈劾書，作為法律上的根據，決定舉行清黨運動。並否認武漢的中央，另在南京召集中央全體會議，組織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當日參加這個會議的人，除蔣先生外，可以記憶的，中央委員是吳稚暉、蔡子民、張靜江、李石曾、陳果夫、李任潮、李德鄰及我，不過十來個人，另外還有軍事的首長，如白劍生等數人。會議的形式很簡單，也沒有什麼辯論，就很快的決定了。

〔廣西首先實行清黨〕正在開會的那時間裏，李任潮和我，接到鄧演達由漢口發來的一封信，大意是責任潮同我，身膺革命後方疆圉重寄，未奉中央命令（指武漢中央），擅自參加非法的會議（指上海清黨會議）要我們顧全革命的歷史，不要違犯了黨的紀律。含有責難和規勸的話氣，我覺得他的用意，未嘗不誠懇，但大局已經決定，以後的友情，已化為敵意了。我們亦不予答復。清黨會議結束以後，我就打電報回廣西去，將情形告知黃旭初伍展空等。因為我離省後，一切的軍事問題，都是他們在那裏支持。他們接得電報之後，在四月十二日立刻就開始行動，將梁六度等十三人逮捕，並通緝黃家植等數人。所以廣西的清黨，比其他省份還早三天。在這十幾個逮捕的人之中，照我平時的觀察，除了少數幾人之外，大多是投機份子。就他們的歷史，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政治慾望，他們的生活行動來看，都不

像是實行工農專政的人物，而是要藉此造成他們的社會地位，進而獲得政治上的地位，以遂其私圖。因為他們過去同軍政方面對峙得太尖銳化了，自然是首先被注意的目標。所以在軍部方面，不等到我回來，就將他們處決了。也許怕我回來之後，其中有好幾個人，我會把他們釋放了。在一個時代方向大轉變的時候，往往有許多無辜的人被犧牲的。這是他們的不幸，也可以說是他們的幸運，因為替他們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名字了。同時上海方面南京方面，都開始行動，一時那些叫囂市上的烏合組織，好似蠅軍一樣，一趕就散，並不要費很大的力氣。

〔赴蕪湖軍次處理第七軍政治工作〕大約是四月十六七號，蔣先生邀我們同車到南京。這時，南京克復未久，劫後離亂痕跡，隨處都可以看到。我們由下關一直乘汽車到前清穆督衙門（即以後的國民政府），沿途狹隘的街道，還與我十二年以前見到的一樣。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就設在那裏，連普通的陳設都沒有。我和朱一民參謀長住在一個空闊的大樓上，除了兩張床鋪及兩張辦公桌之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了，實在寂寞得很。這時，第七軍駐在蕪湖附近，蔣先生與李德鄰都希望我到部隊去說說話。因為我是七軍的黨代表，一切政治工作人員，直接間接，均與我發生關係。而那時候軍隊的政治工作，的確是部隊的潛力發動機，在一個重大變革之際，官兵心理，總不免有所動搖或迷惑的地方。所以要我去對他們說話，正是希望使軍心安定的意思。我乘專輪到了蕪湖，同夏煦蒼、胡宗鐸、鍾祖培、李明瑞等團營長以上的人，都見面了。我除了對他們慰勞之外，並將清黨的意思向他們說明，他們對我說：「在未聽到黨代表報告以前，一切情形都不很明白。軍長（即李德鄰）又不在軍中，突然接到清黨的命令，大家都很懷疑，現在才明白了。我們對兩公都是一樣服從的。現在兩公的意見一樣，我們就放心了。」他們又說：「自從這個問題發生之後，部隊的軍風紀都渙散了許多，真是可惜！」我隨後將政治部應留應去的人員決定了。應留的叫他們安心工作，應去的亦不為難他們，使自由離開。在人情上，這些總努力

共患難的人，一旦將他們無情的拋棄，不免感到難受，這樣的處置，總算是一個公私兩全的辦法。我在蕪湖工作完畢，仍舊回到南京，將一切情形，向蔣先生及李德鄰報告，他們都覺得很放心。

【風雨中驅車遊西湖】我在南京，既沒有什麼名義，又沒有什麼工作，頗感苦悶。便要求回到上海走走，但說明仍同南京來的。到了上海，住在東亞酒店。我於十二年前經過上海的時候，大馬路的三大公司，正在打地樁，開始建築，不料現在已經是樓接雲霄，遊人羣集，成為上海或中國那時最大的建築物了。其他的地方，也正在積極的進展中，與以前已多不同。在那時候，廣西屢次來電促我回去，我就發電報告蔣先生，不再同南京去。蔣先生命王世和同志帶了一封親筆的信給我，信內大意說：「革命正在危險的關頭，萬一不幸，則國族泯亡；吾等胥負其責。」無非要我急回南京的意思。我當時也的確困難，我負有廣西一省黨政軍的全部責任，在這個大變動之下，不知廣西變成如何的狀態，心中頗為憂念。於是我們將必須回去的理由，呈復蔣先生。趁着未起程前，抽暇赴杭一遊。在滬杭路南站上車，買的是頭等票。車廂上的沙發椅，不知是那方面的軍隊，將那皮面扯去了，祇剩下一個鐵架子。窗子上的玻璃，也打碎了。在風風雨雨中，到了杭州。車中遇見杭州市的公安局長章烈，是我的同學。我清楚的認識他，他好像也有些認識我，但是我因為行動的祕密，時間的短促，不與他招呼，恐怕引起無謂的應酬。到杭後正值大雨，雇了一輛汽車，沿西湖各處，作了一個極迅速的巡視，並到街上買了些綢緞，在舖子裏吃了一頓飯，就乘下午的火車回上海去了。雨中坐汽車遊西湖，它是怎樣一副面目，實在弄不清楚，也算是我平生一個有趣的故事！

【廣西二全大會的三項重要決議】我匆匆趕回南寧，大約已是四月下旬，所有事務，他們都處理得很妥當。除了十幾個人遭遇不幸之外，其餘都不加追究了。自此之後，廣西的黨務政治，在人事和組織方面，都有些更動。省黨部因為第一屆執監委員會任期已滿，依照本黨總章的規定，三月間召集第二次

全省代表大會，檢討過去黨務工作，並選舉第二屆執監委員。因為兩黨時有鬭爭問題發生，所以人事必須調整。人事的調整，亦可以說就是清黨的先聲。

第二次全省代表大會選舉的結果，我和黃旭初、伍展空、盤珠祁、黃華表、葉光燾、俞作柏、李岱年、黃同仇、曾象賢、馮冠倫等十一人，當選為執行委員，蘇民、劉嘉彤、葉懷青等三人為候補執行委員，黃薊、朱朝森、陳錫光、蒙民偉、黃岷山等五人為監察委員。執行委員會除第一屆分設各部之外，並加設訓練部，專負訓練黨員之責任。當時互推我為訓練部長，黃華表為宣傳部長，盤珠祁為青年部長，俞作柏為農民部長（俞不久辭職以伍展空繼任），黃旭初為工人部長，馮冠倫為商民部長，劉嘉彤為婦女部長，蘇文為組織部長，在這一次代表大會裏，有三個重要的決議案：第一、是將全省的田賦附加一倍，作為教育經費，這是全省人民非常擁護的。因為廣西教育，素稱落後，若不寬籌經費，將無從發展，而且當時廣西的賦額很輕，附加一倍，並不為重，這是廣西教育的奠基石。第二、是澈底的整理黨務，將所有跨黨份子，並那些投機份子土豪劣紳一併清除出去。整理的結果，全省的黨員，減少了一半，大約不到兩萬人。此後黨的糾紛，以及黨政的糾紛，就大大的減少了。第三、是澈底實行本黨的二五減租政策，此事當時無論在黨政方面，或社會方面，都有些人會替地主說話的。以為清黨之後，是不必再為農民做這個工夫。我對於這種意見，很不以為然。因為清黨運動，僅是對共黨的制裁問題，我們二五減租的政策，並不因而改變，更惟有使農民能獲得真正的利益，然後可以安定社會人心，免致中共藉口。所以我對於這個意見，非常堅持，絕對不肯放鬆。我並曾另訂一種辦法，另由一個委員會去處理。並為顧慮梧州、潯州、玉林各屬，地主多，租額過重，糾紛必更多，特派李岱年同志主持其事，務必澈底解決。地方上見我如此堅決，也就很順利的進行。所以我很願慮會發生問題的那個地方，並沒有發生什麼問題。這是我衷心引為快慰的一件事。不久，省黨部的執監委員奉中央派赴各區任指導的工作，政

府方面亦因黨的問題而局部改組。俞作柏辭農工廳長職，出洋考察，由蘇民代理。旋將農工廳撤銷，關於農工行政，歸併於民建兩廳辦理。雷沛鴻辭教育廳長職，出洋考察，由黃華表代理。

東蘭的草拔羣，自清黨之後，又大爲活動，政府雖屢經派兵鎮壓，仍未能杜絕根株。到了十八年以後，廣西政局變動，遂與李明瑞、俞作豫等連爲一氣，在左右江一帶，組織蘇維埃政府，完全揭露其真面目。然因此反而大失各地民衆的同情。後被省軍壓迫，不能立足，而挺走江西，與中共合流。這股廣西的「土共」，卒爲江西的中央所解決，這是後話。

【赴南京參加中央特別會議】大約是那年的五月底，我又到南京去參加中央的一個特別會議，及徐州軍事會議。因爲自四月十二日清黨之後，南京方面，僅成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與武漢形成軍事的對峙形勢，中央黨部及中央政府的重大問題，尙未解決。在政治方面，武漢仍舊擁有多數的中央委員，與中央的名號。在軍隊方面，寧方有第一軍、第二軍、第三軍、第六軍、第七軍、第十軍及兩廣後方之四、五、七等軍的實力，漢方則有第四軍、第八軍、第九軍、第十一軍的實力。馮煥章（玉祥）的西北軍自參加革命之後，雖然出兵到了洛陽鄭州，但是對於清黨問題及寧漢兩方，尙未有顯明的表示，情形還是很混沌。經過了一段的時間，有好多在武漢的中央委員，也就回到南京來。究竟到了多少，是否過了半數，我就記不清了。於是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在南京成立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並奠都南京，與武漢方面形成政治上的對立。但軍事上，仍未至破裂衝突。這時孫傳芳在山東，張作霖在鄭州以北，兵力尙很雄厚，大敵既當前，內部又是糾紛重重，情勢頗爲險惡。於是遂有人提議，寧漢雙方，同時出兵北伐，南京沿津浦路出兵，武漢沿平漢路出兵，先解決了當面的敵人，然後再解決內部的糾紛。因此乃有徐州的軍事會議。蔣先生及許多與軍事有關的人都到了徐州，希望馮煥章親來參加，而馮氏并未親到，結果並不十分圓滿。尤其武漢方面的謠言很多，說寧方已與孫傳芳勾結，藉口派兵向長江下流壓迫，

孫傳芳部亦著着向南進迫，遂無結果而散。以後遂有南京龍潭之大戰，與西征之戰事。這都是徐州會議所演變後的結果。

我回到廣州，害了很厲害的肺炎，留在廣州養病。那時廣州的兵力不敷分配，李任潮要調兵到廣東。不久武漢清黨，四軍分裂，葉賀回粵，我又奉命率兵迎擊葉賀，而連續不斷的作戰，直至民國二十年，我方跳出了這個漩渦。這都是國共分裂的前因後果，回憶起來，真是國家歷史上的一個大慘劇呵！

【回憶辦理黨務經過的感想】我自入黨而當選中央委員，而辦理黨務，到現在已經廿二年了！我在宣統二三年至民國十二年這一個階段裏，雖有革命的意志與行動，但都是本着個人的良知良能，並未參加了黨的組織，與接受黨的訓練，直到十二年，才加盟入黨。不久，就被選中央委員，可以說不是先有個黨的意識，參加黨的組織，而後才有革命的行動。而是我個人先有革命的行動表現，然後才加入了黨的組織。關於這，不但我個人如此，就是現在黨裏很多的高級幹部同志，也都如此。但因此，就很容易使個人的意志行動，影響黨的意志行動。這種情形，雖然在一時事實上不可避免，而在事後必須設法予以補救。照我辦黨的經驗來說，本黨所吸收的黨員，僅僅是注重他入黨前對於黨的傾向和認識如何，而不注重入黨後之改造與訓練，所以一個黨員在未入黨之前，與既入黨之後，他的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分別，這便是缺乏訓練的緣故。尤其沒有統一的進步的指導和訓練。在清黨運動之後，雖然各省黨部有訓練部的組織，但不久又撤銷了。在廣西曾經開設過黨務學校，訓練黨的幹部，但並沒有訓練過黨員。姑不論黨校的內容怎樣，而就表面上觀察，確已收到了若干效果，現在廣西好些黨的幹部，都是那時候訓練出來的。這可證明訓練的效果，也可反證沒有訓練的缺點。

黨是一個政治團體，要求他能不斷的進步，黨的成員，必須不斷的發生新陳代謝的作用，甚至要不斷鼓舞其鬥爭的精神。古人所謂廣收、慎選、勤教、嚴繩四個用人的原則，黨的人事方面，是同樣適用

的。黨員的廣收，我們是做到了，慎選却未能做到。我記得汪精衛在梧州宣傳工作人員養成所講演，曾舉洪兆麟的笑話。他說：「總理要陳炯明部下軍官入黨，有一日，洪兆麟向總理報告，說是全師都入黨了。」當將黨員名冊呈上，就是他全師官兵的名冊。到後來，背叛總理襲擊總統府的，也就是洪兆麟這一師的官兵。」可見廣收而不慎選，已不是良好的辦法，若不能勤教嚴繩，就是慎選得來的，也要發生問題。過去本黨對於黨員未能做到慎選、勤教、嚴繩的工夫，不能不算是組訓工作上的一個極大的缺點。

十六年的清黨運動，固然是本黨的不幸！亦是國家的大不幸，如果一面清除共黨，同時復將本黨裏的腐化落伍份子逐步淘汰了去，則黨的進步，必非淺鮮。可惜結果並不如此。因為清除共黨的緣故，反將許多腐化落伍份子吸收進來。這樣的做法，雖然亦曾得到一時之利，同樣的也受了不少的害。因為這樣兼容并包的結果，政治上經濟上便不能有顯明堅定的政策，來策勵黨員，推進革命，而含糊的過了十八個年頭。黨在這種狀態之下，表面上雖然很平靜，未嘗發生什麼糾紛，然而暗潮仍是到處潛伏着。為顧慮黨的糾紛發生，凡事都是遷就敷衍，不敢積極進行，連黨的本身應行的幹部選舉，或是工作批評，都停頓了好久。現在可說是祇有黨部而無黨員，祇有上級黨部的意志，而無黨員的意志，我總覺民主選舉制，不但可以促起下級的進步，亦可以促起上級的進步。可惜這十幾年內都未澈底實施，進步二字，又從那裏談起呢？

十五、十六、十七這幾年間，省黨部對於各同級政府之執行黨的政策，都是處於監督的地位的。政府對於黨部的地位，也相當的尊重。在這種新的關係之下，彼此各盡其應盡的責任，政治便獲得了長足的進展。自此以後，黨政關係，逐漸改變，這不是說政府漠視黨部，亦不是說黨部不與政府合作，而是成為彼此相對的迴旋，不是平行的激進。在這種狀態之下，不但政治無進步，黨務的前途，更不可樂觀。

。我們必須在黨的實質上及推動的方法上，急謀改進，然後方可挽救當前所伏的危機。

總理以三民主義，及其他遺教，不能視同耶穌的聖經，而是進步的政治指導原則。這些遺教，產生到現在，雖僅僅廿多年的時間，但在變動劇烈的現代，這許多指示，與現實情形，已經有了很多出入的地方。本黨黨員，應該本着總理指示的原則，悉心研究，在實施的方法上，尤應隨時加以補正，使其隨時代的演進而產生新的政策與辦法。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黨員對主義的認識，與時代的認識，一方面並可刷新社會之觀聽，獲得大眾的擁護，而能迅求實現。可惜二十多年來，我們都是拿它作引證的典據，不是拿它作更進步的基礎。

以上所述，是我寫完我辦理黨務工作的回憶以後的第一個感想，並不是我對於任何方面的批評和不滿。

自從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將其產黨員容納在國民黨的裏面，而國民革命同時有了很大的進展。許多人說：「國民革命軍北伐進展的迅速，是容共的效果。」我認爲並不如此簡單，而是有其他的因素存在裏面。最重要的，還是由於時代演變，迫使軍閥自趨於崩潰。我們檢討民元以後，至十三年以前，北洋以及各省軍閥的崩潰，都並不是受某一個政黨直接攻擊的影響。廣西陸譚的崩潰，時在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之前。陸譚的消滅，也不是全靠黨的力量。打擊陸譚的主力，是在那個時代中自然產生的一種新力量。這種新的力量，是應乎時代潮流而起，隨時可以接受某一個政黨或某一個政治集團的正確領導，完成其時代所賦予的使命，並不是一件很希奇的事。所以我對於國共的分裂，以國家的立場看，好像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情。但在時代潮流上看，却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因爲本來是兩個政黨，兩個主義。除非某一個黨將它的組織取消，將它的主義取消，或可作比較永久的合作。否則，總是很快就要破裂的。在容共時代，共產黨中人，對於革命的工作，不能說是不努力，然而國民黨的同志，又何嘗不努力？不過

各有各的主張，各爲各的目標而努力。中間有一時，雖然努力的目標，是完全趨於一致，但過了那個階段，便又各幹各的。好像一艘沿途搭客的船，同船的乘客，在某一段行程上，路線相同，但是過此之後，就分道揚鑣，能夠共同到達終點的人，却沒有幾個。不但兩個政黨如此，就是同屬一黨之內，又何嘗沒有這種情形呢？晚近各民主國家的各黨合作，僅是政治上一時的各黨協議的分工，而不是各黨澈底的溶合。各黨政治上的協議，是臨時的，而各黨組織的存在，却是永久的。

國共的合作，並不是兩黨有政治上的協議，而是兩黨組織上的混合，其間誰想佔便宜，誰不想佔便宜，誰含有惡意，誰不含有惡意，我都不去追論他。廣西早在十五年的一月，就有章拔羣的佔領縣城，反對政府，以後更不斷的擴大起來。當時雖有黨政軍三方派員調解，而終無結果。平心而論，章拔羣在共產黨的立場上，也許不能不有此種作風。但與我們的政治體系，互相抵觸，無論如何，不能容許他這樣的胡幹。我對於好些中共的同志，在未破裂前，都是很好的朋友，到了兩黨真正衝突的時候，彼此的友誼，就無法維持了！黃日葵同志（第七軍政治部主任）臨死的時候，對人說：「假使不是黨的關係，必不致和我分離，而真誠的願意爲我始終努力的。」在我又何嘗不是這樣的感想呢！可見在感情上講政治，往往會陷於不幸的悲痛。流血的悲慘，與感情上的痛苦，都是同樣的不幸啊！現在正值國家危難的時候，團結是必要的，合作是必要的。以前的痛苦與不幸，已經飽嘗過了。我想要團結合作，定要抱定不被壞統一的目標，在避免流血不重感情上去講求，才有希望。這就是民主精神的真諦，亦是全國人士所早夕祈求者也。這是我寫完以前辦理黨務經過後的第二個感想。

十 新粵桂戰事

「標題的詮釋」這裏所謂「新粵桂戰事」，自然是因爲以前曾經有過舊的粵桂戰事，所以特別標出一個新字，以示區別。蓋自民國五年以後，一直到民國十二年，這七八年間，不是廣西的軍隊去打廣東，便是廣東的軍隊來打廣西。在這種循環的內亂當中，我們如果站在老百姓的地位，用歷史的眼光來觀察，是分不出甚麼正統與叛逆，是非與曲直，而祇是歷史事實的蛻變，社會現象的反映而已。關於以往的事實，因爲我沒有主動的參加，祇能在前面作概略的敘述，爲使寫作界限明顯起見，名之曰「舊粵桂戰事」。自民國十六年至十九年，兩廣的戰事，仍舊繼續的循環的發生，雖然作戰的地點不限兩廣，而擴及於湖南江西，但考其戰事發生的原因，總由於兩廣問題而引起。作戰的雙方，亦是兩廣的部隊。因此我仍本着前面所說的立場與觀點，名之曰「新粵桂戰事」。這是我在追述這一段事實的經過以前，要首先聲明的。

兩廣自民國十五年革命之後，似乎不應該再有戰事發生，而事實上戰爭又延長四五年之久。這不但局外人不易了解的謎，就是我們局內人，亦祇是莫名其妙地打來打去。現在追想當時所謂原因與理由，不過是一種正面的直覺的威觸，此外還有很重要與很微妙的因素存在裏面。此種因素的發酵，正好成功那些正面的直覺的劇本演出的原因與理由。

「殲滅葉賀之役的經過」民國十六年，革命軍底定南京，因國共分裂，發生了清黨運動。但是共產黨在廣東方面的潛勢力，還是很大。尤其是在東江方面的海豐陸豐等地，在他們操縱之下，各處的農民組織，已普遍發展，繼而發生了武裝的暴動。這時廣東方面的國民革命軍，大多數已出發北伐，後方非

常空虛，本黨廣州政治分會的主席李任潮，并負坐鎮革命後方根據地的責任。我也是政治分會委員之一，因患肺炎，在廣州養病。李任潮因為廣東情形複雜，兵力不敷分佈，在是年四五月間，要我派兵一師到廣東增防。當時廣西內部，很是安定，除了李德鄰率領第七軍北伐之外，後方還留有伍展空、黃旭初、呂煥炎等三個師，及幾個獨立團，擔負維持地方治安的責任，自綽有餘力。我在公館上，私情上，都不能不接受李任潮的意見。於是派黃旭初一師到廣東，駐在北江附近。這時武漢方面，汪精衛與共產黨已經鬧翻，第四軍各師亦在九江、南昌附近分裂。張向華（發奎）、黃琪翔一派的部隊，沿贛江由贛回粵，陳真如（銘樞）、蔣光鼐、蔡廷楷一派的部隊，由贛東轉入福建，葉挺、賀龍、周士棟一派的部隊，與第三軍之朱德部合流，公開共產旗幟，由撫河入粵都、瑞金、會昌、鄱縣、尋鄔、蕉嶺、平遠、下潮梅、進駐東江，與海陸豐之農民軍會合，進圖廣州。當時廣州方面，對張同華之回粵，自然表示歡迎，而對於葉賀等，則派隊阻擊。由錢慕尹（大鈞）率領兩師，進駐會昌，黃旭初一師繼續向尋鄩前進，而對於葉賀等，退至信豐。黃師在尋鄩初戰亦不利，轉守會昌以南之筠門嶺，與之再戰。葉賀見我有備，乃由筠門嶺轉入福建之長汀、武平、上杭，有由大浦縣折入潮梅之勢。李任潮兄前方失利，要我加兵向贛南增援，並要我擔任第八路前敵總指揮名義，親往指揮。那時我正当大病之後，尚未完全恢復健康。但局勢嚴重，亦祇好勉強出發，親率呂煥炎一師，續向贛南挺進。行至南雄，知葉賀部隊已轉入閩境，於是命黃旭初師退至尋鄩附近集中，錢慕尹部經三南至梅縣附近集中，我親率呂煥炎師，經信豐，進駐尋鄩，以防葉賀由蕉嶺、平遠折入梅縣。同時廣州方面，亦令陳伯南、薛伯陵兩師進駐興寧、五華。我到尋鄩後，繼續進駐平遠、蕉嶺。因情況不明，乃派營長黃鶴齡率兵一營，晝夜兼程前往大浦，實行威力搜索。據報：葉賀全部皆由大浦三河壩、沿水路直下潮州、汕頭。三河壩僅有朱德、周士棟等部留駐。該營並擄獲政工人員男女數十人，訊問之下，情況主為明瞭。我得此情報，即全部進駐梅

縣，計劃除以饒墓尹部由梅縣進至松口鎮，牽制朱周在三河壩部隊，並掩護我之側背外。我率黃呂兩師，越過潮州與梅縣間之高山、鰲魚嶺，直趨粵順縣，然後東進佔領潮州與三河壩中間的留隍圩（距潮州六十里），將潮州三河壩間水路交通線韓江截為兩段，使葉賀前後不能呼應。同時並要任潮令陳薛兩師進駐湯坑、揭陽，與我軍會同，向汕頭、潮州攻擊。廣州方面對於我這計劃，認為太冒險，蓋慮萬一葉賀再有部隊由三河壩向梅縣進攻，則我腹背受敵，勢難應付。並引以前戰例，凡進入潮汕不守梅縣者，無不失敗為言。殊不知我在前方，情況非常明瞭，葉賀幾乎全部由水路下潮汕，陸上必不注意，我乃圍而襲之，必有致勝把握。幾經爭論，始照我的計劃實行，果獲全勝。此役成功，當以黃營情報準確，為重要關鍵，由此可見情報與作戰關係之密切！

我於計劃商定後，即由梅縣出發，這完全是一條山僻樵徑，平時很少有人行走。由上羅衣至下羅衣中間四五十里，都是崎嶇險峻的山嶺。加以風雨載塗，人馬擁擠，墜崖傷斃者，時有發現。由梅縣到豐順縣城地圖上的距離，雖為九十餘里，直到次日黃昏，始得達到。當晚在嶺上露宿了一夜，實為我生平作戰行軍最艱苦的一次。到豐順後，次日，即東向進攻留隍圩。預料葉賀對此要點，必留兵據守，不意到達時，闕無一人。我仍將水路阻絕，以斷其交通。並悉葉賀僅留全部兵力三分之一及政治人員輜重等在潮州作為後方補給根據，以防我軍襲擊。其主力則趨揭陽，希圖先將陳伯南、薛伯陵兩師擊敗，與海陸豐農軍聯為一氣，然後回師再與我軍作戰，冀收各個擊破之效。殊不料我方動作迅速，反將彼各個擊破也！

我軍到達留隍圩，次日拂曉，即沿韓江右岸急進，於十二時左右，即到達潮州附近。敵軍在潮城北方高地，築壕固守。我以呂煥炎全部及黃旭初師之一部，向正面攻擊。另由許副師長宗武率黃師一部，繞至潮州城西南火車站，以防其由汕頭方面增援，於是展開激烈之爭奪戰。在這時候，適接陳伯南通報

，謂已於前一日在湯坑、揭陽之間，與葉賀主力接觸，戰況非常激烈，希望我派兵協助。我軍亦因戰鬪正殷，勢難分兵，唯有激勵將士，猛烈進攻，早日攻下潮州，然後分兵向揭陽方面增援。幾經衝殺，至黃昏時候，已將潮城完全佔領，守城敵軍除傷亡外，皆被繳械，並俘獲其大批政治人員，及全部之械彈輜重。次日，即向揭陽方面前進，以夾擊其主力。葉賀等知前後受敵，軍心動搖，亦已爲陳伯南、薛伯陵所擊敗。並知潮州已失，不能退回，乃轉向揭陽以南，沿海而西，向海陸豐潰竄，復爲陳薛等部追及包圍，全部繳械。其在三河壩附近朱周所部二千餘人，見大勢已去，乃隱竄入潮，投依范石生。蓋范朱皆爲滇人也。此時所剩僅千餘人耳。葉賀自南昌出發南下，沿途脅迫民衆相從，號稱五萬之衆，而實際上不過兩萬餘人，至是幾全部消滅，這是殲滅葉賀之役經過的概要。

「汕頭的社會風氣」我到了汕頭，有一種情形，使我至爲驚異！當我們初到的時候，地方士紳都殷勤前來探問，要籌多少軍餉？我說：「我的部隊，政府都有一定的餉項，無須在地方籌餉。」他們聽了我的答覆，好像爽然若有所失的樣子，我當時莫明其妙，何以不就地籌餉，反使地方紳士不高興呢？後來才知道其中內幕。原來汕頭是廣東富庶出名的地方，過去初來汕頭的部隊，多不攜餉項，而是就地籌給。於是就地籌餉，就成爲一種通例。此例一開，就有一般熱心爲軍隊籌餉的士紳，應運而起。他們并不是真心樂於幫助軍隊，而仍爲他們自己的荷包打算。譬如軍隊要籌餉十萬，他們就向商民攤派二十萬，除了交給軍隊十萬之外，其餘都是他們的好處。如果你責問他「何以要攤派二十萬？」他就回復道：「籌餉是沒有一定把握的，需要十萬，必須加派十萬，才可足數。」這種說法，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但是以此爲業的人，就故意誇張其詞，借此機會，混水摸魚，收取他們的盈利。這種陋弊，不但那時的好處，實在太多。難怪他們會推波助瀾，歡迎機關部隊，在地方攤派經費或實物了！

據說汕頭是全國白蘭地酒銷數最多的地方，這話也許是就人口比例銷售白蘭地數量而言。因為在那裏一切應酬宴會，白蘭地是一種必需品，由此可見汕頭的富庶與奢侈。所以從前的軍隊，都以得到這個防地爲無上的幸運。但同時在這個地方駐防久了的部隊，又沒有一個不被消滅，也幾乎成爲一個定例。我到了這裏，見地方環境如此惡劣，如果久住下去，不但軍隊本身要日漸腐化，而受天然的淘汰。就是對於友軍之間，也要發生磨擦。況且事實上已經發生了一些磨擦的現象，於是我決心將部隊調回。

【同師廣西】第四軍自葉賀公開分裂之後，下層潛伏的共黨分子，還是很多。他們不得志於軍事，便用挑撥離間的手段，希望內部發生問題，可以獲得利於活動的機會。尤其因爲我是消滅葉賀的人，更仇視得厲害，種種問題，暗地裏都集中到我身上。所有張黃方面的人物，表面上雖然和我仍舊融洽，而心裏已經發生極大的誤會。我見此情形，心裏私付，若是我的軍隊長居廣東，必定要發生不幸的衝突。而且我軍入粵，原是奉李任潮命令而來，係屬幫忙性質，對廣東根本沒有什麼野心。現在客觀的情勢上，既無駐兵的必要，而又生出許多是非。爲公爲私，都不合算。於是決心將部隊調回廣西，首先令黃旭初師由西江調梧州，呂煥炎師亦陸續集中北江，準備調回。我自己於八月間回桂。當時以爲如此處置，以前有些誤會，縱然不能當面解釋，事後亦必可得人原諒，孰知退讓的結果，仍不能避免戰事，誠出我意料之外。

【汪精衛的陰謀】我回廣西後，大約是八九月間，汪精衛陳公博等因爲不容於甯（南京）漢（漢口）也就逃回廣州。彼以北伐前在廣州及北伐後在漢口政治會議主席的地位，廣州的政分會，自然要表示歡迎。第四軍素來擁汪，支持更爲積極。但是廣州政分會的權限，祇限於兩廣區域，以汪精衛的野心，自然志不在此，而是要另開黨國的全局場面，像民國十五年以前那樣的開府廣州，以與南京的中央政府相抗衡。但因李任潮與第四軍有長遠的歷史關係，未便使用激烈的辦法。故一面製造空氣，說廣

州是太腐敗了，太不革命了，要求革命的真正成功，必須改造廣州的政治環境。一面與李任潮商量，要他自動的改革，也就是要他擁護自己在廣州開府的意思。此種內幕的醞釀，我回廣西後，一些也不知道。民國三十三年三月間，南岳會議後，我同李任潮張向華吳梧生（奇偉）同車回桂林，還談起這回事。張向華說：「向任公說盡了話，繼以流淚。」李任潮說：「我始終不知道你們對我說過的話，用意在什麼地方？」我想李任潮不是不知道他們的用意，而是不贊成汪精衛再開府廣州，以免破壞北伐的成功，破壞黨國的統一。我又問吳梧生說：「假使我被你們拿到了，會怎樣處置呢？」他說：「恐怕對不起！」我說：「爲什麼恨我到這樣地步？」他說：「在我們看兩廣的問題，你是一個幕後人，所以要先對付你。」我說：「豈不冤枉也？現在你可明白了呢！大家大笑起來。」

十月上旬，我在廣西忽然接到汪精衛的電報，說有種種問題要我到廣州去面商。我在那時以前，對汪不僅毫無惡感，而且相當的敬仰。所以接到電報後，也就毫不懷慮他有什麼惡意，立刻覆電「等輪前來。」並買了很多廣西的土產，如菓子狸海狗魚沙田柚之類，奉送他們，以表情意。十七日中午到達廣州。汪精衛約我下午四點鐘到大沙尾葵園的公館裏見面。我很誠意的依時到達，總以爲見面後，一定有很多重大問題商談。可是到了他的公館，見汪派許多人物都在座，祇作見面的招呼，態度非常沉默，似含有極嚴重的心事。尤其是陳公博何香凝的面部，表現出憤怒而張皇的樣子。我覺得情勢不好，又發現李任潮亦不在座，就開口問道：「李任潮不到會嗎？」汪回答說：「任潮急於要赴上海，已乘飛機趕起程，我等方才送行回來。季寬先生初到，路上辛苦了，一切事情，待明日商量吧。」我祇好興辭退出。一路上暗自猜想：「李任潮一定被他們用手段趕走了，又把我召來廣州，看他們那種情形，說不定會玩出什麼花樣對付我呢！」當時我這樣的想着，事變之後，才知道在葵園時，就有人主張把我扣留，也許汪精衛礙於情面，不便在他的公館內動手，橫直我到了廣州，已成籠中之鳥，釜內之魚，還能逃得出

去嗎？所以安心放我出門。事後回思，當時我如果被他們立刻扣留，那末除了束手待斃，還有什麼辦法？興念及此，不覺毛骨悚然！

「深夜的事變與脫險經過」我同吉祥路家中，就立刻想設法離開廣州，但是省港輪已經開行，陸路更走不通，祇好等待明早再說。那時內子蔡鳳珍產後數月，仍在廣州居住。我倆晚飯後，在陽臺上閒談，忽見馬路上不斷有汽車環繞我的公館遊行，速度很慢，車中的人時常向我公館顧盼。我對內子說：「氣候已很涼爽，為什麼還有人遊車河？」（即乘汽車兜風）說時，我心中已有些疑惑，恐怕是他們派來暗中監視我的。我倆談至十一點鐘，已經就睡，忽然馮竹萬進來要求接見。侍從人告訴他，我已經入睡了，可否明早再見？他說：「無論如何，要立刻叫醒一見！」我在樓上聽他的口氣，知道有重要事情發生，於是披衣下樓，兩人在扶梯上相值，他不及上樓，就說：「得到確實的消息，他們今天晚上將有舉動，目標完全在你身上，不管確實與否，今晚一定要避開為妥。我深夜冒險到來，就是爲了告訴你這兩句話！」說完，便匆匆下樓回去。我平日對馮竹萬頗敬重。彼處世持重，不苟言笑，說的話自然使我相信。加以今天日間所見的情況，判斷他報導的消息，是毫無疑問的，他們會在晚上暗算我。於是急急改裝出門，連我的妻子都沒有好好的安頓，使她們受到極大的恐怖與危險，也就想見我當時急迫的情形了！這時正是深夜十一時四十分鐘。

個人走出了公館，茫無所之。後來才想起石硯書楚琛住在西關很僻靜的地方，於是跑到他家裏去，兩人相對默坐，聽候情況的變化。並時時打電話到我的公館去探問，亦沒有事情發生。到了兩點鐘，東北方的槍聲，好像鞭炮一般的響了起來。我家的電話，再也搖不通了，就知道不幸的事件已經發生。我雖然一時脫了險，可是如何逃出廣州，還成問題。而且在石寓也是一個危險地方，他們不難搜查我辦事人員居住的地方。因此再行改裝，成一個鄉下人模樣，預備黎明就逃走。正在那個時候，就有人來報告

：我旅館的衛士，除死亡外，已全數被繳械，我的妻子尚被看守在樓上，辦事處亦被攻擊繳械。我得報後，心裏盤算，必須向江北逃走。因為我尚有一師人駐防在那裏，到了部隊，才有辦法。於是同石楚琛向西村車站走去。到站一間，據說：「今天火車停開。」也就知道他們對於北江方面，已有防備。就是三水一路，亦必是同樣的情形。於無可奈何之下，便轉到南澳（西村附近小鎮）石楚琛友人姓胡的家內，耽擱了大半日，想想終不是個辦法。必須轉回長堤方面，看省港輪船的情形，設法逃到香港，才是生路。走到十八埔，見有一班士兵，在那裏警戒檢查坐汽車通過的人，我一手夾雨傘。一手提一包藥材，土頭土腦的走過去，他們竟然毫不留意，被我揚長通過。但是離下午四點鐘開船的時間，還很長，西堤地方，耳目衆多，固然不宜久留，就是在任何地方停止等候，都易啓人懷疑。祇好在馬路上低頭緩步，一面察看他們對社會表示是怎樣的。行經永漢路，見那些政工人員，正在那裏張貼五顏六色的標語。第一條是「歡送李主席北上」，第二條就是「打倒黃紹竑」。以下各條，無非是列舉我種種罪狀，非得驅除不可的意思。反正我在他們勢力範圍之內，是不會也不可能抗辨的。我於是恍然明白他們所玩的，原來是這一套把戲，覺得好氣也好笑！想我在西南的政治舞臺，本來不過是個次要的角色，現在倒弄得我名聞全國，這也算是他們在替我捧場吧。我看了之後，仍回轉西堤，在離碼頭不遠的一個水果攤上徘徊着等候船上開船的號令。就要抽吊橋的時候，三步併作二步的，跨上輪船。在船上，碰見熟人甘心衛，他已不認識我了，我以肘觸他，大家才點頭示意。輪船徐徐開動，離開了岸邊，好像一條大魚，擺脫了腮邊的吊鈎，脫險游入大海一樣。而我呢，也正似一隻籠中飛鳥，已破籠凌空，獵者又何從弋獲呢？甘君祕密引我到一個房間裏，我的妻子及家人面現着憂思，在那裏默坐着。瞥見之下，真說不出是悲是喜！在十幾個小時之內，居然演出這種離奇曲折的情事，是做夢呢，還是在做戲？真連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了。

內人告訴我：昨晚自我離家後，大家非常不安，但又不敢外出。到了兩點鐘，槍聲大作，向衛兵駐所及我臥室射擊。她自己唯有緊抱着小孩，臥於床下。幸樓板係洋灰石子所造，不致穿透，得以保全性命。衛兵繳械後，槍聲停止。即由官長上樓搜查，搜遍全屋，找不到我的影子，大失所望。乃向她查問我的行蹤，她回答說：「晚飯後出去，並未回來。」直到次日下午，她仍被監禁着，於是對那看守的連長請革命應如何的遵守紀律，這種政治鬭爭，不應涉及婦人稚子的身上。一面將她的金銀首飾，及箱內萬餘元的廣西紙幣，都交與那連長保管，要求准她與小孩自由外出。連長至此，心為之動，遂准她母子離宅。她帶着孩子，狼狽的逃到船上，遇見了熟人，及那些家人，最後竟又和我團聚了。我聽了她脫險的經過，對她那種鐵定的態度，動人的言詞，與微妙的方法，終能打動對方，脫離虎口，使我衷心起了很深的敬佩！

「在港發表談話暴露事變真相」我逃到了香港，起初住在港商陳佐衡的家內，後來又搬到鄧彥華家中（前任廣州市公安局長），繼又自賃房屋，在半月之間，遷移了四處地方。無非使行蹤秘密，免再被他們暗算的意思。到港後三日內，廣州政治分會的委員，如戴季陶邵元冲等，以及李任潮各親信幹部，都避到香港來。並有飛鷹艦長舒宗鑑乘艦武裝衝出虎門等要鑒。我於是將這次事變的前因後果，作了一篇很長的談話，在香港各報發表。社會人士才知道事實的真相，各方面對汪精衛的反感，便日甚一日了。首先是吳稚暉先生撰文斥責汪精衛等受共產黨的利用，並指他們是灰色的共產黨，認這次事變，完全是為葉賀洩憤，以後必有更重要的演變，勸國人注意。

我在香港，見各方反應良好，急想回廣西去。但西江已被封鎖，檢查非常嚴密，不易通過，乃繞道安南，由龍州回南寧，隨下柳州，部署軍事。這時駐在北江的我軍，皆已退回梧州，彼此就在西江形成對峙之勢。可是雙方都沒有什麼名目，可以開始打仗，祇是在那裏磨拳擦掌，等候導火線的燃燒。

【廣州大暴動與汪派的離去】十一月中旬，廣州的大暴動發生了。係由共黨領導第四軍的教導團，與廣州市工人，乘着汪派部隊向各方佈防，廣州市內空虛，發動了一個空前的大暴動。雖然由他們同師將暴動平定了，但是廣州已遭了空前的浩劫。社會上無論知道內容與否，把一切責任與罪過，都歸到他們身上。於是在福建的陳真如軍，（十一軍）和南路的後方四軍各師，及江西方面的我軍，都有了打仗的題目，一齊向廣州進發。南京中央政府並派李任潮回粵主持這一次的軍事，汪精衛等首要見形勢不佳，也都離開了廣州。隨後他們在軍事方面，把廣州也放棄了，全部向東江出發。據我的判斷，他們見廣州處於四方包圍的地位，作戰至爲不利，想以全力擊破東江方面的陳軍，然後再回師擊破我軍，及南路部隊，萬一不利，即折入江西，另謀出路。因此我軍由西江直趨廣州，而廣州已是一個災後的空城，這時正是民國十七年的元旦前後。

我軍到達廣州，不稍停留，即會合南路徐景唐的十三師，急向東江追躡。這時四軍已與陳真如軍在五華岐嶺等地接戰，陳軍爲其所敗。我軍追至河源縣譚落鎮附近時，適與彼回軍相遇，於是發生非常激烈的戰鬪。我軍及十三師共有四個師的實力，對方亦有四個多師，全面展開大戰，歷時兩晝夜，卒爲我方及十三師擊敗，雙方都死亡七八千人，實爲內戰以來最激烈的一個場面！事後回想，在國民革命軍中素以善戰著名的四七兩軍，自己合併起來，那種敵愾精神，比較對反革命的軍隊作戰，一定賣力得多，真是一齣可悲可痛而又可恥的武戲！四軍方面的勇將許師長志銳，就在那次陣亡了，黃師長鎮球受傷。我前年到曲江時，曾參觀過規模宏大的許志銳的紀念學校，廣東的將領，無論在當時爲敵爲友，都捐款爲他建紀念館。我心裏想：「如果張向華要我捐款的時候，想起了以前和現在的情形，內心是如何的矛盾呢？我有一次，笑問黃鎮球（前四軍師長）『你腿上的子彈是那個送給你的？』彼此相顧大笑。這『見賊呢？還是歷史之神在那裏導演呢？我欲問天！

這次戰事結束了，我也由東江回到廣州，廣州又是一番新的氣象了！我的軍隊除了一部之外，大都開回廣西，我也於四月間回廣西，繼續我那些饒有興趣的建設工作。滿以為這次是粵桂最後一次的內戰了，從此好好的把廣西建設起來，悔禍未晚，桑榆可收。誰又料及歷史的主宰，還在那裏導演第三幕的武戲，我們這些演員，又是不由自主的在幕後從事準備的動作，這真是不可逆料的慘劇！

【全國編遣會議後的不幸事件】十八年一月間，中央在南京召開全國編遣會議。問題的核心，固然在長江黃河一帶，但是兩廣也不能例外的。而受到召集的李任潮，對應否出席會議，頗費考慮。他回到自己的家鄉大坡山鄉下，躊躇未決，要我前去商量。馮竹萬、鄧益藩、李民欽、張文、都在他家裏，參加商討。有主張出席的，也有主張不出席的。我到後，竭力主張應去出席。我認爲必須裁減兵員，國家才可談建設，革命才可告成功。同時因爲我自己正在廣西進行地方建設工作，也不願發生意外的阻礙。李任潮採納了我的意見，遂動身赴南京。這個難題解決之後，我也很愉快的回到南甯，安心致力我的工作。不料到了三月間，武漢北平問題發生，第四集團軍解體，李任潮在南京不能自由。問題的核心，一轉就到了兩廣。廣州方面電邀前去商量應付的辦法，並派專輪到梧州迎候。我連夜趕到梧州，乘南強小輪，前赴三水。到三水時，第八路總指揮部副官處長李少毅，正在火車站守候，形色張皇，不似前來歡迎的樣子。他一見到我，即拉我到一個僻靜的處所，秘密對我說：「廣州局勢已變，陳炯如、陳伯南已就廣東省政府主席及廣東編遣主任的新職，白劍生昨晨會秘密到過廣州，旋即遣返香港，請你趕緊搭商輪回梧州，切不要到廣州去，自投羅網！」我見情形如此，自不能再前進，時適港梧大明輪進口，就搭船回梧。真是無巧不成書，在船上，忽然發現白劍生，他很秘密的躲藏在一個房間裏，相見之下，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處說起。原來他是前數天從天津搭一艘日本的貨輪，秘密的偷過上海。當船到上海時，南京方面派人上船嚴密搜查，他伏在船主房內的衣櫃裏，未被發覺。前天到達香港，當晚即乘船入廣州。

，昨天早上到廣州，而廣州局面已變，由公安局長鄧益臨調停，方得自由轉回香港，即由香港乘這船回梧，適巧和我相值。在船上，除了談一些武漢北平的經過外，也沒有什麼積極的決定。回到梧州，一兩日內，李德鄰亦祕密到來，數年以來的患難朋友，聚首一堂，雖然是在失意的局面之下，而大家都非常歡洽。此時廣東的局面雖變，彼此感情，尚未完全破裂，往返的電報，都以和平建設爲言。我們在梧州逗留不久，即回到我家鄉容縣，召集重要的幹部會議。廣東方面並派香翰屏代表到來商量，表面上仍是息戰甯人一套老調。他們除了答應我駐粵部隊自由撤回之外，其他政治問題，實無從談起，一切祇有靜候時機的演變。我對於內戰，確已早生厭倦的心理，但是在一個人團體裏面，個人的意志，是很不容易表示出來的。記得有一次，我因事到了離城數十里的小鄉下，住了兩日，就有很多電話，催我回去。但是回來之後，並未有若何重要問題，等待解決。後來才知道我到鄉下去，引起了德鄰劍生的誤會，以爲我有意隱避。的確，在當時那種形勢之下，本來有容易引起誤會的可能。其實我雖有厭戰的心理，却不願違背團體的意志，因爲不願團體的個人行動，是會使團體陷於不幸的分裂的。在那時候，譚組庵、何敬之有一個電報給我，要我顧全大局，勸解息爭。可惜措詞不甚妥切，字裏行間，並感覺有令人難堪和不夠誠懇之處，我自然不能單獨用我的意見去答復他們，而是要參酌大家的意見。商量的結果，認爲首先要求恢復李任潮的自由，與德鄰、劍生的名義。復電的語氣，亦不示弱。南東方面正在「六合統一軍解甲」的樂觀時期，我們提出這種要求，與譚強的口氣，當然不會得到結果。從此與南京往來斷絕，成了一個僵局，無法再行轉圜。而外間的謠言很多，不是說廣東的軍隊集中肇慶，就是說湖南的軍隊，集中永州，對廣西將實行武力解決等話，空氣日趨緊張。廣西的民性，是不輸最後一口氣的，你迫得他愈厲害，他就不顧一切的和你的蠻幹到底。洪楊末期，很多全軍被殺，不肯投降的情形，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以到這時候，戰爭的主動，遂移到我們這一方面了。

【戰事失敗出走安南】李德鄰因為要作政治上的活動而去香港，廣西的內部，由我同白劍生主持。這時也想不到出師的名義與理由（後來才起了一個護黨救國的名義），就先發制人的指揮軍隊，由西江向廣州攻擊。在一個憤激的情緒之下，會把打仗的問題，看得太容易，而不顧一切的向前衝去，希望以戰事的勝利，來轉變政治的環境。但是我們兵力究竟有限，一共祇有十三四個團，雖然在大塘、蘆包獲得了初期的勝利。可是到了白坭、銀盞坳，就兵力竭，不堪再戰，而向西江敗退下來。此役，黃旭初在陣上受了重傷，幾至喪命。後來到香港休養了很久，才始恢復。這時候湖南劉恆先（建緒）的軍隊，已由全州乘虛攻佔桂林，逐步向柳州前進。於是趕忙把由廣東敗退梧州的殘餘部隊，調到柳州去抵禦，將其擊退至全州附近，雙方對峙着。這時柳州無兵防守，門戶洞開。俞作柏、李明瑞、楊騰輝等率領在武漢解體的第七軍各師，及廣東方面的部隊，乘隙進佔梧州。並沿江上達桂平，直攻南甯。我方已無兵可調，勢難抵抗。我見情形如此，雖柳州方面，一時獲勝，究於全局無補。同時我更覺得俞、李、楊等所部皆數年來共患難同生死之袍澤，雖然在政治上一時意見相左，一時不致與我作正面的武力衝突，若能適可而止，善意處之，免致與省內力量相火併，則廣西元氣，尚不致受重大損傷，仍可保持整個的強大力量。而俞、李、楊等偏私躁進，必不能長久維持，待時局之演變而善為運用，仍可入我掌握。我乃決心退出廣西，並電白劍生回南甯。這時彼尚在柳桂處理各項未了軍事，遲遲不能成行，我迭電催促，有云：「一走百事俱了，不走百事不了，何必多所留戀？」迨彼回南甯，而俞、李、楊等，亦已進追貴縣，我等將省內部隊，交由師長梁朝璣、呂煥炎統轄，由其與對方妥協。這時南京方面，已任命俞作柏為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為廣西編遣主任，楊騰輝為副主任，我留民政廳長栗威在南甯辦理省政府交代，以示清白。隨即與白劍生乘輪經龍州，而入安南。此為當年陸續出走的舊路。我們竟在數年之後，步其後塵，誠不禁感慨系之！這是十八年六月間的事。

一個年富力強素喜做事的人，一旦置身國外，雖說一走則百事皆了，實則百感交集，積極的意念與消極的意念，同時在我的海腦裏起伏着。消極的想法，是如何安排生計，消磨光陰，終老異域。積極的想法，是如何等待東山再起的機會，以重握政權。這兩種意念，除了年老力衰者外，最後總是積極的意念得到勝着。尤其是客居在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耳聞目見的恥辱；親自經歷的痛苦，都是激發革命情緒的酵母。所以暫時蟄居租界或殖民地的失意軍人和政客，沒有一個不是靜極思動，在那裏等待機會，策動變化。而這些機會與變化，在多亂的中國，是不斷的發生的。這班在野人物，遂也乘時而動，免起鵲落的在舞臺上演出種種悲歡離合的活劇，這就是中國數十年來循環不已的內亂發生的主要原因。

【俞作柏的異動】我們在安南住了不久，就回到香港去。因為香港是兩廣政治活動的後台，我們要求政治的出路，就不能不到那裏去。俞作柏向來左傾，在十六年的時候，就同我們分離。他之所以服從中央，無非是想取得廣西的地盤，掌握廣西的軍隊。自從當省政府主席之後，其左右都是那些左傾或共黨分子，終日包圍着他，要他有所舉動。就職不到兩三個月，遂自稱為×××軍總司令，公開反對中央，與廣東對峙起來。他這一種舉動，不但我原來在廣西的部隊，接受我們的意旨，全體表示反對。即李、楊由武漢帶回的部隊，大多數也和我們站在一條陣線，一致反對。南京方面乃將俞、李免職，並任命呂煥炎為主席，兼編遣主任。俞作柏走香港，李明瑞、俞作豫率領少數部隊，逃入左江，和共黨韋拔羣、黃誠虎等聯合，張開赤色的旗幟。這一次的離奇變化，前後不到一個月，是歷次政變中最短促的一頁。經此次事變之後，廣西的實力，無形中又在我們領導之下，互相團結，暗地裏等待時機到來，續演以後的一幕。呂煥炎雖也有野心，欲自成局面，但他祇能掌握一部，而不能領導全部，因此他雖受了南京的任命，實際上仍舊受我們的指揮。

【第四軍與我們言歸於好】汪精衛自十六年在廣州失敗以後，對中國政治，始終不能忘情，尤其不

能忘情於廣東。俞作柏變動的內幕，我雖不能詳悉底蘊，但與汪始終有很大的關係。俞既失敗，廣西的力量，又轉回到我們手裏。素來擁汪的第四軍，又遠在長江一帶，雖掛着中央的旗幟，仍想同我們聯合一致，由唐孟藩（生智）的介紹，進行協商。一日，在唐氏家裏，我與汪氏再開始見面，對飲一瓶一百年陳的拿破崙白蘭地酒，彼此言歸於好。政治的活動，原來祇計利害，不擇手段的。昔日是離仇，今日是朋友，在局外人看來，雖覺得難以爲情，而在當局者，則視爲勢所必然，無足爲怪。這時第四軍張向華等因爲移防改編的問題，又與中央脫離關係，由宜昌經湘西、廣西，希望再回廣東。於是政治的合作，進而爲軍事的合作。大家都主張我先回廣西去，統一領導廣西的部隊，免與第四軍衝突。再與四軍合力攻取廣東，廣西內部亦派人來，願與四軍合作，要我回去領導。這時廣東方面正增兵至平樂、荔浦，堵擊四軍，情形十分緊張。我對於回去，雖有決心，但並未商定何日動身。

【離港返容】我在香港居住，本甚安適，忽然有警政司派人要我前去談話。我即派代表前往，據云：「有人控告黃先生在香港從事政治活動，礙及治安。」我的代表答辯，不得要領而同。越數日，警政司又來一件公文，限我於三日內出境。處在帝國主義者勢力之下，受到這種不可抵抗的壓力，心中非常憤慨！我固然恨香港政府，尤其恨當時廣州的當局，爲什麼要借外人的勢力，來壓迫我呢？我立刻下了決心，要吐這口怨氣。我想：「英人既不許我往香港，自然也不許我到他所屬的其他殖民地去，上海是不敢去，安南及其他地方，我又不願去。最合理的，還是回廣西去，開闢我的自由天地。」於是我秘密準備了到廣州灣的船票，除了同行的妹夫吳柱文外，連我的妻子與兄弟都不知道。在一天的下午，兩點鐘，法國的「網球四騎士」，在香港表演，我還去參觀。廣州方面的人物如陳策黃驕都在場上碰見，彼此都是很熟的舊朋友，在不同的心情之下，彼此祇作會心的微笑，不交一語。看完網球表演之後，急急改裝，並告知我的妻子，要她在三日之後，才通知李德鄰白劍生汪精衛等。在傾盆大雨中，默然與我的

妻子告別，跨上了法國的輪船，啓程向廣州灣進發。

到了廣州灣，我化裝一個汽車夫，吳柱文化裝一個車行老闆，兩人隨便買了一些汽車零件帶着。次日，僱車經廉江陸川而至玉林，沿途祇同那車上的司機攀談，並幫他駕駛了一段路的车。這種做法，無非是要他認我們作同行，以免沿途盤查時露出破綻。一路過去，平安無事。一直到達玉林，下車後，到一個小客棧裏去找住宿地方。忽然後面一個士兵跟蹤追問：「你不是黃主席嗎？幾時回來的？」我聽了，大爲驚奇！雖然此人對我，未必即有惡意，此地亦未必有多大危險。但這時候我還不能露出我的真面目，祇好低頭急行，假裝與我沒有相干的样子。可是他還在後面連聲說道：「真像啊！真像啊！」我進了小客棧，即上床下帳，瞇頭而睡，假裝害病，查夜的軍警盤查，一切都由吳柱文應付。次日，乘車回到容縣，隱居在我的一個小房子內，絕對不與外人來往。然而熟人太多，形跡終於暴露出來。縣長封鎮南，首來求見，他是本縣人，而又是老世交，舊同事，自屬誠意。並且介紹他的族侄駐容縣的旅長封克魯來見，表示絕對聽我的命令。我遂拍電到南甯，要呂煥炎，楊騰輝，梁朝璣，黃權，梁重熙，呂競秋，張任民，蒙志，楊義，黃鶴齡，黃稻等到賓陽見面。第三日，我即乘車到賓陽。他們已先到達，不但我指名邀約的都到齊，就是不指名，不邀約的，如梁武恆、周炳南等許多人，亦都到家參加。我離省雖不到半年，大家相見之下，都覺非常難遇，有的甚至感動得對我流下淚來！我將來意說明，希望自己團結一致，與四軍合作，同下廣東。他們一致贊成，無稍異議。當時即令各師祕密向平樂梧州前進，與四軍合擊在平樂一帶的廣東軍隊。我雖然沒有什麼名義，但是我的命令已經發生效力，這可說是一種內心的效力，乃是心悅誠服的偉大表現。

【慈親之死】我因爲尚在準備祕密行動期間，即日仍回容縣，並下鄉省視我垂老的慈親。母子久別重逢，至情流露，當時彼此內心的感觸，自非筆墨所能形容。兩日之後，我又向她叩別。她低聲喚我

的乳名，戀戀不捨地問我：「你這樣快又要出去了嗎？」我那時真是沒有一些理由可以答復她的問話，亦無一句可以安慰她的言語。臨行，她送我出大門，望着我坐上轎子，還捨不得回去，我忍痛的走了。天呀！這便是我母子最後的一面了！祇此一面，竟成永別！我當時却那裏預料得到呢？事後回想，她那龍鍾的老態，盈盈的眼淚，無言地望著的情景，宛在眼前，在那時她的心內，是如何的痛苦啊？而且她是爲我而死，因爲事前我不能將她安置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十九年粵軍佔領容縣，派兵到我家鄉搜查，她老人家幾經搬遷躲避，祇有我妹子普安在她身邊照料。衰老的身體，怎禁得這樣的恐怖，遂因驚悸過甚而昏迷，而很淒涼的死去！我兄弟無一人奉侍在側，親視含殮，事後聞報，真是遺恨終天，悲痛無極！古人說：「忠孝不能兩全」，我自問忠在那裏？孝在那裏？這一個極大的刺激，也是後來厭戰的主因！

「重組軍政機構」我離家之後，匆匆趕到南甯，從事護黨救國總司令部的組織。李德鄰任總司令，我任副總司令，兼省政府主席，白劍生任前敵總指揮。八年以前的老調，又重新彈起來了！爲與汪及四軍易於連絡起見，任用陳翰笙爲參謀長。這本片子的序幕正式揭開，德鄰劍生亦陸續由香港趕回，當我秘密回到廣西，在賓陽召集會議的時候，粵方即已知道，趕忙將在平樂方面的部隊，連夜撤退，並未受到若何的損失。我迫近梧州，彼亦放棄梧州，於是廣西的全境，又重新歸我掌握。我到梧州後，即趕赴黎木根（梧州東北六十里小鎮）與張向華約會。新事正待合作，舊事自然再不提。照我的意思，桂局轉變，未到一月，諸事都要重新部署，俟四軍在廣西境內稍爲休息整頓，再會師東下。但張向華的意見，則以爲應乘其不備，一舉東下，即可佔領廣州。否則對方準備完畢，必難獲勝。其實廣州方面，早就準備很強固的工事。而四軍師行四省，直下廣州，已犯勞師襲遠之戒，且自信過甚，認對方不堪一擊。同時暗示即使廣西軍隊不能協助，亦可單獨獲勝，則又蹈了驕兵之忌。廣東方面，此時不但集原有粵軍力量，並且調了好多北方部隊到來，所謂「乘其不備」云云，亦正與事實相反。但他決心甚堅，大有「

滅此朝食」之慨。我雖不贊同他的意見，亦無法將他阻止。同時又不能袖手旁觀，聽其自敗。於是除留呂煥炎率其一部留守廣西外，其餘全數東下。四軍由廣甯、四會、清遠、入花縣、崇化，擔任左翼。七軍十五軍由西江經肇慶，攻肇軍田粵漢鐵路正面。並分兵一部，攻擊三水。四軍在左翼作戰，起初甚爲順利，將近廣州的時候，粵方發動反攻，來勢頗猛，乃向琶江敗退。七軍十五軍久攻正面不下，四軍既退，左側背即受極大之威脅，故各軍皆由四會廣甯懷集，退往信都，賀縣一帶。本擬扼守梧州，再行作戰，但梧州空虛，在我軍未到信都前，已爲粵方海軍陸軍襲取，乃轉向平樂荔浦，集中整理。此次作戰，前後不到一月，其進也銳，其退也速，除上述主內外，首爲步調不一致。次爲第七第十五兩軍頻經變動，戰鬪力已減。再次則爲對方有空軍參加作戰，予我軍以極大之威脅也。

【再度出兵】我們退集平荔後，同在患難之中，彼此乃謙抑反省，更加團結，力量反比以前加強許多。這時粵方分兵向平樂荔浦進迫，而呂煥炎則叛變投敵，據南甯、玉林、桂平等處，絕我後方。敵之實力，數倍於我，而我又兼有內憂，情勢至爲惡劣。我們會商決定以七軍及十五軍之一部，在荔浦附近，拒止當面之敵，由德鄰、劍生指揮。我同向華率四軍及十五軍之一部，同師解決呂煥炎，以固後方。由荔浦經修仁象縣，下武宣。復分兵出貴縣桂平，銜枚疾走，每日行程皆在百里以上。出其不意，襲取貴縣桂平，呂煥炎旋爲所擒，乃退守玉林。南甯方面呂部團長覃興、楊振昌反正，將呂氏親信驅逐，於是後方救平。我復以四軍分略欽（州）廉（州），轉進高（州）化（州），十五軍以一部監視玉林，大部沿西江東下，襲取藤縣，佯攻梧州，並再分兵轉入撫河，斷粵軍之退路。粵軍見情勢危急，連夜撤守梧州平樂方面，僅留北方調來朱一民所部進攻荔浦，幾經激戰，卒爲我軍擊敗，逐出桂境之外。

【北流戰役的挫敗】粵軍退集梧州後，見我軍兵力不多，且分散各處。同時我許崇武部久攻玉林，急切難下，敵方乃進佔藤縣，並以主力沿容蒼公路前進，希解玉林之圍，收內外夾擊之效。我乃急調四

軍由高州進入容縣楊梅附近，以阻其前進。但主力未到，敵已迫近，不得已退至北流附近，再行拒止，以免其與玉林城內呂部會合。此時前有強敵，後有阻礙，情勢已極不利。如任其匯合，則我軍各處部隊，更難集中應戰。遂不得不以北流以北地區，進行決戰。四軍與十五軍各部，不是由前方撤退，即係由桂平、高州、武林等處遠道集合，兵力疲憊，絡繹參加，苦戰四晝夜後，卒至敗北，兩方死傷，皆甚慘重。我乃退至貴縣，憑江防守，滇軍亦不積極追擊。這是十九年一月間的事。

北流的戰敗，關係於我的氣勢太大了！事後自然有好些人要埋怨我指揮的失當。我自己檢討一下，也確有很多的錯誤。當我很順利的襲取貴縣桂平，佔領藤縣，進兵撫河，威脅粵軍，逼迫其倉皇退回梧州的時候，忘記了自己的部隊是新敗之餘，實力不厚。同時指揮四軍，分進欽廉高雷。粵軍見我兵力那樣分散與單薄，並且玉林圍而不下，遂大舉進攻。我們要將散在數百里地區內的部隊，迅速集合起來，又何等的困難？而粵方力量集中，佔着優勢，雖然李白在平樂方面獲得勝利，但已成強弩之末，不能再進攻梧州，以牽制粵軍的前進。我方處在前後受敵的情勢之下，被迫而進行決戰，自不能僥倖得到勝利的啊！我們遭遇了這一次和上次在廣州附近的二度損失，各軍的實力大減。四軍的各師，每師剩下的實力，都不過一團。他們的師長都改爲團長，團長都降爲營長，十五軍各師的情形亦是如此，可是官長的奮鬥精神，仍和以前一樣的旺盛，絲毫沒有頹喪，這却是值得稱道的事情。

自此之後，兩方隔着邕江對峙，而從事整理與佈置，等待戰事的繼續發展。這時退入右江的李明瑞見我軍失敗，即開始向南甯方面進迫，其前頭部隊，已到遠離南甯二百餘里的隆安縣以南。我不得不轉回南甯，部署抵抗。乃率領在南甯反正不久之軍與楊振昌兩團，向隆安進擊。在隆安附近，經過了兩次激戰，將其逐退。我進駐平馬，（即恩隆縣）他們退入東蘭附近的大山內。因爲他們對當地民衆，曾予以相當的組織和訓練，所以我們要繼續深入進攻，是有相當的困難。記得有一次，我集合平高附近的民

衆講話，在滂沱的大雨之下，還是靜肅整齊的，聽我的話。這並不是因為我歷年在廣西的地位和威望使然，而是已受了李明瑞部組織訓練的結果。我在平馬住了一個多月，不能將李部澈底解決。他們則時以游擊戰術出擾，使我不待安甯。正在那裏相持的時候，忽接我母親逝世的噩耗，我不禁痛哭起來。想起不久以前臨別時的景況，以及因我在政治上的關係，而使老人家受驚致死，不孝之罪，百身莫贖，真使我悲痛萬分！甚至心灰意懶，不願再在政治上有所作爲。我曾經有電報給德鄰劍生向華等，向他們引咎辭職。他們回電，給我懇切的安慰。四軍將領並將北流戰敗的責任，負在自己身上，認爲由於他們作戰的不得力，以解慰我內心的不安，這也是值得我感激的事情。

【進退湖南的經過】四五月間，北方的擴大會議事件發生了，閻馮一致參加，引起了更大的內戰。李白張等在南甯舉行會議，決定出兵湖南，要我放棄右江，率兵回南甯，一同出發。我雖然沒有親自參加這個重要的會議，但是團體的決定，我必得服從。右江放棄之後，李明瑞仍舊恢復原來的態勢，一直到了二十年之後，始將其逐出桂境。李明瑞率部千餘人，由湘桂粵邊界竄入贛南，與共黨合流。但不久因共黨內部李立三路線與毛澤東路線的鬭爭而被殺，所部亦完全消滅，這是以後的話。

我回到南甯的時候，部隊已集中桂林，進入湖南境內。粵軍因我軍北進，乃乘虛進佔桂平貴縣，並迫近貴縣賓陽間之梨塘圩。我在南甯匆匆佈置，以韋雲松率領一部守備南甯，其餘皆隨同出發到柳州桂林，除留置一小部隊據守各個城池，以作最後的據點外，其餘一概放棄，或以民團扼守。十五軍的三師，除梁朝璣已出發外，許宗武蘇祖鑒兩師，由我與黃旭初最後率領出發。這時前方李德鄰白劍生張向華率領之四七軍及在湖南合作之唐生明第八軍，已佔領衡陽，長沙，大有直搗武漢之勢。我軍北上，粵軍並不向廣西深入尾追，却另行折回廣東，由北江出衡陽。我與十五軍到達零陵時，衡陽已爲粵軍佔領，將我軍截爲兩段。我見兵力單薄，一時不能將衡陽奪回，即用電報與前方商量，回軍擊敗衡陽粵軍，再

行北進。於是前方各軍由長沙向耒陽撤退，我率十五軍向常甯前進會合。到達常甯時，粵軍佔領耒陽常甯間之秧田圩，切斷我的進路，乃展開激戰。十五軍稍受挫折，停頓於常甯附近，適前方各軍已退至耒陽，粵軍亦撤回衡陽，固守不出。我親到耒陽會議，偵得衡陽工事堅固，不易攻擊，而且是年湖南歲荒大飢，軍食極成問題。於是決心由常甯以北地區渡過湘江左岸，據守祁陽熊飛嶺及寶慶零陵各處休息整理，度過荒年，再求進展。而衡陽粵軍見我軍撤退，遂向洪橋出擊。我等在洪橋會議，共認乘勢反攻，奪回衡陽，比較消極的撤退為有利。即下令翌日向後反攻，雙方又展開大戰，十五軍置於右翼，左翼為四七八軍主力。我回到駐地時，部隊已逐步推進，情況頗為順利。從第一日起，一直到次日下午四時，我的正面尚沒有甚麼變化。但是左翼方面，情況非常沉寂，自次日上午八九時起，已聽不見他們的槍炮聲音，並和我們得不到連絡。當時我深為詫異，不知是勝利的前進呢，還是失敗的退走。但我深信白劍生在作戰時對連絡工作，素來是非常注意，尤其當敗退的時候，他必用盡種種方法，通知友軍，以免受意外之損失。這次也許是急於前進追擊，而不及通報。這樣左猜右想，一直到了下午四時以後，等我派出去的連絡員回來報告，才知道他們在今早為敵人反攻，已經敗退。敵人在上午十點鐘通過與我並行的某地，正向洪橋前進。這次左翼退却所以不通知我們，到後來才知道是送信的人，中途遇見一個軍官，送信人向他查問我的所在，他答復不知道，並且說「想早已退却了」。以致就誤軍機，這情況是多麼危險呀！此時左翼的敵人已超過了我大半日的路程，而我們的右邊，隔着一條正在漲大水的湘江，不易過去。另一方面又得到報告：一部份追擊我軍的湘軍劉恢先所部，已到達常甯白水市，向零陵方面急渡。萬一左翼的敵軍，先我到達祁陽，遮斷我的後路。或者知道我未能退出，由洪橋向左轉來包圍，則我將全部被俘。於是火急下令，向大營市祁陽方面撤退，連夜向左翼敵人並行的後方轉進。在一日夜之間，走了一百八十多里路，次日黃昏時候，到達祁陽城。而敵人也過了熊飛嶺，離祁陽不過二十多里的地方，

與我的後衛部隊對峙着。祁陽自然又不能再留。早早的吃了一頓晚飯，當夜渡過湘江南岸，向零陵退却。連日連夜作戰敗退下來的隊伍，未曾經過收容整頓，秩序極爲紊亂。我除了身邊一個衛士隊之外，幾乎都失了掌握。向來我遇到軍事不利，必須退却的時候，自己一定是支持到最後才退走的。這一次我的身體實在太疲乏了，走一段，睡一息的，慢慢向後轉進。團長周雲很匆促的跑來，向我報告：「後而已無自己隊伍了，離敵人先頭不過二十多里，請副總司令趕快走路吧，不然，敵人快要到了！」情勢緊急，可以想見。次日午後三點鐘，我到達零陵城，得悉由白水市向零陵城追擊的湘軍，離城已不過三四十里。如果繼續前進的話，黃昏時候，也可到達城心。我進城的時候，看見我的部隊，或在睡覺，或在覓食，在那麼炎熱的夏天，經過四日四夜長距離長時間作戰潰退下來的部隊，到了一個比較後方的城市以後，精神的疲勞，及秩序的混亂，是必然的現象。所以我無論怎樣命令他們，督促他們，退到道江對岸佈防，都不能辦到。他們好像是一羣失了知覺神志昏迷的醉漢，這一個起來，那一個又睡下去，我看急極了，假如敵人在黃昏後，或明天拂曉時到達，這些部隊的官兵，一個個都要變成俘虜。因爲零陵是一個背水的城呀！我在萬分困難之下，祇有命令我的衛隊長莫世才，將那百餘個衛士，分佈在六七個城門，緊緊的把守着。萬一敵人攻城，一定要堅守到明天上午九時，掩護城裏的部隊退過對岸，才能撤退。當晚我也過河，到對岸宿營，同行的祇有張伯璇戴石浮幾個人。次晨，仍向全州方面退却。起行不久，就聽到零陵城方面的槍聲響起來了。我的衛士隊，一直抵抗到九點多鐘，城裏的部隊，全部退完了，才撤退。雖然犧牲了三分之一以上人槍，但他們能使很多的部隊，脫離危險，確是一場值得稱道的後衛戰！

【退集桂境後遭遇的危險】我到了全州，李德鄰、白劍生、張向華已先一日退集那裏。他們是由湘江北岸，經東安退回來的。左翼的損失，非常重大。第七軍的師長梁伯藹，第四軍的副師長李漢炯，都

在五塘前線陣亡。士氣頹喪極了，敵軍還在後面緊追著。我軍除留一部在全州佈防外，主力仍向桂林撤退，俾能補充整頓。到了桂林，據報有些向來反對我們的份子，受了對方的任命，糾合土匪散兵，進擾柳州。同時得到滇軍萬餘人圍攻南甯，並與賓陽縣粵軍聯成一氣的消息。在這四面楚歌的情形之下，而我們僅保有桂林平幾處很小的地方，幾面受敵，情形是危險極了！於是桂林方面，由劍生等在那裏佈防久守，我率一部回防柳州，將那些反動的雜軍肅清。湖南方面敵軍到了全州，不再前進。因此我軍的主力，亦移柳州，籌劃如何去解南甯的圍。

【決心離開廣西】我到柳州後，因身體衰弱，又回到桂林去休養。在一個大勞動大刺激之下，得到一個靜息的機會，自然會有許多感想發生。我覺得這幾年的內戰，是太無謂了！於國家有什麼益處？於人民有什麼益處？於自己又有什麼益處？於是我決心退出這個內戰的旋渦。本來我於退到全州的時候，一天晚上，在清湘寺內，已對白劍生提出這個意見。他恐怕動搖軍心，竭力勸止我，我也不再堅持。的確，那時我若離開這一個集團，士氣方面，是極易受到影響，我當然不能不顧念大局，而接受他的勸告，中止自己的企求。現在我去志復萌，並更堅決，於是不再徵求他們的同意，即將辭退的電報發出。同時並有致南京方面的電報（馬電）發出。他們見到這兩個電報，非常驚異。不過除了復電勸阻之外，亦不能十分勉強，祇有各行其是而已。自此以後，我雖然還未正式解除軍事政治上的名義，但實際上已完全不負責任。不久，我又回到柳州，與他們相處一起，彼此的政見，固已分歧，但社交上仍是一樣的純篤。我那時因為不能出省，在柳州開闢了一個很大的林場，種植桐油，取名茂森公司，從事生產工作。三十三年我到柳州，邀同黃旭初去參觀這個農場，當年所種植油桐幼苗，今日已喬木參天，十五年前好像是一個無聊極思的玩意兒，今日則成為社會上一宗很大的財產。比到十餘年來你死我活，此起彼仆，那些「奪帥印」「取成都」的活劇，意義深長得多，使我對於以往的一切，引起了無限的感想！

南甯之圍，終於解開了。在優勢的敵人四面包圍之下，能以劣勢的部隊，從一個空隙中衝進去，完成裏應外合的形勢，將重圍打開，並將敵人擊敗，真是戰爭史上的一個奇蹟。這固然靠守將黃旭初、韋雲淦等能堅苦固守，亦確是白劍生指揮成功的一個傑作。此後還在右江方面進行好幾次的戰鬪，使廣西的局面，得到一些回旋的餘地，這都是值得稱頌的事實。因為這些戰役進行的時候，我均未曾親自參加，其經過的詳細情形，不敘述了。

南甯解圍之後，滇軍退出桂境，粵軍亦退出貴縣以下，南甯終於恢復了他原來省會的重要地位。一切軍事政治的重心，迅速的轉移到那裏去。我與李德鄰亦由柳州回到南甯，在我的舊園舊寓內，渡過了我三十七歲的生日。他們很熱烈爲我祝壽，勝利的情緒，與誠摯的友誼，都融和在杯酒裏，使得大家沉醉。不久，我提出決心離開廣西的意思，這時他們也不再勸阻。在臨行之前，和各重要幹部還開了一個會議。他們希望我出省以後，仍爲團體而努力，務使團體的精神，永生而不斷的發展。白劍生發言：「廣西人是不會投降的！不但現在不投降，即使將來的環境比現在更困難，也不會投降的！所謂爲團體而努力的意思，就是在不投降的原則之下，使團體的力量，更大更強更堅固。」我在那時候，雖仍是很消極，並未考慮到以後的行動，但是我已堅定我的決心：第一是不再破壞國家，第二是不再破壞團體，這是我以後行動的原則，可以說是我以後爲人做事的最高準繩。在當時，彼此的言語間，或者有不甚愉快的地方。但在彼此的立場上，就不能不如此申明我的衷心。在那時候雖未必爲他們所完全諒解，但是到了廿五年統一以後，已得到事實的證明。這是一幕團體政見與私人友情矛盾衝突的表演，最後終於得到善美的結果。在這一段內戰史中，可算是一個特別的鏡頭了。

【寫完這段事跡後的感想】我寫完這一個事跡的經過，心中發生了很多的感想！我們在當時，對於北洋軍閥的互相火併，尤其是近在目前的舊粵桂戰爭，自然有許多不良的批評。但決料不到這個悲劇

，竟由我們自己來重新表演一次。可是我們重演這個悲劇，決不是有意的，而是在不知不覺中，走上了表演的舞台，幕後自然有一個導演者，在那裏指導我們的演出。這導演者並不是那一個人，而是歷史的和社會的背景，因為這一幕一幕的戲，是歷史的社會的演進必然的過程！假使我不是害病，那會長期的留在廣州？因此或者可不參加葉賀的戰事。沒有葉賀的戰事，就不會有對第四軍的戰事，沒有編遣會議，就沒有十八年的粵桂戰事，沒有十八年的戰事，就沒有十九年二十年的戰事。但是這不過是我事後的推想，即使這些事實都沒有，難道就沒有其他的原因，可以引起不幸的戰爭麼？即使沒有這些原因，也必有別的動機。因為戰爭的起因，往往當初都是很細微的，而這細微的起因，又往往為人們所忽略，等到醞釀已久，形勢日漸擴大，遂至一發而不可收拾。雙方當局者，如果能注意這些細微的地方，而及時消滅其禍機，也許可以免却許多無謂的損失。但是這種防微杜漸的顧慮和辦法，不是很容易的。譬如我在十八年，決然回香港，和潛回廣西，召集舊部，參加戰爭，實由於對方欲借外人勢力，壓迫一個失意的人，使他不能安居，而加以侮辱。在主之者不過是接受了一個膚淺的建議，而在受之者，則認為是一個奇恥大辱，不得不挺而走險，以謀相當的報復。我們嘗讀吳梅村譏評吳三桂「痛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的詩句，總覺得吳三桂因小忿而忘大節的可痛可恨。可是檢討中國近數十年來的內戰，當事者雖然不是「一怒為紅顏」，而一考其起因的價值，兩兩比較起來，往往相差無幾。這是個人的悲劇，也就是國家社會一個極大的悲劇啊！

論這次新粵桂戰爭的悲劇，我雖然中途下場，而劇情的後半，還是由其他角色繼續表演下去，仍是一個極可悲傷的同憶。然而我讀了三國演義的頭一句話：「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和黑格爾辯證法正反合三個原則，覺得這種歷史的演變，總是避免不了的慘劫。無論是分是合，是正是反，都是有一定的理由。任何一方面的道理，都有他的是處和非處，並不是絕對的是，和絕對的非。是和非衡

突之下，乃產生另外一個是非，這就是合的道理，也就是一個進化的道理。雖然一個歷史的演變，要犧牲很多的生命和毀滅很多的物質，然而誰又有這樣大力，能穀挽回這種莫之爲而爲的定數呢？這在佛家的說法是「劫運」，用辯證的說法是「必然」。無論「劫運」也好，「必然」也好，事實既無法抗禦，過去亦不必追悔。反正祇是在歷史的演變上，留下一個供後人參證的資料，和憑吊的痕跡罷了。

十一 海外的閒散生活

【閒居香港】十九年的冬天，我在南甯，與他們分別，到了龍州，又到安南去。這是廣西政治人物下台的一條好路徑，我已經走過兩次了。外國人在中國各地，爲中國軍事上政治上的上台人物，安排了許多「遁逃藪」式的安樂窩。廣西雲南的下台人物，可走安南，廣東的下台人物，可走香港，在長江一帶的，可走上海，在華北各省的，可走天津，在東三省的，可走大連。真是天無絕人之路，你一到外國的租界，或殖民地，祇要不妨礙當地的治安，當局者無不表示相當的歡迎。因爲收容政治犯，是國際公法所允許的。所以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到了不得已時，也可拿國際公法准予收容政治犯這個規定來作護身符。而某一種野心國家，即憑此規定，保護鄰國的活動分子，使鄰國的政局不安，以便乘人之危，圖漁翁之利。

【赴南京後一個小風潮】一個剛下台的軍政要人住在外國的殖民地，或租界裏，自然會引起許多方面的注意。他們是本着人棄我取的原則，用種種方法來拉攏，來酬酢，利用你剩餘的力量，作爲他們政治資本，以達成他們政治上的目的。我一到香港，已有人在那裏等候，向我遊說，勸我到南京去。南京，我是準備去的，但我雖然離開了我的團體，却不是因與團體內的中堅份子感情破裂，利害衝突，而失意出來的。我仍愛護我的團體，更沒有破壞和利用的心理，而是想調和團體與國家的衝突。我之決意赴南京一行，是想實行我的和平統一的主張，並非受了一般說客的變動。換句話說：要去南京是主動而不是被動的。我在香港逗留不久，就動身赴上海，轉赴南京。我自自然不須什麼介紹而逕自晉謁蔣先生。這次見面的情形，與十五、六年初見面時，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使我最感動的是蔣先生待遇我們這

些曾經反對他的人，和以前是一樣的誠懇，或者更密切一些。這種情形，想就是促成中國統一的因素吧！我將自動退出廣西的原因，詳細陳述，深得他的嘉許。他即以廣西善後督辦的名義，命我回去，收拾廣西的局面，這好像是結束內戰必有手續。但我之不願再參加內戰，和不肯作勾結破壞的工作，而孤顧在整同方面爲和平統一而努力的決心，是他所瞭解的。所以我在南京的短時間裏，許多向來反對我的人，就在我所住的旅館大貼標語。說我是「破壞統一的禍首」，「實行苦肉計」，「實行緩兵計」。要求中央懲辦我，並要求出兵討伐廣西，我祇好付之一笑。這個風潮，一時頗爲激烈。經由警察彈壓，才得平息。我在南京住了不久，就回到香港。廣西內部知道了這個消息，也同樣的起了一番騷動。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就對我加以攻擊。並牽累及省內以前與我關係比較密切的幹部。在那個時期，廣西的幹部，除了第四軍之外，半白以下的軍事幹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曾爲我的直屬部下。其政治幹部，更不必說了。要分又何必從分起？要去又如何去法？後來李白見內部情勢不安，乃通電爲我解釋，說明我是厭戰，自動離桂，並未破壞團體的行動，更與那些幹部無關。經過了這樣的剖釋以後，廣西的局面，始行安定下來。我在香港，也就很安閒的住了好多時候。

【漫遊海外的動機】二十年的春間，胡展堂先生在南京被扣留，孫哲生、鄒海濱、古義勤都離開了南京，祕密南下。有一日，早上，我遇見陳真如，他很狠狠的由輪船碼頭下來，邀我到香港大酒店裏密談。說是廣東的政局又變了，陳伯南聯合廣西，反抗南京，他隻身逃來香港。變動的主要原因，自然是爲了胡展堂被扣。我聽了這個消息，覺得政海風波，真是不可逆料。不久以前，他同我還是敵人，現在異地相逢，時勢變換，又相親密起來。而在另一方面呢，兩廣的軍隊，正是槍口互相對峙的時候，忽又團結起來了。不久，汪、胡、孫、古、李、白、陳、張諸人，相繼在廣州出現，彼此前嫌盡釋，重新開府嶺南。這一幕滑稽戲，我雖不會參加，但在旁看得非常清楚，也特別感覺有趣。

我在香港開住，預料他們必然的要來邀我參加。果然，不多幾時，李德鄰、白劍生也到香港來玩，大家相見，作了很多時間的懇談，絲毫沒有隔膜。他們要我回廣西去，我也頗想回去看看故鄉的情形。他們又要我參加這次的活動，我祇答應願在地方經濟建設上努力。我們到了南甯，起草了一個五年經濟建設大綱。這一個大綱的內容，當然是很空泛的，即使實行起來，亦未見得會收到多少的效果，尤其是在那時「軍事第一」的狀態之下，又那裏有從容的時間與大宗的款項，去進行這樣不濟急的工作？祇好作爲我那時回到南甯的一點抒情表現吧了。過了些時，汪精衛、孫哲生等到了梧州，我與他們在梧會面。他們在中山紀念堂一個大會上，邀我講話。我所講的意思，與他們口味，頗有不合之處，大家弄得很難爲情。隨後，他們示意，要我擔任廣西的經濟督辦，並且希望我回到廣州一行。我答應回到香港後，再加考慮。於是我乘船直回香港，他們也回廣州。我回到香港，想了一想：中央委我爲廣西善後督辦，他們又要我當廣西經濟督辦，我還是督辦善後好呢？還是督辦經濟好呢？在香港再住下去，一定糾纏不清，難以應付，不如早日離開爲宜。去上海，去安南，都覺不妥。還是到更遠一點的地方去走走，使耳目更清靜些。於是計劃先到菲律賓，再到台灣，轉赴日本美國。在太平洋上作一次長途旅行，考察各地的風土情況。一則可以免除無謂的麻煩，再則可以增進自己的見聞。在這匆促的情形之下，辦好入境手續，與盤斗寅（珠祁）二人，匆匆離開了香港。

【菲島首都馬尼拉】菲律賓首府馬尼拉距離香港不過六百四十哩。大郵船航行三十六小時，即可到達。人口六十多萬，商務非常繁盛，爲亞美兩洲航線之起點。當輪船入口之後，首先就遭遇到國際間種族不平等的待遇，白種人很自由的就登陸了，剩下的是日本人和中國人，必須經過許多嚴格的檢查手續，中國旅客被檢查的次序，更挨到最後。我們登陸後，住在馬尼拉旅館，這是馬尼拉最大的旅館，建築與設備，都相當宏偉。我們到那裏的時候，正是氣候最炎熱的季節，白天的溫度，總在華氏九十幾度以

上。很多长期的旅客，就跑到碧瑤去避暑。所以旅居在那裏的客人，並不很多。華僑在菲律賓賓有很長遠的歷史，並能刻苦耐勞，所以在經濟上頗佔勢力。各種營業都有，尤以經營珠細店（即雜貨店）者為最多。一九三〇年以前，有人曾估計全島珠細業，由華僑經營者，約佔總數百分之六十，可見他們經濟力量的雄厚。華僑中以福建人最多，經濟力量亦最強。廣東人次之。近年來日本移民日多，經濟勢力亦日漸擴展，幾有凌駕我僑胞之勢。原因是僑胞經營之貨物，除一部為國貨外，多半為販賣日貨。並以航運噸位之限制，運銷雙方，都發生很大的困難。日人則是直接經營，又得航運之便利，與國家之保護，自可獲優厚之利益也。

【菲島的商業管理制度】菲列賓政府對於捐稅之徵收，非常周密。那年正施行會計管理與機器計帳制度。華僑商店（其他商店想亦如此）必須雇用曾經政府訓練，對於政府負責之會計人員為會計，一切薪給費用，皆由商店負擔。稅收機關不費一文，而對於各商號的營業收支與盈虧情形，社會經濟狀況，無不瞭如指掌。所有營業稅利得稅等之徵收，均甚便利，絕對不致有隱漏短少的弊病。凡較大之商店，必須置備計算機。每日收支，皆以機械記錄為標準，以防會計人員通同作弊。自此種制度實施以後，政府稅收大增。而僑商則多以為苦。蓋華僑積習，皆認私人經營之帳目，為私人的，祕密的，如今被迫化為政府的，公開的，不但於習慣不便，亦不能作隱瞞政府逃避稅捐的行為，自然認為不利的事。但是我們客觀的為政府設想，此種商業管理的制度，極為完善，在中國尤有澈底做行之必要。

【菲政府的同化政策】菲列賓的法律規定，外國僑民，無不動產（如土地）的購置權，僑胞為購置不動產，大都與土女結婚。因為土女及土生子，皆有購置不動產的權利，故久居菲島之僑胞，其家庭大多已為土人所同化。我在一個僑胞的宴會上，遇到一個菲政府的農林部長，據說他的祖父即為華僑，第二代為土生，第三代即完全土化了。不過此人對中國的印象尚好，自認為中華血統。其他類此者很多，

皆認為菲律賓人，不願說是中國人，對祖國的觀念已淡忘無遺。我想此種法律，完全是一種同化政策，我國若不能積極設法挽救，則數十年後，在菲華僑，將盡為其所同化，而不復自認為中國人了。

馬尼拉沒有什麼名勝古蹟，唯有麥哲倫的墳墓，足供憑弔。這一位世界航海偉人，航行一三〇〇九海里，由西方到達東方，不但證實了地圖的學說，而且將西班牙的勢力，引到東方來。西班牙佔領菲律賓三百六十餘年，將西方的文明移植到菲島上面，可惜國力不振，於一八八九年割讓於美。美國治理菲律賓，於今已五十餘年矣。

【馬尼拉的社會情調】馬尼拉社會的情調，非常複雜，乍看好像是全盤美國化的，但仔細分析起來，便知道並不是那麼單純。西班牙的流風餘韻，在那裏還佔很重要的地位，西班牙語言，亦是重要方言的一種。古老而宏偉的教堂，都是西班牙神父在那裏主持着。我曾參觀過一個教堂，它對於當地的天文氣象，貢獻甚大。教堂內置有一種地震儀器，能夠將地震的情形預先報告出來。據說：「菲律賓是太平洋上大震源之一，亦是大風源之一，因為地震，以致氣象的劇變而釀成大風，菲律賓上的大風，便著名於世界。」西班牙式的古舊橋樑，到處還可以見到，橋身彎的很高，兩頭寬，中間窄，有些像江浙橋樑的樣子。汽車在上面經過，有一種不同的感覺，汽車快就會告訴你：「這是西班牙橋樑」。

菲島上的華僑，大都還保持着中國的情調，什麼「興」，什麼「隆」，中國字與外國字並用的商店招牌，隨處可以見到。會館與祠堂還保留着中國固有的建築型態。華僑辦的學堂，用的是中國課本，教師們講的國語，也很好，可是一般僑胞子弟，認為學習國語和學習外國語，是一樣的難易。而生長異地，反以學習外國語為有興趣，也許是比較適合實用的緣故。我在碧瑤，遇見了個姓陳的僑商，據說是當地木業的領袖。他同他的夫人，都是中國古老的裝束。他本人已經六十多歲了，不會說英語，也不會講普通話，祇懂得西班牙語和福建漳州土話。我們同行的人，既沒有會說西班牙語的，亦沒有會說漳州

土話的。大家相見，祇是心會。彼此同是中國人，而竟無法用言語來溝通情懷，真是莫大的憾事，這位僑胞，可算是西班牙時代的華僑的典型了。

【菲島的社會風尚】菲律賓還有一種尚未開化的土人，無論男女，都有堅強的體格，全身除了一條小布遮蔽下體之外，是一絲不掛的。他們大部居於北部的山上，房屋的構造很特別，四條柱子架搭成一間小屋，屋頂用葵葉覆蓋，代替瓦片，遠遠望去，好像一個鳥窠似的。他們有一種原始的木刻玩具，是遠處來遊歷的旅客所樂購的紀念物，也就是菲島土人原始文化的代表作。土人的戲園鬪雞場，我都去參觀過，完全是東方情調，沒有一點西洋色彩。菲律賓各地，均有電影院，放映的片子，都是美國出品，終日開映一個片子，循環不已，不分場數，隨時可以入場，隨時可以離場。有的是從頭看到尾，有的是從尾看到頭，祇要你願意，接連看兩次也沒有問題。這是與我們國內電影院習慣上不同的地方。菲律賓人對於音樂，具有特別天才，不但國內以此為職業的很多，就是大郵船上以及上海香港，隨處皆可以見到菲人的樂隊。菲律賓的民主政治，是美國化的。我到馬尼拉的時候，適值議會選舉，街道上到處可以看見競選的宣傳標語，五光十色，引人注意。投票期間，全國一律禁酒，預防酒後滋事，影響治安。那次選舉的結果，奎松獲得了最大的勝利。

【菲島的文化】美國人對於菲律賓的教育，可說是完全成功了。他們統治菲島，不過五十餘年，培養成了美國式的菲律賓文化。不論小學、中學、大學，在外表上說，都是美國式的建築。就內容上說，那是美國的課本，美國的教法。大多數的菲人，都認識了英文，學會了英語，菲人本來祇有極簡單的文字，與極複雜的語言，現在突飛猛進，幾乎完全變成美國的文化了。有人認為這是菲律賓文化的滅亡，我則認為這是菲律賓文化的改造。因為那些原始簡陋文化，本來是不值得去保存的呀！

【菲督府裏的大油畫】我們考察了馬尼拉社會的外形與內幕，進一步還想去參觀菲政府的許多重要

建設，如海軍基地、砲台、大水利工程、大水電廠、金礦等。但非得菲督的許可與介紹，是不能達目的。於是我們到總督府裏去會見總督，在會客廳裏看見一幅很大的油畫，畫的是西班牙政府時代用絞刑絞死土人的狀態。被絞的人，肌張睛突，正在作垂死的掙扎，絞手也在那裏竭其全力，以盡殺人的責任。兩個人一爲求已生而掙扎，一個爲謀人死而努力，這種矛盾的殘酷的景象，表現得非常深刻。這幅酷刑掛圖，佈置在督府客廳之內，不知是要暴露以前西班牙政府之虐政呢？還是作爲現政府施政之警惕呢？這就不得而知了。

【菲島的避暑勝地——碧瑤】菲督已到碧瑤避暑去了，我們空跑了一趟，殊覺失望。菲島地處熱帶，那時正是炎熱的暑期，政府及海陸軍的美國人員，大都到那裏去消夏，衙署兵營，差不多都變成了一座空屋。我爲達到我參觀的希望，同時馬尼拉的氣候，實在熱不可耐，也就到碧瑤去走一遭。由馬尼拉到碧瑤，大約有一百多公里，先由馬尼拉乘火車北行，至仁牙因港附近一個小站，約摸兩小時的時間，沿途是很平坦的田地，都是甘蔗園及蕉蔴園。糖是菲島的名產，沿途見到很多規模宏大的糖廠。蕉蔴亦是菲島的特產，形似芭蕉，而不結果。蕉皮可製成韌長而潔白的蔴線，菲列賓草帽與草蓆，都是這種蔴製成的，並不是尋常的草類。浙江的餘姚、黃岩、溫嶺一帶製草帽的原料，就是菲島所產的蕉蔴，我們在一個小站下了火車，換乘汽車，折向東行，約摸四十五分鐘，就到達山頭。霎時間，宛如身出火坑，進入清涼境界，心神爲之一爽。

碧瑤原是一座荒涼的高山，並無什麼名勝古蹟，山上原始的松林，極其茂盛，拔海在三千尺以上，比之我國廬山的牯嶺街，還要高些。他的氣溫，比馬尼拉低得好幾度，開闢的歷史，並未很久，當美國人初佔菲島，開始經營馬尼拉的時候，氣候炎熱，惡性瘧疾，流行甚劇，美國官兵病亡者頗多，於是用科學方法來撲滅瘧疾。我在馬尼拉曾參觀過美國煤油大王以一百萬美元捐築之瘧疾館，那裏有許多人在

培養研究由野外採集來的各種各色的蚊蟲，他們曾放映一張關於瘧之研究的影片，由瘧蚊卵子的孵化，幼蟲之生長，瘧蚊之長成，及瘧蚊如何吮吸人血，瘧菌如何傳染人體，原蟲如何發展，血球如何破壞，疾狀如何變化，從頭到尾，一目瞭然。在十數分鐘內，將瘧疾的原理，說得清清楚楚。科學之造福人類，真是偉大極了！但是科學能破滅瘧疾，還不能改變氣候，為求比較適應人類生活，還祇有在大自然的環境去找尋。碧瑤這個山地，正是理想的目標，既可避暑，又可避瘧，開山闢路，經營建造，美國政府為完成這個嶄新的美園型的避暑勝地，曾費了很多的金錢。邱陵起伏，地形頗為開闊，不但廬山黃山那樣的峻拔，而另有挺秀的風緻。那裏也有操旅館茶館業以及種植蔬菜的華僑，他們多半都是廣東人。我住在一家華僑開的華盛頓旅館，據說在我到達不久以前，我國府主席林公，曾寄寓於此，可惜時機不巧，未能在此見面。

我在碧瑤，曾參觀一所菲人辦理的初級農業學校，擁有面積廣大的農場。學生一進學校，即分組分授耕作地畝，教師一而授課，一而教以實作。並由學校供給種籽，貨與資本肥料，每年收穫，即運至市場銷售，所得之值，除歸還學校資本外，即為學生所有。一個學年的收入，可得百餘菲元，四年之後，學成，資本亦有著落，儘可以自謀生活。我覺得這個辦法，非常完美，如有機會，很希望到國內試行一下。我住在碧瑤不久，即去會見菲督，請求備文介紹參觀其他的重要地方。在他簡單的別墅內，亦是辦公的地方，作了二十分鐘的晤談，我們的談話完畢，他的女書記已將各種介紹函件用打字機打好，經他簽字之後，即封好交給我，完成了我的要求。外國人辦事的簡單迅速，真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一個偉大的水利工程】我得到菲督的介紹信後，即下山回到馬尼拉。首先去參觀一個偉大的水利灌溉工程。這個工程的地點，離馬尼拉城約四十多公里，係將一條很大的河截斷了，設有利用水力自動升降的水閘。在河的左岸，開築一個水門，總渠長二十多公里，支渠數目甚多。灌溉的面積，約有七萬

多赫特（一赫特約等於中國三畝）。據一個菲律賓工程師告訴我們：「這完全是美政府投資建設的。一切的工程設計，都是美國人主持，建設完成後，則交由受灌溉田畝的居民，組織一個委員會負責保管，並逐年撥還政府的資本。現在這個工程的資本，已經還清，工程的所有權，已為地方人民所公有，美國人也不再顧問了。從前這個地區，易遭旱荒，自從水利辦好，不虞此等災歉，因之生產日增，民間富力日強，土著對於美人，無不表示感激，」這位工程師並云：「水利工程的最基本工作，在灌溉地區的水準測量之正確，因為一切水利工程設計，都要拿他做基礎，往往因為水準測量不正確，以致工程完成後，有完全不能上水或局部不能上水的事情發生，或有水量不足之虞。那時再要修改，就費事了。所以他們在全部工程實施的過程中，水準測量的工作，佔了大部份的時間，其他工程敷設的時間，則並不很長。」他並表示，如果中國要辦水利工程，菲律賓有很多的專家，都願意到中國來服務，而且保證技術的完善。我很感謝他的誠意。

【參觀水電廠】第二個參觀的地方，是馬尼拉市東北八十五公里卡科萊谷附近的偉大水電廠。這廠設在一個很大很高的深山谷底下，負責的是一個美國工程師，他曾在北平燕京大學擔任教授，招待我們非常殷勤。我們在水頭入口處他的臨時住宅內，進了一頓午飯。據他說：「這個水電廠，可發動七萬多匹馬力，是菲律賓最大的一個電廠，就是在整個亞洲，目前也要算是數一數二的了。所發電力，除了供給馬尼拉全市及沿線附近各村鎮應用外，尚有餘剩。」電廠的全部工程，是新近才完成的。現已開始放電，那個作為水源的小河，流量並不很大，而且山雖高，山水溝成的瀑布，一個個不相連接。我便問他：「這麼小的水源，何以能利用它發生這麼大的馬力？」他笑着那破舊的板屋說：「我在這裏，已經住了三年多了。第一個工作，是測量雨量。第二個工作，是工程設計。這條河流的水源，雖不很長，但是這帶山脈的雨量，是非常之多的。一日之間，總有一兩次的大雨，或小雨。每年平均雨量，總在三千

六百裡之間。（按我國雨量，以福建西南部爲最高，平均不過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裡，）是菲律賓雨量最多的地方。河水每日至少要漲一次，你們今日很幸運，沒有遇到大雨。」說到這裏，他又手指對山的鳥窠說：「你們看，不久大雨就要來。」果然，不到一會兒的工夫，雲霧滿山，大雨傾盆而至。飯後，他領我到水頭入口處參觀，見一條直徑三公尺的大鋼管，將全溪的水，導入管內，大鋼管係由山腰打通，直通至山側的腳底下，成爲一個人造的大水柱，並不須利用天然的瀑布。由入口處到谷底電廠，水位差爲六百多呎。隨後至一個升降站上，進入升降箱，係懸在兩山間架設的鋼纜循環軌上。用電力將升降箱移至電廠的上空，再徐徐下降，到達電廠的下面。要上來時，則徐徐上升，仍回到原來的地方，比上海國際飯店二十四層樓的升降機，要高出兩三倍。發電廠在深山窮谷之下，汽車火車都不能通行，一切機器及建築器材人員等等，都賴這個升降機來運送，亦算是一個奇觀了。機器日夜在那裏轉動着，電力不斷在那裏發生着，使百千萬人得到了光明。我們不禁又想起愛迪生的偉大，科學的萬能，我問他：「萬一天時大旱，打破了你的雨量紀錄，又怎麼辦呢？」他搖搖頭，指着天空，對我笑笑。

「美國駐菲的海軍基地」第三個參觀的地方，是小呂宋島卡維特省的美國駐菲海軍基地，距馬尼拉市水路是十哩，陸路是二十哩。我們同菲督的一位副官，乘坐小汽輪前去參觀。那裏有設備完全的海軍醫院，電力強大的無線電站，海軍陸戰隊的營房，修理船艦的乾船塢，與修理場停泊場。我們均經一一參觀，並在那裏午餐。距此西北方十多海里處，有一個柯里幾多島，是控制馬尼拉灣入口的要塞。柯里幾多島的北面二三里，即是巴丹半島，亦爲海陸軍的重要根據地，爲一九四二年麥克阿瑟將軍最後抵抗的據點，亦可見形勢的重要了。我所能參觀的地方，可說是比較普通而可以許可外人參觀的軍事基地，覺得沒有很大的價值。於是要求再到柯里幾多島的要塞上去參觀，却被提督畢特婉言拒絕了。他說：「時間恐怕來不及，而且風浪太大，小汽輪會發生危險。」自然，我也知道那個地方他不會允許外國人前

去參觀的，而他謝絕參觀的言辭，却絲毫不露痕跡，使人感到很滿意。他並且說：「美國因為華盛頓條約限制，且菲律賓不久要獨立，美國不便在菲律賓積極設防。」這也許是實在的情形。那時畢特提督已六十多歲了，將屆退休的年齡。民國廿五年，他的後任提督到中國來游歷，我在漢口接待，問起畢特的情况，那位提督回答說：「他在紐約替一個寡婦管帳。」我聽了，不勝驚訝！問他：「一個地位高貴的提督，怎麼會願意屈就寡婦的帳房呢？」他說：「退休的提督，能有機會替一個有錢的寡婦管帳，倒也不大容易，也可說是幸運的事。」這個回話，使我深深感覺到人生職業之可貴，宦海浮沉，又有什麼價值呢？

「美英法三國的殖民政策」我曾住過法國的殖民地安南，英國的殖民地香港，美國的殖民地菲律賓。這三個殖民地的宗主國，比較起來，美國可說是開明的，他對於菲律賓的態度，是友愛的，善意的，用美國的教育方法，來提高非人的知識，用美國的科學生產，來發展非人的經濟，以期逐漸達到平等解放的境地。我們可以說，美國對菲律賓，是父子兄弟的關係，不是主人奴隸的關係，這是美國偉大的地方，也是他成功的地方。英國對於香港，就不同了。英人的秉性，富於保守，對殖民地的設施，也是保守的。雖然在物質建設上很努力，而於教育文化之促進，及風俗習慣之改良，並不注意。固然不能說這完全是惡意，但英人之不願殖民地人民有長足的進步，是無可諱飾的。法國對於安南，更不同了！她對於安南人，正以強大的控制力，阻礙他思想學術經濟的進步。因為不如此，惟恐安南人不甘馴服，而起來革命。社會上一切惡習慣，隨處暴露，毫不取締，而任其滋長。我們又可以這樣說：「法國對安南是壓制的，英國對香港是羈縻的，美國對菲律賓是解放的。所用的方法既不同，而所收的效果亦各異。安南的革命運動必有爆發之一日，目前的馴服，不能算是法國的成功，正是法國的隱患啊！」

「閩住殖民地的感想」一個下台的軍政人物，在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做寓公，表面上好像很安閑，而

實際上並不盡然。既不能討好於這一方面，另一方面的人就會設法親近你，拉攏你，甚至有許多人原來的立場各不相同的，因為大家都成了失意者，往往就在「失意」的這個相同點上，漸漸接近起來，另作新的利害結合。我與汪精衛方面，本來是敵對的，後來大家在政治上，都不待志，因此逐漸接近，而大談其團結。租界地殖民地真是一個融化萬流的大壑呵！租界殖民地的士紳，對於失意的軍人政客，應也特別殷勤。表面上好像是對你表同情，其實是「燒冷灶」，完全為求日後往來親密着想。至於軍人商人，官辦階級，為預謀將來的利益，亦各獻其殷勤。是以往來應酬，就幾無虛日了。

【日本對於鄰邦政治失敗者的陰謀】英法殖民地政府，一向是採取「治安第一睦鄰第一」的方针。失意的軍人政客，祇要不煽動他的民衆，妨礙他的治安，他也很放心很寬大的讓你居住下去。他也不想利用這些人，來擾亂鄰近的地方政府，他對於鄰近的地方政府，祇要不損害他的利益，便見神就拜，固不問其是那一種偶象。但是日本人就完全不同了，日本駐在中國租界內的領事，特務武官，平時除了治理正面的工作之外，對於政治失敗者的幫助聯絡，是無微不至的。如軍人政客逃亡時，他可無代價的盡保鏢與收容的義務，祇要你有求於他，無不盡力辦到。在中國近代的內亂史上，不論是南方北方，這種例子，不勝枚舉。這是日本一貫的政策，他保護這些份子，是要造成中國不斷的內亂，以完遂其吞併中國滅亡中國的陰險企圖。甚至想收買這些份子，為他日後的傀儡。現在偽組織的大小漢奸，在失意時，沒有一個不與日本人發生過關係的，這就是日本最後的收穫。我要旅行日本的消息，被日本人知道了，於是廣州的日本領事矢野真，香港的日本領事清水，都來找我，替我辦護照，寫介紹信，打聽船期，請酒餞行，說不盡的殷勤週到。日本藝妓的情趣，牛肉鍋的滋味，我也都是在那個時候第一次嘗試到的。

【香港人愛好運動之一斑】香港這一塊「維多利亞王冠的寶石」，她有明媚的山光水色，有清潔整齊的市街，有安定的秩序，有便利的交通，一切內地所沒有的物質，一切內地所沒有的自由，假使你有

饒有閒的話，都可盡情的享受。香港人對於運動，有特別的興趣，足球一項，獨開我國風氣之先，技術亦為全國之冠，球員終年在球場裏踢球，市民們也終年在那裏觀看，而不覺有片時的厭倦。每當足球大賽的時候，人山人海，搖旗吶喊，各有聲望，有如對敵作戰的情勢。賽馬是大眾公開的賭博，為買辦階級的高尚娛樂，馬主高坐看台，密切注視人獸最後一刹那之勝負，勝者則視同拱璧，敗者則棄如敝屣，此種運動，已失提倡尚武之初意矣。游泳在香港更為普遍，不但海水清潔，場所衆多，而且設備完全，一到夏季，男男女女就以海灘作為他們的消遣地方。既可健身，又極經濟。有人估計，香港的夏季，每天有五六萬人浸在海裏，約佔全港人口十分之一，可見香港人愛好游泳之一斑了。

【有趣的香港政令】香港政府的行政，有好些是值得我們稱道的。我最覺得有趣的，是獵狩規則與禁止虐待動物的規定。獵狩規則裏規定，某種鳥在某個季節裏內，才准獵取，到某個季節，即行禁獵，如果違犯了，就得受相當的處分。此外並且劃出一個區域，作為禽類安全棲息的地方，任何季節，都禁止在那裏打鳥雀。如果牠們有知識的話，飛到那裏，就是快樂的天堂，牠可以大膽的立在獵人的面前，獵人亦祇好對牠望望，而無可如何！

香港人到菜市買來供膳食用的雞鴨等活東西，都得像抱嬰兒一樣，把牠抱回，才可宰殺。禁止兩腳朝天，倒吊着拿回。否則警察看見了，就要干涉，或處罰。理由是這樣：倒提着會使牠難過，而成為虐待的行爲！我有一個朋友，打得一個受傷未死的鳥，警察看見了，要他立刻處死。據說：「牠已受傷，就不應使牠多受痛苦。」那個朋友與其他爭辯，結果，被罰了一元，這是有法律根據的。因此我想起中國也有過「秋彌冬狩」，「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的名言。但是實行的政令，却見諸外國。同時我又覺得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人類，受虐待的情形，恐怕比鳥類厲害的多，不知他們立法的時候，也會想到及此否？

【國籍安葬先母靈柩】我在菲島考察了一個多月，本想由那裏轉赴台灣，再到日本去。因為接到蔣

先生的電報，要我不必遠離。同時先母又定於八月間安葬，於是復經香港返籍，完成先母的喪葬之禮。先母自去年逝世，因我兄弟皆遠在外鄉，停柩在堂，已一年多了，而今兩廣軍事已局部停頓，我乃得有個里奔喪的機會。人亡柩在，觸目傷心，人子之痛，今猶未已！

【「九一八」事變發生】葬事既畢，本擬在鄉小住，忽閱報章刊載「九一八事變」的消息。晴天霹靂，觸目驚心！我雖閒居，而雪恥救國的責任，無容諉卸。乃匆匆離鄉，先後在縣城及梧州召集大中學學生及當地機關人員，勉以放棄內爭團結救國之大義。本着內心義憤，發為激烈言辭，不意反增各方之誤會。乃赴香港，從事奔走陳說，冀作萬一之補。

中國自華盛頓會議之後，朝野上下，多認為處列強均勢局面之下，可以苟且偷安。於是內戰循環，此仆彼起，發已不知有敵國外患矣。「九一八」事變發生，一時間，雖驚醒了國人的迷夢，而倚賴國聯的干涉，冀望事態不致擴大，得如十七年日軍佔領山東旋復撤回之故事，仍為一般同具的心理。故奔走呼號者，雖不乏人，終不易激發麻痺着的人心。大勢既屬如此，我祇好蟄居香港，隨俗浮沉，而內心的憂憤痛苦，固與時俱積也！

【廣西代表團赴滬共商和平統一】「統一團結，共禦外侮」。這一個全國一致的呼聲，響徹海內，終於使分裂的局面，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兩廣方面，派了代表團，到上海去商量和平統一的問題。代表團以汪、孫為領袖，我既不是兩廣方面的代表，亦未負有中央方面賦予的使命，而是以私人資格從中奔走的一人。他們邀我趁晨臣總統號輪船一同北上，船在中途，遇我生平未見的大風浪。我對唐孟濤說笑話：「假使這隻船沉沒了，國家一定可以減少許多的糾紛，大家既不能「同舟共濟」，若能「同舟共葬」，亦是一樁好事。」船將近黃浦碼頭，就見到一艘小汽輪，張了一幅大黑布，上面寫着：「上海各界歡迎各方代表二十個大字。」「團結禦侮」，「和平統一」，這一類的標語，更是五光十色的，佈滿了

船的四舷。表面上看來，似乎非常莊嚴非常熱烈的一回事，可是大家上了碼頭，便一哄而散，各走各的路了。

代表團在上海，與中央方面的代表，舉行一度會議。雙方商定，重行分配中委名額，由粵方就現有地區召開代表大會，加選中委。粵方中委出後，再召集中央全體會議，實行統一。這次會議，我並沒有參加，等到粵方中委選出後，我也隨同赴南京，出席第四屆一中全會。這次全會，關於中央政制上，有一個重要的決議，就是修正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以年高德劭的同志擔任國民政府主席，不負實際政治責任，並不兼其他官職，而另以行政院負責實際行政責任。這個修正書的原則，也是上海會議時商定的，全會不過提出作成正式法案而已。本來此種修改，是不合於國難嚴重的時勢之要求的。於法亦無依據。按照訓政時約法的規定，國民政府主席是享有實權的元首，五院院長，均由主席提請國府任免。經過這次改制後之主席，則不負責實際責任，無任免五院院長之權，由實而虛，兩法完全抵觸，這完全是遷就當時情勢的不得已的措置。根據這個決議，選任林子超先生為國府主席，汪精衛為行政院長，數年來分裂的局面，至此在表面上總算告了一個段落。和平是實現了，但是否真正統一，還是一個謎。

「一二八」事變期中的香港民衆運動」我於全會閉幕以後，又回到香港。不久，「一二八」的淞滬砲聲響起來了！在華南的人聽到了，自然要比「九一八」的瀋陽砲聲驚心得多。十九路軍及第五軍的英勇抗戰，引起華南人民極大的興奮。但因實力相差太遠，終不免於敗退，使閩北成為廢墟。香港人民因此更起了一次極大的衝動，對於住在香港的日本僑民，加以激烈的攻擊，日本商店的玻璃窗，都被打得粉碎。數十個日僑，或受傷，或擊斃。香港政府對中國雖表同情，但爲了治安及外交責任，不得不出而彈壓。一方面通知日本人居家不出，暫避羣衆的怒潮。一部份日本人更自動的回國去了；以往那種目空一切的傲慢態度，也改變了許多。這一次對外的民衆暴動，雖然有幾個中國人進了英國的監牢，但日

本人的槍砲，始終不敢向我射擊。被打死傷的日本人，也無法取得優越的賠償，可說是中國對外的民衆暴動最便宜的一次。不過暴動的地點，不在自己的國土，而在英領的香港，究竟算不了什麼體面的事！

【劫後淞滬一瞥】戰事至三月初，因十九路軍及第五軍之退出閩北而告結束，中日雙方簽訂了一個淞滬停戰協定。我既不出國，就不能長久閒住下去，國家正在統一的時候，也急於趕赴南京，擔任一種工作。當港滬輪船進了吳淞口的時候，同船的人，無論男女老幼，黨政軍民，無不羣集船舷，引領眺望，由吳淞口以至閩北一帶地區，真有偌大的吸引力，吸住了我們的視線。那些斷垣殘壁，瓦礫廢墟，至爲刺目，比讀「吊古戰場」文，不知要傷心多少！這便是「一二八」戰役所賜予的啊！我到了上海，曾偷閒驅車到閩北吳淞一帶，對這個新戰場作了一番巡禮。昔日的繁華，於今盡成灰燼。而被難的災民，又紛紛在廢墟之上，重新建立其生活的根據地。我試問那個車夫說：「假使十九路軍不抵抗日本人，上海是不是可以不致弄到這步田地？」他說：「假使我們的軍隊不打，這些地方的房屋財產，自然可以完全保存，但是國家的體面，却要喪失光了。現在僅僅是這個地方受損失，而國家的體面仍得保存。依我看來，還是打的好。」他的語氣中，似乎對我的問話，表示一種驚訝的不滿意的態度。可見國民的認識是正確的，尤其這些勞動階級的認識，實在比有產階級要清楚得多，因為他們沒有自己利害的關係呀！

十二 內政部工作時期

【中央統一後之國府新陣容】二十一年的春天，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屆第二次全體會議在首都南京舉行，兩廣方面所有原來和新添的中央委員，都到來參加，這是數年來分裂後統一的實現。國民政府也就在這時候實行改組。林公子超，以年高德劭，被選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孫科任立法院院長，居正任司法院長，戴傳賢任考試院院長，于右任任監察院院長。行政院各部的人事，亦隨之變動：我任內政部長，羅文幹任外交部長，何應欽任軍政部長，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朱家驊任教育部長，顧孟餘任鐵道部長，陳紹寬任海軍部長，陳銘樞任交通部長，陳公博任實業部長，陳樹人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閻錫山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這是和平統一後，中央政府的新陣容。但胡漢堂先生在廣州，仍有他自己的作風，兩廣依舊和中央對峙着。可以說這次國民政府改組，祇是中央表面上的統一，而尚未達到全國真正的統一。

這個中央統一的新陣容，基礎並不十分堅固，在三四個月內，行政院內部首先發生了裂痕：交通部長陳真如（銘樞）提出辭職。他辭職的原因，非常微妙而複雜，當時我不很詳細知道，現在更記不清楚，但知中央對他的辭職，既不好斷然的批准，又不好堅決的慰留，結果是給予出洋考察的名義而另行派人兼代，這個代理人必須得到三方面的同意，作為過渡的橋樑，等到兩方面都上了岸，然後再將這橋樑拆除，中國政治上的人事問題，類多如此解決。這次陳真如辭職，我是被認為適宜的橋樑，而代理他的職務，一直等到兩方面的人事都安排好了才解除了兼代的責任。

不久，汪精衛又向中央提出辭職，並且立即離開南京，回到上海。這次的風潮比陳真如的辭職大得

多了！當時行政院的各部會首長，因為院長辭職，同時都向中央提出辭呈，表示責任內閣閣員共同進退的意思，這次的風潮，我又是從中奔走斡旋的一個。這個軒然大波，隨後由林主席出面，對全體分別予以慰留。但同時解釋行政院並不完全是責任內閣制，暗示即使院長辭職，各部會長也應繼續負責，不能全體辭職，致陷國家於無政府狀態。我記得蔣先生亦有電報分致各部會長回京繼續供職，可是有的是立即回京，照常辦公；有的仍逗留上海。汪精衛更由上海遷居莫干山休養，表示政治的病態。我被推到莫干山去向汪氏問候，並勸駕回京。這個任務，雖未完成，而我却無意中遊覽了浙江的一處名山——莫干山。這裏是滬杭富有人士避暑消閒的地方。山雖不高不秀，而建築佈置却充分表現出人工的技巧，尤其是萬竿翠竹，綠葉生涼，爲他處所不及。山上有著名的肺病療養院，據說整個莫干山的氣候，都適宜於肺病的療養。但是汪精衛的病，却是肝臟病，是否適宜，就難說了！我去見他的時候，他躺在床上，好像有很重的病。陳璧君一見我便說：「汪先生病得很厲害，醫生要他靜養，你切不可同他多談話，使他心裏不安！」並且同坐房內，好像監視一般。我將來意陳述，並轉達了南京方面的意思，請他早日回京主持政治，他手指着自己的肝部說：「據醫生診斷，肝臟已經腫脹了好多，病情非常不好，不但一時不能回京工作，而且要到外國去作長期的休養。如果病好了，一定還要回來與大家共同努力。」他不肯和我談政治問題，祇是說些病症及多謝南京方面同人關心的話，弄得我無從開口，而陳璧君又頻頻要我到外面客廳裏去坐，祇好告辭出去。本來要人病多，時時都有些不易根治的病症帶在身上，政治上一不如意，就會發作起來。我既不是醫生，自然無從診知他病的真假輕重。於是毫無結果的回到南京，他不久也就出國休養。一直到二十二年春長城的戰事發生，才回來實踐他「共赴國難」的口號。

【軍事時期的內政部是一個冷衙門】內政部是在糧道衙門的舊址，民國元年，我在那裏人伍當小兵，不料二十年後，我又在那裏主管一部的事務，實不勝今昔之感。衙門是舊建築，破壞不堪，沒有其他

各部的堂皇美煥，一望而知它是一個冷衙門。但是內政部在行政院各部會排列的順序上，居於首位，足見立法的初意，視內政是很重要的工作。古人所謂「作內政以寄軍令」，可知內政自古就認為是建國的最基本工作。可是因連年戰事頻仍，為適應當前需要，自以軍政、財政為急先之務。加以國家未統一，軍事未停止，內政的工作，實也無從設施。所以歷來內政部等於閒衙，部長好似院內的傭員而已。自十七年四月一日成立以來，在四年又一個月的時間，已更迭了十個部長。第一任為薛篤弼，第二任為閻錫山（未到部，由次長趙戴文代理部務）第三任為趙戴文，第四任為楊兆泰，第五任為鈕永建，第六任為劉尚清，第七任為李文範，第八任為汪精衛（兼任），第九任為馮玉祥（未到部由次長彭學沛代理部務），我已是第十任了。在行政院中，這可算是最冷落最不令人注意的衙門。革命政府之下的機關，仍不免有些北洋政府時代的習慣。即是有錢的非常闊綽，無錢的窮苦萬分。我記得有一年年尾，很多有錢的部，不是發雙薪，就是給獎金。這些冷衙門的屬員看了，自然很為難過，很為不平，我為感情所驅使，不能不向他人請求幫助，在當時固然覺得非常難為情，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得非常難過。在革命政府之下同一的機關工作人員，為什麼有這種不平的現象，而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當時雖說是國難時期，有錢的人或有錢的機關，在過年過節的時候，總免不了公私廬酬，各樂其樂的。我們那個窮衙門，自然談不上如何的闊綽，在二十一年過年的時候，那裏同仁，大家湊集一些錢，作一次聚餐。并且由擅長遊藝的同志舉行一次歌詠會，凡是同人及其眷屬都去參加，情形也相當熱鬧，也算是窮人過年苦中求樂的辦法。而南京的某小報竟大肆譏評，以為在國難期間，是不應該如此。弦外之音，似乎想借此題目，有所發揮。事情鬧到汪精衛那裏，汪精衛說：「共赴國難，并不是如喪考妣的痛哭悲號，臥薪嘗膽，不過是後人的形容詞，難道真是夜夜臥着薪，時時嘗着膽麼？」這話，我倒頗同意他。同時想起社會上私人及公共的娛樂，不知要比我們部裏一年一度的聚餐及歌詠會要奢華得多少，

爲什麼就沒有人看見，就沒有人說話？

內政部的涵義是太廣泛了，幾乎把全國的行政都納在一部的範圍之內。且組織法上規定構成內政部的單位，爲民政司、警政司、土地司、禮俗司、統計司，還有衛生署，全國禁烟委員會。每一個司、署、會職掌的事項，都是全國普遍性的，必須全國統一，而且要很多的錢，很多的人，才可以將工作展開。在民國二十年以前，全國各省正忙於分裂的內戰，即使中央有很多的錢，很多的人，也無法展開工作。所以那時一般人對於內政部看法，僅是中央組織上一個形式的點綴品，並不見得是行政工作上的急要部門，一直到現在，這種情形還沒有完全改變，中國因內政的基礎不穩固，而影響到其他的行政工作，都不能有條理的順利的進行，真是革命建國期中的一個重大缺憾。蔣先生在「中國之命運」上說：「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國的帝國主義之手；而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就是操在我們全國國民自己的掌上。」就是這個意思。抗戰勝利之後，建國工作，更爲繁重。近年以來，內政部原來主管的衛生、地政、水利等，雖已分別獨立，而剩餘的工作，如地方自治、戶政、警政、禮俗、統計等，其在國家行政上的重要性，仍是非常顯著，實有加強努力的必要！

【我在內政部的作風】我到內政部後，雖說在那種情勢之下，不能十分開展我所主管的業務，但我的工作興趣，並未減少。每日按時到公，按時退值，將過去都員閒散的風氣，改變了許多。那些例行的文書工作，固然有很多是無補實際的，但許多實際問題，亦須從這些上面探討出來。在我代理交通部的時候，汪精衛曾對我說過：「不如你就真除交通部，而把內政部讓出來。」我說：「我仍舊喜歡做內政部，因爲我不是交通人才，而且那邊情形太複雜，恐怕應付不了。」其實，我又何嘗是內政人才呢？汪精衛說：「不料季寬先生對於內政部的工作倒覺得有興趣。」他的意思是這種工作，於我過去工作的歷史不甚接近，未必是我所願意的。也可以表示那時各部的輕重，不是以事業爲標準，而是以收入的多寡

及人的關係爲標準的。我隨將內政的重要性對他陳述，望他以後加以注意。我對於用人方面，是取量才器使的宗旨。當時部內除了新調一個次長甘乃光，一個總務司長黃祖培，及幾個庶務人員之外，其餘都是原班人馬，不但出乎當時那些部員意料之外，並且打破了當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風氣。因爲中國政界的陋習，往往一個長官更調，部屬亦大都隨而調動，所以到任的時候，各方介紹人員的八行書，比公文書還多，應付非常困難，有些長官在到任之後，多在報紙上大登啓事，以局面狹小，窮少僧多一類的話謝絕各方對於人員的介紹。我既不願登報，而對於介紹書信，除了必須答復者外，祇好投諸紙簍，因此可省去許多的麻煩，但是也得罪了很多。我這種作法，不但在內政部時如此，即在交通部及各省也是如此。而我的收穫，即是隨處都可發現有能力的幹部，爲國家效力，爲個人分勞，比較吸引自己有關係或視爲親信者要得力得多。而我每當職務交卸的時候，又省却了爲所謂有關係的親信者善後安置的麻煩。我常說：「一個長官如果認爲某一個公務員是自己的，亦無異於自己侮辱自己的人格。一個公務員如果認爲是某一個長官的人，亦無異於自己侮辱自己的人格。一個公務員職位保障，要在國家的制度上，自己的工作上去建立，不能在人的關係上去追求，這才是現代法治國家的光明現象。」

「我在工作上所遭遇的兩個障礙」我對內政部的工作，除了整頓內部之外，首先想明瞭各省實際情形。因爲我覺得中央與地方的隔閡，必須溝通。往往中央立法，因不明各地方的實情，以致制頒的各種法令，地方無從奉行。因地方之不奉行中央法令，遂引起中央與地方意見之分歧，由彼此意見的隔執與擴大，而演成中央與地方之對峙分裂的形勢。很多不幸的重大問題，其起因都很輕微的，若能從這些地方着手注意，於國家之統一，政令之推行，未嘗不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於是我在行政院會議上，提出增設內政部簡任視察人員，派赴各省，視察政情，以溝通中央與地方的政情，但因這等工作，不是低級

人員所能達成任務。於是會議席上有些人因爲不明白這種作用，以爲是增加高級人員太多，經費的支出太大，而不予通過，使我非常失望！我又鑑於全國水利機關，如華北水利委員會、黃河水利委員會、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導淮委員會、太湖水利委員會，有的是屬於內政部，有的是屬於其他部會，或者是無所隸屬的。內政部組織法上既有掌管全國水利行政的明文，自宜設法統一，以便管理。我會將這個意見，簽呈蔣先生，蒙他採納，准用他的名義敕案提出中央常會討論。但是因爲人事利害的衝突，雖然原則通過，而無形擱置，無法實行，這是我在內政部工作時期首先受到的兩個阻礙。我才感到全國各省的真正統一，固然很不容易，就是在首都的範圍裏，要求各部門工作的意志與步調的統一，也很困難！

【召開第二次全國內政會議】在廿一年的十一月間，內政部召開第二次全國內政會議，全國各省的民政廳長，省市警察局長，都來參加，即當時尚在對峙中的廣東、廣西的廳長、局長，亦都到來，情況空前熱烈。不僅會議本身的收穫良好，而會議以外的政治的收穫，尤爲偉大。中國的政治問題，是最複雜的，在統一中有矛盾，在矛盾中有統一。比如在分裂時期中，司法是統一的，郵政是統一的，海關是統一的，教育也有一部份是統一的。在陸軍大學裏，各方面的學生都在一個講堂裏面，一同學習各種作戰的方法。畢業回去之後，就站在各人的立場上敵對作戰，好像戰國的時候孫臏和龐涓同師鬼谷子，後來各事其主，而互相殘殺。歷史的事實真有遺傳的麼！這次的第二次全國內政會議，也就充分表現矛盾中的統一。這種情形，真有些令人費解！

這一次會議的內容，雖然很複雜，我們是設法使它簡化。比如民政、警政、土地、水利、禮俗、衛生、統計等，都是先由部裏作成各種詳細而具體的方案，在提案審查時，將各省的提案，研究其是否可行而分別歸併在某種方案之內，再提出大會討論，使各方面的提案，均成爲大會的提案。因爲過去一般人對於各種會議的性質，尙未能認識清楚，不論任何會議，都以爲同國會的性質一樣，某人要爭某人提

案的通過，某地代表要爭某地提案的通過，某黨要爭某黨提案的通過。國會的會議，就是政治鬭爭的舞臺，這種鬭爭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可是行政會議的性質就不同了，它是施政的方針與方法的決定，並不含有政治鬭爭的意義，並且應該設法避免含有政治性的鬭爭。如果在這種行政性的會議而含有政治性的鬭爭時，不但這個會議的本身得不到好的結果，而且要影響到整個國家的政治統一問題。因為那時侯國家的統一，尚在動盪之中，我之採取這種辦法，固然是會議上的技術問題，亦顧慮到政治上的問題。所以第二次內政會議，不像其他會議決議了幾千百件的提案，或通過了某人或某地的提案，而是得到推進各種業務的幾個完整的方案，可算是一種創作，也可算是這次內政會議的一種收穫。我以後在各省任內所舉行的行政會議，都是採取這種方式而逐步加以改良。現在各省各地舉行各種業務會議，亦多採用這種方式了。

在內政部掌管的幾項主要業務，我現在回想起來，尚有分別作比較探討的必要。一方面固可明白當時內政不能進展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為今後推進內政工作的參考。

「縣政建設問題」最重要的是縣政建設問題。國父在建國大綱上規定縣為自治的單位，也可以說縣為國家的基石，一切內政設施都要透過縣的組織，才能開花結果。縣政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但是自民元以來，縣的制度是破碎了，各省有各省的作風，一地有一地的辦法，還比不上滿清時代在形式上人事與組織——倒有一個統一的規模。各省的情形如何，我不知道，單就我所經歷的廣西來說，在民國十六年以前，就不知變了多少花樣。這種變化，多半是根據主管人的意見，及當時財政的狀況而決定的。在我的任上——民十四五年間——會行過縣政包辦的辦法，即每個縣政府，僅由省政府委了一個縣長，規定其每月應用的錢，至於組織如何，人事如何，省政府就不再過問，省所要求於縣的，亦僅是田賦的收入，治安的維持，其他的問題，就視為無足重輕了。所以在那個階段裏，當縣長的，對上級政

府僅是系統的關係，人和財的關係，而對地方的行政設施，可以憑着各人的良心與見地，爲所欲爲的做去。有若干人的確爲地方上做了一些好事，但是貪污枉法，或是無所建樹的人，也就太多了。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於十七年九月公布縣組織法，十八年六月，修正重頒。這個組織法的內容，與各省實際的情形相差太遠，實施的結果，成效不著，而且有很多顯著的缺點，以致不能完成建立縣政規模奠定自治基礎的功能。

那時候政府對於建立縣制的情形如此，在野的人士，却很有些人各就其理想，致力縣鄉建設的研究實驗工作。他們的動機，也許是因爲對於現行地方政制的失望，而想在縣以下的鄉村，作爲研究實驗的對象，然後進而及於一縣，以探求地方建設的途徑。所以那時候是談村政的人多，而談縣政的人少。如河北的定縣，山東的鄒平，河南的鎮平，都是在野人士從事村政的實驗基地，這對於以後縣政的演進有很大的關係。我爲了要明瞭各地實驗研究的情形，以爲改進縣政的參考，特先去定縣作實地的考察。

定縣的實驗工作，是晏陽初、陳筑山等領導的，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爲領導的組織。他們認爲目前中國人民所患的病症是貧、弱、愚、私四個字，要醫治這四個病症，必須從教育着手；以生計教育治其貧，以衛生教育治其弱，以文藝教育治其愚，以公民教育治其私。他們是完全站在教育的觀點上來從事鄉村的改造的。他們所用的經費，是美國煤油大王洛氏基金捐助的，并且還有一個美國人參加這個工作，因爲煤油大王同情於中國無教育的人民，在他賺來無數的金錢中，撥一些出來作爲一個慈善的試驗。數目的多少，雖無從知道，但我想總不會比他在中國賺去的錢百分之一還多吧！

我在定縣參觀了兩日，城裏鄉下都到過了。站在教育的立場來說，確有好多地方是相當成功的。他們要我批評，我說：「在現社會裏，如果離開國家的行政系統，想從旁得到政治上的成功，是不可能或是極不容易的事。平教會的目的是政治的改革，所用的手段是教育的方法。想單獨用教育的方法來達到

政治的改革，就是有政權的關係，亦屬不容易。若果離開了政權的關係，那就更困難了。」我希望他們要進一步的透過了政府的關係，以期收到更偉大的效果。因為當時有很多人士，認為自己都是清高的，官吏都是污濁的，而不知道清高的人士不肯積極參加行政工作，擔任政府官吏，可以使行政界中，愈加沒有乾淨的人。同時這些所謂清高的人士，一旦作了官吏，是不是能夠長久保持他的清高而不同流合污起來，也是一個問題。

鄒平、鐵平的研究工作，都是以鄉村建設為基礎的。我因時間的關係，未曾前往參觀。他們的作法不同，收效各異，不能相提並論，却都引起了當時社會上的注意，因此產生了實驗縣的設置：定縣方面，是翟六丁擔任實驗縣的縣長，廣西方面亦設了一個實驗縣——賓陽實驗縣，由定縣平教會聘去的湯茂如擔任縣長。山東的鄒平、荷澤等都繼續改為實驗縣。以後他們所收到實驗研究的效果怎樣，不得而知。更進而有江甯實驗縣，蘭谿實驗縣的設置，各省亦有相倣的設施，這就是當時縣政演變的情形，也是我國縣制改進史上的重要過程。

「派員赴各省籌備地方自治」實施憲政，為本黨革命建國的終極目標，地方自治的實行，又為實施憲政的前提。一個自治之縣，必須完成建國大綱第八條所規定的條件。所以在訓政時期的縣政工作，就以完成地方自治必備的條件。但在當時（廿一二年）有好些省份剛脫離軍政時期，有好些省份還在軍政時期。要整齊劃一的同時實施起來，當然有很多的困難。而在內政部的職掌內，自治是首要的工作，若等待全國各地訓政時期的完全到臨，而再同時開始自治工作，不知等到什麼時候。我以為不管怎樣困難，準備的工作，總應該先着手進行。在全國第二次內政會議之後，我就決定由內政部委派各省自治籌備委員，協同各省政府籌備自治工作的進行。在當時部裏要直接委派人員到各省去籌備自治，也有相當的困難，因為有些省行政當局，認為自治與官治是衝突的，至少認為自治時期尚未到來，所以在人選的方

面，就大費斟酌。唯一的條件，就是要找到各省可能接受的人。結果總算還好，選派去的人員，沒有被擋攔回來的。有的人到省以後，工作進行非常順利，有的人在省裏閒着沒有事做，但在當時的情形，也祇好任其如此。派到各省去的人，我都記不起來了，祇記得派到浙江的是許蟠雲。

【自治與保甲】從廿一年至廿四年間，正是中共在作歷史上大流血的時候。爲對付他們，在地方行政組織上，恢復了古舊的保甲制度，表面上看起來，保甲與自治是衝突的。所以當時在南京，就有自衛與自治之爭，好像保甲是自衛的組織，是自治的工具，與自治根本不相容。但事實上，保甲制度因爲組織上的嚴密，與法令上的嚴厲，對於人的控制，事的進行，都發生很大的效力。所以當時又有先辦自衛，復辦自治的折衷論調。其實保甲組織與自治組織，在形式上並沒有什麼分別，不過方法上一個是自上而下的要求，一個是自下而上的發展。而在當時的形勢與需要，自下而上的發展的效率，是比不上自上而下的要求來得迅速有效。所以在那時候的環境與需要，實施保甲制是必要的。就在抗戰的期間，保甲制度亦發揮了偉大的效果，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而當時持反對論調的人，一方面僅是在表面上立論，同時還受到另一方面的影響。因爲這種嚴密控制的組織，是反對中央統一的人所最不利的。於是就在自治的理論方面借題發揮，做出他們別有用心的一篇文章來。

【報紙刊物等的審查問題】內政部的職掌，好多是被割裂的。如報紙、刊物的登記檢查，圖書、雜誌的審查，電影戲劇的審查，依照規定都是內政部主管的。但這些事項，當時真正的管理權卻不在內政部，而在黨部及其他的部會裏，內政部對於這種工作，就好像一個備員，並不十分過問。我到任後，覺得這個情形，不甚允當，總得認真去辦理才是。縱然不能完全由內政部掌管，至少亦要與其他機關有同樣的努力，才不負了應負的責權。我確定了這個工作態度，起初就不免有與其他機關發生爭執的地方。最有趣的事，是電影檢查，他們以爲這是專門的技術，至少要懂得英文才行，內政部恐怕沒有這種人材

，所以就由他們作主了，但是內政部派去的人，英文程度也還不錯的。

【禮俗問題】禮俗也是內政部主要的職掌，專設一司來主管其事。我對於禮俗，根本上就沒有研究和興趣，尤其是這一司的主管人員，不易物色。老的一派人，他們所知道的是古禮舊俗。新的一派人，他所知道的是洋禮洋俗。我覺得在那時候或是現在，我國的古禮舊俗，是否值得維持或恢復，而洋禮洋俗是否適合中國的需要，都成為問題。這個問題，在當時雖然並不成為社會上的爭端，亦因為不成為社會上的爭端，所以就這樣的馬馬虎虎下去。不但內政部無改良與規定，就是中央最高當局，也未決定若何的原則。所謂禮俗司，就是一個極無作用的機構。禮俗原是社會上通行的一種生活習慣，生活習慣是自然演變的，而不是硬性的規定，更不能作永久的規定。在世界交通發達，國際關係密切的現代，必須在國際之間探求一種適合國情，適合世界的良好的禮俗，我們若果還拋棄不了舊的東西，而「敝帚自珍」，那我們就躋不上國際之林，而且要影響到種種思想物質的進步。

我在內政部的期間，是兩年又八個月——二十一年五月至二十三年十二月。自國府設置內政部以至我卸任時止，我算是任期最長的一個。但是我覺得自己對於內政上的貢獻太少了。這固然由於我個人沒有內政的研究與經驗，而當時環境的限制，亦是重大的因素。這個首席部直到現在，還是不怎樣為人重視。我在這兩年又八個月中，真正致力職掌內的事，實在太少，大部份的時間都在東南西北的奔走中過去了。（見另章長城戰役宣慰內蒙籌備遠征新疆）這種奔走對於國家有沒有益處，是另一問題，而我個人則增進了很多的認識。因此有人說我不是內政部長，而是內交部長。

每當我去奔走的時候，部裏的工作，都由甘次長乃光主持。他是留學美國研究行政學的，他為提高行政效率，想將研究所得，從部裏着手實施，而推及於各省。首先實施的是公文處理程序的改革。他會費了很多心力。研究出普通機關處理一件公文，從收文到印發，至少需要一個星期的時間，並提出如何

簡化程序，以節省時間的改進辦法。道於行政效率的增進，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內政部主管新聞雜誌的登記，圖書的審查事務，全國各地所出版的各種報章刊物圖書，無一不須送到內政部備查的，以前各省的省志縣志存在部裏的也不少，是以內政部實為全國出版品薈萃的中樞。可惜二十多年來沒有人把牠整理保管而任其散失。甘次長對此却極為注意，親自督導整理，成為一個擁有十餘萬冊的圖書館。這件事於以後來料的保存及行政研究的參考，具有極重要的價值。內政年鑑也是我任內着手編纂的。我交代的時，這些事物，也算是交代成績的一個重要部門了。

我的後任是黃膺白先生。他是長城戰後北平政務委員會的主席。那時他曾邀我當政務委員會的委員，我因內政部長的身份不便應許而婉辭了。後來北平政委會改組，他奉命改任內政部長，內政部就好像內外大員停轉的傳舍，亦是一件有趣的事，可是他未到任就因病去世了。

十三 長城戰役

【國聯調查團來華】自九一八之役，東北軍事當局因不抵抗而喪失遼甯吉林黑龍江三省的土。至「一二八」一役，上海十九路軍及第五軍奮起抗戰，予日軍以相當的懲創。結果，雖仍是失敗，但因此而使日人知道中國尚不可輕侮。同時他們也還顧忌到上海為世界各國在中國之最大市場，恐怕引起國際的干涉，不得不接受英美各國之調停，而成立了淞滬停戰協定。經此二役之後，我政府及社會人士，既感不抵抗之足以亡國，又鑒於抵抗亦不能勝利，乃要求國際聯盟，出而制裁。這樣一來，却弄得國聯左右為難。他們對於制裁日本，自覺無此力量，對中國合理合法的請求，又不能置之不理，乃以拖延敷衍之計，冀免拆穿「紙老虎」。他們的辦法，是以調停為名，組織國聯調查團，由英國李頓爵士率領。待淞滬戰事風平浪靜，才由歐洲動身東來。先到日本，取得他們的同意，然後再到中國來。他們在上海，在南京，以及在北平，都受到中國官方空前未有的盛大歡迎。一個被強盜劫掠的人家，強盜還盤據在他的屋角，正作繼續洗劫的計劃，事主亟向政府報告，請求緝辦，而政府不馬上派兵剿辦，先派委員來調查實情，已屬非常滑稽。而遭被劫的人家，反要對這調查的委員作盛大歡迎，希望他能夠秉公辦理，驅逐匪徒，追回失物，那更可憐之極了。我那時雖在南京，有參加這種歡迎貴賓宴會的資格，但是由於內心的驅使，也不願前去湊熱鬧，所以對於這強顏歡笑心痛肉麻的一幕劇情，也就無從描摹和記述。後來我在津浦路的火車上，同那些辦鐵路的朋友，偶而談起。他們告訴我這麼一段故事：「因為歡迎國聯調查團北上，把全國鐵路上所有最漂亮的花車，都集中起來，加以整理消毒。唯恐外國委員發現臭蟲，要笑我們鐵路辦得不好，而影響到調查工作，將會不利於我。由調查團北上到回來，祇津浦北甯兩條鐵路上

的員工，真是小心翼翼，比之侍候前清的皇帝，坐火車出關，還要週到哩。」即此一端，可見我們對於國聯調查團的重視，與對國際聯盟的信賴。不錯，他是解決國際糾紛的權威，也是收回東北的主宰。我們希望因不抵抗而失去者，仍從不打仗而收回。對於他們所派遣的調查團，自然應該待之以上賓，敬之如神明。然而中國畢竟是失望了！調查團來了之後，不但東三省收不回來，反多花了大筆招待費，所得到的，不過是一本不着邊際模稜其詞的李頓報告書。「賠了夫人又折兵」，真令人哭笑不得，下台不得。自己沒有國力，而一疊依賴他人，結果總是靠不住的啊！

【東北日軍得寸進尺】日本人在東三省，一面是以酒食敷衍調查團。一面是用武力「肅清」馬占山蘇炳文的義勇軍，給調查團一個不好看的顏色，等到調查團離開遼甯之後，他們的「肅清工作」，也已經做得差不多了。並且漸漸迫近熱河的邊界，準備繼續向關內進攻。中央見事態愈趨緊迫。一而令張學良所部，準備抵抗，並調集華北部隊，準備應援。那時中央大多數軍隊，因受江西中共牽制，無法調動。至廿一年冬，蔣先生乃命我同訓練總監部的徐副監景唐南下，和廣東當局商量。希望他們能出兵江西，擔負剿共任務，好讓中央的軍隊，抽調北上抗日。我們到了廣東之後，與他們商量應酬了好多日，都得不到要領。有一天的早上，廣東當局邀我去談話，很坦白的表示：「不但現在的情形，廣東方面，不能出兵。就是日後情形再惡化一些，廣東也不能出兵。」我得到他這個答復，固然是很失望，很懊喪，但我覺得他們的態度是很誠懇的。此公同我是多年的朋友，也可以說是同過生死患難的老朋友。他開頭就說：「我同你是老朋友，無話不可以直說。如果我用假話來敷衍你，不但對不起老朋友，而且會就誤了中央的計劃。我所以不能出兵的理由，想你也明白，不必我細說了。」我得了這個失望的確實答復，祇好離開廣州，匆匆回去復命。他派專車送我們到香港。我同徐景唐說笑話：「二十塊錢的頭等特別快車不坐，要我們坐專車。」因為我們急要離開了這個失望的地方，恨不得立刻就走。專車中要遊慢、小時

多的時間，真感得太慢了。而且還要給侍役賞錢五百元，才不失坐專車大員的體面，這筆開支，由那一個出呢？豈不是太不合算了麼？在車上，愁顏相對，作葉子戲消遣。說明誰負了，誰出賞錢。結果我是贏了，作了「大好佬」，錢却是他出的，這也是百無聊賴中的一件趣事。

〔奉命北上指揮長城戰事〕我回到南京，祇好據實報告。這時熱河的戰事，已經發生。中央仍是調軍北上。但數量不多，僅徐廷瑤一軍第廿五師第二師第八十三師。而東北軍及孫殿英的部隊，都陸續的由熱河邊境，及赤峯方而敗退回來，長城的情勢，日緊一日，蔣先生命何部長敬之主持北平的軍分會，指揮長城作戰的軍隊，並且組織一個參謀團，要我擔任參謀長。我對於這種對外戰爭的工作，無論任何名義，甚至沒有名義，都是願意擔任的。就隨同何部長北上，同行還有宋部長子文，他表面上好像是籌劃北方作戰的軍餉，而實際上恐怕還有其他的祕密活動。我們是由南京乘津浦路火車到徐州，再轉隴海路東段平漢路北段而達北平。這樣繞道行進，是惟恐經過天津的時候，日本的駐屯軍，會對我們發生不利的舉動。我們到了北平，都住在南海的居仁堂內。這時候的北方軍，都是張學良負責指揮，但東北軍是節節的敗退下來了。他雖然很告奮勇的要率領他駐在北平附近尚未作戰的部隊，到前方去，與敵作最後的決戰，以洗雪他不抵抗的聲名。但是他的身體實在太壞了，我們曾在順承王府見到他，差不多每隔一二小時，就要注射一次嗎啡針。每日要在中午十二時以後，才能起床辦公。這樣的人，要上前線去作戰，身體能否支持，固然是一個疑問。此外新近調來的西北軍、中央軍，是否肯接受他的指揮，也成問題。所以張氏的下野出國，便成了長城戰役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了。數天之後，蔣先生到了保定，何部長張學良和我，都奉召赴保定。蔣先生除了指示軍事的部署之外，並決定了張氏出國的問題。我們回到北平的次日，張氏即自動辭職，出洋考察，而且即時離開了北平。何部長才正式接收北平軍分會，我也開始執行我的新任務。

【我們的軍事部署】這時的敵人已經佔領豐甯、承德（熱河省會）、平泉、陵源、凌南各地，繼續的向長城推進，分向古北口、喜峯口、冷口各要隘進攻。但榆關（即山海關）的正面敵人沒有什麼動作。第一個原因，是山海關的天險，比較難攻。其次喜峯口、冷口攻破之後，山海關的後路，已被切斷，可以不攻自破。我方的戰略，則在固守各要口，依據萬里長城古代築成的國防要塞，與天然的險要，拒止敵人進入關內。以徐庭瑤軍擔任古北口方面，以宋哲元軍擔任喜峯口方面，何柱國、王以哲軍擔任冷口及山海關方面，並調山西綏遠方面的部隊，由傅作義指揮，擔任張家口一帶防務。這種部署，可以說完全是被動的，並無積極的企圖。因為這並不是全國整個性的有計劃的戰爭，而祇是局部的消極的應戰。而在敵人方面呢，亦是乘着蠶食中國的大陸政策，希望完成首先佔領東北四省的企圖。並掌握長城各險要，以爲日後繼續佔平津之準備。我們的部隊，除東北軍孫殿英一路由熱河作戰下來之外，其餘都是由各方陸續調來，各部隊到達長城各口的時候，敵人也到達口外了。

【各口的戰爭】在古北口方面，我們廿五師就和敵人在那裏發生了遭遇戰。關師長受了傷。他是此次中日戰爭中首先受到陣傷的將官。他回到北平協和醫院來醫治，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代表，以及機關代表，向他慰問致敬，幾乎哄動了整個北平城，這真是他的光榮，也就是國家的光榮。古北口雖然失去了，但在口內的要地，仍舊支持了很長的時間，第二十五師有一連人在一個山頭上作戰，大多陣亡，祇剩下十多個人，敵人要他們投降繳械，那個最後率領的班長拒絕了，并且拚命搏鬥，殺傷敵人一百多，結果是一個個都光榮的戰死。敵人隨後爲他們立了一個碑，題曰：「中國的勇士」。日本人的確做出。他不但對於勇敢的敵人表示敬意，而因此給予自己的士兵，一個很大的鼓勵。其實爲保衛國家而勇敢光榮的戰死，確是值得任何人敬仰的啊！此外可歌可泣的故事還很多，不一一記述。要之在這方面的戰事，要比其他方面激烈得多，這是中央部隊精神的表現。

在喜峯口方面，我們先佔有地利，敵人進攻，比較困難。宋軍（西北軍）素來是以能守著名的。敵人攻擊多次，均被擊退。有一次，在夜裏大舉逆襲敵人，獲得很大的成功。聽說俘獲了他們坦克車與大砲，及許多的戰利品。西北軍每個士兵，都佩有一把大刀，雪亮的鋒刃，柄上纏着紅綠相間的毛絨與紅布，好像戲台上耍武把戲一樣，確是鮮艷奪目。軍中刀法操演，與槍法的操演，同樣重視。不知他那次逆襲的勝利，究竟得力於大刀呢，還是得力於槍炮呢？這祇有他們自己才明白，而全國的報紙上，尤其是上海各報，就為大刀隊大吹大擂，寫得活龍活現，說是敵人個個被大刀砍死。因而敵人望見大刀隊，就害怕得發抖。上海婦女慰勞會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蓮兩女士，還特地到喜峯口去慰勞，並且手捧着大刀，攝了一個照片。她倆到北平來見我，同聲的說：「這把大刀，還有敵人的血，留在上面呢！」我聽了實在有些好笑！她們好像祇知道喜峯口的神祕大刀隊，不知道其他各口的部隊，同樣的在那裏作壯烈的犧牲，而不去慰勞。我說明了，她們還覺得驚異。停戰後，我在上海與申報館的老闆史量才談起報紙鼓吹大刀的問題。我說：「新聞界不去鼓吹正規軍的新式武器，而來鼓吹大刀隊，不是又要演出義和團的老把戲了麼！」他說：「新的沒有得吹，祇好把舊的來吹吹。」我當時嘆了一口氣，我們的抗戰如此，我們的新聞界也是如此。

【處理孫殿英部】其他各處，也有很激烈的戰鬪，但是比之古北口與喜峯口，規模要小一些，所以也不為人所注意，我也不能十分記得清楚了。軍分會的命令，本來是要孫殿英的部隊固守多倫的，但是他退下來了。據說：「祇遭遇敵人的少數騎兵飛機轟炸，就潰退了，情況很不明白，軍紀極壞。」何部長要我前往視察處理。我由北平乘火車到張家口，這時傅宜生（作義）駐張家口，我就同他坐汽車經張北縣沽源縣，到達多倫西南，約一百公里平地騰包，邀孫殿英來面談。因為他的部隊，都退到了那附近的地方。據孫氏說：「多倫在地圖上雖是一個大地名，但是人烟稀少，給養困難。而且四面都是荒漠平

沙，無險可守，就是沒有敵人到來，我這兩三萬人，也不能久居那裏。既沒有兵站，又沒有積儲，不待敵人來打死，也必餓死。所以說我軍紀太壞，事實上我是不能不承認，因部隊自開多倫之後，就沒有接濟，不由自己就地徵發，那來得食呢？至於說不見敵人就潰退，請部長看看我那些傷兵，那裏來的呢？務必請部長將我的實情，轉報何部長，並且妥為處理，我一定服從命令，絕無二心。」我聽了他的話，認為也是實情。在那個株樹不生的平坦地形，正是飛機坦克車騎兵發揮威力的場所，不要說是孫殿英那種部隊，就是極好的隊伍，如果沒有足以抵抗的裝備，也是不能固守的。至於他沒有二心，我也無法判斷。在那時却不能不先整頓他的隊伍。於是我答應撥給他四十萬塊錢，四萬袋麵粉，並指定他在沽源獨石口對北對東佈防，這事處理完畢，我就回到北平來。

「遊覽古宮與古物南遷」北平是中國的古都。民國四年，我在北苑入伍的時候，雖也到過，但那時不過入城訪訪友，及聽聽京戲，吃吃小館子，就度過了一個星期的假日。而且北苑離城還有二十多里，一來一往，已經費了好多時間，又不是每星期都可以出來，所以好多地方，都未曾經歷。而那時也還有些地方，尚未開放。這次在軍事稍暇的時間，就想到以前未曾到過及不能到的地方去遊覽遊覽。古物陳列所，是內政部的附屬機關。我當一個主管部長，自有前往視察一下的必要。那些古物名稱，種類實在太多了，那時我對於這些古董，根本不發生興趣，不過問問他們保管的情形，也沒有工夫去注意它，考究它。同時又去參觀故宮博物院，這裏的古物，比古物陳列所還多得多，並且更名貴些。除此之外，我還到各處宮殿去瞻仰瞻仰。在這次遊覽中，我最感覺興趣的，就是中國最後一個洪憲皇帝的寶座，與他的儀仗。洪憲寶座是用紫檀木製成的，和廣東最古老的酸枝木大椅差不多。但是四條腿很短，坐的地方很闊，雖有好多精緻的花紋。如果沒有人告訴你，你是洪憲皇帝的寶座，你一定不會知道他的價值和用處。後來我才想起袁世凱的腿子最短，身子很胖，所以要作這個怪模怪樣的東西，才合他的身材。可惜他

尚未坐上去，就倒下來了。我想：「如果他真的坐上了這樣一個笨傢伙，究竟是否舒服，倒也是一個有趣的謎。」這幾件東西，是不公開展覽的。據說：是恐怕有失民國的體面。其實還是恐怕洪憲時代的舊人看到了，有些難爲情，倒是真的啊。這次參觀，使我覺得驚異的，就是古物陳列所所長問我：「要不要帶一兩樣東西回去？」我聽了這話，非常難過。便責備他道：「這裏陳列的東西，可以任由你送人，任由長官來要的麼？可見你們保管的不盡責任了。」他聽了我這樣的話，就轉口說：「並不是這裏已經陳列的東西，而是有些比較次等，認爲不必陳列，且沒有登賬的東西，」這些保管人都是以前傳下來的，中間的弊病很多。據我所知，可以拿假的東西，來換真的東西，所以陳列的東西，是真是假，外人無從分別。而那些保管人又是社會上所稱「考古專家」，他們說是真，那一個同他辨別呢？不久，古宮博物院的盜寶案就發覺了，當北平軍事最緊張的時候，南京方面要將這兩處寶物南遷。而北平方面則以北平地方的繁榮，全靠這些寶物來鎮壓，紛紛起來反對。終以「國寶」應該由國家來保存，決定遷到上海的四行倉庫去儲藏。這是因爲恐怕自己的國力保護不了，還要借租界外人勢力來保護的意思。因內政部有保存古董的責任，爲慎重起見，對南遷的事，特地會同各方辦理。派來辦理的部員，到了北平，就向我來請示。那時候軍事正忙，我對他們說：「整個河北、整個北平、就要丟了，他的代價，不知比寶物大得多少倍，我必須用全力去保護這些土地，那裏還有心機去管寶物？我是重人重地不重物的，隨你們怎樣辦去就是了。」這就是國寶南遷的經過。「八一三」之後，這些寶物不知遷到什麼地方去。反正都是一些歷史的殘餘，我覺得並沒有很大的價值要保存牠，還是積極充實國防建設，才是正當的辦法。不然的話，國土喪失了，國家滅亡了，即使留得那些國寶，又有什麼用處。而且國之不存，寶將焉附，東京柏林的博物院裏，存着好多中國的古董，不是庚子年從北京搬去的麼？

「頤和園的天鵝」我有一次同何敬之逛西直門外的頤和園，這是北平最著名的名勝，那裏的景物，

的確是太美麗了！我最愛的是排雲殿的雄偉，長廊的爽直，站在萬壽山上，全園的美景，都收入眼簾，真是心曠神怡，幾忘却長城邊上的連天炮火！我們想到慈禧太后那時的國難情形，也和現在差不多。她居然有這樣偉大的魄力，移鉅大的海軍經費，來造頤和園。把整個國家的大海，築成園內的小海，把整個國防巨艦，改建遊玩的小輪，這個設計，真象徵着當時慈禧簽魚的朝政，這等苦中作樂的精神，千古能有幾人？但未知這位太后以及後來遊覽的人，有沒有受到這種象徵的暗示，而發生和我們同樣的感想咧！我們到了這小海岸邊，看到成千論百的白色天鵝，正浮游於泮冰綠水之間，玩味那春天的樂趣。牠們萬不料在這洞天福地之內，會蒙到狙擊的危險。何敬之與我，一向都好獵，隨行都帶有獵槍。我們見了天鵝，獵興大發，便動着射擊的念頭。事前曾問過管園的人，可不可以射擊？你想一個是軍政部長兼北平軍分會的委員長，一個是內政部長兼軍分會的參謀長，要射殺一兩隻天鵝，那裏會成什麼問題。於是我們便開始射擊。轟！轟！這是牠從來未曾聽過的槍聲，於是驚飛滿天，好似白雲朵朵的盤旋在海子上面，簷簷着不知所往。等到槍聲止後，牠們又飛了下來，真像一羣從未經過戰事的民衆，乍然聽見警報，就驚慌萬狀，一到警報解除，又似燕雀處堂，呢喃自得了！我們兩人前後一共射殺了四個。天鵝是一種貞禽，牠的伴侶，是終身不變的，萬一雌雄中，有一方遭遇不幸，則另一方不能再有所歡，而永遠過着牠悲慘的孤獨生活。所以當我們射殺這一隻的時候，那一個就不避危險的宛轉悲鳴，前來救護。有的是和他的伴侶，同歸於盡。這種愛的勇敢，值得我們感動。於是就停止射擊。次日，何敬之請客，就以天鵝肉作名貴的佳肴，所有那時華北的高級將領，及重要的政治人員，都嘗到了天鵝肉的滋味。中國社會流傳一句話：「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其實天鵝肉非常不好吃，簡直同老牛肉差不多，吃在口裏，索然無味，不知爲什麼流傳的俗諺，會形容得那樣美法。也許當日我們那些人不是癩蝦蟆，所以就覺得不好吃了！這是我們在北平時候一件趣事，但也是一件煞風景的事，到現在，我還是耿耿不忘！

「北平的新價值」有人說：「北平實在太好了！中西合璧，貧富咸宜，各安所安，各樂所樂，有很多為別處所找不到的特色。」其實這都是一種消閒享樂的看法。它沒有一些蓬勃的生機，而祇是深沉的暮氣，籠罩着偌大的城垣，在歷史上不知埋葬了多少的英雄豪傑，不知消磨了多少志士青年。它祇是葬送歷代皇朝的墳墓，而不是開基創業的源泉，雄偉的皇宮，雖值得景仰，而淪落的皇子皇孫，尤令人悲哀不已。煤山的柏樹，是經死崇禎的工具，南海的瀛台，是因死光緒的監牢，歷史上的悲劇，無一次不在那裏演出，殘羹剩滓，那裏值得贊美和留戀。然而就中國地勢講，北平的重要性，是不能磨滅的。他是控制東北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外蒙古對內對外軍事交通的樞紐，是我們國防上的重鎮。同時河北省境內儲藏有相當豐富的鐵和煤，四隣各省，無論礦產與農產，都以此為集散地。故在經濟上，亦為適宜於建設輕工業重工業的區域。因此我對於北平，不是重視它的陳舊靜止的歷史，而是重視它重新創造的將來，但不知道個希望，何時才可以達到呢！

「德國軍事顧問」同我在北平擔任作戰的指導工作的，還有德國的顧問團總顧問弗而采將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軍官。據說：曾經擔任少將級的職務。他們對於作戰上的規劃，並不見得有若何特別高超的見解，而都是我們可以見得到的戰略上或戰術上的一般原則。並且有好多地方，因為他們不明白中國軍隊的情形，而在計劃上，就與我發生參差的意見。例如在同樣大小的區域內，他認為用同等力量的若干個師就夠了，而我認為這一個區域不夠，那一個區域却夠了，甚至還有多餘。又如這一部份軍隊，他認為應該放在另一區域內，因為他不明白中國的軍隊在指揮系統上，有人的關係，在戰鬪力量上，編制的大小，武器的精劣，訓練的久暫，幹部能力的強弱，也各有不同，但他們以德國的眼光來看中國的軍隊，也同德國的軍隊一樣，來擬定作戰的計劃，就不免發生種種的錯誤。但這不是他計劃見地的錯，而是我們軍隊內容的特殊，沒有一定的標準的單位力量，可以用科學計算的方式，求得正確的結果。

而是要計劃者熟悉內幕一切的情形，用感情的神祕的方法，來指揮調度。我對他說明之後，他才恍然大悟。他說：「爲什麼不把他們統一起來呢！」這話，我可難以答復了。他又對我說：「要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增加，不但要充實武器，嚴格訓練，同時還要在服裝方面去改進，有很好的服裝，才可以養成他們的自尊心，不但軍風紀可以進步，戰鬥力量，也可以大大的增加。因爲要發揮至高無上的戰鬥精神，一定要能自尊的人，才可以做到的啊！」我覺得他這種見解和理論，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隨後他回德國去了，中央又聘了一位德國鼎鼎大名的塞克特將軍爲總顧問，他在德國當了很久的國防部長，他是凡爾塞條約後保育德國陸軍的慈母。有一次，在廬山蔣先生公館內相會，蔣先生提出很多問題來問他。他的答復，我覺得是很謹慎，也很平凡。談到對日的國防問題，他說：「最危險的是這條揚子江，必須沿江建築要塞，及設備很多的流動砲兵；否則一旦開戰，日本的艦隊部隊，就可直搗漢口，打擊到全國的心臟。」這種意見，難道我們都不懂得，而要一個德國的國防部長來當我們的顧問麼。所以我認爲充實中國的國防建設，而聘請外國高級的理論顧問，實在有些不切實用。因爲中國歷史傳統下來的戰鬪理論，戰鬪原則，如孫子兵法等等，都是相當正確，也可以說世界上談兵的理論和原則差不多都是同樣，沒有很大出入的。但是此等談兵的理論，也僅僅是一個最高的空洞的原則。要實施起來，還需要極大的物質，極多的技術，與執行的堅強幹部。現在我們所缺乏的不是最高的空洞的原則，而是物質技術與執行的幹部。由民國十三年，以後聘請的蘇聯顧問德國顧問法國顧問意國顧問，而又回到蘇聯顧問，恐怕都犯了這種錯誤，得不到多大的好處。

〔戰事失利北平告急〕戰爭雖在長城各要口穩定了一時，但以我們劣勢的裝備，單憑官兵的勇敢犧牲精神，與那個數千年遺留下來的古老而頹廢的萬里長城，總經不起敵人飛機的轟炸，和坦克車大炮的衝擊。到了四月間，各路部隊，都漸漸的敗上來了。最初是冷口方面的敵人，進佔遵化，宋軍乃不得已

而退守玉田豐潤以北之線，古北口方面敵人，更逐步進佔密雲懷柔，逼近順義，離北平的地方，不過是四十多里遠近。這時候雖已調到山西軍隊的一部，由昌平方面出擊，亦不發生很大的效果。後方又無軍隊可抽調，而且遠水不救近火，北平空虛已極，人心恐慌萬狀。同時接得情報，已有人在平津圍釀類似偽組織的活動，並且還有一些不願再向南方撤退的部隊，參與其事，形勢惡化，已到極點。一天的下午十二點鐘，軍分會的機構已準備撤離北平，並在馬廠的小站上，準備了火車，各人的行李，亦已包裝好了，等待命令一下，就要上車。何敬之黃膺白張岳軍王常李擇一和我一共六個人，在那裏作最後之會商及部署，據黃膺白報告：「由日本駐北平武官方面所得消息，如果中國方面肯派軍使向關東軍要求停戰，便可立即停止進攻北平，用外交方式，來結束此次戰事。並希望在夜裏二點鐘以前，給他們答復。」我們會商了許久，有主張撤退以保存北平的，有主張先進攻東交民巷的日使館及駐軍，而背城一戰的。有主張派軍使商量停戰的。因為事體重大，那時北平的長途電話，與南京廬山，尙未能通達，無法向蔣先生請示。因此不能立刻決定採用何種主張。最後我提出意見，調兵增援，既不可能，前方部隊，又正在潰退之中，在這種情形之下，自難收獲很好的戰果。萬一我們撤退，而敵人利用正在活動偽組織的人物，組織傀儡政權。即以他們作對手，而訂立協定，作為這次戰事的收場，將關東軍撤回關外，並不佔領平津，那時我國家的損失，更為重大。所以我主張一面佈置北平的城防，一面派軍使商量停戰。萬一停戰不可能，我們再行退出，就在北平作最後的抗戰，亦未始不可。這件事責任雖然很大，但蔣先生既要我們來負這很大的責任，在情勢緊張而無法請示的時候，我們應當就當前的情況，作適當的處置。萬一以後蔣先生不同意時，我們祇好大家共同負責，聽候國家的處分，萬不能再遲誤時間，而無所決定，使後果更不堪設想。我這番理論，多數都以為然。惟王審慎憤憤地說：「我就調炮兵上中華門，對東交民巷轟擊，不管他日本人也好，英美人也好，一概把他轟死，橫直也不過丟了一個北平，使英美旁觀者，

也受到影響。他們吃了這個虧，然後對日本方有所責難，誰叫他們同住在一起呢？」他這些話，自然是義憤的流露，終被我們勸止了。他就走上樓去睡覺，不再下來。這是當時一幕緊張沉痛而又帶些滑稽的好戲。

在停戰談判之前，有一天，九架日機飛到北平的上空，飛得很低，機上的太陽徽及駕駛人的面目，都可清楚的望見。那時既沒有防空警報，也沒有防空設備，我和何部長聽到了機聲，才跑出居仁堂，到堂外的假山石下去躲避。我們的高射炮隊曾經格格地放了幾聲，但敵機並未拉彈，就飛回去了。似乎是示威性質，事後英美外交界方面，深不以我們的高射炮隊的射擊為然。他們說：「日機不是來轟炸的，向它射擊之後，倒會引起它的轟炸或掃射。」揣測他們的意思，好像這種無希望的抵抗與無代價的犧牲是不值得的。但敵機轟炸不轟炸，祇有天曉得，也祇祇有他們外交人員才先得了消息。

那時在北平的日本武官的居住和行動，都是無限制的。常情況最緊急的時候，我們調了一部份部隊到城裏佈防，入夜即戒嚴，有兩個日本武官深夜在很僻靜的地方，亂闖亂進。我們負責戒責任的士兵喊口令，仔細檢查，本屬尋常之事，可是因此却引起了對方嚴重的抗議。說是我們的士兵拿大刀來侮辱他們，迫他們下跪，作殺頭的樣子。我想這一定是他們憑空捏造出來的，其目的無非要我們的部隊撤出北平城。日本人的扯謊，真可說是不耍本錢的，其中有一個武官，第二天帶了兩個武裝的步兵一同進來要求見何部長，這種武裝求見，在外交上是從來沒有的事。他的理由，說是恐怕生命沒有保障，所以要帶了兵回來。經再三拒絕而不得，我們不欲多生枝節亦勉強答應了。這種情形，比鴻門宴還不如，實在有些難堪。這個武官的姓名，好像是酒井隆，真是一個壞蛋，何部長對他痛恨極了。那時候，日本的武官在北平耀武揚威，都好像犯了高度的癡狂症，失去了理智似的。

【簽訂塘沽停戰協定的經過】黃膺白得到何敬之的同意，就同李擇一與北平日本武官商量，到了兩

點多鐘的時候，才回來報告說：「日本武官答應調停，並已電商關東軍的同意，希望我方立刻派定軍使，明日就同北平武官到順義前線去商量停戰。」這事雖然有了一個頭緒，但是派誰去充軍使，更比派誰單獨去銜鋒陷陣的人選，還要困難。因為這是一個忍辱負重的任務，無論辦得好與不好，在個人方面，不免受社會重大打擊，甚至有性命之憂。在中外的歷史上，已有過不少的例子，而在人的條件方面，既要能忍耐，又要能折衝，無論言詞儀表，學術地位，都要相當，才可勝任。於是選派參謀團的徐處長燕謀充任我方軍使，起初他是極不願意的，後來經大家再三勸勉，才啣命而去。由北平到順義，汽車行程，不過一個鐘頭。他於次日一兩點鐘的時分，就回來了。據說，「在順義附近一個村莊內的日軍司令部，舉行了一個接待軍使的儀式後，才開始談判，談判的內容很簡單，由雙方決定，即時停戰。中國軍隊撤退若干里，然後於三日內（時間與日數記得不是很清楚）雙方再派正式代表，在塘沽舉行停戰協定會議，簽訂停戰協定，由駐平日本武官作為見證。」這件事的第一個階段結束了。第二個階段，即須繼續進行。我方以後的代表人選問題，要比以前的更費斟酌。最後決定派熊哲民氏充任，日方則派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甯次郎為代表。（即現在指揮華中華南敵軍最高指揮官）這是當時北平軍分會處理長城戰役及塘沽協定的經過。這種前方權宜的處置，雖不斷有電報報告中央，但詳細情形，非得有人回去面陳不可。而且對於數日後塘沽停戰的方針，亦要請示機宜，於是派我在那日的下午五時，專車南下。過天津時逗留了一個多鐘頭，在子少侯主席處，匆匆食了一餐晚飯。並將情形面告，即時開車南下，除在濟南車站上與韓復榘主席作了一個短時間的談話，告知停戰的情形之外，沿途各大站，都準備有升火待發的火車頭，所以連加煤上水的工夫，都未攔攔。由北平到南京，僅費了廿二個鐘頭，真算是一個空前的快車紀錄。到了南京，蔣先生及各院院長都在廬山，本想即時乘飛機晉謁，但時間已來不及了。次日上午，即乘軍用機赴南昌。飛經黃山的上空，俯覽羣峯，宛如簪筍，並不見有何雄奇壯偉的地方，這也許

是心境不同，觀點各異的原因吧。到了南昌，在賀元敬家裏，吃了一餐午飯。又乘南潯路專車到九江，趕到牯嶺，已是午後四點多鐘。在牯嶺飯店的客廳內，晉見蔣先生。在座有各院院長及中央要人。我在一星期中，都是過的非常緊張的生活，又加火車的顛簸，飛機的震蕩，氣候的酷熱，精神疲倦，已達極點。一到廬山上面的清涼境界，愈覺昏昏欲睡起來。本來在蔣先生面前，雖不會下過不准吸煙的命令，但是大家都不好意思吸煙，就等於受了命令禁止似的。我那時候的確是太疲倦了，好多的事，好多的話，都好像記不起來，說不出來似的。於是我要求蔣先生，准許我吸煙，並喝了一碗極濃的咖啡，精神爲之一振。乃將這一段的經過，逐一的報告，報告完了之後，並請予我們越權的處分。可是蔣先生和各院院長聽完我的報告，除了各人補充的詢問之外，並沒有什麼討論與責備的地方。蔣先生並說：「你們這個庭置尙得當，事實上也不能不如此處置，以後的問題，我另有電報給何部長。」這個重大的集議，就算完結了。而我呢，喘了一口氣，卸除了千鈞的重擔。好好的在山休息了幾天，就回到南京，轉返上海的家裏，不久又回到北平。

「日本的關東軍和平津駐屯軍」這次長城的戰役，想起來，不但可痛，又有些滑稽好笑！與我軍敵對的是日本的關東軍，在熱河及長城一帶作戰，而日本所謂華北的駐屯軍，却駐在我們的戰線後方，北平天津——同我們的高級指揮部駐在一起，彼此還保持着和平的態勢。日本駐北平的武官如酒井柴山之流，還不斷同我們互相往來，好像和關東軍是兩個國家的軍隊一般，一個同我們作戰，一個在旁邊守中立。其實彼此却在那裏唱雙簧。我們一方面要與關東軍作戰，一方面又要防備平津的駐屯軍，即使他不在我們的後方發動武裝的行動，我們也必須作萬一的準備。平津是他們特務機關的大本營，他們數十年養成的漢奸間諜，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們無論軍事上的一切情形，不但平津方面的日軍，明明白白，同時關東軍方面，也清清楚楚。關東軍所有的情報，都是平津方面送給他們的呀。我記得因爲冷

口被敵人突破，不得不令何柱國在山海關的部隊，退回灤河以西。那天夜裏下的命令，第二天早上，平津的順天時報，就把這種消息登載出來了。恐怕敵人得到這個消息，比我們軍隊接到這個命令還要早一些。這種仗，如何打得下去。至於平津一帶的地形，駐平津的日軍，比我們的軍隊還要熟悉得多。他的軍隊可以在附近一帶演習，以前陸軍大學（在北平時代）有許多日本的軍事教官，現在都是部隊裏的旅團長了。陸大所有的參謀，旅行或演習，都在灤東北平一帶舉行的。這些日本教官率領中國的學生去研究實習，就是他們今日帶了日本軍隊來攻擊我們的準備。駐平津的日本武官亦無一不是時刻準備着這種工作。據說：「土肥原賢二在平津的時候，曾經數次徒涉過永定河，（即無定河，水勢變化無定，極難徒涉）試驗在何種水量之下，是何種的情形，居心叵測，概可想見。總之一七七」以後，侵華的日本將領，大抵均以曾經在中國擔任教官顧問使館武官之流為基幹的。松井板垣東條岡村壤谷酒井等，就可作為此中的代表了。

【日本是四重軍事】世界人士都知道日本是兩重外交——軍部和外務部——却不知道日本是四重軍事。陸軍有陸軍的做法，海軍有海軍的作法。而陸軍方面又有關東軍的作法，與平津駐屯軍的作法。甚至軍部的作法與派遣軍的作法，亦有不同。簡直可以說是「五重的軍事」。但是各別的作法說法，在表面上雖並不統一，而事實上則互相表裏。祇要與他國家有利，就各別的發展，變出各種的花樣來，作為烟幕，以欺騙我們。可憐我們許多日本通，及一般社會人士，還以為人家是不統一的。這個來走這個路線，那個又走那條路線，結果條條路線，都是人家有計劃的布置，最後都通通到東京。我們不知上了多少的當，受了多少的騙。就拿長城戰役來說吧，這關東軍發展的階段，他的目的，是要把關東軍的勢力，完全掌握東北的四省，所以到了佔領長城之後，他的計劃，就算完成了。並不是他的力量，不能佔領平津，而是要留一段文章與駐屯軍做做。所以駐平武官一說，就可以停戰，塘沽協定一成立，他就退

到長城邊上。顯然，他們是彼此分定界限，顯然的，他們是做好圈套，讓我們自己踏進去。廿四年的所謂何海協定，廿六年的蘆溝橋事變，就是駐屯軍發展的階段。由此演進爲整個的向中國武力侵略的階段，這不是很明顯的事實麼？唉！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早在三四十年以前，我們却不知不覺的睡在鼓裏，外交上那得不吃虧？軍事上那得不失敗？長城戰役，祇是整個悲劇趣劇中的一幕而已！

「長城戰役中的一個插曲」一個國家，打了敗仗，同敵國訂立好像城下之盟的停戰協定，不僅是國家的恥辱，而是每一個人民的恥辱。所以在歷史上，一個國家滅亡了，一定有好多道民義士，不是自己殉國而死，便是號召忠義，作最後之抵抗，如田橫的五百烈士入海自殺，以殉齊國。鄭成功唐景崧劉永福的繼續抵抗滿清和日本，都是歷史上昭人耳目的壯烈事蹟。

馮煥章先生（玉祥）在革命的人物中，是我久仰大名的。但以前未曾會過面。自北平擴大會議之後，他就隱居泰山，不肯下來。以避風雨的侵蝕。「九一八」「一二八」之後，國內大團結，他才到南京來。我和他初次相見，一身藍色的棉襖褲，襯着他高大的身體，與緊張的面孔，響亮的口音，令人見了，就有一種不同凡響的感想。後來他又回泰山去了，不知在什麼時候，才又遷住張家口。我有一次去拜望他，他請我吃了一頓粗糲的飯，雖然沒有大碗的酒，却有大塊的肉，與很大的饅頭。在長城戰事正在緊張的時候，他在那裏號召抗敵，所有以前西北軍及國民軍的將領，及其散在各地的部屬，都到那裏集結。此外並雜致好些抗敵的文人，成立了一個國民抗敵軍總司令部，他自任總司令，方叔平（振武）孫殿英任副總司令。塘沽停戰協定成立後，這個名目，還存在著。後來經了好多的商量，才取銷了。他仍舊回到泰山去。當他車過北平的時候，好多新聞記者去見他，問他對於時局的意見。他說：「這幾年頭很難說話，請大家嘗嘗紅菓（即北方的花紅菓）的新鮮味道。」蓋當時爲二十六年的六月間，正是花紅上市的時候，這又是長城戰役中一個有趣的饅頭。

【南下訪問兩廣舊友】塘沽協定成立了，北平的政務委員會也成立了，在打敗仗之下，簽訂的協定，那裏會得到滿意的條款？那些不參加打仗的人，及不明瞭當時情形的人，對於政府，自然表示極大的不滿，而加以抨擊。尤其是兩廣及福建方面，離開平津更遠，更不容易了解事實的真相。因而謠言紛起，似乎又要發動什麼新花樣了！因此中央又要我到香港去走一遭。這次的南行，並不指定什麼商談的範圍，而是以私人資格，訪問那方面的友好。把華北折衝情形，向他們解說。但是當謠言正熾的時候，新聞記者對於我的行動，非常注意。我爲避免他們的麻煩，很祕密的就上了船。並不是我懶講話，實在是深愧沒有話可以對他們說，但越是如此，而他們便越以爲有重大的祕密的問題在裏面，而越加增多了猜測和注意。我到了香港，很多的好友，都在那裏。我很坦白的將塘沽協定的內容，及我們當時在北平的情形，向他們說明。自然他們在軍事上都是諒解的。尤其是對我個人方面，不會發生什麼誤會。但是政治上的問題，許多不是表面上的原因，而是另有其他的文章，不能在表面上點出題目來。所以我這次南行，根本上就無所謂有結果與無結果。因爲原來就是一個半私半公的行動，大家見見面，談談天，洗洗海水浴，吃吃館子，就算是結果。

【赴山西觀光】我在香港逗留了半個月，仍舊回到北平去。因爲我在軍分會，還掛着一個名義，不能不回去結束一下。那時北平已經回復了歌舞昇平燈紅酒綠的景象。三四個月以前的緊張情形，和戰時氣氛，誰也不再放在膠海裏。這時閻百川先生正在山西進行他的三年計劃。我就借此機會，到山西去觀光。同時因爲「兵工統一」與「同蒲路軌」這兩個問題，受了軍政部鐵道部方面的委託，也要與閻先生解釋解釋。因談起山西的經濟建設計劃，大家都非常興奮。山西人的頭腦，素來以計算周密著稱。省內所有一切的建設，都由閻氏親身壁劃，力求經濟，而不稍浪費。我提到同蒲路（大同至蒲城由山西省籌款建築，太原至大同一段，已興工甚久）的路軌問題，他說：「如果照標準軌道建築，不但經費一項，

山西省負擔不起，而材料亦無法取給。時間方面，更不經濟。照我的計算，建築窄軌輕磅的鐵路，每公里祇需款一萬餘元，而建築標準軌的鐵道，每公里至少需要五萬元。經費增加五倍，現時那裏有這種財力。至於材料方面，除鐵軌機車卡車要向外國採購外，其餘的一切，均可就地取材，而無須仰給外國。如果要用標準軌道，則本地許多材料，都不能適用了。我原來預算，三年內就可全部完成，如果一定要用標準軌道，不知需要多少時間，才能通車。照現在山西地方經濟情形，在運輸上說，此種窄軌的運輸力，至少還可以維持二三十年，正太路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麼？他並指出日本的鐵道建設，也是由輕軌窄軌而逐漸改成標準軌，這是最經濟的辦法，值得我們仿效的。他這種理論，單就山西地方情形着眼，自然有相當的理由。如果就全國的觀點來看，就不見得合理了。但他已堅持那樣做，而一切的計劃，都是照窄軌來準備，怎能把他改變過來呢？在那裏，我參觀了他辦理的許多工廠，有已成的，有未成的，而以太原兵工廠規模為最大。自民國元年經營起，直到那時，已經二十二年了。由他一手經營，逐漸擴充。據說中國的兵工廠，規模之大，首推奉天兵工廠，其次便是太原了。這裏，一個月可以製造三千多枝步槍，若干枝機關槍，二十多門大砲（口徑大至十公分半），數百萬槍彈，數萬砲彈。新近對於砲廠及藥廠，還在那裏擴充。據說藥廠是最新式的，而且產量甚大，我會經參觀過漢陽兵工廠，但規模遠不及此。那時中央提出「兵工統一」這一個口號的要求。第一是制式的統一，因為太原兵工廠造的是「三八」式的六五口徑步槍，與中央的規定不合。第二是要由中央統一辦理，不能由各省自辦。並且要太原廠南遷。第一問題，據說為機器所限制，不易辦到。第二個問題自然更有為難的地方。我因問題難以解決，祇盡了轉達部方意見的責任，一切由他們自己去解決，不願多參加意見。

「太原的古董商場」太原乃三晉的故都，在「新時代裏，他仍保存着好多古舊的遺跡。榆次縣太谷縣就是古董的集散場，每年都有定期的市場。北平、天津以及上海、漢口的古董商人，都到那裏去採販

其實這些古董，一部份是山西本地古代遺留下來的，一部份是太谷等縣破落富家拿出來拍賣的。在二十餘年以前，全中國的金融，操在山西人經營的錢莊票號手裏，太谷人就是經營錢莊票號的巨擘。他們不但把各省的現銀匯回家裏，鑄成「沒奈何」，使劫掠者望而興嘆。而且把各省名貴物品，贖了回來，以供家人之賞玩。所以在那裏可以買到精緻的廣東象牙雕刻，紅木傢具，也可以買到福建的有名漆器，與江西的名貴瓷器，這都是那些富家的收藏物。民元以後，山西的錢莊票號倒閉了。在整個農村經濟破產之下，他們也漸漸破落了，不能不拿這些東西來換錢糊口，看到太谷縣城裏，一望渠渠的破敗大屋，便可想見他們當年全盛的景況。還有一部份古董，是就地仿造假充的，銷路也很不差。這等山西古董大多數都是轉到北平的外銷市場，許多外國人，都到北平來購置中國的古董。據說每年古董出口的價值，總在數百萬元以上。外國輸入的是現代的機器產品，而中國輸出的，乃是古代的手工產品，這個新舊時代生產技術的對比，是多麼深刻而動人的感想啊！

【大同的佛像】我在太原遊覽了十多天，就順道由晉北轉向綏遠一遊，汽車越過雁門關，這裏好像是古代對北方的第二道國防線。（第一道在大同以北）雁門關在歷史上更是有名的要隘，舊劇上表演楊家將的英勇故事，所指的地方，就在這裏。這齣名劇的流傳，使得社會上的婦人孺子，無一個不知道這個地名。但自現代交通發展以後，這裏的地形，便不見怎樣險阻了。我同傅宜生、趙承綬在古代長城的廢堡之下，進了一些粗糙的午餐，拍了一個照片，就向大同前進。當晚，宿在大同。大同為晉北重鎮，不但在古代的軍事上，有重大價值，即在現代，也是同樣的重要。二十六年日軍對山西攻擊的主力，就是由大同發動的。就經濟的觀點來說，大同也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列為平綏線上四大要鎮之一（即張家口、大同、歸綏、包頭）自從同蒲鐵路完成後，更成為現時中國西部縱貫線的樞紐，將平綏、隴海兩大鐵路連貫起來，他的地下，蘊藏着極好的煤。據云：「不但品質甲於全國，而且數量亦極豐富。」凡是遊

歷過大同的人，一定會想到雲崗的石刻佛像，在那裏的居停，必然很興奮的，引導你去遊覽。雲崗石窟在大同城偏西三十里的雲崗鎮附近，乘汽車祇要大半個鐘頭，就可以到達。是一帶石炭岩的山崗，傍山開窟。這個石窟中的岩石，雕成一個極大的佛像，整個的石窟，就好像天然的佛龕，以避風雨的侵蝕。在窟壁的各方，亦雕有無數的小佛像。此外尚有露天的大小佛像，係就山壁雕成的。佛像的數目，固然無暇計算，就是那個石窟和大佛像的高度，也無暇丈量。約略估計，總在六七丈以上。我們二十多個人，站在他的肘上，拍了一個相片。我們的身體，和佛像比較起來，真覺得太渺小了！我引用水滸傳上潘金蓮的兩句話：「拳頭上立得住人，胳膊上走得馬」來形容他的偉大，實在有些確當。據說：「這個大佛像的雕塑工程，經營了一百多年，才告成功。」此外大同城裏寺廟的壁畫，也很有名。尤其是那個健碩而美麗的半裸體女像，最爲壯觀，富有西洋藝術的風味，這是北魏的偉大遺跡。

【在歸綏憑吊昭君墓】我們離開大同，繼續北上，經平地泉，轉向西行，到了綏遠的省會歸綏。綏遠自設省以來，進步甚速，在四個內蒙特別區所改設的省份（熱河、察哈爾、綏遠、甯夏）之中，要算是最進步的一個。究其原因，可以說一半是得之於天，它有相當肥沃的土地，與可以灌溉的河流，所以物產頗爲豐富。一半是得諸於人，晉省當局在那裏經之營之，不遺餘力，所以他的教育文化政治，都有相當的基礎。綏遠的古跡也不少，最著名的青塚，即王昭君墓，亦在那邊。我們震於昭君大名，也不能免俗的前往一遊。詎知到了目的地，却大失所望。塚在黑河的旁邊，祇是一個大土堆，長着萋萋的荒草，除了一個碑記之外，別無其他的建築物，想不到這位歷史上不幸的女人，千載之下，竟有如此的吸引力，使到達綏遠的遊客，都會到她墓前去憑吊一番，我當時曾吟憶江南兩闕，以紀其事。其一云：

「來憑吊，正值塞峰高，野草年年燒不盡，夕陽紅照一荒坵，情往水空流。評漢史，千載有春秋，驚驚殺人攘外患，紅顏白骨付胡收，愧對女兒曹」。

「參觀民生渠」綏遠省肥沃地區，全在黃河的河套一帶，所以北方人說「天下黃河富一套」。河套就是陰山以南黃河彎曲的地方。在西爲臨河五原兩縣所轄，在東則爲包頭薩拉齊托克托所轄，都是便於灌溉生產豐富的地方。薩拉齊托克托境內，有新近由華洋義賑會所築成的民生渠。我和傅宜生主席同往參觀，先乘火車到磴口，（磴口有兩個，一個在綏遠境內，一個在甯夏境內，按磴口是水入口的意思，這裏是指綏遠的磴口。）然後沿渠流而下行。此處原來有一個舊渠，已因年久而淤塞了。華洋義賑會乃以工代賑，捐資修築。全渠長約五六十公里，灌溉的面積，估計總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這渠既名爲民生渠，所以那灌溉區，也叫做民生灌溉區，可惜工程設計，不十分精密，有些地方，不能上水。舊渠改了新渠，尙未見其利益。所以人民甚爲懷疑。因此就想起了菲律賓參觀水利工程時，那位專家的話：「灌溉地的水準測量，是農田水利工程的最基本工作。」民生渠就是犯了忽略這個基本工作的錯誤。

「一個以教會勢力爲中心的市鎮」中午，我們在一個外國教士主持着的教堂裏午膳。這個市鎮，就是以教堂爲中心，而形成的。他們初到的時候，僅有少數的人家，初來此地的傳教士，亦祇有幾個人。因爲他們根據不平等條約，握有治外法權，不但可以保護他們自己，而且還濫用權力，來保護他的中國教友，中國政府不能奈何他。他有自衛的槍枝，可以保護村坊，土匪也不能奈何他，他有醫藥，可以施恩於平民，他有金錢，可以放高利貸，可以屯積居奇，可以高價購買很大的土地，他有學堂，可以施行奴化教育，自前清咸同年間，他們就到來了。拳匪之亂，亦未曾受到若何影響，反而更威風起來。所以信教的人，一日多於一日。不但這裏如此，其他各縣，亦多如此。據說薩拉齊一縣之內，差不多有半數以上的人信教，其力量可想而知。這簡直不是傳教的行爲，而是以政治經濟文化力量殖民的方式。這種力量，從多方面滲入民間，比武力侵略，還來得狠毒而可怕。那時和我們同行的，還有清華大學剛畢業來此旅行參觀的男女學生。他們也很注意這件事，一個姓蔣的女生問我：「這是內政部應該管理的事，

不知黃部長有何感想？」這話，使我窘於應付。我們回到賭綫，就動身回北平，這就是我參加長城戰役的尾聲。從此之後，我就解除這方面的一切責任，而從事另一個工作。

十四 宣慰內蒙

【內蒙改省改縣後的情形】內蒙在中國地理上，現在已僅是一個歷史的名詞。昔日內蒙的區域，包含哲理木、卓索圖、昭烏達、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等六盟。除哲理木盟原屬東三省（遼吉黑）外，其餘五盟，已於民國三年劃為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特別區，各以都統總理其軍民兩政。迨民國十六年，本黨莫都南京後，為遵奉總理「民族平等」之遺教，復將三特別區分別改為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省。卓索圖、昭烏達兩盟，在熱河境，錫林郭勒盟在察哈爾境，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均在綏遠境。自東北四省淪陷後，內蒙的範圍，僅餘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三盟，及察哈爾十二旗羣，（歸察省府直轄）歸化土默特旗左右翼兩旗。（歸綏省直轄）盟之下為旗，為內蒙行政的基本單位。各盟所轄之旗，多寡不等。盟設盟長副盟長各一人，旗長稱札薩克，是世襲的，為該旗之封建領主，如有過犯，仍得削其爵位，另擇閑散王公之有功績者繼之。盟長副盟長由政府擇其盟內札薩克之賢明者任命之。這種盟旗組織，創自滿清，是清代統治蒙古重要政策之一。自從改省之後，靠近南邊土地肥沃人口衆多的盟旗區域，已經改為縣治，祇剩極北荒漠人烟稀少的地方，尚未改縣，仍以盟旗稱呼。同時為安定蒙人起見，不但盟旗的王公、貝勒、貝子（內蒙札薩克之爵共分六等一曰親王二曰郡王三曰貝勒四曰貝子五曰鎮國公六曰輔國公）等封建稱號，依舊保留，就是地方行政的實權，也仍操在他們手裏。又不僅盟旗如此，在已設縣治的地方，他們對於蒙古族人，尚有一部份之統治權。不過前者逐漸漢一併受轄，後者則僅是他們自己的蒙古族人。所以在設縣治區的蒙古人，不啻是受到兩重的統治，即省縣政府與盟旗兩重政治組織的統治。

「最近漢蒙的惡感和德王的政治慾」本來改省改縣，都是減削盟旗王公封建勢力，及改善蒙民生活的政策。但結果，王公勢力雖受到打擊，而蒙民生活，不僅未見改善，反而感受許多新的痛苦。（詳見下文）於是氣憤不平，而正好作爲王公貝勒貝子輩煽動利用的機會。自革命政府奠都南京，對於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口號，竭力宣傳。起初僅對於宗教的首領，如班禪活佛章嘉活佛等加以羅致，後來對於內蒙的王公貝勒貝子等亦竭力拉攏。民國廿一、二年，如德王（錫林郭勒盟副盟長）等都到過南京，並列席過中央全會的會議。宗教領袖班禪活佛，祇希望中央能援助他回藏，此外並無利害衝突的地方。可是盟旗王公，就不同了。記得有一次，在一個歡迎席上，德王曾發表演說，其大意如次：「我們到南京來，希望中央對內蒙問題，有一個解決的辦法，不意到了南京，終日都是被邀參觀赴宴，或是被請表演騎馬，對於內蒙政治，一字不提，實在使我們感到失望。」他並陳述內蒙自改省縣後，蒙民所受的種種痛苦。當時因爲語言的隔閡，語意的簡單，好多人都以爲是一種應酬話，並不十分注意。而我內心上，就體驗到德王是個政治慾望很高的人。內蒙不久就會發生問題。問題的核心，就是德王的強烈的政治慾。

「內蒙要求自治的內幕」日本對於內蒙，早圖染指。侵略內蒙的準備工作，亦早已開始。自從「九一八」事變之後，此種工作，更加積極。廿一年長城戰事發生，其軍事力量，已侵入察察兩省的邊上。這當然是內蒙王公所認爲時不可失的抬頭機會。果然，在廿二年六七月間，內蒙自治問題爆發了。當初，平津報紙所刊載的，不過是事實的表層，尙未知道他的內幕，是有強鄰日本爲其背景，他們在表面上是要求自治與自衛，自治要組織自治政府，脫離省的關係，自衛要組織軍隊，獨立抵抗日本。其時正當國軍在長城新挫之餘，許多人因不滿於塘沽協定之成立，與北方政治上的缺點，對於內蒙之自治自衛運動，自然博得一時輿論之重視而有些過份同情的地方。殊不知此種運動，是直接間接受了日本人的煽動與指使，而爲一個脫離國家統治的獨立運動，這可由此後反復的經過，與抗戰後德王附敵的行動，作爲

確切的證明

『奉命宣慰內蒙』內蒙古自治運動發生後，中央派我擔任宣慰內蒙的工作，同時解決內蒙古自治的問題。並派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趙次青先生襄助辦理。我以內政部長的資格，而對北方的情形比較熟悉，趙爲蒙藏會副委員長，而又係與晉省方面有關係之人。中央對此事人選，可謂鄭重已極。我於奉命之後，即着手準備。並向中央及蔣先生請示方針，均以相機處理，隨時報告，並須與晉綏方面閻伯川先生取得密切聯絡相囑咐，但未有具體的腹案指示。中央派員宣撫邊疆，過去未有成例。我們此行，不過是代表中央對蒙民宣示中央德意，與慰問的意思。有人說：「以前滿清派大員至蒙藏，必須置備很多的禮物，饋贈當地的王公與貝勒貝子，如團花，古銅色或黃色的綢緞，銀質的茶壺酒壺酒杯筷子及手錶之類，都是蒙人最喜歡的物品。」我們也都購備了些。各項工作辦理完畢，隨即動身北上。這時已是十月下旬。同行除趙副委員長之外，有李松風、賀揚靈、楊君邁、楊文昭、譚惕吾、池中寬、林競等十餘人，均由中央各機關調派。到達北平後，中外新聞界都非常注意，尤其是外國記者，對於我中央處理內蒙態度，訪問十分詳盡。這事在國內一部份開明人士，雖然感覺到這是一件邊疆重事：究竟深切關心的，却不過幾人。而國際方面，則認爲是中國民族間嚴重的政治問題。因爲這時，正當東北淪陷，傀儡政府出現之後。而內蒙有類似獨立之要求，實非其他單純的內政問題可比。我當時對中外記者發表談話，認爲實行地方自治，是中央一貫的主張。內蒙要求自治，祇要不違反地方自治的原則，中央自然可以允許。不過內蒙王公所要求者，似已逾逾地方自治之範圍。中間經過及背景如何，須親到內蒙巡視之後，方能明瞭。然後報請中央決定處理方案。天津大公報，爲澈底明白內容起見，特派記者汪君松年同行。蒙方知道我們已到北平，特派代表吳鶴齡（蒙人改漢名者）到來歡迎。這時天氣尚未很冷，但是南方人初到北方，精神上總有點冷的威脅，何況要到內蒙去。而且不能預期什麼時候才能回來，這種威脅，自然更

大。於是我們全體人員，在北平耽擱數日，準備寒裝後，纔乘平綏火車向歸綏（綏遠省會）出發。火車上了八達嶺，地勢漸高，氣候漸寒，到張家口，已是口外，塞北風光，迎人隨處，秋高萬樹，葉壓嚴霜，益增羌笛春風之感。張家口爲察哈爾省政府及察哈爾十二旗羣總管公署所在地。我們在此停留一日，晤見察省府各委員及十二旗羣總管尼瑪鄂索爾等。有靈廟蒙古王公方面，派來歡迎之代表包悅卿（蒙人改漢姓的）等，是日亦抵此。我們一度聚談，對內蒙各項問題，稍作詢問後，次日即登車繼續西行。經大同而至綏遠，火車繞行長城兩側，古代國防之偉大遺跡，今日一變而爲旅行中寂寞的伴侶，令人發生無限之感想。車到歸綏，與傅主席宜生及黨政軍首長相聚，交換內蒙方面之情況與意見，對於蒙古自治問題之內幕，知之更詳。

〔德王發動的自治運動〕此次內蒙古自治運動，發生於綏遠境內之百靈廟。這是一個很大的喇嘛廟，地以廟名，位於歸綏西北方的二百五十餘公里，爲北通庫倫，西通甯夏新疆，東通察哈爾北部之陸路交通要點。除了那個大喇嘛廟及數十家多爲漢人所營的小商店外，其餘都是臨時集散的蒙古包。倡議內蒙古自治運動的王公等，皆在此集合，小小一個鎮市，因此成爲內蒙古政治運動的中心，而聞名全國。在這班集合的王公中，有察哈爾省轄錫林郭勒盟副盟長德王，綏遠省轄烏蘭察布盟長雲王，伊克昭盟盟長沙王代表副盟長阿王，甯夏省轄阿拉善盟特旗代表以及各旗的貝勒貝子數十人。其中以德王爲主幹，雲王老耆庸弱，無所主張，阿王沙王皆傾向中央，內心並不贊成這次的自治運動，不過格於歷史上名義上的關係，不能公開反對。德王當時不過三十多歲，有蒙人強健之體格，有漢人靈活的頭腦，性情狡獪，政治慾望極大，嘗以現代的成吉思汗自命。他羅致了好些蒙古知識青年，其中有在中央軍校受過軍事教育的，也有在其他學校受過政治教育的。內蒙古自治運動，雖由德王發動，而這些青年，也是其中推波助瀾的重要分子。

〔自治運動之結所在和衛王叛國情形〕現在內蒙各盟旗，皆在察哈爾綏遠兩省境內，即歸盟十旗，察哈爾旗中之東四旗及四牧旗屬於察哈爾境內；烏盟六旗，伊盟七旗，歸化土默特旗，及察哈爾八旗，其中之西四旗屬於綏遠，在這兩省境內各盟旗的蒙古人口，正在銳減中。去年調查的人數，與今年的實際情形，有極顯著的差別。況且歷年又無正確的統計，所以欲指出內蒙人口數，極為困難。但據一般調查所得，最高的估計，不過三十五萬人左右。在察哈爾兩省人口總數內，僅佔百分之八弱。其分佈狀況，在已設縣的地方，十分之九均為漢人，在未設縣的地方，漢人亦多前往經商者。這些十分之九的漢人，都是歷年從外省移殖而來，尤其是平綏鐵路通車後，外省移來的人口，更是迅速增加。這少數的蒙古人，自然感覺到生活與生存的威脅。他們一向以游牧為生，自改省改縣之後，受到政治法律之束縛加多，這與他們一向的生活習慣，頗不相容。而且放墾的土地日多，他們游牧的範圍，遂日形減少，這是蒙民感受威脅最重大的一端。加以蒙民不善經商，彼此貨物的交換，必須假手漢人。商人惟利是圖，對於他們不免施行種種之欺騙手段，使他們經濟上受到很大的損失。以前有一家規模很大的商號，叫做「大盛魁」的，在北平、張家口、歸綏、庫倫各地，都有他的分支行號。內蒙外蒙的經濟權，差不多都是操在他一家之手。內外蒙獨立後，蘇聯曾以「大盛魁」為背景，作為一個劇本，到處演出他的把戲。由此可見蒙古人所受經濟上的痛苦，比政治上的痛苦，更為嚴重。所以他們之要求自治，其目的在解除經濟之壓迫，恢復游牧的生活。而在王公方面，於未改省改縣以前，整個盟旗就是他們封建的勢力範圍，可以予取予求，不受什麼限制。現在有了省政府縣政府，他們的權力與利益，就日漸減削了，雖然名號尚存，而實際所有，已不及過去十分之二三。所以王公之要求自治，其真正目的，乃在恢復其封建時代的權益。而恰好與一般蒙民，以不同之目的，作同樣之要求。昔人有同牀異夢之說，如今蒙古王公和道班蒙民，竟成了異夢同牀了。

綜上所述，種種複雜原因，不但蒙古本身有要求解決的需要，即中央對於國內少數民族的痛苦，亦有應行從早解決之必要。因為蒙古人民生活，若能解決，則德王等決難利用機會以背叛國家，完遂其個人之政治企圖也。可惜數年以來，我們僅僅在宗教領袖及王公方面，做了一些表面上的應酬工夫，而於蒙民之實際生活，未能注意改善，成為本黨執政以來內政上一大缺憾。不過此次內蒙自治運動，主要的要求，是造成一個獨立的政權，並且對於省縣制度竭力反對，主張將省縣所轄的土地，併入盟旗，而於經濟問題，却極少提及。在當時雖未必即有敵人三背景，而事實上不啻予蓄謀侵略之敵人以可乘之隙。試觀廿四年後，德王曾赴長春見溥儀，並到東京去見日皇。抗戰之後，華北淪陷，德王即受僞命，為內蒙政府主席，其造因未始非為廿二年之自治運動也。

〔斯文赫定博士對於我國邊疆的研究和著作〕我在歸綏稍作逗留，先派李松風、賀揚靈等到百靈廟與對方洽商，然後再開酌情形，親自前去。我在歸綏時，會到一位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博士，這人在帕米爾高原及西藏青海新疆一帶，從事探險工作，已歷三十年之久。因高原地帶終年積雪，他在雪光反射之下工作，日久月深，神經異常，必須在白天裏睡覺，黑夜裏才是他工作與活動的時間。這個奇怪的客人，學術造詣很深，對於中國邊疆上的特異智識，尤為豐富。他已是六十多歲的老翁，但是精神體力還很飽滿強健。外貌上處處表現出一位經過風霜雨雪長期鍛鍊的老探險家，他把在新疆青海西藏的工作情形，向我陳述，並希望中國政府對於這些地方，多加注意。臨行他把所著的「我的探險生涯」與「萬里長征記」二書，簽名贈我。並說這書已有十多國文字譯本，在學術上、政治上、軍事上，都有很重要的價值。我送他出門，隨即把「我的探險生涯」翻閱，文字生動極了。雖然內容大多數是記述在雪山或是沙漠中極其枯寂寞的生活，却寫得十分有趣，處處引人入勝，使讀者不忍釋手，好像自己親歷其境一般。這書對於自然科學的知識，和許多關於土人的勇氣。我在兩個晚上，將這兩大本書讀完，

引起了許多感想。斯文赫定是一個外國人，他為什麼肯費三十餘年的精力，在中國的邊境上，作這種探險的工作，中國的邊疆，實在太偉大了！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這偉大的邊疆，應如何注意加緊開發才是呀！我看完了這兩部著作，在宣慰內蒙途中，不期突發遠征新疆的念頭，這可以說是斯文赫定博士的偉著，鼓起我的興趣來的。

【歸綏百靈途中】三數日後，李、賀來電，報告商洽的情形，尙屬順利，請我早日到百靈廟去。我們將接洽情形，告知傅主席，再其他一度磋商，密取聯絡，並將各種手續辦妥後，即與趙次青先生徐月祥軍長等，一同前往。由歸綏到百靈廟，可通汽車，即綏新汽車路的首段路程，但要越過陰山山脈。在包頭以東，土人叫做大青山，在包頭以西，土人叫做狼山。陰山最高處，海拔二千五百公尺。山上產大角羊，又名青山羊，體重三百餘斤，其角大而彎曲，極爲美觀，外人多用爲室內之裝飾品。羊毛長三寸餘，粗而硬直，但底絨極厚，禦寒力極強，即貂狐亦尙有不及。據聞：「大角羊於大風大雪之時，必至山巔迎風而立，以爲快意。」可見其皮毛抗寒力之強。且氣候愈冷，愈覺溫暖，彌可珍貴。自歸綏行至山巔迎風而立，以爲快意。」可見其皮毛抗寒力之強。且氣候愈冷，愈覺溫暖，彌可珍貴。自歸綏行至五十公里至武川縣，與東邊之陶林縣，西面之固陽縣，同在一線，爲綏省山北之三縣，亦是該省極北之部份。設治時間，皆不甚久。過武川，綏沙拉毛林召，黑沙廟，即到百靈廟。自武川以後，沿途愈行愈荒涼，除一二召廟之外，人烟極少。數次經過小水溝，皆向北流，隨地沒入沙磧之小泊內，道路荒蕪難行，歷七八小時，方始到達，已燈火黃昏矣。

【蒙古招待貴賓的禮節】蒙人習慣，遇有迎送大典，必於迎送站所，張設蓬帳，爲遠客未到時自己休息之所。蓋荒漠之地，風沙襲人，舍此別無可資坐立之處也。我到達時，各盟旗王公及廟內喇嘛，皆分別設帳等候，已有半日。傅王、雲王及各貝勒貝子等，皆滿清朝服，紅藍頂戴，髮辮後垂。廟內喇嘛，着大紅袈裟，白鹿禮帽，禿頂半露，兩相輝映，另有風趣。我等宛如置身異國，已不復見漢家範度矣。

。彼等趨前向我表示歡迎之意後，即各回寢帳，我即依次到德王靈王等帳內答謝，稍作寒暄。至是賓主之禮乃成，各自撤帳歸還寓所。我的行轅，即設於百靈廟內之別院。次日，彼等到來謁見，並獻哈達（哈達，乃長五尺淺藍色之薄綢，上有花紋，爲蒙人見面時表示敬意之禮物。）我亦親到各王寓所，照樣回敬，並將所帶之銀器、綢緞、手錶、茶葉等禮物，分贈各人，蒙人每早初見面時，開口即問：「爾爾昨夜有沒有着涼？」蓋彼等以爲南人畏寒，故以此相慰問也。是晚，各王公等設牀招待，用蒙俗全羊席。這是蒙人最原始最鄭重的席面，必須有大典禮有貴賓方始舉行。其制，就羊羣中選取最肥最大之羊，宰殺後，整個用白水煮熟，各賓客盤腿環坐，於客廳四側之炕上，主賓坐於正上方，主人抬全羊置於廳中，先由蒙民唱歌，伴以短笛及蘇拉，其聲高亢而蒼涼。歌聲一起，全場不禁嚴肅起來。歌的意義，據說係祈祝豐年，並爲衆人祝福。歌完，主人德王割羊頭肉一塊，用刀尖挑獻給我，從人並獻奶酒。我右手接肉，左手接杯。主人復依次獻給其他客人，照例不能不受，並須隨即食完，方爲誠敬。我等皆爲南方人，酒酸肉腥，極難下咽。我勉強盡了一獻，以表誠意，幾至嘔吐。其餘諸人，都不能着口。主人見此情形，亦不作二次之獻。隨將局面撤換，改用漢席。席間德王語我：「這是蒙古風俗必有之儀式，明知南方人不慣，故於舉行儀式後，即改用漢席，否則，本爲敬客者，反以困客矣。」民國廿六年，我在武昌招待英國大使許閣森氏，談起蒙俗的全羊席，他也說一個南洋的故事給我聽，他以前在南洋某部落工作，與酋長頗相得，有一次，他的生日，酋長很誠懇的奉送了一份祝壽的禮品，這禮品不是別的，而是二個血淋淋的人頭。全世界各民族，各有其風俗習慣，如果主客兩方習俗相距過遠，往往主人是表示十分的敬意，而客人反感到十分爲難。上述情形，都是一個例子。

〔住在百靈廟的班禪活佛〕班禪活佛這時卓錫百靈廟；我到時他曾派代表歡迎。據說，佛是超人的，滿清對於活佛，皆敬而不臣，所以他不親自參加王公等有政治階級性的歡迎會。次日，我去答謝他，

他也來我的行轅回拜。這本屬普通友誼上的禮節，當然是平等的。當我到他廟中的時候，其門前地上，放置一塊大木板，有一蒙古人在那裏朝拜，拜法與我們通常所見不同。跪下後，將胸部靠地，手足伸直，然後以頭叩板打響。叩頭後，再行起立，重複照前跪下叩頭，想即是五體投地的意思。如此終日不息的拜，一直拜到活佛出見為止，才算達到目的，了却心願。若活佛摩一摩他的頭頂，就是無限榮幸的事。這人是由外蒙遠遠過來朝拜，已經拜了數日，班禪活佛送我出門時，特別給他摩一摩頭，他就將身上帶着的銀子及其他貴重的物品，盡量獻給活佛。據說有的祇是與活佛見一見面，得不到摩頂的榮幸，也就盡獻其所有了。朝拜活佛的人，所得的結果，各有不同，那就祇能怪自己的誠心不誠心，不能怨佛緣的厚薄了。這裏終年有人前來朝拜，所有獻銀收入，也就非常可觀。據熟悉內幕者云：佛緣之厚薄，與獻銀的多少，頗有關係，獻銀的數目，至少是十兩，班禪活佛的行轅，有一定編制的佛官，並擁有一個一二百人的衛隊，還有一個軍樂隊。他的行轅規模之宏偉威風，比之南京的院部，有過之無不及。他的一切用度，中央都有額定之給予。但是他在盟旗裏面，無論是食的用的住的，無一不是毫無代價的取之於各盟旗，這也是蒙民極重大之負擔。不過在這極端迷信的社會裏，大家却安之若素，並不認為這是痛苦的事。活佛在盟旗請客的方式，也與普通不同。在一個客廳裏，擺着一張桌子，祇有他和我二個人的座位，其餘的客人，另在一個地方，也另有人相陪。我們到後，他舉行扶輪金剛法會，為國家祈福，他請我去參加典禮，我當時頗費考慮，因為參拜法會，要行三跪九叩禮，這是一樁不甚習慣的事。因此我託故請趙次青先生代表，並邀各同事參加，而活佛臨時將禮節變通，蒙人行三跪九叩禮，漢人行三鞠躬禮，在一個場合中用兩種禮節，亦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故。

活佛在內蒙，對於宗教上，固然擁有很高的權威。但在政治上，一般王公都不尊重他的意見。據說，這是政教分立的緣故。百靈廟內還有二個由外蒙逃過來的活佛。外蒙自依附蘇聯獨立後，活佛的地位

，已經沒落，他祇好求食內蒙，否則生活無法維持，不免有變成「古佛」的危險。我會經問過由外蒙到來拜佛的人，據說對外蒙情形，多不甚清楚，也許是不肯對我實說。我問他們對於共產主義的認識如何？現在外蒙人民得到了些什麼好處？他們的回答，都是支吾其詞。對於共產理論，可謂毫無所知，祇是說他們的牛馬羊等家畜，因為有了獸醫的設備，不致再有因瘟疫而成羣的死亡。這是因為牛馬羊是他們最重要的財產，是他們生命所寄，所以對這種獸醫的設施，首先感到興趣。其次，則為現在已不再受中間商人剝奪其應得的利益了。我想這也許就是外蒙政府的一點小恩小惠罷。就政治觀點來說，此種恩惠，僅僅是一點消極的作用，根本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政績，但從眼光短淺知識幼稚的老百姓看來，已經是不得了了。如何施以更有效的方法，從積極方面，發揮政治力量，使蒙古人民的知識水準提高。同時發展經濟建設，使他們得更大的實惠。這不僅是蒙古人民的幸福，對種族文化，國防經濟，都有莫大的關係。而外蒙政治的煽誘伎倆，自更無從施展，這是政府當局最宜深切注意的問題！

「蒙古人口銳減的原因」蒙古的人口衰退情形，至堪驚人。據我所知，外蒙的人口，不過九十多萬人，內蒙也不過三四十萬人，連各地的蒙古人統通計算在內，最多也不過二百萬人左右。我們回想成吉思汗及忽必烈大帝的蒙古全盛時代，他們以武力統一中國，縱橫歐亞，必有極強盛的人口基礎。照現在的蒙民人口數量，即使回復到十三世紀，任憑成吉思汗與忽必烈是多麼英勇强悍，恐怕也不一定能統治支配歐亞兩洲廣大的地域吧！照我的推想，當時蒙古人口，必比現在多出數倍以上，總數當在一千萬左右。八百多年以來，何以減少到這個程度？其原因頗多：第一，蒙古人以游牧為生，他們沒有經濟與文化的基礎，無論在蒙古區域的內外，都容易被有經濟文化基礎的民族所同化。中國就同化他們最大的力量。第二是地理氣候的壓迫，使其不易生活，而向外遷徙。中國古來的外患，都在北方。不是北方民族特別好侵略，而是北方的地理氣候壓迫，他們不得不南進，以求生存。中國是他們認為生活最舒適的

天堂，自然容易成爲他們略取的目的地。我在斯文釐定所著「我的探險生涯」及「萬里長征記」中，看出蒙古新疆境內，以前很多很好的土地，後來因爲沙漠南移，而變成現在的大戈壁，氣候亦隨而惡劣了。故沙漠南移，土地氣候變化，是促成蒙古人外移的主因，外移之後，遂被同化。第三，成吉思汗與忽必烈大帝的武力，不僅是軍隊的武力，而是民族的武力。據馬哥孛羅的記載，蒙古人的進軍，前面是戰鬪的鐵騎，後面跟隨着乘馬的男女老幼，所以蒙古兵到達的地方，亦是蒙古民族到達的地方。因爲武裝移民的結果，蒙古境內的人口，遂大量減少了。第四是滿清統治政策的狠毒。清廷畏懼蒙古，而欲消滅蒙古人，除了戰爭的屠殺外，特別提倡皇教。（即喇嘛教）清廷用敬而不臣的辦法，來提高活佛及喇嘛的地位，設定種種優待。凡爲喇嘛者，除免除一切徭役外，並給以種種特權。活佛與喇嘛，一切所需，完全由蒙民供應，或由政府，使其不勞而獲，以引誘蒙民。並規定蒙古三男中，必送二人去當喇嘛。人民文化低落，易生迷信，經朝廷之惡意提倡，莫不以出家爲無上光榮。是以蒙民爲喇嘛者日衆，幾佔內蒙人口之半數。喇嘛不許結婚，而准許其任意性交，以絕其後代，增加其花柳病之傳染。從而人口繁殖力日漸衰弱。以上所述，皆爲蒙古人口銳減之原因也。

【內蒙自治問題的處理】我對內蒙自治問題的解決，不採用會議的形式。因爲我的任務是巡視與宣慰，不是會議的代表。而且盟旗王公等知識甚低，根本上他們祇有一個自治的希望，而不能作成有條理的系統的辦法和條款，來提出討論。所以用會議方式來解決這個內蒙自治問題，是不會得到結果的。王公中間，主張內蒙自治的德王，便是一個中心人物。而且他幕後尚有若干激進分子在鼓動着，所以我就以德王爲對象，進行問題的處理。先派李松風、賀揚靈等與德王等代表包悅卿、蘇魯岱等舉行磋商。彼方固執成見，談判難得結果。蒙方要求的條件要點：（一）組織內蒙自治政府，其區域包括察哈爾省、綏遠省、甯夏省各盟旗，直隸於中央，經費由中央撥補。（二）凡是蒙古人，不論住在已設治地方，或

未設治地方，皆歸內蒙古自治政府統治，不受各省各縣政府之統治。（三）內蒙古自治政府得自行編練軍隊，由自治政府指揮調遣（四）保證盟旗王公名義永遠存在，並保證以後不再設縣，永遠不再開墾牧區。（五）內蒙古自治政府得自行制定法律。我對於蒙方要求，考慮結果，認為：第一是破壞了現時省的行政區域。不但違背國家既定的政策，即當時各省的當局，亦難通過。第二，在未設縣治區域之蒙人，自可歸其統治。已設治區域，漢蒙雜處，一地區內之人民，決不能同受兩個政府的統治。第三，自行編練軍隊，不但易與各省發生衝突，而且與中央正在進行之軍事統一政策不符，更須顧慮其易受日本的利用。第四，盟旗及王公之名義，不適於現代政治。而游牧部落，尤不適於現代生活。第五，地方政府自可制定單行法，但可以不與中央法令抵觸為原則。因此我即將所定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統方案，稍加增刪，於原案第一條後，增「蒙古原有各盟旗羣之組織及制度仍應保存」一款，於原案第二條後，增「前項地方行政委員會之經費，由中央酌量補助之」一款。並將原案第七條改為「關於蒙古全體事項，及各地方行政委員會有互助關聯之事務，每年得開聯席會議一次，或由該會議召集全體蒙民代表會議討論之，其議決案呈請中央核准施行。」又於第八條末段，應由「省政府委員會」之下，增「與地方行政委員會」字樣。第十條原文刪去，另改「蒙古地方行政委員會成立後，各省政府，應即停止設縣或設治局」一條。我擬具了這個增刪中央指定方案條文的意見之後，詳電中央請示。次日即奉復電照准。但與蒙方所要求者，仍相去甚遠。中間幾經磋商，幾至破裂。蒙人最主要的目的，要在各省之外，組織蒙古自治政府，竭力反對各省分治。此與當時實際情形和國家政策，極不相容，如這一點能解決，則其餘各點，皆易商量。續經數度磋商，允許其在百靈廟設立各省自治委員會聯合辦事處，俾資聯絡。其餘各點，大致尚無問題。但他們的內心，自然尚不滿意，而與各省政府之間，問題亦多。後來中央根據我們的報告，並經詳細商酌，特設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直隸於行政院，辦理盟旗地方自治事務，以示蒙事直隸於

中央，同時亦可調處各省政府與內蒙古自治委員會間的糾紛問題。

【蒙古人的遊戲和戰鬪生活】我在百靈廟，住有二十餘日，除了處理各種問題之外，並觀蒙人表演的各種特殊技能。最出色者為摔跤，乃人與人之角力。蒙人身強力健，一般均在內地漢人之上，其技術之純熟，亦極驚人。其次為擡馬，即以擡馬竿在野馬羣中捕捉所需要馬匹之方法，竿長數尺，上端繫極堅韌之索，索端繫小木棒，作成圈套。當日馬羣，約有馬三百餘匹，由我指定一匹，令其捕捉，表演者乘駿馬，手持擡馬竿，馳馬向指定目標追逐，相距數十尺，即揮竿擡索，將指定之馬頭擡住牽來，百發百中，很少落空，堪稱絕技。我前在北苑入伍時，據曾經參加征蒙的官兵對我說：「蒙古騎兵除攜帶槍枝之外，還攜帶擡馬竿作為武器。迨兩軍衝鋒接近時，即將擡馬竿擡我士兵，為其活捉者不少。」此種游牧工具，竟利用為戰爭利器，亦屬至可玩味之事。此外尚有徒手捕馬之法，表演者不持擡馬竿，徒手馳馬，闖入馬羣，突然下馬，將一匹正在奔馳的馬抱住，使其一步不能奔騰，其精神的勇敢與氣力的強健，至可驚人！蒙人射擊技術，亦甚精。一日，我與德王到野外遊逛，忽在約摸二三百公尺之外，發現一狼，正在奔走，德王的衛兵，持步槍連射三槍，將其擊倒，經檢查命中兩槍，可謂準確已極，蒙古人本來是一個戰鬪的民族，他的生活與戰鬪條件是一致的。蔣百里先生說：「生活條件與戰鬪條件一致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這自然是指某一時代的戰鬪條件與某一時代的生活條件而言。蒙古人在數百年前，他的戰鬪條件與生活條件是一致的，所以他能縱橫歐亞，所向無敵。現在蒙人的生活，還是數百年前的簡單的戰鬪生活。即以飲食而論，他們的食量很小，而且很簡單。每日祇是飲食少量的牛奶或羊奶馬奶及干酪（工製的旨士）等而已。穀類僅有炒熟的小米，是與奶類伴食的，並不是主要的食品。食肉雖較內地人為多，但亦不如我們想像那樣的多量。其食量雖然不大，而此種飲食品類之營養價值則甚高，取給攜帶亦甚方便，所以他們有強壯之體魄，與迅速之行動。馬哥李羅說：「元朝蒙古的騎兵，

可以三日三夜在馬上作戰。」此於其生活之簡單，與營養之豐富，自然有極大關係。我想蒙古人既是中國國民的一部，他的內部各種問題，今後必須迅求澈底解決，纔能使蒙民人人能成爲中國國防上堅強之分子，這次世界大戰，蘇聯之勝利，不是得到西伯利亞軍隊很大的力量嗎？

【蒙古的草原】百靈廟附近地方的土壤，亦適宜於農作物的生長。我曾經在一個小山谷內，發現很大的樹木。其他農作物的繁殖，當然也很可能。蒙古人因過慣游牧生活，不很需要耕地，而是需要廣大的草原。所以對於種植，就向不注意。不過蒙古草原，也快成爲歷史上的名詞，現在草原上的草，已不甚適於馬牛羊的食料，原因是馬牛羊都喜歡吃適口的草，在春夏時期，野草繁茂，自然可以得到充足的食料。一到秋冬，野草枯萎，畜類食料，便漸漸缺乏。蒙人又無儲藏牧草的知識與設備，因此嚴冬季節，畜類就要忍餓耐寒，嚼食覆在雪下的草根。草根既被嚼食，草類的繁殖，便受影響，於是好草一年少一年，蒙古的草原，日漸不適於畜牧。蒙古的馬與蒙古的羊，素著聲名的，可是王公們送我的幾匹馬，都是羸弱不堪，羊亦不甚肥美。其主要原因，即由於牧草不良，食料不足。可見專靠天然爲生活的人類與獸類，終久是要被天然所淘汰的。

【政治問題的初步解決】內蒙政治問題，磋商了許久，終未得到具體的解決。氣候日漸寒冷，雖然沒有下雪，小河裏的水，却已完全結冰了。若到大雪之後，道路都被壅塞，必須等到第二年春暖雪溶之後，方能回來。而遠道到來的王公貝勒貝子，亦都因未帶過冬的糧食與工具，亟願早日散去，於是我通知他們，如果在三數日內不能遵照中央指示原則，商定解決辦法，我們決定回京復命，不再等候了。他們遂不再堅持，將我所提的方案，稍加修改，予以承認。並由各王公通電中央表示擁護。至是內蒙自治問題，才算獲得初步的解決。我們一行，即啓程回歸綏。車過陰山時，口占一詞云：

大陰山，朝夕跨，既收牛羊限胡馬。蘇武留邊十九年，我今匝月歸華夏。（仄韻馮練子）

這時，已是十一月下旬矣，回到歸綏，復舉行漢蒙聯歡大會，閱兵、表演技藝、演戲，一連熱鬧了一星期之久。各王公及蒙人到者甚多，洵盛會也！各種事務處理完畢，即乘車南下。由大同乘汽車，繞道太原，向閻伯川先生說明這次處理內蒙自治問題的經過，再由太原轉北平，向軍分會何委員長敬之報告經過情形後，返京作成詳細報告，陳明中央，這一個宣撫內蒙的任務，才告畢事。

十五 籌備遠征新疆

【遠征新疆的先聲】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全國正籌議編遣裁兵的時候，忽聞白劍生將由北平率領國民革命軍五萬人赴新疆從事殖邊工作的消息，我即去電表示贊佩之意。不料後來因種種關係，他這偉大的舉動，未得實現。連年內戰發生，這等事關國家邊防的大計，也就無人顧問，這真是一件值得痛惜的事情！「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淪陷，國人懷於敵國外患之嚴重，急謀團結禦侮的方策。但其目的多是指當前日寇而言，對於西北的邊防問題，還是很少有人注意。廿二年我北上參加長城戰役，深感新疆問題的重要，如果我們能夠及早措置，則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未始不可補償一點邊疆的損失。同時新疆的軍事政治，正在一個非常混亂的時期，實在有趕緊收拾的必要。

【新疆的耕地面積】新疆是太偉大了！牠是中國最大的省份，擁有五百餘萬方里的土地，佔全國土地總面積六分之一，比浙江省大十六倍以上。雖然境內有很多的大山脈，與廣闊的戈壁沙漠，因而不能耕種的土地，要佔到三百萬方里之廣。但剩下來的二百餘萬方里可耕地，仍遠比其他任何一省可耕的面積為多。而新疆的人口，僅有四百萬，每人平均可得到半方里的耕地，（約為二百七十畝）這也是其他任何一省所不能及的。浙江全省的耕地，計田二千五百萬畝，地七百萬畝，山一千四百六十萬畝，蕩一百六十萬畝，合計四千八百二十餘萬畝。以二千二百萬人計算，平均每人得二畝二分。可是現在新疆已經墾闢的耕地，估計不過一千六百餘萬畝，僅佔全部可耕地千分之一五。如果二百萬平方里之可耕面積，全部墾闢，可得十萬萬八千萬畝，每平方里以五百四十畝計算，假如以每人佔有耕地十畝計算，就可容納一萬萬多的人口，所以開發新疆，真是解決中國人口問題唯一要策呵！

【新疆的畜牧】新疆是最寒溫熱三帶氣候的大地。農業之外，最宜於畜牧，自古即以牧業著稱。現在他的經濟基礎，仍建築於農業牧業之上。先說牧業：因為這裏有許多民族，如蒙古族、哈密族、索倫族、錫伯族、克爾克孜族、塔吉克族，素來都以游牧爲生。牧產以綿羊及山羊爲最主要，全省約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頭，以其繁殖快，而獲利厚也。其次則爲牛，全省約有一百萬頭。牛有黃牛與犏牛之分，犏牛爲新疆與西藏青海三省之特產，新疆所產者，其身軀比西藏青海產者爲小，登山度嶺，任重致遠，爲他種牲畜所不及，實爲多雪山區之重要交通工具。再次則爲馬，大宛良馬，已著名於漢代，現時則以伊犁、塔城、鎮西、焉耆等地較多，伊犁所產尤爲著名。伊犁的馬，體格高大，長頸修尾，聳耳怒睛，神采駿秀，適於騎乘。較之蒙古馬，優點尤多，全省約有二百萬匹。再次爲駱駝，即所稱「瀚海之舟」者，是沙漠地帶的主要交通工具。在汽車路未修通之前，更爲新疆與內地各省的唯一長途旅行工具。直到現在，還不失他的重要性。明駝爲駱駝的另一種，體格強大，耐久行速，勝於良馬。木蘭解「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似即指此也。

【新疆的農產】新疆的農產，也兼有寒溫熱三帶的作物。哈密的瓜果，及吐魯番鄯善的棉花葡萄等，均爲中外聞名的產品。南疆並產蠶絲。其他普通的作物，如小麥、高粱、稻米、包穀、青稞等，無一不因氣候之不同，而異其種類。境內雨水稀少，水利尚未發達，各縣產量，頗受限制。而這種原始的生產，已屬可觀。若將來興修水利，運用科學方法，予以改進，則新疆將成爲我國西北農業倉庫，實可比美於東北。

【新疆的礦產】新疆的礦產，雖然因爲遠在邊荒，未經地質學家的實地詳細調查，無從知道他蘊藏的種類與數量。但就已知者言，如阿爾泰、諾羌、于闐所產的金，和闐所產的玉，在歷史上即已著名。新疆土話「阿爾泰」，即是金子。阿爾泰山，即是金山的意義。又如迪化、烏蘇、綏定、塔城所產的石

油，多流於地面，而未經新式的開採與利用。這種現代工業與現代國防之必需品，多於天山及祁連山南北兩麓隨處發現，蘊藏的豐富，當可想見。這廣漠無垠的大地下面，給予我們無限的希望，而有待於吾人運用科學的技術，努力開發，以應建立工業化的現代國防的需要。

「新疆是中國的生命線」新疆西北，與蘇聯為鄰。而南與阿富汗及印度為鄰。帕米爾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稱，實為中國、蘇聯、阿富汗、印度四國的天塹國界。在過去數十年的邊疆歷史中，英蘇兩國，對這世界的屋脊，起了不少的爭執。今後國際航空日形發達，帕米爾必將成為歐洲和亞洲航空交通的中心，誰能佔有這歐亞航空中心，誰就得到空中的優勢。故今後的帕米爾，必將成為中英蘇三國國防上紛爭的焦點，而值得吾人及早注意的。新疆的種族，也非常複雜，在四百餘萬人之中，詳細分析起來，有十四個種族之多，在中國數千年來，西域的外患，以及最近數十年來新疆問題，大都是由於種族間的衝突而發生出來。這種複雜的民族問題，如果不速謀合理解決，必將由中國的內政問題，而演變為國際的外交問題，這是吾人深為憂慮的一件事。綜觀新疆地理形勢之重要，物產蘊藏的豐富，民族情形的複雜，不僅成為中國之生命線，亦為內政外交變亂之源泉。我之所以要遠征新疆之理由，即在於此。我的志願雖未酬，而其重要性，則任何人所不能否認也。

「民元以來之新疆政局」新疆的政局，自民元以後，一直到民國二十年，都沒有什麼波動。考其原因：第一、是由於與關內相隔太遠。在這廿年之中，雖然內戰頻仍，新疆仍保持安定，未受若何影響。第二、近鄰的帝俄，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由失敗而崩潰。蘇聯革命之後，內部尚待整頓，而且常以和平不侵略為口號。故歷來多事的中俄邊界，亦得以相安無事。第三、光緒五年，回亂初平，全疆收復，國家聲威尚在，即有好亂之徒，一時亦不敢遽爾竊發。諺語「新疆六十年一亂」這正是將亂未亂之時也。

楊增新氏主持新疆已有七年，因有上述種種原因，故政局極爲安定。其唯一的政策，爲保守新疆地盤，不被外來勢力滲入。他自己亦無意過問關內的政治。新疆省府廨大堂內，有楊氏自撰一聯：「共和實草昧初開，業稱五霸七雄，紛爭莫問中原事。邊庭有桃源勝境，狂率南回北準，渾疆長爲太古民。」楊氏一生的政治懷抱，可於此聯語中見之。唯民國十一年，楊氏以阿爾泰地當邊要，且爲新疆北方之屏蔽，力請劃歸新疆管轄。蓋阿爾泰原屬外蒙之科布多，自改轄新疆後，不致隨外蒙而獨立。則楊氏之功，亦足多也。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楊氏被刺身死，金樹仁氏繼起秉政，率循楊氏政策，亦無新的建樹。「九一八」後，外患正殷，內亂未已，由東北而影響西北，由中原而影響關外，於是回亂復作，外力乘機侵入，新疆政局，遂陷於長久混亂的狀態矣。

【新疆變亂的起因】近年新疆事變之劇烈，實爲前清同治回亂後六十餘年來所未有。其初則爲哈密總民之變亂。總民歷來皆受回王的統治，民國初年，因不堪回王的苛虐，曾經叛變一次。民國十九年，新疆省政府將哈密改設哈密、宜和、伊吾三縣。在回王方面，因封建勢力日削，常思恢復；在總民方面，則因設縣後，回漢稅課不公平，且耕地常被漢人侵佔，積憤不平，回王復從中鼓動。總民秉性馴良，平日甚畏政府，雖有怨憤，亦惟聯名電省請願，尙未敢遽然爲亂也。而暴發之機，實由小鋪守卡軍官強娶總民女結婚一事而起。總民因宗教關係，素不與漢人通婚，今見卡官誘迫成親，引爲奇恥大辱，於是激起公憤，聚謀反抗，乃於歲暮之夜，乘其不備，將男女殺死，並盡殺卡兵，奪其槍械。總民既得武器，公然倡亂。這是民國二十年二月間之事。同時，他處總民，亦皆起而響應，殺官奪械，達十一處之多。並將附近新由甘肅移來的漢族總民百餘家，盡行殺死，埋諸土中，以示佔地的報復。

總民聲勢既盛，復集衆攻哈密舊城。城陷，漢人無倖免者。省方乃派大兵進剿，總民見官兵勢大，懼而請降，名以省軍誅求過甚，總民無奈，誓死反抗，一方到處煽動，使省軍疲於奔命，一面派員向馬

仲英請援。

馬仲英爲甘肅回教徒，這時爲馬步芳所敗，正想另謀出路，遂於民國二十一年五月，率所部四五百人，入新援助纏回。纏民以同教關係，尊他爲領袖，是爲回亂之開始。馬仲英與纏民進攻鎮西，駐軍開城投降，於是聲勢更壯，繼續進攻七堯井，追近迪化。金樹仁派省軍迎擊，復爲所敗。後得白俄歸化軍二千餘人增援，始將其擊敗，馬仲英部退回甘肅之安西、玉門、敦煌等縣，纏民亦逃匿東山中。本可及時撫輯，以省軍處置過苛，仍四處散伏，與省軍抗拒。馬仲英亦派人聯絡，希圖再舉。省軍既無訓練，又無紀律，時爲纏衆所敗。於是南疆北疆各處纏軍，又都紛起響應，進圍迪化。幸經省軍及歸化軍竭力合禦，終於擊退。

「四一二」政變 民國二十二年春，東北軍蘇炳文李杜王德林等部，由蘇聯轉入新疆。因不滿金樹仁之所爲，乃與歸化軍聯合，驅逐金樹仁，而推舉盛世才（原爲金氏參謀長兼總指揮）爲邊防督辦，劉文龍（原任教育廳長）爲主席，即所謂「四一二」政變是也。那個時期，也正是纏軍與馬仲英部第二次聯合進攻迪化的時候，纏馬部衆，復進佔哈密木壘河古城，俘獲甚多，聲勢大振，省軍欲議和，未成。

「中央兩次派員巡邊」 中央鑒於新疆連年兵劫，民不聊生，乃派黃次長嘉松來新宣慰。黃氏適於此時飛抵迪化，滿擬調和兩方意見，勸導他們一致服從中央命令。但雙方皆無和平誠意，戰事仍然爆發。省方得歸化軍及東北義勇軍之增援，復將纏馬擊敗。馬仲英率衆退走南疆，形成南疆北疆對峙的局面。省方將領多有傾向中央者，盛世才以爲於己不利，將省府秘書長陶明樞、參謀長陳中、航空處長李笑天逮捕槍決。此即所謂「六二六」政變是也。黃宜慰使之行動通飢皆不能自由，不得不飛回南京。黃氏此行，可謂毫無結果，徒然加深中央與地方之誤會而已。

中央復於二十二年九月間，派外交部羅部長文幹氏巡視新疆，蓋中央鑒於以往俄人每趁中國內亂，對邊隅無暇顧及之時，即乘機侵佔，深恐又蹈覆轍，所以特派羅氏以外交部長的地位，親自巡邊，表示中央十分重視新疆問題，藉以引起強鄰的注意，無形中消弭其侵略之野心。故羅氏此行，雖不能達到安內目的，對外方面，却發生極大的影響。

【偽回教國的興滅】南疆之亂，自係受北疆之影響，而南疆纔回，又佔絕大多數，乃以宗教為號召，戕殺漢官及漢人。除極少數官吏及漢人平日為纏民所愛護者外，很少能夠倖免。禍害之慘，比到同治之亂，實有甚焉。時省軍因內部不和，應戰不利，行政長馬紹武，招致黑黑孜族為助，黑黑孜本係以劫掠為生的游牧民族。不久，復為纏民首領鐵來耳所誘，與纏軍聯合，反擊省軍。於是南疆各城，卒為所陷。馬紹武等困守喀什漢城，被攻達七月之久，回衆推舉和闐王為首領，於二十二年九月組織「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國旗自布中嵌半月及星，並書回教經典標語，這是南疆獨立之經過。偽組織宗教色彩甚濃，不但反對中國，驅逐漢人，即由蘇聯回來之纏民，稍違教規者，亦處於死刑。故無形中成為反對中蘇，親近英國的獨立組織，馬仲英因回教的關係，起初和他們聯合一致，後來見他們完全脫離祖國而獨立，乃率所部，於民國二十三年二月間，進攻喀什回教偽政府。纏回首領和闐王薩彼得及其政府官員，逃往葉爾羌。回教國的成立，不及半年，即告消滅。馬仲英氏此舉，在國家民族立場言，實有極大之貢獻。此段經過事實，在國內知之者甚少，而在國際方面，則載之甚詳，可見國人對邊疆問題之忽視也。馬仲英既驅逐回教國，而省軍復躡其後，馬氏乃逃入蘇聯境內，解除武裝。至是，南疆擾亂之局稍平靖。

【新疆在國防史上的重要】內亂與外患，往往是連貫的，內亂易致外患，幾成為中外歷史上一定的法則。一個國家的內亂，大之足以招致整個國家的淪亡，小之足以招致邊疆土地的損失，這也是一個不

變的定例。

新疆自漢唐以後，疆土日闢，到清初康熙征服準葛爾之亂，天山北路之四衛拉特，全部盡入版圖。而藩屬之效順者，有哈薩克、布魯特、霍罕、安集延、塔什干、布哈爾、阿富汗，與都斯坦等十餘國。當時西域範圍之廣大，南及坎巨提，西至阿富汗，北逾齋桑淖爾，其疆域幾領有現在蘇聯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圖克門斯坦各聯邦。自漢唐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我國歷代對邊界土地，素不重視，加之疆吏愚昧，輿圖不全，即在承平時代，強鄰暗圖侵佔者，爲數已屬不少。咸同時候，內亂嚴重，俄國乃乘隙而入。咸豐十年，同治三年，中俄兩次訂立北京條約，於是阿爾泰山，後阿爾泰諾爾、烏梁海游牧地，科布多卡倫以西，以及齋桑淖爾東岸愛古斯各地，全被俄人侵佔了去。同治九年，建立塔成界碑時，俄人又將察罕鄂博界碑移於中國境內，侵蝕百餘里。光緒七年，中俄改變條約，而齋桑淖爾全湖與阿拉克別克河以西，蒙哈各游牧地，又被奪去，這是咸同年間內亂時期新疆北部失地的情形。

新疆西北之哈克薩部，乾隆時即入我版圖。當時邊陲之地，荒而不治。道光年間，俄人逐漸南下，迨咸同年間，東南亂起，俄人於伊犁卡倫外邊之阿拉本圖地方，設立商埠。又遣兵至阿拉本圖以西的哈薩境內，建築砲台。復於塔城東北設斜米省，繼則奪取塔什干阿拉本圖，皆係乘我內亂的時機，或誘惑我藩屬，歸其統轄，或威迫我政府，訂立條約。同治三年，塔城條約成立，西界一變。同治十年，全疆淪陷，俄人入據伊犁至十三年之久，後經左宗棠督師西征，收復全疆，始於光緒七年訂立中俄條約，而西界再變。光緒八年，訂立哈城條約，而西界三變。統計前後訂約十餘次，每次訂約的結果，總是蹙國削土，此種損失，真所謂不可道里計也。

新疆的西南，爲帕米爾高原，乃蔥嶺之脊背，南北五百餘里，東西八百餘里，爲中、俄、阿、印四

國交通之樞紐，帕者爲山脈，一縱四橫，羣山相間，分爲數區，各異其名，總名爲帕米爾。全地分爲八帕，而有六帕米爾小帕米爾之稱。上有乾隆紀功碑，其爲中國屬地，實毫無疑義。光緒十五年，全疆收復，曾設卡於帕外，以防俄羅斯、阿富汗、坎巨提之入帕。日久防疏，遂不顧問。光緒十七年，俄兵進入帕境，揚言各帕均爲俄屬。英人聞之，亦侵入坎巨提，以固印度門戶。我雖向英俄力爭，英方說是防俄，俄人說是防英，實際都是覬覦這一座世界的屋脊。這是英俄爭奪帕米爾之開始。當時我若處理得當，未嘗不可作兩國的緩衝，無如正值中日多事，無暇西顧，反將已設之卡倫撤退，遂致英俄私定帕界，訂立帕米爾協約，公然置中國於事外，我國亦竟毫末與聞。今恆將克敦巴什一帕，尚在蕭黎縣境內，其餘小帕米爾大帕米爾等七帕，均爲英俄私分而去。總計失地二十餘萬方里。

以上種種歷史的追溯，實足供我們國民的警惕，並啓發我個人對於經營新疆之雄心。

【蓄志遠征新疆】一個人到了塞外，極目遠望，一片無涯的國土，自然會引起遠征的大志。入晚聽到悲壯動地的胡笳聲，更不禁勃然奮發，躍然欲起。我在綏遠與斯文辯定晤談新疆的情形，並讀了他的著述，使我對於新疆的地理形勢及經濟價值，增加許多認識。又鑒於內蒙的民族問題之複雜，新疆的漢回糾紛，更加嚴重。所以我認爲新疆問題，中央必須派員妥爲處理，而我就願意擔任這種工作。晉綏當局對於我這個見解及決心，都非常贊成，並允竭力相助。於是我就作成報告及簡單計劃，派陶鈞同志帶赴南昌，面呈蔣先生，當蒙採納。是年冬天，閩變發生，我尚在巡視內蒙途中，接蔣先生來電，命我赴建甌。即將內蒙事件迅速處理完畢，遂返南京，轉赴杭州。由航空學校校長徐培根兄派教員那薩非君駕一架雙座練習機，送我去建甌。當時氣候嚴寒，彤雲密佈，頗有雪意，飛行到江山附近，已大雪迷空，不能前進，乃折回衢州機場降落。高空風雪，寒冷異常，下機時手足僵硬，幾於不能行動。次日風雪更大，短時間內不能飛行，乃乘鐵路回杭州，（杭江鐵路此時僅通至衢縣，）適返南京。

【遠征新疆計劃概要】回南京後，就將遠征新疆問題，詳加研究。我以為白劍生兄帶兵五萬赴新疆的計劃，事實上是不易辦到的。這並不是說沒有五萬兵力可調，也不是五萬兵力尚不夠用，而是五萬大兵在二千多公里的荒漠長途上進軍，需要極大的設備與極長的時間。在那時候，通新疆的汽車路，尚未修築，汽車輸送，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能通汽車，五萬兵員的輸送設備，也太不容易，決非那時的財力物力所能辦到。若徒步進軍，則不知要費多少時間。時間過久，變化愈多，問題亦更複雜。而且沿途給養，如糧食、飲水、燃料等之補給，及宿營之設備，都是非常困難的問題。所以我認為：第一、必須估計新疆方面反對的兵力，然後決定使用的兵力。據我所知，當時盛馬兩方的兵力，合起來不過兩萬人，但是總有一方是站在中央方面的，假定各得半數，則與我為敵的，僅有一萬人。而且械彈匱缺，訓練不精，我若用精銳步兵一師，附砲兵一團，另附飛機若干架，及裝甲汽車若干輛，即使雙方合以抗我，亦可應付有餘，何況奉有中央命令，事實必不致此，則兵力更綽有餘裕也。第二、須克服荒漠長途行軍運輸的困難，爭取迅速的時間。二千公里的徒步行軍，即使沿途人力物力的供給，都十分容易，且無對敵的行動，亦須一百餘天（每日平均行廿五公里，每三日息一日）之久。左文襄經營新疆，費時數載，僅就進軍設備而言，如沿途籌備宿站、水站、及長途糧食，就不知費了多少精力與時間。現在這種簡陋之設備，僅能適用於少數旅客，若大軍進行，自非計劃增加不可，這樣在時間上所費更多。所以我計劃完全用汽車輸送，則一切空間上的困難，可以克服，並可爭取最迅速之時間也。

【第一項籌備工作——購置車輛訓練司機】廿三年一月間，我將經營新疆理由，及計劃概要，呈報蔣先生，並提出行政院會議，請撥款一千五百萬元為籌備經費，皆蒙核准通過。為保守機密便利進行起見，並不發表何種名義，而是由我負責暗中進行。第一項籌備工作，為購置車輛及訓練駕駛人員。依我初步計算，全部官兵，約為一萬五千人。每人平均體重一百四十五磅，攜帶械彈裝具四十五磅，共為

一百九十磅。全部官兵重量，約共二百八十五萬磅。如用三噸半的載重卡車，每輛平均載重量爲七千磅，則用汽車四百另七輛，一次可以輸送完畢。故我決定購置各種汽車六百五十輛，其用途分配如左：

指揮車四十輛，以小包車及三輪卡車爲主，專供各高級官長指揮傳達命令之用。

炊事車廿輛：每輛裝置汽汀鑼鍋六個，每半小時可煮飯一次，足供八百人之食。二十輛一次炊鑪，即可供全軍之一飽。並用極少量之柴油爲燃料，可解除沿途燃料之困難。

修理車廿輛，車上裝置修理機械，專供汽車修理，及槍械修理之用。

醫療車二十輛，專供收容運送病兵傷兵之用，亦即移動的醫院。

裝甲車五十輛，供警戒作戰之用，平時亦可裝運士兵。

運兵車四百輛，專供運載戰關兵員之用。

補給車一百輛，專供運輸各種補給物品之用。

這種編制與數量，雖然尙不能達到現代摩托化師的要求。（現代摩托化師，官兵約一萬六千餘人，攜帶各種槍枝約一萬五千餘枝，各種大砲二百三十餘門，所需各種汽車二千七百餘輛。）但以那時中國一師的裝備，尙屬簡單，尤以各種的大砲數量，相差太遠，則所需車輛，自可大量減少。故就當時之部隊裝備，並與財力物力配合，這種編制與數量，已頗合於實際的要求。亦爲中國籌備摩托化部隊之嚆矢也。

各種車輛之購置，得財政部孔部長之幫助介紹，與廠家直接訂購。故能於三個月內在滬全數交足，而且價格較市價便宜三分之一。又因汽車的裝置，必須適合於西北地帶的長途行駛。特親往上海參觀美國兵營的軍用車輛，並同若干專家詳細討論後，乃決定式樣，在上海楊樹浦設立汽車裝備廠，派林榮恩同志主持其事。林同志曾留學美國，對汽車製造，學有專長，尤富於國家民族思想。廿六年「八一三

「上海戰爭爆發，奉命製造魚雷，轟炸黃浦江內的敵艦，失慎被難。長才殉職，我至今猶爲痛惜！」

駕駛員的條件，必須具有國家民族的偉大思想，赴遠投荒的勇敢精神，與嚴肅的紀律，堅強的體格。我認爲現有的汽車司機，不但數量不夠，質的方面，更難適合要求，自非特別訓練不可。於是在北平及晉綏方面招考青年一千餘人，在綏遠設所訓練，由蕭仁源同志負責。

【第二項籌備工作——儲運油料】第二項籌備工作，爲油料之儲運。估計由綏遠至新疆迪化，全程約長二千里，最低限度，準備八千公里的油料，方可供來回兩次之用。沙漠行軍，至耗油料，每車每加侖汽油以行駛十公里計算，則每輛需準備汽油八百加侖。全部汽車六百五十輛，共需汽油五十二萬加侖。另附必需用之潤滑油。這樣大量的油料，決不宜用汽車運送，以加增消耗，而須事前用獸力或人力，將其繼續運至沿途各站，先行儲備，以便汽車行進時，隨時補充。

五十餘萬加侖之汽油，已經購到甘多萬加侖，不等購齊，即須陸續起運。運輸路線，分爲兩條：北路由歸綏循綏新汽車路西進，經富夏之北部，運到甘肅之酒泉縣。此路唯一的運輸工具，則爲駱駝，每頭長途可負三百多斤，約等於五十加侖。運輸十萬加侖，就要二千多頭駱駝，幾乎把綏新路上的駱隊，都僱用完了。用駱駝運貨，每日至多需要裝卸兩次，普通五加侖的油箱，極容易因碰擊而滲漏，故須將油箱改裝厚鐵桶，每桶容卅加侖，方便駱載，不致損耗。這種工作，均甚麻煩。南路係由西安經蘭州至酒泉，這路可利用騾車牛車汽車，比較北路要容易一些。兩路最後的積集地，都是酒泉附近，因爲這裏已是甘肅省的極西端，中央的力量，尚可達到，過此則安全就有問題了。而且我的計劃，是將所有軍隊以及各種物品，均須於事前用各種運輸方法在酒泉集中完畢，酒泉以西始改用汽車輸送。蓋如此，可節省汽油之大量消耗也。此項工作，由陳勁節、程章玉兩同志負責。

【第三項籌備工作——偵察路線地形】第三項籌備工作，爲路線地形之偵察。這時綏新汽車，雖勉

可通行，但在軍事上可能發生之障礙與應行補救之設備，仍非派有軍事專門知識人員親往偵察不可。至於地形氣候與戰略戰術之價值與影響，尤非實地考察，不能作正確之計劃。故由徐佛觀同志率領參謀人員，乘車由歸綏經白靈廟，向富夏之居延海出發偵察，往返近月。歸來將考察所得，作成很詳細之報告。以前我對於車輛在沙漠地帶長途行駛之各項技術問題，雖經詳細研究，但一經實地試驗，就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新綏公路，並不是人工作成很合理的公路，而是利用天然的路線，稍加修理而成的。沙漠地帶，大風之後，路線往往為塵沙所蔽。大雨之後，又往往為積水所掩，通過十分困難。常須繞道探進，因此常有方向迷失之事。沙土路面，極不堅固，除了結冰時外，汽車的載重量較普通為少。行駛速度，每小時平均不能超過十五公里。每日行程，至多一百六十餘公里，油量消耗亦較預想者為多。每加侖汽油，僅能行駛八公里。大隊汽車同時行駛，非常困難，因塵土飛揚，後面的駕駛者，往往為所障礙而不能開眼。故對汽車行駛時，前後應保持適當的距離，及防護必須的設備。這些車輛行駛的問題，皆須研究解決。此外沙漠地帶，氣候變化，非常厲害，往往日中氣候升至九十餘度，夜間降至零度，故在沙漠地帶旅行的人，必須隨帶夏冬兩季的服裝，才能適應一日夜間氣候的劇變。因此官兵的服裝，亦須有充足的準備，從而增加汽車運輸的負擔。沿途飲水，因汽車行程可以超過一通的驛站，雖不致發生困難，但有些地方，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夠供給大軍使用，於是擬購新式掘井機，將所到的站上，加掘水井。此種計劃，不僅足以滿足我們行軍一時的需要，即為便利以後永久行旅計，亦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玉門關以西，沿途原有的水井，多半是左文襄行軍時所開掘的。我們趁這個機會，多鑿水井，為後人造福，亦是至有價值的事情。

我為辦事方便，並與各方聯絡起見，特在北平設辦事處，由陶鈞同志負責。我自己並於廿三年四月間，前往北平主持。

〔通迪化的兩條路線〕由內地到新疆省會迪化，有南北兩條路線。南路爲以前官道，由西安經蘭州、肅州，出玉門關，經安西、哈密、七角井、鄯善、吐魯番而達迪化，即左文襄西征時所取的路線。北路爲綏新間之駝路，亦北方商業交通之要道，由歸綏經武川、百靈廟，沿陰山北麓之草原地帶，經三德廟轉入甯夏省北部之阿拉善旗與額濟納旗間之草原地帶，而至居延海。再經經桃山口至哈密後，繞出天山以北，經鎮西木壘河台奇、阜康，西達迪化。南北兩路的比較，如就往昔普通旅行着眼，則南路人烟稠密，物資豐富，氣候溫和，北路人烟極少，物資缺乏，氣候寒冷。我爲軍事着想，決定南北兩路兼用。即於起初取北路，由歸綏至居延海，轉入酒泉，出玉門關，再沿南路西段，而至迪化。其理由有三：第一、當時由西安至肅州之汽車路，尙未暢通，而綏新汽車路則通行無阻。第二、在綏遠方面，進行各種工作，易於保守秘密。陝甘方面，則耳目衆多。第三、玉門關以後，須以哈密、鄯善、吐魯番等處爲籌迪化集結作戰之基地也。

〔籌備竣事乘機飛蘭〕各項籌備工作布置竣事以後，最後的問題，則爲部隊之派撥與編成。當時我還擔任內政部長，手下沒有軍隊可供遣征之用，事前曾請示 蔣先生，奉諭候籌備就緒後，由胡宗南軍長處抽撥。這時，胡軍正駐在蘭州附近，派遣至爲方便，所需炮兵，我曾商得閻伯川先生同意，由其指撥山炮兵一團。當時晉省炮兵甚多，其所指撥之一團，在四月間即在綏遠點交，公誼私情，均應感謝。我在綏遠北平方面的各種佈置就緒後，遂於四月中旬由北平乘機飛洛陽，再轉機飛西安。西安爲我前代故都，規模頗似北平，附近之名勝古蹟甚多。邵主席力子、楊主任虎城，曾留我遊玩。我因急於赴蘭州，進行我的工作，不能應邀暢遊，至今引爲憾事。次日，乘機飛蘭州。飛機昇空後，鳥瞰地面，關中形勢，盡入目下。渭河、涇河、洛河的流域，都保可耕沃壤，南西北三方，都有雄偉的大山，以爲屏蔽。東有潼關依山界河，爲其門戶，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實爲我中華民族東進之根據地。周秦漢建都於此

，固然由於地理形勢之險要，亦爲我中華民族初期發展時所必然。唐代以後，民族向東南進展甚速，遂不復再有存關中建都者矣。現在形勢雖已變遷，然在國防軍事上，仍不失其重要之價值。飛機由長安至蘭州，須越過六盤山；此山拔海三千餘公尺，飛行高度，須在一萬二千尺以上，空氣漸漸稀薄，呼吸頗成困難。同行石楚琛同志等已覺疲憊不堪矣。

抵蘭時，朱主席一民兄等，均在機場歡迎，並接至省府後花園居住。此時由綏遠出發偵察道路之陳勁節同志，已由居廷海經毛目、酒泉，回至蘭州。由北平先期派來蘭州聯絡之黃劍鳴兄，亦於此見面，分別報告經過情形。

【來蘭的兩個目的】我來蘭州之目的，第一是與朱主席商談新疆進行問題，並請其協助一切。因爲我以後要在酒泉集中部隊，並集積許多糧食，以及各種必需的物品。這裏是甘肅省境，必須得他的同意協助，方能順利進行。他對於此舉，自然表示十分贊成。並檢出省政府所珍藏的左文襄經營新疆的文卷資料，給我參考。可惜我沒有時間，不能把這些寶貴資料，完全讀過。其次，是與胡宗南軍長商談使用他的部隊問題。此事雖尚未奉到正式命令，但我必須事前與他商量。一日，他集合在蘭州的部隊幹部，在省府開座談會，把我遠征新疆的計劃，逐一報告，希望大家奮勇參加，他們都一致贊成。同時因他們遠處西北，對中央及各省情形，未能十分明瞭，紛紛提出詢問。尤其關心長城的戰事，與塘沽協定問題，亦經我一一答覆解釋，使他們獲得了了解與安慰。

【開發西北須先由國家投資】這時，國內輿論界對於開發西北的論調，唱得很高。宋子文先生及上海的實業界鉅子多人，亦於我到蘭後一星期來蘭州，並飛赴青海視察。他們是以經濟開發爲目的，甘肅兩省地方人士，久苦貧困，對於經濟開發，特別歡迎。但就我個人觀察，西北的經濟價值，不是在目前，而是在將來。不是需要個人的投資，而是需要國家的投資。因爲今日的西北，並不是遍地黃金，而是

到處貧苦與黑暗，要解決這普遍的貧苦問題，非由國家用很大的資本，很長的時間，大規模興修水利，開發礦產，改良畜牧不可。目前西北社會之經濟條件，是太缺乏了，人民的生活程度與文化水準，若和東南各省比較，恐怕要相差五十年的時間。移東南的人民，去開發西北，實在是一種不合實際的理想。而且西北人民的現時生活，決非東南人民所能忍受。東北移民之所以成功，實由東北之生活條件，優於關內人民生活條件所致，二者決不能相提並論。故我以為開發西北，必須先由國家投資，然後再由個人投資，必須不顧目前微薄之利益，始能獲得將來優厚之利益也。

【奉電停止遠征】我一到蘭州，即患腳氣病，左足趾潰瘍，疼痛不堪，鬱居近半月，不會出省政府一步。故蘭州附近之名勝，未得一往遊覽。在閒住中，忽奉 蔣先生來電，囑將遠征新疆計劃，停止進行，並命我即回南京。我奉到這個電報，宛如晴天霹靂，突如其來，惶惑懷喪，莫可名狀！此中原因如何，當時既不及知，亦無從探詢，而事實已不容繼續進行矣。西北氣候較遲，時令雖已殘春，園花却正纔開爭妍，自己心病足病，兩難其行，於百無聊賴之中，偶吟浪淘沙一闕寄慨，詞云：

行不得哥哥，徒喚奈何！殘春況值客邊過，隔院鴉啼庭院冷，愁比花多。歲月苦蹉跎，萬里奔波，不因阻隔便情疏。引領長空西北望，天際黃河。

【離蘭返京】那時，我已無留蘭州之必要，即乘飛機經西安洛陽而回北平。一個失望的人，對於一切自然現象的觀感，隨着心理的變化而發生很大的差別。當我去蘭州的時候，興致蓬勃，沿途景物，春意欣欣，怡心悅目，似乎人以光明遠大之啓示。而歸途則烟雲慘淡，觸目生愁，一切感觸，都與以前相反。到了北平，精神疲倦不堪，幾至成病。勉強將各項經手事務結束，乃乘車南下。抵京後始知停止進行的原因，係恐怕引起中蘇外交上的衝突。因京中得悉蘇聯的志願軍隊，已開抵新疆邊界也。其實彼引狼入室者，早已與蘇聯有所勾結。照我的觀察，盛馬之職，乃是個人地方性的衝突，中央既不顧問，蘇

聯軍與之勾結，而以志願軍入境援助。若中央斷然出兵制止，則盛馬兩方，必有一方聽命中央。而蔣聯見我中央出兵干涉，自知師出無名，亦必有所顧忌，或不致與我發生國際的正面衝突。而新疆問題，却可因此獲得澈底解決，對國防經濟雙方收穫之大，當不可以數量計也。乃因顧慮太深，致放棄國家應有之權利，不予過問，任其演變，造成十年來紛擾變化之局面。這不僅是我個人畢生的恨事，亦國家政策上莫大的缺憾也。

我以失望之餘，對於政治頗覺消極，乃請假三月以廣西。原擬不再出來，卽在地方上辦理實業，稍盡個人力量，爲桑梓造福，在精神上亦可得到安慰。廣西當局各同志亦極同情我的遭遇，而顧慮協助。但當時兩廣尚未統一，謠言甚多。蔣先生電促我銷假回京，乃仍攜眷北上，在廬山住了兩個多月。身閒無事，終日徜徉於山水之間，宛如置身世外桃源，幾忘人間喪亂矣！

十六 第一次主政浙江

【奉命主持浙江】民國二十三年十月間，我尙寓廬山，忽奉 蔣先生召見，命我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徵詢我的同意。浙江是全國精華之區，西湖名勝，馳名中外。自古來守是邦者，如蘇東坡、白居易等，都與湖山並垂不朽。奉命之餘，深感欣幸。但又頗躊躇，因浙江毗連京畿，又是 蔣先生的故鄉，地位重要，恐怕不能勝任愉快。而當時 蔣先生的意見很堅決，似不能辭謝，乃決意受命。 蔣先生對於浙江財政問題，頗爲關切，囑我同徐青甫先生詳加研究改進辦法。觀察他的指示，似有以徐青甫擔任財政廳長的意思。我隨即將省政府改組名單呈核。省政府的委員爲我與徐青甫、曾養甫、許紹棣、蔣介卿、朱孔陽、周象賢、莊嶽甫、黃華表等九人，以黃華表兼秘書長，徐青甫兼財政廳長，許紹棣兼教育廳長，曾養甫兼建設廳長，宜鐵吾任保安處長，我自兼民政廳長，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到杭州就職。後來徐青甫調長民廳，程遠帆繼長財廳，曾養甫調任中央，伍廷黻繼長建廳。

【整理財政】當時浙江最嚴重的問題爲財政困難。過去已經是借款度日，負債累累。並且浙江財政收入，以田賦爲大宗，經過廿三年的空前大旱，不但災民需要救濟，而一般農民，亦自救不遑，對於政府的負擔，自更困難。我認爲必須發行公債，方能渡過這重難關。當前任魯詠庵（蕪平）主席時，已決定發行賑災公債二千萬元，正呈中央核示中。我在廬山受命時，即面請 蔣先生予以支持。到任後，續向中央陳請，方由行政院核准照辦，省財政的困難，總算暫獲解決，而根本問題，尙極嚴重。我到任後，與徐廳長再三研究，期作澈底整理，務使收支獲得平衡。當時浙江財政支出，每年將近一千八九百萬元，而收入年僅一千五百萬元，其中尙多虛列。田賦爲收入之大宗，計列一千一百餘萬元，其次爲營業

稅二百五十餘萬元，其他零星捐稅一百餘萬元。而田賦一項，實際收入，往往不過六七百萬元。原來浙江田賦以浙西杭嘉湖及浙東紹興各屬占大多數。這些地方的農民，大都以蠶桑爲主要生產，自從蠶絲滯銷，絲業衰落，農村經濟，大受打擊，賦稅負擔的能力，亦受嚴重影響。且地方風氣，大戶以不納糧爲榮。其實不僅大戶不納糧，即一般人民，對於納稅完糧，亦其敷衍。所以田賦收數極低，歷年積欠至鉅。現在我們要整理財政，當然要從開源節流，雙方並進。而開源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即是田賦的加緊催征，及清理舊欠。但那時地籍尚未整理，一切串冊，都操在莊書手裏。以前本省雖費了很大的人力財力，辦過土地陳報，結果不能應用。因爲承辦的人尚未經過訓練，經驗毫無，大都是閉門造報，訛誤至多。所以政府雖加緊催征，而收入仍無多大起色。迨廿五年積極推進清理舊欠工作之後，收數始漸增加。其次對於稅收方面，除擠查營業稅之外，則爲公開包商承辦。但承包商人，狡詐異常，所得亦屬無多。政府財政在此種情形之下，真是庫空如洗，朝不保夕。我記得有一次徐廳長報告省庫存款僅有廿八元，窘況一至於此，令人失笑。至於節流方面，全部支出中，債務支出，占了幾百萬。政費的實際開支，並不很多，實已無流可節。政府對於債信的顧全，非常重視。蓋以前皆以借債度日，今後仍不免於舉債，一旦債信喪失，則借款必多困難。可以說在那個時期，政府的財政權，實操在少數的金融巨頭手中，政府時時要仰他們的鼻息，不敢有所得罪，苦痛情形，可以想見。如上所述，開源既鮮把握，節流又無辦法，除了勉強維持原有局面之外，實在談不到新政建設問題。

【改革縣政】浙江的縣政，以前可說都是師範政治，一切工作，爲少數幕僚所包辦。此輩對於經辦事務，祕不告人，亦不知改進，大有清代師爺舊習。縣長對於縣政實際情形，不甚清楚，也無從着手整理。尤以田賦稅捐爲甚。當我到任之前，曾關蘭谿縣爲實驗縣，意在掃除縣政黑幕，建立新政基礎，用意至爲重要。蘭谿實驗縣的幹部，幾乎全部都是中央政治學校的師生，縣長胡次威，係政校教授，祕書

科長科員等，多是政校的畢業生，行新政，用新人，若輩可說是受過新訓練，具有新精神的行政幹部。我到任不久，即往蘭谿巡視，並指定若干縣長，參觀他們的主要工作。如辦理土地編查，整理田賦稅捐，以求縣財政的充裕。其次為調整基層人員，健全鄉鎮組織，以求政令的貫徹。推行合作，以發揮農村經濟。而以先求機關內部組織的健全，實行科學的管理，為其實驗工作的總綱。雖然因時間未久，尚無特殊成績表現。且其中仍不免有若干幼稚和困難的地方。但規模已具，一切都在進步之中，對於浙江縣政的改進，自有極良好的影響。

在民國廿三年以前，國內人士，對於縣政，尙未重視。尤其是一般立身清高較有學問的人，視從政為腐化，以縣長皆貪污而不屑為。縣長以下的佐治人員，更無論矣。以前縣政之不能改進，這也是一個重要原由。我在內政部時，因縣政是主管業務，所以非常重視。這次到任之始，即邀部裏同人，前來參加縣政工作。王先強以民政司長的資格，首先來任嘉興縣長。以前中央各部會的主管人員，對於縣政，多鮮實際經驗，因此若干政令，往往扞格難行。王先強之出任縣長，實有鑑於此種缺陷，希望作實地的考察，而亦開中央高級人員到縣工作之先河。其餘如賀揚靈、周俊甫、曹鍾麟、陳言等，皆捨中央的職務，來任地方工作，對於浙江縣政的改革，亦大有關係也。

【推行保甲】地方組織應實行自治，抑辦理保甲。當時中央各方，意見不一，爭論甚多，至難決定。浙江辦理自治甚早，且較有基礎，一旦推行保甲制度，實為省政一個重大的改革。我到任之初，正是本省共產黨發展的時候，浙東的開化、遂安、昌化、分水及浙南與閩省交界的處屬各縣，或被他們佔領，或發現他們的蹤跡。甚至杭州市的西郊，亦滿佈鐵絲網，構築碉堡，以防他們窺襲。雖經前任保安處長俞濟時將浙皖贛邊境的方志敏擊斃，但餘衆仍散伏四處，其在浙南方面的發展，正方興未艾。我巡視浙東到達蘭谿時，共黨部隊正由遂昌、溪口（龍游縣屬），進擾湯溪武義等處，金華蘭谿一帶，無不恐慌。

萬分，我即調隨行衛隊，赴前方堵擊，隨後去龍游等處視察。其時富有之家，多聞風遠避，一般士紳，亦軟弱無能。地方既沒有組織，自衛力量又非常薄弱，無怪赤禍迷漫，閭閻不寧，並非共產黨有如何強大之武力也。我既認清這種情勢，就決心辦理保甲，以增強地方自衛力量。蓋保甲制度，組織嚴密，適合國情。蔣先生在江西之勝利，得力於此種制度者甚大，正是我們一個明顯的榜樣。於是呈請中央停辦自治，而代以保甲。因事屬創舉，為集思廣益起見，並電請江西熊主席選派辦理保甲有經驗人員，來浙襄助，這是本省停辦自治推行保甲的經過，亦為當時縣政的重要改革。

【普設行政督察專員】民國以後，府道制度廢止，改行省縣兩級制。浙江為全國最小的省份，交通亦稱便利，但省府對於七十多個縣市，監督指揮，已感困難。此外地區較大單位較多交通不便的省份，其困難情形，當必更甚。蔣先生有鑒於此，在江西時創行分區督察制度，設置行政督察專員，以督導考察各縣政治。施行之後，成效大著。但這種制度，當時僅施行於特殊地區，尚未普及全國。若干政論家認為有違省縣兩級制的原則，使行政層級增加，效率發生影響，所以直到現在，尚未成為定制。行政督察專員祇是臨時遣派的職務，而非正式列入國家官制的官員。

我到浙江時，衢、溫、甯三屬已設有專員，其職權甚小，且側重於軍事方面。當時省府對於各縣，深覺監督難周，認有普設行政督察專員以為輔助之必要。於是呈准劃吳興、長興、孝豐、臨安、於潛、昌化、安吉、武康、德清、分水等縣為第一行政督察區，以黃人望為專員，署址設吳興。劃嘉興、嘉善、平湖、桐鄉、崇德、海鹽、海甯、杭縣、富陽、新登等縣為第二行政督察區，以王先強為專員，署址設嘉興。劃紹興、蕭山、諸暨、新昌、嵊縣、上虞、餘姚為第三行政督察區，以賀揚璽為專員，署址設紹興。劃金華、蘭谿、湯溪、武義、永康、東陽、義烏、浦江、建德、桐廬為第四行政督察區，以胡次威為專員，署址設蘭谿。劃衢縣、龍游、壽昌、江山、常山、開化、淳安、遂安為第五行政督察區，以

魯忠修爲專員，署址設衢縣。劉鄩縣、慈谿、鎮海、奉化、象山、甯海、定海、南田爲第六行政督察區，以趙次勝爲專員，署址設鄞縣。劉臨海、天台、仙居、黃岩、溫嶺爲第七行政督察區，以羅鏡塘爲專員，署址設海門。劉永嘉、瑞安、平陽、樂清、泰順、玉環爲第八行政督察區，以許鑄雲爲專員，署址設永嘉。劉麗水、松陽、縉雲、青田、宣平、雲和、遂昌、龍泉、慶元、景甯爲第九行政督察區，以陳式正爲專員，署址設麗水。均於廿四年九月間分別成立。這時中央對於行政督察專員制度還沒有訂頒統一規程，各省設置情形，及職權大小，也很不一致。當時本省規定各區專員的權限比他省爲小，專司縣政的督察輔導責任，不使各自爲區風氣，致與省府權限政令，發生衝突。但各專員均兼任駐在縣縣長，專署與縣府合署辦公，所以節省經費人力，並含有中心縣之示範意義，這是與各省不同的地方。

【推行會計審計制度】中央創行各種制度，浙江均能率先奉行，如會計制度審計制度，本省已於廿四五年間，分別實施，並由省推行於各縣。此種制度，在消極方面，固在防止行政人員的違法貪污，而在積極方面，則爲減輕行政長官經濟方面的責任，使節省精力，以謀其主管業務之發展，自應認真實施，以宏效果。但就制度本身方面說來：也還有許多缺點，須待改進，如會計制度手續繁而效率少，其經管賬目，亦多積壓不清。一種新的制度，大有演變而成爲舊式師爺政治的可能。審計制度則因用人少而審核遲，往往失去時效，案件積壓過多，日久即無從審計。總之一種新制度之施行，原意皆甚妥善，但如施行之後，本身不能時求改進，則新制度勢將逐漸變爲老腐敗，隨而發生種種流弊，此則近年來推行新政之通病也。

【浙江教育概況】浙江教育素稱發達，歷代名人輩出。民國以來，新進的人才亦不少。當我們接任的時候，高等教育有省立浙江大學，私立之江大學，國立西湖藝術學院，省立醫藥專科學校等，職業教育有高級工業農業商業助產蠶桑水產及初級農業等。一般中等教育及師範教育。就學校數量上說，不論

是省立縣立或私立，均稱完備。初等教育亦極有基礎。社會教育方面，除省市縣均設有民衆教育館及民衆學校外，省立圖書館博物館等內容，亦相當充實。雖然歷任政府因經費困難，各項教育，仍未能針對社會實際需要，大量發展，但較之其他省份，並無遜色。且就質的方面說，各級學校設備，均相當完善，辦理頗為認真，學生程度優秀，尤爲其他省區所不及。此固由於浙人秉賦聰穎，地方勤學風氣濃厚，而歷屆教育當局刻苦興學之功，自亦不可淹沒。可是因爲接近上海的緣故，浙人在上海者爲數極多，一般富有之家，多送其子弟赴上海或外洋求學，各處士紳對於省內地方教育，並未能十分注意，例如餘姚一縣，人口五十餘萬，地方素稱富庶，竟無一所中學，即因該縣豪富，多在滬經商，負有聲望的人士，亦多外出服務，竟致無人過問地方教育事宜，此實爲當時浙江教育的一大缺憾。

民國二十三年以前，各省地方教育的發展，多仗地方士紳及熱心教育人士的倡導與努力。政府方面，則以連年內戰，大宗經費多用於軍事，對於國家民族盛衰興亡有關的教育工作，未能予以切實之注意，更無整個的遠大的計劃。是以少數教育家雖苦心孤詣的提倡經營，而實際所收的效果，仍是有限。在北洋政府時代，教育部雖已設立，但皆以閒銜視之，各省教育主管機關，組織多不健全，或竟尚未設立。國府與都南京之後，雖設置教育廳，爲構成省政府主要單位之一，而全國軍事，尙未底定，政令尙未統一，推行教育，障礙仍多，自難求其普遍的發展。我到浙江後，亦祇有維持現狀，未有若何重大設施。此固由於省財政的困難，而傳統觀察的錯誤，與自己認識的欠缺，都有極大關係。敘述至此，實不勝其感慨與愧怍也。

【浙江交通的發展】浙江的陸路交通，除了原有滬杭鐵路之外，其餘的鐵路公路，都是革命政府成立後建設的。當我到任的時候，境內已有二千多公里的公路，全省的公路網，大致均已完成。而且在工程方面，多是適合標準的，平時的保養，亦甚注意。據我的觀察，當時全國各省的公路工程，保養，翻

南居第一，浙江可算第二位。浙南多山地區的公路，大半是就沿河棧道改築的。據說若干段工程，每公里的建築費，約需二萬元，工程的浩大與困難，可想而知。這些公路，有的是政府修築的，有的是人民修築的。大致有營業價值的路線，多半是商辦的，沒有營業價值的路線，都是政府經營的。在我任內，僅增加了杭州至嘉善，開化至淳安，遂昌至碧湖，吳興至嘉興四線。我卸任的時候，已有公路三千餘公里，似足適應當時之需要。杭江鐵路是張主席辭江任內以省款開始興築的。我到任的時候，已由杭州通車到江山。這條鐵路，當初用的是輕軌，所費極省，工程進行甚速，在國內也算是首創紀錄的工程。當然其中經過的困難也不少。這些交通建設，多是在曾養甫廳長任內，奠定基礎，以後不過蕭規曹隨，酌予添補而已。曾氏在交通建設方面的貢獻，是值得稱道的。

【浙江蠶絲業的改進】浙江的絲業，素佔全國的首位。在極盛的時期，年產價值約達九千多萬元。自從日本蠶絲改良，大量增產，出口傾銷以來，華絲銷路，一落千丈。首先受到影響的，就是浙江。政府為挽救絲業危機，在改良蠶種改進繅絲技術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在省府之下，特設置蠶絲統制委員會，綜理其事。素以養育舊種為業的人民，對於政府的蠶種統制辦法，極表不滿。我到任不久，竟發生聚衆焚燒政府所設蠶種改良場，而至於派兵彈壓的情事。蠶民對於曾養甫之責難甚苛，政府一本以往政策，堅定不變，並剴切曉諭利害，風潮始漸平息。蠶種改良與繅絲改良的結果，在品質方面，足與日本所產者相抗衡，外銷市場，亦漸恢復。這在中國蠶桑史上是值得記載的。這種產業改良工作，雖經不少風波，而卒能成功，所謂「人民難與圖始，可與樂成」這句古話，在人民狃於舊習而無新認識的情形之下，是相當正確的。

【糧食增產與稻麥改良】浙江是缺糧的省份，據統計年缺食糧約計三百萬擔至五百萬擔。全省山多田少，人口密度僅次於江蘇。耕地面積既無法增加，唯有改良耕種技術，以增加生產。浙東各縣，特別

是金衢各屬的農民，耕作極爲勤勞與精到。所有耕地，終年沒有休息的時候。廣闊的原野，幾乎四季保持着碧綠的顏色。收了稻子，即種大荳，收了黃荳，又種麥子。一年三熟，而且收穫量都很豐富。一畝中等的水田，普通可收五百多斤稻子，上等的當在六七百斤以上。我常乘車來往安徽江西福建交界的地方，幾乎不必望省的界牌，即可知道那處是浙江，那處是外省，因爲在地面上的作物，就有顯然的分別。

稻種的改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試驗培育，才可獲到一種新的優良品種，得以推廣繁殖。而且因各處的氣候土壤，多不相同，在此處是良種，到了別處，說不定變爲劣種。所謂「橘逾淮爲枳」，就是這個道理。因此改良稻麥品種，必須實施分區試驗。民國二十四五年，本省的稻麥改良工作，已到了試驗的最後階段，直至二十八年，推廣工作，才擴大進行。據考查本省改良的稻種，平均每畝的收穫量，比舊種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每個穗的稻麥，多至三百六十多粒，而且米質充實，苗的抵抗力甚強，不易受到各種病蟲的侵害。這是專指稻種而言，此外小麥和棉種的改良，也都有相當的收穫。

「浙江漁業」浙江沿海的漁業，在全國中，亦佔極重要的地位。定海的沈家門，便是東南著名的漁業市場。每年的漁產數量，雖無精確的統計，而沿海各縣以捕魚爲業的，據查有十餘萬人之多。假定平均每年每人收入三百元計算，一年的總收入，就有三千多萬元。惟捕撈工具不精，儲藏設備製造技術等，也都墨守成規，不知研究改進，所以每年收入，也只限於此數。但從反面設想，僅用這種原始的方法，尚有如此鉅大收益，如果將漁撈工具、水產製造、儲藏、運輸等力加改良，並加強海上防禦，以策漁民安全，則收穫的利益，必什百倍於此。政府有鑒於此，曾設水產學校，培植人才，從事改良。可惜抗戰軍興，沿海爲軍事衝要地帶，皆爲敵人控制，學校停辦，漁民不易出海捕魚，漁業一落千丈，非俟戰

事結束，不能恢復與發展也。

【浙江保安團隊】浙江的保安團隊，裝備槍械，都很完備，訓練亦頗純熟。在共產黨侵入省境的時期，地方治安，很賴他們的力量維持，尤以擊斃方志敏之役，戰功最著。後以二部改編爲國軍第五十八師，由前保安處長俞濟時率領，開赴漢口。省軍改編國軍，雖因其著有戰績，亦由於省方財政困難，借此可以減輕負擔也。浙江保安處內部事務之處理，有一優點，即爲經理制度之嚴密。此種優點，在當時的正規軍，亦恐不及。直到現在，依然保持着昔日的規模，這是很值得稱述的。

【建築國防線】自一二八淞滬戰爭以後，浙江在國防的地位，頓形重要。因上海爲日寇既得之根據地，萬一戰事發生，敵人從上海登陸，分向京滬滬杭兩鐵路沿線前進，首都重地，立刻受到威脅。所以中央對於蘇浙國防，亟謀鞏固，計劃建築永久國防工程。分爲錫澄線與乍平嘉線，乍平嘉線係由浙境之乍浦鎮起，經平湖嘉興兩縣，而至蘇浙交界之王江涇鎮，全長約八十餘公里；此線由我負責建築。當時中央撥款一百萬元，我以經費太少，殊難建築強固工事，即由省府撥款一百五十萬元，以資補充。爲保全工作秘密起見，並不發表名義，和成立公開的機關。祇是省政府內設一辦公廳，秉承中央密旨，秘密進行。派徐景唐爲參謀長，張曙文張少傑徐佛觀等爲參謀，負計劃之責。派楊澍松爲工程處長，楊長鑫爲副處長，陳琮等爲工程師，負建築工程的責任。當時因爲經費的關係，八十餘公里長的防線，若照築城學上規定的堡壘建築，勢必難期周密。於是着手研究改良之法，務使堡壘的強度不減，而能全線周密佈置。我曾設計一種輕型的堡壘，幾經試驗，却很滿意。某次實彈試驗時，我幾遭不測，這種堡壘，抗戰後各處國防建築皆多使用，差不多已成爲一種定式了。據報日寇佔領杭州之後，曾以大炮轟擊，皆能抵禦，彼亦認爲此種輕型堡壘，在防禦上有相當價值。當時我幾以全力從事國防建築，及各種軍事準備計劃，對於政治方面的本身責任，反多疏忽。辦公廳的同仁，乃至一班建築的工人，均極興奮，工作異

常努力，故全部工程，均能如期完成。可惜二十七年上海會戰後，因戰略關係，乍平嘉線棄而不守，未能作保障杭州一日之用。以致我及共事同仁年餘之心血，與中央地方所費之大宗款項，均成爲毫無價值之敝屣，至今思之，尙有餘痛。

【實施戰時動員準備工作】因爲加強國防的關係，隨而展開了若干與國防有關的動員準備的工作，第一項是實施國民軍事訓練。首從辦理省級公務人員入手，含有爲民前鋒的示範作用。特設訓練機構，名曰省會公務人員訓練團。我自任團長，許紹棣、宣鐵吾、鄭炳庚任團附。省會各機關公務員每日規定時間集合訓練，爲期三個月。訓練後，一般精神，極爲振奮，對於國防意識，普遍增強，行動迅速，形式整齊，紀律嚴肅，確實收到相當效果。各縣皆遵行訓練，一時蔚爲風氣。此爲浙省公務員訓練之先河，是值得紀念的一件事。其次則爲民衆訓練，分爲壯丁訓練，與義勇警察訓練。全省壯丁訓練，省府設訓練處，以總其事，鄭炳庚任處長。各縣設社訓總隊，縣（市）長任總隊長，軍訓教官任副總隊長，各縣市人民均能踴躍參加。義勇警察係我在內政部時創議的制度，到浙江來，首先實行。由周象賢、趙龍文總其事。各省亦隨而實行，幾已普遍全國。義勇警察的訓練，以市區爲對象，就市民中之壯丁，加以警察的訓練，以備戰時協助警察，負擔市區緊急任務，參加者亦極踴躍。訓練至爲認真，並隨時在市內實習，執行警察職務。廿五年雙十節，召集杭州市及杭縣附近已受訓練之公務人員壯丁義勇警察，舉行大檢閱，參加者一萬五千餘人，實爲民衆空前大集合。杭州日本領事對此至爲注意，聽說事後多方調查我全省壯丁訓練的情形，及受訓人數，可見日人對我國民衆組訓及武裝的重視。七七戰端爆發，此亦爲其原因之一也。第二項工作是舉行軍事有關的各種演習。杭州是中國航空的主要基地，亦是中國空軍的搖籃。中央航空學校防空學校都設在那裏。在軍事上無疑的是敵軍首先攻擊的目標，故我國防空演習也首先在杭州舉行。時爲民國廿四年的冬天，地面上防空的工作，除了市區軍警，一致參加之外，並動員

了已經訓練的義勇警察和壯丁，由航空防空兩校共同負擔指導，情況至爲逼真。使民衆對於防空，獲得極深刻的認識。「八一三」事變發生的第二天，敵空軍出動助戰，杭州首被襲擊，我英勇的空軍，奮起應戰，將來襲敵機全部殲滅，在我空軍史上寫下最光榮的一頁。「八一四」遂成爲我空軍重要紀念日，由中央規定爲空軍節。

正在演習的時候，有一重要外交事件，值得附述。那時我忽奉 蔣先生電話囑立刻乘機飛京，時已傍晚，且風雨交加，飛機不能升空航行，乃作罷論。旋又奉電話，囑我中止赴京。當時莫明底蘊，頗爲驚愕。事後方知日寇在北平，向我提出了種種苛刻要求，中央派何部長敬之前往處理。因爲民國廿二年我會同何部長在北平擔任過工作，便命我隨同襄辦。那天夜裏，即須動身北上。因時間趕不上，改派熊天翼、陳公洽兩位隨往，這就是所謂何梅（梅津美治係日本駐天津陸軍司令官）協定的序幕。

【同時舉行水陸運輸演習】陸軍的運輸演習，正在那個時間，分別舉行。有一次，將全省公商汽車大部徵集起來，運輸兩團的兵力，假想開赴前線參戰。這個演習的目的，在獲得戰時汽車的征調指揮，道路的改良，與軍隊的乘車下車，軍隊的行進等等之實施知識。並由此發現其困難，以謀解決的方法。又有一次，舉行水路運輸的演習。以一師的軍隊，由蕭山方面渡過錢塘江，再由湖墅乘船，沿運河而至嘉興的前線。這些演習，都由我負責主持，中央派員參加指導，情況緊張，成績也稱不惡。而我亦因此得到很多實際經驗，並認識許多問題的癥結所在，而知所改進。在那時我的全副精神，幾乎都集中在這些事務上面，雖然增加了地方許多負擔，同時行政方面，也不免受到若干損失。然而爲了國家，爲了國防的問題，也是出於無可如何啊。

【中日航空協定中止簽訂之內幕】在廿四年的春天，日子已記不起來了，蔣先生住在漢口的家鄉，忽來電話，囑我立刻轉知南京行政院汪院長停止對日簽訂滬甯航空協定（日本福岡至上海中日合資）

。並指示必須停止的理由，即使日本對中國以武力壓迫，亦不能簽字。因爲此項協定，一經成立，日本即可在中國建立空軍基地，並且必定繼續援歐亞航空公司（中德合資），中國航空公司（中美合資）的前例，要求在內地航行，並建立基地，那時候就無法拒絕他們了。日本以武力佔領一地，僅是一地的損失，如果日本飛機能在我領空自由航行，並在內地建立基地，則我所有的國防空防，彼必瞭如指掌，勢將全部被破壞，所以這個協定必須停止簽訂。語氣極爲堅決，命我將這個意旨，一字不漏的，轉知應辦。我遵命立即照轉，因爲中日航空協定雙方定於是日下午兩點鐘簽字，這樣拒絕外人要求的強硬態度，實開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的先例。協定突然拒絕簽訂，日本方面極不愉快，因此醞釀出以後種種問題。中國方面也隨而發生了政治風潮。

【中日航空協定中止簽訂後的政治風潮】原來這時候汪精衛擔任行政院長，正在進行所謂中日外交調整工作。中日航空協定，卽爲其調整工作之一。臨時停止簽訂，不僅予日本一個嚴重的警告，亦爲給汪精衛政策一個致命的打擊。於是不久汪卽以養病爲名，逃避青島。陳公博、陳璧君及其親信若干人，都離開了南京，到青島去，中央政局，又起了一個軒然大波。南京方面，有有些人因汪氏之走，認爲政治上失了重心，深恐因此引起日本武裝的侵略行動。同時又恐怕再引起國內政治上的重大糾紛。此時蔣先生正在成都，大眾的意思，要我去成都見蔣先生，面陳種切，並請蔣先生指示對汪氏出走的態度。他們推我去的理由，想係因爲上次汪氏託病出走莫干山養病，也是我去奔走的，似乎含有駕輕就熟的意思，我幾乎成爲汪氏政治病發生時一個代述病狀領取藥方買送藥品的侍者。我這次赴成都，是由上海乘中國航空公司小型水上飛機專機前往，到萬縣上空，機件忽生故障，不敢高飛，乃降落揚子江的水面。在江面上飛行，既是最慢的飛機，又是最快的汽艇，實爲生平難得的際遇。而富有詩意的三峽，竟坐飛機在水面上遊覽，亦算是一個古今未有的奇遇了。到了重慶，這架飛機已不能再飛，乃改乘他機到

成都，即日偕楊暢卿晉見 蔣先生，陳述來意。蔣先生說：「如果日本因為航空協定簽訂不成，欲以武力壓迫，我就立刻對他開戰。以前因為中央力量，尚未深入四川，東南各省交通便利，距敵過近，不能作長久抗戰的根據地。現在中央軍隊，已進駐四川，即使開戰，一定可以持久，爭取最後的勝利。」我因為使命的關係，不能再三陳說。楊暢卿也補充我的意見。我們以為四川初定，西南方面，尚有問題。統一基礎，未臻鞏固。而且國防的準備，正待積極完成。萬一對日開戰，顧慮甚多。辯論了相當時間，最後 蔣先生鄭重指示說：「你們的顧慮，都是就以前或目前的看法來講。我可斷言，中日一旦開戰，這些問題，都要化為烏有，國內一定更加團結統一。至於國防的準備，也不能作萬全的打算，一面作戰，一面準備，要比平時迅速得多，而且日本對中國，即使沒有航空協定問題，亦隨時可以對我尋釁開戰。你們以為航空協定不簽字，將為引起中日武裝衝突的主因，我則以為中央力量到了四川，將為他不敢即時對我開戰的主因。」最後並堅決表示，航空協定問題，不必再談。如果日本不發動武力，仍可由汪先生與其敷衍。囑我將這個意旨，轉達南京及汪氏。這種事情，蔣先生在民國三十二年本黨五屆十一次中央全會時尚提起，以證明今日的形勢，與他當日所判斷的，若合符節。蔣先生謀國的深遠，見解的卓越，使我於追懷往事之餘，不禁肅然起敬！

我奉了 蔣先生的指示，隨即乘飛機回南京。並再飛青島，將意旨轉達汪氏。同時勸他即回南京主持政務。政客的作風，總是扭扭捏捏，缺少直截爽快的風度。他還是裝腔作勢的說：「等病好了再說」。不久，他病就好了，仍回南京，擔任行政院長。一場由外交而引起的政潮，也就此告一段落。

由成都回京途中，飛機在高空飛行。我坐在機上，展望飄渺無垠的雲海，才覺得天空的偉大，它把地面上坎坷不平的種種狀態一概掩蓋了。偶而俯首鳥瞰，忽見映在潔白的雲海上有一個飛機的影子，周圍襯托着紫紅的圓圈，隨着機影而移動。因此我得到一個迷信的解釋；我在峨眉山的時候，有人邀我

去遊山，他們說：「山的最高處，有一個捨身崖，如果你與佛有緣的話，在那裏向雲海下望，可見到佛像，這佛像就坐在紫紅的圓圈裏面，有些人以為這便是仙境了，也就有人因迷戀這仙境而投身下去喪失其生命，捨身崖就因此得名的。」這種傳說，與我在飛機上所見的雲海機影，是一樣的情形，不過在捨身崖所見的是自己的影子，而不是佛影。我在雲海上飛行的次數很多，在別的地方都未嘗遇見這種現象，也許因為四川的雲海水份比較的多——四川是中國潮溼而多雨霧的地方，飛機在某一種高度及陽光在某一個角度映射之下，就有這種現象發生，而不是隨時隨地都可以見到的。

青島是太美麗了，經過德國人的割據，日本人的佔領，先後裝上了若干德國與日本的風味，更增加了他各種不同的顏色。尤其是夏天，成為國際海軍及一般有閒階級消暑的勝地。我到青島去的時候，正值暑期，就在那裏逗留了一個多星期，領略那錦繡的山光水色，這可算得我這一次東奔西走最有價值的報酬。

【兩廣異動的前因後果】廿五年三四月間，兩廣當局，突以抗日的名義，出兵湖南。消息傳來，深感詫異！兩廣處在中國的極南，要北上到上海漢口，或天津北平，才可以碰到作戰對象的日本兵，但中間要經過中央權力完全到津的若干省份。中央與兩廣的關係，多年來均在若即若離的狀態中，兩廣當局以抗日為名，貿然向湖南進兵，既未得到中央的允許，而且抗日是國家整個的問題，決非一二省的力量可以達到勝利的目的。這種異乎尋常的舉動，真非局外人所能揣摩其理由。我數年來奔走於中央與兩廣之間，無非為國家的和平統一而努力。亦可以說，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希望，而是全國人民所一致期望的事情，現在突然演變到這個惡化的程度，真似佛家所謂無可挽回的劫運，祇有所禱上天，不再擴大事態而已。然而事實的演變，又有出乎意料之外者。廣東內部，忽然起了極大的變化。多數的陸軍與全部空軍，都表示服從中央，脫離廣東的關係。廣東的局面因此急轉直下，迎刃而解。廣西方面亦隨而轉變方

針，言歸於好。中央任命李德隣、白劍生爲廣西善後督辦與會辦，黃旭初爲省政府主席，數年來懸而不決的兩廣問題，至是仍得和平的統一，這豈不是國家意外的幸事麼。這兩個突然發生的啞謎，後來我到廣州，才知道清楚。原因是一個占卜星相的江湖術士，發癡一般的信口胡言，說某人應敗，某人當興，某方不利，某方興旺。這種沒憑沒據的荒謬之談，竟有人信以爲真，而作爲政治軍事行動的指導。活像舊小說舊戲劇中一個賣卜測字的人，幾句謊言，馬上變成捏鷹毛扇的軍師一般，說來真是可笑。但是一時的黑暗，終掩滅不了永遠的光明，光明一定會把黑暗掃除，而回復他燦爛的景象。這就是這兩次突變的前因後果。我到廣州的時候，尙能看到這位術士神壇的遺跡，和聽到好多神怪的奇談，這也算是二十世紀科學世界中一樁怪事。

【出入意外之奉調廣西軍務善後督辦】五月間，蔣先生來電，要我到廬山去。我就乘浙贛鐵路火車，到了南昌。浙贛鐵路是將杭江鐵路延長而成，在廿四年的冬天舉行杭南通車的典禮，我曾經同浙江省的黨政紳商往南昌去訪問。從前相隔千餘里，交通困難的兩個省會，現在可於一日一夜之間到達，這也是東南交通的一個大進步。這次，我奉召到了南昌，忽見報載國府任命我爲廣西軍務善後督辦，李德隣調軍事委員會委員，白劍生調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消息。這一個閃雷，打得我昏天黑地，幾乎轉不過氣來。好多報館的記者要求接見，問東問西，採訪消息，簡直使我無言可答。當日僥倖趕上廬山，問明真相，想作請求收回成命的打算。因事實已經如此，祇是如何設法補救而已。我會對楊暢卿說：「這無異於硬捉媒婆充新嫁娘，兩方精神都要受到極大的痛苦。」他笑着說：「橫豎你已經嫁過，（指二十年曾充廣西善後督辦）再嫁一次，又有甚麼要緊，你還是準備上轎吧。」這時真弄得我啼笑皆非，進退維谷。因爲我數年來奔走兩廣的問題，無非是想求內部的團結統一，加強對外力量。我對於廣西如果有所留戀，早就不應該退出了。現在要我再回廣西去，不但違反了我過去的心願，而且各方面都要對我發生誤會

，公私都沒有什麼好處。我於是把自己處境困難的理由，向 蔣先生陳述，幸而得到諒解。隨即由我發電李德隣、白劍生，說明這事不是我的本意，表示我決不回去就職，以明我的心跡。並且勸他們尊重中央的意旨，作妥善之解決。自然一時是不會得到諒解的，而且事情一定要更形惡化。我於是回到上海，不聞不問的，過了好些安閒的日子。浙江省政府主席職務，因白未到任，由徐青甫代理，以下的人員，仍然照舊不動。

【解決廣西問題】我在上海住了不久， 蔣先生又從廣州連來電報，要我到廣州去。我心志忑不安，不知又要擔任什麼工作了。由上海坐船到香港時，一般與廣西方面有關的人物，都到船上來接我。他們不是來歡迎新長官，而是來歡迎舊長官的。彼此相見之下，非常款洽，大家都有說不出的微妙意思，蘊藏在各人的內心。我自退出廣西，對於他們，從來沒有一些私意與惡意，他們對我，也沒有一些私意與惡意，這是我數年來衷心所引為最安慰的。我對他們表示，當本着一貫的主張，盡我的力量，不使廣西糜爛，國家分裂，也希望他們對此共同努力。隨後我到了廣州，雙方已在那裏調兵遣將，積極準備作戰。我晉謁 蔣先生的時候，申明我的意見，仍望盡我的力量來擔任調停工作。 蔣先生也沒有一定要使用武力的意思，對於我的意見，表示允可。我於是來往於省港之間，從事接洽。同時也有很多電報給廣西方面，但是都得不到什麼要領，情勢一天一天的惡化，好像有非用兵不可的樣子。中央方面並要我擔任討伐軍總司令的名義，逼得我非常為難。這時參謀總長程頌雲（潛）先生亦在廣州。我對他說：「情形雖未能即刻好轉，但並不是完全絕望。據我的觀察，用兵三個月，未必即能解決，善後問題，更屬困難。如能遷延三個月，也許倒有和平解決的希望。顧慮事實與保存國家的元氣，靜候一些時間，要比立刻用兵合算得多，因為以往國內許多糾紛，起初無非是當事者一些面子上意氣上的爭持，彼此互相激盪，遂成為狂波而不可挽救。並不是有什麼了不得的問題，存在其間。而必須以武力來解決的。假使我

們設身處地，爲廣西方面打算一下，自有其許多困難。如能假以時間，使其從各方面着想，亦必能自己尋求其解決之道也。」他對我的見解，很爲贊同。於是我同程總長到黃埔，去見蔣先生，我將意見陳述，幸蒙採納。由我同程總長分別再電他們，作最後和平之斡旋。不久，得到他們的回電。並且提出若干解決條件，希望我同程總長到廣西去商量。開價雖然很高，但並不是沒有商量的餘地。我們又將來電呈核，^{後蒙}蔣先生大度寬容，差不多都完全允許了。並且派我們到廣西去。一個極嚴重的危機，終於又得挽救過來，內心是如何快樂啊！

我們到廣西去磋商和平，當時有人以爲有虧中央的體面，應該由他們先到廣州來，方爲合理。我覺得不必計算這些小節，惟其如此的豁達大度，更足以表示中央相忍爲國的苦衷，而使今後國人更能精誠團結，共禦外侮。我們飛到廣西，李德鄰、白劍生、黃旭初都在武鳴機場等着歡迎，大家相見之下，並不像接待代表的例行儀式，而是充分表現出患難知己的真誠情意。除了照例的應酬之外，並沒有形式的討論，而是誠懇的商談。我們並邀李德鄰一同到廣州，面見蔣先生，一切事實問題，都可順利解決。他也坦白的答應了，我們三人遂同赴廣州，在飛機上，深覺同舟共濟的意義，就在那蔚藍的天空上，充分表示出來。這件大事的完成，豈真有天意麼？無非是幾個人以誠相見的結果而已。到了廣州，下機後，休息不久，預備一同晉見蔣先生，而蔣先生却先到來了。我想彼此握手相見之下，必有說不出的愉快與感慨。同時更覺得蔣先生的偉大與親切。此後的問題，由他們當面去解決，我不願再爲參加了，一椿彌天的大事，至是煙消雲散。我在廣州香港，痛痛快快的過了幾天，在那個情景之下，真是值得痛快的啊。數日之後，蔣先生又要我回到浙江的任上去。這真是做戲一樣，反串了兩個多月，仍舊恢復了本來角色。我回到杭州復職，一切依舊，好像是預先安排仍要回來的樣子。至今回想，的確有些可笑。

『浙人的迷信』二十四年春間，蔣先生在家鄉奉化溪口小住，有一日，我隨他到甬江南岸的育王寺去遊覽，這是浙東有名的寺廟，香火非常之盛。那住持的方丈說：「前年育王寶殿被焚，估計要二十多萬元才可修復。募捐的時候，上海有一位富商，願個人獨資重建，寺方認為這是萬衆的善緣，不能任他一人獨佔，而拒絕了他的好意。」這話是否確實，不去管他。但一般富有的人，往往對公益事業，一毛不拔，而看菩薩面上，却偏能慷慨解囊，則確是事實。浙江各地的名山古寺，每年不知消耗多少金錢，單就紹興的錫箔稅而言，那時一年的收入，就有三百多萬元，以十倍來伸算，錫箔的價值，即達三千萬元以上。政府雖抽征三百多萬元的稅收來辦理教育，破除迷信，但這真是揚湯止沸的笨法，於事毫無所補。那和尚又拿出裝在一個小玻璃器具內的「舍利子」與我們看，他說：「這是中國唯一真的舍利子，不但中國各地，就是很多日本人，也要到這裏來瞻仰。」說的十分鄭重，好似育王寺香火的旺盛，就全仗這個佛寶一般。我看那黃荳大小的東西，是半透明的琥珀質，在各種不同方向的光線看過去，就發出各種不同的光彩，這就是他們認為無上至寶的地方，其實道有什麼稀奇呢！三稜的玻璃和貓眼石，不是照樣可以發出不同的光彩麼？就科學觀點說，總不過是很淺顯的折光道理而已。據說：「這是某代高僧修鍊得來的結晶，」不管這話是否可靠，即使真是修鍊得來，於他本人有什麼益處？於衆人又有什麼益處？而值得那樣去寶貴牠呢？在千餘年前，已出了一個反對迎佛骨的韓愈，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真正革除迷信的政府。如果任他自然的下去，不知還要多少年，才能使這種迷信舉動自然的消滅。唉！中國還是在迷信的環境裏面，先行發展科學教育，然後破除迷信好呢？還是用革命的方法，先掃除了迷信的環境，然後發展科學教育好呢？這真是今後行政上值得考慮的問題啊！

【義務勞動與公墓制度】那次，蔣先生指示我兩項工作：第一是人民勞動服務，第二是設立公墓制度，這兩項新政，就全國言，浙江都是最先實行的。勞動服務，首先由省會的公務人員做起，在杭州

市內，將那條污臭的運司河填平。我和省會各機關的同事，大家服務了三天，工作的效率，雖然很低；而工作的情緒，却非常熱烈。這條馬路，就叫做勞動路，作為義務勞動的紀念。各縣對於這個運動，也很熱烈的進行。如修築道路，疏濬河塘，都有很好的成果。由杭州到嘉善的杭嘉公路，就是沿線各縣人民義務勞動的結果。

浙江本是缺糧的省份，由於二十三年的大旱，人民飽嘗飢餓的痛苦，我對開闢耕地，增加生產，自然認為是很重要的措施。而埋葬屍骨，多是良好的土地，却被死人永遠佔領着，並在日益擴大中。生人耕作的土地，則日漸減少，以致影響生產，這便是中國以迷信方式孝敬祖先所獲的結果。浙江甯波鎮海一帶，這種情形，更為顯著。那邊的土地，恐怕要佔可耕地十分之二三。甯波一帶出外經商的人民，不能不賺錢回家，是不一定的。但是死了以後，一定可以賺得一副外面的棺材回來。因此甯波的口岸，客死他鄉者的棺材，要佔進口輪船很多的噸位。我嘗驅車由甯波到鎮海，沿途差不多都在坵墳間行駛，真是他處所未有的現象。自從遷移私坟設立公墓的命令頒行後，有些縣份，因為不感覺土地的需要，未能踴躍實行。至於感覺土地需要的，如甯波鎮海等，經努力執行之後，立刻發生很大的阻力：第一，公墓是新創的制度，社會上都沒有送死人進公墓的觀念和習慣。而且過去具有公墓形式的義塚，是那些貧苦無告者或路屍的埋葬之所。是以普通人家，都不願意送死人到公墓裏去。第二，公墓設備太簡單了，祇有一塊木製的墓碑，似乎不夠體面。第三，社會上大多迷信風水，公墓是不考究這一套的。如果強制他們的先人遺骨離開好風水的地方，而到公墓裏去，是一件不可補償的損失。而且公墓的建築設備，本來是葬者公共的事業。一般人寧可個人花費數萬以至數十萬，去建築私人的坟墓，要他們在公墓裏花上一萬八千，就沒有入樂意了。在財政困難的時候，政府那裏有這許多錢來從事公墓的建築？公墓建築不成功，私墓的遷移，就成問題。更有一些地方士紳，聯名電請中央制止。電文大意有云：「蔣委員長以

孝治天下，對於生母坟墓，備極愛護，何以對人民父母之坟墓，則須勒令遷移，望本為孝思不償永錫爾類」之心，立令省政府收回成命」等語。我接得這種電報，察閱他們的意思，好像遷移私坟，創立公墓，完全是省政府自己變出來的新花樣，而以委員長的孝思作為阻止遷坟最有效的工具。真有些像民國十五年，我在廣西通令全省搗毀偶像，我回到家裏，我的母親却要我去拜菩薩同樣情景。想起來，真有啼笑皆非之慨！由這遷坟的問題，充分表現中國社會舊禮教束縛力量之強大，與政治上事實之矛盾。中國政治，並不是沒有好的政策，但是這等束縛，不能解除，矛盾不能解決，對政策政令的推行，不免有很大的阻礙。上述遷坟問題和破除迷信兩點，都是顯明的例子。

【調任湖北主席與西安事變】廿五年十一月的下旬，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暢卿被刺殞命，蔣先生由西安來電，調我去湖北，我只得從命。我已與浙江新任朱主席騷先約定於十二月十六日交代，準備先到西安去請示，再赴湖北到任，已經定好機位，擬於次日由上海飛西安。那天晚上，許多朋友餞行，飲得大醉，第二天早上，竟誤時上機，祇好等到下次班機再去。在第三天的晚上，（十一月十三日）已知道蔣先生在西安被叛軍劫持的消息。這真是震驚全國，轟動世界的不幸事件。我幸而醉後誤班，不然，這時候亦正在西安，不知要遭遇如何的結果呢。當天晚上，何部長敬之來電話邀我到南京去，共商挽救大計。次早，即乘車到南京。中央方面有主張武力討伐的，有主張和平營救的。結果是兩者同時並進，一方面任命何部長為討伐軍總司令，一方面派人到各方營救。我被派往山西，與閻伯川先生商量，就近設法營救。同行有東北將領王亭午王維宙兩君。乘機飛太原，到了合肥附近，上空飛機漏油，勉強飛至開封，強迫降落，已不能再飛，時已日落黃昏矣。在河南省政府商主席啓予（震）處，匆匆吃了晚飯，連夜改乘火車，到達太原。除了傳達中央方面的決議，及大眾的屬望外，祇有請閻先生去電解救而已。但對方的回電，都是一些不着邊際的話。在太原逗留了好多天，總得不到如何的好結果。雖然內心非常焦急

，亦祇好在那裏忍耐等候。有一天晚上，忽然消息傳來，說是 蔣先生已安抵南京，不覺眉飛色舞，額手稱慶，把壓在心上的一塊大石頭，輕鬆的放了下來。我想：這不僅是我個人如此，全國的人民，也都該如此罷。

我到浙江前後共計一年又十一個月，好多的時間與精神，都耗費在奔走國事與準備國防方面，行政本身的工作，反而無所建樹。好在浙江政治，素來都是謹守成法，具有規模的，尙不至有若何貽誤。而我不能完全盡我的力量，從事本位的工作，使浙江政治得到相當的進展，這是我內心上引爲極大歉疚的事情。

十七 調主鄂政與廬山訓練

【赴湖北接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事變解決，蔣先生平安飛回南京，如山駭浪，倏歸平靜。因西安事變發生而齊集南京的人物，也就漸漸的散去，回復各人原來的崗位。我延至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才由上海飛赴武漢，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職務。這次省府改組，人事更動甚少，祕書長盧鑄，民政廳長孟廣彭，財政廳長賈士毅，教育廳長周天放，委員楊揆一，范熙績，吳國楨均留任。他們都是楊前任的同僚，亦多是張前任的同僚，祇有建設廳長李范一呈請辭職，改由伍展空繼任。在楊前主席被刺，迄我到任之前，中間差不多有三個月沒有主席，一切政務，都由他們在維持，而未嘗停頓。因此我到來接事，各項都很有頭緒，祇是舉行了一個交代儀式，並沒有一般機關新舊交替的許多麻煩。我想：這是人事安定的好處。不然的話，「一朝天子一朝臣」，人生地不熟，不知要耽誤多少時候，才能使各項政務重上軌道。其損失的重大，是不可計算的。這種情形，不但省政府如此，即省以下各級機關，又何嘗不如此？真是值得我們在制度上應行研究改進的一個問題。

【武漢的環境】湖北省會武漢的社會環境，與浙江省會杭州相比較，有很大的區別。杭州是甯靜的，幽美的，不但西湖的山光水色，清幽綺麗，即過往及居住的人，也都悠閒自得，與政治好像沒有多大的關係。它雖然接近上海，但上海的繁雜並沒有影響它的甯靜。我們住在杭州，並不覺得它有什麼好處，可是一旦離去，就時常會想起它的風味。「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人們在未到杭州以前，是多麼的豔羨？離去以後，又多麼的留戀？可是武漢就大不相同了！武漢是中國中部水陸交通的總樞，行旅來往是那樣的頻繁，社會環境是那樣的複雜，山水是那樣的平凡，氣候是那樣的窒悶，住在那裏的人，在行

動上心理上，到處都表現着忙碌而不安定的狀態。尤其是省政府方面，既要應付各方的軍事問題，又要應酬往來的軍政賓客。而漢口租界的各國領事以及各國駐軍，無一不是同上海一樣的應有盡有，省政府都要同他們來往周旋。精神上的痛苦，時間上的浪費，是不必說了。還有一年一度的大水，無論成災與否，政府與人民，都是提心吊膽的在恐怖中過日子。

【武漢的工商業】武漢是中國中部工商業的中心，工商業的發達，在中國各大都市中，僅亞於上海。中外商人在那裏所辦的工業，固然很多，我們的民族工業，也有良好的基礎。而南皮張文襄（之洞）實開武漢工業史之先頁。由其手創者如漢冶萍鋼鐵廠、紡紗廠、織布廠、製蘇廠、造幣廠、兵工廠、造船廠、造紙廠、製革廠，都是在光緒年間就開辦了。可惜現在或因機器陳舊，出品不良，或因管理不善，營業不振，或因資本不足，無法維持，大部都已停閉。能苟延殘喘者亦祇極少部份。工業本來是要繼續不斷的改進，才能擴展滋長。至於如何才能改良進步而不斷的發展下去，創辦者僅負一部份的責任，而繼承者却要負大部的責任。我國工業，不是創辦無人，而是繼承者不能盡其責任。尤其是官辦事業，幾乎都成了官僚中飽自肥的淵藪，根本談不到生產的改進，營業的發展。今後如不能將這等痼疾革除，非特不能用國家的資本，從事計劃的經濟建設，並將無以立國於世界。因為今後經濟的建設，必須運用國家資本，由國家管理經營，方能迅速的有計劃的成功。我們看到蘇聯的三個五年經濟計劃的成功，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而反觀我國以前工業的失敗的主因，大抵由於官辦官營的不得法，這是多麼值得我們政府與人民的反省啊？我懷念張文襄創業的艱苦與偉大，同時也憂慮到今後官辦官營事業的危機。

【悼念楊暢卿】刺楊（暢卿）的案子，可算是國民政府成立後繼廖（仲愷）案發生的第二件重大謀殺案。在案子初發生的時候，社會人士，固然是揣測紛紛，莫衷真相。就是案子破獲之後，很多人也不甚了了。上使的劉處隱，雖判了徒刑，但是案情的內容，仍沒有公佈。楊氏是一位政治的能手，他輔佐

蔣先生，有很多的貢獻，他在湖北任內，雖僅有一年多的時間，而憑他的毅力魄力，不顧一切阻撓，銳意進行，也就做成了幾件重大的事情。要不是發生那次慘案，一定還有更多的建樹表現出來。這種硬幹苦幹的精神，實在值得吾人欽佩！成就未宏，竟遭狙擊，這又是何等可惜的事情！我到任的時候，曾到他的墓地奠吊，牛羊踐踏，木石縱橫，尸骨未寒，已經無人過問，這真是政治犧牲者的不幸的遭際，我於悼念之餘，不禁感慨交集！

湖北省曾設於武昌，這是我二十二年前負笈舊遊之地。那時的街道狹隘污臭，每由南湖學校入城，宛如進入腐爛地獄。到我就任主席，已經完全改觀了。楊暢卿氏以他前在廣州辦理市政的經驗與魄力，終於將武昌腐舊的樣子，改變為一個嶄新的形態，不任漢口租界，專美於前。我到了武昌，同時也想到廣州，這真算是楊氏生平一首一尾留在都市中的兩個政績，恰好擺在粵漢鐵路的兩端，亦是一個極有趣味的事跡。

省政府的辦公處一向都在長街上，由前清的總督衙門改設。不知是那任的主席，精於堪輿之術，因舊督署的地址，風水太壞，要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據說：「那裏是武昌風水最好的地方，省府設在那裏，可能使主席長久做下去，甚至可以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可是他的任期，并不能如他所期望的那樣長久。廿二年張岳軍繼任主席，就職時，我代表行政院去監誓。見號為武昌風水地的湖北省政府，是在一個小橫街百壽巷裏面的一個舊衙門，局面極為狹隘，不是一個全省最高行政機關的氣象。張岳軍還笑着對我說：「衙門面前原有兩條旗桿，亦因為有碍風水，而把牠移到衙門的側邊。」我聽了，聯想起西遊記孫猴子被二郎神趕得沒處藏避，把身子變為一個廟，把尾巴變為一條旗桿，豈在廟的背後，而為二郎神識破了的故事，不禁大笑起來。

【省府合署辦公制的研究】楊暢卿是主張省府合署辦公最力的人。他到任後，見省府舊址太不合用

了，即將舊署重新建築，把全府的各廳處合在一處辦公，所以湖北省政府的合署辦公，是最徹底的。不但辦公廳的地點，同在一起，就是全府的公文，也是總收總發，集中處理。各廳處即等於省府的一個大科，除了本身的直屬機關外，所有公文都是送由祕書處核閱後，用省府的名義行出去。比之浙江的分署辦公，廳處承辦府稿的辦法，似乎要簡單而便利得多。但我認為這種制度，並不是最好的辦法，而尙有值得我們研討的地方。合署辦公的本旨，在節省時間人力物力以至地方與建築物，藉以提高行政效率，原是很切要很合理的辦法，也可以說是實行科學管理應有的措施。我們知道美國是首先提倡科學管理運動的國家。他的陸軍部的五角大廈，能容納四萬五千人在一處辦公，指揮靈活，聯繫方便，工作效率極高，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是要澈底實行科學管理，必須以進步的科學設備與技術為基礎。如果不求機關的設備與技術的改進，而謀制度的改革，往往會發生很大的困難。況且省政府是國家行政的分支機構，地方行政的最高機關，政務門類繁複，決不像部的業務那樣性質單純。省政府主席及祕書長應否成為總攬全局的中心，能否具有總攬萬事的能力？頗成問題。就拿湖北合署辦公的辦法來說，各廳處成為省府的一科，廳處長成為一個科長，在某一個時期及某一個範圍內，未嘗不可。但他們所辦理的事件，完全須經由祕書長或祕書處的祕書科長核閱後，才能作最後的決定，而繕發出去，時間上未必見得經濟。事務的處理，亦未見得就能妥善正確。而且現代行政事務日漸繁雜，分工日趨細密，以省府祕書長祕書科長少數的人手，綜核全部的業務，未必能做到盡善盡美的程度。因為他們決不是萬能的人才，也不能有超人的精力。即使這兩個條件都具備了，在組織上與工作上，也不免犯了重疊繁複之弊。所以我主張在事務尙未大量發展的時期，廳處可視同省府的一科，主辦他應辦的業務，廳處長對於主管業務，除了極重要或有關全體者，應提出省務會議或請示主席外，其餘儘可逕行決定，用省府名義發行，不必再加復核。關於兩廳處以上有關的問題，亦由其本身妥商解決就是了。如此則各廳處主管的精神，既可

以發揮，省務的統一性，不致於妨礙，時間人力物力，亦極經濟，這便符合行政三聯制中「分層負責」的旨趣。否則必減少主管的責任，增加祕書處的繁雜，工作效率，反而發生影響。如果省級行政業務的範圍日漸擴充，各廳處的組織，必日漸擴大，在不妨礙統一，不發生矛盾的原則之下，更應予各廳處長以較大範圍的決定權力，以處理其主管的業務，使他能成為對內對外主管的負責機關。從而減輕主席與祕書處事業上的負擔，得以專心於各項重要問題的研究與應付。如此方能收簡繁之效果，而不致束縛制度的精神，阻礙各級機構能力的發展。所以省府合署辦公制度的建立，應在發揮分層負責的精神及各主管機構的效能上着眼，而不能就事權集中，束縛次級應有職能的發展上着眼。楊氏對於合署辦公的安排，在設備上技術上，固已相當顧及，但他的精神對於主管機構能力的發展，終不免有束縛之處。這是我事後客觀的看法，順便寫出來，以供研究本問題者的參考。

【漢冶萍公司的近況】湖北的礦產，以大冶的鐵礦，為最著名，在全國亦佔極重要的地位。礦區在大冶縣石灰窰附近的象鼻山一帶。據專家說：礦石的成份雖好，但藏量并不十分豐富。他不是整片廣大的山脈，而是聚集成窩的一大團，所以叫做「窩子鐵礦」。經歷年的開採，藏量已日見減少了。漢冶萍公司是前清官辦的，包含了漢陽的煉鋼廠，大冶的鐵礦及冶鐵廠，與萍鄉的煤礦。即是採運萍鄉的煤，將大冶鐵砂，在石灰窰冶成生鐵，再運至漢陽煉成鋼鐵，規模是非常宏大的。可惜管理不善，無形中就變成了盛宣懷一家的私產。中國官辦事業，往往如此，殊堪浩嘆！我到任以後，漢陽鋼廠石灰窰鐵廠，都已停工了。而且在國內外負了很多的債務，尤其是日本的債，價值的條件非常苛刻。所以祇得將開採下來的礦石，全數交由日本抵償債務，價格十分低廉。不但公司無利可圖，而工人終日辛勞，亦難圖一飽。因為大量的礦石，國內既無大規模可以冶煉（石灰窰鐵廠每日可冶鐵二百五十噸，已停工，僅大河溝鐵廠每日可冶鐵一百噸），即使能自己冶煉，這許多鋼鐵，亦非幼稚的中國工業界所能全數銷納的。

并且在冶煉技術上，生產成本上，亦不能與外貨相競爭，而債務又不得不償還。故大冶的鐵礦，就變成日本的專賣品，稍不如意，就以停購追償相威脅。這種「原料國」的痛苦，我們不知忍受幾多年代了。日本將我鐵石運回本國，由八幡鋼鐵廠加以冶煉，而成了他國防軍事工業上的重要原料。中日戰爭爆發以來，日人屠殺我軍民，佔領我土地的武器，其中不知含有多少大冶鐵礦的鐵石成份在內，這不是大冶礦業史上最悲痛的一件事麼？

【石灰窯附近的礦產】石灰窯係大冶的一個市鎮，與黃石港相毗連，在武昌的下游百多公里的岸上，大輪船終年可通。那裏附近，除鐵礦之外，還產大量的石灰礦，石灰窯想係因此而得名的。更有幾處小煤礦、石灰石、煤鐵，這些礦產，在工業上都是相依爲用的原料。那裏水路交通既便，又兼有這幾種礦，就形成一個最適宜的工業區域。除了冶鐵廠外，還有一個很大的洋灰廠，（西記象牌水泥）及其他的小工廠，因此石灰窯這個市鎮，無論在目前及以後，在湖北省內，都要佔工業上很重要的地位。

【應城的石膏鹽】應城縣的石膏礦，亦聞名國內，附帶生產一種石膏鹽，每年產量，也有二三十萬擔。此種副產品係吸取石膏礦洞的水，熬煎而成者。據說：係洪楊時候，下游鹽運不通，人多淡食，始發現此種膏鹽，以供食用。近百年來，以此爲業者，頗不乏人。其銷行區域，都爲附近各縣，且多係私販。歷年以來，中央鹽務當局，欲禁止煎熬膏鹽，與地方時常發生糾紛。在我赴任前，受鹽務當局之託，請爲設法禁止。到任後，地方又請願設法解禁，但廢除小產地，集中大產地，是中央的鹽務政策，目的在管理便利，增加稅收，如浙江之餘姚黃巖等鹽場，皆在廢棄之例，膏鹽、硝鹽自然亦非禁止不可。而且還說膏鹽、硝鹽缺乏礦質，含有毒藥，不合衛生，理由是很正當的。但因地方一部份人民生計所關，若祇是禁止膏鹽的產銷，而不妥籌補救之法，則顧此失彼，困難仍多。所以歷任主席對此問題，皆處於兩難地位，而無法解決。

【湖北的水患與金口的水利工程】湖北的大患，就是水災。廿四年的大水，打破了歷來的紀錄。漢口的租界，武昌的城區，都用水泥築起防水的圍牆，每漲大水的時候，附近的人民，都在水平線底下生活。我雖然未到過荷蘭，但想武漢的水災情形，大概和荷蘭相仿，那麼武漢就可稱爲「中國的荷蘭」了。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和武漢水利工程局，也可說是水害委員會和水害工程局。一年到頭，都是忙於築堤防水，水漲堤高，水和堤，年年在那裏比賽，不知誰得到最後的勝利？近數年來，武漢的大水，固然由於雨量的增加。而主要的原因，實由於下游水道淤塞，雨水宣洩不及。如果不由中央作整個計劃，從下游水道疏濬着手，祇是在武漢年年作那加高培厚的工程，總不免有水溢堤崩盡成魚鱗的一天！廿四年鍾祥羅漢寺大堤潰決，漢口左岸，自鍾祥縣以下，盡成澤國，人民的損失，自難數計。楊暢卿主席，用了四百多萬元法幣，動員了二十多萬民工，才把它修復起來，工程浩大，可想而知。我到任的時候，工程完成，特地親到那裏視察，對楊氏的勇於防患，深致欽佩，但此項工程能否作爲永久保障，還是一個疑問。另外一個偉大的水利工程，則爲金口閘。金口是我辛亥北伐時登陸的地點，撫今追昔，更覺有前往察看的必要。金口乃附近幾個小湖的出口，每年江水倒灌，沿湖十數萬畝的良田，都被淹沒了。這閘築好以後，不但原有的田，可以耕種，并且還可以新闢出許多湖田來，價值是很大的。那時全部工程已經竣事，係用鋼骨水泥建築的機械，開閉水閘，在全國中也是數一數二的了。政府在那裏，開了一個很大的農場，仿照蘇聯集體農場的辦法，土地是公有的，人民耕作的收穫是各別的，政府貸予資本，并擔任技術的指導，與行政的管理，用意未嘗不善。可是人民狃於故常，對於這種集體耕耘的生活，不很習慣，所以參加者尚不多。尤其是在那裏原有田地的人，在水淹田沉的時候，因無力抵抗而不得不放棄。現在水乾田起，他們又要爭回所有權。對於政府將他們財產盡劃爲公有的辦法，均竭力反對，引起了大規模的暴動，將農場焚燒，殺殺農場職員。我到那裏的時候，附近數百農民一路頂香長跪請願，要求政府

發還他們的田地。據查其中固然有若干失田的農民，但亦有很多豪紳在鼓動這個風潮。他們希望政府取銷土地公有與集體耕作的計劃。如果這個希望能實現，那末那些新漲出來的湖田，就為他們所佔有了。我對於這事，正擬分別處理，而「七七」戰事發生，就擱置下來。

【湖北的財政】湖北省政府的財政，以往都很困難，收入不敷支出。自張岳軍氏竭力緊縮支出，收支已可相抵。但是開源的工作，尚在開始着手辦理。湖北全省田賦僅三百餘萬元，與浙江相比，相差甚遠，若能切實整理，則其收入，自比浙江為多。因為湖北的土地面積，數倍於浙江也。前任擬仿行浙江土地編查辦法，特調金華縣長陳開泗到湖北去主持地政實驗縣。隨後又設立土地局，由楊緯庵創辦。楊去後，由汪浩繼任。汪係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教授，我主浙時，任平湖縣長，以辦理地政實驗為縣政中心，亦是秉承中央整理地政的意思辦理的。一般對於湖北的土地整理工作，在技術方面有主張飛機測量者，有主張實地丈量者。前者因工具未備，經驗毫無，後者則需時過久，難收速效。正徘徊於兩者之間，而中日戰事爆發，以致未能循序實施，收穫若何的成績。

湖北的稅捐，以營業稅為大宗，但全年收入，亦僅三百多萬元，與估計相差甚遠。我到任後，派李立民負責整理，先由武漢三鎮着手，雖然短短數月內，而收數比例，增加甚多。並且征收的範圍已到達租界，這是以前湖北所未有的事。他如警察房捐，亦疲玩不堪，收入甚少。我將此項捐稅交與警察局長蔡孟學負責辦理，按戶催征，在武昌方面，收數增加數倍，然而與地方權勢衝突的事情，就多了。有一次，警察局長因房捐問題，而受到駐軍機關的極大侮辱。由此可知武漢情形的複雜，政令推行的困難了。

【湖北的交通】湖北交通，素稱便利，陸上有平漢、粵漢兩大鐵路，直通南北。長江滾滾，橫貫東西，漢水及各地湖港，亦為內地交通的補助。以前政府首要之交通機關為航政局。其輪隻航行，東至九

江，西至宜昌，北至襄樊，南至長沙，營業相當發達。武漢三鎮隔江相對，皆設有輪渡。每日往來人民，將近十萬人。民元以前，用小艇渡江，一有風波，即行停渡，而且大擺隊小擺隊，（幫會名稱）往往在江中強橫勒索，人民視為畏途，至是乃告絕跡。我到任後，與地方集議，建築武漢三鎮大鐵橋，工程浩大，估計需款一千六百餘萬元，已有成議。并由錢江大橋工程處長茅以昇設計，開始鑽探。此橋完成，當為武漢生色不少，惜因戰事停止，此後不知何日方能觀成耳！公路交通無論量的方面，質的方面，都比各省落後，原因是他已有鐵路和水路，交通相當發達，需要尙非迫切，而開辦亦較遲。其次湖北公路路線所經，皆為沼澤地區，路基濡軟，敷築保養，亦頗不易也。

【湖北的特產】農產方面，棉花每年出產三百餘萬擔，佔全國棉的生產量三分之一。此外，糧食和麻，都是生產的大宗。就是許多湖泊裏所產的魚，數量亦極可觀，以漁撈為生的人，也不在少數。古人說：「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不是武昌所產的魚，滋味不好，而是食得太多了，就覺得腥臭的原故。這句話要久住武昌的人，方可了解的。我們對於這句成語，並可作為武昌多魚的形容詞看。

【舉行縣長考試】我到湖北，最感到麻煩的，就是那些想當縣長的人。他們好像前清的候補知縣，終年在那裏候差一樣，時時上衙門來請求。好像當縣長是他們終身的職業，他們失了業，政府就得設法維持他們一般。這班人似乎是有組織有團體的，稍有機會，就拚命鑽營，或挑撥是非，與風作浪，以造成於他們有利的機會。我為解除這種麻煩起見，於是請准中央舉行縣長考試。這是我從政以來舉辦的第二次縣長考試，但是所得的結果，也令我失望！

三月間國民政府主席林子超先生要到廣州去祭黃花崗的革命先靈，路過武漢，我們舉行了一個空前盛大的歡迎。各國駐在武漢的兵艦，都鳴砲致敬。林主席一向是輕軍簡從，不肯講求這些儀節的，所以他的行動，社會上都不很注意。早前報紙上的記載，都是直呼其名的登着「林森至何處」，而不稱「國

府林主席」。我認爲這是有損國家元首的尊嚴，易啓外人的輕視。尤其武漢乃中外觀瞻所集的地方，對於禮敬元首的舉動，在國家體制的尊嚴上，是極屬必要的。林主席在武昌逗留了大半日，就乘粵漢路車南下到了廣州。曾以國家元首的地位，致祭黃花崗的革命先烈，爲中國統一史上值得記載的事件。

【鄂粵鐵路電訊交通的完成】粵漢鐵路在二十五年兩廣統一之後，才能通車。二十六年春，廣州至武昌的長途電話，亦接通了。我與廣東省政府主席黃慕松氏，首先通話，這是珠江流域與長江流域交通史上的新紀元。我們在電話中，都用廣東話接談，好像在兩廣地區內閒談一樣，並沒有覺到廣東湖北之間，隔了三個省份，廣州武昌之間，相距一千公里。那時他正在患病，不久就逝世了！這次的通話，成爲我們在最長的距離作最後的談話。反轉來說，如果沒有粵漢長途電話，我們連這一個最後談話的機會也沒有了，這是多麼值得追憶和感慨的事情！

【湖北的煙毒】這時湖北省的民衆組織工作，如都市方面的義勇警察訓練，各縣的壯丁訓練等，都在積極地推動。各種有關國防的演習，亦相繼舉行。我也如在浙江一樣，爲這種工作而忙碌。在我的想像中，浙江人民的體格多是矮小而孱弱，湖北人民一定比較的高大而壯健，可是事實並不如此。我所檢閱的湖北壯丁，並不見得比浙江的強壯，反而表現出許多病態。最特殊的則爲很多人面帶煙容。因爲當時湖北不是禁煙的省份，而且四川、陝西、甘肅、雲南、貴州這幾省所產的鴉片煙土，百十年來，大都以漢口爲集散的市场，所以受毒極深。聽說宜昌一帶，比武漢附近各縣，還要厲害得多。使我想起浙江的禁煙禁毒，由魯主席而到我任內，雖然槍斃了好些人，但是浙江人民，因此不致受到經濟上的無量損失，與身體上的重大戕害，這於保障國民經濟與民族健康，實有極大的關係。林文忠公（則徐）在晚清時代，首先注意及此，真是具有遠大眼光的政治家啊！

【武漢的國際應酬】武漢當水位最高的時候，一萬噸的巡洋艦，都可直達，因此每值大水季節，就

是湖北行政當局對各國海軍應酬最多的時候。除了常駐武漢的司令艦長之外，英、美、日、法、意五國駐遼東的海軍總司令，必乘大巡洋艦到漢口來巡視一次。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的領海內河，都是他們共有的勢力範圍。他們並不是友誼的來拜訪或遊歷，而是任務上例行巡視。他對於省府主席市長等地方長官，表面上也很尊重的，一到武漢，即先來拜訪，而我們亦不能不同他們應酬。可是這種帶有示威性、侮辱性的交際，我心中總感覺得難過。那年到來的，就有英國遠東海軍提督李特，日本第三艦隊（即駐中國艦隊）總司令長谷川清，及美國遠東海軍提督等。他們訪我之後，我也得照例前去回拜，他們并且在艦上設宴招待。我問美國提督說：「你們這樣大的船，駛入長江來，要不要中國領江？」他說：「不會的。因為我們已發明一種儀器，在艦行的時候，水的深淺與有沒有暗礁，在儀器裏很清楚的表示出來。不過航行慢一些就是了。」他並且邀我參觀那種儀器。我深覺得天然的險阻，並不能限制外人航行，一切天然的困難，都被科學克服了。我又問他的夫人：「是不是坐兵艦來的？」他說：「不是的。她須坐飛機或坐商船到來，因為美國的法令，是不許可帶着女人家眷在兵艦上行動，即使大總統也不能例外」。於此又使我想到民主國家的規律，實在要比不民主國家嚴格得多。民主不是個人的絕對自由，而是人要共同遵守法律的規定，這等立法守法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效法的。長谷川清的坐艦龍田號（三等巡洋艦）僅有三千多噸。他說：「因為水淺，大艦不能進來，其實這種噸位，在長江已很合用了。」他的言外之音，使我聽了，非常難受，很像他們這種兵艦，完全是爲了對付中國而用的。據說：「日本海軍對於長江的航行，更爲熟悉。不但他聚養了專用的領江，而他們的駕駛員，恐怕比中國的領江，還要熟悉得多。」長谷川清是日本海軍裏最年輕的中將，他在日本海軍俱樂部招待我，他說：「一個議會裏，沒有女人，是太寂寞了。在日本，不論最高級軍政長官的議會，都可以叫藝妓陪酒，這是不違犯紀律

和藝妓算嚴的。這次因為在中國講中國的地方長官，所以不好意思叫藝妓陪酒。」我以前也聽人說過，日本軍人也是同中國過去的軍人一樣，以酒色英雄自豪的。聽了他的說話，更證實了以前所聞的不錯。（按長谷川清即爲「八一三」上海事變的主動者，後調台灣總督。）

在國際的應酬場合中，文官的服裝是沒有規定的。如果有好幾個文官同在一起應酬，有的穿中山裝，有的穿西裝，有的穿長袍馬褂，弄得參差不齊，形式非常難看。那年四五月間，英皇喬治六世，舉行加冕典禮，我國除了派遣特使去慶賀之外，凡英國在中國有領事駐軍商民的地方，都是很熱烈的慶祝，邀請中國官民去參加。漢口的英僑很多，自然是更鄭重熱烈的舉行。我國參加的文官，爲求儀容整齊起見，都穿了長袍馬褂，我並掛了一個大綬二等雲麾勳章。那時天氣已熱，穿的都是沙馬褂單長袍，再掛上那個大綬勳章，就覺得累贅不堪。後來弄得大汗滿身，透過衣表，更不雅觀。我想，這種長袍馬褂，在閒常無事的時候，偶一服用，也覺舒閒適意。若從事工作，或參加典禮的時候，實在是要不得的。我不知國家爲什麼要把這前清的遺式保留下來，並當它是正規的禮服呢！

【武漢的氣候】武漢夏季的酷熱，我在學生時代已經飽嘗過了。白天熱氣與水氣交蒸，人好像住在蒸籠裏一樣。壁突上筆直的煙，一縷一縷沖入霄漢，湖沼裏平靜的水，一片一片躺在地面，沒有一些風來攪動它，成爲一個靜寂而煩悶的景象。夜裏仍舊是一樣，溫度並不能減低多少。據說武漢是中國氣候最熱的地方，比兩廣福建都厲害，真是熱得怕人，所以住在武漢的要人，必須有個避暑的地方，來調劑他們的夏季生活。在平漢路上，河南、湖北交界的地方，有雞公山，在九江附近有廬山。這兩個避暑名山的開闢，主要的原因，便是爲了要避躲武漢的炎熱。抗戰軍興的前幾年，每到夏天，蔣先生多半住在廬山，所以廬山一變而爲暑期中國軍事政治的中心。以前歷任的湖北主席，都在那裏置備別墅，因此我也不能避免的準備了一些房子，以便不時到那裏去居住。

【廬山訓練】廬山訓練團成立於二十二年的夏天，廿三年仍繼續辦理。廿四年 蔣先生入駐四川，就改在峨嵋山訓練。廿五年夏天，兩廣事變發生，蔣先生赴廣州，暫停了一年。到了廿六年，重新恢復。廿六年以前，我雖時常往來這些地方，但沒有直接參加過訓練工作。而且以前的訓練，完全以軍隊重要的幹部為對象，他的作用，是將過去會互相攻擊互相對抗的所謂中央軍、西北軍、東北軍、晉綏軍、四川軍、兩廣軍等等，會合一起，在蔣先生精神感召及懇切訓導之下，加以國家民族意識的陶冶，惕以敵國外患侵凌的危險，使得他們把以前畛域派別的觀念，和頻年交相火併的夙隙前嫌，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滅。同時更積極的造成了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的新意識、新力量。所以訓練的時期雖極短促，受訓人員在學術上的收穫，雖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言之，可以說是未來抗戰建國的一種原動力。成功之偉大，可以想見！但因含有對外軍事的作用，內容比較秘密，所以外間明白真相和意義的人，是很少數的。到了廿六年，訓練的範圍，更加擴大了，把全國中等學校的校長，訓育主任以及辦理童子軍的幹部，與黨政的幹部，都集合到廬山去受訓。於是廿四年以前軍事幹部的團結訓練，乃一變而為知識青年幹部的團結訓練，範圍和意義自更重大。蔣先生自兼團長，陳辭修任教育長，孫方魯任第一總隊長，我任第二總隊長。以下的大隊長、分隊長都是那時的軍、師、團長挑選出來的。抗戰以來，都在擔任着戰區副司令長官，集團總司令，軍長，以及省政府主席等要職。羣英畢集，濟濟一堂，真是一時的盛舉。

第二總隊的宿舍，在山上的圖書館，是廬山最偉大最新穎的建築物，團員是全國高中與師範學校的校長，與訓育主任，共有一千多人，分為三個大隊，九個中隊，完全按軍隊編制，實行軍事管理。這些久為人師的學生，一旦拘束起來，嘗試軍隊的生活，自然有些不慣。當入隊的時候，首先要將西裝的長頭髮，古裝的長鬍鬚剪去，變成一個士兵的形式。有兩個鬚長及腹道貌岸然的團員，對於此種規定，頗

不願遵守，而請求保留。他說：「數十年相傳爲命的東西，一旦將它剷除，不但感情上有所不忍，在道義上亦有所不安！」他這種說法，似乎有點迂腐。實在他的不願剷除長鬚，不是所謂感情與道義的問題，而是一個習慣問題。滿清入關，漢人爲反抗雉髮令，不知死了幾多人，他們何嘗個個都是凜於民族大義而誓死不屈的呢？可以說，大多數都是因狃於舊習不願改變花樣，致被滿人疑爲有意反抗而將他們殺死的啊。到後來這兩位學員的長鬚，在發生了一些小麻煩之後，終於剪了下來，不知道他們現在回想起來，又是怎樣一個情緒呢！有一天，舉行開訓典禮，全隊開到海會寺第一總隊的地點集合，并且當天要趕回來。山上的天氣與山下的天氣，完全兩樣。在大熱的陽光下行軍，路程雖不很遠，（來回四五十餘里）而山路崎嶇難行，中途落伍的非常之多，天太黑了，還在爬那險峻的太乙嶺。有一個上海的學員，在暗地裏說：「我從來未離過上海，從來也未見過山，上過山，這個苦頭我真吃不消了！爲什麼不把第一總隊調到山上來，等他們歇歇涼，領略領略廬山的風味。偏偏要把我們調下去，吃這個苦頭？真是缺德。」我聽了他的話，不禁笑了起來。

【訓練的管理與內容的批判】一個人即使到了六十歲，如果重度學生生活，那種天真無邪的學生習氣，仍會很自然的表現出來。這許多當過先生的學生，自然也不能例外。入隊以後，馬上把先生的面目收起，表現出學生的姿態。所以隊內的管理，是相當困難的。凡管理上每一個要求，必須將事理說明，并時常提起他們自尊的心理，才能使他們迅速接受，一致遵行。記得有一次，在飯廳內，非常的嘈雜，值星官無法制止，我祇是溫和的說了兩句：「你們應該自己尊重，不要長官來干涉。」說了，頓時靜肅起來。因爲有知識有地位的人，受了旁人的干涉，心內總有些不平的憤懣之氣，而欲有所反抗，以爭取體面。因此干涉愈厲害，反抗亦愈甚。縱然一時用強力制止了，他的內心總是不大舒服，遇有機會，還是要爆發出來的。倒不如提起他的自尊心，使他自己約束自己，來得有效。這種辦法，不但對有知識有

地位的人，應該如此，即是對普通的人，也應該如此。

如右所述，這種訓練的意義和辦法，的確具有偉大的價值。但是照我看來，還有需要改良的地方。第一訓練的時間是那樣短暫，需要灌輸的科目，又那樣繁多，弄得一天到晚，緊張不堪，連休息思索的時間都沒有。這樣的訓練，以之鍛鍊勞動刻苦的生活則可，欲言改造精神，訓練意志，恐怕還要啓發學員在內心上多做一些自我反省自我檢討的工夫才行。其次一般講演的課目也太多了，樣樣都要聽取，弄得人腦筋裏裝不下去。結果，樣樣都未必有深刻的了解。倒不如課目簡單一些，內容深刻一些，或者較易得益。不過我得聲明，這是我對於廬山訓練的回憶與感想，現在經過許多時期不斷的改進，各地的幹部訓練，當已大大的不同。

「七七」事變發生了！有一天，集合了全隊的官長學員，蔣先生登壇點將，命令總隊裏的李默庵、馮安邦、劉堪等軍師長，率隊北上，抵抗日寇的侵略。奉令出發的人員，站在將台上，與一班未曾出發的同學告別。真是人中英雄，氣壯山河。同學景仰羨慕的心，與企望効死致勝的心，都同時表現出來！這是一個有歷史價值的鏡頭，可惜那時沒有將實際的影子照下來。但留在我的腦筋裏的影子，是永遠忘不了的！

武漢是我們抗戰的中心，情形特殊而複雜。我因職務的關係，必須立刻回去照料準備。在距離本期結訓還有十天的時候，就下山回去了。到了省裏，除處理行政事務之外，也正如在浙江時候一樣，忙着國防工事的佈置與建築。因為預料武漢是敵人必然進攻的目標，而須早為準備的。

【主鄂餘感】我自一月十六日到湖北擔任職事，八月一日，調回南京，另有任務，中間又在廬山擔任訓練工作一個月。實際上完全致力省政的時間，不過五個多月。湖北是一個衝要而複雜的省份，單就熟悉全省的情形而言，也需要相當的時間，在這復雜的任期內，決不能有所施展。但是現在回想起來，

湖北的政情雖然很複雜，而可以發展可以成功的條件也很多。如果不是因地理上的關係，易受外來牽動，弄得人事上的不安定，那末他的進步，一定不會落於任何一省之後。除此之外，湖北的大患，一爲洪災，一爲黑毒，這是損耗人民生命財產的兩個主要原因，而須以全力根除的。如果洪災黑毒能夠根除，再能假以時日，利用各種優越條件，發展經濟建設，則湖北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天上的天堂，決不僅限於地上的蘇杭啊！

十八 抗戰開始與山西之役

【抗戰開始奉命入京擔任軍職】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我鑑於武漢是中國的心腹重地，華洋雜處，恐怕會發生問題，不待廬山訓練團訓練結業，就請准先回武昌。當時我曾考慮到萬一蘆溝橋的戰事發展為全面的戰事，日本第二步攻擊的主要目標，必定是武漢。而我國首都南京萬一不守，第二個首都，也一定是武漢。所以武漢為將來軍事上必爭之地，必須趁這個時間作鞏固武漢大後方的準備。於是建議中央撥發國防工事建築費一百萬元，以加強武漢的國防工事。這個建議為中央採納了，不過祇准先撥五十萬元，其餘五十萬元，責成湖北省政府籌墊。這個國防工事建築的責任，便無形中交由我來擔負。我一方面仿照在浙江的時候，先組織一個國防工程處，分頭採購物料，開始建築。另一方面到各方去觀察過去湖北省境已有的國防工事，主要的是長江下游的田家鎮至九江一帶，與平漢路上的武勝關至信陽一帶。先到田家鎮一帶，這是歷史上屏障武漢的要塞，有新的國防建築，也有舊的國防建築。我見原有的工事，舊的是太陳舊了，新的是太簡陋了，並有不合理的地方。有幾個炮位竟看不見江面上的目標，控制不了整個的航線。那些砲位上的防守官兵，更是行所無事的在那裏住家式的住着。我隨便考問他們一些防守上的常識，竟沒有一人能答得上來。其他必要的通訊，交通，設備與糧秣，彈藥的儲藏，更是談不到，我覺得非常危險與失望，而急急想把它改善增強。隨後又到武勝關及信陽附近觀察，那裏的情形，比田家鎮更差得多。我在五十八師俞濟時師長處食了一頓晚飯，俞師長曾任浙江保安處長，也是舊同事，那師官兵都是浙江的保安團改編的，所以相見之後，分外親密。飯後接到程參謀總長頌雲的電報，要我立刻到南京去，我祇好停止了觀察的工作，當夜趕回武昌。我已知道有新的任務，一時未必能夠回來，

便把省政府主席的職務交由秘書長盧鐸代理。斯搭機飛到上海，大約是八月一日，觀察當時情勢，預料全面戰爭是免不了的，必須將家中稍爲安頓，逗留了幾天，於四日才到南京。六日那天，在國民政府旁了一備具有歷史性的重要會議。蔣先生將「七七」事變的情形，以及敵人要滅亡中國的陰謀，與我們國家的決策宣佈了，中日兩國自此遂進入戰爭的狀態。當場除各軍事主管長官或有機關報告之外，即由蔣先生指定各人的任務，我擔任第一部長，係主管作戰計劃，與作戰命令的。此外，還有二、三、四、五、六等部，但後來有些部並未正式成立。我受到這個命令，非常惶恐，因為我這十多年來，一向都混在行政界中，對於軍事祇在中間幹了幾次打雜式的臨時工作，對於這個老調，有點怕起重彈起來！蔣先生要我擔任這項工作，也許因為我會於二十二年擔任過北平軍分會參謀長，參加過長城戰役的原故。但那次戰役，是局部的，而現在却是全國性的戰爭，輕重大小，又有分別。同時因為離開軍界久了，很多情形，不甚熟悉，幹部亦成問題。躊躇至再，終因懷於國家民族勝敗存亡的大義，與自己應盡的責任，便不顧一切的毅然肩負起來。在短短的數日間，東渡西渡的，將一個機構，組織成功。并擬具初期的作戰計劃，呈請蔣先生核示。好在蔣先生直接指導之下，奉命進行，尙不致十分困難。

【抗戰後的國內大團結】自「七七」蘆溝橋事變而至「八一三」上海事變發生期間，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最大的轉變！這一事變，驚醒了國人的迷夢，結束了國內的戰爭，使中國內部團結起來。「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古語，那時才得到事實的證明。黨內久未到南京的人物，如閻伯川（錫山）、龍至舟（雲）、李任潮、李德隣、白劍生、陳真如（銘樞）、劉輔臣（湘）、方叔平（振武），不論是在國內，或在海外，都在共赴國難的口號下互相集結。就是方在對壘中的朱德、周恩來、林祖涵、葉劍英等，也停止戰火，在南京互相握起手來。這時南京住民，已經命令疏散，潮水似的湧向各地去，而各方的要人及開赴前線的部隊，却相反的湧到南京來。恐怕這是南京有史以來最熱鬧最緊張的一個場面了。

【抗戰初期敵我外交上的奇蹟】「八一三」上海的炮聲響了，一切都進入戰時狀態。「八一四」南京受到第一次的空襲，來襲的敵機，被我們擊落了幾架，這是中國空軍開始同敵人作戰的第一天，就收到極好的戰果。「八一四」也就成為中國空軍的永久紀念日——空軍節。上海的戰事，由於我軍之英勇抗戰與主動的攻擊，幾乎將敵人多年來處心積慮所造成的軍事根據，完全摧毀。但終以我海空軍的劣勢，不能阻止敵人由海上源源的增援。同時我們的援軍也陸續由各地開到上海來，戰場逐步擴大，戰事至為激烈，比之戰爭最先發生的華北，規模要大得多。這裏現出一點奇蹟：華北同上海雖然開戰了好些日子，但都是不宜而戰，一面在那裏打仗，一面還在那裏講道理，並不按照宣戰的國際慣例執行。在漢口的日僑，我們並不當作敵人看待，將他們俘虜起來。那時江陰下游江面已封鎖了，我們准許這些日僑，乘船到浦口，再乘津浦火車到濟南，轉青島回國。好像這些路線及青島還是中立地帶似的。我在南京住在鐘鼓樓日本大使館的隔壁，日本大使館的人員走了，丟下好多汽車，不能帶走。部裏正缺交通工具，要徵發那些車輛來使用，我們的外交人員大打官話，說：「未經宣戰，征用對方器材，不但日本以後要說話，就是中立國也要說話！」我不願同他們過於爭執，也就罷了。但不知他們會不會想到日本在華北和上海作戰地區，是怎樣的行動？土地都被佔領了，我們還要很慎重的替他們保存一些小東西。後來南京市政府復將日本大使館的門，用磚牆封閉，並派警察嚴密的保護，深恐有人進去偷東西。我不知道十二月十四日日軍佔領南京，看到那種慎重的保護措施，有沒有一些謝意，或其他的感想？

【最高統帥的英明決策】在未敘述以後的種種之前，我得將最高統帥英明的決策，先為提明。日本侵略中國，一貫的採用蠶食政策，由朝鮮之奪取而佔東北，而進入長城，而發動蘆溝橋事變，均屬「蠶食政策」的逐步實施。他們發動「七七」事變之目的，實在佔領平津或察綏，並未有對中國全面作戰之計劃。蔣先生早已洞悉其奸，在「七七」事變發生後，曾在廬山某次集會中訓話，內有：「和平未

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之語，又記得有一次，蔣先生曾對我們解釋「最後關頭」四個字的內涵，他說：「平津的存亡，就是中國最後的關頭，因為平津一被佔領，則華北全局必至瓦解，我們以後就落有一處可爲華北國防鎖匙的地區，更無時間以從事國防的建設了。日本如果決心佔平津，則中國必全力對日本作戰。」等到日本佔領平津已成事實，一面仍希望像以前一樣作地方性事件，爲局部之解決，他的目的既在佔領平津，其用兵數量及作戰計劃，亦以佔領平津爲度。却不料我最高統帥，却嚴正指出最後關頭已到，而領導全國軍民奮起作全面的殊死戰。是以我們的作戰計劃，就不限於平津而爭取主動的地位，以展開全面的戰鬪。

上海雖爲日本在中國東南的侵略根據地，但因為礙於國際關係，並未準備在淞滬作戰。「八一三」事變的發生，是出乎日本意料之外的，亦可以說日本是被動的，而我國是主動的。最高統帥的決策，是要以主動的姿態，先把上海的敵軍根據地摧毀，然後再主動的向華北作戰，即使不能將敵人根據地剷除，亦須吸引其兵力到這方面，以擾亂其既定的計劃。果然淞滬會戰範圍，一日一日的擴大，敵人以前所準備在華北方面使用之兵力，亦被吸引到淞滬來。最先發動戰事的平漢線，反而暫告安靜，否則敵人如用軍兵沿平漢鐵路向武漢進攻，則其進展之迅速，決非淞滬可比，而我方之應付，必招致非常之困難。此種英明決策，實爲抗戰八年而終於得到最後勝利之最重要關鍵，述敘至此，不禁起衷心之崇敬！

【抗戰初期的華北軍事形勢】華北方面，劉經扶（峙）、孫方魯（連仲）兩部在平漢線良鄉一帶，拒止敵軍的南下，湯恩伯部在平綏路南口一帶，躡其後方。故敵軍必須以主力攻擊平綏路方面之湯軍及晉綏軍，始能南下。這樣彼方戰事，便非常激烈起來，我軍憑據險要，予敵以極大之損害。而我方犧牲之壯烈，亦非戰事初期所僅見。大本營爲欲解救湯軍之危急，乃令衛俊如（立煌）率李默庵等軍師，由涿州間道出北平西方之東齋堂西齋堂，與湯軍夾擊該方之敵軍。惜山道崎嶇，又爲雨水所阻，不能如期

趕到。而這時候湯軍已不能支持，向張家口方面撤退，衛李部隊遂單獨在東西齋堂附近與敵人作戰，仍予敵人以重大的牽制。

敵人攻佔南口一帶要地，並匯合由熱河方面的另一支日軍攻佔張家口；然後再分向山西的大同及河北的保定進攻。晉北重鎮的大同，很迅速的就陷敵了！山西是華北數省的脊背，表裏山河，素稱天險。在古代的戰爭中，固爲用兵的要地，在現代的戰爭，仍是同樣的重要。大本營的作戰計劃，必須確保山西，方可阻止敵軍沿平漢路平原南下，而大同尤爲晉綏兩省軍事之樞紐，大同的陷落，不但影響華北軍事的全部計劃，並且要影響全國的戰局。蔣先生接到這個消息，非常焦急，命我親自到山西去視察，並與閻伯川氏洽商以後的處置。我匆匆離開南京，由津浦而臨海，而平漢，而正太，乘車趕赴太原。這時，平綏線上之我軍，已退守雁門關、平型關、楊方口一帶。敵人也積極部署，準備進攻。我到太原，閻氏已赴雁門關督師，我在太原逗留了一日，會見了第十八集團軍的許多將領。他們的部隊，亦正在趕赴平型關方面作戰，自從國共分裂，而至於武裝衝突，戰火燃燒了將十年，戰血灑遍了十餘省，這戰爭的最後一幕在山西境內（晉西南）結束了，隨着一幕最初的對外戰爭，亦在山西境內展開，豈不是歷史上一個奇突的轉變麼？我想不到彼此在不久以前正在對打的朋友，忽然變爲同一戰線上對外的袍澤，見面時候，彼此應作如何的感想？就是久已脫離內戰漩渦的我，追想到以前的種種，更是不勝其慨嘆與愧悔！如果將中國以往一切內戰的損失，都用之於對外，日本能不能這樣的猖獗，歷史家自有一定的評判。事已過去，不必再談，祇是希望以後能永久的團結。永久是一致對外，使國家民族能夠渡過這生死存亡的難關。這不僅是那時候個人的感想，也許很多的人，都是這樣的熱烈盼望着！

【赴雁門關會見閻伯川】那時，太原白天整日都是空襲的警報，我要到雁門關去見閻伯川，必須等到黃昏時候才能動身。同行有平八集團軍的副總司令彭德懷。北方的月色，秋後分外的皎潔，殘照在天

，星光四照，與白天也差不多。日本的飛機照常活動，我們曾在中途一家小飯館內躲避空襲，並在那裏吃了一碗粗麵，擋擋深夜的寒氣。在那靜寂的小舖子內，我與彭氏作初次的閒談。他滔滔不絕的講他們已往的經過，我也隨時插問我所未知道的情形，使寂寞的旅途，增加了不少的興趣。空襲解除了，東西也吃飽了，大家仍舊分車前進。本來由太原到雁門關，在白天，四五個鐘頭就可到達，但我們却差不多行了一整夜，到達閻氏駐地時，已是村鷄鳴曉，東方漸漸發白了。我在一個招待所休息了片時，等到天大亮了，才去見閻氏，商量一切。

閻氏駐在雁門關後依山的一個小村，村後有許多窯洞，他們就在那裏設立指揮作戰的處所。原來山西（陝甘及豫西一帶都如此）的鄉村，差不多每家後面都有好多窯洞，或是用來儲藏物品，或是用來居住。因為西北一帶，土層厚而堅實，並且乾燥而不會潮溼，所以儲物不易霉壞，住人則冬暖夏涼，至為適宜。富有人家的窯洞很高敞，陳設亦相當精緻潔淨。我們以前以為住窯洞的人，一定是很貧苦的，同南方住在破瓦窰的化子一樣，其實並不如此。舊戲中薛平貴回窰的故事，所指的寒窰，就是山西鄉間的窯洞，而不是南方的破瓦窰。我到山西才明白，這可算是我對於山西窯洞的真正認識。

【平型關戰役的實際情形】閻伯川同龍次龍（山西省政府主席）梅軍法總監（名字我記不起了，與伯川、次龍皆係辛亥年革命的老同志，歸田很久了），朱參謀長（蘭生）住在一起。閻氏到南京時，對於抗戰將領，主張大賞大罰。他以為非大賞不能獎有功，非大罰不能懲有罪。那位梅軍法總監亦是同一主張，所以他在戰爭一起，就毅然出山擔任這個工作。當大同陷落後，就首將守將李服膺槍決了。這是此次中日戰爭中首先被軍法判處極刑的軍長。在這種嚴刑之下，加以閻氏等親臨前線督師，軍心為之一振，敵門關的正面，因此才得鞏固下來。但是敵人對於雁門關正面並不十分攻擊，而是以主力由平型關方面迂迴，希圖楔入雁門關的側後。閻氏認為單靠那時晉境的兵力，決不能達到確保山西的任務，非大

本營趕速增加兵力不可。我亦同樣有這種見解。於是會電大本營核示，並要我回去面陳最高統帥。臨行，我向閻氏建議，無論目前形勢如何，必須在忻口附近準備第二線的防守計劃，因忻口在太原以北五十里，正面甚為狹小，極適宜防禦也。我見無久留的必要，乃於當日仍回太原，轉返南京。到石家莊時，接得太原的電話，說是十八集團軍在平型關打了一個大勝仗，把敵人殲滅了好多。其實是宣傳過甚，是役所擊敗者，僅是敵人的先頭部隊。十八集團軍以很優勢的兵力，用他密集猛衝的戰法，將敵人壓迫在一個山溝裏面，雖然是將敵人打死了許多，但是敵人低地的防禦戰術，也甚高明，等待主力到來，仍舊解圍前進。此後雖續有戰鬪，也祇能稍為遲滯敵人前進之速度，而不能將其完全阻止。這就是平型關戰事的大概情形。

我由石家莊乘車回武昌，因為我還兼着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任務，雖有祕書長代理，仍想順便回去望望，才能放心。我到武昌住了一夜，將一切應注意及辦理的事情料理料理。次日復專輪回南京，將山西情形，向最高統帥報告。

我回經石家莊的時候，遇到劉經扶，徐永昌，林蔚文，知道敵人已迫近保定之線，戰事正在進行。大家都覺得在這種平坦的地區作戰，沒有多大的把握。同時並遇到平漢鐵路局局長陳地球（延炯），他正率一班工程人員搶修保定以南一度炸燬的大橋。據他說：「自開戰以來，敵機對於鐵道橋樑及車站，不斷的加以轟炸，但總是隨燬隨復，從沒有發生過二十四小時以上的交通障礙，因為這座大橋毀壞太厲害，所以得親自上來督修，亦於三日內修復了。」的確，那時候鐵道交通的修復很快，不但平漢路如此，其他的各路亦是如此。這不僅是鐵道管理及工程人員——由局長以至員工——能盡他們應盡的責任，而那時物質材料儲備的豐富，亦有以致之。

【奉令襄助閻氏指揮山西戰事】大本營對於確保山西的戰略，自然是一貫不變的。但當時上海的會

戰，正在積極展開中，並希冀能在上海方面得到相當的勝利，或者能支持到十一月一日九國公約簽字國的開會，促起國際形勢的轉變，使中國戰局亦隨而變化。並且希望國際制裁日本對中國的軍事行動。所以中央的主力部隊，以及廣東、廣西、四川新加入的部隊，都使用在上海方面，而對於山西僅是決定以由平漢路正面撤退下來的孫衛、馮（欽哉），曾（萬鍾）等部轉移到山西正面，而以劉、湯等部擔任平漢正面。蔣先生並命我以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的名義，再往山西去襄助閻伯川。我奉到這個命令，心裏很躊躇，但是亦不容我再猶豫，因為戰事已很吃緊，古人云：「見危授命」。我在這個時候，還能推卸責任麼？大約是在九月下旬，正是秋風蕭蕭微雨霏霏的時候，我又離開了南京。幾個知好送我到浦口上車，大家都懷有是否得在南京再見的意思。一方面是地的轉變，一方面是人的不測，在戰爭的時期，誰都不能預料明日的事啊！

我再行經石家莊，其情況與上次經過時大不相同了，這時保定已失守，敵人繼續南下，石家莊，就成為敵機轟炸之主要目標。火車站炸得破破爛爛，已不是廿日前那樣富麗堂皇了。一般老百姓，都知道他們的危難快要到臨，各人都有自己打算與自己的行動。從各人面部緊張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石家莊是綏綏南北，西通三晉的鐵道交通要點，也就是軍事上的要塞。敵若據此，可以西叩娘子關，南飲黃河水，其重要可以想見。戰前也許是戰事發生之後，我們在那裏開始準備建築一條國防線，但是直到那個時候，這條國防線的工事尚未完成，聽說好多水泥鋼骨的防禦工程，尚未乾燥堅硬，所以毫無抵抗大炮轟擊的能力。我在那裏逗留了兩三日，一方面是傳達大本營的意旨，一方面是想看看部隊調動的情形。一日，我正在孫方魯的總部吃飯，敵人的炮擊已經是開始了，而我們的部隊正在佈置，好多還未進入指定的位置。聽那聲音是重炮，而且數量也相當的多。我問孫方魯：「你看這正面能夠支持多少日子？」他說：「如果挨得過這陣炮擊，就有相當的時間可支持，否則就難說了。因為敵人作戰開始，就

是用炮火作猛烈的轟擊，往往有些部隊忍受不住，不待敵人步兵的攻擊，已經敗退下來了。」這是他經驗之談，並不是批評那個部隊。這時他的部隊已經奉令到太原去，在正面的是另一個部隊，而且兵力也很單薄。

「雁門關陷後的山西戰事」我到太原，閻伯川已經由雁門關回來了。敵人由平型關突破，楔入雁門關的右側後方，威脅整個的正面，同時正面的敵人也加緊進攻。號稱晉北天險的雁門關，遂告陷落！往昔晉人有「鳥飛不過雁門關」的諺語，以形容雁門關的險阻。但是敵人却不由正面飛過來，而是由側面繞過來，也許是受了歷史上傳說的影響。其實雁門關的形勢，並沒有傳說那樣的險峻。公路鐵路都通得過去，何況是兩脚步行的步兵呢？以現在的目光及情況看起來，並算不了什麼。雁門關戰役，我方損失雖不大，但撤退的情形，是相當的狼狽，影響到以後的計劃與部署！

在太原，我住在綏靖公署內，以便隨時與閻伯川商量問題。同住在一起的，還有李任潮、李民欣、張文等數人。李任潮當時未有什麼職務，他們由南京到山西來，想是作戰時的遊覽，大約他以前未曾到過山西。空襲是每日都有的，每當警報發出的時候，閻伯川總是派員催促我們同下他的防空洞裏。有一天，我們在防空洞裏，炸彈下來了，整個的洞發生劇烈的震盪。我的心裏想：「難道就這樣完了嗎？」警報解除，急忙去勘察，一個五百磅的炸彈，落在隔院裏，與防空洞相距不過三五十步，把李任潮所住的那幢房屋，整個炸毀了。落在其他院裏的還有好幾個，假使不是閻伯川照料得週到，李任潮等或者還在屋裏睡午覺，因為他從來對此是滿不在乎的。住屋炸毀了，行李也沒有了，他們就此離開太原。

「石家莊失陷娘子關吃緊」忻口的戰役，正在佈置着，而石家莊的戰事，我軍却已敗退了。我方的計劃，是想以少數的部隊據守石家莊，牽制平漢路正面的敵人，使他不能轉向山西，而以主力轉移太原，從事忻口的會戰。因雁門關、平型關已失，敵人已進入山西之腹地，若能在太原以北，忻口附近將敵

人殲滅，則太原尚可確保，晉局尚可控制。否則，形勢必相反的突變。但是敵人何嘗不預料及此。而且我們部隊的行動，無一不在敵機偵察之中，他必針對我們的計劃而確立他的對策。他們以很迅速而有力的攻擊，將石家莊的防線突破後，僅以少數的步兵，配合較多的騎兵及機械化部隊，向平漢路沿線的平原地區追擊，而以主力轉向娘子關會攻山西，並不受我正面的牽制。反而因我正面不能確保，將整個的太行山脈的側面暴露出來，變成一個綿長而單薄的防線。

約摸是十月三四日吧，石家莊情況已經不明。娘子關方面應該如何佈置，亦未有確定的計劃。而且因為情形的突變，以前的計劃也未必適用。這裏是一二兩個戰區的分界點，毛病就要出在這個地方。十月七日，閻伯川要我到娘子關外去視察。我帶了幾個幕僚人員，乘車到了關外的井陘縣，這是關外的要點，我在那裏找到當時娘子關方面的指揮官馮總指揮欽哉，問他前方的敵情及我軍佈置的情形。根據他的報告，覺得情勢十分不佳。因為敵人的先頭部隊已到達獲鹿縣附近地方，離我們不過三十里，在我們會談的地點，衛士就捉獲了敵方的便衣偵探，這是由敵人隊伍中的朝鮮人化裝的，經審訊屬實。把他槍斃了。就此判明敵人距離我們更近，我認為我們的部署太不適宜，娘子關的正面僅佈置了趙壽山的一個師，馮總指揮本有的兩師，却放在龍泉關以南，娘子關左翼，曾萬鍾的三個師，則放在和順縣馬嶺關方面——娘子關右翼。以這樣少的兵力，佈置這樣廣的正面（一百七八十里）處處顯出薄弱，處處都是空隙，尤其是娘子關正面是太單薄了。我當時與馮總指揮商量，要把左右兩翼的部隊向中央靠攏，但是部隊已經移動，不能趕得回來，又是問題。那時井陘秩序已是相當紊亂，火車站上還有許多要開往太原的孫方魯部隊正在候車。我於黃昏離開那裏的時候，已聽見遠遠的槍聲。

【我負起指揮娘子關戰事的任務】趕回太原後，向閻伯川建議，迅速改變娘子關方面的部署，並且要留孫方魯的部隊擔任娘子關的正面。在當時祇有指派孫部擔任這個任務，時間上才來得及，因為他尚

有一部份官兵在井陘候車而未開動的。伯川問我：「何人去擔任指揮呢？好不好你去負這個責任？」我當時並未考慮我本身的困難而推託，祇覺得無論怎樣的困難，我都得去擔任。因為在那時候，不允許我考慮本身的困難問題呀！責任擔負起來了，九日晚上，就得出發到前方去，但是我由南京帶去的幕僚人員，僅有陶鈞、裘時傑、徐佛觀等數人，即使臨時有幹部，要把這指揮機構組織起來，在時間上亦做不到，祇好在綏靖公署調了幾個參謀副官，并帶了一架無線電報機，連夜趕到娘子關去。這正是二十六年的雙十節。

我在離娘子關車站十多里的磨河灘設立指揮所，這是以前國防計劃中所定的指揮地點。但除了依山作了三個防空洞之外，其餘一無所有。初到的時候，連打電話都得要借用正太路或鄉村的電話線。所謂娘子關的國防工程，僅是在那一帶的山上鑿一些洞，既不是砲兵的砲位，又不是步兵的戰壕，而且整個陣地上，除了太原通石家莊的一條長途電話線及幾處鄉村電話線之外，陣地的通訊設備，完全沒有。軍隊在這樣的既設陣地作戰，簡直與臨時遭遇戰的情形差不多。而敵人已迫近關門，並且佔領舊關（又名固關）了。要臨時準備，又那裏來得及呢？這是娘子關作戰以前的國防佈置情形，至少可以說是還未準備完成的國防情形，而不是局外人所能知道的。

原來敵人自突破石家莊我防線之後，就以主力——川岸二十師團——附屬特種兵及一部份戰車轉向山西進攻。他到達了井陘的前方，並不即向井陘，娘子關正面進攻，而以主力斜出井陘的右側，繞攻舊關。這是會軍與趙帥中間的空隙，沒有部隊防守。我到娘子關那天的早晨，舊關已經為敵人佔領了。舊關在娘子關的右側後，敵人如果再前進，就要切斷娘子關的後路。在那情況非常緊急的時候，祇得一面命令在車站候車的孫部某旅，去阻止舊關的敵人，他們雖然還沒有奉到他直屬長官的命令，而對於我的命令也接受了。我說我對他們負責。正面的趙師見情形如此，也很敏捷的向井陘右側出擊，以阻止敵人

的繼續向舊關前進。但是結果不好，反而將關外的要點雪花山丟了，而退守於關的正面，關外就毫無控制地點。於是敵人的行動，更為自由。我急電會軍向舊關之敵進攻，但不能如期趕到。舊關之敵，又向左翼進攻，離我指揮所僅有數里，一時又無生力部隊來阻止他，形勢真是危急萬分。這時恰好陝西綏靖公署的特務團到了，立刻上去堵截。這個團約近三千人，裝備很完全，而且都是年青學生。團長李登西，尤為勇敢。由上午八九時起接觸，戰鬪到下午四點鐘的時候，總算把敵人堵住了。而這團人呢，僅剩下四五百人，李團長亦身受重傷，戰鬪之慘烈，概可想見！隨後孫部的一師趕到了，參加上去，把這股敵人——約一個加強大隊——困在一個谷底而完全消滅了。我們這方面，除了那個李團蒙了重大的損失之外，孫部的一師，亦損傷不少。

【兩次懸賞的收穫】自孫部及會軍陸續趕到，戰局乃告穩定。遂調整部署，以孫部及趙師擔任舊關以左娘子關的正面，以會軍擔任舊關以右，馮部兩師擔任娘子關以左之任務，對於楔入舊關之敵，由孫部及會軍加以攻擊。孫部的正面，頗有進展，予敵軍以很大的打擊，并將正在增援之敵炮兵加以擊潰。但敵軍亦陸續增援，陣地屢有得失，漸漸成為膠着狀態。有時敵軍被我軍壓迫於山谷下村落內，仍頑強的抵抗，不容易將其逐出或殲滅之。要俘虜他更不容易。我乃懸賞：俘虜一個敵兵，賞洋二百元。在當時二百元，是一個很重的賞格，「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定了這個賞格，猜想一定可以得到很多俘虜，但結果解上來的，僅有兩個。據部隊報告，俘虜敵兵，確不容易。即使俘獲了，一不小心，他就會自殺。那一次俘獲敵兵原有十多個，結果僅剩了兩個解上來，其餘的都自殺了。因為敵兵平時受到他長官的欺騙宣傳，說是萬一做了中國軍隊的俘虜，一定要殺頭的。敵人非常迷信，說是殺了頭的人，下世不能轉身為人，是以最怕殺頭，他們的長官就以此作為哄騙逃亡或投降的唯一方法。這便是具有所謂「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兵，不肯作俘虜的主要原因。那兩個俘虜，一個腿都受了傷，不能行動了，另一個

便到處背負他，服侍他，絲毫不覺得有一些勉強或厭煩的樣子。在這種場合裏，表現出高尚的互助精神，真是值得我們佩服的！又有一次爲爭奪一個要點，懸賞五萬元，孫方魯指定二十七師的某營去擔任，並說明懸賞的意義。那營長慷慨激昂的說：「賞麼？我們不知用得着不用不着。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我們總是盡我們最大的努力與最後的犧牲，以報効國家，希圖戰後能在那兒立一個碑，來紀念我們這一羣爲國犧牲的人，就滿足了！」結果，那營長及一營人大部都犧牲了，剩下來的不到幾十個人，可惜這營長的姓名，我不會記下來而遺忘了。在一個長期的國際戰爭中，無名英雄真不知有多少，而無名英雄的精神，實在比有名英雄更爲偉大，他們埋沒了姓名，不一定是他們的不幸呀！我對於懸賞得來的俘虜與不受賞而犧牲的官兵，同樣的敬佩。同時又想到懸賞是中國軍隊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辦法，這種辦法，是否合理，且留待後人去批評吧！

【娘子關放棄後陽泉接着淪陷】敵人仍是繼續的增加，而且向我們的右翼延伸，希圖包圍晉軍的側翼，我商得閻伯川同意，把十八集團軍劉伯承的一師調到東邊來，掩護我們的右側背。劉部在陽泉集結，向平定方面推進，行軍迅速，紀律亦佳。劉伯承綽號劉單眼，在十八集團軍中號稱能打硬仗的，他有一股猛衝的蠻勁，這是周恩來向我介紹的話。但是到了這方面作戰，他不願擔任固定任務，而祇肯進出敵人的側翼，以邀擊敵人。在當時情況之下，亦祇好任其如此。如果他確能在敵人的側翼邀擊敵人，亦未嘗不可以阻止敵人向我側翼包圍。劉部到達指定的位置後，的確打了一兩次相當激烈的仗，將敵人滯止了相當時候，但是敵人以一部與他支持，主力仍向平定前進。而且他們打游擊打慣了，遇到這種頑強的敵人，也就無可如何而任其通過，從此也就不知道他們游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時我將前方交與孫方魯指揮，自己回到陽泉來，以便指揮後面到來的部隊。而敵人已進到平定附近，威脅晉軍的背側。這時川軍鄧晉康（錫侯）所部有一旅到達陽泉，我命令他去確保平定，以掩護會

軍的側背。那旅長姓曾，很勇敢，但是對外作戰，尙欠經驗。而且川軍槍械，也實在太差了，輕重機槍固然缺乏，就是步槍也是川造的，往往打了二三十發子彈，不是槍機打不開，就是膛炸了。他們到了平定，也許是警戒疏忽了，爲敵人所襲擊而不知所終！敵人並不逕向陽泉前進，而仍向曾軍的側翼包圍。本來我們的陣線，是與正太鐵路成直角的。到那時，就漸漸變成與正太鐵路平行了。而陽泉的側翼，更是空虛。敵人仍向陽泉方面移動，萬一陽泉被敵人佔領，則我軍所有的部隊，都被隔在陽泉以東，而受到敵人的包圍。敵人並可由陽泉直趨太原，那時後方更沒有卽刻可以增援的有力部隊，雖然有些川軍陸續到來，但是他們的裝備太差，而且時間已來不及了。

我處在這個情形之下，乃決心將在娘子關正面的孫方魯所部，轉移到陽泉方面來。我把這個處置向長官部報告，他們總以爲不應該就把娘子關放棄了。因爲他們不知道敵人並不向娘子關的正面攻擊。雙十節那一天，敵人已經佔領了娘子關側後的舊關，以後更是不斷的向我側後進攻。娘子關的險要性已失，若堅持固守此關，不但虛耗我軍的兵力，而且有使這部份守軍被包圍殲滅的危險。

孫方魯到了陽泉，我便轉到壽陽。原來希望在陽泉的正面可以拒止敵人多少時間，但是敵機終日活動，我們的行動，他們是清清楚楚的。白天行動，固然困難，晚上行動，更是混亂，我軍到達陽泉的時候，敵人也到陽泉了，於是就在陽泉附近作了一次的混戰。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軍自不易得到適當的部署，確實阻止敵人的進攻。陽泉失陷了，以後的情況更是混亂，孫方魯也轉移到壽陽來。這時在忻口以北地區擔任敵後作戰的十八集團軍全都轉移到壽陽。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並到我所駐的半月村裏會面，同吃了一頓晚飯。據談是奉令轉移到正太路的側面昔陽縣與和順縣中間的地區，與劉伯丞師會合，以全力作戰，阻止敵人向太原前進。我聽到這個計劃，自然是興奮的，因爲如果沒有强有力的部隊增加我們的正面，的確難以維持。但是他們過去了三四日，計算時間早到達了，而他們的消息一些都沒有，

亦未曾從其他方面得到他們在那方面作戰的消息。我那時還想不到他們會信口開河，不踐諾言，而置友軍於不顧的。到現在才想起他們的全部轉移，是有他們的打算，奉命不過是虛飾的話，他們要脫離晉北的戰場，而移轉到晉東南來，亦即是要脫離整個山西會戰的場合，而自己在太行山脈上建立單獨的基地與活動。所謂要在昔陽、和順中間地區阻止敵人，不過是對外標榜的一句話而已。

我在壽陽，久等不到十八集團軍的消息，一天晚上，在孫方魯總部接到馮師長安邦——後來升軍長在襄陽附近殉職的——的報告，說是敵人離壽陽僅有二十五里。孫方魯對他說，要他竭力的抵抗，否則先將他殲斃。他的回答是：「我當盡我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我手上僅有一連人，其餘的部隊都脫離了掌握。」其他的友軍更是聯絡不上，而敵人亦漸漸的迫近。我們的意見，對於這些潰散的部隊，總須有收容整理的地點與時間，才能指揮再戰，否則以後更難設想。收容整理的地點，最好在榆次縣——正太路與同蒲路的相交點——附近，於是就決定再由壽陽向榆次轉進。在途中忽奉閻伯川的命令，要將這方面的部隊都向太原集中，而且要我們回到太原去會議，我們就祇好遵命而行。

「忻口會戰概況」——忻口會戰情形，我雖未親自參加，也有敘述的必要。原來的計劃是對於由雁門關，平型關突入太原以止之敵人——一兩師團、一個酒井兵團（相當於一混成旅），及特種兵坦克車等，在忻口以北予以殲滅。而當時欲使用在那方面的部隊，除晉綏軍十幾個師，十八集團軍三個師之外，中央軍如衛俊如、劉茂恩、高桂滋等亦有十幾個師，一共有二十幾個師的單位，并有十多個砲兵團。當時的戰況非常激烈，敵人處在我優勢兵力與砲火之下，曾遭受極大的損失。敵人的砲彈用完，不能不停止射擊，等候飛機的接濟。步兵亦被迫改取守勢，以待後援。而閻伯川更令他的砲兵，不惜砲彈，盡量轟擊，我官兵亦極勇敢，郝軍長夢麟，就在這次戰役中陣亡。他是中日戰爭中首先陣亡的一位軍長。起初是不料在晉北的陣地被突破得那樣快，即使被突破了，敵人也未必能以平漢路上的主力轉移到娘子關來。

。所以娘子關的守軍不很多，而且是不很堅強的部隊。等到娘子關危急，乃將已調到太原的孫方魯部調回娘子關，即使娘子關沒有問題，孫部能參加忻口的會戰，亦未必即能將那方面的敵人殲滅。因為敵人的作戰計劃是整個的，難道就讓這部份隊伍任我們殲滅麼？所以石家莊，娘子關的情勢突變，對我總是要發生很大的影響的。

「深夜退出太原」敵人在忻口方面雖一度為我所抑止而陷於危殆，但仍能由陸空方面得到補充與增援。十八集團軍在敵後阻止敵人增援的工作，並未完全收效，我們轉移到壽陽的時候，忻口方面的我軍也就支持不住而撤退了。我把指揮部的人員留在榆次縣附近的鳴李村，而自己輕裝回到太原。忻口、娘子關兩方面的高級將領，都已趕到，閻伯川及主持作戰計劃的參謀人員，將改變的作戰計劃，向大家說明。這個計劃，是固守太原近郊的既設陣地，太原城及以北以東附近十餘里的地帶，以前都構築有國防工事。廿五年我到太原曾參觀過，時間又經過了一年，想必是更加增強了。原定的計劃，是以忻口方面的部隊退守太原以北的工事，娘子關方面的部隊，退守太原以東的工事，而以傅宜生所部固守太原城，因為他是以前以久守涿州而著名的人物。在會議的時候，我提出意見，不很贊成這個計劃。並不是我對於太原附近的國防工事，認為不應固守，而是恐怕兩方面正在敗退的部隊，還沒有佔領陣地的機會，就被敵人壓迫到太原的城邊來！同時此種工事是否適用，亦還是一個謎。這是我在娘子關方面所得到的印象。萬一佔領不住，就被敵人壓迫下來，這三十多個師，應集在一個鍋底裏，其危險情形，就不堪設想了！我們都是戰敗下來的部隊，若果沒有生力軍掩護，使這些部隊有收容整理的餘暇，決不能作戰，就以娘子關方面的部隊來說，自第一次撤退後，中間雖嚴令他們在陽泉、壽陽等處佔領陣地，節節抵抗，但何曾收到一些效果——退到太原附近部隊，更是混亂，所以我認為固守太原附近，有許多的困難問題，並且要招致極不好的後果。我的主張，是將娘子關方面的部隊，撤退至正太鐵路以南的榆次，太谷之

線上，對由東西進的敵人作側面障地，以削弱敵人對於太原的壓力。將忻口方面的部隊向汾河以西的山地撤退，隔河依山，佔領側面障地，監視由北向南之敵，以免其直攻太原，而太原則以傅宜生所部固守。這種佈置，雖未必能收到積極殲敵之利，至少可以延長太原防守的時間，並得避免集中受困彼此混亂之危險。但這種主張，未蒙採納。事實上軍隊已經行動，要改變方向，也有困難。到會的那些人，尤其是前方的將領，都是連日作戰，疲勞已極，好多人就倚在席上，呼呼睡去了。會議到深夜十一時，仍決定照原計劃實施，并且決定長官部當晚撤退——其實大部早已撤退，僅留幾個高級人員。太原的防守，交由傅宜生負責，大家分途的散了。但我得打一個電話回南京，將這個情形報告統帥部。等到我打了電話出來。全城的電燈都熄滅了，一個偌大的綏靖公署，黑黝黝的靜寂得可怕。我走出大門外，一輛汽車都沒有了，連原來指定給我乘坐的那輛汽車，也不知駛到什麼地方去？大家都散了，向誰去追問呢？我想找傅宜生去設法，但他的司令部又不知設在什麼地方？黑幕籠罩着的太原城，又何從去找他呢？祇得帶着隨從六個衛士，同他們步行出了南門，本想向榆次前進，回到指揮部裏去，但據報榆次已發現敵人，我們的指揮部想來也一定移動了。於是決定步行向西退出，這就是我廿六年十一月四五日狼狽退出太原的情形。

我走到汾河南橋——城北是鐵橋，城南是舊式的木橋——好多的車輛堵塞在橋面上，有的是汽車，有的是大車，有的是太原撤退的，有的是要回到太原去的。橋面狹窄，僅能容一輛汽車通過，大家都不肯相讓，大家都無法通過，而在那裏鬬嘴，有些人已在車上睡着了，一點也不覺得着急。我見了這個情形，覺得非常危險。因為一到天亮，如果敵機飛來發現這個轟炸目標，隨便丟下幾個炸彈，大家都完了。我把車輛逐一檢查的結果，知道是回來的佔少數，出去的佔多數。我就要那些回太原的車輛向後退出，讓出去的車子過完了，再准回來的車子過去，連勸帶罵費了一點多鐘，才把橋上的車輛疏通。我也附

搭在一輛卡車上，開到太原西南五六十里的開棚村停下來。在車上默思：爲什麼這些人連過橋的常識都沒有？祇有一條單行的橋，彼此都對堵着而不肯相讓。好像不知大禍的將臨似的。這算是賭氣呢？還是賭命呢？

『由交城撤退至靈石』第二日早上，我到那鄉公所探問，知道這裏是交城縣管轄的地方，離縣城不過三十多里。我叫周副官傑英借了一輛腳踏車到城裏去查詢閻伯川駐留的地方，並請派一輛汽車給我，以便到池那裏去商量許多軍事上的問題。因爲臨撤退時，他說是退到交城縣附近的。過了些時，閻氏派來的車子到了，我到他的駐地見面，把昨夜南橋所見的情形告訴他。他說：「北橋的情形也是一樣，朱參謀長蘭蓀的汽車，這時還沒有到達呢！」我說：「照昨夜的情形看來，太原恐不能久守，希望趕快到較遠的後方去作其他的佈置。」而他堅信太原城至少可以防守一月以上，不管外圍的部隊情形怎樣。

因爲我的指揮部已由榆次向太谷沿同蒲鐵路上撤退，而且汾河以東，同蒲路沿線，都是軍事上的要地。那方面沒有一個高級長官在那裏照料，雖然目前軍事重點不在那邊，亦須有一個人去處理那些消極的問題。於是我請求到河東去，遂與閻先生分別了。我坐了一輛小包車，在路上走，白天裏敵機是時時可以遇到的。我車傍雖派有警戒的人員，但發現敵機時，已經是很近了，我們停了車，趕快避到路旁的凹道裏去。仰望天空是九架敵人的戰鬪機，敵機知道撤退時坐小包車的，一定是高級官長，所以一齊俯衝向汽車掃射。但是我們已經躲到凹道裏去了，敵機又來回向凹道掃射了三次，我們見機羣向這方飛來，就躲到那方的死角裏去。因此不致爲槍彈所傷，汽車也未損壞，可云幸事！經過汾縣、孝義縣，老百姓還是攙往熙來的在那裏趕市集，他們好像不知道有戰爭似的，當然更不知道太原的情形。過了汾河，到了介休縣。據說這是介子推退休的地方，因而得名。它是同蒲路上一個大站，剛被敵機轟炸，車站上的設備都炸毀了。幾個列車正在燃燒着。站上的人員也星散了，打聽不到沿線的消息，在黃昏時候，已

經和我失去聯絡的一個衛士隊突然找到了，而指揮部的人員，却已乘火車向南開去，我祇好同我的衛隊在黑夜裏，步行向靈石前進。一路上有很多由前線撤退下來的難民與散兵。那時正是秋高的深夜，殘月在天上，照着這撤退的行列，大家都是深沉而靜默的前進。我在那百無可奈之中，吟了一首詩，結句云：「一片孤城一痕月，幾行涕淚幾行人！」蓋寫實也。

在靈石縣附近一個小村駐了下來，從電話上打聽各方的消息，知道太谷尙未有敵人到達，因為敵人是向西會攻太原去了。而敵機則終日在鐵路線上轟炸，想敵人是恐怕我們會有增援的部隊從鐵路上開來。其實當時並沒有增援的隊伍開上去，而由太原撤退下來的傷兵散兵及物資，却布滿了鐵路沿線各站。這條鐵路本來是先天不足的，再加以敵機的破壞，員工的星散，運輸力就等於零了。在靈石車站上有兩個列車機車沒有水，不能開行。列車上擠滿了散兵，傷兵，有很多傷兵反而丟在站裏不能上車，痛苦呻吟，無醫無藥，已是二三日了！我命裘時傑率領衛士隊將散兵繳械，驅逐下來，把傷兵抬了上去。同時命縣長動員數百民衆到河裏去挑水，把機車灌滿了水，升火開行。火車用人工上水，也是我初次遇到的事。

山西當時的民衆組訓工作，是相當成功的。我在撤退的路上，無論大小村鎮都有犧牲大同盟團——簡稱犧盟團——的組織，那些壯年的男子，都佩着犧盟團的符號集合在一處，等着擔任引路，運輸或偵察的工作。這是戰事發生以後的人民服務組織，好像各省的戰時服務隊一樣。以前山西的鄉村中還有一種公道團的組織，揣測他的意義，好像是鄉村的評議會。山西當局對於村政素來是很注意的，這個組織特別將公道兩字標出，不知是否鄉村裏還有許多不公道的問題存在着？

〔在靈石聽到太原失守的消息〕我在靈石數日後，才與閻伯川聯絡上，知道他撤退至大麥郊附近（中陽縣的市鎮），並且知道太原已於我們離開後四五日就失守了。這次戰事，打破了山西軍善守的傳說

其實並不是山西軍不善守，而是現代的火器太厲害了。以我們古舊的城堡與劣勢的火器，要作長久的固守是不可能的。不但山西如此，以後的南京，以及各地的防守戰都是如此。我們的作戰觀念，應該有重大的改變才是。後來曾到孫方魯，李默庵等，談起那天深夜太原撤退的情形。他們說是回到部隊裏去的情形，更是混亂，敵人就乘着混亂的時候，向他們進攻，所以沒有一個部隊能按照原定計劃進入陣地，得以從容抵抗，就被敵人壓迫到汾河以西的山地裏去了。在那個地帶，也祇有河西的山地是敗退的安全地方。這個混亂的大敗退，何嘗是意外所不及料的呢？

我在靈石住了幾天，將應該臨時處理的事，已經是處理了，我就乘同蒲鐵路的车轉到臨汾。這是我第一次乘坐山西省自築的鐵路，它的風味與正太路差不多，也竟可以說是完全一樣。閻氏費了數年的工夫，辛辛苦苦把它修通了，不意敵人就沿着這條路線作爲進攻山西的主要路線！交通便利固然是一個好處，但在國防不能鞏固的國家，却是一個害處。張漢卿在東北修了很多的鐵路，結果也是便利了日本人。我寫到這裏，還想起一件事：自太原失陷後，不久正太和同蒲鐵路的北段敵人就通車了。原因是石家莊、娘子關及大同撤退的時候，這些鐵道都沒有澈底的破壞。山西當局以爲祇要將機車車卡全數退到太原以南，那些路軌，敵人是無法利用的，因爲都是窄軌。但他們沒有想到這些機車車卡都是購自日本的。聽說天津還有路上購下而未運回的很多機車車卡，日本人要利用，豈不是更加方便麼？

臨汾是晉南的重鎮，是太原撤退時預定的後方基地，軍事、政治、經濟的各種機關及人員早就撤到這裏來。他們知道了太原失陷的消息，面上表示很懷喪的神氣，尤其是那些富有資產的人。因爲太原是民國以後，最安全的都會，從未受到內戰的蹂躪。它是軍政人員及富商大賈的安樂窩，尤其是歷史悠久而規模偉大的兵工廠，與近年來新建的工廠，正要爲國家的軍事經濟上有所貢獻的時候，而遭受到毀滅的損失，因此我也爲它擲了一把同情的眼淚！

【回到南京】我在臨汾又住了數日，覺得山西的戰事已經告了一個段落，我在那裏也沒有什麼意義，奉大本營許可，回南京去。乘火車到達同蒲路的終點楓陵渡，在初雪方飄的早晨，坐民船渡過了黃河，而到達歷史上有名的蒲關。回頭望望滔滔東去的黃河，想起它在歷史上有很崇高的軍事價值，不知在這次的民族神聖抗戰當中，又能發揮出一些什麼力量呢？

在駐軍李及蘭師長處吃了一頓早餐，即乘隴海車轉到津浦路上去。歸心是何等的急，但空襲警報是不時的傳來，列車在路上旅停旅進的，把時間都誤了。離浦口不過二十多公里，還來一次警報，據說有九十多架敵機轟炸南京，為拉戰發生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在那裏看見一架我們的戰機，一歪一斜的向北飛去，想是被打傷了，不知要降落到什麼地方以終結它不幸的遭遇？到了浦口，津浦線區司令部的高參謀長義安，已在站上候我。我問他上海和南京的情形。他說：「上海的會戰結束了，我軍已退到鎮江附近，南京要作緊急的撤退，路上要準備五百個列車作為撤退之用。」^{（註）}過了下關，進入城裏，一切的情況，已不是一月以前的樣子了。雖然如此，但我仍很幸運的回到首都溫暖的懷抱裏來。在悲痛寂寞之中，得到莫大的安慰！

十九 重來浙江

「奉命重主浙政」我自山西回到南京，這時上海會戰已告結束了。國軍自錫澄線——無錫至江陰——向西撤退至鎮江、丹陽、溧陽之線。南京情勢已是十分緊張，統帥部正在籌劃如何固守南京，攘擊敵人。我在這種情勢之下去見蔣先生，（他自上海戰事發生，即移住總理陵園苗圃的小屋內，這小屋就是當時發號施令的所在地，我離南京前和蔣先生最後一次的見面，也是在那裏。）將山西失敗的情形，向他報告，引咎自請處分。蔣先生說：「那方面——指娘子關——軍隊太複雜，臨時指揮，自有困難。」並不加以責備。我并請示以後的工作，他會有意要我幫助唐孟瀾守南京。我因為在山西已嘗過它的滋味，再不願重來一次，向他婉辭了。他亦不勉強。過了一兩天，又召見我，要我重到浙江當省政府主席。因為當時長江下游各省正當軍事要衝，為使軍事便利起見，都調換軍人充當省主席，江蘇的陳果夫換了顧墨三，安徽的蔣雨岩換了李德隣，浙江的朱紹先換了我。這是當時各省人事重大的變動。蔣先生所以要我重回浙江的原因，無非是因為我曾在浙江兩年，那裏的軍事準備，都是我在任內着手規劃的，我回去可以駕輕就熟，配合軍事需要。而我呢，亦有此感想。同時，以為兩越（浙江、安徽）是歷史上有名的復興基地，兼有傳統的優點，若加以組織與訓練，一定大有可為。我預料中日戰爭時間，一定是很長的，區域也一定是很廣泛的，而且浙江一定首先受到不幸的遭遇。如果能在浙江將民衆武力建立起來，與國軍配合一致，則於國家民族神聖的抗戰，一定有很大的貢獻。所以我在聞命之下，對於這個危險的環境與艱鉅的任務，不稍躊躇考慮，就毅然地擔負起來了。次日，我將省政府委員及各廳處長的名單呈上去，即奉批准。省府委員除我之外，計為王先謙、程達帆、許紹棣、伍廷鸞、朱孔陽、周象賢、許鑄雲（

八區專員升任）賀揚靈等九人，而以李立民任秘書長。（當時不是委員，周家賢辭職後始任爲委員。）王先謙爲民政廳長（係由一區專員升任）。程遠帆爲財政廳長（舊任）。許紹棟爲教育廳長（舊任）。伍廷顯爲建設廳長（新任）。宣鑑吾爲保安處長（舊任）。這個抗戰初期的省政府陣容，雖然加了幾個新人，而這些新人與舊人，亦都是我二十四五年在浙江任南的同事，預料工作的力量，一定很充實的。命令發表之後，朱前任就有電報，催我趕快到杭接事。但是我還有許多人員在湖北，而湖北任內雖然移交了柯雲竹（成濬）主席，也仍有很多未了的手續，必要回去料理料理。於是我同朱副先約定十二月五日赴浙接事，請他多等幾天。我大約爲十一月二十國五號離開了南京。那時南京的機關人員除了蔣先生及軍事指揮機關人員外，全部都已撤退了，船位自然極不容易找到。最後找到兵工署運炸藥的專船。這隻船裝的都是高級的爆炸藥和軍械，萬一發生危險，一定全船化爲灰燼，因此許多人都不要上船，而主管人員亦不輕易准許人搭乘，以免發生意外。一個大餐間裏僅是我和一個同伴，冒險中的景況，要比安全的地帶中舒服得多，不是身臨其境的人，是不能體驗得到的！陰雲籠罩的天氣裏，配合着空襲警報呼聲的悲鳴，下關馬路上見不到一個行人，我們的船就悄悄地離開了南京碼頭。眼望着紫金山，總理陵墓慢慢地隱暗而終於不見了。雖然我們的國旗還在那裏飄揚，我們的將士還在那裏堅守，但是它最後的悲慘的命運，已是預料不可避免的，心裏忽然感着無限的悲哀與眷戀！正如面對一個臨死的病人，着他氣息奄奄，卻要作最後的訣別一樣。

船到了漢口，自然有許多應酬及料理準備的工作。英國駐漢口的領事默思到來訪我，我對他說：「美國對中日的戰事是守中立的，但是日本對英國極不尊重，貴國駐中國的大使許即森爵士竟爲日機掃射而受傷，你的感想怎樣？」他說：「我們也明知日本軍閥有意地向我們挑戰，英國並不是不準備，相反地，正在那裏準備着。」現在每月我們有很多的軍艦下水，但是這個計劃要到一九四一年才能完

說：「他繼續說：『英國人的性格，當自己的力量尚未充實時，祇是一聲不響，暗地的做準備工作，到了力量充實了，自然會挺身而出，一些也不會放鬆了敵人的。』他又說：『聽見說有人（暗指德國大使陶德曼）想出來調停中日的戰爭，但是中國切不可上當！中國若長久的支持下去，英國一定出來幫助的，如中途途議和，那時便愛莫能助了。』這個默思領事，他平日很同情中國，痛恨日本，而且好說話，至於其他英國人那樣的陰沉。我聽了他的話，總認為他有些感情的衝動。我將這些話，曾在行政院的議事報告過，好些人也是如此看法。我有回憶起來，默思的話也頗正確。他可算是一個直爽的英國人。」

我到杭州接任。我在武漢逗留了數日，一切的準備都弄好了，就由漢口乘輪赴九江，轉南潯鐵路到南昌，再乘浙贛鐵路專車赴杭州。車過金華，知道這時浙江省政府以及杭州各機關都撤退到金華來了，就是朱顯先主席同少數的人員留在杭州，主持前方要政，配合軍事的要求。金華方面，由許廳長紹楙主持，我住在金華停車，與黨政人員見面，并問問前方的情形。當時他們假中國旅行社為我準備了接風的筵席，匆匆的吃了，仍舊上火車開行。第二天的早晨，（十二月四日）火車到錢塘江的南岸，玲瓏而古舊的六和塔和綿長而偉大的錢江大橋，一橫一豎的露在錢江的面上，在晨光熹微中看起來，益覺得其雄奇旖旎得可愛。火車徐徐地通過大橋，臨流顧盼，雲影波光，心中至為愉快！幾已不知戰爭就在不遠的地方，正在猛烈進行，這是我在抗戰中第一次通過錢江大橋，亦是我在抗戰中最後一次通過這座大橋的情景。

錢江大橋，本是浙贛鐵路最大的橋樑，亦可以說是中國最大的鐵路橋樑。全長五千五百九十英尺。（內正橋十六孔共長四千五百五十英尺，餘一千零四十英尺為副橋。）因為錢江的河床都是極深的流砂，橋樑的施工，至為不易。然全部的工程都是中國的橋工權威茅以昇氏設計的，當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我奉一次主持浙政時就開工了，直至我重來浙江的不久以前，——二十六年雙十節才初步的完成。

經費用去四百萬，時間費了兩年多，工程的鉅大也就可想而知。雖然通車不久，就被破壞，但在短短的時聞裏，能將很多的物資尤其是京滬滬杭各鐵路車輛器材統統運送到安全的大後方，不致遭受很大的損失，它對於抗戰的貢獻，也就非常偉大了！我曾聽見說：過去內戰時，北方軍隊敗退過黃河，總想將平漢路的黃河鐵橋炸毀，以阻止南方的進兵，住在黃河鐵橋旁邊的比國工程師就立在橋上，阻止軍隊的破壞，他寧願以身殉橋，不忍目覩他心血構成的建築物被破壞！因此黃河鐵橋在內戰期間，得以安全無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晚上，一個驚天動地的爆炸發生了，就是這座錢江大橋最不幸的遭遇！聽說茅以昇曾痛哭過這科學的愛子。事後還在科學報上發表它的建築與破壞的經過。那三個橋墩倒下江裏的照片影子，將永遠深印在我們的腦際，何況主持橋工的茅先生呢？茅先生科學素養的深厚以及科學家的殉道精神，值得吾人欽佩！然這是國家民族勝敗的大問題，有時對於這種小犧牲是顧不到的。況且如上所述，錢江大橋已盡了它偉大的任務。茅先生也可稍慰了。

我到了杭州，先與朱前任見面，他還請我在他的寓所吃飯，談談前方及交代情形。過去數十年的官員交代習慣，都是前任去了，後任才來。好像新舊任在住所見面，是怪難為情似的。可是這次却打破慣例了。朱主席一直等到我到來才走，這也算是抗戰中的一種進步吧！第二日，我到省府去接事，也不過是一個形式。因為事實上省府各機關及人員皆已遷至金華，而且許多都是自己交代自己，加以戰爭緊迫，大家就隨便從事了。我在杭州，除了緊急措施用電話處理之外，很少其他的政務可辦理。我們曾在寶墩塔底下的防空洞裏，開過一次省府委員會議，這是我二十五年任內杭市防空重要工程之一，以極堅固的巖石琢成，可以容得二三百人辦公，可以受得最重磅的炸彈，一切設備都很完全。可惜我祇是用過一次，以後就被敵人接收去了！

【杭州淪陷的前夕】這時負杭州軍事指揮責任的是劉總司令恢先，部隊的前線，東邊在臨平、海甯

一帶，北邊在吳興、武康，中間在練溪、德清一帶，前線都很平靜。因為敵自上海決戰進抵上述各地之後，除一部分兵力監視並牽制杭州方面之外，其主力皆去圍攻南京，另以一部地宜興、長興、廣德，威脅南京至蕪湖之後路，所以杭州方面就安定下來。在我未到任以前，杭州市民的心理很恐懼，市面很蕭條，自我到任之後，又漸漸的熱鬧起來。這當然不是我有什麼特殊的能力與威望，而是敵人在戰略上暫時不來的原故。我在杭州住在背臨西湖的中行別墅裏面，有暇便走走街頭，或是坐了艇子游游。一般市民見我安閒無事似的，大家也就拿我當作戰爭鬆緊的寒暑表來看，認為戰事一時不至有若何重大的變化，有些已經疏散出去的人，又重復回來了。浙省當時淪陷的縣份，僅為平湖、嘉善、嘉興、海鹽、桐鄉、吳興、長興等七縣。其餘浙東各地如蕭波、海門、永嘉等地照樣與上海往來不絕，和平時毫無差別。

我以前在乍浦、平湖、嘉善、嘉興、海鹽等地做了很多的國防工事。在杭州也做幾個規模宏大的防空洞。然而前線的國防工事，未曾守過一天，就放棄了！國防工程處的人員，也就星散四方，等我到了杭州，才又重新集合起來。他們辛辛苦苦做了兩年多的工程，落得這樣一個結果！當時負責人楊處長潘松聽到工事放棄不守，曾經大哭過。他說：「這兩年多以來，皮都晒脫了好幾層，不意結果守也不守，不能發揮一些效力，不但對不起國家，也對不起老百姓，更對不起自己。」這不僅是他，在我也當然同樣的希望，那些親自計劃經營過的工事地帶，能夠發揮一些戰果，作為保障杭州的長城，不料當我未到杭州以前，就因不守而放棄了！亦覺得非常痛心！還有一個在工程處工作的同學羅傳英，極張向華說，當情勢緊張的時候，他還在嘉善前方工作，竟被敵機炸死了！工程人員不但流汗在工程裏面，而且還流血在工程裏面，這是工程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他是廣西甯明縣人，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炮兵畢業，精於技術而勇於負責，又是一個無妻無子的人，竟忠勇的殉職了！我在同學和朋友的責任上，不能不把他這種光榮的事蹟表揚出來。

杭州的防空洞，做得也很堅固合理，可這祇開了一次省府會議就不用了。因為敵人對杭州並不十分轟炸，雖常有警報，甚至終日的警報，我在中行別墅裏，祇是僱一個小艇盪到湖心裏就算了。遊西湖遊警報，回想起來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杭州最後的命運，我早就料到了。但是那一天是及後的一天，就祇有敵人才可以知道。因此，我在杭州重要的工作，就是疏散。機關搬去了，還有數十萬的老百姓和重要的物資，亟待運送出境。浙贛鐵路，及公路、帆船，一齊動員，無不盡力的裝載。鹽轆船隻，膠輪鐵輪，連接不斷地向西南開行，但是想將偌大一個杭州城所有的物資和人民全部搬走，真是不可能的事！我所最注意的就是那些工廠，希望它們搬運到內地去，作為持久抗戰物資生產的基礎，可是我到各廠去看的時候，知道他們大都停工了，工人也已星散。祇剩下一些無用的人，要建設廠召集各廠的負責人來開一個遷廠的會議，也召集不起來了。後來我下命令，如果各工廠不自動搬遷，我就要派兵來炸毀了！有的遵命自動的搬走，有些還是政府硬同他們搬運。然而交通工具太缺乏了，時間又是那樣的迫促，好些笨重的機件雖已拆卸下來，仍是搬不走。結果能夠搬到金華的，不到十分之一，還少少的一些生產工具，後來竟大有貢獻，假使當時能夠大量的搬出，其效用就不可勝計了！最可笑的是某一家銀行存有十多萬元的銅板，因為笨重，亦棄置不要，後來才設法運出，照現在的價格計算，不知道值若干萬哩？

【首都淪陷與退出杭州】十二月十四日，中國的首都——南京陷落了！我在收音機內聽到，日軍定於十六日舉行正式的佔領儀式，心中無限的悲痛！不覺流下淚來！自首都陷落之後，杭州最後的命運已可計算得出來，而我們統帥部對此突出前方的杭州，自有一定的打算，在十二月十六、七日的時候，陳辭修（誠）、張向華、黃琪翔諸兄由安徽方面轉到浙江來，約我同劉侯先到慈德縣城去會商，他們是轉達最高統帥的意旨，對於杭州的問題有所指示。他們是由松滬（京燕長途）轉戰過來的，辛勞固不必說

、肚子餓也餓極了，總想痛快一些弄點食物來果腹。而那位姓江的建德縣長，却是從容不迫的將酒席三獻三讓的慢慢送上來，不但是慢，而且又不好，弄得這些急先鋒火氣上升，叫副官去煮幾碗麵吃了就算數，弄得那縣長非常難爲情。的確，一個小小的縣長遇到這許多統兵的大員，不知如何小心翼翼必恭必敬的來辦差才好？結果是費力不討好，急驚風遇着慢郎中，不但是把病人誤死了，也把旁人急壞了。中國官場及社會上的繁文縟節，不但在戰時要不得，即在平時也不用着。這種陋習，不知何日才可以革除呢？他們說完了，吃完了，就走路。我對張向華、黃琪翔說：「你兩位以後也許不很容易再到杭州來了，你對於臨死的西子，也應在她未死之前去看她。」他們也以爲我的話爲然。同回到杭州，在黃廟日的別莊內，我請他們吃了一頓晚飯，洗了一個澡，他們仍連夜趕回自己的崗位去了。

杭州經昌化到徽州的公路，在那時候奉令破壞了。前方作戰地區的公路，爲要阻止敵人機械化部隊的前進或遲滯敵人的前進，要破壞是當然的。但就那時說，這條後方的道路也要破壞，心裏終有些不以爲然。這也許是對於自己費心力築成的產物，有些不忍的感情包含在裏面。但是感情是感情，命令是命令，遵從命令，就祇好忍痛的把感情犧牲了！這條杭徽公路在這矛盾的心理之下就破壞了去，也可以說這是浙江公路大量破壞的開始。

杭州當京滬側背，在南京未陷之前，敵軍無暇顧及，南京陷落了，日軍必須佔有杭州，才可以向西沿長江攻武漢，與向北沿津浦路前進，以會師徐州。所以十二月十六日以前，埭溪、德清、臨平、海鹽、各前線的敵人是很沉寂的，十六日以後，就漸漸的活躍起來了！且另有一路敵人由廣德、泗安、下安吉、孝豐，其主力由黃湖出餘杭，佔富陽。一部由孝豐經報福鎮，希圖越過天目山，佔於潛，下分水、桐廬，以切斷錢江北岸的退路。滬杭鐵路正面之敵與京杭國道正面之敵，亦同時進迫。我國軍按原定計劃抵抗，逐步向南岸撤退。十九日的晚上，我與天目山章軍長雲淞、凌師長歐西通電話，我問那邊的情形

？他們說：「天目山附近的山太高，不好守，敵人攻擊很厲害，恐怕守不住。」我說：「廣西人既怕水，難道還怕山麼？你們一定要守住天目山，不讓敵人直下於潛、分水、桐廬，才對得住我。」我這不客氣的話，在第二個部隊是不能用的，因為那方面的部隊都是廣西兵，都是我多年共患難的部下，我就很不客氣的責備他們。他們也就接受了我的意見，去死守那條嶺。結果，敵人死傷很大，不能衝過於潛、臨安。當地的人民特爲此戰而立了一個紀念碑，紀念那些陣亡的將士。但是黃湖、橫坂一路，攻進至餘杭附近，京杭路上之敵，亦已進至瓶壩附近，滬杭線上已到塘棲附近，尤其是餘杭方面，橫下富陽，則我後路將爲其所斷，因此我與劉恢先總司令商量，決定準備退出杭州，這已是廿一日的事了。

黃膺白先生在西湖的邊上，建築了一所房子，外面是中國式的，內裏則完全西式，可惜造好之後，他還沒有住過，就去世了！交由中國銀行保管。我很喜歡這所房子，時常到那裏去休息，或請諸客。到了二十二日，我到那裏去。管房子的也知道就要撤退了。對我說：「那兩個房間都是字畫古玩，是黃先生保存下來的，棄去未免可惜。」請我設法。我說：「整個杭州都完了！還顯得這些物件嗎？我很喜歡那兩條洋狗，因爲在那所空無一人的房子裏牠同我最親暱，便把牠們帶了走。我回到中行別墅把應該準備的事物料理一番。前方是再沒有什麼消息可報告了，成了「一個絕望而沉靜的狀態。我打電話通知劉恢先，說明二十三日黎明以前離開杭州，因爲我同他的路線不同，我是向桐廬方面，他是向蕭山方面。天一亮，杭富公路就要破壞了！所以我不得不早些離開。他候到二十三日的夜裏，才退回南岸，錢江大橋就在二十三日夜裏未天亮的時候，轟然一聲，沉下去了！這是以後的話。我打完了在杭州最後的一個電話，還上床去睡了一覺，心裏如像對臨死的病人，能多留一刻就是一刻的光景。兩點鐘起來，檢點行李，還把中行別墅裏一個席夢思的床褥帶上汽車。我由杭州帶出來的東西，就是這一張席夢思床褥，和兩條狗。

我在二十六年十月底，很狼狽的離開了太原，十一月底，很悽慘的離開了南京，十二月底，又很悲痛的離開了杭州。冷峭的寒風，吹着霏霏的微雨，汽車沿着湖濱駛過，零落不見一個行人。但那街頭的路燈好像含着滿眶熱淚的眼睛，放出慘紅的光圈，一明一暗地，在那裏閃爍着，湖上的碧水，也像一個困苦飄連的流浪人，在那兒長吁短歎如怨如訴的悲鳴。我就在這種情況下，離開了號稱天堂的杭州！天堂天堂，剎時間就要變成地獄了！想起了天堂的快樂，便想到地獄的痛苦，不知何日可以再回天堂哩？我是兩任的西湖守主，這種景況是我終身不能忘記的啊！傷感之餘，會填菩薩蠻一闕，以誌不忘。

越王欲雪稽山恥，越溪送女愁西子，一步一回頭，酒旗樓外樓。吳宮人已去，教訓謀生聚。期以十年春，還伊湖上人。

二十三日拂曉，我到了桐廬縣政府，將朱縣長海樑叫了起來。我同他到離城十多里事先準備好的小村莊裏，將電話架設起來，打電話給杭州劉總司令，問問前方的情況。也不過是想知道敵人到底在那個時候進城，並沒有什麼積極的希望。但是下午的電話就打不通了，祇能通到富陽。當日的下午，富陽還沒有敵情，但是敵人已由餘杭向富陽前進，預料二十四日的下午，就可到達富陽城。當時我手裏祇有一班衛兵，可是不願馬上就向金華退去。二十四日下午，富陽的電話亦叫不通，自然是敵人已經到達了。幸而在那一日裏，廖總司令研農（磊）的兵，有一部從分水方面轉過來。張師長淦，徐師長啓明（都是廣西兵）先已到來。我將杭州、富陽的情形告知他們，要他們立刻佈置。我雖然不負指揮的責任，但當時我不能不在那時暫時的負一負責任，而等待廖總司令的到來。還有一團的廣西隊伍，由團長李本一率領，並奉令守嘉興，後來轉守德清，撤退時，於二十四日黃昏，經過富陽，為日軍所截擊，乃由東沙洲渡過南岸，被敵擊斃或淹死的很多，幾乎全軍覆滅！

敵人到達富陽之後，亦不再前進，已成相持的態勢。我見前方已有人負責，乃轉回金華。剛巧是二

十七年的元旦，正值兵荒馬亂滿目淒涼的時候，也就忘記這是一年的開始，更談不上照例的慶祝了。

此次浙江淪陷的地區，又增加了武康、德清、崇德、餘杭、杭縣、海寧、富陽及杭州市。安吉、孝豐雖一時陷敵，但隨即退去。省會是在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淪陷的，距首都淪陷爲時僅十日，我們每年都在這一日舉行紀念的儀式，以示不忘這個奇恥大辱。

「臨時省會由金華遷方岩」當我回到金華的時候，那裏的秩序，還很混亂。這固然由於從杭州或上海撤退下來的黨政軍機關人員尚未安頓就緒，同時敵軍佔領杭州之後，金華就是敵機第一個轟炸目標，亦爲敵軍向西進攻的主要目標，所以人心恐慌萬狀，弄得家家閉戶，處處關門。市上連吃食的東西，都不容易找到。顧墨三、白劍生兩位，適於這時到金華來，召集劉恢先、廖研農及其軍事重要幹部，會商浙江前線的軍事部署。決定錢江南岸由劉氏負責，錢江北岸由廖氏負責，前方的軍事總算安定下來了。我又陪同顧、白兩位到錢江北岸視察了一週。過後，他們到皖南去了，我仍舊回金華來。

臨時省會究竟設在什麼地方？是當時一個重大問題。因爲省級黨政機關雖然撤退到金華，都尚未確實安頓，照常辦公。金華道地方，雖然交通便利，足爲軍事政治經濟的中心，但就當時的情況，考量結果，實在有些不相宜。往西去呢？衢縣還夠得上開爲臨時省會的條件。但我預料敵人若沿浙贛路西進，這裏便馬上要受到威脅，而且到那時再要轉移一個地方，就不容易了。往南去呢？麗水在軍事上的地位比較差一些，也比較安全，但我覺得太偏南了。而且我那時想配合軍事上的需要，也不願離鐵路線太遠，於是拿地圖來詳細研究一下，覺得永康的位置，適居浙東的中心，爲公路交通的樞紐，離金華的鐵路線亦很近，萬一敵人向浙贛路西進，再可向麗水轉移。我并曾聽說離永康城十多公里的一個鄉村名叫方岩的，有很多的巖洞，可以躲避空襲，并有許多廟宇與客寓，可以容納許多機關辦公及許多人員居住。我並未親向前往勘察實情，而向省政府委員會提出了開府永康的意見，大家都很贊成。於是當機決

本設在永康，普通機關在永康城區，軍事機關則仍在金華。可是方岩這地方，並不如傳說之「一谷納千峯」，省級機關的全部。因此有幾個機關如教育廳建設廳等又移駐麗水，也因為這兩個機關的業務，比較偏於平時性一變，工作的環境，也更需要安定一些之故。

臨時省會之所以確定在永康，除了上面所述的理由以外，恐怕還受有吉利的迷信的暗示。中國人卜筮或行動，往往要取一個吉利的兆頭。這種習俗，就是西洋人也在所不免。抗戰後各省的臨時省會，如浙江的永康，福建的永安，江西的泰和，湖北的恩施，都是很吉利很好聽的地名。固然被選為臨時省會的地點，必須具備相當的條件，如果兩個地方的條件大體相似，那末地名吉利的一處，一定是中選的。可見永康並不永康，泰和並不泰和。因此我想起十七年北伐完成後，將北京改為北平，以為北方就此平定了。不料這正中日的大戰，就從北平附近的盧溝橋發生。命名的吉利與擇地的吉利，實際有什麼關係呢？

省政府遷到方巖好久之後，我才到方巖去。因為我須在金華方面處理許多的軍事問題。我到了方巖，觀察一環，大失所望！所謂巖洞，不過是很淺很小的單頭石縫，比之桂林任何一個小洞，不知要差多少。但在沒有岩洞的地方，就覺得是非常難得了。省府秘書處在五峯書院辦公，五峯書院是永康的名勝，宋儒呂東萊曾在此講過學，院舍傍山依巖，層巒既不見寬敞，環境更覺狹窄。其餘各廳處辦公的房舍，亦不見寬大適用，經濟物質條件，更為缺乏。我雖然感到失望，但在戰時，祇好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素旨，兢兢於住下去，不欲多所更張，免得多費人力物力。并且藉此亦可鍛鍊一般公務人員簡單的生活與刻苦的精神。

方巖成為省治，達四年許之久，中間雖經三十年之一度遷移松陽，但不久仍舊遷回。直至三十四年五月，方巖原距離。有人說：「省政府在方巖四年多的時間內，敵機未曾來轟炸過，因為那裏的風水

好，還有胡公大帝的神力來保護，當敵機飛臨方岩上空的時候，胡公大帝就大顯威靈，騰雲駕霧來遮蔽敵人的視線，使它不能投彈。」一般迷信的愚民，說得更爲活龍活現。然而胡公大帝並不能抗拒三十一年敵人的窺擾呀！

〔臨時省會再遷至雲和〕三十一年五月，敵寇大舉窺擾浙東，永康就失去了臨時省會的地位，省會各機關遷移松陽；敵人陷龍（游）（衢）（縣），再遷至雲和，陷麗水，復遷至景甯龍泉慶元一帶。九月初，敵人撤退，遷回雲和。三十三年八月，敵重陷麗水，雖又有遷地辦公之議，但經過幾次的播遷，交通工具，極度缺乏，公私行李，損失不貲，搬遷所需的費用，却較前激增了。一談到應變疏遷，公私都覺得非常困難。因此一般人的心理，反而鎮定得多。所以當敵陷麗水，繼續南犯，迫近碧湖，離雲和祇有四十公里的時候，我們還是鎮靜的住在雲和，照常辦公，而不輕易移動。當時，我對我的同僚們說：「我們應變是進步了。第一次臨時省會——方岩，距離敵人大約是一百五十公里，我們都走了。第二次臨時省會——雲和，距敵人僅八九十公里，我們也移動了。這次距最前線的敵人不過四十公里，我們還沒有退走。」的確，我們是弄得無處可退，無法可走，才有這種鎮定的修養啊！

雲和這個縣名，在戰前，不僅外省人不大知道，就是本省人，也有很多不知道的。舊處屬是浙江的經濟文化較爲落後的地區，俗諺有「處州十縣九無城」的話，（十縣中僅麗水一座府城，青田半個城。）所謂雲和縣城，祇是一個四百數十家住戶的村鎮，連一處土圍牆都沒有，更談不上堅城了。現在成了臨時省會，遷居來此的公務員及眷屬，要比土著的人口多得幾倍。吃的用的，固成了問題，住更發生極大的困難，城郭附近村落的破祠堂爛廟宇，就是省會機關辦公的地方，人民的灰房毛房，也都修成職員的住所，當三十一年敵人壓迫我們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敵人大肆宣傳，說我們在山裏吃草根樹皮，不久就都要餓死了。可是我們在這裏已好好的活過了三個整年。

在這崎嶇的山城裏，有些人當百無聊賴的時候，會捏造一些故事來增加它的顏色。有人說：岳武穆滿江紅一詞中「八千里路雲和月」句，即指雲和的月光，由於這種附會的說法，有些做詩填詞的人，便借此來發抒他的情感。

雲和作了臨時省會，雖然增加當地人民許多的負擔，或帶給他們許多的苦難，但同時也助長它很多的進步。政府在這里建築了一個水力電廠，使這十幾方里以內黑暗的農村，放了光明，開辦了幾所設備相當完備的學校與醫院，使附近的兒童與人民，獲得較為豐富的智識，與減少疾病死亡的痛苦，無形中把這裏的文化程度，至少提高幾十年，我們還在這裏建築了一座民族復興館，作為將來回杭以後的永久紀念！

二十 八年來浙江軍事

〔浙境戰局演變及甯紹的淪陷〕敵人自佔領杭、嘉、湖以後，其前線，西邊僅進到富陽、餘杭、武康、吳興、長興一帶，南邊則未逾錢江一步，大有隔江而守不復向西向南前進的姿態。其實敵軍對於杭州的佔領，僅是完成京、滬、杭三角地區的第一期軍事計劃，而第二個目的，則為沿揚子江直上，進攻我當時全國的心臟——武漢。所以杭州佔領之後，對於浙贛鐵路方面以及浙南方面，就變成靜止的狀態。這種狀態，一直延長到二十九年的春天，才被打破。中間雖也曾有過好幾次小規模的戰鬪行動，但對於整個局勢，並沒有多大影響。

迨二十七年冬，武漢淪於敵手，軍事的重心，仍在長江上游。東南戰區，在整個的戰局上，仍是處於次要的地位，所以浙江的偏安局面，更顯得安定起來。當時駐省國軍，大都紛紛他調，留存浙江境內的少數部隊，僅夠擔任前哨的防務，我們的兵力自然不免單薄了。二十九年的初春，敵人乘着漫天大雪，我軍警戒疏忽的時候，偷渡錢塘江南岸，佔領蕭山附近的橋頭堡陣地。並繼續前進，停止於臨浦、義橋之線，作為他日後進展的基點。

三十年四月，我率領軍政幹部巡視前線。八日到達紹興，閭閻安謐，市況如常。不料當我離紹的第二天——四月十三日敵軍驟然蠢動，先攻佔紹興，繼復沿浙贛鐵路，西進陷諸暨，其先頭部隊，進達義烏縣的蘇溪鎮，旋為我國軍擊退。但紹興從此淪陷了！

敵軍於佔領紹興後，復進軍竄擾曹波、奉化、慈谿、餘姚、上虞等縣，相繼淪陷。我軍乃退至四明山脈、會稽山脈一帶，與敵軍對峙。另一部敵軍，則由海門登陸，陷黃巖、臨海，我守備指揮官蔣志英

陣亡殉國，不久敵軍又退走。

此次敵軍由多方面擾竄，影響頗大，金華、永嘉等地，皆受波動，省府會一度撤退至松陽。後以局勢稍定，仍遷回方岩。

「德蘇戰爭及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戰，是要等到引導世界戰爭爆發了，才可得到良好的結果。蔣先生於抗戰開始時，就這樣明白的向我們指示。可是歐洲大戰雖於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九月爆發，而那時的同盟國——英法波荷比——都是節節的失敗。法國的貝當政府並在康邊森林簽訂類似無條件投降的停戰協定，德軍橫掃西歐大陸，固然不可一世，而我們的敵人，亦趾高氣揚的大步向中國進攻，三十年六月，中央召開全國財政會議，我也到重慶去參加，六月二十二日，德蘇的戰爭又爆發了，而且德軍的進攻，非常順利，在十幾天的工夫，由明斯克而斯摩棱斯克，沿著拿破崙的舊路，向莫斯科進攻。好些朋友問我：「蘇聯為什麼這樣懦弱，現在德軍距莫斯科僅三百多公里，豈不是快要完了麼？」我說：「不，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蘇聯有比中國面積更大的土地，蘊藏更多的物質，組織嚴密的共產黨，我想他一定能支持下去，而獲得最後的勝利。」我雖如此說法，而實際情形，却一天壞一天，直到德軍迫近莫斯科，才把他堵住。

三十年十二月七日，我接到上海方面的消息，說是日軍解除了英美在上海的武裝，接收了英美的租界。次日，又知道日軍襲擊珍珠港、香港、小呂宋等地方，英美立對向日本宣戰了。那時正在赴渝途中，沿途所聽到的，都是這等興奮的消息。好多人以為美國一參加了對日的戰爭，在一年至多二年內日本就要屈膝了，而我的看法，却不是這樣。在桂林有一次座談會裏，有人要我對於戰爭的久暫，作一個觀察。我說：「還要五年」。我有一位老朋友聽了我的話，非常失望似的說道：「你的觀察，如果正確的話，那我就要死了！」我很驚訝地問他：「為什麼說出這樣的話來？」他說：「這四年多來的痛苦，我

已經受不了啦：如果加上五年，豈不是要死了麼？」我笑道：「你死不死是另一問題，戰爭的時間一定要這樣長久，才得結束呵！」現在我回想起當時的觀察，却還不大錯誤。

〔盟機初炸敵京我軍民救護降落人員〕三十一年四月十八日，我正巡視到臨海，是日傍晚暮色蒼茫的時候，忽然聽到空襲警報聲，這是過去所未有的。同時接獲報告：臨海三門沿海各地，以及衢縣浙西方面都有飛機在盲目的亂飛。我當時心裏想，這不像向我們空襲轟炸的樣子，一定是敵機因為那日天氣非常惡劣，受不了狂風暴雨的襲擊，而迷失了方向，覓不到降落的場所。如果它在我們的境內強迫降落，我們定可活捉幾個他們的空軍，稍洩這幾年來遭受無情襲擊所感過的種種苦痛和怨氣。決然斷定不是我們的空軍。更不料會有同盟美國的空軍，能飛到中國的天空上來！我離開了臨海，轉赴溫嶺，才接到報告，那天晚上的飛機，是由太平洋方面起飛的美國飛機，作歷史上第一次轟炸東京的壯舉。原來預定炸完之後，就飛往中國，在浙省的衢縣機場降落的。祇因氣候惡劣，天又黑了，無法找到機場，乃不得不犧牲飛機，而跳傘下來。後來又陸續接到報告，在三門、江山、遂安、天目山等處，都找到了跳下來的盟友。總計在浙境降落的，有五十餘人之多，除了少數人受傷之外，其餘盟友都安全無恙，經我們護送到後方。這班飛翔太平洋上空英雄的領導者，就是後來馳名歐洲的美國第八航空隊的杜立特將軍。

當他們降落的時候，不知道那個地方，是日人的佔領區，還是中國的自由區，所以他們不能不作自衛的戒備。而在降落地區附近的人民，或地方團隊，也以爲這些跳降落傘下來的飛行員，一定是日人，而想將他們生擒活捉起來，便用武力去搜索。因為我們軍民的腦中，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時候就有美國的飛機，在我們的天空上降落的呀！等到見了面，是一班黃頭髮，高鼻子，藍眼睛的人。如果是我見到，自然很容易判別，這不是日人，但在當地的人民和團隊，却不容易分別是日軍或是中國軍。有的逃到深山裏去躲藏了，有的握着手槍準備抵抗。彼此官話不通，用了種種手勢的表示，才知道他們是美國的空

軍。在三門縣的南田島上降落那一批，距離敵人的據點很近，我們的團隊很迅速的把他們救護出來，脫離了危險界數小時之後，敵人的搜索隊就到來了，但是已不見美國飛行員，所得到的僅是美機的殘骸。他們雖然到了我們的安全地界，——臨海——但是對於此行任務及經過詳情，仍保守秘密。阮廳長毅成那時正在臨海，除了招待他們之外，并用種種方法，詢問他們，想知道轟炸東京的詳細情形。（直到美國政府公布，我們才明白詳細的情形。）但是他們祇是說從太平洋方面起飛轟炸東京，預定飛到衢州機場降落，不料一進中國沿海，就遇到惡劣的氣候。而且天又黑了，方向迷失，找不着機場降落，以至受到這不幸的挫折。并時時向我們打聽降落其他各處同伴的消息，尤其是杜立特的消息。他們這一行人，沒有一個到過中國，他們初次吃到中國飯，還穿上了中國士兵的棉襪，不但在他們感覺得是有趣的事，我看了那個怪模怪樣的照片，也覺得可笑。後來我在美國雜誌上看到他們將這次轟炸東京及過險脫險經過，作成電影片子。其中有一幕是在臨海恩澤醫院治療的情形，有個著長袍馬褂留長鬚戴眼鏡的中國醫生，一望就知道是恩澤醫院的陳院長，此外還有幾個中國的女護士。

杜立特將軍，那時還是一個中校，他是在天山目方面降落的。在臨海方面降落的人，首先就問起杜立特中校的下落，便引起我們對他的注意。竟料不到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出色的空中英雄！他辭別天目山的時候，將他的航空衣服及降落傘贈給浙西行署的賀主任，作為紀念。到了美國，還有信來道謝地方招待的盛意。他們作了這一次偉大而冒險的壯舉，回國後，各人都晉升了兩級，杜立特由中校一躍而為少將，作了第八航空隊的司令。現在又晉升為二級上將了。這樣迅速的升遷，自然由於杜立特將軍的超人功績所致，而不是僥倖得來的。我對於美國政府按件計功的獎賞，覺得非常有意義。他們在這次大戰中，從草莽裏殺出許多英雄好漢來，這正可算是哥倫布冒險開荒的傳統精神啊！

他們受到我各地政府與人民竭力的救護和熱烈的歡迎，這不但在他們是一個歷史上的重要記錄，即

在我們浙江，亦是美國空軍最先到達的地方。我們幾年來費了很多的心血與力量，總是希望我國或盟國有飛機到敵國去轟炸東京，使日本人民也嘗嘗炸彈的滋味，現在是開始見到了！雖然他們受到不幸的挫折，不能接連的作第二次第三次轟炸，然而已經給予了我們極大的興奮。不過，同時亦帶給我們浙江人民更大的痛苦！

【金華寓居遭炸災及全村】我繼續在沿海一帶巡視，由溫嶺而樂清、永嘉、瑞安、平陽，再由青田、麗水回到永康。這時，我們在金華正籌備一個全省工商展覽會，準定於五月十五日正式開幕。而前方的情況，却一日緊似一日。並且知道敵人所用的兵力和行動的規模，要比往前增大。到了五月十五日上午九時，空襲警報又發出來了。據報有飛機九架，由桐廬向金華飛來。我家小雖然避開了去，我却依然留在羅店的寓所，我也料到這次敵機轟炸的目標，或者是羅店，因為我住在那裏，而且還有許多的軍政機關，散在這一個村莊中。我聽到機聲，跑出屋外，敵機已飛臨我的頭頂。本來寓所的前面，相距二三百米突的地方，連接的做好了幾個防空坑，當時情勢緊急，我祇得在頭一個坑裏伏着，靜候炸彈的來臨。幸而他的航線不很正確，飛到這兒尚未投彈，而向前飛去。但聽到他飛過了金華城的上空，仍不投彈，又向羅店飛來，我就斷定轟炸的目標是在羅店了。同時覺得我避伏的地方，太過危險，馬上由第一坑躍進至第二坑，更由第二坑跨至第三坑。立足初定，炸彈的聲音，已如轟雷般震聳了耳鼓！事後檢查，這次敵機所投的彈，大都落在羅店鎮上，也有幾顆落在我住的屋子裏。我第一次匿避過的防空坑，也着了一門炸彈，傷了一個男工人和一個女傭人，房舍大部被炸燬了，還震死了兩個豬。不久，第二批敵機又飛來了，更瘋狂似的濫炸羅店附近的村莊。我的秘書潘季東之妻，就在這一批的轟炸裏，喪失了生命。一個小小的村鎮，受到兩度轟炸，數百棟房舍，幾已全毀，人民死傷達一百餘人，亦可謂慘絕人寰的災難了。

『浙贛戰役的前因後果』全省工商展覽會在當天的黃昏時即開幕，許多遠地到來參加的人，已是心旌不定，草草地舉行了一個開幕儀式。這一個開幕典禮，也就是一個閉幕典禮。因為當時風聲鶴唳，各個人都有其他應即處理的事務，想不到我們化費了數十萬元，籌備幾個月的展覽會，就這樣地結束了！我的家小，因為房屋已炸毀了，就在那晚上離開了羅店，我仍留在那座破屋裏，做我應做的事。十七日，我始得到軍方的通告，說是我軍改變了預定在金華決戰的計劃。我於是召集當地的中央地方機關人員，囑照他們趕快疏散。永康、方岩方面，亦作同樣的處置。我於二十日下午離開金華的時候，看見那幾要疏散的人民徬徨躊躇，顯露出一副焦灼倉皇的神情。他們要車沒有車，要船沒有船，而那些貨物檢查的機關，對於疏散的貨物，還在那裏留難。一個四年來繁榮起來的金華，也可以說是浙東的精華，就在這種情形之下葬送了。說起來，真是萬分痛心！

我到了永康，見到幾位銀行經理金潤泉、張忍甫等，正在那裏著急。這時嵊縣方面的敵人，已到了東陽縣屬的巍山。我問他們：「為什麼還不走？公路就要在二十一日晚上破壞了。」他們說：「汽車到麗水要檢查，回空的车又不許通過。」（因為以前有規定，要利用回空車裝載人貨，不許空車行駛。）我聽了這種話，心裏想：「這些檢查人員即使沒有惡意，也就太不近情理了。緊急時候的疏散，那裏還要照平時的手續來檢查？那時祇有出去的東西，那會再有回來的東西呢？」我於是打了一個電話給駐麗水的雷團長霆，叫他帶兵一排到檢查站去，制止他們檢查與留難。這件事曾引起很大的誤會。論理，我這種權宜處置，好似有些越出職權範圍之外，但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情。在平時，我同劉總司令的車子經過，他們也裝做不認識而要照例檢查，我們為尊重國家法令，表現我們守法精神，也和平常來往的人一般，由他們那樣做去。但是在這緊急的時候，我就不能不有這一種權宜處置。因為我負有全省安全的責任，萬一這些銀行受了損失，不但經濟上要受到很大的影響，而且要受到中央很大的責備。因為在那個

撤退的時候，是要銀行第一呀！

敵軍各路迫近金華了，我奉最高當局的電令，要我固守縉雲通麗水的道路，并要我負責將那段艱難險要的公路，澈底破壞。我那時不負軍隊指揮的責任，手無一兵，我祇好自己駐在縉雲，一個防空監視哨所，就是我的臨時司令部，用電話調集保安第一、第三兩團到來。并調傳揚誠、楊長鑫幾個人前來計劃防務與破壞的工作。等到李總司令雲波到麗水，由前方退回的黃師長權到達縉雲，我才把這個臨時差事卸下。但是那條路的破壞，就很費力了。經派一營工兵，用上三千多公斤的黃色炸藥，還不能破得很澈底，因為這段路沿互於括蒼山脈，巉巖險壁，開鑿通行，在修築的時候，是最艱苦的一段工程，破壞的時候，當然也就是最困難一種工作了！

我轉退到松陽——預定的臨時省會地點，這時，省級各機關人員亦都陸續到達了，而敵人也已攻陷金華，逐步向衢縣移動，我看形勢不對，如果敵人到了龍游、衢縣，松陽定必感受威脅，不得安枕。於是我與省黨部吳主任委員抱峯面商，又決定即時撤退到雲和。不料敵人的進展，同我們的撤退一樣的快，當我們很狼狽的到達雲和的時候，敵人也就順利的佔領衢縣，並且越過浙江的境地，由江山、常山窺竄上饒，與南昌方面東進的敵軍會師。這條殘餘的浙贛鐵路，從此就算是「壽終正寢」了！

此次敵軍，在浙江方面，共分三路進兵：第一路由餘杭，臨安下新登、分水，趨桐廬、建德，饒壽昌。第二路沿浙贛鐵路正面，經諸暨、義烏，趨金華、蘭谿，第三路由奉化、新昌、上虞經嵊縣、東陽、武義趨湯溪，然後會攻衢縣，以佔領衢縣飛機場為初步的目標。也可以說：這次敵人興師十萬，分途的進攻，是爲了報復東京的被炸。敵人爲了要掩飾他的前哨，同時爲防止以後美機再利用浙江境內的機場，而發動了這個大攻勢。由於美機之轟炸東京，打破了東南四年以來的沉靜局面，雖然給予我們以莫大的興奮，同時也加給了我們以更大的痛苦與更大的損失。這就是卅一年五月浙贛路戰役的前因後果。

敵軍自浙贛路會師之後，乃折而向浙南進攻。以一部由江山、廣豐攻仙霞嶺，希圖下浦城，爲我國軍奮勇擊退。另一部由衢縣、龍游，下遂昌、松陽，並向龍泉方面之白岩與雲和之湯侯門進攻，皆爲我軍所阻。再一路，則由武義經烏門，陷麗水，復分兵一部向碧湖、大港頭進攻，一部則沿甌江下青田，陷永嘉，與由海面登陸之敵會合。當敵軍分路向雲和、龍泉進攻的時候，我恐怕雲和龍泉亦難立足，乃將省會各機關向景甯、泰順、慶元等地撤退，而我却留駐龍泉。這時，敵人離龍泉僅八十多里了，各機關人員除必要留至最後才走的幾個人之外，龍泉的街道上，僅能看見零零落落由前方退下來三五成羣的軍隊或難民，在那家家閉戶的街頭巷口，叩門覓食。那種情形，實在淒慘得可怕！加以敵機終日空襲，竟在市區投下許多燃燒彈，城裏起了好幾個火頭。我同崔縣長履瑋督率軍警，施以撲救，因爲當時住戶已逃走一空，及撲滅時，全部精華地區，已化爲灰燼了！我在安清山的古廟裏，守着一架電話機，靜聽各方最後的消息，長日寂寥，百感交集，想起數年來殘餘的局面，亦曾盡力支撐，現在一切都快完了，不禁淒然！曾填臨江仙一詞誌慨。蓋恐龍泉不日亦須別去也。詞云：

半壁殘餘今已矣，五年枉費心腸，宏圖宿願未能償，個中疑有數，成敗待思量。勳業自來多鬼妬，幾翻遭遇堪傷。湖山暗淡減容光，寶慚勾踐地，無語別淒愴。

省黨部陳委員貽蓀，由方岩退出頗遲，在武義爲敵軍俘虜，帶至龍游附近，才脫險逃出。輾轉奔波，歷盡艱難困苦，到達龍泉。特來安清山古廟看我，在當時那種景況之下，我不知用什麼話來安慰他才是，就將那首詞給他看，他亦黯然！他將被俘時所作的詩，遞給我看。兩人相對感慨之餘，就悄然分別，他即轉往慶元去了！

由金華撤退的人中，令我最難忘懷的是商會會長程世榕，他不但在未撤退前，參加各種抗戰工作，可以說出了錢，又出了力。臨撤退時，將自己很大的財產犧牲了，而把他所主持的救濟院幾十個兒童，

公醫院幾十箱藥品搶救出來，因為他認定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藥品是目前作戰的要品，甯願損失自己私人財產，而保留這班兒童和許多藥品。他到龍泉來見我，我向他安慰，他還是很坦然的，並不覺得有什麼難過。他已是七十的高齡了！現在仍舊帶着兒童救養院數百兒童，終日在一起。他的年紀雖然大了，我覺得他的精神，還是和他帶的幾百個孩子，一樣的勇敢活潑，富有朝氣！

還有留在淪陷區裏面，始終不肯退出，始終不肯屈服，而能特別表現民族氣節者，如新昌張墮初（載陽）先生。他是浙江的軍政前輩，自從退隱之後，一向都住在家裏，與山實政治不發生什麼關係。當新昌快要淪陷的時候，新昌縣長請他一同撤退，他拒絕了，仍舊住在家裏。不久，新昌淪陷，敵人就去找他，想利用他作個傀儡。因為偽組織的傀儡，多半是以前失意軍人政客，或是與現政府不發生關係的人。敵人以同樣可鄙的眼光來看張先生，不料張先生以天地正氣，把他驅了出去。他對敵人說：「我做過中華民國的浙江省長。我這樣大年紀，難道還受你們的玩弄麼？你們有的是刀槍，儘可以殺我，我的性命可以不要，名節却要保存的。」敵人受了他的教訓，不但不敢加害於他，反而對他肅然起敬。新昌淪陷了三年多，他的正氣，還是屹立在那裏支持着。

【敵寇暴行一斑】八月中旬以後，江山、衢縣的敵人已撤回金華，松陽的敵人也由宣平退回武義，永嘉的敵人，一部由海上撤退，路由陸路撤回麗水，隨又同麗水之敵，撤回武義、金華。這次戰役經過時間，約一百天左右，然災區域之大，地方損失之重，真當得空前二字。茲摘錄松陽縣長徐雄飛所作「卅一年日寇燒殺松陽記實」文一段，以見倭寇暴行之一斑：

八月二日下午五點鐘光景，松陽城淪陷了！——爲由龍游及麗水兩方面竄來的敵人所佔領，敵寇佔有了這座山城，給養困難，於是普遍的深入農村。這時全縣有四十二個鄉鎮，敵人竟竄到了二十九個鄉鎮。

八月廿八日那天，得悉敵人開始經由宣平回竄金華，廿九日拂曉，敵人掩護撤退的隊伍，也越過了柴頭嶺（松宣交界處），政府員警便在那天深夜回到城裏。當我們踏進距城十里許地方，顯然感到景象淒慘，臭氣逼人，原來敵人在盤踞二十八天之內，竭盡燒殺破壞之能事。我們一進城，更覺腥臭難聞，非幾步便會踏着屍體，有的已腐臭不堪，有的是鮮血淋漓，至於殘缺不全的牛屍、豬屍、羊屍，更是狼藉滿地。敵人把牠們肥美的鮮肉割去吃了，剩下來的頭、腳、皮、骨、便到處棄置，有幾株老樹上，排列的懸掛着三四個婦女的屍體；有幾處水源澄清的水裏，倒塞着七八個老弱的屍體，這顯不是自盡而是敵兵弄着玩的。最殘酷的，要算是幾處集體屠殺場：如南街電燈廠的水池，整個的爲敵人殺戮的屍體所填滿了！據後來掩埋的人報告，共有一百四十多具，東門的朱山頭，溪南的寺嶺下等地方，均各有五十多具的屍，堆積在一起。這些地方，敵人都用粉筆標明「死刑場」的字樣。這許多屍體，都是我手無寸鐵的同胞，而且大都是些老弱婦女，其中還夾着兩三歲的小孩子。他們遭此不幸，不知在敵寇的國際法上犯了什麼罪？從南門到北門長有里半的大街，兩旁店舖，只留了殘餘的軀壳，所有門窗板壁，一堆堆排列在街道中心。電桿柱子，一根根都被鋸斷了，倒臥在屋簷底下，這似乎是臨時的障礙物。住戶十室九空，板壁被拆了去，泥壁上都穿了大洞，飯鍋水缸，全被敲得粉碎，桌椅板凳，四腳截去了半段，都成了廢物，端莊的桌面，鑿了幾個大孔，敵人似乎在表演他破壞的技巧。孔廟和城隍廟均被作爲馬房，糞便堆積盈尺，污穢得可怕，學校和機關的圖書儀器，悉被損毀。尤其是浙江農業改進所的東西，事前移藏鄉下，終被敵人搜索到了，除破壞一部份外，多數是被搶劫了去。有幾家私人珍藏的善本圖書，或撕去幾頁，或燒去幾本，總使殘缺不全，以盡其破壞的能事。城內自縣政府起，南至太平坊，西至北街，兩旁市房，盡付一炬。其爲公共建築如縣政府、警察局、司法處、縣立中學、農民銀行、英士大學農學院等，均全部

燒去。他如豐業改適所、地方銀行、縣訓練所等，或燒去一部，或將內部搗毀，空存軀壳。縣西二十里之古市鎮，爲昔松州府治，平日市集繁榮，全鎮房屋，被炸毀焚毀達三分之二。鄉間如洋坑埠、石倉源、港口、源口等處，村舍被焚，幾無倖存。「流寇所至，牲畜不留，廬舍爲墟，婦女淫辱，老弱慘死，財物被劫，壯丁被俘」，這是敵寇蹂躪松陽以後，所給予我們一個永不磨滅的慘痛印象！這一次空前未有的浩劫，計死亡人數，有家屬可查問的。得一千五百七十一人，被俘壯丁，據各鄉鎮報告，合計爲一千九百五十四名，此外尚有許多外籍被俘壯丁，無從調查的。其因避難山林，受毒菌或寒氣侵入而病死的，不下二千人。燒燬房屋，除公共建築外，民房有一千四百四十六所，至於公私財物的損失，可以彙成百頁以上的帳冊，數字不可勝計，這裏留待將來向日寇清算的。這僅僅是松陽縣的一個慘酷的鏡頭，我隨後出巡收復各縣，情形也相差不多。我在那個期間，由於內心的痛苦，因而填了好些詞，詞意都是以這次敵人大流竄的慘痛爲背景的。在麗水城填了一闕「念奴嬌」，詞云：

乍聞敵退，知多少人家，悲歡淚滴！道路相逢，爭見告劫後家園消息。瓦礫千堆，頽垣半堵，尸骨縱橫擲。炊煙灶絕，蔓草滿街黃碧。回首四月光陰，年般過了，痛餘生鋒鏑。若個幾人今健在，若個幾人息寂，暮色淒涼，城郊極目，夜火青燐色。孤星點點，露冷秋聲唧唧。

自三十一年秋至三十二年秋，戰局復歸平靜。三十二年九月間，我巡視浙西，在天目山行署召開行政會議，天目山屹立浙西，數年來好似支撐軍事政治的柱石。我已三年不到了，長途跋涉，一入山中，便涼雨相迎，至爲愉快！詞意油然而起。因填「賀新涼」一詞，以贈賀主任培心諸子，雖爲寫景之作，仍寓慰勉之意。詞云：

一別三年矣。想山中，幾般物換，幾般依似。觸目頽垣禪寺燼，院廢草離離地，更不復，梵音

佛諦。嶺上千松行列壯，似生成，執戟食多士。七載憂，長城倚。遠行常覺初行易。最艱辛，百程未盡，半程十里。在望雲山今不遠，再過一山便是。喜重認，舊遊山水題記。日日塵勞今且息，謝來迎陣深秋雨，消鬱暑，新涼洗。

但一時情勢又稍緊張起來，敵人發動流竄，攻佔安吉，進迫孝豐，旋又告平定。惟安吉之敵，仍久據不退。三十三年五月間，粵漢、湘桂方面，戰爭相繼爆發，浙境敵人，發動響應。六月間，武義之敵，向宣平佯攻，被我軍擊退。乃轉向湯溪、龍游以南地區挺進，會台金、蘭正面之敵，進陷龍游、衢縣。旋被我軍擊敗，仍退回金華、蘭溪。復由武義、永康進陷麗水，再下青田，陷永康、樂清。其後麗水之敵，雖已退走，但永嘉、樂清，則久佔未退，到今年（卅四年）六月，始會合由福州經霞浦、壽甯、平陽撤退下來的敵人，向台州方面退去。這股敵人，竄抵臨海後，又分兩路潰退：一路經三門抵甯海，與奉化竄來之敵會合，有久據甯海態勢，一路經天台，抵新昌，與嵊縣之敵會合。新昌之敵，曾於今年五月，一度克復，至此又告淪陷。總計抗戰八年來，浙省被敵佔領相當時日或現在尚盤踞中的縣市，有杭州市、杭縣、海甯、海鹽、平湖、嘉善、嘉興、桐鄉、崇德、吳興、德清、武康、長興、安吉、餘杭、富陽、蕭山、紹興、上虞、餘姚、慈谿、鄞縣、鎮海、定海、奉化、新昌、嵊縣、諸暨、象山、東陽、義烏、金華、蘭谿、浦江、武義、永嘉、樂清、甯海等三十七縣一市，縣境被敵一次或數次竄擾者，有孝豐、臨安、分水、於潛、新登、桐廬、建德、壽昌、湯溪、龍游、衢縣、江山、常山、開化、淳安、永康、縉雲、麗水、青田、松陽、遂昌、宣平、瑞安、平陽、玉環、臨海、溫嶺、三門、黃巖、天台等三十縣，縣境完全未被敵竄擾者，僅昌化、遂安、仙居、泰順、龍泉、慶元、雲和、景甯等九縣，茲將各縣淪陷及克復日期，列表附誌如次：

浙省各縣淪陷及克復日期一覽表

縣名	諸暨	蕭山	紹興	武康	德清	吳興	長興	孝豐	安吉	臨安	新登	餘杭	杭縣	縣名
淪陷日期	31. 5. 16.	39. 1. 22.	29. 10. 26.	26. 12. 21.	26. 12. 22.	26. 11. 24.	26. 11. 25.	27. 2. 23.	26. 12. 21.	26. 12. 30.	29. 10. 10.	26. 12. 23.	26. 12. 24.	第一次
			30. 4.		34. 4.			32. 10. 2.	27. 2. 21.	29. 10. 8.	31. 5. 17.			第二次
									27. 3. 19.	31. 5. 21.				第三次
									32. 10. 7.					第四次
克復日期				32. 8. 27.	32. 8. 4.			27. 2. 24.	26. 12. 24.	26. 12. 31.	29. 10. 12.			第一次
								32. 1. 2.	27. 2. 24.	29. 10. 11.	31. 7. 20.			第二次
									27. 3. 25.	32. 7. 24.				第三次
														第四次
備考								廿九年十月曾一度淪陷，即克復。				廿年二月六日克復後又淪陷，廿一年六月一度克復，又淪陷。		

常 山	江 山	衢 縣	武 義	湯 溪	宣 平	永 康	蘭 谿	金 華	義 烏	東 陽	新 昌	上 虞	嵊 縣	餘 姚
31. 6. 9.	31. 6. 10.	31. 6. 6.	31. 5. 23.	31. 5. 26.	31. 8. 29.	31. 5. 21.	31. 5. 28.	31. 5. 29.	31. 5. 20.	31. 7. 20.	31. 7. 14.	30. 4.	31. 5. 16.	30. 4. 25.
3. 7. 12.		33. 6. 26.	31. 6. 18.	33. 6. 10.		31. 5. 29.				31. 6. 30.	34. 7. 2.		31. 7. 14.	
			31. 7. 4.			31. 6. 28.				31. 9. 4.				
						33. 9. 18.								
31. 6. 12.	3. 8. 23.	31. 8. 28.	31. 5. 27.	31. 8. 30.	31. 8. 30.	31. 5. 25.				31. 6. 5.	34. 5. 10.	32. 7. 6.	31. 5. 26.	
31. 8. 22.		33. 6. 29.	31. 6. 26.	33. 6. 30.		31. 6. 10.				31. 7. 12.				
			31. 5. 16.			31. 9. 1.								
						33. 9. 21.								
						永卅 境戊年五月十六日 敵全部退出								

瑞安	平陽	永嘉	三門	黃岩	臨海	天台	寧海	象山	奉化	鎮海	定海	慈谿	鄞縣	龍游
31. 7. 13.	34. 5. 27.	30. 4. 1.	34. 7. 4.	34. 6. 22.	34. 6. 25.	31. 6. 29.	34. 6. 29.	31. 3. 11.	31. 4. 23.	2. 7. 17.	28. 6. 23.	30. 4. 22.	30. 4. 19.	31. 5. 27.
34. 1. 21.	34. 1. 21.	31. 7. 11.				34. 7. 3.				30. 4. 19.				33. 6. 12.
34. 5. 26.		33. 9. 9.												
31. 7. 17.	34. 6. 10.	30. 5. 4.	34. 7. 5.	34. 6. 26.	34. 6. 29.	34. 7. 1.				29. 7. 21.				31. 8. 29.
34. 1. 23.		31. 8. 15.				34. 7. 5.								33. 7. 1.
34. 6. 12.		34. 6. 18.												

富 陽	桐 鄉	崇 德	平 湖	海 寧	海 鹽	嘉 善	嘉 興	松 陽	蕭 雲	青 田	昌 昌	麗 水	玉 環	樂 清
26. 12. 24.	26. 11. 21.	26. 12. 21.	26. 11. 18.	27. 11. 8.	26. 12. 20.	26. 11. 11.	26. 11. 29.	31. 8. 2.	33. 9. 21.	31. 7. 9.	31. 8. 1.	31. 6. 24.	31. 5. 30.	33. 9. 10.
					27. 8. 26.					31. 7. 27.	33. 8. 15.	33. 8. 26.	34. 5. 1.	
					28. 2. 26.					31. 8. 5.				
										31. 8. 18.				
					27. 3. 30.			31. 8. 28.	33. 9. 22.	31. 7. 13.	31. 8. 3.	31. 8. 28.	31. 5. 31.	34. 6. 23.
					27. 9. 30.					31. 7. 30.	33. 8. 19.	33. 9. 16.	34. 5. 13.	
										31. 8. 13.				
										31. 8. 19.				
廿八年三月廿三日會一度克復， 繼又淪陷。	廿八年一月七日會一度克復， 繼又淪陷。	廿七年九月十九日會一度克復， 繼又淪陷。	廿七年九月十五日會一度克復， 繼又淪陷。	廿七年九月十五日會一度克復， 繼又淪陷。	廿七年三月卅日會一度克復， 繼又淪陷。	廿八年三月九日會一度克復， 繼又淪陷。							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敵一度竄據縣城，當日退去。	

桐廬	建德	壽昌	浦江
31. 5. 18.	31. 5. 22.	31. 5. 23.	31. 5. 21.
		31. 7. 21.	31. 8. 27.
31. 7. 16.	31. 7. 19.	31. 6. 1.	31. 5. 27.
		31. 7. 24.	34. 7. 5.

附註：（一）本表所指淪陷及克復，以縣城爲準。

（二）時間截止三十四年七月底止。

還有敵機空襲浙境，計一千一百五十六次，投彈一萬七千四百八十三枚，好些城市幾乎都夷爲平地！政府與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之鉅大數目，也就無法估計了！

三十二年三月杪，日機大炸麗水，自早晨到黃昏，連續轟炸了五次。我在雲和，聽到這個消息，不知被炸的損害如何重大，心中頗爲焦急！當晚偕同方處長青儒乘車到麗水去視察，並帶一些款項去急賑。到達時已是深夜了，十多里外就見到燭天的火光。到了城裏，即赴火場巡視。余專員森文，朱縣長毅生，正督同團警在那裏搶救，大火仍燃燒着，火舌由窗門壁縫裏不斷的伸出來，全城祇有見燃燒的火光，而不看見住戶的燈光。燃燒的爆炸聲與圍牆的倒塌聲，相間而作，更顯得恐怖！抗戰以來，麗水城不斷的遭受敵機的轟炸，城裏的精華地區，已被燬損過半，再經這次的大轟炸，真是滿目淒涼了！由金華分邊來麗水江南的東南日報社，這次大轟炸中，也被殃及。屹立在前方的文化壁壘，雖然一時受了損害，但很迅速的又恢復起來，他們工作的毅力，是值得稱道的！

後來，我在敵人的廣播裏聽到他們要不斷轟炸麗水、建甌（閩境）的原因，是偵知道兩處都駐有美

國的空軍，以爲美軍將利用這兩處的機場，作爲前進基地來轟炸日本。並且說：「這種轟炸並不是對中國人民有敵視的意思，而是要把駐在那裏的美國空軍驅逐出去，使他沒有駐足的地方。」其實據我所知，這兩個地方，時都沒有美國的飛機及地面工作人員。雖然有英國的軍事代表團（由副團長諾克陸領導約數十人）在李默庵總司令部裏工作，也不在麗水，而是駐在離麗十七八公里的圓頭，却未爲敵機所發現。日軍對於少數的盟軍，就這樣的恐慌起來，豈不是怪事麼？

民國三十二年以前，美國的軍事人員在浙江並未設立什麼固定的辦事機關，但是他們的軍事準備工作，却進行得非常積極。卅一年六月間，正當浙贛路軍事吃緊的時候，戴雨農（笠）兄同一個美國海軍中校到溫州去工作，這是美海軍來浙工作的第一人。此後，就漸漸的多起來了，陸、海、空軍各方面的人員都有，但沒有統一連繫的機關，而是各做各的事，這也許是爲保守秘密的原故。卅三年春天，美國駐華陸軍總部才在浙江的臨時省會雲和設置救濟機關，由凱萊君主持，名義雖爲救濟上海的美僑，及海空軍遇難人員，其實蒐集軍事情報是重要的任務。此外，在昌化及瑞安的玉壺鎮，還有訓練中國部隊（忠義救國軍）特種技術的機構，爲以後配合美國軍隊在浙江沿海登陸之用。這些美國的工作人員中，除了陸海空軍人員之外，還有很多技術人員，如氣象學家、海洋學家、地質學家、工程學家、昆蟲學家、病理學家，這些都是由國內徵調來服務的。由此可見美國動員的澈底，並可表示科學戰爭的輪廓。他們對於責任範圍的工作，就我們看是很小的事，而他們却各盡其最大的努力，這是值得欽佩的！在這交通不便的地方，由高山峻嶺而海港島嶼，都有他們的踪跡。有的不帶譯員，單身行動，也能達成任務。這固然是我們曾於事前招呼過地方注意招待，但也虧他們有這種勇氣，打破種種的困難，而能完成自己的任務。美國人是輕視金錢而重視生命的，我會同一個海軍少校舒美克閒談，問他對於日本的自毀飛機作何感想？他說：「自然，它可以予美國海軍很大的傷害，但是我們並不是沒有防禦的方法。有效的防禦

方法，不久即可研究成功，請實施。」我又問：「美國可否仿照日本自殺飛機的方法，來對付日本的海軍呢？」他笑道：「如果美國人有這種想法，大家一定當他是個瘋子。我們美國有的是飛機，有的是炸彈。一架壞了，可以換兩架三架，一次投彈不中，可以再投兩次三次，為什麼要將有用的人去犧牲！自殺不算是勇敢的行爲，而是愚笨的行爲。」他這種說法是相當正確的。有一次，一個盟友得了急病，雲和沒有醫療機關，他們就由福建的建陽，連夜專車派醫生來救治。我有一次翻車受傷，他們的主持人馬爾將軍會與我有一面之交，知道了這個消息，也專派醫生來替我醫治。由這些地方，充分表示美國人對於生命的重視與救護同類熱忱。但是我以爲這必須有科學發達物質豐富的條件，方能實踐這種良好的道義。

在這次抗戰期中，我們所接觸到的，有英國的軍事代表團，有美國「各種工作人員，還有蘇聯的軍事顧問。這三國的民族性，各有不同。英國人是紳士派頭而兼有商人的風味。（因為英國在東南的軍事代表團，除了一二個軍人之外，其餘都是在中國經商的人徵集起來，而臨時賦以軍事工作的。）美國人則活潑而天真，蘇聯人則拘束而嚴謹，也許是因為都是軍人，要受到軍紀與黨紀嚴格制裁的原故。這三個國家的人，我們不能從某一個角度來批評他們的長短，他們之所以形成此種不同的性格，是基於他們祖國的歷史與地理的原因。

我國因為沒有大量的驅逐機及高射砲來作積極的防空，所以防空工作僅限於消極方面。防空情報及防護圈是消極防空的雙環。浙江的防空情報網，在二十五年我第一次主政時就準備好了的。因為那時航空、防空兩校，都設在杭州。開戰以來，防空情報非常靈通，充分表演出他的功能。在十八年當中，敵機到了我們的上空才發出警報的事情，祇遇到一二次。而這班防空工作人員，亦不能盡職，在最新線工作的人員，非至敵人十分接近，不肯撤退，因而被俘或被炸而殉職者，亦有數人。因防空情報的確實，

而予人民生命以很大的保障，是值得稱許的。但是各地的防護團，組織並不健全。全省防空司令雖然由我兼任，但是實際負責的，是張副司令咸宜。我時常稱道防空在抗戰當中，是有很大的消極貢獻，這不僅是單就浙江而言，全國都是如此。

全省各縣，除了奉順、景甯、慶元、磐安，四縣之外，就沒有一縣不遭遇敵機的轟炸。在一個空防薄弱的地方，敵機真是爲所欲爲，一架或數架很低飛的轟炸，機上日軍的面貌，都看得清清楚楚，祇是心中恨恨，無奈他何！但是三十二年之後，情形就不同了。敵機再不敢低飛，原因是美國的飛虎隊及十四航空隊在中國成立了，雖然它的基地，還遠在西南，而它的聲威，却已到達東南。就那敵機轟炸麗水建甌的情形，可以表示敵人對於美空軍恐懼的心理。

「地方自衛武力的發展與游擊戰的展開」我們在「全面抗戰」「持久抗戰」的口號之下，雖然有了國軍在陣地上與敵人作正規的戰鬪，而發動地方的武力在敵後作游擊戰，以牽制敵人或幫助國軍作戰，亦是很需要的。當我初到任的時候，上峯就任命我爲第三戰區的游擊總司令。這也許因爲我是一個軍人，平時又喜歡談談游擊戰術的原故。（我曾寫了一本游擊戰的理論與實際的小冊子。）但是要以一省的行政首長來總領戰區各省的游擊工作，那裏可以做得到。而且我又沒有一個兵，所以這不過是一個虛掛銜頭而毫無內容的東西。後來中央頒佈了國民抗敵自衛團的組織法，每一淪陷區的省主席，都得兼國民抗敵自衛總司令，以統一指揮全省抗敵自衛的工作。浙江淪陷得最早，所以這個組織也就成立得最早。我兼總司令，宣鐵吾兼副總司令，後來又加派俞濟時爲副總司令，張貽文當參謀長，石楚琛當秘書處長，傅揚誠當參謀處長。楊長鑫當工程處長，孫璜當軍法處長，楊義當總務處長，譚計全當政訓處長，魏忠統當經理處長。這個機關設在金華的中學裏面，其所隸的部隊，則編爲八個支隊。第一支隊司令趙龍文、省府警察隊改編），第二支隊司令王夢、韓治（由各社訓總隊改編），第三支隊司令黃權（由

帶來之衛士營擴編），第四支隊司令徐圖遠（新編），第五支隊司令鄭器光（紹興地方部隊改編），第六支隊司令徐志餘（餘姚地方部隊改編），第七支隊司令朱炳熙（內河水警改編），第八支隊司令胡雲飛（廣西部隊改編）。此外尚有各區自衛總隊，第一區自衛總隊長葉志，第二區自衛總隊長邱玉林，第三區自衛總隊長徐志餘，第四區自衛總隊長羅傑，第五區自衛總隊長王雲沛，第六區自衛總隊長尹錫和（後由六區保安副司令張威慶兼），第七區自衛總隊長魏思統，第八區自衛總隊長鍾炎興，第九區自衛總隊長杜克良。各區的自衛總隊，皆由原來區有之武力改編，在縣則為縣自衛隊。各縣按地方需要及可編成的自衛隊，自兩大隊、一大隊、至兩中隊、一中隊不等。到了三十年，自衛支隊與區自衛總隊共約十六七個團，再加原有四個保安團，省屬的武力，共為二十一個團，縣自衛武力，亦有二萬餘人。這省直屬保安團及自衛團，除一部份擔任地方治安之外，其餘皆配合國軍，担任國防工作，而第五支隊鄭器光首先渡過錢塘江，進入杭嘉湖，展開敵後之鬭爭。隨後過江殺敵者，有六支隊徐志餘，三支隊黃權等部隊。我們第一個目的，是在建立及掩護淪陷區的政權，以維繫淪陷區的民心，免致都作順民，為敵所利用。第二個目的就是打擊敵人，牽制敵人，消耗他的兵力，使他不能以全力向我們內地進攻。游擊戰在國際鬭爭中的價值怎樣，還未得到正確的估計，但至少可以說，它可增加敵人後方許多的顧慮，而予正規軍以一個有力的幫助。它可使作戰的時間延長，而等待國際機會的轉變。它可使作戰的空間擴大，而消耗敵人的兵力。我們抗戰的八年當中，敵人因佔領地區愈廣，使用的兵力愈多，綜計他在中國全部的兵力使用到三十幾個師團以上，而用在最前線的不足半數，其餘大都用在控制游擊區內。假使敵人自開戰到現在，對游擊區毫無顧慮，而將卅幾個師團完全集中在一點或一線上，向我們攻擊，戰爭的局面應該是怎樣的變化？戰爭的時間能不能支持到八年之久？自然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即就浙江一省而論：當杭嘉湖淪陷之初，我們的軍隊後撤了，我們各部的政權也隨着瓦解了！自從我政府人員同自衛團隊重

新進入陷區，始把政權重新建立起來，敵人就不能在佔領的地方，建立許多的據點。數年以來，敵人每年都作一次或兩次以上的「掃蕩」，企圖摧毀我們的政權，並肅清我游擊部隊，以祛其後顧之憂。同時可以一往無回的將全部軍力，移到前線去進攻，但這結果都未能達到目的，反而增加了他自己的負擔與消耗。我們雖或一時受了挫折與損失，但旋即很快的恢復過來。所以浙西陷區的政權一直維持到現在，重要政令仍能照常的推行。甚至在敵人的據點裏，我們仍舊能夠募債與收稅。我們本着以往的經驗與教訓，現什陷區的縣政工作人員，對敵鬭爭與應變，很能從容不迫，驍應裕如。固然，淪陷區內的老百姓因為游擊隊對敵作戰，不免要受到無限的苦痛，但這不特游擊隊本身的價值問題，而是我們在這種情勢之下，有許多複雜的問題會發生的。第一是散兵游勇的滋擾。每一個戰役失敗之後，一定有很多不能歸隊的官兵與散失的武器，他們以游擊的名義集合起來，成爲一個力量。有時也打打敵人，但大半都是紀律不佳足以騷擾百姓的。第二是土豪和土匪的猖獗。這班人平日慣行魚肉人民，劫財越貨，到了軍隊和政府撤退的時候，就更耍脾無忌憚，假借游擊名義，來發揮他們劫掠的技術。第三是游擊部隊的收編與本質。游擊部隊如以正規國軍或正規自衛團隊改編，因其本質的健全，自不會發生上述的不良現象。無如好些游擊部隊，都是就當地的散兵游勇土豪土匪收編而成的，遂致他們得以游擊的名義，做出種種不法的勾當來。而且在淪陷區那種變亂惡劣的環境之中，即使平日紀律很好的國軍或團隊，時間一久，本質也會變壞，何況本來不是正式的隊伍。所以弄到後來，游擊隊的名義，就變成萬惡的淵藪，游擊隊的意義也就失去了。然而游擊戰術本身價值的存在，則是不可否認的。

一省的區域裏面增加了這許多隊伍，自然要增加財政上的負擔，地方人士不免有所批評。也有些人以爲一省裏面不應該擁有這許多武力，甚或至於懷疑到會造成私人的武力。當二十九年春天，錢江戰役發生，蕭山失守，因防守錢江南岸的都是本省自衛團隊，這些閒話越傳越多起來，都以爲這是自衛團隊

應負的責任，也就是說這是我個人應負的責任。於是我受到各方的責難，並且在省臨時參議會裏受到公開的質問。我對於這個責任問題，雖然不能完全推諉，但亦不能完全擔負。因為地方團隊祇能擔負一些軍事補助的任務，一切指揮計劃，都是軍事長官直接負責。我祇是一個團隊的建立者，而不是軍學的指揮者。如果說我建立的團隊，一定要守必固，攻必克，否則，這個失敗的責任，就要我完全負起來，則對我的責難，就未免過分了。在整個戰爭中，各方面的失敗責任，又應該如何去評定呢？我碰到這個問題，也太重，問題也太複雜了，於是呈請中央派員協助我整理。結果改編為四個縱隊，以黃樸、蕭冀勉、裴時傑、勞冠英任縱隊司令。旋又改編為暫九軍（轄三個師），及一個獨立師，歸中央直接負責指揮。浙江省國民抗敵自衛團總司令部，亦於三十年冬撤銷，我的責任亦就解除了。經過的情形就是這樣，為功為罪，留待後人去評定吧！

【兵器的製造與研究】我擴充了許多自衛團隊，那裏能得到這許多的武器來試用呢？實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們也曾將省縣及地方舊有的武器集中起來，不過數量還差得很遠。於是我就計劃自己設廠製造，將以前在廣西山造土槍造土藥而建立兵工廠的經驗重新演一下。我的計劃，不但想單單補充浙江省的團隊，而且想補充外省的團隊或國軍。因為我認為武器製造是抗戰期間一個重要的工作，亦是個人對抗戰的重大貢獻。所以我毫不躊躇，毅然決然便開始進行，當廿六年十二月杭州快要撤退的時候，我就下令要將杭州的工廠機器搬到金華，但以時間及運輸的關係，搬出的不到十分之一，這些殘缺不全的機器，最初還想不到一定的用途，祇是搬出來再說。這我決定製造兵器之後，就派黃祝民為鐵工廠廠長，將這一機器搬到甌水的大港頭安頓起來。但是一經檢查，可用的機器，僅有二三十部，以之造兵器，還差得很遠。黃祝民對於機器製造很有經驗，而且隨杭州工廠退出的，還有許多技術人員與熟練工人。於是全部集合起來，設立一個浙江省鐵工廠。為了製造兵器，感到機器的不夠，除了向上海（那時上海

貨物尚可進口）福建及本省各地搜購若干零件之外，自己也仿製了許多工作母機及應用機械，並且繼續的向上海、漢口等地搜購鋼、鐵、五金、焦煤等必需材料，數量相當的多。可是自廠長以致技術員工，對於兵器製造都是毫無經驗，祇是各有一些普通機械的知識和技能而已。我在一羣散兵手裏，繳了一支捷克式的輕機槍和一支比利時式的步槍同一個手榴彈，給他們看看，問他們能否仿造？他們爲了抗戰的需要與熱忱的驅使，當時毫不畏縮的齊聲答道：「能」，「能」。於是我就叫他們照樣的做造起來。話說起來很容易，做起來就不是那樣容易了。經過兩三個月時間的試驗，才造出一支步槍與一挺輕機關槍。說起來也真可笑！那頭一次造出來的東西，不但形式上土頭土腦，十分難看，就是實彈射擊的結果，機關槍不能繼續的連發，步槍瞄準不正確，手榴彈發生過早爆炸或過遲爆炸的危險，離實用的可能，距離相差得很遠。所幸這一班人，上自廠長，下至工人，並不因此而灰心，反而增加了他們研究的熱心與興趣。一個工廠好似一個學校，大家都在那裏細心的研究，精求改進。他們——廠長以及員工雖然有些機器製造的知能，但對於兵器製造，確是外行。我對於兵器製造，雖然也是外行，但對於兵器的使用和性能，却瞭解一些。他們造出來的東西，就根據我粗淺的經驗，作爲改進的指導。學術研究是沒有階級的，是極民主的。很多的時候，我同廠長技術員工人，大家坐在一起，各人發表自己的意見。有時爭執得很厲害，決不因地位的關係而把自己所認爲正確的理由犧牲或緘默。經過了多次辯論的結果，正確的見解是最後決定的權威，而不是階級高的人就是最後決定的權威。我在這些場合裏，也增加了不少的技術和知識，並更了解民主的意義。我覺得民主就是討論自由的形式，必須經過很自由的討論，才可以得到正確的真理。然而，正確的真理，最初不一定是爲大眾所了解或注意，或擁護的。必須經過許多辯論解釋或實驗，才可得到大眾的明瞭與折服，然後可能得到他們衷心的擁護。民主固然不能違反大多數人的意見，但決不能因爲大多數不正確的意見而掩滅了真理。這不僅在學術上往往如此，即在政治上亦莫不如此。

。所以真正的民主精神，是在求正確的理論如何，並能使正確的理論爲大眾所瞭解。這也就是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一課。

【衆志成城】二十七年的七八月裏，我們的機槍步槍和手榴彈之製造，可以算得初步成功了。但是數量是那麼少，怎樣供應部隊的大量補充呢？而且在一個廠房裏，要製造許多部門的東西，不但是困難重重，亦且很不合理。擴充和分工的計劃就隨而發生。我們便在小順（距大港頭約二十公里），建造了一個新廠，專造步槍，在石塘（距大港頭約十五公里）建一個新廠，專造輕機槍，在玉溪（距大港頭二公里）新建一廠，專造手榴彈、槍彈筒，及各種爆炸品。大港頭廠則專造各種工作母機。這種計劃，於二十八年冬就先後完成了。此外還成立一個實驗室，專門做研究與實驗的工作。自此之後，規模相當完備，生產力量亦就逐日的增加了。但是我們並不因此而滿足，在製造方面，我們仍舊是不斷的研究，不斷的改良。中間因材料的困難與製造機器之不便，我們想不再仿製捷克式的輕機槍，另外創造一種合於我們的原料與機器的式樣，（因為我們沒有很多大的方鋼來作節套，而且因機器的關係，工作困難，想利用鐵路鋼軌作節套，並適於機器的工作）以省工省料。由黃渭川擔任設計，可是試驗結果，並不很佳。後來又由胡四興、彭益楚設計一種，試驗的結果很好，就採用了，正式的製造起來。我定名爲「七七式輕機槍」，與以前國內外的形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後來又有譚世義等設計一種漏斗式的，但未採用。步槍也設計過好幾種，均不滿意。仍舊依照比式而略加改良，亦名爲「七七式步槍」，手榴彈亦大加改良，使能投遠而便於攜帶，槍榴彈筒，本來是想造意大利式或日本式的。後來由我設計一種，試驗的結果很好，亦定名爲「七七式槍榴彈筒」。此外，我還設計各種地雷的發火器及各種地雷爆炸藥等，內中有兩種地雷發火器是很理想的，可惜尚未把它大量的應用，發揮其效能。我們這幾個廠雖不很大，但是我創造的膽量却是很大的。我們起初雖是做造人家的東西，但我們並不因此而滿足與畏縮，

總是就環境的需要與可能，而盡力加以改造與創造。這些創造與改造的東西，雖不能算得善盡美，但亦可以在製造兵上另樹一格的了。

工廠的機器不斷的怒吼着！員工也不斷的工作着！軋軋的聲響，震動附近山谷，小小的村落裏涌住了工作員工。到卅一年的春天，各廠擁有四千多員工，上萬的眷屬。那一處的方言，都可聽得到，寂寂和閉塞的山村，頓時出現各種不同的熱情情調。機器由二三十部增至一千多部，每月可產一千多枝步槍，五十多挺的輕機槍，五六萬發手榴彈，槍榴彈，還有許多零碎的東西。它的產品，西邊銷到廣西、貴州，南邊到了福建、廣東，北邊到了安徽，一直銷到西北的甘肅。在戰區與本省內銷場，更是普遍，名聲隨着銷路一日好似一日宣傳出去。有些不知道內幕的人，以為我是如何神祕的舉動。二十九年南嶽會議的時候，我帶了許多的樣品到那裏去試驗，邀請到會的許多高級將領與參謀來參觀，當時有人對我說笑話：「黃季寬，你已經變成軍火商人了，你是不是想要向我們推銷生意麼？」我說：「在抗戰時期，自己能製造一些軍火來賣賣，不要買外國貨，也是一件值得做的買賣呀！」我曾經將這個情形向蔣先生報告過。他說：「好！好！你就這樣做去！」所以我就更放膽的做起來了。

浙江的兵器製造工業，除我之外，還有浙贛路的副局長吳競清。他見我做得很有趣味，就將浙贛路上多餘的機器都搬到龍泉去，在那裏建立了一個工廠，並且利用火車上的軸鋼，來製造迫擊砲，也算得是抗戰期中很大的創造，出品也很精良，此外並做重機槍及各種機械。在贛江的上游，無形中就組成了一個軍事工業區。我們在那時候，並沒有什麼其他的念頭，祇是想着，多製造一件武器，即可以增多一分抗戰的力量。產品雖不很精良，趕不上外國貨，但比沒有總要好得多。時間一日一日的延長下去，名聲也一日一日的擴大起來。敵人首先知道了：時常派飛機到那一帶去搜索。終於被它發現了！塘頭機械廠首先受到轟炸，但損失并不大。我們照常工作，照常出品。三十年的夏天，中央兵工署派了九位委員

到來考察，認為尙有相當價值。於是同我商量，打算收歸中央辦理。理由：第一、是地方政府不宜辦理兵工事業。第二、我們的出品，尙不能合中央的規格。在「兵工統一」，「制式統一」的正大理由下，我自然很願意交出，以減輕我的負擔。於是在三十年的三月，就把造兵器的三個廠交出去，而祇留大港頭一個廠，爲本省地方製造一些應用的機械。交出去的員工，在感情上自然有些依依不捨的樣子。我對他們說：「女兒長大了，總是要出嫁的。能嫁得一個好門戶，不但女兒是喜歡的，就是作父母的心裏也是很安慰的啊！」

三十一年五月，敵軍陷金華，下麗水，交出中央的幾個廠，都要搬遷到外省去。尙未動手，敵人已攻到大港頭來了。軍隊方面要將附近工廠，全部破壞，理由是恐怕資敵。我對他們說：「這些破舊粗糙的機器，在我們視爲至寶，在敵人則視爲廢鐵。難道敵人還要用我們這些粗糙的機器來造兵器麼？假使敵人不來，豈不是一個錯誤的損失？」果然，攻到大港頭附近的敵人，爲我三十二師官兵英勇擊退。然先行破壞的，已不可修復了。祇有大港頭一個廠，我願負資敵的責任，不許他們破壞。敵人退去後不久，這個廠的引擎又動起來，一直動到現在，沒有停止過。而搬遷破壞的廠呢？兩年之後，才能重新建立起來。單就本身的損失來講，已經難以計算了！

我在那幾年，對於這幾個工廠，的確用了一番心思。差不多每月都有兩次或三次以上住在那兒。它在抗戰上有什麼價值和貢獻，不必再估計，對我自己，確實有了它很大的益處。我以前對於兵器學根本就厭惡，不肯用心去研究。但從此之後，它能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不但在技術上使我得到瞭解，還有一些粗淺的創造，更能使我對於科學物質的創造，與國家社會的認識，得到更進一步的瞭解。它不但是我愉快的工作園地，亦是我研究實驗的場所。這是我極有興趣的回憶。

「軍工工程與軍需供應」在「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口號之下，地方的行政工作，都與離開了

平時的常軌，而從事與軍事勝利有關的特種工作。我並不因乍、平、嘉一帶費了兩年多工夫構築的工事棄置不守而稍有灰心，我對於國防工事構築的熱忱，還是和以前一樣。當我初到杭州的時候，重新把國防工程處組織起來。這種組織，後來成為抗敵自衛團總司令部裏很重要的一處，也是很重要工作中的一環，一直到抗敵自衛團總部結束以後，才隨之結束。

本省對於軍事工程的建築經過情形，大略有如下述：

廿七年的春天，我們就開始構築諸暨縣安華、牌頭、建德及甌江洋灣附近的國防工事。這些，都是永久性的工事。雖然它的強度比不上乍、平、嘉，但在抗戰後物力極度困難的情形之下，也就不顧一切的去完成了這個工作。至其他部隊隨時隨地需要地方民衆構築的防禦工事，可以說差不多遍佈於全省各縣。所耗的民力、財力、物力，的確難以計算。

三十年的冬天，太平洋的戰爭爆發了！美國加入了我們的戰團。軍事當局預備將來美國的空軍到中國來作戰，浙江就是一個轟炸日本本土最好的空軍基地。於是建築飛機場的重大工程又開始發動，不上半年的工夫，衢縣飛機場在我偉大的人力下告成了。前線的人民飽受敵機無情的轟炸，都以爲我們的機場築好了，就會有飛機來保護自己。并且飛去轟炸東京，使日本人也嘗嘗炸彈的滋味。所以飛機場的工作，他們是萬分高興的，不但日裏冒着敵機轟炸的危險，努力的工作，即是晚上也點起大光燈或火炬，繼續的工作，所以工程能夠很快的完成。爲了要確保這個重要機場，防備敵人的進攻與擾亂，就要鞏固衢縣以東，以至金華、蘭谿、義烏、諸暨沿線的工事。從而國防工事的構築，也就隨着機場的完成而大量的開展起來。那一線上，一時廣集了成千成萬的勞動民衆，與堆積如山的構築材料。而尤以衢縣附近爲最後堅守的核心。軍事當局的計劃確定了，就在衢縣召集附近各縣的縣長會議。我亦去參加，將所需要的材料數置，迅速要他們如期如數的征到。但是數量太大了，時間也過迫切。各專員縣長聽了，都覺

得有些爲難，恐怕不能如期如數的辦到，而貽誤了軍事，面面相覷，不敢答應。然而軍事計劃已經決定，要改變是不可能的。我當時含淚忍痛的對他們說：「我們負地方責任，固然有我們的困難；但軍隊方面的困難，比我們還要厲害，上官的命令要怎樣辦，就得絕對服從的去辦，流血犧牲，就是他們最後的責任，我們及人民不過是勞些心，勞些力，流些汗，貢獻一部份的時間與一部份的材料而已。我知道這事的困難，但我們祇得照這樣辦去。」同時我對軍事當局方面要求，要節省材料，節省人才，切不可故意挑剔與浪費。大家見我這樣說，也就很高興負責的辦去了。可是工作的確是鉅大而繁重。試想，單就所需的大木（二十公分中徑）就要三百六十萬根，竹子九十萬根。這許多的木頭竹子，都不是隣近幾縣所能辦到的，必須到很遠的縣份征運，才可以辦齊。所以征購木竹的縣份，北邊到了遂安、淳安、建德、桐廬，東邊到了武義、永康、縉雲。南邊到了遂昌、松陽。附近那幾縣，就不必說了。最遠的地方，將近二百公里。從數十里以至數百里遠的地方，要把這幾百萬根木竹搬運到衢州來，不要計算木竹的成本，單就人工一項來說，也就不易估計。那時正是隆冬大雪，要過舊歷年了。幾十萬人因爲運木頭而不能回家過年！壽昌的林縣長與黨部的書記長爲鼓勵民衆工作起見，在大雪底下，同民衆一樣的去背木頭，以身作則，來鼓舞民氣。

這些東西，在短短的一個多月內，都集中到了衢縣城的附近。有些因爲驗收的時候，中徑小了一些，又得重新換過，或是兩根算一根，所以實在的數目，還不止三百六十萬根。唉！鄉下的老百姓，他身上那裏得許多的米達尺。他也不知道二十公分究竟是多少長？他所知道的是舊尺寸。辛辛苦苦地把自己的木頭砍下來，自己又送上很遠的地方去，還要受到尺度不合的挑剔。他所希望的代價是什麼呢？「勝利」兩個字！或是「多打幾天」，而不是那微小的代金。這一場大工程，人民茹苦含辛，終於如期完成，政府所能給予他們的代金，不過兩百多萬元，而地方人民種種的損失，恐怕要加上二十倍以上。四百

五十萬根木竹，數目是河等的驚人！衢縣城的人口，不過四萬多，然堆在城區附近的竹木，就比它的人口數多出十倍以上。我到那裏去巡視，祇見竹木，少見人頭，真不勝其沈痛與悲感哩！

另外，還有一個消滅的軍事工程，就是破路。自然囉！以我們劣勢裝備的部隊，同優勢裝備的部隊作戰，如果能夠在交通上予敵人以極大的阻礙，使其不能發揮優勢裝備的效能，亦可獲得勝利。即就消極方面而言，退却的時候，亦可遲滯敵騎而迅速進展。所以破路，就成為我們抗戰時期的經常工作。不但鐵路要破，公路要破，即連鄉村乃至山頭的羊腸小道也要破。浙江戰前公路有三千七百十七公里，破至現存，僅剩七百五十九公里了。（由大港頭至富陽街及由楓嶺至咸坪）內中還有一大半是已經破壞又重新修復起來的呢！至於接近前方的鄉村小道，究竟破壞了多少？還不能得正確的統計數字。我想，它的數量，如果統計起來，必然超過公路的數量若干倍，是可以斷言的啊！

單純，防禦，不能收到良好的戰果，在舊的戰術裏，已有這和啓示。整個中國抗戰期中，由太原的不守，而南京，而武漢，而洛陽，而衡陽，而寶慶，而桂林，而柳州，都未收到一次良好的守勢效果。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由法國的馬奇諾防線的崩潰，而至德國齊格非防線的崩潰，更足以證明單純防禦戰，必歸於失敗，中間雖有莫斯科，列寧格勒，史太林格勒的例外，但我們要知道，這幾處地方，蘇軍並不是單純的防守，而是由各方不斷的反攻，然後才能夠反敗為勝。我們過去的作戰觀念，總認為一個古舊的城池，在歷史上曾經有過防守的戰績，到了現在，認為仍舊有同樣的價值。殊不知近代武器進步之後，一切的戰略戰術，都隨着改變了。亦可以說，以往的防禦方法與防禦物，都失去它的價值。我們想以千數百年殘餘的城牆或簡單的防禦工事，來抵抗現代新式武器的攻擊，豈不是太落伍太錯誤了嗎？我們受到這種鐵一般事實的教訓，我認為要從近代物質價值的基本觀念上來改正戰略戰術上觀念的錯誤，更在物質方面努力，作為建軍的基礎，然後才可以發揮新的攻擊防禦精神與方法。如果不此之圖

，仍照舊的方法做去，不但民衆是一種無謂的浪費，即軍隊的本身，亦是一樣無謂的浪費。

道路的破壞，固然有暫時遲滯敵人進展的功效，但祇是很短的時間。我們浙江境內，無論道路破壞得如何徹底，敵人佔領後修復的時間，從未超過三個月以上。也可以說，從未因道路的破壞而能中止敵人進攻的企圖。而且即使破壞不像過去的那樣徹底，敵人的進展亦不致超過了過去的速度。反之，敵人是逐步進展，逐步修復，并不妨礙它第二次的進攻。而我們呢，事前破壞，反先受到交通的困難，而影響當前的作戰，尤其是我們已養成了倚賴道路破壞爲阻止敵人唯一的方法，而不知我可以通過，敵人何嘗不可以通過？以一種曖昧倚賴的心理，在任何情形之下，恐怕都不能拒止敵人的進展。此外，更有低估敵人修復力量的錯誤。往往一種破壞工作，皆以自己爲標準。認爲足以妨礙自己交通者，亦足以妨礙敵人交通。殊不知足以妨礙自己者，未必即足以妨礙敵人。故此種破壞工作，我們自己所受到的損失，實遠大於敵人所受的妨礙。太平洋以宏無際涯的海洋，應該是天塹不能飛渡了，又何曾限止了海空軍的活動呢？

【軍隊副食的供應】三十年四月間，我到紹興去巡視，同前方的部隊長官談到士兵的營養問題。當時士兵的副食費，僅有二十餘元。他們說：「士兵每日除了二十四兩米之外，祇是煮開水煮些青菜來伴食，月中見不到一些肉與一些油。天氣很熱了，某團長要士兵把棉衣脫下來，士兵皆怕冷，不肯脫下。那團長就自己將上衣通通卸下，赤膊露臂，表示不怕冷，以鼓勵士兵。然而士兵確是怕冷，并不因團長的以身作則而有所感動。他們說：『不料士兵的精神體力衰退到這個地步。』我聽了他們的話，心內慘然不安！我想士兵平日沒有一些足以發生熱力的營養料，不但是沒有勇氣與敵人作戰，就是要抵抗氣候的寒暑，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個團長以身作則的表演，未嘗不是精神鼓勵的方法，但是他不了解物質的缺乏是會影響精神，同時他也沒有想到自己敢打赤膊不怕冷，是由於每日吃得好一些，營養好一些

，而忘記了士兵終日是喝開水，煮青菜。我又在路上遇到了一隊輸送兵，一個個都是瘦弱不堪，病態畢現的樣子，東西由老百姓挑，他們徒手陪著走，好像還跑不上。我心裏想，輸送兵自己不能輸送，要老百姓幫他輸送，又何必有此輸送隊？像這樣下去，恐怕他們自己的身體，都要老百姓同他輸送了！我於憐憫這班老百姓之際，同時也對他們起了無限的同情。覺得士兵的營養問題，確是嚴重極了，這不僅是對敵的戰鬪力問題，而簡直是本身生命的生存問題，然而我祇有同情而已，不能替他們解決這個重大的問題。時間一年年的過去，三十年的作戰能力；已不如二十九年、三十一年年的作戰能力，更不如三十年！固然，其中還有許多的複雜原因，不過官兵營養不足，體力減退，確是最重要的原因呵！三十一年浙贛路戰役，不但部隊戰鬪力減退，就是紀律亦大不如前。我嘗擬了一個電報，想將這種情形向當局者陳述，但後來因種種關係，未敢發出。原文中有這幾句話：「平時要士兵上山砍柴，則戰時必折窗戶燒門板，平時士兵輩腥不費口，則戰時必捉雞殺豬，」蓋以平時士兵的生活太苦了，要自己上山砍柴，才可燒飯，一到作戰，就連砍柴的工夫都沒有了，祇有將村莊裏的窗門板壁折來燒火。他們每月不知肉味，在打仗的時候，官長監督不到，老百姓逃光了，剩下來的雞豬，殺幾個來嘗嘗滋味，亦實在是很平常的事！

我還記得，二十九年入金華的時候，有極少數的士兵不很規矩，社會上有許多非議。我同東南日報社社長胡健中談到軍隊的紀律問題。他說：「就現在的情形來論，自然是一種極不好的現象，但過兩年再回頭看現在，則現在已是黃金時代了。」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自二十九年而三十年，而三十一年，一年不如一年的下去，我倒很佩服他的先見。因為物質是行動的基本要件。古人說：「倉廩實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軍隊的紀律，何嘗不是如此呢？

三十一年秋天，浙贛路的軍事已經平定下來了。軍事當局在建陽舉行一個檢討會議，我也被邀參

加。大家都感覺到，官兵營養不足，體力，戰鬪力以及軍紀，風紀，都不易維持。我同本戰區各省的當局，發起了一個募捐慰勞的運動。一共募了六百萬元，來慰勞全戰區的官兵。然而人數太多了！六百萬元的數目，看起來好像很大，但是平均支配起來，僅能打一次「牙祭」。對於整個官兵的營養問題，依然不能解決。

三十二年的情形，越加嚴重了！我爲同情心所驅使，首先對軍隊副食的供應，命令當地的縣政府切實負責辦理。自五月份起，每月供給每個士兵青菜三十斤，黃豆一斤，豬肉一斤，食油一斤，那時士兵的副食費，每月還是三十多元。即使全數交給地方政府代辦，這些實量的物品價格，相差得很遠。尚有一些部隊，還不全數交付的。無形中地方人民對於士兵副食，就要全部負擔起來。實行之後，人民負擔，自然加重，地方政府亦就增加了一個極繁重的工作。但是我覺得爲國家保持作戰的力量，爲士兵保持身體的健康，雖然人民加了一些負擔，政府多了一些工作，也是值得的事！所以我勉勵人民，當作保養自己子弟一樣，並告誡地方政府，作爲政績考成之一。辦理以來，尙屬順利。是年的秋天，我到江山一帶去視察。李總司令雲波集合駐在附近的二十六師弟兄，要我檢閱。他報告，自副食供給後，逃兵減少了若干，病兵減少了若干，死亡減少了若干，都有很正確的數目字。他們對於地方及我，表示了許多的謝意。我見士飽馬騰，不似以前面黃骨瘦的樣子，衷心也比較安慰了些！

三十三年春天，南嶽召開軍事會議，各軍事長官都覺得軍隊副食的嚴重，同時亦顧慮到地方負擔的困難。於是 by 最高統帥決定鹽斤加價，每百斤增加一千元，專作爲增加軍隊官兵副食之用，由中央統籌。當討論的時候，我曾經想過，假定浙江每年銷鹽一百萬擔，即是副食費負擔十萬萬元，而就當時的物價，就地供應實物，至多不過一萬萬元。即使照後來第一次規定，每兵增加一百五十元，以全省十萬人估計，所需不過兩萬萬元。所以鹽斤價統籌副食的辦法，表面上看來，好似減輕了浙江人民的負擔，

實際上則普遍的增加了五倍的負擔。至於因食鹽加價而刺激一般物價的上漲，間接而普遍的增加了人民負擔，就無法估計了。同時，在鹽稅收入方面，并不能按照預計增加的數目收到。因此，士兵副食費增加的數量，亦不能照物價的指數一樣，在各地仍舊有很大的差價。這部分的差價，仍舊需要地方另籌彌補，或是照平價徵購，又加重了地方政府辦糧軍隊副食的困難。這種現象，雖然是實施後才表現出來，但我在當時的會議席上，亦提供過這種意見，而未為大衆所注意，真是一個遺憾！副食問題演變到今日，物價隨著鹽價增高了！國家的稅收，受到重大的損失！人民負擔，亦普遍地加重，而士兵副食，仍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演成兵民交困的現象，真是始料所不及的啊！

【兵役與國民兵組訓】二十五年三月，兵役法公佈，那時我正在主持浙江政務。我為確定兵役基礎，一面責成國民軍事訓練委員會積極規劃國民軍訓之推進——側重壯丁訓練，一面即指定永嘉、金華等五十一縣為試行徵兵區。四月間，成立金嚴、溫處兩師管區，並分設金華、蘭谿、衢縣、吳興、永嘉、臨海、麗水、雲和等八個團管區，由民政廳綜理其事，省政府為監督機關。這是本省設立徵兵機構的嚆矢。廿六年冬，我重來浙江的時候，主管全省兵役事務的，是兵役管區司令部，將各師管區及國民軍訓委員會改隸指揮。廿七年三月，兵役管區司令部結束，改組為軍管區司令部，我兼任司令。三十年中央規定兵役管區由三級制改為二級制，本省原有各師團管區，便一律裁撤，改設永樂、臨黃、麗雲、金衢、蘭嘉、嵊紹、郵奉七個師管區。後來，嵊紹和郵奉兩師管區，因轄區各縣先後淪陷，均告裁撤，改設徵兵事務所，劃歸臨黃師管區管轄。縣級徵兵事務，先由縣政府設置兵役科辦理。本省自二十七年七月起，在後方二十四縣縣政府均設置兵役科。三十三年兵役科裁併於國民兵團。各縣國民兵團是二十八年十二月成立的，他的前身社訓總隊，早於民國二十九年就成立了，由縣長兼總隊長，中央分發來縣的社訓教官兼副總隊長，專司壯丁訓練的任務。現在本省的國民兵團分為戰地和後方兩種，戰地兵團三十三

縣，後方兵團四十三縣，同負徵募國民兵組訓和警衛的責任。

本省徵兵開始的時候，中央並無配額，而是隨徵隨撥的。廿五年的實徵數是五千一百多名，我們在今日看來，這個數目太微小了，可是在當時要打破一千多年來「好男不當兵」的舊觀念，而把這些壯丁從田間徵送到兵營裏去，也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抗戰開始，兵員的補充自然有大量的需要。廿七年中央配賦本省的兵額數字，相當龐大。那時杭、嘉、湖人口最稠密的十五個縣市已經淪陷了，兵役的基礎，又還未曾建立，役兵的工作，確有相當的困難。可是經全省工作同志的共同努力，尤其是那些政工隊的青年同志們，不辭辛苦的普遍深入鄉間，不論是宣傳、徵募、征屬慰問，都出了很大的力，流了很多的汗。這個兵役的難關，總算很順利的打破了。廿八年以後，配額雖繼續增加，而征撥的數字，却是每年都超過了的。直到三十一年敵人大舉竄擾浙東，陷區擴大以後，征兵的工作，才遭遇新的難關。陷區照常征兵，這是我堅定的主張。我的理由，可分四方面來說：第一，「以華制華」是敵寇最險毒的陰謀。他佔領了我們的土地，還要驅使我們的壯丁同胞，做他衝鋒陷陣的炮灰。因此，陷區的壯丁，如不為我們征集以負荷殺敵衛國的神聖使命，即將為敵人役使來殘殺同胞，危害祖國，這是一個多麼悲慘的劇情！第二，這次對日抗戰是長期的全面的，戰爭的時期愈延長，戰爭的地區愈擴大，兵員的補充愈迫切。如果我們放棄淪陷區的征兵工作，則兵源日稀，部隊補充困難，勢必影響戰爭的進行。第三，陷區人民直接受到敵人的蹂躪，同仇敵愾的精神，至為旺盛。如能依法征集，在國家的正規訓練與統一指揮之下，必能成為最精良的戰鬪員。第四，後方人民因不良的傳統思想所禁錮，對於當兵，大多視為畏途，莫不想盡方法以求逃避。如果淪陷區域可以不征兵，則後方地區的壯丁，將視陷區為逃役之淵藪，而相率以去。所以本省自廿七年七月起，即開始陷區征兵。雖然征募的數目比後方要少，成績不如後方的縣份，但也有若干縣份，有很好的成績表現，尤其是蕭山。

征兵工作，在長期抗戰的過程中，是極重要的一環，因為這是國家要求人民貢獻生命的事。而我國自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以來，已養成了積重難返的文弱風氣。自廿五年兵役法公布至廿七年大量征兵，中間不到兩年的時間，一切兵役的基本工作，都沒有做好。是以八年來的兵役工作，發生了很多的流弊。這不僅浙江一省如此，而是全國普遍的情形。這些情弊，我不願在這裏一一列舉出來。我們要求改善，固然不是短期內所能辦到，也不是枝枝節節的辦法所能達到目的，而必須從下列兩方面作根本的努力。第一，教育方面：應迅求國民教育的普及，廓清「重文輕武」的落伍思想，矯正卑視軍人——「好男不當兵」的錯誤觀念。培養強烈的民族意識，並普遍提倡國民體育活動，鍛鍊國民堅強的體魄，使人人都有「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壯志豪氣。第二，行政設施與兵役制度方面，應力求基層政治的健全，特別要嚴格實施戶籍管理。基層政治健全，則民主精神充沛，兵役監察制度，才能發揮其效能。戶籍登記妥善，則壯丁管制嚴密，征兵才有確實的根據。國民兵組訓工作必須確實認真，並改善其訓練方法，使及齡壯丁在軍事部勒之下，接受嚴格的軍事基本訓練，養成有組織有紀律的生活習慣。國民兵組訓幹部和各級兵役幹部，必須遴選有經驗有理想的優秀軍官充任，俾能發生新軍人的典範作用，克盡建立兵役基礎的職責。免緩役的範圍，應盡量縮小，以防止浮濫取巧，影響兵源。在實施征兵制度的先進國家，征集新兵，祇要發一道某年次壯丁的征集令，規定報到時間和地點，所有同年次的壯丁，便都遵令如期入營。我們的征兵工作，要達到這個程度，為期還很遠。在目前的過渡時期，新兵的征集費用，必須充足，俾可優遇新兵，使在入營前獲得良好的「第一印象」。入營以後的保育，尤須切實注意。此外，官兵待遇的提高，征屬的優待等，都是於改善役政有密切關係的問題，而必須絕對做到。能如此，則目前所發生的征兵困難與流弊，均可迎刃而解或杜絕。堅強的國防新軍之建立，亦指日可期了。

廿一 幾個政治問題

『全省士紳會談』如果一國的首都或一省的省會淪陷了，在舊的眼光看起來，好似這一國或這一省就算完了。所以當南京和杭州相繼失守之後，有些人就感覺到亡省亡國之恐慌！有些人則索性繼續他醉生夢死的生活而一切不理，這些都是非常危險的現象！我回到金華以後，就覺到有急速召集全省各縣有名望的士紳會談的必要。事前與省黨部及省府各委員面商，某縣應召某人，或由縣裏自己推選，自然這些人包含各縣黨部負責的同志在裏面。那時候，除已經淪陷的縣份外，交通還很便利，被召集的人，都如期趕到。他們是抱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熱誠，並想來省探聽時局的消息，及省政當局對於以後如何應變設施，以盡他們以後的責任，決定他們以後的行動。

會談的地點，在永康城內的縣立中學，也就在那裏作爲他們的招待所，使他們首先嘗到簡單而集體的戰時生活，是沒有平時生活的舒適了。這次集會，不採用會議的方式，因為要商談的問題太大了，不能將各種問題分別提出，一一商討，作成決議。同時這不是一個法定的會議，所以不能制定各種方案。也因爲時間匆促，大家都沒有準備的原故，祇是彼此約略的交換意見，而沒有詳細討論。首先由我將受命來浙的經過，及我所知道的軍事概況，以及杭州撤退的情形，向他們報告。同時將我對於抗戰軍事的見解，及對於地方士紳的期望，向他們說明。比較重要的意見有三點：第一、這次抗戰是長期的。在國家方面言，決不因首都的淪陷，而對抗戰國策有所變更。在省方面言，也決不因省會的淪陷，政府隨而瓦解。我們的政權，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都是一樣的健全和行使，決不至陷於無政府的狀態。而且戰事的勝負，不決定於目前一城一市的得失，最後的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第二、此次抗戰是

全面性的，也是全體性的。作戰的區域，不僅限於前方的一點一線，而是包括前方和後方的全面。戰鬥的人員，不僅限於軍隊，而是包括人民的全體。第三、戰時的政治，自然以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爲前提。一切設施，都要配合軍事，爭取勝利。我希望他們格外鎮定，益加努力，以他們的地位來領導全體人民，參加這個持久的全面戰爭，效法先賢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光榮史實，以恢復既失的土地，爭取最後的勝利。並且希望他們多多發表意見，以供政府政治改革的參考。這些論調，在現在看起來，好像非常平凡。但在當時却是一番很新穎而極動人的言論，也是必須使大家明瞭的道理。他們自然也有許多慷慨激昂的陳詞和意見，但也多半是很抽象很籠統的。所以這次集會，在形式與實質上，並不見得有什麼收穫，但在精神上，却起了極大的作用，並溝通了政府與地方士紳的意見。也可以說是戰前未有的事。它在本省政治史上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大約是廿七年一月中旬的事。

【訂頒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自從全省士紳會談之後，我總覺得在一個局勢大變動的時期，政治上必須有一個嶄新而爲大眾所擁護的主張，公佈社會，才可以作爲政府與人民共守共行之準繩。本來這應該是中央政府決定的，但當時中央各機關正在西邊中，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而浙江最先爲敵騎所侵入，處在前方動盪而艱苦的環境之下，爲安定人心，振刷精神，動員民衆，培養實力，以貫徹中央抗敵自衛的國策，似乎有即時決定一個省單位的政治主張的必要。於是我審度實際的情形，再三考慮，親自擬訂『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十條。那時我適在麗水工作，一時不能回到方岩去。乃召集省府各委員到麗水，舉行第九八八次委員會，並邀請省黨部各委員及高等法院的鄭院長烈蓀（文禮）參加商酌。在會議席上，大家都認爲有此必要，將我所擬的原稿加以修正通過，正式頒佈各縣，並呈報中央備案。那是二十七年二月九日的事。茲將這個富有歷史性的『浙江戰時政治綱領』原文附錄如左，以供讀者的參考。

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

一、浙江省爲貫徹中央抗敵自衛之國策，在現階段之政治設施，以動員全省民衆，參加抗戰，創造新的政治及軍事力量，保衛浙江，收復淪陷土地，爭取最後勝利，爲一切努力之總方向。

二、調整各級行政機構及地方抗戰自衛組織，培養民主精神，領導民衆運動。並絕對澄清吏治，掃除貪污，提高各級軍政人員之戰鬪意志與技能，厲行戰時嚴格的自覺的新風紀。

三、對戰時人民之負擔，以有錢出錢務求公平爲原則，嚴禁一切藉名苛派。設法減輕地租，改善平民生活，減免戰區田賦，另籌戰時費用，並節減行政經費至最低限度。

四、調整物產，保證戰時生產品自給，活潑社會金融，逐步推行公營及管理貿易。振興民間手工業，以救濟失業，增加生產。禁絕日貨，取締奸商投機操縱。

五、健全交通組織，實行水陸聯運，並負責軍運民運，嚴禁拉夫、扣車、扣船等情事。

六、實施戰時青年及政治工作人員訓練，提高其民族意識，強化其戰鬪精神與技術，養成政治及軍事上之新幹部。

七、國民兵役之推進，當改良其方法，嚴厲懲辦藉抽繳壯丁枉法舞弊之各級人員。出征軍人家屬之瞻養與保護，傷亡將士之撫卹，地方政府應予切實執行。

八、發動並統一全省文化界救亡工作，號召文化人回鄉服務，推廣戰時民衆教育，普遍提高人民之政治認識及文化水準。

九、以國民抗日自衛軍之統一組織與領導，動員及武裝民衆，堅強人民之抗戰精神與自衛力量。

十、鞏固抗日陣線，加緊肅清漢奸，凡背叛或脫離抗日陣線者，政府得徵發或沒收其財產，佃戶對

之得不納租，債戶對之得不償債。

【政治綱領公布後的社會影響】自從這個政治綱領頒佈之後，社會耳目，爲之一新，而政府的一切設施，也依據這個綱領，逐步展開。不僅在省內起了很重大的影響和作用，即當時國家政治中心所在之武漢的各報，亦都以顯着的地位來登載，並作爲重要的問題來評論。固然這個綱領的內容，今日看來，已經是很少涉的了，但在當時，的確是一件富於刺激性的東西。因而一方面雖然博得很多人的贊同與擁護，而另一方面，却引起很多的批評。尤其是在中央，對戰時政治尚未有具體的方針決定以前，浙江以一省的地位，首先來這一套，名稱用「政治綱領」，而不用施政綱領或行政綱領的字樣，就好像有逾越職權的樣子。其實中央對這個綱領，並不覺得有什麼悖謬的地方，不過有些反對的人，喜歡這樣吹毛求疵的在旁邊指責。我會聽說，有人曾將這個綱領錄呈最高當局察閱，最高當局一條一條看完之後，說：「這並沒有什麼，祇是末尾一條：『鞏固抗日陣線，加緊肅清漢奸，凡背叛或脫離抗日陣線者，政府得徵發或沒收其財產，佃戶對之得不納租，債戶對之得不還債』，欠斟酌一些。」我在當時，祇是一心一意的按着這個綱領去實施，對於外間的批評指責，不加置理。到了四月間，中央頒布了抗戰建國綱領，以爲我們施政的最高準繩，以前單行的浙江戰時政治綱領，就等於廢棄了。但是這個政治的暗礁伏下了，仍然醞釀成以後種種的複雜問題。

【浙江省戰時政治工作隊的組織】當杭、嘉、湖淪陷，杭州放棄之後，陷區裏的學校都停辦了。那些不甘心做亡國奴做順民的教師學生，都跟着軍隊或政府撤退到後方。省立嘉興中學校長張印通，帶着數百個學生，由首先淪陷的嘉興，屢停屢進的跟着軍隊行動。我由杭州退出，在桐廬芝廬鎮附近遇見了他們，對於這些可敬愛的先生與學生，除了內心上對他們予以同情之外，因爲那時政府自身也正在行動中，尚未有妥善的安頓辦法。我到了金華，退集在那裏的知識青年，就更多了。不但是本省的，還有江

蘇的，上海的。有些是有組織的，有些是無組織的，有些是遷地復課，有些則欲找事謀生，有些已投入軍隊的政治工作隊裏去工作，有些是自己組織服務隊，從事各種宣傳與戰時服務。不僅金華如此，其他各地也多如此。我想，如果將這些青年好好組織起來，不但對於安頓的問題得到解決，同時對於抗戰工作，也有許多幫助。否則，必致流離失所，不僅釀成社會的不安，抑且有損國家的元氣，這在政府方面是不能辭卸其責任的。我於是決定以戰時政治工作隊的組織，來統一他們的行動與工作。首先到蘭谿去召集撤退到那裏的失學失業知識青年談話，將我這個意思對他們說了，他們自然都很願意加入這個新的組織。我並要各人寫一篇自傳，測驗他們的學識與意向，以資甄別取舍。二十七年一月下旬，蘭谿縣戰時政治工作隊正式成立，這便是本省政工隊的創始。接着金華、義烏、永康等縣的政工隊，也相繼成立，並逐漸推廣到其他各縣。這些青年羣中，有男有女，有的是中學生，有的是大學生，有中學教師，也有大學教授，王耘莊就是擔任過暨南大學教授的一個。多數人固因戰事影響，失學失業，而來參加這個工作。但也有很多是放棄原來優越的工作崗位，而來參加這個工作的，姚旦就是遠從香港匯豐銀行辭職，來浙江當政工隊員的一個。

〔政工隊的組織系統及其內容〕這個組織自蘭谿創始之後，發展非常迅速，二月下旬，浙江省抗日自衛委員會便陸續訂頒了四種重要的法規：（一）浙江省戰時各縣政治工作隊組織通則，（二）浙江省各縣戰時政治工作隊隊員守則，（三）浙江省各縣戰時政治工作隊工作實施綱領，（四）浙江省各縣戰時政治工作隊補充規則。從此政工隊的組織，是制度化系統化了。到了九月間，全省七十五縣，不論自由區和游擊區，普遍成立了政工隊。這個時期，縣政工隊隸屬於縣抗日自衛委員會與縣政府，由省抗衛會負責全省各縣政工隊的領導責任。（按省抗衛會由我兼主任委員，縣抗衛會由縣長兼主任委員）十月間，我為使戰時政治工作與行政密切配合，並加強其領導起見，規定各縣政工隊，直隸於縣政府，並將政

工指導的任務，由省抗衛會移轉於省政府，即在祕書處內設置戰時政工指導室，專管其事。二十八年一月起，並在各區專員公署各縣政府，分別設置政工指導室，建立政工指導的系統。我們就上面所舉的四種政工法規中，可以提出三個要點來說明政工隊的內涵：第一是民主的組織。政工隊的隊長副隊長和其他幹部，都由隊員選舉的。第二是士兵的待遇。政工隊的幹部與隊員待遇完全一樣。最初規定一律每人月支生活費十元，生活費用較低的山僻縣份，有減支八元的。二十八年以後，隨物價的上漲，隨時予以調整，以足夠維持個人最低限度的生活為標準。他們下鄉工作，僅支必需的膳宿費，不給交通費。第三是工作與教育並重。他們於工作之外，隨時舉行各種檢討會，研究會，並規定隊員按月作文一篇，繳省批改，評定優劣後，仍予發還。省抗衛會創辦週刊一種，名曰「新力」，（後來改由省政府政工室編行）指定為各縣政工隊員必讀刊物。

「政工隊的主要任務」自各縣政工隊普遍成立以後，我每到一縣，必召集這些青年開座談會，指示他們的工作，鼓勵他們的精神。在抗戰以前，一個省的行政首長，每到一縣，所接觸的都是那些老年——商會會長地方紳耆等。在抗戰以後，我就特別注重這些青年。因此便聽到很多人評論，說我看不起地方耆老，將他們置諸腦後。其實我並不是不重視老年，而是以前太不重視青年，現在不過稍加注意了一些。這樣就會引起人們的批評，這也可以說是新舊觀念的不同罷！我之所以要組織這些青年，在消極方面，固然是安撫他們，而在積極方面，却有極大的作用。因為我覺得抗戰的烽火，雖然已燃得很高，但全省兩千多萬人民，能確實知道抗戰的意義與戰局的演變的實在少數，尤其是抗戰時期國民應盡的義務，能瞭解能實踐的更為少數，必須有很多人作傳聲擴音的喇叭，才可以使這千千萬萬睡著做夢的人們清醒過來，負起他們應盡的責任。我更覺得以前政府發布的政令祇是在衙門裏而兜圈子，或是祇能到達鄉鎮公所為止，政府人民間保持着一個很大的距離。人民不但不知他應盡的義務是什麼而不能盡到，

應享的權利是什麼而不能享受到，他們在黑暗的社會裏所受的魚肉痛苦，也就無人知道。政工隊的主要任務，是要將抗戰時期政府的政令宜達到民衆的內層，使人人能自動的盡他應盡的義務，同時要將民間的黑幕揭發出來，使能享受應享的權利，而不致爲貪污豪強所魚肉。因此在政工法令裏特規定政工隊員不是公務員的身份，他是政府與人民間的橋樑，用以溝通政府與人民間的意志。

政工隊在二十七二十八這兩年內，不但數量上發展極爲迅速，（全省計七十五個縣政工隊，二個區政工隊，五個省政工隊，合計幹部及隊員三千餘人。）在工作方面亦有極良好的表現。爲鼓舞工作情緒，統一工作步驟，以提高其工作效率起見，曾舉行分區集訓及調省集訓，後方縣隊的工作，以動員民衆參加抗戰爲重心。前方縣隊及省隊則以深入陷區，展開對敵偽鬭爭，爲最高之要求。二十七年三月七日，三區戰地政工隊及省政工隊隊員十三人，由紹興瀝海所渡江至海鹽、海甯一帶，協助軍隊作戰，不幸在茶院附近（海鹽縣境）與敵搏鬥，全部殉難。這是政工隊同志對敵鬭爭最先犧牲的一批人，也是本省知識青年爲國殉難的急先鋒！從此前後繼陸續深入敵後工作因而犧牲者達七十四人（其中男同志六十一人，女同志十三人）之多，其事蹟之壯烈，實「歌可泣！哭之：本省敵後政權之維持，我後方工作之展開，得力於政工隊同志們的艱苦奮鬥不少，實爲不可磨滅的事實。但青年的幼稚病，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地方，自然會引起社會的指摘與不好的批評。而且這種緊張的工作，時間長久之後，有些因不能忍耐而離開了，有些因不能隨着時代進步，以致工作情緒與工作效率都降低了。到了二十九年夏，幹部與隊員的流動性愈大，素質日漸下降，以前那種奮發蓬勃的朝氣，已逐漸消沉下去。這時適值三民主義青年團浙江支團籌備處成立，爲統一青年組訓及其領導起見，即將後方各區縣政工隊劃隸青年團，再加統一訓練後，改組爲戰時青年服務隊，仍在各縣服務，受所在地縣長的指導，協助推行戰時政令，但數量已大爲減少。二十一年以後，游擊區各縣政工隊及省政工隊，也以敵後行政基礎業已確實建立，分別

結束。

【設置訓練團訓練青年幹部】廿六年十二月初，我在杭州接事的時候，鑑於地方政治因軍事形勢的劇變，幾瀕於崩潰的狀態，認為這之間的主要原因，便是舊的幹部不能適應新的環境，而必須加以新的訓練。同時為收容由戰區撤退下來的學校青年社會青年，並加以適當的訓練，使成為政治上軍事上的基層幹部。於是在接事後的首省府會議上，便決定設置兩個訓練團，一為戰時政治工作人員訓練團，一為戰時青年訓練團。前者以造就刻苦耐勞的戰時政治幹部為目標，受訓學員由各縣保送，並經過考試而錄取的，計五百餘人，程度較為整齊；後者的性質，以偏於消極的收容，訓練的目標，不甚鮮明具體，受訓學員計一千五百餘人，大多是浙西後退各中等學校的學生。間有若干失業的社會青年，沒有經過保送和考試，祇是簡單的甄別口試而已，故程度高下與年齡大小，相差甚大。兩團團址同在麗水壩湖鎮，均由我自兼團長；政訓團設副團長二人，由民政、教育兩廳長兼任；青訓團設副團長一人，由教育廳長兼任。統於廿七年一月間着手籌備，二月初開始訓練，採用嚴格的軍事管理，實行軍事訓練。政訓團設一個大隊，轄三中隊，其政治教官，多為省政府各廳處的高級職員兼任的。因為訓練目標比較清楚，訓練的實施亦較為順利。青訓團設一個總隊，下分三個大隊，九個中隊，及一個獨立分隊。（獨立分隊完全是女學員，軍事教官政治教官均是女同志擔任的。）其政治教官多為當時由戰區撤退之中等學校校長與教職員。因為創設之初，未明白規定訓練的性質與內容，究竟是屬於軍事，抑或屬於政治，或仍是普通的學生訓練。完畢之後，作何用途，亦未確定，因此訓練就發生困難了。在軍事幹部方面，以為這是完全軍事性質，一切皆應以軍事為主，而在政治教官方面，則以為仍是學校，不過加重軍事的管訓而已。於是兩方面就發生意見。而受訓的學生，亦各有各的志願與主張，相持不下的，幾致釀成風潮。政府為解決這個困難，並鑑於局勢又趨於安定，於是將政訓團與青訓團合併而為戰時工作訓練團，將兩團學

員，重加測驗甄別，並各就其志願，分爲區政人員、縣政服務員、鄉村建設人員、財務人員、合作金融人員、會計人員、貿易管理人員、自衛幹部人員、自衛政訓人員、電訊人員等班次，實施專業訓練，並調現任各區署各縣府秘書入團受訓，爲佐治人員班，其中電訊人員由大港頭的省抗衛總司令部的電訊訓練隊訓練，自衛幹部人員改送入武義軍事幹部訓練班訓練。七月，訓練期滿，分發各機關部隊工作，願意繼續求學的，則按其學力分別送入新設的聯立高中、聯立初中、聯立師範等校肄業。本省抗戰初期的幹部訓練工作，於是亦告結束。當澎湖訓練團開辦之後，亦有許多不明內容的人，作惡意的揣測。與政工隊同樣爲掀起政潮的原因。

【新四軍離浙的經過】自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至十七年葉、賀回粵，開始武裝衝突，而進入江西的長期戰爭，這一番悲慘的戰事，一直到廿六年七月蘆溝橋戰事爆發，朱德、周恩來等到南京來商談團結抗敵，才停止下來。但這僅是延安方面的中共主力，參加了山西各處的戰役，而閩浙邊區的局部問題，尙未有完全解決。在抗敵團結偉大號召之下，雙方都似乎要設法解決這個局部的問題。我到浙江之後，也要首先解決這個問題，才可以使後方安定，專心一致去對付敵人。這時，中央已准許東南各省邊區的中共武裝，編成部隊，到敵後去擔任游擊的工作。閩浙邊區方面，是以劉英葉裕爲首腦的，他們主要的基地，就在平陽的北港附近。雖然衝突是停止了，但彼此還是武裝對峙着。廿七年四月間，我由平陽渡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與周恩來等相晤，曾談過這個問題。我返浙之後，他們就派代表吳毓、黃昂到金華來同我接洽。我商得軍方同意，由我去解決。於是巡視溫州，到了平陽，在平陽縣政府裏再同吳毓、黃昂商定數點：一、所有他們的武裝，完全離開浙境，到蘇皖的敵後去擔任游擊的工作，並確定由浙赴皖的路線。二、他們的部隊通過時，國軍及地方團隊不予爲難，並予以補給上之方便。三、他們留在地方的家屬，政府保證其安全，但不能再有政治的活動。四、准許他們在麗水或溫州設立辦事處。這些約

定未有明文的簽訂，而祇是口頭上彼此的同意而已。他們並請我到北港去同他們的部隊說話，我因急於回來而謝絕了。

正是麥子金黃的時候，他們的部隊，由平、瑞、青、麗各縣的邊界，到了大港頭集中。這時我適在碧湖訓練團。粟裕同吳毓到來找我，商洽沿途經過的問題，並要我去同他們的部隊說話，我不能再却，而且我也想看看他們的隊伍到底是怎樣的情形。我留他們在訓練團內吃了一頓午飯，大家隨便談談，據說劉英已離開部隊，隊內事務由粟裕一個人主持。他們奉中央命令，編為新四軍底下的一個支隊，軍長是葉挺，副軍長項英，也許是因為葉挺曾在老四軍當過師長，所以才掛出新四軍的招牌來。粟裕是一個矮小的個子，說得一口江西音的普通話，使你一聽就知道他是江西人。午飯後，我同他們及許廳長一同乘車到大港頭，隊伍集合在大港頭的一個小廟旁邊的空地上，總數大約是五六百人。其中還有許多年紀很小的小孩子，武器是不完全的，各式的雜槍都有，還有許多是徒手的，執着一枝矛子。我對他們說的，無非是統一團結共同抗敵的話。在講話之前，及說完話之後，他們都報以熱烈的掌聲，並且高呼「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擁護民族統一戰線」！「擁護抗戰建國綱領」！「擁護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這是他們一貫的作風。講完話之後，我同許廳長到村裏粟裕的司令部去訪問，同時送了幾條豬肉作為慰勞的禮物。這也可算是富有歷史性的事件了。

【周恩來由桂來浙】自從浙南的中共武裝餘部離境後，過去許多足以引起地方不安的嚴重問題，暫時總算得了一個解決。大家在團結抗敵的口號之下，也確曾有過表面上的「合作」，正因為「合作」僅做到表面的程度，而新的磨擦便繼續發生起來了。他們自然有他們的主張，暗地裏安排他們自己的工作，不但是在地方上起了一種不安的心理和鬭爭的事實，就是中央方面也為此而擔憂！這時周恩來正在擔任中央政治部的副部長，特地到浙江來視察，不知是中央派他來調處這方面的問題，抑是他自己要來這

方面走走，或是有他自己的工作？那就不得而知了！

廿七年年底，我赴重慶出席中央會議，順便到香港家裏走了一趟。廿八年一月裏回到桂林，就遇到他。說是要到浙江來。於是同他由桂林乘湘桂浙贛聯運的通車回浙江。同行的還有新四軍的軍長葉挺。在衡陽停留的時候，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的教育長湯恩伯和副教育長葉劍英到來會面。以往中共似乎以游擊戰爲他們的亮牌子，所以游擊訓練班就聘十八集團軍中共部隊的參謀長葉劍英來當副教育長。此外還有一些教官是中共份子，我所知道的彭雪風也是其中之一。在衡陽中央銀行的陽台上，葉挺曾爲我們拍了很多的照片。

火車繼續東進，葉挺中途下去了，經過江西橫峯，那是中共當年佔據很久的地方。目睹荒蕪的田地，殘破的房屋，以往的遺跡，還歷歷在目，不知他們見了，心裏發生一種如何的感想呢？我同周氏同車來浙，他當時也算是中央的一個大員，我爲蠡地主之誼，自然要加以招待。他要到大港頭去參觀兵工廠，我也得陪他去，於是引起各方面非常的注意，報紙上特爲登載「黃周同車赴某地」等刺目字樣。好似黃、周的同行，是一個特別的新聞似的。我當時覺得有些可氣，現在想來，又覺得有些可笑。他在金華逗留不久，就到紹興去了。他是紹興人，據說是要回家掃墓。這也許是中國人的宗法觀念吧！那時省政府浙西行署剛在天目山成立，行署主任尙未有人，由李處長楚狂代行職務，我得親自到那邊去部署一切。我到天目山，周恩來也由紹興轉到天目山。又在那裏盤桓了好幾日。這是我第二次上天目山。第一次是抗戰前到的，但並未上西天目的最高峯金頂。這次我同周氏一同攀登，東望錢塘，煙波迷茫，西子湖若隱若顯，似含有無限之羞辱。因填滿江紅一詞以誌感。詞云：

天目重登，東望盡，之江逶迤。依稀足，六橋疎柳，微波西子。寂寞三潭深夜月，岳墳遙下精忠淚。卅年來守土負初心，生猶死。收失地，從茲始。越勾踐，應師事。願勿亡訓聚，膽薪滋味。

逸像有傷家國運，辛勞勤把我行治。枕長戈，午夜警鷄鳴，扶桑指。

在天目山，就與周氏分別了，他怎樣的回去，我也記不清楚了。我回到金華，中央曾有電報問我周恩來商談的經過。其實我並未奉到明令與他作正式的商談，而簽訂了甚麼彼此同意的字據。僅是私人交換意見，或解決一些問題。口頭上決定的有三點：一、由他指定一個代表人，遇有問題發生時，可同他商量解決。（當時他指定的代表就是吳贛）二、中共份子參加地方政治工作的人員，祇是在本身工作上努力，不能發展組織上的關係。（我要他將在浙江從事政治工作的中共份子名單開給我，他不肯答應。）三、中共在我後的地方，不許發展武裝組織。消幾點口頭的約定，固然知道不會發生很大或很久的效果，但在當時也祇好如此，因為不是簽訂甚麼合同與條約啊！

【中共武裝侵入浙江及其發展的概略】自從延安方面的十大綱領發表之後，中共份子顯然是照着他們的主張積極從事宣傳和行動，問題就一日一日的嚴重起來。由廿九年而三十年。漸漸地達到很尖銳程度了，但這時候他們的組織還是潛伏的，秘密的，未能公開的發展。就是淪陷數年的杭、嘉、湖一帶，直到三十年的上半年，它的武裝力量，尚不能侵入。這就因為那個淪陷區我們的工作人員及武裝力量相當堅強的原故。中共在浙境最先建立武裝的地方是浙東的三北（即姚北、慈北、鎮北）地區。這些地方，於三十年夏間淪陷以後，自然有許多游擊部隊乘機興起，薛天白的松滬游擊支隊，就由浦東方面轉移到「三北」。他在松滬的時候，雖然是受某軍的名義，但是祇是一個名義而已。到了「三北」，又接受另一軍的收編。他得到了掩護之後，就積極的擴充勢力，並逐漸暴露他的真面目。地方黨政機關，雖很明顯知道他的陰謀，但格於情勢，無法制止。三十一年敵人在浙贛的大舉進攻，我軍事力量後移，浙東問題更兼顧不到，以致任其坐大，得寸進尺，甚至公開的襲擊我縣政府及自衛武力，更把他的真面目，完全透露出來。他們的領導者何靜，是延安方面派來的。三十二年年底，中共的武裝，開始由蘇南

侵入長興邊界上的硯山，他的口號是「三山一湖」，即是要佔領黃山、茅山、天目山和太湖地區。三十年冬，向長興、安吉、孝豐進犯，并續陷臨安，追新登，欲渡過富春江，與浙東敵連成一起。他的口號是「打通浙東浙西的走廊」。由蘇南過來的中共部隊，是葉裕率領的「新四軍第六師」（新四軍這個番號中央已於三十年一月明令撤銷）。粟裕是二十七年和平的離開浙江，他現在要武裝的回來了，前後相隔是整整的七年，上面所述，是這七年中演變的經過概略。

「中共陰謀種種」我最近看到一張葉裕發的布告，一則說：「要在敵後建立抗敵政權」。再則說：「要團結抗戰」，我看了不禁啞然失笑。在本省敵後，我們的政權，始終屹立未動，天天在那裏打聲敵僞，無須他們再去建立。而他們的槍口不朝「敵後」，反指向「我後」來了，孝豐、臨安都是沒有敵蹤的地方呵！他們到處破壞行政，篡奪政權，并襲擊地方團隊，攻擊國軍。行動如此，而偏偏要高談「抗戰團結」的廢話，真是滑天下的大稽！中央素本相忍爲國之旨，不願將這種事實公布，最近（三十四年五月）本黨六屆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仍希望就政治途徑，免取和平解決。可是中共不知悔改，仍一意孤行。我就地方的立場和責任，特於五月廿五日，對於此事向報館記者發表談話，宣布中共在浙武裝活動的真相，和表明我們應有的態度，因爲中共部隊在浙境明目張膽的攻城略地，已不是局部的問題，而是有計劃有組織的政治陰謀。不能不使地方人民一致了解其真相，以免受其利用，擾亂地方的秩序，破壞國家的統一。中共煽惑人民，從事破壞行動，每以政府爲應付戰爭而必需之敵，如徵兵、徵實、募債等爲藉口，而尤慣於挑發戰時政治設施之漏洞，以爲攻擊政府離開人民之工具，實則中共雖善以小恩小惠爲釣餌，欺騙民衆，要其最後目的，不過在籠絡人心而已。如果民衆一旦隨其轍中，他們的態度，即隨而改變，掠奪、壓迫、驅逐，幾無所不用其極。我最近巡視浙西途中，有許多自孝豐等地逃出來的人說：中共於掌握地方權力後，征兵則一甲一丁，於是壯年男子皆成爲彼等之部卒。徵課則多方巧取豪奪

，於是民間之倉廩，皆顆粒無存。我政府八年來從事艱難困苦之戰爭，所需民間人力、物力、財力之供應，自必甚夥。又以戰爭情勢之緊張，需要程度之迫急。故不論征兵、征糧、募債，辦理之際，不免有若干弊病發生，自屬無可諱言。彼輩因得以搜索瑕疵，作為攻擊的資料，可是我們決不能因此而放棄國家政令的推行。我們一面仍應力求政令的貫徹，另一方面當努力改善行政的方法，而尤須力矯行政人員一切違法亂紀的行動。我之所以定今年為法紀年，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我以為國內的政治鬭爭，固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很平常的事。如果隱諱不說，不但於事無補，或反增加事態的嚴重性。我的聲明，並不妨礙中央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的決策，甚或於政治解決有所補益。我敘述這事的經過和事實，並沒有一些架空捏造，不但想使各方得到一個真相和諒解，就在中共方面，我也想得到他一個自反與批評，使大家都本着政治鬭爭的公式，而得到政治上合理的解決。

〔省政府與省黨部的關係〕在省境內與省政府同級的機關，可分為黨務、軍事、民意、司法四種。系統雖是各別，而關係却非常密切。先就黨務機關來說，與省政府同級的是省黨部。中國目前是在「以黨治國」的時期，國家一切的政綱政策，都是由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決定，再透過各級政府，分別執行。省政府一切的行政措施，皆秉承中央的政策與法令辦理，與同級的省黨部，似乎不發生什麼直接的關係。而中央對於省政府與省黨部的關係，亦未嘗有明文的规定，縣黨部與縣政府的關係亦是如此。因此省縣各級的黨政關係，就僅在黨政合作的口號之下，而各自進行各別的工作。所謂各別，其實尚有許多相關而不能分清或尚未分清的地方。合作是基於兩方面的，假使有一方發生了意見，便不能合作而終於發生黨政磨擦與衝突的問題。抗戰以來，中央因為要加強各省的黨政合作，很多的省份，因為合作容易發生問題，甚至進一步而為黨政的合一，即是省政府主席兼任省黨部的主任委員，使黨政同在一個人主持之下，而得到更密切的合作。但是實行黨政合一的省份，到底得了什麼良好的成績，還不能有明確的

比較。浙江省黨政關係，在我前後將近十年的期間內，彼此都是客客氣氣的，從來就沒有發生大的磨擦與衝突，但小的問題則也所難免，尤其在縣級。抗戰八年來，有些省份，雖然是實行黨政合一的辦法，而浙江却仍舊維持過去的樣子，而在黨政工作的表現方面來看，却並不見得比實行黨政合一的差得多。且我個人的見解，中央的黨政關係，是一個表與裏的作用，國民政府是表，中央黨部是裏。表面的一切表現，都是由裏面決定的。地方的黨政關係，是一體的兩個面，兩個面雖然在一體上，但中間總必須保持着若干的距離，才能發生兩面的效用。若果中間的距離，完全沒有了，即是等於一面，就沒有兩面的作用，也即違反進步的原理。我認爲一個人要擔任兩面的工作，不但是件難事，而且是件苦事。在個人打算，何苦去討這些苦難來吃？不過這是我未曾嘗過這種苦難的想法，不知道那些過來人，又是如何的想法呢？上面說過，浙江的黨政關係，一向都是客客氣氣的。也就是說，有關黨的事務，政府尊重黨部，有關行政的事務，黨部尊重政府。彼此間不是沒有問題發生，而是有問題發生的時候，彼此照着上面的原則來商量，自然可以得到一個結果。不過我覺得這種相處的辦法，還嫌於消極了一點。

省黨部的實行主任委員制，是抗戰以後黨的組織上的改變，主任委員居於執監委員之上，是由中央命令派任的。浙江第一任主任委員是谷正綱，第二任是李敬齋，第三任是吳挹峯，第四任是羅霞天。這個改變，也許是中央感到委員制在戰時有些不合宜的原故。中央復規定省黨部主任委員須出席省政府會議，想來是爲的加強黨政的聯繫。但本省歷任的主任委員，在會議席上仍舊是客客氣氣，沒有積極的提出行政上的意見。彼此間重要的問題，還是在會外商量。

【省政府與同級的軍事機關的關係】省境內與省政府同級的軍事機關，有戰時的指揮機關，與平时的行政機關。戰時的指揮機關多沒有經常性的，此外還有臨時到來的作戰部隊。在「軍事第一」的口號之下，省政府對軍政的合作，軍民合作的要求，特別加強。那合作的事實，在另一篇已有比較詳細的敘述

，這是不必費詞。而在合作的理論上，我仍認為應是雙方的同意，而不是單方面的要求。以前中央曾經頒佈過軍民合作公約，所謂公約，自然是大家同意的東西，而且是要大家一致遵守實行的。可是大家對於公約的意義，因為時間久了，而漸漸的模糊了。有好多的問題，漸漸變為單方的要求，而不是雙方的合作了。此時見男女戀愛與強姦來作比方，戀愛是合作，強姦是單方面的要求。戀愛與強姦，實是沒有什麼分別，而祇是形式上的差別，強姦會使雙方的精神上受到非常的痛苦，而且成為一個犯法的行為。在浙江軍政軍民的合作，還算是好的。但這是比較的問題。長久同處在一個地方，彼此輒論如何的努力，有時也會感到不十分滿意的。恐怕以後還得在形式上方法上加以改善，使雙方更加愉快一些。

平時的軍事行政機關，有全省保安司令部、軍管區司令部、防空司令部。這三個軍事機關的首長，規定均由省政府主席兼任的。也因為它與省政府及行政方面的關係太密切了，雖然表面上是平行的關係，而實質上却好似有些隸屬的關係。像這種關係的軍事機關，雖然由政府主席兼任首長，在形式方面是聯繫得很密切的，但實際上仍有相當隔閡的地方。因為長官雖然是一人，機關仍是各自獨立的。一個人精力究屬有限，尤其是在戰時，各機關不能集中在一處辦公，那裏能處處照料得到？所以兼職的結果，並不見得加強了行政的統一與效能。往往一件公事，仍舊往來的簽商，有時彼此意見相左，亦不免在紙面上打筆墨官司。彼此行文都是用某人的名義，而竟有矛盾衝突之處，豈不可笑？所以照我十數年來的經驗，如果認為某一種業務，有它的獨立性，則不如乾脆獨立，直屬於中央。在民十四年以前，各省省長兼兼司法監督，但並不見得司法在行政首長監督的時期，就有什麼好處。現在司法完全獨立了，也並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某種業務與省政府的一般行政有密切關係，決難分開，也就乾脆隸屬於省政府之下，與其他各廳處同等的為構成省政府組織的一個單位，由專任的首長——廳長或司令來負責任，使責任分明，功過易見。省政府主席不必再簽什麼名義，而有統率各部門業

務的實權。這樣行政的統一與效能，一定要比以前同級並行而兼職時好得多。我這意見不是今日才有的，二十八年參加中央全會的時候，我會有過建議，呈給蔣先生，並在最高國防委員會通過，而未銘見諸實施。這個建議的要點：是在省政府之下增加一個軍事廳，廳長之下設保安、防空、兵役等處，或是將這三個處同隸於省政府，另加設一個參謀長來贊襄省主席對於軍事方面的設施，他的地位與秘書長相同，不過一個佐理普通行政事務，一個佐理軍事行政事務而已。現在我仍舊是這樣的主張，并希望我的主張能實現。

【省政府與省臨時參議會】浙江的民意機關——省議會——自民國十六年以後，就中斷了。抗戰開始，中央為發揚民意勤求民隱並集思廣益起見，於二十七年成立國民參政會。這好像是有代替因戰事而不能召集的國民大會的意思。各省臨時參議會亦繼國民參政會之後而陸續成立了。浙江的省臨時參議會是在廿八年一月成立的。議長副議長由中央就參議員中指派，參議員則是由省黨政雙方會同推選加倍人數，報請中央圈定。因為現在一時尚不能由選民直接選舉，所以採用這種過渡的辦法，這也就是「臨時」的意思。參議會的秘書長是中央簡派的，他沒有參議員的身份，而好像是政府派在民意機關服務的職員。本省臨時參議會第一屆的議長是徐青甫，副議長陳紀懷；第二屆的議長是陳紀懷，副議長是沈綱來；後來陳紀懷因病回缺，故派朱獻文擔任。臨時參議會參議員本來是一年一選的，但是成立到現在已有七年，僅僅改選過一次。這固然是因為選舉的實際上有困難，而因選舉會引起許多問題亦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所以第一屆參議員的任期延長了二年，而第二屆參議員的任期更是一再的延長，希望展延到各縣能直接選舉參議員，成立省參議會的那個時候。這不僅浙江如此，其他各省市也多有同樣的情形。

在省臨時參議會初成立的時候，政方與會方在神經上似乎都不免有些過度的敏感，但是後來這種敏感就漸漸消失了。這也許是因為在戰時有許多問題，都失了常態，不是經常的辦法可能解決的，彼此就

相忍相讓的敷衍下來。政府遇了許多實際困難的問題，我祇是坦白的承認或陳述。參議員都是地方上的領導人士，對於地方情形自然熟悉，所以好多問題，祇是在彼此間獲得一個諒解，而並不是問題得到了真正的解決。我嘗感到我們負責行政的人員，對於民主精神的修養是太不夠了，人家多說幾句話，就覺得難爲情，甚至弄成意氣，釀成風潮，而缺乏接受與辯論的勇氣。自然對方亦不免有同樣的缺點。自從中央財政收支系統改變之後，省政府的地位，在實質方面好似已不復存在，因而有人懷疑到省參議會是否仍有存在之可能。因爲省參議會的對象是省政府，如果省政府的地位或實質消失時，它的地位自然也隨着發生問題。直到卅三年十二月中央公佈了省參議會組織條例，這種懷疑才算沒有了。

〔省政府與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是省內最高的司法機關，司法獨立是現代國家的通例。但是我記得民十以前，省的司法是受省的行政首長監督的，其他各省是否如此，我不盡知道，至少廣西是這樣的。大約是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才完全獨立。並又規定高等法院院長出席省政府委員會，這無非是使行政與司法保持密切的聯繫，也就是由行政首長監督司法這個制度演變下來的形式。我想這種形式，至少任以前是有此需要，以後有無保留的必要，又是另外一個問題。浙江高等法院鄭院長烈蓀是浙江司法界任事最長久的人物，他自民國十七年就任高等法院院長一直到現在。他一向是出席省政府委員會的，也可以說，他是出席省府會議歷史最長久的一人，他好像是省府長期的義務法律顧問似的。所以浙江的行政和司法兩者之間所發生的問題雖少，而行政方面得到司法首長的益處則不少。

我國現行的民刑法律，起草的時候，大多是以泰西各先進的法治國家的現行法典爲藍本。而現在我國尙在建國時期，情形特殊，好多地方是行不通，或不能適應需要，於是就制定了許多特種的法律來補救它。同時又產生了執行此項特種法律的機關——軍法機關。所謂軍法，並不是單獨懲治有軍人身份的法律，而尙包含了：中華民國戰時軍律，軍機防護法，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懲治漢奸條例，懲治盜匪

條例，禁烟禁毒治罪暫行條例，懲治貪污條例，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等。尤其在戰時這種罪犯非常之多，所以抗戰以後，軍法機關的組織，也成為全省普遍性的了。行政首長皆兼軍法官，或是省內最後的裁判者，這樣行政首長職權加重，自易滋生物議。我在前幾年就同司法界的人士談過，我認為廢除特種法律，一時是不可能的，甚至有延長相當時期的必要。但是廢除執行特種法律的機關，是可以的。就是將這些特種的案件，由法院裏面加設一個特種法庭來審理。但是司法界的人士，以為普通法院，僅能辦普通法律的案件，特種的法律案件，不宜加入他們責任之內。好了，中央於三十三年一月公佈了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規定有關特種刑事案件，除軍人為被告者外，均由司法機關審理，這個條例已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實施，這正同我以前的意見完全一樣。

在人民法律知識尚未普及的社會中，行政官吏的被控，一定是很多的。如果每次都要傳他去審訊，即使他的罪案不成立，而對於工作的時間上與政府的威信上，都要受到很大的影響，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還未得到妥善的解決。據我的意見，如果是關於公務執行上面發生控案，在某一級的政府，可以指定一個律師或代表人去出庭答辯，不必要行政首長親自到庭，則司法與行政雙方都可以顧到，但這僅是限於罪案未成立的初次審訊。如果罪證確實，或者其罪行是由其本人負責，而與公務不相關的，當然不在此例。大多數行政首長，都以出庭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也有有人主張親自出庭的。前衢縣縣長梁濟康，他以為縣長如果親自出庭，則案件一定容易剖白，而且可以使控告者心理上有所戒懼，并可減少謠言的發生，這也未嘗沒有相當的見地。

【幾次政治上的暗潮】政治上的暗潮，隨處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恐怕再沒有比戰時的浙江發生得這樣離奇了。我第二次來浙江，是廿六年的十二月。自從省政府由杭州撤退之後，在廿七年二月間，公佈了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並從事青年的組織與訓練，團隊的擴編，希望發動全民的力量，來保護這殘餘的

省境。政府同人都是終日不停的在工作，決想不到會引起什麼政治上的風潮。二十七年六月間，忽然接到中央方面的電報，說本任政府聲名狼籍，要我切實注意。我接到這個電報，憤慨極了！因為我從政十幾年，從來就未受過這樣嚴重的責備口氣。中央的責備既是這樣嚴重，自然一定是在私的方面或公的方面有什麼重大的罪過。但是我自己檢討，到任僅有半年，所做的又僅僅是上面那幾件事，而且剛剛開始，尚談不到任何的好壞。在抗戰的頭半年裏，即使平日是個壞人，因為受到國家民族意識偉大的驅使，到那時候也要學學好。我自問並且檢討我們省府的同仁，都不致如此，那自然是另外的作用了。我將這個電報提出府會報告，大家都覺得有些奇異與難過，主張全體向中央辭職。我則以為這個責任，應由我個人擔負，即由個人去電辭職。而得到的回電，却是慰留。內中有句：「耳有所聞，乃以之告」。像是並沒有譴責的意思。那一下冷一下暖的電文，弄得我啼笑皆非。我再去電請准到武昌面陳衷曲，並蒙允許了。我由金華坐汽車經南昌、長沙到武昌，作了上千公里新路線的長途旅行。在武昌曾見蔣先生，我仍舊將辭意陳述解釋，但仍是慰留。有一日，我到東湖（武昌城東的一個大湖）武漢療養院去訪問李任潮先生，碰到院長米勒（美國人），他是我在湖北任內就認識的。那時他剛由上海來武昌籌建武漢療養院。他說建築經費大部份是張漢卿捐助的，不足之數，要到美國或在我國內地設法，要我幫他的忙。因為武昌是我管轄的地方。經過一年多的工夫，這個療養院的建築完成了，其中的設備也很完善。李任潮就住在那公療養。我順便請他檢驗身體，據說血壓高了許多，但並不是生理上的變化，而是精神過度的緊張，或是受了刺激的原故，能夠休養一些時間就好了。他歡迎我到院裏住住，我也很有這個意思。

東湖是武昌的新風景區，有清潔而幽靜的湖水，武漢大學的西藏喇嘛廟式建築與武漢療養院的美國式建築兩岸對峙着，更增加它的美麗。沿湖已有很多富商大賈邀官貴人在那裏買地皮，建房屋。在湖北人的眼光中，將來的東湖要比現在浙江的西湖為好，它已把「東施效顰」那句成語，轉變為正面的形容

詞了。

不久，李德鄰亦因病由前方回來住在那裏，白劍生有時來住住玩玩。那時正是武漢的夏天，熱得可怕。我們終日乘小艇去乘涼，或是到湖水裏游泳，心裏頗爲暢快，幾不知前方的炮火聲，和日夜的空襲，反覺得增加了不少旁觀的興趣。有一日，陳辭修部長到來看我。他笑說：「我來趕你們出院，你們幾個廣西佬住在一起，外面滋生很多閒話，聽起來有些刺耳。」的確，我們也接到香港方面的電報，有人造我們的謠言。因爲李任潮閒着沒事，我是呈請辭職，李德鄰也許有人懷疑他是政治病。不久以前，我同陳辭修兄還閒話起這段趣事。他問我：「你也把它寫入五十回憶裏面麼？」我說：「也寫進去了，這也是值得回憶的笑話呀！」大家哈哈大笑。

我的妻子蔡鳳珍，也由金華趕到武漢來，我本有電報給她，說我是不日就要回去的，但是耽擱的時候太久了，那方面的謠言很多，都是說我不再回浙江了。她在金華便住得不安，而自動的離開。我因辭職不准，終於要回到浙江來。但是我爲便以後辦事容易起見，把在浙江里辦的事與應該解決的問題，作了一個節略，呈請蔣先生核批，大多數的要求都批准了。其中也有加指示或限制的，我自然是一一照辦。這次風潮總算平息了，而民政廳長王先強却因而去職了，繼任的具阮毅成。

事後，我才明白這次的風潮發生的原因，在表面上是爲了我宣布那十條浙江戰時政治綱領與組訓青年的問題。而骨子裏，則因有有些人見我太不顧一切的猛進，並與共產黨的幾個人太接近了，除了政工隊收容若干中共分子之外，還有我在三月間出席本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曾訪問周恩來。因爲我會任山西同他們一起作戰過，我想知道些山西方面的情形。又有一次任李任潮的寓所會見了陳紹禹、秦邦憲、周恩來、葉劍英等。李德鄰、白劍生也在座。此外，還有好多人。這次偶然的會見，好似事前約好了的樣子。在那全國統一團結的口號叫得震天價響的時候，同他們會面談話，本來是很平常的事，而

他們的行動是時時有人注意的。因此我們的行動也被注意了。我想：許多謠言就從這裏發生出來的：與王先強有什麼相干？

我回到金華，工作仍照常進行，尤其是兵工與編練自衛團隊，是更加積極了。在軍方也希望地方多有一些武力來補助他們的不足。因為那時候，駐在浙江的國軍，僅有幾個師。在浙東的前哨，除了甯波駐有國軍之外，其餘的防務，自錢塘江南岸以迄平陽的沿海，都是地方團隊擔任的。所以每處的兵力，都少得可憐，裝備和訓練更談不上。往往一個部隊才編成，就要調到前方使用了。而我呢，僅是負建立團隊的責任，作戰指揮，都是由軍方主持的。設廠製造兵器，和編練團隊，在地方人士直覺的眼光看起來，是浪費財力，增加地方負擔。而在另一方面的想法，更容易引起惡意的誤會——造成私人武力，破壞中央法令。

廿九年春天，杭州的敵人乘着漫天大雪，我方部隊戒備疏忽的時候，偷渡錢江，進襲南岸，佔領蕭山附近的橋頭堡陣地，而擔任守備錢江南岸的部隊，正是抗敵自衛團的第五支隊，僅有一團的兵力，而且後方也沒有支援的部隊。不要說是地方部隊無法守住一個敵人必攻的要點，就是更多一些有力的正規軍，也未必就能守得住。不然的話，我們何必撤出杭州，退至金華？這並不是我為地方團隊譏卸作戰的責任，而是在整個戰局中，都是一樣的情形。作戰的責任，自有軍事指揮長官。要事後檢討，而判給部隊長以應得之懲罰，在我個人自不能負這個責任。

同年五月間，省臨時參議會開會的時候，蕭山失守的責任問題，就成為那次會議的中心目標。好多人對此向我提出嚴重的質問。我除了答復他們所問的團隊數目經費數字之外，對於戰事失利的責任問題，我不好說什麼，希望他們在實際上得到瞭解。因為我如果辯論起來，要暴露我們整個軍事上的弱點，同時還要弄得各方面不能和諧。「蕭山事變」是當時本省新聞上的一個大題材。而失陷者僅是錢江南岸

橋頭堡，南至湄池，東至廣安橋的一個三角地區。這要名之曰「事變」，作為軍事上一件大事來看，那麼杭州之失守，又叫做什麼呢？若果作為政治上的問題看，就可大可小了！據我所知，有人很想利用這個題材，作為有組織的政治暗潮，我也知道政治暗潮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既負了政治的責任，也想法將一個波浪消滅，使它不致繼續演變下去，使國家和地方不致遭遇無謂的損害。在廿九年年底，我就將本省的團隊改編為四個師，由國軍來接收指揮。三十一年又將兵工廠交由中央接收。這些次等裝備的部隊，及次等設備的工廠，能否增加一些國防的力量，抑或是徒然增加了國家的負擔，這又是另一個問題。

三十年夏天，浙贛路的戰事發生，敵人攻佔紹興，諸暨而到達義烏的蘇溪。金華雖未有敵人到達，但是已經非常的危險了。戰事平定之後，有些人就以政治不能配合軍事為題目，而大做其文章。好像一切的失敗，都要地方政府去負責。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就在這種濤浪之下，而受到了「文武同科」的刑罰。實在他並不負有指揮作戰和防守警備的責任，（警備司令另有人負責同駐紹興城）而僅是一個行政督察專員。有人說：「他在紹興被佔領的那上半夜，還在戲院裏聽戲。」聽戲或者是的確的，不能成為他責任上的罪，又是另一個問題。的確，我於紹興淪陷前三日，才離開紹興。我在那裏，也曾經看過某軍的「八六劇團」所排演的「排色網」，你想，軍方向好整以暇的在那裏演戲，行政人員自然可以放膽的去看看戲。我這種說法，並不是贊成前方毫無戒備的演戲，而是借此說明軍政的責任問題。三十一年敵人的大流竄，受災的地方更大了。事後對於行政方面的責難也很多。我也很坦白承認軍事上的失敗，基於政治的因素很多，尤其是任戰時行政上的缺點到處都有。但這是兩方面的，若果單純責備一方面，未免失之公平。我曾為此而引咎辭職，未獲邀准。我想：若彼此都能嚴於責己，必能化怨懟為祥和，一定可以增加彼此間的諒解，所以三十一年之後，行政方面日漸得各方面的諒解。我當時去意甚堅，曾填有

一首騷陵王詞，傾吐我的抑鬱。詞云：

歸鞭直，東望錢塘江碧。古越地，淪陷年年，西子湖山怎顏色？忠誠用報國，早識一官非客。疚心處，建樹無從，江水綿綿愧千尺。頻年按巡跡，記踏徧憂區，寢未安席，幾曾杯酒尋歡食。晴溪冷淥路，流亡載道，何人宵寐有館驛？骨肉隔南北。惻惻，別離積，願浙水澄清，風鶴聲寂，遠望得慰渾無極！任桂嶺樵採，牧牛橫笛。滿腔熱緒，化萬點夜雨滴。

有人以為這人年來的政潮起伏，由於我想把一個省的行政當一個國家來做。有些國家尚未公佈或尚未進行的政策和政令，在省的範圍之內，就不應該先中央而進行的。比如浙江戰時政治綱領，雖然內容與抗戰建國綱領沒有多大的差別，但浙江先行頒布，就會引起很多的誤會。走路打先鋒的人，一定容易碰壁或傾跌，這道理是容易明白的。但是我想這是我一向的作風，有好多地方，即使我受了挫折，後來者還是可以得到成功。政治上的浪潮，總是有的，未必因為去了這些原因，就永遠不會發生政潮。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中央及戰區與鄰省間的政治問題」以上所述，多為省內的政治問題，而中央及戰區與省之間的種種政治問題，就我親自經歷的，也附帶陳述一下：

廿七年四月，本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我前往參加，到了武漢，想去看看汪精衛，先打一個電話給汪公館，接電話的是陳璧君，她問我到山西去作戰的情形怎樣？並且說：「如果打了勝仗，我好送花籃。」我說：「自然囉，是打了敗仗回來的囉！」我聽了她的話，真有些莫明其妙，也許因為我在南京將要出發的時候，她們曾在陵園的公館內為我饒行，並且送我一副望遠鏡。我打了敗仗回來，她自然早已知道，現在拿這些話來奚落我，如果我到她那邊去，也沒有好話說，因此就不去了。從此我就沒有再和汪公館接過話，這次臨全大會，有兩大收穫：第一是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確定抗戰建國的嚴密政策。

這個綱領固然是本黨革命建國史上劃時代的重要文獻，亦爲全國一致擁護與共同努力的明確指標。第二屆修改黨的總章，重建的綱領，蔣先生夜全聽出席人員一致選舉爲總裁，汪先生也被舉爲副總裁。選舉完畢之後，蔣先生及汪先生都出來致詞。汪穿了一件藍色的紡綢長衫，一條白褲，和一雙便鞋，樣子非常瀟灑，面部表情非常沉悶，充分表示其內心的痛苦！他祇說了一句話：「此後當追隨蔣先生與大家共同努力！」就退下去了。我覺得非常奇怪，汪氏一向動人的風度，今天忽然完全失去，而變成這個樣子了，不知他內心發生什麼感觸。同時我又想到自總理逝世之後，汪在黨內，一向不以第二人自居，是不易和這事有關係呢？等到二十八年十二月，他逃到河內，發表背叛黨國的通電，才知道臨全大會惡果難逃一件事，便是最大的伏因。

二十八年春天，我同顧長官墨三、熊主席天翼等正在南昌集會，蔣先生忽然到來了，我們事前並未知道，當時對於軍事政治均有所指示。有一天早上，我同熊天翼隨他散步到勵志社休息，趁便把浙江一年來工作情形，向他報告，大部份是表示首肯，有的還加以指正，最後我對於抗戰建國這個大問題提出了一些意見。我說：「中國的抗戰，一時既未得到國際實力的援助，惟有盡我們的全力與敵人周旋，使敵人能年漸而退。然後再休養生息，澈底整頓，把國家重新建立起來。若果單憑我們自己的力量，想把敵人完全擊敗，恐怕是不可能的！」他對於我所說「知難而退」那句話，非常注意，並且問我：「知難而退，有我們，在敵人，是如何的限度？」我不能作具體的答復。而他却很明確的指示，使我們知道在那個環境之下，我們在軍事上政治上的目的及其努力的方針。自然現在的情形和那時是完全不同了。二十九年我到重慶去開會，隨處可以聽到不滿政治現狀的言論，不但社會上如此，即黨政內部，也是如此。有一天，蔣先生請各省主席吃飯，他問對於政治上的意見。我說：「民衆的意識多少是自動的，這七年來，因爲抗戰的關係，國家所要求於人民者太重太多，他們積悶在心，稍有機會，即求發洩

。這種發洩是無軌道的，無理由的，若果有人從中利用，則可釀成很大的風潮。舉一個例：浙江的平陽縣對於征兵征糧及推行各種政令，成績都算最優等的，因為如此，無知的老百姓，就被人利用，在短時間裏聚集了好多人，以抗兵抗糧爲口號，而實行軌外的暴動。國內類此的問題很多，都得善爲處理，然後政治才能安定，否則亦可因此而成爲更大的橫決。」他對於我的意見，頗以爲然。

在一個戰區裏，或省與省之間，這些政治問題也很多，都得去奔走疏通。因為有許多涉及戰區各省的政治問題，不是中央的法令所能解決的。尤其是軍方與政方的立場和看法，不免有不同之點，容易發生糾紛。以前本戰區最高軍事機關設在皖南，就得時常到那邊去走走。其實見了面，也沒有很多的問題。因為中國向來注重公文書，在公文來往上，往往爲了一個字或一句話的欠斟酌，生出許多無謂的枝節，這都是承辦人員沒有了解主官意旨所發生的毛病，如果雙方主官見了面，則事事都易解決了。在屯溪，我們時常愛到上官紀青（雲相）總司令的小房子裏盤桓。那裏有很多合抱不交的大樹，陰涼得可愛！我問他：「在這童山濯濯的地方，爲什麼還能夠留存這許多大樹？」他反問我：「這是什麼樹？」我說：「不知道。」他說：「這叫樺樹，這叫櫟樹，古人說『樺櫟庸材』，就是指沒有用的意思。這種樹既不能作建築材料，又不能作燃料，就是因爲沒有用，才能保留下來，不然早就被人砍光了。」我聽了他的話，悻然澈悟中國黃老學說之所以盛行的緣故。消極的人生觀，固然是明哲保身的好辦法，然而畢竟不是值得提倡的民族精神啊！

省與省之間，數年來最苦的莫過於糧食封鎖，與邊區治安這兩個問題。浙江是缺糧的省份，自然希望餘糧的隣省糧食的開放。但雖有中央的明令及我們人民的請求，都不易達到目的。原因是隣省雖有餘糧，但他們要存儲備荒，而且怕糧食外運以後，會刺激本地糧價的高漲。縱然省方已交涉好了，縣裏仍舊封鎖，並且用人民團體的名義來抵擋，所以弄得一方面快要餓死人，而另一方面的米却沒人要。龍泉

的米價比浦城高出三倍，可是除了龍泉人遷移就食之外，就不易吃到便宜的浦城米。所謂刺激糧價，自然是一個說法，但這是辦公文和沒有糧食生產者的話，而大多數的農民，何嘗不想他的生產品多賣幾個錢呢？邊區治安，向來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原因是相鄰的各省政府，對其邊區，均有鞭長莫及的情形。亦可以說是彼此都有不十分負責的情形。所以一旦發生了治安問題，就要在邊區專設一個機構來負綏靖之責。其實這種機構，能否達成任務，亦很難說。我以為這完全是相鄰各省治安當局的責任問題，中央如果責成雙方切實負責，自可協同解決。若是另設機構，專管其事，不僅浪費公帑，於事無補，而且重床疊架，愈增糾紛，也是不合理的事情。這些省際間的政治問題，隨時隨處都會發生，這裏不過略舉幾個例子而已。

廿二 戰時行政舉要

「兩個三年計劃」「戰時應作平時看，平時應作戰時的準備。」這是 蔣先生自抗戰軍興以來屢經語誡全國軍民的兩句名言。這次民族自衛的對日抗戰開始時，我們就預測到不是三年五年可能結束的。廿七年中央頒布抗戰建國綱領，詔示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雙重任務。廿八年頒布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揭櫫「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三大目標，基此所述，我們的工作不僅要配合軍事需要，爭取最後勝利，並且要積極從事軍事性的各級建設，俾在長期抗戰中奠定建國的基礎。同時又鑒於抗戰以來地方政治表現的一般缺點，為臨時應付者多，而有整個計劃者少，馴至任何事情，祇為消極的被動的措置，鮮作積極的主動的籌劃，以致事業進度迂緩，工作效率低微。因此我於廿八年十一月，召開全省專員縣長會議時，特提出「制定浙江省三年施政計劃」一案。計劃的內容，包涵轉移社會風氣之精神部份與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等之實際設施部份兩大體系，並以（一）民主精神之培養，（二）民生主義之實施，（三）攻勢政治之展開，為政治總動向上必須遵守之原則。俾以新的政治，轉移社會的風氣，以新的社會風氣促進政治的成功，根據這些方針，制定綱領十二條，以為確定計劃的準則。茲將這十二條綱領附錄於左：

（一）以建設浙東，收復浙西，完成抗戰建國之各項基本工作，實現三民主義之新浙江，為本省三年施政計劃之總目標。

（二）轉移社會風氣，創造新的政治環境，強化人民之國家民族意識，使共同瞭解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真義，為完成三年計劃之基本精神。

(三) 根據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之原則，一切政策措施，以配合軍事需要為主；同時運用民主方式，力求意志之集中；運用科學方法，力求力量之集中。

(四) 從人民之日常生活上，加以科學經濟之指導與管制，使養成衛生科學知識，以保育民族之健康，破除迷信倚賴觀念，提高創造奮鬥精神，實踐戰時生活，以適合於現代之生存競爭。

(五) 政治建設，以實施縣各級組織綱要，完成地方自治，實現民權主義為中心；首謀基層政治機構之充實與各級民意機關之健全，在三年期內，政府須克盡訓政責任，以樹立憲政規模。

(六) 經濟建設，以發展國民經濟，實現民生主義為依歸；首先完成本省自給自足之目的，以準備長期抗戰之需要，一面積極採用政府管理統制辦法，完成國家資本之創造，以謀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之實現。

(七) 軍事建設，以完成徵兵，自衛充實國防為目的；以提倡社會尚武奮鬥精神，促進軍民切實合作與完成國民兵組訓，為基礎工作。

(八) 教育文化之建設，以掃除文盲，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為中心，並針對社會政治經濟軍事之各項需要，力求普遍發展與一般水準之提高，為確立三民主義之建國思想而努力。

(九) 財政建設，首將省縣財政之基礎，清理公款公產，以增加地方收入，舉辦公營公賣事業，以裕庫收，發展地方經濟，以培養稅源。

(十) 游擊區域各項設施，應針對敵偽一切陰謀，運用全力，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予以有效之打擊，以爭取民衆，收復失地。

(十一) 嚴格實施人事管理，規定行政人員異動時期，以保障事業進展，並收人盡其才之實效。

(十二) 按照實施三年計劃之實際需要，培養必需之人材，分期訓練，以提高各級幹部質量。這一個三年施政計劃於二十九年一月訂定頒佈，至三十一年年底屆滿。在這三年中，敵寇流竄頻繁，在淪陷地區，並不斷的「掃蕩」「清鄉」，以致預定的各項目標，未能一一見諸實行，日積月累的工作成果，亦遭受摧殘。但綱領中規定的重要節目，經全省工作同志的共同努力，無不循序進行，且已收穫若干效果。可是原定計劃的優點和缺點，究屬如何？執行的成敗如何？尚未實現的事項是什麼？必須有坦白率直的檢討，以爲以後改進的張本。三十二年二月召開的全省行政會議，對於這個檢討工作曾列爲會議的中心之一，經聚會同志的縝密審查，提出詳盡的報告，其政治設施部份，並列舉各項確實數字，全文冗長，這裏祇摘錄其結論，以見一斑：

三年計劃之實施，雖未完全成功，已有若干收穫，其未實現之工作，半由於環境之變遷，半由於人事之未盡，而一般行政人員，尚未深切體會計劃之重要，蓄力奉行，尤爲重要之原因。夫以今日省縣行政工作之繁雜與責任之重大，已千百倍於往昔，烏可漫無計劃，因循將事，更烏可漫視計劃而掉以輕心。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亡羊補牢，當爲未晚。際此最後勝利接近之時，亦爲極大難關待度之日，亟宜依據以往種種經驗，接續三年之成績，重新擬訂三年計劃，并重視其實施，以竟前計劃未竟之功，而成省縣應興應革之大業。

根據這個檢討的結論，決定續訂第二個三年計劃，當時曾有人說：中央修正財政收支系統法後，省的地位，已有變更，省地方之行政設施，一惟中央的政策與法令爲依歸，而不容有歧異的傾向。現在再來訂一個省單位的計劃，不免失之多餘。這話，表面看來，似亦有理，但省地方的施政，因處處不能脫離中央整周政策與法令之範疇，而審酌地方特殊情況，規定辦法進度，亦自有其因時因地制宜的必要。況且戰時省行政的繁雜與其責任的艱鉅，已甚於往昔，倘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循應付，又豈有不

覆練貽誤之理？

這個第二次三年計劃的擬訂，仍是一本本黨主義與中央政策及配合本省現階段在地理上軍事上之情況與要求，並繼續第一次三年計劃有關精神與政治建設各部份未完成之理想，確定為左列十一項中心工作：

- (一) 建設鄉鎮，充實組織，發展造產，以鞏固新縣制之基礎。
- (二) 整理地方稅捐款產，以充實自治財政。
- (三) 普及國民教育，加強師範及職業教育，注意社會教育，使人人識字明理，知禮守法，服從領袖，愛護國家。

(四) 灌輸人民之科學知識，提倡研究，獎勵發明。

(五) 墾殖荒地，推廣良種良法，力求糧食之自足自給。

(六) 增加生產，節約消費，掌握物資，合理分配，以達到物價管制之實效。

(七) 強化運輸組織，增加交通工具，以增進運輸之力量。

(八) 充實自衛武力，加強民衆組織，以確保社會之安甯。

(九) 普及衛生常識，改善人民營養，以保證健康而促進其生存樂趣。

(十) 鼓勵出征，優待征屬，以充裕抗戰之兵源。

(十一) 振卹災難，搶救游擊區青年壯丁兒童。

【十二項施政原則】三十三年七月，長衡戰事失利，日寇大舉向粵漢湘桂線進犯，企圖打通所謂「大陸交通線」，遮斷我東南各省與中央的交通。當時我默察情勢的嚴重，特邀集黨政軍民意金駝稅務各機關首長，在雲和舉行座談會。我首先說明當前軍事的形勢，判斷以後演變的趨向，並鄭重宣洩：萬

敵寇佔領了粵漢路湘梓路，使我東南地區與中央交通隔絕，我們對於中央的向心力必須加強，絕對不許有利用惡化的形勢而作遂行個人意志與個人利益之行動。對於中央的政策政令，尤須貫徹實施，不容稍有瞻顧敷衍之情事。對於駐省之中央稅收金融機關，遇有困難，必須予以協助，使稅收旺盛，金融穩定，而無礙各項費用之支付。我們在省的黨政軍民各首腦部，必須密切聯繫，組成一堅強的戰團體，以加強領導力量，渡過當前難關，靜候有利形勢的到來。我說完了這一番話，就提出親擬的十二項施政原則，大家都表贊同，即由省府命令公布。茲附錄如后：

(一) 浙江省有抗戰建國現階段之一切措施，確定以統一意志集中力量，爭取軍事最後勝利為最高準則，故省境內之黨政軍各首腦部門，必須密切配合，使組成一堅強之戰團體。

(二) 凡有利用因交通阻滯致中央政令未能普及深入之新形勢，而冀圖作遂行其個人意志與個人利益之蠢動者，黨政機關不特對於此種行動應加絕對之鎮壓制止，尤須對於今日最艱苦時期之情況及中央之方針，與人民應有之負擔，加強宣導，使其明瞭當前形勢，與本身責任，以杜絕此種離心心理之發生，進而鞏固其對中央之向心力。

(三) 黨政機關之行動，必須輕便敏捷，俾與軍事行動相配合，尤須領導人民，加強其對於軍隊物質之供應與精神之鼓勵，俾由軍民之密切合作，以期民氣發揚，士氣旺盛，作共同最後之奮鬥，澈底消滅省境內之敵人。

(四) 黨政軍各級機關，對於本身業務之責任，與應守之紀律，必須更加注意，隨時檢討，尤貴彼此互相督責，養成自動自發自立自強之風氣。切不可因中央或上級機關監督未週而不盡責任，或違法亂紀，並須積極提高最後鬭爭之精神，根絕玩法瀆職貪污之事件，其由人民輿論自由檢舉者，必至澈底查究，依法懲處。

(五) 各級政府人員，對於中央飭辦之兵役、糧食、儲蓄、公債等戰時要政，務須深體中央意旨，國家需要，及本身責任，加強其努力，以期政令貫徹，成績進步。

(六) 各級民意機關，在此艱難時期，對於人民，須盡其積極領導之責任，並積極匡正政府之措施。

(七) 中央駐省之稅收金融等機關，除加強其本身應有之努力外，遇有困難時，地方各級政府與人民，必須盡力為之協助，並予監督，使稅收旺盛，金融穩定。

(八) 各級行政機關，對於本身機構，須加調整，組織力求簡單，人員力求減少，俾能適存於最艱困之環境。上級對下級之指揮監督，必須執簡御繁，減除不必要之手續，注重實際上之考察，以增進行政效率，下級對上級功令之奉行，在上級授權範圍內，可因地制宜，如有超越妄為，加重其處分。

(九) 各級行政幹部之選用，以具有行政經驗富於冒險競爭精神而體格健全能耐勞苦者為上，除現任幹部須力加鍛鍊外，尤須鼓勵並訓練青年奮發向上，任最後鬪爭之工作。政府對於各級工作人員，不僅要求其服務之成績，並須嚴密防制其在工作程序上有苛擾事件之發生。

(十) 政府為改善各級公務人員之生活，必須掌握實物，作合理之分配，以免受物價之影響，而減低其工作效能，尤須實行集體生活，集團生產，以減輕其擔負。

(十一) 各級政府對於稅捐之徵收，須注意不苛擾，不中飽，款項之開支，須注意不浪費，能公開。

(十二) 省縣區之團隊武力，須力加充實，認真訓練，以期素質堅強，切合實用。軍風紀之整飭，尤須特別注意，各區自衛武力，并應統一指揮。

這個施政原則公布以後，我爲使全省工作同志及全體人民深切瞭解其意義，又親自撰文闡釋。當時的軍事形勢，日趨惡化，敵人於佔領衡陽後，繼續西進，一度衝進貴州大門，粵漢路南段亦被打通，並佔領贛州，使東西交通，發生極大障礙。在浙江方面，敵人由武義竄麗水進佔永嘉、樂清，使偏安的浙東陷於支離破碎的局面。而在這種艱危的局勢之下，地方秩序尙能維持常態，各項戰時政令，尙能循序進行，前述十二項原則，可說是發生了相當的安定作用。

【行政督察制度之演變】本省的行政督察區，建立於民國二十四年九月間。我重來浙江之初，浙西各縣，大部淪陷，爲適應新形勢之需要，特訂定「浙江省戰時各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暨保安司令部合併組織暫行辦法」九項，其中規定專員公署，區保安司令部統一組織合併辦公，稱爲「第幾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暨保安司令部」。所有公文政令，均以專員兼司令名義行之。預算亦合併編造。並將原來第一、第二、第三三區轄縣重行劃分：第一區轄餘杭、新登、分水、臨安、於潛、昌化、孝豐、安吉、長興九縣，專署駐於潛。第二區轄杭縣、嘉興、嘉善、崇德、桐鄉、吳興、德清、武康八縣，專署駐德清。第三區轄紹興、蕭山、諸暨、富陽、餘姚、上虞、嵊縣、新昌、海甯、海鹽、平湖十一縣，專署駐紹興。二十八年冬，復將這三區的轄縣變更：劃於潛、昌化、分水、臨安、杭縣、新登、富陽、桐廬爲第一區，專署仍設於潛，劃吳興、長興、德清、武康、安吉、孝豐爲第二區，專署設安吉。劃紹興、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縣、新昌爲第三區，專署設紹興，並新闢一區爲第十區，轄嘉興、嘉善、平湖、海鹽、海甯、崇德、桐鄉等七縣。三十一年一月中央頒發各省專員公署及保安司令部合併暫行辦法，其規定與本省前訂九項辦法完全符合，不過署部名稱改爲「第幾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部公署」而已。是年夏，敵寇大舉流竄浙東以後，陷區擴大，各區轄縣復加調整。三十二年五月又增設第十一區。現在的行政區域，列舉如次：第一區杭縣、餘杭、臨安、於潛、昌化、新登、分水，署址設於潛。第二

區：安吉、孝豐、長興、吳興、德清、武康，署址設德清。第三區：紹興、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縣、新昌、東陽、義烏、磐安，署址設新昌。第四區：金華、蘭谿、永康、宣平、湯溪、武義，署址設宣平。第五區：衢縣、開化、遂安、江山、常山、龍游，署址設甯海。第七區：臨海、黃巖、仙居、溫嶺、三門，署址設臨海。第八區：永嘉、平陽、瑞安、樂清、泰順、玉環，署址設永嘉。第九區：麗水、龍泉、遂昌、青田、縉雲、景甯、慶元、松陽、雲和，署址設麗水。第十區：嘉興、嘉善、海甯、海鹽、平湖、崇德、桐鄉，署址設海鹽。第十一區：富陽、桐廬、建德、淳安、壽昌、浦江，署址設淳安。

行政督察專員制，始行於二十一年南昌行營所轄的軍事區域。二十五年三月行政院通過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暫行條例，始成定制，普行於全國各省。創行這個制度的主要意旨，在補救省政府監督指揮的不足，以加強行政效率。因為我國現行的省區，範圍太大，以一個省政府來監督全省各縣，其他各省姑置不論，即面積最小的浙江，亦有很大的困難。我們體念創制的精神，認為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的任務，關於軍事方面，固應統一調遣區內的自衛武力，以確保地方的治安。而關於行政方面，應以輔導督察為重點。換言之，專員對於區轄各縣的施政情形，要隨時嚴加督察。推行政令如有困難者，應輔導解決；如發生瑕疵者，應即予糾正。務使區內各縣政治均能遵循國家法令齊頭並進，不致參差過甚，或發生其他不良情形。同時，對於區轄各縣的社會情形，要隨時縝密考察，尤貴能深入民間，探求民隱，蒐集各種資料，詳為分析研究，以供各級施政之參考。抗戰軍興以來，行政督察專員制度雖屢經演變，但制度的精神，並沒有逾越這個範圍。我每次出巡，必指示各區專員本着上述的意旨去做，並以此為考核的準則。因為這個制度實施上如稍不注意，很容易發生兩種不良的傾向：（一）不顧多做事的專員，必使專員公署成為一個消極的公文承轉機關，不僅不能促進行政效率，反因公文承轉關係，使工作愈加迂

緩，虛糜公帑，猶爲小事。（二）勇於負責的專員，必運用其職權，建立本身的事業，形成省縣之間的一個行政實體，與國家創制的原意大相逕庭。

【新縣制的實施】二十八年九月，國民政府頒布了縣各級組織綱要，重新確定了縣的制度，在我國地方行政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一般都簡稱它爲新縣制。新縣制的產生，由萌芽到公布實施，經過一年半的時間。自二十七年四月 蔣先生在本黨五屆四中全會發表「調整黨政關係與下級機構改造案」的講話之後，我們對於縣的組織之調整，即着手研究，並決定調整原則，指定新昌、永康、龍游三縣先行試辦。綱要頒行後不久，即召開全省專員縣長會議，對於新縣制的實施，曾經詳細討論，決定遵照中央規定自廿九年起，無分敵後、前方、後方，同時普遍施行。中央原定新縣制實施的完成期限是六年，後來又改爲三年。三年的期限早已過去，第二個三年又快屆滿。其他各省實施的成果如何，不知其詳。就浙江說，我們考查的結果，在表面上看來，雖勉可交卷；但嚴格說來，與國防最高委員會規定的地方自治實施方案中十四項地方自治條件及其完成標準，還有着相當的距離。除了本省地處前線，常受軍事動盪影響，爲其重要原因之外，也還有其他的因素存在。

【新縣制實施成效不著的幾個原因】第一是財政問題。實行新縣制，完成地方自治，在在需要大量的經費。縣各級組織綱要中對於縣財政，規定有八項收入，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便是土地稅之一部（即在地法未實施之縣各種屬於縣有之田賦附加金額）。本省各縣田賦附加額，原來佔全部賦額（正附合計）百分之六十八，爲縣預算之大宗收入。在田賦未由中央接管以前，要推進地方自治，經費仍感極大困難，於是另闢兩大來源：（一）比照田賦標準，代收四成自治經費。（二）比照營業稅標準，代收二成自治經費。由省統籌分配，總算勉足應付。各縣自治工作，也能循序進展。可是從三十年以後，田賦由中央接管，並改征實物，這四成自治經費，雖仍在改征之列，但已被統盤收支，而中央撥補各縣的祇

有全部賦額百分之十五，並且不是實物而是按官價折給法幣（按今已請准自三十四年起改撥實物）。至於加收二成之營業稅，亦因營業稅法修正，不能再行代收。因此浙江各縣的自治經費大受打擊，一切自治工作，亦無法按照預定計劃做去，這還是就財政本身而說的。至於工作方面，照綱要規定，縣的職權，分爲自治事務與中央及省委辦事務兩項，前者所需經費當由縣自行負擔，後者所需經費自應由國庫負擔。在地處前線的浙江各縣，承辦的國家事務至爲繁重，舉凡破修道路機場，建築國防工事，運輸軍糧軍實，乃至征兵、征實、募債等，支出費用極爲浩繁，實際得到上級補助的款項爲數甚少，大部份均爲地方臨時籌派。各縣一方面因忙於國家委辦事務的處理，另一方面又因負擔此項鉅額之經費，自治財源的資格，自應有獨立的財政，以便興辦各項自治事務。綱要中規定的五項鄉鎮財政收入，自治基礎還沒有鞏固，自治事業還沒有發展以前，這五項來源也都是靠不住的，因此中央便有鄉鎮造產辦法的公布。本省根據這個辦法，訂定實施細則一種，規定造產業十二項：（一）公有農場，（二）公有林場，（三）公營小工業，（四）公有廁所糞寮，（五）公有畜牧場，（六）公有市場，（七）公有屠場，（八）公有水車、水碾、水磨、水壩，（九）公有池塘，（十）公營小礦業，（十一）公營交通事業，（十二）其他公共事業。我到各地巡視的時候，對於鄉鎮造產業極爲注意，考查的結果，沒有可以使我滿意的。我想這不能完全責備辦理的人，因爲在土地政策沒有徹底實行和鄉村沒有工業化以前，要談到鄉鎮公共造產以建立鄉鎮財政基礎，是不大可能的事。

第二是幹部問題。實施新縣制，首先要使縣的各級幹部對於新縣制的意義與實施方法有深切的認識與充分的瞭解。中央爲配合這個要求，特建立幹部訓練制度：各省均設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由省主席兼團主任，以調訓各縣高級幹部爲主體；各縣均設地方行政幹部訓練所，由縣長兼所長，以調訓鄉鎮以

下的自治幹部為主體。這原是很合理的措施。可是考諸實際，因為我國教育文化落後，尤其是戰時各級幹部資質水準的普遍低落，一個月或二個月的短期訓練，並不能收穫顯著的效果。這還得從教育上作根本的努力。就是說，我們一方面要以全力謀國民教育的普及，另一方面應在各縣普設中等學校，造就中下級的自治幹部（管、教、養、衛各種幹部均可包括在內）。此外尤須切實建立人事制度，提高縣各級幹部之待遇。我對於各縣人事，素主安定，不輕易更動。二十八年以後正式實行縣長定期異動的制度，非有過失或其他原因，不在年度中間更動，並獎勵久任。因為各級機關的主管每經一次更易，其業務的損失是不可計算的。縣的事務，真是千頭萬緒，縣長的更調，於縣政上的損失更為重大。分水縣長鍾詩傑是二十一年六月到任的，到現在已整整的十四年了。恐怕是全國縣長中任期最久的一個吧！有人說笑話：「分水全縣的老百姓家裏，每天有什麼婚喪喜慶，鍾縣長都可以說得出來。」這固然是一句戲言，而他因為對於縣境情形的熟悉，與地方人民相處的長久，縣政工作的推行上確實減少了很多的困難。可是由於縣各級幹部待遇的微薄，其人事流動性之大，與素質的欠整齊，也和其他各地相似，因此仍不能有卓越的成就。現在本省各縣縣級公務員的待遇，一般不及省級待遇四分之一，縣以下的鄉鎮保各級自治幹部，更不堪言狀了。今年浙江各縣預算上，鄉鎮公所辦公費最高的每月不過一千二百元，保辦公處辦公費每月不過五百元。在戰前有人形容保長待遇之苦：「管、教、養、衛四件事，紙墨筆硯一塊錢。」現在保長要做的事更多更苦了，而所得的還不及戰前的一塊錢（照物價八百倍申算，戰前一元，現在應是八百元）。縣級幹部待遇微薄如此，縣以下的各級組織經費困難如此，有德有能的人，豈能安心於位？又怎能要求他們把國家事務辦得很好，又把自治事務也辦得很好呢？

第三是組織問題。縣各級組織綱要第十三條：「縣政府組織規程由各省省政府訂定報內政部轉呈行政院核定，縣政府組織規程所無之機關，不得設置。」這是統一組織集中事權的一個重要規定，也可以

說是新縣制的精髓所在。可是綱要頒行不久，縣政府以外的組織，又陸續增設，而不是省政府訂定報經中央核定的縣政府組織規程所能否定的。以浙江今日的實際情形來說，與縣政府並行的機關，有國民兵團、田賦糧食管理處、地方行政幹部訓練所、補給分會、軍民合作站指導分處、優待出征抗敵軍人家屬委員會、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以及各種臨時性的委員會，多至不下二三十個。往往在一個縣政府的門前，形形色色，掛滿了各種長短不一的招牌。雖然這些機關的首長，多由縣長兼任，但在行政的系統上說，是破壞了縣政的統一性。而且有時候，這同一個人擔任首長的各個機關，仍不免發生意見上的衝突，這正與我們在省政府與各同級機關的關係——一節上所說的情形一樣。我的意見，上面所舉的研枝機關的業務，通統可以歸併到縣政府有關各科，或另行設科去辦理；如果縣政府另設專科還辦不了的，那也可以依照警察局的行情，在縣政府之下，設置專管機關來辦理。有些臨時性的特種事務，必須運用羣力組織委員會來辦理的，一俟事務辦畢，立將機構撤銷。這種委員會的首長，非十分必要，不應由縣長兼任，以免分散他的精力。至於尚有若干事務的進行，必須隨時公諸地方人士知道，或徵詢地方意見的，現在各縣已普遍成立民意機關，祇要隨時提出報告就是了，也不必專設機構。務使全盤縣政，納於縣政府的一個系統之下，由縣長統率起來，以達成組織統一事權集中的要求。

【戰時財政的困難及其解決的辦法】浙江財政，戰前素來是困難的。在朱主席騷先任內，曾經一度的整理。主要的辦法是借新債，還舊債，借大債，還小債，減輕利息，延長還期，總算得到一時的寬裕。但自抗戰軍興，杭、嘉、湖首告淪陷，杭、嘉、湖是浙江的財庫，這三屬的賦稅收入，在總收入上要佔到半數。也就是說：杭州失守之後，省財政的收入，減少了半數。而支出呢？因軍事的關係，反而逐漸增加。在這種情形之下，將來怎樣支持下去？財政的負責者，自然感覺得萬分的困難。於是財政廳長程遠帆辭職了，繼任的是黃祖培。整理財政的辦法，一向是「開源節流」四個大字。他接事後，自然也

祇是照這四個字的原則做去。省府撤退到方岩之後，在首次省府會議席上，我就提出：不論文武官吏，最高的薪水，不能超過一百四十元。當時大家體念時艱，貢獻抗戰，無異議的一致通過了。同時各機關對於不必要之開支，亦竭力節省，這算是節流的工作。固然在這一方面收到了相當的效果，但來源減短得太厲害，而軍事上的支出，又陸續的增加，事實上仍多困難，於是不得不往開源方面積極設法了。

『辦理食鹽運銷』浙江沿海是產鹽的地方。散在沿海的鹽場，如餘姚、黃岩、樂清、永嘉、瑞安、平陽、玉環等，平時管理食鹽的產銷，已經不易。往往因走私緝私，鹽務當局與人民之間，起了不少的糾紛，政府亦增加不少的麻煩。軍事發生之後，緝私更屬不易。而且鹽商停運了，鹽場所產的鹽，無法銷售，鹽民因失業而發生生計的恐慌，內地各省因無鹽而感受淡食的痛苦。鹽務機關的稅收更大大的減少。這種情況若延長下去，國計民生，都要受到很大的影響。我與南浙鹽務局長周三農商定，由省府與鹽務局，合資五百萬元（兩機關各半）設一食鹽運銷處，將各場所產的鹽盡量收購，負責運輸，由本府許委員蟠雲主持其事。這樣一來，鹽的稅收增加了，鹽的產銷暢旺了，但是問題也隨而發生。以前運銷食鹽的鹽商，在局勢困難的時候，裹足不前，保有他的資本。鹽民失業，人民淡食，他是不負責任的。到了時局稍定，有利可圖，他又出來為他私人的利益而來爭奪和破壞了。在財政部方面呢，則以為這是中央的業務，地方不應該參與辦理，亦表示不滿之意。但已成的事實，一時又不能即刻撤銷。於是將食鹽運銷處改組為食鹽收運處，由部派南浙鹽務局長當處長，省方派石楚琛充當副處長，處長是部方委任，省方加委；副處長是省方委任，部方加委，弄成一個欲分而勉合的組織。我也知道這個組織不能長久維持下去，但是收運的業務仍可很順利的進行。不久楚方的資本，都收回來了，業務仍不斷的發展。不但解決了浙江鹽民的生計問題，而且還救濟了江西、湖南一部分的鹽荒。而鹽的銷量及稅收的增加，都打破了以前的記錄。到了三十年，鹽務總局總辦特地到浙江來同我商量，提出結束分夥收回自辦之意。

見。當時我考慮之餘，認為若堅持下去，地方與中央必加深誤會，而且本錢已經收回了，剩下的盈餘及財產，還值數千萬元，若永不分拆，於省方財政，亦無多大好處，好似養一個大肥豬，若不殺了牠，終歸得不到豬肉吃。於是我就決定殺豬吃肉的辦法，同意他結束分家的提議。拆夥結果，省方除得了二千多萬元現金，還有許多財產與工具。我對鹽務當局說：「你們上當了！」

【實施專賣制度】專賣制度各國早已實行，我在廣西也舉辦過捲烟專賣，曾收到很好的效果，這也是戰時財政開源的好辦法，於是就從火柴、捲菸兩項先行着手舉辦，將進口或土製的火柴和捲菸，由政府統制起來，將商人或工廠販賣或製造的成本計算出來，再加上他們應得的利潤，把成本和利潤給予商人，這些商品——火柴、捲菸就算是政府的了。政府加上專賣費，並指定零售商去銷售，自然可以得到很多的收入。其實專賣制度，不過是政府財政上兩面刀的法子：一方面把消費者的負擔增加了，使他們在這必須的消費品裏的利益限制了，不使他們獲得過分的利益。一方面把消費者的負擔增加了，使他們在這必須的消費品裏面，不能不增加一些支出。政府就在這兩方面獲得大量的收入，這就是專賣制度的內容。如果專賣機關對於專賣品的生產成本及第一次販賣成本計算不精確，則廠商和販賣商仍有法子將「假成本」增加上去，而得到他們所希望的滿足利益。結果，一切的負擔，都增加在消費者的身上了。所以專賣事業辦得不好，就無異變相的增稅，或者比增稅的後果還要不好。當我們初辦的時候，自然有很多人反對，尤其外國的菸廠或菸商，反對最為厲害，他們並請求其大使館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議。中央對我們也打了不少的官話。但是外商的特殊勢力，因為中國的抗戰而大大的減少了，也許他們因為同情我們抗戰，而退讓了。抗議儘管抗議，專賣依舊專賣。這兩項專賣事業舉辦以後，浙省的財政自然得到很大的幫助。我在武漢，曾將浙江辦理專賣的成效，向在中央負稅務責任的朋友吳君說過，並詢問他：「中央為什麼不實行專賣呢？」他說：「戰事一二年內就可結束，多發行些鈔票就可應付，何必多找這些零零碎碎的麻煩。」

我聽了不覺愕然。三十一年中央財政當局亦決定實行專賣政策，我又覺得專賣事業於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不會得到很好的效果。果然，實行不過二三年，現在又把它取銷了。不知是不是犯了我前面所述成本計算不精確的原因而得不到良果的，那我就無從知道了。

【實行田賦徵實】戰事延長，貨幣的價值日漸低落，物價日漸上漲。其他的稅收，可以採用從價徵稅的辦法，以爲補償，但田賦則仍是照舊稅額徵課，不但政府的收入減少，而地主在戰時的負擔，反比戰前減輕了。這真是一個不合理的現象。我在二十九年赴重慶出席中央全會的時候，就提出田賦徵實的議案，當時在審查會裏爭論了很久，才把原則通過了。我回來之後，就想把這個決議案付諸實施。但是因爲種種的準備——如倉儲、運輸、配給等——來不及，祇是將賦額折米，又將賦米照市價折征法幣。可以說當時浙江的田賦徵實，是徵實價，不是徵實物。而福建倒是最先實行徵實的省份。我想他們一定遇到很多開創的困難。三十年，這個徵實案中央規定全國普遍實行（淪陷地區折徵法幣），開始的困難，各省自都不免。而時間愈久，積弊愈多，好多人都歸咎在制度上人事上的不良，而忽略了物質設備的缺陷。如倉儲問題、衡量問題、包裝容器問題、運輸配給問題，都是予經手者以舞弊的主因。這幾年來人民在這幾個問題上面，不知受了多少苦痛？「當娼不如從良」的諺語，好似都從糧制糧人發生出來。而我的見解，凡是一種良好的制度，若沒有良好的物質設備爲之輔助，是無法澈底實現的，豈但糧政而已？

其他各項稅收，無一不予積極整理。尤其是對人民納稅的宣傳，與稅務人員的調整——遴選高中以上的知識青年辦理稅務。我們的口號是：「納稅是人民抗戰中重大的貢獻！」「多一分收入，即多一分力量。」大家在這兩個口號之下，盡其最大的努力。所以自廿七年而至三十年間的省財政收入，是逐年增加的。戰前（廿六年）預算是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廿七年是一千八百另六萬，廿八年是四千二百四十

三萬，廿九年是六千二百六十五萬，三十年是八千另六十一萬。所以當時的財政，並不覺得困難，反較戰前爲充裕。這也是戰時地方財政稀有的現象。

『財政收支系統變更後的財政情形』三十年夏，中央召開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我也前往參加。這次會議，對於財政有重大的決策，即是改訂財政收支系統法，劃整個財政爲國家財政與自治財政兩大系統。國家財政，除以往原有的範圍以外，並包括省級財政在內。換言之：省財政併入國家財政系統裏面而不復單獨存在了。省的賦稅收入，全部由中央接管，省的支出，由中央統盤支配。此種決策，不但在戰時有此需要，即在平時亦屬合理的制度。因爲戰時各省的財政，尤其是淪陷的省份，已陷於崩潰的狀態。而支出浩繁，若不設法補救，則曠日持久，勢將無法維持。即使戰事結束以後，由於各省富力的不均，其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各部門的進度，必參差不齊，在今後建國的過程中，似不宜再有此等畸形的現象，而應力求其平衡的發展。所以中央此種根本大計，是很正確的。祇是改制後，中央核定各省預算額，於實際上不免有不甚合理的地方。試以浙江而論，廿六年的預算是二千四百餘萬元，若以幣值五百倍來伸計（本省目前的物價一般已達千倍左右），本年度（卅四年）應爲一百二十億元；即以一百倍來伸算，亦須二十四億元。可是卅四年度的浙江預算，中央核定僅爲四億五千萬元，較廿六年度增加不到十九倍。而本省同年度各縣預算總額，則較戰前增加一百六十倍以上（戰前——廿六年度全省各縣預算總額爲一千九百八十餘萬元，卅四年度爲三十四億六千八百餘萬元）。據我所知，全國各省政府預算合計起來，尚不及中央一部或一局之多。以分管全國四億五千萬人的各省政府，祇此微薄的支出，而且戰後，作人員增加了，事務繁重了，怎能應付餘裕？

縣級財政——即自治財政——形式上雖沒有改變，但實質上已遠不如前，而岌岌可危！因以前各縣的收入稅源，都是賦稅的附加。過去本省田賦正附總額的百分之六十八即爲各縣所有，自中央接管田賦

改征實物以後，每年就實征數提撥百分之十五補助各縣，數量較前減少百分之五十三。加以撥給各縣者非實物，而為法幣，實物折幣的價格又極低（今年以穀每市石四百五十元計算，而各縣市價最低額則為二千元），撥付的時間又常拖延，現在縣裏惟一可靠的稅收，就是屠宰稅，其餘的都是零星的收入，而是極易取怨於人民的稅收，此外則還有一種「人民捐獻及贈與」（這是財政收支系統法上規定的自治財政科目之一）的收入，既非抽稅，又非募債，簡直就是攤派，捐獻不過是一個好聽的名詞而已，現在各縣預算，就以捐獻的收入作彌補，中央則嚴禁攤派，而事實上各縣則不能不變相攤派，縣府遂變至為怨府，距民愛民之道遠矣！無論省預算縣財政，在手續上應該改善的還很多，以上所說，不過是其中比較重要的幾點。

【會計審計制度的實際問題】會計制度，在消極方面，自然收到相當的效果。舉例來說：浙江淪陷的縣份，雖然情形特殊，因會計獨立，尚有賬目可查，不致為不肖者混水摸魚，但是會計本身需要改進的地方還很多。我常有他本身計算不清或變成從前的錢穀師爺那個樣子的憂慮。拿出一筆帳來，祇有他自己才知道，或在裏面玩弄花樣，故意和主官為難。審計制度也是同樣有好處有缺點。好處固可不談，舉其不合理之點來說，戰前必須價值一千元以上的購置或建築物，才要事前送審。現在如果照一千倍的幣值伸算，就要壹百萬元，始須辦理事前審計。雖然後來改為三萬元，與一千倍的物價比例起來，不過三十元。這三十元的小數，要按手續去審計，人力、物力和時間的損失，不知多少。我記得從前某機關要購價值五千元的一部無線電報機，起初審計機關因為五千元的价格太大，不肯核定。貨物漲價了，第二次送上來的預算是壹萬元，又不核准。因為事關必需，再而三的送上去，最後是二萬五千元核准了，豈不可笑？在物價狂漲環境變動劇烈的戰時，若斤斤於手續的爭執，或拘泥於法令的規定，而不顧全事實，真是莫大的浪費。其實若認真照手續辦去，就非得開假賬，造假單據不可。聽說審計機關的經費

報銷，有時也要作些假才可以送得出去。人家吃上苦，或者不知道；自己吃了苦，亦不想法改良，這又何苦來呢？

【民族健康問題的嚴重及其原因】中國人的體格與白種人相比，顯然覺得我們是矮小而孱弱，與其說是他們得天獨厚，毋甯說是我們後天失調。所謂後天失調，不外是疾病的戕害與營養的不足，這種現象由後天而變為先天，一代代的遺傳下來，而成為現在的狀態。記得我的故鄉——容縣，在廣西也算比較富裕的一縣，但是十家之中，終年有三餐飽飯吃的，不到三四家，他們終年都是在飢餓線上掙扎，裹腹的食糧，已成問題，其他的營養品，自然更談不到了。浙江算是中國比較富庶的省份，但也祇限於杭、嘉、湖及沿海一帶。多山的地區，也窮苦得可憐！甚且富庶地區在同一縣之中，情形也不一致：一部份是相當富庶的，一部份是貧苦的，餘姚就是一個例子：沿海的平原，就可豐衣足食，而近山的鄉鎮，就衣不蔽體，以草根樹皮作為維持生命的食糧了！處州有句流行的話：「魚龍鵝鳳菜靈芝」。魚和鵝因不容易吃到；就是青菜，都和靈芝那樣的稀罕。我住在小順（雲和縣屬的一個小鎮），附近的一二百戶人家，就沒有一整片的菜園，即使偶然見到，也是避難來此的客民種的。我們臨時省會初遷到雲和的時候，固然苦得沒有肉吃，更苦的是沒有青菜吃。這裏出產米麥甚少，雜糧是本地老百姓活命的主要品，甚至連草根樹皮也佔着重要的地位。他們佐膳的是生筍乾筍或野菜，這並不是這些地方不能栽種蔬菜，而是他們缺少了營養的常識，與種植的技術。至於疾病的戕害，更可驚人了。這些地方，壯健的男子，或健美的女子，不易見到，無論男女，都表現出一副病態。疾病流行最普遍的是瘧疾——惡性瘧疾。這一帶地方的人，已不當它是一種可怕的疾病，而認為這是一種人人必然要患的病。固然他們沒有特效的醫藥，亦不想去求醫藥，或是無錢來醫治，萬不得已時，請個巫師來打打鬼，就算盡了最後的人事。戰前，政治重心在杭州，那裏是魚米之鄉，疾病自然少得多，醫藥設施也相當完備，所以對於這個民族健

康問題，政府並不覺得十分嚴重。而對邊遠地區的實際情形，知之既少，遂也不甚關心。戰後省會南遷雲和，目見浙南人民死亡率之高，而且自身也受了疾病的痛苦，衛生設施使日以加強，但仍是杯水車薪，相差甚遠。加以醫藥來源缺乏，人民貧困，無力求醫，死亡率日見增加。湯溪是十二萬餘人口的縣份，三十二年罹於性瘟疫而死的，就有六千八百餘人之多。龍游希唐鄉，人口不過八千多人，在三十二年一年中，就死去九百十三人。三十二年冬天，我在浙西的昌化縣，曾親自訪問過廿份人家，家家都有病人，每家二三人不等，甚至有全家人都挨次害過病的，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家，並受到死亡的不幸！他們病了，祇憑着自己的生命，與病魔掙扎，除了少數富有的人，得到有效的科學救治之外，其餘都是聽由造化的決定，即幸而不死，他們的體力損失與經濟損失，就難以計算了。一般人都知道鼠疫霍亂和腦膜炎的可怕，對於瘧疾則不甚重視。照我看來，瘧疾給予人民的打擊——生命的損失經濟的損失——最爲重大，我常說：鼠疫、霍亂、腦膜炎等急性傳染病，祇是流行一次，或死亡一次，而瘧疾却是年年流行，年年死亡。鼠疫等病猶如烈火，人民不敢接近，而易於防範；瘧疾則如緩水，人民容易接近，而易於玩忽。鼠疫、霍亂、腦膜炎等，雖亦屢有發現，但由於衛生人員的努力，撲滅較易，而瘧疾一直到現在，尚沒有有效的絕對預防方法，其原因就在於此。貧困無知的人民，一方面因爲營養不足，妨礙其身體之發育，與減退對疾病之抵抗力，同時因疾病之侵害，而更傷殘其不健全的身體，與減少其疾病之抵抗力，以致普遍形成神經衰弱，生理機能萎縮的病態。我初到處屬各縣，見一般人民除了真正抱病在身之外，其餘的都是渾渾噩噩，既不能運用腦力，又不肯運用勞力，好像他們沒有了人生的樂趣與慾望一般。有人以爲這是愚是懶，實則此不過是表面上的看法，形成這種情形的主因，却是營養不足，與疾病的戕害。我時常就兩三歲的孩子來觀察，一旦有了病，便失去他的活潑；病愈之後，馬上就活動起來，或是笑，或是跳，或是想。因爲小孩子天真無邪，不會作假，俗語所謂「小孩無假病」。他失去活潑

的病態表示，是由於質受了損害，能（指機能）不能發揮；他病愈後的活動，即由於質與能的恢復。一個壯健的孩子或成人，他一定是活潑的，或是勞動，或是思索，以表示他本質的能的程度。所以處州各屬，許多人的渾渾噩噩，不思索，不勞動，完全是由於他的本質受了先天及後天的損害之故。愚與懶那是表面的現象，而不是真正的原因。

【兩種可怕的地方病】開化的住血蟲病，是浙江可怕的地方病，至今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離開化城三十多里的某鄉，那裏有三千多畝的良田，都荒蕪了，因為這種可怕的寄生蟲——住血蟲，就繁殖在那片廣漠的水田裏面。那附近村莊的人民，差不多都因患這種病而死絕了，並且還有向外蔓延之勢。今年（三十四年）五月間，我在那附近停車，見到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子，聰明活潑，可是染了這種病已經兩年多，而是大腹便便的樣子了。我問他的祖父，「他的病是怎樣傳染來的？有沒有醫治的藥方？還能活得多少時候？」他說：「我們是外路人，因為三十一年避難到這個住血蟲病最多的地方，因此傳染到了。也曾用各種土方醫治過，但是終沒有效果，而且家裏很窮，那得許多錢來醫他。照這樣下去，至多還有兩三年，這小生命就要完了！」他說時老淚縱橫，不勝其悲痛。我也明知現在還沒有醫治這種疾病的特效藥，如能早點醫治，或有治愈可能。但是想用試驗的方法，把這可愛的小孩子，從死神手裏打救出來。我對他說：「你肯不肯把這小孩子交我帶去醫治，橫直二三年內，他就死了，你就當他現在已經死了就是。」起初，這老人不知道我的身份，不願接受我的意思。後來我對他說明而答應了，但是孩子的母親一定不肯。那孩子聽說我要把他帶走，尤其哭得厲害。他們明知遲早都不免一死，但是猶戀戀不捨這未死前的短聚，而演出一幕母子愛的悲劇，真是慘絕人寰的事！我雖然想在沒有希望中救治還一個可憐的孩子，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也祇好作罷了！

浙江沿海一帶的象皮病，也是一種尚無特效方法醫治的地方病。我嘗到沿海巡視，見到那些小腦腫

大的農人，還在田間操作。他不知他的病就得之於田間操作的時候，起初是足部受了一些創傷，絲狀蟲就由創口侵入。勞苦的農民有時連晚上洗腳的時間都沒有，還說得上衛生消毒麼？於是足部一天天腫大起來，雖然不覺得很大的痛苦，但是腫脹不已，最後腿部的皮肉，如同象皮樣的堅厚，連腳趾與腳板都分不出來。這也就是象皮病得名的由來。可是他們仍舊是不斷的工作着，一直到全身的肌肉都消瘦了，而那脚部却就此潰爛而終於死亡。患這種病的人，從來就未有得過救治！聽說曾經有過一個外國醫生，將這種絲狀蟲移種在他自己的腳上，帶回他國內去試醫，因為外國是沒有這種病的，但是這個醫生終因不能醫治而死了。外國人的以身作科學的試驗，與身入地獄救人的勇敢精神，真是值得欽佩的。

【為增進國民健康今後行政上應有的努力】世界上醫學及藥物學的進步，對於各種病症的醫治，差不多都有了醫治的方法，與特效的藥品。我在三十二年曾經患了鼠疫，因福建劉主席連夜用專車送來特效藥，使我得到救治。我對於這種友情的關切，是十分感謝的。同時我以前也曾患過許多危險的病症，也因爲我的地位而得到救治。但是我想；假使患這種病的不是我，而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就祇好聽天由命的任他死，沒有什麼保障了。我又見到一個美國人，在山僻的玉壺（瑞安縣屬）患了重病，回到雲和來，建陽方面的美國人得到這個消息，馬上派醫生攜帶特效的藥品專車漏夜趕到雲和，把他治好了。這就表示美國人對於生命的重視，而他們所以能如此，是因為有了特效的藥品，和高明的醫生，還有迅速的交通工具以爭取時間。這種健全的衛生組織——醫生和藥與現代的本通，我們目前還沒有普遍發展，一般人的健康，怎能有保障呢？

近年以來，我國的衛生行政機構，也漸漸由建立而充實起來。由於這些衛生人員的努力，所以曾經發現的鼠疫、霍亂、腦膜炎以及其他的急性傳染病，在醫療預防上，都收了很好的效果。但是這僅限於局部的而不能遍及全面。同時我想到外國雖有了磺胺安類各種製劑，及般尼西林的聖藥，把以前不易治

的病，大多數都能作有效的治療。然而這些進步的藥品，都是外國的產物。它醫得了我們的病，醫不了我們的弱，更醫不了我們的貧與愚，而且因此而致我們更弱、更貧、更愚。所以爲增進國民健康，光就衛生方面言，醫療不如預防。就全盤行政言，如何力求生產的建設，使其有所養而日益健康；如何增進衛生教育，使其知道預防，這是醫國醫民的兩個重要方劑，而是今後行政上必須加強努力的兩大課題。

【社會振濟】一提起振濟，就會想起抗戰以前每一次兵災，或天災，都有許多慈善人士，在各地募捐，或在報紙上大登其徵信錄，好像是大災之後的一幕喜劇。中國的災難，似乎特別的多，而且特別的重，往往弄得外國人也來參加這一幕災後的喜劇。我對以前的振災，有兩點感想：第一，中國的善士，振災是消極的，他們祇要將募得來的款散放完了，就算盡了他的善心，結了一次善緣。外國人的振災，就含有部份的積極性與建設性。我所到過的民生渠（綏遠省）及所知道的涇惠渠（陝西省），都是由華洋義振會以工代振的辦法完成的。我認爲外國善士的辦法，要比中國善士高明得多。若果中國老是消極的振濟，一定會弄到振不勝振的地步。

抗戰以後，兵災、天災是不斷的來臨。尤其是浙江，敵人一度的流竄，就遭一次災難。省政府除儘可能籌款施振之外，就得向中央請振，向各方呼籲。中央對於各省的災情，是非常關心的。主持全國振濟的機關，是中央振濟委員會，各省則有省振濟會，縣有縣振濟會，這種振濟機構，好像和行政機構一樣的重要。後來中央將黨的社會部歸入國家行政系統，省增設社會處，縣增設社會科，振濟工作，即劃歸這個新機構主管。雖然這些社會行政機構所主管的業務，不僅是振濟，而振濟工作却是最繁重的一部門。（社會行政機構設置後，中央的振濟行政，仍由振濟委員會辦理，但到最近這個委員會也裁併了。）本省每經一次災歉，向中央請振，都有款撥下來，但是施振的辦法都是消極的。祇有廿八年省府決議在振款內提撥拾萬元辦理難民工廠，這一件事，是帶有積極的建設性的。

難民工廠由呂將軍戴之（公望）主持，當初是設有紡紗（手紡）織布兩部門，收容由淪陷區退出的難民，從事生產工作。後來又經營煉油、榨油等小型工業，一共有二千多員工，連他們的家屬在內，就救濟了數千難民。紡織部份規模相當的大，有織布機近千架，每日可出布數百疋，對於軍服及平民衣料之供應，是有相當的貢獻。自三十一年敵人大流竄後，乃由永康之英遷移雲和、龍泉一帶，情形就日益困難。最重要的是原料來源的缺乏，其次則是糧食困難。到了三十三年，每况愈下，終於難以維持，而不能不停工結束。這難民工廠，就經營上講，是失敗的；但就振濟上講，是成功的，它以十萬元的資金，養活了數千難民至六七年之久，而且還生產了許多物資，其收效之大，是任何一筆振濟巨款所難比擬的。

三十一年敵人大流竄，兵災幾遍全省，災情之重，為前此所未有。當時除省府籌撥五百萬元施行急振之外，中央的振款也比任何一次為多。但仍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十一月間我赴重慶出席十中全會，旅渝的同鄉先生，對於這次災情非常關切。于是由我與黨部的吳主任委員挹峯，省臨時參議會徐議長青甫具名邀旅渝同鄉會談，向他們作災情的報告。除了蔣先生外，其餘的重要人物全部到了。我除提出了書面報告之外，復加口頭補充。各位同鄉先生聽了，非常感動，當場由戴季陶先生等發起組織浙災籌振會，以籌集振款三千萬元為目標。戴先生並說：「以前各省的災情，浙省人士無不踴躍捐助，現在對於桑梓的災害，自然更加關切，三千萬元的數目，看起來似乎很大，如果折合戰前的幣值，不過二十萬元，或者還不到二十萬元。在戰前，國內無論那一次災歉的募振，浙人所捐的款，都要超過這個數目，所以這三千萬元並不算多。」繼續發言的如褚慧僧、陳果夫、王曉籟、屈文六諸先生，都是非常誠摯懇切的來贊助。並立即決定由各方先墊撥一千萬元濟急，這是我那次在重慶最大的收穫。後來又籌匯二批，合共籌集二千二百餘萬元，嘉惠浙民，確非淺鮮。

三十一年之寇災，逼得浙省很多人到外省去度流浪生活，尤其是福建、江西，爲浙江災民流浪的兩個目的地。那年初冬，我由浦城、建陽、南平轉贛州而重慶，中途車子壞了，在水吉的小站上停留吃晚飯，那裏的小飯店，都是流浪的浙江人開設的。他們知道我是浙江省的主席，特別表示歡迎和優待。我心裏覺得非常難過，這些避難出來的同胞，我不能救濟他們，反而受到他們的歡迎和優待，內心是如何的慚愧！後來我又到了南平，那裏很多的商行，也都是浙江人開的，他們從困苦艱連中掙扎起來，不但解決了本身的生活，而且對於社會上也盡了很多的貢獻，是值得欣慰的！三十三年又同顧長官基三、劉主席恢先，在鷹潭（是浙贛鐵路因戰事破壞後贛境的終點站）休息，那時的鷹潭，已不是三十一年以前的樣子了，祇有數十間殘破的房屋，供過境的人停息，好多販賣香烟的小孩子，向我們攬攬生意。我詳細問他們是那裏人：這個說是紹興，那個說是杭州，又有的說是金華。總之，這一羣流浪兒童，通統都是浙江人，他們是一徙再徙的流浪到那裏，沒有父兄長輩來維持他們的生活；相反的，老母幼弟的生活，就由他們來維持。他們失了家庭和學校的教育，習染了社會上最不良的習慣。他們流浪的生活，不知到什麼時候，才可終止？而他們的惡習慣，却是長此增長下去！他們完好的家庭破壞了，他們可愛的天真也喪失了。這真是一幅目不忍睹的流民圖！

發放振款，爲防備經手人的舞弊，往往將手續訂得非常周密，要調查、登記、簽名蓋章、或打指模的種種程序，才可以領到五元至五十元的振款。其實要舞弊，一切都可以做假，要查也查不出來。況且又有何人去詳查呢？因此，爲了辦這些手續，振款的發放便迂緩了，非要好幾個月不能發到災民手裏，而時過境遷，飢的已餓死了，寒的已凍死了，未死的實在也不必要振濟了。我說：中國的振濟，是一「振意」而不是振濟，然而不照此辦法，就有人講閒話。照此辦法，就等於向死人送飯，不但吃不到，連見也見不到。中國的振濟工作，真是需要徹底的改良，尤其需要建設性的積極振濟，庶可一振而不振。否

則，必至永遠發生災歎，永遠辦理振濟，並且容易養成人民倚賴振濟的劣性，與振濟時所發生的種種糾紛與弊端。

【縣政檢閱】第一次三年施政計劃頒行滿了一年以後，我爲明瞭各縣實際執行的情形，打算親往各縣實地考核。可是縣政工作頭緒紛繁，要想在短期內作普遍精密的考查，事實上是很難辦到的。過去各廳處雖亦經常派遣外勤人員至各縣視察，但其視察的對象，僅限於其主管的範圍，在同一時間內，無法明瞭縣政各部門的進展情形，並進而作一綜合的比較。而且各主管機關對於縣級工作之視察指導，疏密亦頗不一致，各主管長官又很少到各地巡視。是以各縣的工作，往往有畸輕畸重之弊，很少能達到齊頭並進的要求。我爲補救過去個別視察制度的缺點，決定組織縣政檢閱團，由我以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的身份親自率領，省政府各廳處各調派高級職員一人或二人充任團員，並由省黨部、省訓練團、省田糧處、高等法院及軍管區司令部等機關派員參加。檢閱二字，原是軍營中常用的名詞，一個部隊的紀律是否良好？軍事動作是否確實？均可從短時間的檢閱中明其大概。我之所以將這個軍事上的術語用到行政考核方面來，用意亦正相同。檢閱項目，分爲行政管理、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兵役、田賦、糧政、治安、衛生、社會、會計、國民兵組訓、軍法、行政幹部訓練、軍民合作等。凡縣級全盤行政活動，均在檢閱範圍之內。我們每到一縣，通常先舉行座談會，參加人員爲縣長、縣政府各單位主管人員（專員公署所在地專員、區保安副司令同時參加），縣長兼附各機關主管人員、區長、中學校長、縣黨部書記長、青年團幹事長、法院院長、首席檢察官，各法團負責人、地方士紳及一部份鄉鎮長、中心學校校長，在座談會中聽取縣長縣府各單位主管人員及兼附各機關主管人員工作報告（專員公署所在地，有專員、副司令之報告。）接續徵詢黨部、青年團、法院、各法團及地方士紳、鄉鎮長、校長，對於縣政興革之意見。第二步工作，便是由各檢閱人員按照預定檢閱綱要，分組詳細檢閱，如發現錯誤或缺點，即予

指導改正。我在這期間，親赴縣城附近各機關巡視，接見工作人員及地方人士，考詢工作情形，探問民間疾苦，並檢閱團警，酌予犒賞；復派員籌辦帶款項會同鄉鎮保長分赴城廂附近，選擇出征軍人家屬之赤貧者，發給特別優待費，並加慰問。（有傷兵醫院亦照此辦理）檢閱完畢後，我即就檢閱所得及參酌各檢閱人員之報告，作綜合的講評，並對地方各項特殊問題及今後工作予以扼要的指示。鄉鎮自治人員、學校校長等，以其職務重要，工作辛勞，生活清苦，成績優良有特殊表現者，特於講評後，頒發獎狀，用昭激勵。至於各級幹部人員中，如有貪贓枉法，一經查明屬實，即予扣押法辦，以明賞罰。並公宴黨政各機關法團首長及地方士紳，以示慰勞。三十年二月一日第一次出發檢閱，至三月一日回程，為時一個月，計檢閱永康、武義、金華、蘭谿、湯溪、龍游、衢縣、江山、常山、開化、遂安、淳安、壽昌等十三縣及第四第五兩區專員公署。平均每縣留駐的時間不過二天，工作非常緊張。這種行政考核的方法，是我新的嘗試，結果頗為圓滿。因為經過了公開的報告，分組的檢閱與綜合的講評，不僅我們檢閱者對於被檢閱縣份全盤的工作情形得到深刻的認識，即地方各機關法團及士紳等，也明白了政府工作的全貌；不僅我們省行政當局知道了地方的特殊情形及民間的疾苦隱患，縣行政當局更清楚的聽到了地方人士對於縣政興革的意見與要求。至於工作上所發生的錯誤缺點，因檢閱而獲得矯正與改進，從而刺激縣政的進步，更是顯然可見的事。因此我回省不久，又率同檢閱人員再度出發，檢閱了義烏、浦江、諸暨、蕭山、紹興、嵊縣、東陽等七縣及第三區專員公署。原定繼續檢閱上虞、餘姚及第六區各縣，以敵寇流竄甯紹之警訊頻傳，乃告中止。返省後的第三天，杭州的敵人由蕭山向紹興諸縣進犯，甯紹兩區便在这次事變中淪陷了。卅一年春天，我和阮廳長毅成又率領檢閱團赴七八兩區檢閱。卅二年秋，以全省行政會議分在天目山、衢縣、臨海、麗水四區舉行，省政府為考核各縣行政實施狀況，俾在會議中提出商討與改進，便分組四個縣政檢閱團，由我和省府各廳處長委員分別率領，先後經過二個多月，接近游擊

區各縣，都已檢閱一過。這種集體的綜合的縣政檢閱制度，是我們的創制，前後施行四次。就方法上說，一次比一次進步，而交通方面，則一次比一次困難，故所費的時間與經費，亦一次比一次增多。就個人檢討的結果，認為在行政考核方面說，這是一種相當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在交通恢復常態以後的平時，是值得推廣的。

『年度交代』機關長官的交代，也是行政上不可輕視的一個問題，一個機關長官交卸以後，應行移交的事項，在三年五年之內還沒有結案的，極為尋常。雖然公務員交代條例明白規定：「至遲應於一個月內造具清冊報表，悉數移交後任接收，非經取得交代清結證明書後，不得擅自離去任地。」但事實上能照這個規定切實做到的是很少見，而且也不容易，尤其是行政事務繁雜的縣長，要在一個月的限期內結束交代，取得清結證明書更為困難。因為交代需時，有的機關便一任接一任的拖下去，就是說：甲任移交乙任的事項，還沒有清楚，乙任却又奉命交卸下了，丙任接收前任交代還沒有結案，丁任又來向他接收了。浙江某縣一連七任交代沒有結案的，這真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就以我自己做例子吧！我接朱耀先主席的任，已經三四年了，朱任的移交案中，還有一些零星事項被審計機關指摘的，於是公文往返，費了不少的手續，才算辦理結束。省政府主席的交代，實在比縣長交代要簡單得多，尙且如此麻煩，怪不得有人要說「上任容易交代難辦」的笑話了。其實交代並不是一件難事，祇要在任的時候，對於各項經辦事項經費出納，手續上都是合理合法，有條不紊，並隨時注意檢查補正，即使任期久長，交代也可在很短的期限內辦了的。可是一般當機關主管的，對此都不甚注意。以為祇要做事用錢，問心無愧，交代總是容易的事，何必在這些細微末節上用功夫呢？如此大意的結果，日積月累，任期愈長，業務愈發展，經費收支愈浩大，交代的困難也愈多了，公私都吃了很大的虧。

一般所謂交代案，多注意於經費財產各部門，後任盤查前任的交代案，置重點於此，上級機關審核

卸任人員的交代案之重點也在此。審計機關更不必說了。好像祇要你在任內的經費收支情形，財產保管數量交代清楚之後，即使平日是吃飯睡覺不做事，貽誤地方，貽誤國家，也沒有什麼責任了。這真是我們一般對於交代觀念的重大錯誤。公務員交代條例第二條規定前後任應交代之事項，第一款就是「施政方案」、「作計劃及其執行情形之詳細報告」其次才是經費、票據、債券、財產等項。蔣先生任行政三聯制大綱」中，對於行政考核，提出了三種新的重要的辦法：（一）年度政績比較表。（二）政績交代比較表。（三）某種專業進度表。「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這是我國行政史上的良規。可見公務員的交代，應以業務為主，財物為輔。現在大家都偏重於財物的交代，忽視事業的交代，真是舍本逐末的做法。此種錯誤，如不亟予糾正過來，不免阻礙政治的進步。

機關主管的更調與交代，乃機關責任的轉移。就個人說：這個重大責任的起卸，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在交代開始的時候，自應有個公開的降重的儀式，以昭鄭重，並引起社會的注意。可是以往一般機關的主官奉到上級更調的命令以後，不待後任到來，前任就離開了任所，將交代的任務，付託於一二幕僚或親信，能等待後任到來親自移交印信，然後再離去的，已是鳳毛麟角。至於莊嚴隆重舉行交代儀式的，更是絕無僅有了。此次我重來浙江，在杭州接事，正是漫天烽火，杭城岌岌可危的時候，朱主席還在那裏等候，兩人見面晤談之後，他才離任，這種負責的精神，便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我在「重來浙江」這一章上已提及過。所以我們要使一般從政的公務人員重視責任，注意交代，必須切實建立起交代上應有的規模。

我重來浙江的第四週年——三十年年底，想把四年來施政的得失，作一番澈底的自我檢討，連帶想起了前述交代上的種種問題。於是和李秘書長立民，商定由秘書處來辦理一次假交代，假定我是奉命交卸了，由另一個來接收，視同真的交代一樣來辦理。三十一年一月便照這個計劃實施，指定秘書處的高

級職員一人爲總移交人，一人爲總接收人，由各科室主管人員爲移交人，另行指定其他人員爲各部門的接收人，惟經費財產部份，則由會計處派員接收。交代的項目爲：（一）政績移交（前任所遺政績，以及自本人到任後至卸任爲止之政績，互相對比，依照中央訂頒之政績交代比較表式，逐項填列。）（二）專案移交（如印信、章戳、職員名冊、檔案、密電本，以及其他應行專案移交之件。）（三）重要案內移交，（內分：1 性質較爲重要者，2 正在進行尚未辦結者，彙列清冊，分別摘敘案由，記明辦理經過及如何繼續情形。）（四）經管款項移交（機關經費變現金結存以及摺據表簿等），（五）財產移交（房屋器物等），（六）例報及定期工作案件移交（各項例行表報及按期辦理之工作，敘明案由及造報或辦理日期，辦理經過等，彙列清冊。）交代開始，舉行一個隆重的儀式。

這次假交代，雖屬初次辦理，並且也是一個嘗試，而指定辦理交接的人員，點交接收盤查都非常認真，結果至爲滿意。很多爲我們平日所忽略或遺忘了的事情，因交代盤查而發現，使我們獲得一一補救矯正改進的機會。因此，省政府便根據這次秘書處辦理假交代的經驗，訂定「浙江省各機關辦理假交代辦法」，規定本省各機關每屆年度終了兩個月內，均須辦理假交代一次（該機關長官到任未滿三個月者併入下年度辦理），由各該管直接上級機關派員監交，施行一年，收效甚大。我認爲這種假交代的辦法，便是行政三聯制大綱中，所指的機關自身考核，自有制度化的必要。於是將浙江創辦假交代的動機與施行情形呈報行政院，並建議「嗣後關於假交代內之經費財產部份，請再由中央駐省審計機關審核確定後轉報備案，准予視同正式交代。至該機關長官交卸時，即可自會辦假交代截止之日起辦理移交，不必再自到任之日起追溯辦理，以省手續，而免重複。」院方指令回來：「准予試辦」。從此，假交代制度正式建立起來，浙江省各機關非有特殊情形，均能一年一度認真辦理。外省亦有來索取辦法參照施行的。三十三年中央召開行政三聯制檢討會議，對於這個制度會列爲議題之一，而認爲可行。假交代的「假」

字，原爲假定的意思，可是一般往往看做眞假的假，這種字義上的誤會，影響制度施行的效率匪淺，於是又將這個名稱改爲「年度交代」。並將前定假交代辦法，自三十四年起，一律照修正辦法辦理。至於這種制度施行的成效究屬如何，自不能列舉數字來證驗。但我可舉出兩個例子，以見其梗概。（一）某個新創的機關，數年之後，負責人交卸了，其所應行交代的事項，以往固無成例，而他本人已奉命遠離，不能親自造冊移交，因爲曾經辦過一次假交代，卷冊清楚可稽，即以此假交代的冊據作爲移交的張本，使這個交代案順利辦結。（二）某機關長官在任已有八年之久，職掌事務既繁，經費財物的出納又多，加以戰興以還，變遷甚大，而平日未嘗清理。迨本省施行假交代制度，即遵照辦理。將到任以來所有經辦的事務及經管財物經費，作了一番澈底的檢查與稽核，使各項事務整理得有條有理。假交代辦理不久，奉命調任，要辦真交代了。本來一個到任八年的主管，一旦交卸，辦理交代，不知要費多少人力與時間，可是因他剛辦理過假交代，真交代便得很輕鬆的辦清了。

【行政效率低落的原因】因爲戰事持久的關係，行政效率是無疑的會逐漸降低下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會發生兩種不良的現象。第一是辦事遲緩，不能爭取時間；第二是貪污事件的發生，與風紀的日漸敗壞。這兩種現象，實爲目前政治上極嚴重的問題！但考其發生的原因，決不是一方面的，若是單單責備地方行政人員，就不免失之公平。就我數年來實際的觀察與體念所得，認爲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得從多方面去努力，而不是單方面的要求，可以達到目的的。就拿第一點辦事遲緩來說，一般人總以爲是工作人員的精神漸形疲憊，比之戰事初期，工作要差得多。因而所得到的效率，也比比例的減退，然而這僅是表面的現象，而不是根本的原因。我們要追究這種現象發生的根本原因，就要從多方面來探討，才可以得到正確的結論。

造成這種不良現象的原因，概括的說：可分爲內在的與外在的兩端，而這種原因又是互爲因果，不

能截然的分開。內在的原因，自然由於他的本身——即每一個行政工作人員的本身——這八年來各級行政人員的待遇，實在太微薄了，微薄的程度，幾乎使每一工作者不能維持他個人必需的生活的水準，更談不到仰事俯畜了。在戰事初起的時候，本省曾實行減薪，規定全省公務人員，由主席、廳長、委員起至雇員為止，最高的薪俸，不能超過一百四十元，最低不得少於三十元。在當時一般物價和平時差不多，而且後方生活簡樸，消費的機會較少，大家並不覺得十分困難。現在省級待遇，雖經中央提高至數千元，或萬餘元，但是比之當時的一百四十元或三十元，要差得很多。因為照現時幣值以八百倍伸算起來，當時的一百四十元，就是十一萬餘元，當時的三十元，也就是二萬四千元。現在全省的公務人員，就最高的主席說：連薪俸特別辦公費等統合計在內，到不了十萬元的數目，遑論其他的小職員？他們終日爲自己的生活而分心而愁悶，他們或親自去經營副業，或由他的家屬去經營副業（在雲和我知道有很多小職員的眷屬，在擺香烟攤子、青菜攤子。）賺幾個錢來彌補他們一家生活費用的不足，這比較是最正當的。有些不肯的人，就會利用機會與職務上的便利，去違法牟利。他們的精神是分散了，他們的身體，也弄成歇斯里的樣子。要他們精神振作，要他們工作迅速有效，又何從談起呢？

外在的原因，自然更多了！我們要使行政效能達到迅速確實的要求，電訊、交通及制度，是三個主要的條件。就電訊一項說，在戰前或抗戰的初期，我祇要拿起一個電話筒，無論那一個偏僻的縣份，都可以直接同他們說話，指示他們立刻照我的意思去做。縣以下的機關，彼此都可以迅速的取得密切的聯絡。現在呢，除了隣近省會的區縣，及戰區長官部與幾個重要的軍事機關之外，簡直就無法與他們直接通話了！縣以下的機關，自更不必說，電報雖然可通達，但也緩慢得可憐。電信機關收了電費，先來一個「戰時情形特殊，不能負責按期到達」的聲明。多數的電報，往往被積壓在局裏湊空再行拍發，或是加封付郵寄遞，不管它那天到達。我最近在淳安發了幾封電報到雲和，等我回到雲和四五日之後，方始

收到。而且我在歸途中，還耽擱了好多日，幾乎現在的電訊，僅是應付幾個軍事政治最重要長官，已差不多盡了它可能的力量，其餘的就像蝸牛一樣的緩慢。我們知道 蔣先生有些緊急的電報，可以限數小時內到達，那是將其餘的電報都積壓下來，專門發這一個電報，所以有此效力。此外省府與中央院部的電報，往往是一月半月，得不到回音。郵政回復了原始的郵差遞送，雖然是慢一些，但還可計算一個確實的日期，電訊碰得不巧，就無法計算了！其次，說到交通。自從公路、鐵路大量的破壞之後，要由這個地方到那一個地方，非要步行不可。以前數小時可達的地方，現在非十天半個月不可。有人計算過，由桂林到重慶，最經濟的是坐飛機，不但時間迅速，同時費用也節省。其次是坐汽車，若是坐轎子，再加上一挑行李，就不知要費多少金錢與時間，川旅費之大，恐怕要比坐飛機增加數十倍。省際的交通困難如此，在一省之內，情形也是一樣。浙江省內，雖然還有一二段僅餘的公路，但是汽車隔日才有一班，或是數日才有一班，候車的人是那樣多，未必一等就可等到，候車的費用，固不必說，也許候車的時間，會超過步行來回的時間。但是旅行的人，除了根本不通汽車的地方，總是候着而不肯步行。省裏要派一個人到各地去查案，或各區縣要派一個人來省報告政情，動不動就是半個月一個月，這便是電訊和交通困難的緣故。

說到制度，可分職權與手續兩方面來說：抗戰以來，因為要求國家統一的鞏固，一切都趨向於集權。不但中央對各省要集權，省對各縣的監督，也要加以強化。層層束縛，到了最後一層，就絲毫不能轉動了。在抗戰以前，各省政府的權限，還比較大些，自三十一年財政收支系統改變之後，各省政府的權限，真小得可憐了！以一個省政府之大，尤其在戰時前方的省份，它可由動用的經費，祇有六七十萬元的第一預備金。（就浙江而言）此外要動用一些錢，就得造預算作計劃，去請示中央，准與不准是另一問題，即使准了，也許要一月或兩月，才能得到回音，而實際的需要與價值，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

行政效率，自然要受到很大的影響。再說六七十萬元的數字，聽去好像驚人，實際照幣值折算起來，在戰前不到千元，假定一省最多的預算是五萬萬元，合戰前也不過五十萬或一百萬元，那是多麼微小的一個數目，而值得中央和地方這樣斤斤計較！我差不多當了十五年的省政府主席，並不見得以前（收支系統改變以前）便違法亂用，以後就發生了很高的行政效率。而事實却正相反。記得有一次，我要到重慶去，祕書長請示以後重大問題的處理。我說：「事事請示中央，不必問我。」因為許多比較重要的事，中央已經有很詳細的規定了，省裏祇要照着規定去辦就是，若果超過規定以外的重要事件，即使我在省內，亦祇有請示中央，照這樣辦，決不會發生權限上的錯誤。因為在這種制度之下，祇能夠如此辦去，效率的壞，就不必去管它了！一個曾經在浙江省辦事好多年的工作同志，他在省裏的時候，本是為所欲為，不但沒有受到中央很大的束縛，就是省政府對他的束縛也極少，他在公路建設上的確有了很顯著的成績。不久以前，他在中央擔任主管交通的職務，如果省裏要建築一條路，或是一座橋樑，計劃預算必須呈部核准，才能動工，甚至連公路的行車牌照，都要由部裏直接發給，好像一經過省的手，國家就不統一，弊病就會發生似的。我曾經同另外一個熟朋友談過這類問題，我說：「某君恐怕是忘記了過去在省工作的一切，或是否認他過去在省工作的一切，不然，為什麼前後顛倒得這樣厲害呢？」那位朋友說：「這就是制度及由制度中間產生出來的必要手續呀！」

一個機關內職掌範圍應該明白的規定在它的組織條文裏。應屬於這機關的事務，不能稍有遺漏，不應屬於這機關掌管的事務，絕對不許訂入，這樣才是符合名實一致，權責分明的原則。可是我們一般機關擬訂組織規程的時候，總是想面面都顧到，以致內容繁雜，發生權責不清的流弊。譬如這件事，本來是某一個機關本身職掌的範圍，而在機關的組織條文上有去，又好像與其他機關有關係似的。所以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就得先與那個機關簽商，有的案件，要與好多個機關發生關係，於是簽來簽去，一

件公文上，貼了好幾個機關的簽條，簽得不好，還要再簽。這件公文，就像排球一樣的打來打去，不容易落到地面。我曾發現有一件案子，來文是電報，收文機關因為不明案情，向有關機關簽詢，這個機關也不清楚，又簽詢另一個機關，如此你簽我簽，經過半年之久，電報紙上粘了十三個機關所簽的二十七張簽條，還是落得一個「無案可稽」的結果，豈非滑稽奇談？這等簽來簽去的辦法，好像是爲了完成彼此共同負責的手續，藉以減輕自己的責任。我則以爲看是一種彼此消極而不負責任的無聊辦法，與講求行政效率的目的，正是南轅北轍，倒不如由一方面積極的負責辦理，較爲迅速而有效。寫到這裏，我又想起一個有趣的笑話來：一位黃頭髮藍眼睛的盟友，住在某縣的招待所裏面，有一天的晚上，他要帶一個女性進來同住，他問那招待所管理員：「可不可以？」管理員說：「要請示縣長。」他氣急起來了！說道：「這是即時可否的問題，我等不及你去請示！」結果，請示尚未下來，人家的問題，就在指示的時間解決了！這是權責不清手續繁複影響效率的一個例子。這種政治上的缺點，不知何日才可以改善呢？

【怎樣才能根除貪污】貪污爲法所不許，人所痛恨的事。但是現在恐怕還沒有杜絕貪污的良好辦法，也可以說還有很多沒有明白貪污的理由。貪污會有理由的麼？假使貪污的理由可以成立，那麼貪污就變成正當的行爲，至少是可以原諒的行爲。記得兒時父親對我說：「當大荒的時候，饑民開倉吃大戶，縣官是不能治罪的。」他雖不說出什麼理由，照我推想，這是人類生活最後的正當防衛，亦即是生活的最後權利。這話，我在「廣西政治」篇中已提過了。中國的士大夫，素來以「失節事大，餓死事小」來號召社會，講求氣節。但是我們在歷史上看到甯死而不失節的，究竟數得出幾個人？也可以說最大多數人，到了饑餓迫近死亡線的時候，就會轉變其他的方法，以求得到他生存必需的條件。爲了此種條件的取得，可能生出兩種不同的行爲。第一是積極反抗的革命行爲，第二是消極自私的貪污行爲。第一種行

爲是想推翻目前的制度，卽是推翻當時的統治階級，求得大眾的解放。第二種行爲是想在目前的制度內，用自私的方法，來破壞制度，求他個人的利益與生存。所以這兩種行爲，在公的觀點上看，第一種是革命，第二種是貪污。但是無論那一種行爲，他的始因多半是由於現實制度發生缺點而演變出來的。所以我們要剷除貪污，還得從現行制度去檢討改進。本黨五屆十一中全會的時候，大家對官吏的貪污問題，非常注意。某委員會說了一個慘痛的故事：某部的科長，每日下辦公的時候，必挾着一大包東西出來，被守衛的人懷疑了，將他檢查，發見包在裏面的都是公共食堂吃剩的冷飯殘菜。（這是前幾年的事，在今日的公共食堂裏，是不會有冷飯殘菜的。）有人問他：「爲什麼把這東西帶回家去？」他說：「一家大小十多口，光靠一石公糧和數千元的薪俸補助費，實在不能生活下去，所以將公共食堂剩下来的東西，帶些回去，養養家口！」這一個故事，就有各個不同的看法。有人說：「這是貪污行爲，至少是盜竊公物。」也有人痛心公務人員生活的沒有保障，認爲這是人類求生存的微末行爲而予以同情。因爲他既不能挺而走險，亦不能或不顧作違法貪污的行爲，乃迫而出此無可如何的下策，若果一定當他是貪污或盜竊的行爲看待，而予以一種相當的刑罰，至少是陷於「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錯誤。我之要把這件事情敘述出來，並不是同情貪污，因爲類似這種情形，各地不知道有多少，而不爲人們所注意罷了！我們想杜絕貪污，若不從社會制度改革着手，或最小限度將官吏俸給制度予以改革，恐怕貪污的事實，是容易根除的！

【三十四年是浙江的法紀年】我鑑於官吏的貪污問題，在戰爭的末期，越趨嚴重，特規定三十四年爲浙江的法紀年。我所謂的法紀，是多方面的，而不是單指官吏的一面。因爲現在的貪污行爲都是受授兩方共通的，所以要檢舉發覺，就很不容易。例如兵役上的貪污，必先是有人不願意去當兵，才肯以很多的錢，賄賂兵役人員，然後這個事實，才能成立。自然也有先由官吏不接手續，將許多的壯丁都綁來

了，然後受了賄賂而把他放了的，但這比較的屬於少數。此外種種類似的事實，不勝枚舉。而一般的責備，却都集中在官吏身上，而輕視了受授同科的法律意義。有人希望我在法紀年的口號之下，先帶幾個人頭來示衆，然後法紀才可以樹立。其實照法律的規定，省政府對於所屬行政人員，違犯法紀者，祇有撤職查辦的行政處分權，其餘都是司法方面的責任，殺頭不殺頭，是不與省政府相干的。同時我又覺得中國人一般的頭腦中，還深印着封建的舊觀念，一個當地方官的人，或是中央派到地方來的人，總是想有背在上方寶劍先斬後奏的特權，才可以顯出自己的威權，使人民畏威而懼服。在社會方面，也以爲今日需要包龍圖復生，把他的龍頭劍、虎頭劍、狗頭劍，威風凜凜的擺在大堂上，好像這三個劍刀，就是構成青天大老爺的必要條件。其實包龍圖是否真如小說上說的日斷陽夜斷陰的特殊能力？他老人家是否真有那種嚴酷的作風？我們不得而知。但這種嚴酷的作風，一定要具有他那日斷陽夜斷陰的神察，才成其爲理想的包龍圖。否則「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而況是三劍之下，還不能造出多少罪惡來麼？二三十年的時候，韓復榘在山東，頗有些做效包龍圖的作風，也有一些人，稱道他爲「韓青天」，豈不可笑！我以爲中國人已在歷史上造成一種重刑觀念，與一種輕法觀念。因爲重刑，就會輕法；因爲輕法，就不能不用重刑，這是互爲因果的問題。所以我以爲要完成中國的法治，建立良好的法紀，須得從各方面加以法教，而不是一方面執法，可以達到目的。太史公「劃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義不可對。」便是法教最好的見解。

有人問我：「爲什麼在戰爭的末期，一般人——行政官吏部隊官兵社會人民——的精神，都不如初期那樣好，行政的效率減低了，戰爭的力量減小了，民氣的發揚與民力的貢獻，都不如以前，而違法貪污敗壞法紀的事情，則一日多似一日呢？」我的答案是：「主要原因，由於物質的缺乏，就他們本身來說，營養不足，生活不能維持。就他們身外來說，一切應用的物質，都極度缺乏，那裏會有優異的行政

效率？那裏能杜絕敗壞法紀的行爲？須知戰爭初期比較良好的精神的表現，是由於職前留下來的「一些物質——本身的與身外的——」的原故。現在這些僅有的物質，已經消耗完了，也可以說效能發揮完了，一切的現象，都是表現減退甚至消滅。中國人素來是重精神的，以爲一切都是精神的作用，而忽視物質乃是一切的基本條件。德國人的精神不能算不好，然而結果不能不出於無條件投降，因爲他的物質最後是太劣勢了。一般的精神論者，宜可得到很正確的反證罷！」

【法紀年之意義及其推行要點】我對於行政效率與法紀問題，寫了許多好似題外的意見，其實這並不是題外的文字，而是題內應有的文章啊！關於法紀年的意義及其推行的要點，我已有文字發表，那是正面的說法。因爲意有未盡，不能不在此加以補充說明。並將法紀年開始時所發表的那篇文字，附錄於後，以備參考。

元首在「中國之命運」中指示我們說：「合羣是人類的天性，個人離開人羣，便沒有生存的辦法。」又說：「在人羣的裏面，個人與個人之間，個體與全體之間，自然有其共守的規則，而後羣的生命才可以維持和發展。這種規則，在一方面是道德，在另一方面就是法律。」我們可以再引伸說，道德是辨別善惡的標準，法律則是判定是非的標準。在近代的國家中，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都應當從是非上去辨別，不應當從利害得失上去維持，這是不容置疑的。

自從不平等條約廢除以後，元首屢次語誡我們要注重法治，方可以與盟邦真正立於平等的地位。本席因鑑於近年來社會風紀的敗壞，影響抗戰的力量與建國的前途，所以在上年夏季手訂本省十二施政原則的時候，也特別提出要注重法紀。今年元旦日我又曾在所寫的專文中，加以懇切的說明。

法紀是什麼？說來並不如何深奧，國有法律，黨有紀綱，這是各國所共同的，假如人羣的結合

體——國家沒有了法律紀綱，這就等於沒有組織，更談不到結合體的維持和發展。本黨的基礎在黨史黨德黨魂與黨紀。我國的革命，即是要達成法治。所以說在軍政時期行軍法之治，訓政時期行約法之治，憲政時期行憲法之治，也就是說，在任何一個時期都脫離不了法治。

國父將政權與治權分開，政權中的選舉、罷免二權是對人的，創制與複決二權是對法的；治權中的考試、監察二權是對人的，立法、司法二權是對法的，而行政權處於其中，一面以人行法，一面也以法治人。足見國父對於法的重視，而國父所設計的中華民國建設圖案，整個的就是以法治為目標的。

有人說法律就是規則、規律，軌道都不錯。我們知道世界上凡是愈高的學問，愈注重規則，一切的自然科學都是從一定的公式出發，數學是最具規則性的學問，所以它最有正確性而為一切科學的基本。我們又知道，凡是最具有規律的文化產品，也是最好的，音樂有律，詩詞有律，戲劇有律，假如不合於律，便不成為文學或藝術，我們更知道凡是一切自然的運行與科學機械的效率，都是從軌道得來。天空中星球的運行有軌道，地上的車輛來往也需要有軌道。一旦出了軌，便可以釀成大禍。法律是人類意思的規則，生活的規律，行為的軌道。因而文化愈高的民族，就應當愈成為法治的國家。

過去有一般人說，我們在革命時代，革命注重破壞。又說我們在抗戰時期打仗不擇手段，又說我們要求民主，民主所要的是人民的自由，這些話都似是而非，但都足以影響一般人對法紀的觀念。革命是弔民伐罪的大智大仁大勇的行為，如其一個革命團體沒有了紀律，絕對不能達成他的任務，也決不能獲得人民的擁戴。抗戰是將國家民族轉危為安的空前偉業，本來戰時也有戰時的國際公法，足見戰爭仍不能離開法律。而我國的抗戰，並且還是與建國並重的，如其國家沒有了法紀，意

志力最當然只有分散不能集中，則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又何從達到？至於說到民主，實在就是憲法之治，其所注重的是使政府與人民都在憲法之下活動，而不是將人民仍行分散成一片散沙，只知個人，而忘記了國家的法紀。

我國過去所以不注重法紀的原因，不外幾種：（一）權利義務的觀念不明白，個人權利的被侵犯，不知道請求保護。侵犯了他人的權利，不知道這是不應該，對於個人的義務只知道避免，不知首先去盡；而對於他人的義務，則要求得很苛刻。（二）個人與國家間的關係不清楚，自己破壞國家的法律，而要求國家的法律保護，自己不守法律而批評政府不重視法治。（三）在執行國家法令的人，得了法令所賦與的權力，而忘記了賦與其權力的法令，這等於是忘本。（四）在封建思想遺留下來的毒素中，許多人仍以遵守法紀爲愚魯無能，而以能毀法亂紀爲光榮。因以人與人之間都講情感，講關係，講利害，而不講是非。

我現在鄭重地宣佈：今年是本省的法紀年，這是遵照 元首迭次的指示與上年宣佈的十二原則一貫而來的，我不是說本省過去完全沒有法紀，但顯然的是不夠。我希望全省的黨政軍教人員及全省同胞不可再蹈着過去的覆轍，此後必須更進一步地去認識法紀、認識時代、認識國家的需要，認識盟邦的企望，認識民主的基礎，也更認識多多少少因爲法紀不張而蒙到損失受着侵害人的呼聲，時代不許我們再玩忽，國家不許我們再凌亂，社會不許我們再因循。

至於要使法紀年推行有效，我特別提供下列十點，爲我全省人士奉行的準則：

一、在法紀之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於法外享受權利，亦不得於法內避免義務，此後全省人士，務必人人以此自勉勉人，並且隨時互相督促，互相檢討。

二、法律的常識是民主國家公民所必備的，在黨政軍機關的紀念週，國民月會或小組會議，都

要以講解法令爲重要課題，不但要瞭解條文，並且要瞭解立法的原旨，執行的方法，而於執行後的效果與反應，也當隨時注意意見貢獻上級作爲修訂的參考。

三、全省的學校，除公民課程中已有的部份外，對於法律的智識還要多多講授。尤其是關係人民權利義務的基本法律。至於現行的各種政令也當隨時約請黨政工作人員到校講解，務使學生能以協助推行引爲己責。

四、各級訓練機關，都應當加授法律課程，主要的是要鑄法治精神於軍事管理之中，使其養成法治的習慣。

五、個人的身體自由以及依法保障的權利都應當尊重，中央已有詳細的保護法令。此後人人必須以尊人自尊爲主，不可輕易侵犯他人的身體自由與各種權利，致蹈法網。凡是執行公務的人員，對於法令所要求的目的，必須依照法令所規定的手續去辦理。不可以爲目的而不擇手段，也不可以予人民法令外的負擔或損失，更不可以拘打逮捕禁閉爲執行的唯一方法，否則定要受到法律上的處分，而上級對下級的考核，此後除注重效果外，同時也要注意到其達到效果的方法，以及有無副作用的發生。

六、在法紀年中，對於貪污的剷除，也是一項重要節目，中央所設的監察機關與司法機關此後定能負起其應負的責任，中央所訂定的各項檢舉控告辦法都也已很完備。大家不可再作苟且倖倖的心理，也不可再存天下滔滔，我又何必衆醉獨醒的錯覺，更不可自以爲大事、糊塗，細目末節可隨便。所以因文武公務人員貪污致受損害的人民，應當實行檢舉，不必怕會被人報復，也不必怕上級政府或司法機關不嚴辦，人民尤其不可再將公職人員視作爲昔日的官僚，認爲無不可以用錢商量，托出國家，敗壞風氣，貪小失大，自害害人。

七、保障人民，懲治貪污，都是法院的職權，各級法院此後一定能積極執行職務，各方面尊重法院，協助法院，每一件案件在未判決之前，各方面不可隨便批評，致影響判決的公正。已判決之後，法院應當將辦案的經過及最後的判決向社會公布，這可以使民衆瞭解事實，獲得是非。英美二國民間法律常識的普及與是非觀念的明白，說者很歸功於法院判例的經常宣佈。

八、法院詢問案件，原則上是公開的，看守所以及監獄，原則上也是任人參觀的。一般人士尤其是各級公務人員，學校學生應當隨時到法院去旁聽，到監獄中去參觀。這不但可以增進各人的法律常識，也可以增高一般人士對司法機關的尊重心與司法人員的改進心。

九、在一般人民法律常識尚未完全普遍的時候，凡是具有法律常識的人，都應當以扶助他人爲快樂的服務，律師是人民法律的先生，尤其要注意是非，指導人民。不可完全以公費多少爲辦案的標準，更不可故意引導人民入於法律的迷津，顛倒社會上的是非，增加了人民間的訟累。其他有法律常識而現在並不以律師爲業的人，也不可以法律作爲自有的祕寶，應當隨時出其所學，爲無辜無告的人效勞。

十、古人說法之不行，目上犯之，尤其是在此訓政時期，黨政人員的一言一行，動爲人民的表率，此後務求口非法不道，身非法不行，風行草偃，視聽一新。而在抗戰時期，軍事第一的口號之下，軍職人員尤當處處以法律爲重，軍下臨民，都必須依乎法律。此後不得再有驕矜跋扈妨礙他人奴辱人民捆綁勒索鄉保長、壯丁、士兵、民伕等情事。最近戰區軍風紀巡察團擴大組織，提高職權，任何人均可告訴檢舉，終難逃軍法的制裁。

總之，法治是國家的綱常，也是社會生活的規律。本省同胞文化優秀，對法治之重要素有認識。值茲反攻前夕勝利在望，憲政將終，復員可期的時候，希望人人以守法奉公爲榮，以敗治亂紀爲

恥，各級民意機關及輿論界，一方面是政府的耳目，另一方面是民衆的喉舌，負有宣導的責任，享有檢舉的力量，尤希博採周諮，毋偏毋枉。則社會風氣立可轉移，政府吏治立可澄清，民間疾苦立可減輕，而現在所流行的悲觀、煩悶、幼稚、妬嫉、墮落、腐化的各種現象，也均可立除，我們將眼中有秩序，有規律，上軌道的新浙江的各部門，均可迅速地建立並充實起來，這是抗戰的新力量，也就是建國的新基石。

廿三 教育年

「浙西淪陷後教育設施之一斑」杭、嘉、湖是浙江教育文化的中心區域，那裏有大學校（浙江大學、之江大學）專科學校（藝專、醫專）及各種職業學校（工、農、商、蠶桑、助產等）師範學校。至於普通中學及中等以下的學校亦比浙東各地發達。學校的設備，也要完善得多。自從淪陷之後，這些公立中等以上的學校，大多隨着軍隊與政府撤退了。可以說，二十六年的年底及二十七年的上半年，是浙西各市縣學校的播遷時期，除了少數遷移省外之外，到了二十七年的下半年，大都已在本省的自由區內復課。但是各學校原有的設備損失了，原有的教職員星散了，學生的數目也減少了，於是不能不將這三屬的幾個省立中學、師範分別歸併起來，成爲聯合高中、聯合初中、聯合師範。所謂聯合，就是將數個學校暫時聯合爲一個學校，以表示他們原來的名義仍舊保留着，等到勝利復員之後，再行恢復的意思。那些私立學校，如宗文中學、安定中學、清波中學等，都是由陷區裏掙扎出來，尤其是吳山聾啞學校，也由杭州遷移淳安，他們在不言中表示出民族的氣節和抗戰的熱忱！

在當時未及退出的學生，都回到家鄉去躲避，但經敵人的壓迫侮辱，這些有血性不甘做順民的青年，仍舊陸續的退出來，政府不能不在陷區鄰近的地方，設校收容。於是又有臨時中學、臨時師範的設置。不但浙西如此，浙東也是如此。最先成立的是浙西第一隱中，這些在淪陷之後才退出來的學生和先生，他們都是親身嘗過了敵國統治蹂躪的酸辣滋味，千辛萬苦的跑回祖國自由的懷抱，所以他們的精神和生活都比最先撤退或原來在後方的要緊張刻苦得多。除了這些由政府設立的臨時中學之外，私人創辦專門收容陷區青年的學校也不少。如嘉區聯立中學便是嘉屬的士紳張天方、陸初覺、戴文珍辦理的，他們

在陷區裏辛辛苦苦籌錢籌米收容嘉屬的青年。我見到他們的師生，雖然還保持着文質彬彬的嘉屬風度，但在精神上則充分表現着同仇敵愾的情緒。我對他們以及他們留在陷區裏的父老顛沛流離的景況，起了惻惻的同情心，而對他們堅忍苦鬥的意志，更是十分佩服，這就是超人傳統的特性呵！

【創辦英士大學】二十八年戰事局勢稍定，我覺得大學教育在接近戰區的省份，還有繼續的必要。省政府曾經有電報給遷到廣 宜山的浙江大學竺可楨校長，歡迎他們回來。浙大雖已改爲國立，但就他的歷史及名義來說，同浙江的關係是不可分的。我們是竭誠的希望他們回來，可是，爲事實的困難，不能實現。校方祇答應以後在浙江設一個分校，祇辦一二兩個年級。就是說，分校的學生修畢二年的課程，就要送到本校去。我覺得此次戰爭，爲期必定很長，說不定會拖延五年、十年的，若果省境內沒有一個大學，省內每年畢業的高中學子就沒有升學的機會。這樣浙江人材的培養，就要受到極大的影響，雖然那時還可到大學方的各大學去升學，但是在戰時交通的困難，匯兌的不便，用費的浩大，又有多少學生可以到大學方去讀書呢？於是我在省府提議由省另外創辦一個大學，當時也有人會這樣的顧慮：第一、戰事結束的久暫，姑不置論，但在動盪的戰時環境中，是否可由我們安心去辦大學？第二、在人材物質與財力困難，戰時，是否能創辦一個完善的大學？但是我的見解是戰事決不能遍及全境，祇要尚有一塊比較安全的地方，就可以而且應該辦理。同時抗戰的時期，一定很長，能在戰時堅苦的環境中掙扎出來，鍛鍊出來的學生，一定有很大的成就，所謂「明恥教戰」，就是這個意思。至於戰時人力、物力、財力的困難，自所不免，但是並非絕對不可能解決的。我們做事，應以需要爲前提，決不能因困難而停止。提案通過了，並立即撥款籌備，我當選爲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而實際的負責人，是教育廳許廳長，廿八年八月，這個嬰兒落地了，奉 蔣先生的意旨，命名爲英士大學，是紀念浙江革命先烈陳英士先生的意思。校址起初設在麗水，後來因爲軍事影響而遷至景寧、奉順。三十二年又遷回雲和小順。

翌年再遷泰順。這個大學的嬰兒時期，是由浙江省政府及一個校務委員會來負責保育的，它在艱難困苦中長大了，現在已有了好幾班畢業的學生。二十八年所種下來的桃李，現在已是綠葉成蔭子滿枝了。三十二年九月，改為國立，並派杜佐周爲第一任校長。我重來浙江之初，決心要在抗戰期中創辦一個大學，至今已償我的宿願，這便是我手創的「二個大學」（第一個是廣西大學）。

【戰時浙江教育的發展】浙江教育，抗戰初期雖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但到二十八年，又逐漸恢復起來，並隨戰時的延長而繼續發展，這裏舉出幾個統計數字，以見其一斑：中學校（包括中學、師範、職業）由廿六年的六十八校，到三十三年增至一百八十二校，中學生由二十六年的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九校，到三十三年增至一萬五千七百四十校，小學生由二十六年八十九萬三千九百四十二名，至三十三年增至一百零一萬四千五百零九名。各縣教育經費，由二十六年二百八十一萬二千四百三十二元，至三十三年增至五千七百六十一萬四千六百零二元。這裏所指的數字，學校與學生增加數是實的，而教育經費的增加數却是虛的。因爲戰前的一百萬元，到了三十三年，應是五千萬元以上了。所以教育經費表面雖是增加，實際價值，却是減少。而學校數學生數的增加，更顯示出教育經費的困難。因經費的困難再加上戰事的影響，教育的效果、學生的程度，就不免降低了，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呵！有人說：中等學生的增加，是受了兵役的刺激。因爲以前的兵役法，規定中等以上的學生是可以緩役的。我記得三十二年教育部長陳立夫到浙江來視察，在某次集會裏，他特別提出這個問題來說：「爲逃避兵役而進中學的情形誠然是難免的，但是全國適齡的壯丁，至少有一、四千萬人，而全國的中大學生不過是五十多萬，即使全數都是逃役的壯丁，也不過總數百分之一二，兵役機關既有這許多可徵的壯丁，就讓我教育機關拉去這五十多萬，於抗戰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影響呀！」他的話說得很委婉而動聽，但是我祇贊成一半。因發展教育是一件事，徵兵

又是一件事，兩者並行不背的，而兩者都要認真辦理，才能滿足國家的要求。

【戰時學校人的條件與物的條件均感缺乏】在戰爭期中，物質的缺乏是必然的，尤其是在生產落後的中國。三十一年，我對於前方作戰的士兵生活，起了同情的呼籲，並且想盡我的力量予他們以幫助，同時我也不忘記為國家獻來柱石的數萬學校青年。我每巡視到一個地方，都要到學校裏面去看看他們的生活狀況。由淪陷區退出或臨時成立的學校，固然沒有完好的校舍；即是後方的學校，原來的校舍，也多半成為敵機轟炸的目標。如省立處州中學、衢州中學、台州中學等校都已化為頽垣瓦礫了。即幸而保存未受損毀的，亦因空襲頻繁不易安心研讀而搬遷至隱蔽的鄉下去上課了。因此鄉下荒涼沈寂的祠堂廟宇，就成為戰時弦歌不斷的校舍。至於教育儀器圖書等設備，少數學校還保存着舊有的東西，多數的學校或淪陷了，或敵機炸毀了，或在播遷中散失了，不僅無力補添，抑也無從補添。尤以新設的臨時中師最沒有辦法。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資歷很高學識很好的教師，也未必有很好的教育成績。何況好的教師，在戰時也不容易請到。甚至有些科目，還根本請不到教師呢？我對於現在擔任校長及教師的先生們，衷心至表敬佩！他們都是苦心孤詣的在那裏維持學校垂死的生命，為國家培養未來的人材，希望渡過這一個難關，仍舊恢復以前的光明與健康。他們的待遇，雖與省級或縣級的公務員一樣，但因為環境的困苦，設備的簡陋，他們的生活，總是特別枯燥，而容易引起苦悶。總括的說：現在的學校是黑的黑板與白的粉筆，黑的房屋與白的天窗，以及白紙黑字的講義，其餘真是貧乏得可憐，教育的人的條件與物的條件困難如此，那裏會有好的學校與好的成績？然而我們不要忘記，這是戰爭時期呀！

【戰時學生的營養問題】講到學生的營養問題，更嚴重了。我曾考查一個擁有九百多學生的中學，他們每日吃的食油，不到三斤。那些青菜就是用水加些鹽煮熟就算了，他們不但是三月不知肉味，就是油味聞到的也不多，膳食的管理是由學生組織一個膳食委員會主持的，學校當局不大負責任。學生方

面，以爲出諸自己的手，一切都是盡善盡美的了。因爲膳食由學生自己管理，就可以免得被人家揩油。我在浙西某臨中的廚房裏面，見到學生食的飯，有砂有穀，難以下咽，那個廚房是與灰房廁所聯在一起的，蒼蠅滿室亂飛，骯髒不堪，我問那幾個管膳食的學生，爲什麼不將廚房打掃清潔？他們說：「我們祇是管賬，不負清潔的責任。」我說：「你們祇知管金錢的小賬，那些衛生的大賬，就不會管了。」他們爲的想多吃到一些食物，恐怕連砂子、穀子、蒼蠅、細菌，都要吃下肚裏去，這樣有礙衛生的飲食，是容易致病的，如果害了一場大病，不知要受多少的損失？萬一醫護不當心，連性命也可以斷送了。中國人往往重視金錢，輕視衛生。其實這些清潔衛生的問題，學校當局應該負責。即使膳食歸學生自理，學校當局也要時常監督，指導他們要做到清潔衛生的要求；否則，徒美其名曰訓練學生自治的能力，又何從得到良好的成績呢？學生的營養不足，大家都已知道，我主張要提高收取學生的膳食費用，以增加學生的營養。但是學校當局總以爲膳費數額提高了，貧苦子弟便無力繳納，而有失學之虞，我則以爲國家既尙不能解決清寒學生的求學問題，在這過渡時期，甯可忍痛將這些不能繳費的學生退學，不可因爲少數人不能繳費，而妨礙多數人的營養。中國素來以儉爲美德，不但比較貧困的人要節儉，即使小康的人，也是講節儉，以致學生家庭，不欲多繳費，學校當局亦不願要他們多繳費。因爲儉是中國固有的美德呀！其實儉爲美德，乃指不奢侈而言，若果儉到生活水準以下，不但不是美德，而是戕害身體的不道德行爲。這種道理，很多人還未瞭解。多數學校爲補救這個學生營養問題，通常的辦法，就是准許學生帶私菜。我有一次到英士大學去，曾同杜校長去參觀學生的膳食情形，其中有一個桌子上，八個人在吃飯，有三種不同的菜，有兩三個人是吃學校裏的公菜，有兩個人自己添了一些鹹菜、鹹鴨蛋之類佐膳，另有三個人吃的是魚和肉。在一個桌子上情形，就這樣的不調和，我見了也覺得爲他們難爲情，不知道他們同桌食飯的人又作何感想？我對杜校長說：「這樣會形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呵！」

「尊師重道和培養師資」「尊師重道」是中國的古訓，一般老百姓的香火堂上多供着「天地君親師」的牌位，於此可見「師」在中國社會上地位崇高的一斑。韓愈有言：「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是中國對於師的傳統觀念，以為有了師，教育的問題，就完全可以解決了。但是在社會環境日趨複雜，知識範圍日漸廣大，師資僅是教育上主要的一個因素而已。有一次浙大龍泉分校要我去講演，討論到現在學校的成績問題時，我說：「學校成績的良否，完全看物質的設備情形怎樣？因為我認為人類的智識，完全以環境的物質設備與本身——即指受教育者的本質——的資料如何而決定的。所謂物質的設備，不單指普通所謂閱書儀器及校舍環境等種種物質，就是你們的校長教授也是物質，不過他們是動物就是了。」說時，全堂哄然大笑，那些校長教授也有些難為情起來。因為我將校長教授當做一種動物看待。好像我對於「尊師重道」的古訓，有些違背的意思。其實在我的教育意識中，我祇認定分為兩種物質，一是受的質，即學生的本質，如身體生理的健全等等；二是授的質，如校長教授圖書儀器校舍環境設備等等。受的質是先天的，暫且不去談它。授的質是後天的，必須使它完備，才可以得到良好的成績。過去總以為有了師，教育上的一切都解決了，而不知師僅是我所謂授的物質之一種，此外所需要的物質，還是同樣重要而為數更多。並不是我對於師道不算不重，而是我的解釋師道，包括了一切授的物質，一切都要同樣的尊重，而不僅僅是幾個校長和先生。

儘管我們古訓今訓如何的尊師重道，但是就浙江來講，師資是何等的缺乏？也不僅浙江，恐怕全國其他各省也是同樣的缺乏。根據浙省教育廳三十三年的統計，現在全省的小學教師，合格的僅佔百分之三十八，而代用及不合格的教師却佔了百分之六十二。若果要普及全省的國民教育，需要的師資照現在的數量（二萬六千餘人包括合格與不合格）還要增加二倍半，即六萬三千餘人。培養師資，是一個極繁重的工作。固然充實各級學校的其他的物質設備，也同樣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這幾年來，教育

行政當局，對於師資的培养，極爲注意，不僅創辦各種師範學校，提高師範生待遇，並且限制普通中學的設置，引導多數小學或初中畢業的學生升入師範學校。這個方針是正確的。可是現任的教師們和社會一般的觀感，總以爲學師範，當教師，是沒有很大的前途，除了一些貧苦的學生，被迫的走到這條路上去，此外立志投考師範學校的學生，却不很多見。就是已經養成的師資，又很多棄其所學而轉移到別的工作崗位上去。因爲中國現在舉辦的新興事業甚多，不論公的私的，都需要很多的普通工作人員，不必有一定的出身和專門的技術，而任何部門的待遇，都比當教師爲優。在抗戰初起的時候，教育廳的調查報告，本省很多地方的小學教師，每月待遇僅有十多塊錢，在當時已感覺得很苦，所以溜走的很多，但是以現在的幣值來伸算，已是一萬多元了；而現在的小學教師，連一切的待遇都計算在內，還沒有超過一萬元，固然在戰爭的末期，一切各部門工作人員的待遇，都大量降低，但是小學教師的待遇，本來就很微薄，即使能恢復到戰前的待遇，也是清苦得很，何況相差還很遠呢！在這種情形之下，怎能得到良好的教師？教育事業，又怎能迅速的發展？

「教育和軍事還不能配合」在戰爭的期間，自應以「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爲一切努力的目標。也就是說，戰時的人力、物力、財力，一切都爲了軍事，一切都爲了勝利。可是我們檢討現在的教育，真能夠和軍事配合了嗎？我們無可諱言，現在的教育與軍事，不免有脫節之處，試看一般學校對於軍事意識是何等的消沉？雖然蔡子民先生有過「讀書不忘救國」的嘉言，現在也有「讀書不忘軍事」的口號，但總不能用軍事和勝利的意識來刺激教育的前進。現在一般學校好像有些厭聞軍事了。現在學校裏的學生，不知是否真與以前說的有逃避兵役的人在內。

「戰時教育第二平時教育第一」我見到以上所說教育上的種種缺點與危機，因此提出了戰時教育第二戰後教育第一的口號，我認爲這種種不良的現象，都是戰前尤其是軍興以來政府與社會不認識教育不

注意教育的原故，若果從此認識起來，注意起來，未嘗不可以作末流的挽救，尤其是在戰後的建國，非是在教育上有積極的努力，和澈底的改革，是不會成功的。在這次世界大戰當中，我們認識了「物質決定一切」的道理，而這些物質，都是由高度的科學發展而來的。教育是發展科學創造物質的工具，也就是說，一切都要透過了教育，才可以達到目的。我認為「有教無類」的道理是正確的，不管那一個民族，過去有如何悠久的歷史，有如何古舊的文化，若是離開了現代的科學教育，便有落伍而至被淘汰的危險！這次決定世界戰爭同盟勝利的重要國家，如美國、如蘇聯，都是一般人認為沒有悠久的歷史和古舊文化的民族。然而他們却表現了非常強大的決定力量，這是他們近代科學的成功呀！我也可由此推斷，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蠻族或落後的民族，假使先進國家能夠幫助他們，發展現代科學教育，那末數十年之後，他必定也能躋於世界優秀民族之林。因為科學教育，可以將他的一切加以改造起來。反之，不論那一個有悠久歷史與古舊文化的民族，若果還是想保留他腐舊的軀壳，而夜郎自大，故步自封，不思及時改革，必至因落伍而被淘汰。因為他的悠久歷史與古舊文明，是適應當時環境的教育造成成功的。環境改變了，這種古舊的文化，已經失了時代的價值，還值得去保存它麼？

【三十三年為浙江的教育年】我在三十二年冬，本省分區舉行行政會議的時候，為喚起全省人士及行政人員對於教育事業的注意，就決定三十三年為浙江的教育年，並親擬一個「推進本省教育實施方案」提付討論，獲得一致的通過。三十三年春，省府會議復決議提撥各縣積穀八萬石，作為教育年擴充教育所需的經費。這個決議，三十四年仍延續有效。并希望以後永久的或更擴大的執行這個決議，以促進教育的發展。當教育年開始的時候，我曾發表過一篇文字，以說明其意義。

首先說明我們為什麼要提倡教育：「簡單的說一句話，因為教育是建國的基本工作，抗戰的勝利在望，建國工作亟須加緊努力。在目前任何地方，任何機關，任何部門，無不感到人才的缺乏，幹部的恐

慌。今後加強建國工作，百事待舉，更需要大量的幹部，來擔負這個艱鉅的任務。元首在「中國之命運」中指出實行實業計劃，最初十年內，所需各級幹部人才，計二百六十七萬二千五百人。這樣大宗的人才，從那裏來呢？當然要以教育的方法來積極培養。這個培養幹部人才的教育責任，嚴格的說起來，不在中央，也不在省，而要由各縣來擔負。換言之，縣以下各級機關學校需要人才，不能求之於省或中央。反之，中央或省需要人才，可以責成地方供應。這話怎麼講呢？我們知道，不論是大學生或中學生，均必先受基礎的國民教育，國民教育的普遍實施，那便是縣地方的責任。如果國民教育不發達，國家雖創辦多少大學專科學校，也無法培養多少人才，以適應事實的需要。

「本省的教育，就質量上說，素列全國的前茅，就是抗戰迄今，依然保持着這個地位。可是就數量上說，與中央所規定的要求，相差還很遠。多數縣份國民學校還沒有達到二保一校的第二期標準，入學兒童，不及學齡兒童百分之四十，中學生平均不到五分之一。近幾年來，各縣固有了顯著的進步，浙西前線如孝豐、昌化等縣，進步更為迅速。但是我們不能在一省中，以此一時與彼一時比，這一縣與那一縣比，有了進步以自足，也不能在全中國與別省比，占了前鋒以自慰。我們既欲躋於現代強國之林，國民教育水準之高下，足以代表國力之強弱，我們目下的教育狀況，若與歐美各先進國相比較，真是瞠乎其後，不知落於何地了。設不急謀發展，迎頭趕上，即使抗戰勝利，我們在國際上還是不能獲得真正自由平等的地位的。」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今後自應積極提倡教育，並迅求其普及。」

其次指出教育的目的與內容：「國家興辦教育的目的，總括的說，一為適應國家生存的需要，一為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現代國家的行政，可以分為管教養衛四大部門，而以教為樞紐。教的目的，即是教人民具備管理國家，管理自己，養活國家，養活自己，保衛國家，保衛自己的知能。要達成這個目的

，教育的實施，必須具有科學的內容，因為管、養、衛三者，俱離不了科學的法則，茲分別說明如次：

「管」——管的意義是科學的組織，科學的管理。無論國家或社會的組織，一定要合乎科學的法則，才能實行科學的管理，發揮最偉大的力量。舉例來說：管理一萬個士兵，比管理一萬個老百姓要容易得多，帶兵官下一道命令，一萬個士兵無不服從實行，因為軍隊的組織，由師、旅、團、營、連、排、班一個系統下來，層層節制，紀律森嚴，合乎科學的法則，而一個鄉鎮長管理一萬個老百姓，要做到說東就東，說西就西，談何容易？鄉以下雖有保甲的編制，但組織未健全，管理未嚴密。這是就人的管理而言。再以物的管理作比較：現在晚上大家都點用油燈，假使實行燈火管制，要在同一時間內把一個學校或一個機關的燈光，完全熄滅，已屬不易，要將全村全鎮各家的燈光同時熄滅，是深難辦到的。如果改裝電燈，那末只要把發電機裏的總開關一按，所有幾千幾萬盞的電燈，便可一齊放光，一齊熄滅。因為電燈有科學的組織，所以能實行科學的管理。由此可見國家的組織，如果合乎科學，管理嚴密，如機器一樣，推行政令，必可達成迅速有效的理想。

「養」——養的意義，是科學的創造，科學的生活。原始時代，人口稀少，生活簡單，天然的物產豐富，靠天吃飯，不致有什麼困難。可是現是人口日增，慾望日高，天然的物產既不足享用，人力的生產，亦不足供應需求，必須以科學的方法大量的創造物質，才能養活人羣。舊法種植稻穀，每畝田年可產穀三石，如以科學的新法耕耘，可增產二分之一乃至一倍以上，所增的收穫量，便是科學的創造。山地種樹木，過去的用途，或造房屋，或製傢具，或充燃料，而今日科學昌明，可以作為造紙打絲的原料。過去絲織的衣服，都是蠶絲製成的。現在不僅利用木頭可做成人造絲，還可以用玻璃礫石抽成玻璃絲。過去的交通，或用車，或用舟，都是利用人力或獸力，現在陸上有汽車火車，水上有輪船，空中有飛機，既省人力，又節時間。這些都應歸功於科學家的創造。所謂科學的生活：就食而論，個人日常生活需

要能發多少卡羅里的脂肪、蛋白質、含水炭素？那些食品中含有那些營養素？科學家都有很明細的研究。就衣說：季節的轉移，氣候的變化，與衣服調節，都要合乎科學，使保持一定的體溫。再以居住來說：多少入住的房子需要多少空氣？光線強度如何？都有一定的標準，過多過少，過強過弱，都不合衛生，也就是不合科學家的要求。目前物質缺乏，我們一般的生活，離開科學的標準甚遠，今後必須運用科學的方法以創造物質，才能改善我們的生活，才能談上有所「養」。

「衛——衛的意義，是科學的國防，科學的戰爭。我們要建立一個現代的國家，必先有現代的國防建設。現代的國防建設，沒有那一項可以離開了科學。國防有三個要素：第一是國民的體格強健。我國一般青年的體格多不能合於國防建設的要求，大中學生成報考空軍，百人中沒有幾人體格是夠得上標準的。「無空防即無國防」，飛機本身已是科學的產物，駕駛飛機作戰的空軍，必須是體格強健而有科學素養的青年，才配擔任。空軍如此，其他如坦克車潛水艇等機械化的陸海部隊的戰鬥員，又何嘗不如此？第二是兵器。現代戰爭使用兵器，如大砲、飛機、潛水艇、坦克車等，無一不是科學的產物，大刀、長矛、弓箭等，還能在現代的戰場上發生威力嗎？第三是交通。近代最迅速的交通工具，不論是屬於運輸的，通訊的，也都是科學的結晶品，運輸與通訊，在現代戰爭中，居於極重要地位。由這三個問題要素分析起來，可知現代的國防建設，與科學息息相關。元首告訴我們：「無科學即無國防」，真是至理名言。有了科學的國防，才能參與科學的戰爭，保衛國家民族的生存。我們對日抗戰，全國軍民，既有百折不撓的犧牲精神，為什麼不能迅速勝利？推究其原因，即為我們的國防缺乏科學的基礎。

「管、養、衛三者的意義既已明白，教育的責任，即是要運用科學的方法，達成這三大目標，使全國國民人人具有自治治事，自養養人，自衛衛國的技能；所以教育雖為行政的一部門，而其內涵實包括政治的全部。」

最後指出目前教育上一般的缺點及其補救的方法，因為大部份已在前面提到過，不再摘錄了。

教育年於三十四年的三月閉幕了，根據教育廳的統計報告，總算收到一些形式上及數字上的效果，自然這種效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尤其是我自己，更不覺得有可以滿意的地方。因此我又在教育年結束的時候，發表了自擬的對於教育年以後的意見。特附錄於此：

「我在教育年開始的時候，曾說過教育年乃浙江教育復興之開始，因為浙江教育受了戰事的種種摧殘，纔有這個復興運動。現在教育年雖告結束，僅是一個開始的年度結束，而不是教育年事業的結束。教育事業必須永久不斷的進行着，且在今日戰事尚未結束，勝利尚未來臨之前。教育所受的各種威脅，不但沒有解除，甚至比以前更加厲害。故本省教育決不飽就以往之僅有成績，便認為滿意，而必須隨時警惕重大威脅之再度降臨，確定堅忍不拔之方針，與適應環境之計劃，以渡過目前之難關，企求今後之發展。這是在教育年結束的時候，吾浙人士應有共同感覺。我更不能不提出下面的幾個方針與辦法，作為浙江省教育繼續往開來的工作動向：

第一、對於教育年的實施方案，尚有許多未曾達到要求的地方，務於本年度內，力求其全部完成。這不僅在量的方面如此，更須在質的方面，作更大的努力，務使名實相符，質量並重。省政府對於以往各縣所報告之成績，尤須切實派員考核，以杜假報敷衍之流弊。對於實施方案之內容，尚有未盡未備，或實施之後，有須修正者，皆宜分別檢討，予以補正，使臻完美。

第二、省府今年仍繼續提撥各縣積穀八萬石，變價為復興本省教育三十四年度經費之用，此種辦法，以後如果實際上許可，並將作為永久之定案，或更酌量增加其數額。此事在初實行的時候，頗引起中央主管機關或少數人的誤會，我曾經常面報告元首，而深蒙其贊許。我想以地方之財物，用之於地方教育，乃是天經地義。積穀與其用於消極之救荒振濟，實毋寧用於積極的教育事業，

亦惟有在積極的教育建設之下，纔可以解決飢荒問題。所以積穀積極的提用於地方教育建設，雖達全部二分之一，也不爲過量；但政府對於計劃用途，及收支數目，務須力求公開，以祛除社會之誤會。

第三、青年學生之保養，應成爲今後教育上的嚴重問題與重大的責任。抗戰以來，因爲物質的缺乏，在節約口號之下，而致學生身體，受到重大之打擊，我對於戰時物質缺乏的事實，固不能完全否認，而對於這幾年來在節約口號之下，節到人體生理需要的水準以下，實認爲至不合理之事。中國數千年來，都是以儉爲美德。照我的見解，儉的意義是指不浪費而言，若果儉到生理需要水準以下，則不但不是美德，而是戕害身體的不道德行爲，所以除了政府方面盡其應盡的責任以外，尤須要求學生家庭，盡其應盡的責任，如果學生父兄對其子弟在學校中必需之營養費用不肯負擔，或不能負擔時，學校當可忍痛拒絕其入學，而不可因爲少數人之不肯負擔或負擔不起，而致將大多數人的營養份量減低，至同受殘忍的戕害生活。故對今後青年之保養，政府須確定方針，妥爲規劃，列爲極重要的工作之一。

第四、教育的目的，是以科學的知識，改造社會的風俗，推動社會的進步。浙江的迷信風俗，比任何一省來得厲害，迷信用途的錫箔稅，戰前一年就有數百萬元之鉅。各處的名山古剎，都是以迷信爲中心，而非常興盛，即使以全部的錫箔稅來辦理教育，其效果仍等於揚湯止沸，於事無補。所以我們必須展開破除迷信的政治運動，同時更須展開社會的科學運動，然後教育之目的乃可達到。現在迷信與教育，在並肩競爭，數千年來雄厚的迷信勢力，與數千年來的脆弱教育勢力相比，不知要多少年代，才可以把迷信革除？故今後必須展開破除迷信的政治運動，與展開更大的科學運動才能貫徹國家的教育宗旨，達到教育發達科學昌明的目的。

第五、中國舊文化的價值，實在使人感覺得太空虛了，經過了這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更使我們深刻的認識科學物質，是決定一個國家民族存亡的主要條件，因此我們對於中國舊文化，應重估定其價值，而熱烈地展開戰後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戰後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無疑的是建設在「生活」「科學」「物質」的三個基石上面，否則中國在戰後必不能與列強作和平的競爭。換句話說：今後是「生活」「科學」「物質」決定國家民族的命運，教育是文化推動者，要負起這個推動責任，必須在本身上作進一步的檢討，作更進一步的努力，而決定不是故步自封，就可以達到目的的。」

在教育年結束的時候，我把這些意見提出來作為我們對於浙江教育的方針與希望，但要完成這個偉大的工作，決非個人與少數人可以畢事，不能不望全省人士一致瞭解，共同努力。

有人問我：「浙江的教育經你提倡以後，在短期內可能收穫怎樣的成果？」我的答復：在目前環境之下，雖然會發生若干的效果，但決不能收到我所預期的效果。而我也決不因不能立刻收到所期的效果而失望。我現在是希望我所認識的教育意義，能得多數人的瞭解，從多數人的瞭解中，在最近的將來，達到我的期望。成功固不一定在我的任內或我的手上，因為教育是百年大計，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可見成效的，不過在我的任內，如果事實許可的話，我一定盡我的力量，甚至全省人士的力量，改進教育設施，推廣教育事業，以實現我所說的「戰時教育第二，戰後教育第一」的主張。

【資助公教團警子女入學】在長期抗戰中，公、教、團、警人員，以薪餉收入，來維持其日常生活，已極困苦，若再有子弟上學，負擔更重，情形更困難了。生活與教育，固同樣重要，但到了經濟力量極度薄弱時候，子女的教育，祇好暫且犧牲。在省級機關中，也有許多高級職員不能負擔子女教育費而忍痛使子女輟學的。我一方面提倡教育，而另一方面，眼見自己的僚屬，竟有不能送子女上學的淒涼情形，心裏非常難受。於是在宣布：十三年為本省教育年之後，決定另訂一個資助公務員教職員子女入

學辦法，規定本省省縣及鄉鎮保依法任用之公務員，本省省縣所屬軍警團隊之官佐，本省公立及立案之私立各級學校專任教職員，本省省縣立及已立案之私立社教機關職員，其子女肄業各級學校者，均可申請資助。省級人員之資助金由省款負擔，縣級人員之資助金由縣款負擔，鄉鎮人員之資助金由鄉鎮款負擔。資助金的給與，以一個學期為一期，並按申請人在同一機關的服務年資及其子女的教育程度，而異其數額。所以此項資助金的給與，實包含獎勵公教團警人員久任，及其子女上進的兩重意思在內。這個辦法，自三十三年一月份起實施，資助金額並根據物價的增漲情形，每個學期調整一次，以適合實際的需要。三十三年九月，本省奉到中央頒發戰時公教人員子女就學中等學校補助辦法，其立法用意，和本省所行的資助辦法，完全一致。不過中央規定補助的範圍，僅限於中等學校，並除子女一人外，始得申請補助，較本省之凡屬肄業各級學校而子女每人均可申請資助者為小。中央補助金係國庫支出，補助對象，限於中央及省級公教人員。本省資助金之來源，係各級另行籌集，資助對象為省、縣、鄉鎮全體公教人員。所以兩項辦法不相抵觸，仍同時施行。本省公教人員的子女教育，因此兩項辦法之實施，而解決了很多的困難，尤其是省級人員。

【科學獎金與科學研究費之設置】二十世紀是科學的時代，現代的國家，沒有進步的科學，是不能存在的，談民生固需要科學，談國防更離不了科學。所以現代的戰爭，可名之為科學的戰爭。由科學所創造的物質（包括兵器及國防器材民生必需品等），是否精良，是否衆多，決定戰爭的勝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亦然。固然科學的發明與物質的創造，有賴於平時的修養與努力，但是戰爭也推動了科學的進步，刺激了物質的生產。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看見了很多的新發明與新創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新的發明，新的創造，當然是更多了。在這種觀點之下，我覺得我們應在這個長期戰爭中，竭力倡導科學的研究與發明。其實，不僅在戰時應該如此努力，在平時尤應

如此不斷的努力。因為我國的科學發明與物質創造，是太落後太貧乏了。我們必須趁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來發展科學，建立現代強國的基礎。是以我在二十九年度的省預算裏，加列了科學獎金十二萬元，卅年復增列科學研究費五十萬元，科學獎金增列為十四萬元。這是浙江省預算新增的項目，數字雖然很小，意義却是很大，尤其是在財政困難軍費支出浩繁的戰時。這兩項經費，既同屬新增，為什麼數字不一樣——科學研究費多，科學獎金少，而且多少相差這麼大呢？因為必須先有很多人研究科學，然後才有科學的發明。在中國今日的社會環境裏，要研究科學，是不容易的，既沒有科學館的設備，又很少蒐藏豐富的圖書館，足供科學研究者的研究參考。一項科學的發明，往往須經過長期的研究試驗。在研究試驗的過程中，總有極大的消耗，不論其結果是成功或失敗。在國人的普通眼光看來，認為這種耗費，無論於公於私，都是不值得的。殊不知值得不值得，那是事後成功失敗的評價，有時大得難以計算，有時小得等於零。若就研究試驗的本身來說，即使是失敗，亦不能完全否認其價值。因為失敗為成功之母，嘗試錯誤的記錄，可供後來者參考。一個要想從事某項研究的人，如果沒有或不足或不肯化用這筆研究試驗費，就無從知道這個研究試驗的真正價值的。所以研究試驗費，是決定某個問題價值的必需用費，而不是某個問題的本身價值。也可以說，研究試驗費，在科學的研究試驗過程中，完全是一種消費，而須與研究試驗所得的結果的價值，截然分開，然後方能符合其意義。而這些費用，為數是不可預計的。所以我們於二十九年度預算上，新列了科學獎金，以後三十年度，又增列科學研究費一項，其數字幾乎三倍於科學獎金，因為科學獎金是發明和創造者榮譽的報酬，列數不須和研究費那樣多。而且我們將這筆科學獎金每年祇撥發半數，其餘半數存儲起來，作為科學獎金的永久基金。我希望這基金能積聚成一個相當大的數目，而成為浙江省有歷史意義的一個獎金。省政府為這個獎金，曾制定下列各種章則：

(一) 浙江省科學獎金暫行辦法。(二) 浙江省科學獎金暫行辦法實施細則。(三) 浙江省科學獎金保

管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四)浙江省科學獎金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

【第一次給獎情形】自從這幾種章程公布之後，我們一面組織科學獎金保管委員會和審查委員會，一面公告科學發明物申請審查日期，使省內的科學研究者，將他們所發明和創造的東西送來審查。二十九年度申請審查的，共三十三件，經審查決定給予獎金者，計十一件，共發獎金二萬零七百五十元。茲將得獎者的姓名及其種級錄誌如下：王挺文，經濟植物油燈頭，給予丙種五級獎金五百元，黃渭川，水平測高儀，給予丙種五級獎金五百元。李振民，度量衡折合計算尺，給予丙種五級獎金五百元。朱壽康，中國印花紙，給予丙種五級獎金五百元。胡四興，彈計機關槍，給予丙種五級獎金五百元。黃季寬，七七式槍榴彈筒，給予丙種一級獎金四千元。黃季寬，各種地雷發火機，給予丙種二級獎金三千一百五十元。黃季寬，萬變密碼譯電機，給予乙種四級獎金六千二百五十元。許燾雲等，廿九年式耐火瓷灶，給予丙種四級獎金一千四百五十元。黃渭川等，木裝水管及接頭方法，給予丙種四級獎金一千四百五十元。文佑彥，蒸汽發藍法，給予丙種四級獎金一千四百五十元。這個獎金的授與典禮，是三十一年元旦在方岩臨時省會舉行的。受獎的數目，雖僅數百元或數千元，比不上諸貝爾獎金或其他世界性獎金那樣名貴，但在浙江尤其是戰時，却是破天荒第一次具有歷史的意義和價值的。

這是浙江「科學考試」的第一科，自然得不到好文章，但希望以後陸續有好文章發現。我在這次考試中，也得到了三種獎金。當初，我有些不好意思接受。因為：第一，我那幾樣東西，算不上什麼。第二，我是一個發起人，自己反得了許多獎金。後來再細細想想，這是審查委員會公開的公正的評定的結果，他們不能因為是我的東西，而含糊給獎，我亦不能因為是發起人或省主席，而放棄我應得的權利。我是一個應考的學生，考試所得的獎品，當然是受之無愧。於是也就接受下來，但仍移贈獎金保管委員會作為我的特別獎金，以獎勵以後對這些東西更有研究的人。

自從設置科學研究費與科學獎金之後，省內科學研究的風氣，爲之大振。本來科學發明物的審查給獎，應該逐年辦理的，因為敵人三十年的大流竄和以後不斷的竄擾，省境動盪不定，獎金審查委員會的委員，都是散了，無法召集開會。而各方送來審查的文件，還有二十七件之多。人家辛辛苦苦研究所得的產物，政府竟束之高閣，不但使研究的人失望，而我本人尤其耿耿於心，深感不安。並不是因為我也有東西送去審查，而是覺得我們對於科學太不重視了。中國科學不發達，這就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未審查決定的文件中，我要特別提出來說的，是楊德俊所創作的「化學元素行列表」。初審的化學專家，認爲是很有價值的，但是他們不敢決定，這是他抄襲前人的呢，還是自己的創作呢？因爲在浙江負責查責任的人，在這長期抗戰當中，尤其是僻處在這山角落裏，與目前世界科學，隔得太久太遠了。他們很虛心，不敢武斷的審定。適值教育部陳部長立夫到浙江來，我便將這件東西請他帶回重慶，交中央研究院去審查。結果得到教育部的獎金六千元。但對楊德俊這個表，好像還未作科學價值的評定。

在省府當初所頒的科學獎金暫行辦法中，規定以發明科學原理的，列爲甲等，以有關國計民生的發明或創造，列爲乙等。我覺得這個規格過高了。科學原理的發明，自然重要，但在中國，尤其是在浙江，不是不可能，而是太稀少，太困難了。而且以中國今日的情形而論，能夠利用世界已有之科學原理來發明或創造有關國計民生的東西，是最需要的。懸格過高，或反有礙這方面的發展。所以我們後來把這個辦法修改了，以有關國計民生的列爲甲等，是取實用並適合於地方性的意思。

在第一次得獎的案件中，雖沒有很大價值的東西，而且在那些未得獎的案件中，還有極可笑的东西。然而我認爲這是倡導科學研究的初期所免不了的。中國有一句古話：「千金買馬骨。」不管它有何價值，是否可笑，我們都一樣重視。希羅多買幾副死馬骨，然後千里馬就會隨之而來。

廿四 戰時經濟種種

「物價貨幣與生活」當我們初退到金華的時候，一元錢可買豬肉五斤，可買米二十五斤，可買鹽十斤。除了一些工業品或舶來品價格稍漲之外，其餘的並沒有波動。這就是指明戰爭的初期，物價與貨幣尚呈平衡狀態，亦即是說物價並沒有上漲，貨幣並沒有貶值。後來物價逐漸的高漲了，也就是貨幣價值逐漸的低落下來。但我聽得財政當局說過：「貨幣價格並未低落，因為法幣的準備是充分的。現在的情形，是物價高漲，而不是法幣貶值。」這種說法，也自然有他的理由，至少是另一種看法。但究竟是物價高漲還是貨幣貶值，很難得到一個確定的論斷。我以為物價與貨幣，決不能各自分開，而應作綜合的研究。現在的法幣已離開金本位或銀本位的關係，牠本身已無實質的價值可言。而所謂價值是虛的信用，不但中國如此，外國亦是如此。中國法幣虛的信用價值是存在的。但是虛的信用價值，戰前與戰時相比，有一個差額，這個差額，就是法幣貶值的數字。

物價的漲落，無論在平時在戰時，都不外是供求的原因。我們離開貨幣價值的標準，也可測定一個物價漲落的標準：即供過於求的，價格低落，求過於供的，價格高漲，這都是失常的物價；惟有供求相等，才是物價的水準，也即是真正的物價。如果將這種真正的物價作為標準，來衡量法幣，就可得到戰前與戰時的比較價值，同時也可以衡量其他物價的漲落差數。

先就目前浙江市場上的物品，照前述的原則分三類來研究：第一類是供求相應的。如米、豬肉、食油，皆是本省出產，本省銷售。對於省外，無論戰前戰後，都不發生很大的供求關係，也可以說，它的價值並沒有什麼漲落。而它的價值高漲，乃是貨幣貶值的結果，今假定米、肉、油在浙境內，或某縣

內，沒有供求上的關係。在戰前，米價每百斤是四元，現在每百斤二千二百元（各地平均數），比較漲了八百倍。豬肉戰前是二角錢一斤，現在是一百六十元一斤（各地平均數），亦是漲了八百倍。食油戰前是三角錢一斤，現在是二百六十元（各地平均數）一斤，比較漲了八百五十餘倍。也就是說，貨幣的貶值，在浙江平均是八百多倍。第二類是供過於求的。如木材、茶葉、紙（迷信紙）、水菓，都是浙江的特產。戰前它的銷場，不僅是本地，而是大量的銷到省外，戰後省外的銷場減少了，本地的銷場有限，所以它的價值，雖比戰前表面上是漲了一百倍至兩百倍，而實際的價值，不但沒有增，反而是減低。即是等於戰前的一角二分至二角四分，也即是它的實價比較戰前低了八倍至四倍。第三類是求過於供的，如紗布五金以及一切外來品。它表面上的價值，有漲四五千倍者，但要除去貨幣貶值的倍數，才是真正的漲價倍數。比如某種布，戰前是一角錢一尺，現在是二百元一尺，表面上是漲了二千倍，但要除去貨幣貶值之八百倍，那麼真正的漲價，乃是二千二百倍。

幣值與物價的情形如此，所以社會的生活，亦同樣形成各別的變態。以薪俸收入為生活的公教人員，他們是受了雙重剝奪——貨幣貶值與物價高漲——，政府雖每年都給他們增加薪俸或補助費，但無論如何，也跟不上幣值的低落，與物價的上漲。就拿廿七年省政府規定各級公務人員最高薪一百四十元來說，那時候是想減少一些薪俸的支出，使戰爭能永久維持，而得到最後的勝利。如果幣值與物價沒有變動，自然可以長久的維持下去。但是到了現在，照幣值八百多倍來伸算，就須有十一萬多元的收入，才抵得上廿七年一百四十元的幣值；物價額外的高漲，尚未計算入內。所以在長長的八年當中，這些薪俸階級的生活，實在是苦到極點！然而直接支持抗戰局面的，却是這些公教人員。如果拿貨物來作比例，他們真算是戰時最廉價物最美了！

至於以糧食為生產的農民，他們的生活，在三十年以前並沒有什麼變動。因為他們生產的糧食及其

他副產的價值，與貨幣的價值尙稱平衡。雖然也受到其他工業品漲價的影響，但在三十年以前，田賦尙未徵實，實際上賦額是減輕了。假定三十年幣值低落到一百倍，他們對於政府的負擔，比之戰前還在十分之一以下。他們可以從這方面得到補償，直到田賦徵實之後，才漸漸感到負擔的加重。不過這種負擔，並不比戰前增加得許多，而僅僅是受到工業品的影響。至於以木材、茶葉、土紙出產爲生活的農民，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他們的生產品是低落得厲害，同時他們的消費品，却漲得厲害！所以從事這種生產的農民，簡直都有破產或失業的危險！但是這些生產者，僅是少數，而且大半還是副業的性質，所以還能勉強支撐下去。而且中國的農民，一向以忍耐見稱的，他們祇要有一碗飯吃，其他日用的東西節省一點，甚至沒有都可以的。

直接間接支持抗戰的兩大主力——公務人員、士兵與農民，他們的生活，就這樣的艱苦支持了八年之久，這是一般經濟學上說不通的道理，而中國却是這樣平穩的度過去了，這就是中國人的精神，歐美人所未必能夠瞭解的。至於那些商人及工人的生活，他們都是水漲船高，受到幣值和物價的影響很少，而且從業工商的人，在中國究竟是很少的數目。

「實行糧食管理」浙江的糧食，素來總是不能自給的。在戰前要由上海各地輸入很多的糧食到甯波、紹興等地，同時溫州、台州，也有許多糧食運往上海。這一出入的數目，到底有多少，實在沒有正確的統計。戰後上海的來源斷絕了，而由浙贛鐵路輸入很多江西的糧食。依據廿八年浙贛路局的統計報告：全年運浙的贛米，爲五六、四九七·一〇〇噸（即一、一二九、九四二市擔）。後來贛米的來源受了限制，浙江的米價，也就日漸高漲起來。廿九年金華的米價，高到每元十五斤，寧紹比金華還要高一些，於是社會上就恐慌起來！同時糧食管理的呼聲，遍及各地。省府乃設置糧食管理處，我自任處長，朱惠濟任副處長，這種糧食行政工作，在中國過去就沒有前例，而在外國已經是很普遍，尤其是在戰時

。恐怕除了美國，沒有那一國不採用這種配給制的。

糧管處成立之後，首要的工作，則爲如何覓取糧源與管制價格。這時，江西的糧食，亦因價格高漲而實行禁運。於是更造成浙糧的恐慌，米價扶搖直上，一塊錢只買到米五斤。這要拿今日糧價來比，已經便宜的驚人，而在那時，大家都駭爲古今未有的現象。而熱切希望的，仍是贛糧的開禁運濟。一時黨政機關，民意團體，旅渝同鄉，無不齊聲呼籲，結果仍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飢。省外既無可望，乃不得不從省內想辦法。於是冬耕運動，糙米運動，實行禁酒，稻麥改良，都隨而進行。在這幾種工作中，我以爲冬耕運動，收效最大，以前有好多地方，不種冬作的，都普遍種起來了。這一方面固由於政府功令的限制與提倡，亦由於糧價的刺激與實際的需要，使它自然的發展。我在三十年春，巡視紹興各縣，路經浦江縣，據金縣長平歐報告，他對於冬耕，做得很普遍而澈底的。的確，自鄭家場（浦江縣屬）至浦江縣城，沿公路二十多公里，幾乎沒有一塊土地是不種麥子的。這種現象，不僅浦江如此，其他縣份也差不多，我不過拿浦江作一個例子來說明。

糙米運動，也是我當時提倡最力的。因爲如果能由食熟米改食糙米，每百斤裏可以多出四五斤米，以全省來計算，這個節省下來的數目，極爲可觀，於糧荒問題的解決，一定得到很大的幫助。可是這個效果，並沒有預期的那麼好，而且或要得到一些相反的結果。因爲糙米實在太沒有標準了，甚至把穀子砂子都參雜在裏面，使人吃了發生妨礙消化，營養份不能吸收的毛病。據我的經驗，吃飯的時候，如果咬着一粒砂或一粒穀子，隨着它吐出來的米，一定比砂子、穀子多得數倍。如果一擔米裏一斤砂或一斤穀，在食飯的時候，一定要犧牲數倍的米。至於有礙衛生，又是另一問題。現在的公糧、軍糧，糙得不成樣子，這自然不是提倡糙米的原故，而是糧政機關祇要求數量的滿足，並沒有想到損失方面與衛生方面的重大性。這實在是一樁很不合理的事情，而不是提倡糙米時始料所及的啊！

釀酒自然是可以消耗大量的糧食。尤其紹興酒是風行全國的。戰前，浙江酒稅的收入，約有二三百萬元，其數額之大，可想而知。當二十九年饑荒時候，曾下過全省禁酒的令，但是這事很不容易澈底辦到。因為酒稅是國家正常的收入，禁了酒，就妨礙國家的稅收，而且紹興酒業的人很多，也要顧慮到他們失業問題。所以不久也就廢止了。可是因交通的關係，紹興酒也無法銷到省內各地或省外去，產量自然減少。現在省內外各重要的都市，都有一種仿紹興酒出產，味道也不比真紹興酒差得許多，戰後紹興酒的銷路，恐怕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吧！

稻麥改良，是浙江農業建設的重要工作。先說育種部分，開始於十九年秋季。到二十七八年，此種工作仍舊不斷，而且更加覺得重要。最優良的稻種，要算中秈一號、十號、六五〇六號、五四四一號，和晚秈九號、晚粳一二九號，晚糯二〇四等號。麥種要算第十七號。這些純系品種不但產量多，而且抗旱、抗風、抗病的力量，都比普通種為強。也可以說因為能抗旱、抗風、抗病，而產量在無形中也增加了一些。據報告優良的稻種，每畝要比普通種產量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優良麥種每畝要增加百分之十五左右。所以人民極樂於推廣。遂昌縣推行得最力，成績亦最著。這一個缺糧的縣份，就以推廣改良種，來解決它糧食不足的問題。

物種改良，要有很長的時間，工作人員，尤要有持久的耐性，農業改進所所長莫定森，他是主持這個工作的人，可以說浙江稻麥改良工作的歷史，就是他個人的歷史。在戰時立功而不見功的人，是值得讚美的。戰後還需要這些人來努力，國民經濟建設才有希望。此外還有許委員蟠雲，是在戰時研究剛田與區田的。這是種植方法的改良，據實驗的結果，收入量亦增加很多，但是現在還不易推廣。

在農作物的改良上，尚有一個值得介紹的人，這就是黃岩的朱文劭（佶勤）。前清末年，他曾任廣西道員，而是接近革命方面的人物。他於退休後，專心研究橘子的改良。黃岩是浙江產橘最多的地方，

但品質平凡，多而不貴，他把美國加州的橘子移植到黃岩來。聽說美國加州的橘種，原來是由中國帶去的，那末他可算是替橘子做了歸宗的工作了。二十九年冬，朋友送我一些橘子，色味兼美，我總以為這是他從上海購來的美國橘子，但細看牠的商標，却有「朱氏宜園抱子橘」的字樣，才知道這是黃岩出產的。「朱氏宜園」就是朱先生自己經營的園圃，他不知費了多少心力與時間的研究栽培，才得到這種美滿的結果。但是那時僅生產一些樣品，或者說是贈品，而並沒有大量的生產商品，現在却已逐漸推廣，一般人都可以嘗到這種美味了，我想將來一定有很大的成就。這種園藝作物的改良，雖與糧食無關，但就發展農村經濟的立場說，是有很大的價值，而值得介紹的。

浙江糧食的增產，耕地的開闢，是當前切要的工作，但內地的墾殖已達到飽和點了。在山岳地區，有的並已墾殖到山上去了，這不但有礙水源，淤塞河道，而且減少森林，惡化氣候，是得是失，很易計算。而沿海的區域，則少有人去注意，沿海的海塗，是不斷的增漲，以前政府方面，曾有沙田管理局的設置，但目的祇是管理新墾成的沙田，以增加財政收入，却沒有積極的墾殖計劃，以增加農業生產。據我所到沿海的地方，可開墾一千數百畝的海塗，是隨處都有的，我所到過的狼機山一帶（黃岩、溫嶺的沿海地區），若果加以經營，數年之內，就可成為七八萬畝的良田。其餘如桃渚區、三門灣，則更不必說了。省內盛行一句話：「山上十年，不如海上一季。」這固然是指漁業方面而言，但何嘗不可形容到農業方面來？故今後浙省農產之增加，必須在沿海着手。但要達到這個目的，是需要相當的時間與相當的經費。

以上所說，是糧食開源節流的工作。至食糧分配工作，也在二十九年五月七日，首先在金華城作計口授糧的實驗，事先動員了專員公署縣政府的全部人員，及政工隊警察保甲長等六百餘人，作人口的精確調查。在上午三時半開始，將全城交通斷絕了，並禁止每一人家的人出入，由工作的人員按家按戶把

人口調查表，照實有的人口填寫，至上午六時後，全部的工作都已完成。這次金華的人口調查不但在浙江省內，就是全國，也算是最迅速最確實的一次。有了人口正確的數字，然後才能夠作糧食配給的準備。我們把全城的糧食登記了，糧食商店都停止了營業。其實他們因為鬧米荒，根本無法供應，已自動停業了。我們按照市區人口，分設若干糧食公店，把準備好了的糧食，在公店裏供應。市民都發有購糧的憑證，大口每日一市斤，小口每日半市斤，乳口不計，最多每次可購取五日的分量。這種辦法實行之後，金華城區的米風潮，就平息了。鄉村方面的民食，原有自然調節的機能，不成很大的問題，如果鄉村民食也發生嚴重問題，則城區更不得了！這種情形，不但中國如此，恐外國也都有同樣情形。這事起初辦理，並不見得如何棘手，但後來困難就漸漸的發生了：第一、是糧食準備與週轉不易。政府並沒有很大資本準備大宗的糧食，往往週轉不靈，弄得不能接氣，而為人所指責。第二、對於價格的穩定看得太牢，總是想維持一定的價格，而不敢輕意變更，但是糧的來價却高漲了，按平價收購，則取怨於鄉農，不按平價收購，而按平價出售，則補貼不起這許多虧耗，兩方都遭遇到極度的困難。第三、是那些業務人員都是調用的，一時工作雖很緊張，日子久了，就沒有恆心，而且影響其他的工作。因為縣政府並沒有這筆業務預算，而又不欲在供應方面收取業務費用。這件事自二十九年五月起，至十一月止，一共辦理了七個月。那年的糧荒既已過去，就把這個計口授糧的業務結束了。這是金華城區的情形。其他各縣，也有做行的，但沒有金華實施的徹底。而各縣為取締囤積居奇的大戶，也盡了極大的力量。有些縣長報告我：凡是可以藏匿的地方，都去搜查過，甚至棺材裏也有米穀搜出來。因此渡過了廿九年的糧荒。三十年糧政機關改組了，中央設糧食部，省設糧政管理局。任命徐梓為局長，斯烈、魏思誠為副局長，同時實行田賦徵實。

【田賦徵實得到良效】田賦徵實在抗戰期中，自然是財政上一個極大的改革。我過去曾提過案，並

且在浙江首先實施折徵實額。中央決定徵實，自爲我所衷心擁護的政策。這個政策的確立，主要的原因：第一是控制軍糧公糧。全國有幾百萬軍隊，和百餘萬公教人員，在糧價日漸上漲，刺激人民心理恐慌的情形之下，不但預算的數字要大量的增加，就是有了鈔票，又何處去購買這大宗的糧食？這種控制糧食政策，真是支持抗戰的一支生力軍。第二是調劑民食，雖然現在徵實所得的糧，僅敷軍糧、公糧之用，能夠用來調劑民食的，數量很少。但是軍公糧有了着落，恐慌的情形，就大大的減少，糧價就不至過度的高漲。而且有許多地方，就靠多餘的軍糧公糧拋出來，以壓平市價。雲和就是一個例子。所以雖然沒有拿大量的糧食來調劑民食，而民食自然得到調劑，這是預想不到的效力。

田賦徵實以後，在辦理方面，自然增加許多行政上的麻煩。同時還予辦理人員一種舞弊的機會，而加重了人民額外的負擔。比之徵收鈔票，實在是弊多利少。但這都是政策實施上的表面問題，而不是政策的基本問題。照我的意見，這種弊端表面上雖是人的關係，而實際上是物的關係。就是說，因爲我們的物質設備，不能控制人的舞弊，如衡量工具的不準確，倉廩建造的不完全，容器包裝的缺乏與不注意，以及不合理的運價與不合理的運輸，以致人民增加了賦稅的繳納量，並負擔了保管損失的賠償，運耗的賠償，勞力的損失，運費的補償。而承辦人員，乃得從中漁利。如果這些物的設備都得了合理的解決，則人的作弊機會，自可減少。徵實的政策，就可得到良好的結果。所以今日糧政的弊端，就不肯化本錢與措施的不合理上面，入的問題，還在其次。

「物價管制政策的實施」三十一年，跟着就有物價管制政策的決定，這自然是爲適應戰事演進的需要。在本黨五屆十次中央全會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好多人考慮到政府既沒有實物，又沒有本錢，光憑幾條法令與一紙文告，物價管制是不是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會中最高當局曾指示以糧鹽價格爲標準，來限定其他貨物的價格，並且還指定預算收入百分之三爲物價管制基金。但是糧鹽，因爲我們有實物在

手，所以能得到相當穩定的價格。至於其他貨物，種類太多，那得樣樣都有實物控制在手裏。而且百分之三的管制基金，在一省的總預算合起來，不過是千餘萬，而且還辦不到。至於各項日用品消費量的無法調查，與無法得到確實統計，猶在其次。當時我就感覺到這事恐怕行不通，但是國家的政策既經決定，是必須戮力奉行的，目前事實上雖有困難，且到了行不通的時候再說！

爲實施物價管制，政府並規定設置各級專管機構。在省設有物價管制會議，直隸於中央的動員會議，省政府主席當主任委員，省黨部主任委員當副主任委員，有關的各廳處長當委員，此外還委派地方士紳，尤其商會會長來參加。省以下的組織，大概也是如此。這個機構於三十二年一月成立了。省以下亦次第成立。主要的工作，就貨品的登記，規定價格，並舉行商民宣誓，要他們衷心遵守法令和規定的價格。舉行認真的，要算溫州。但他們的誓言，轉背就忘了！於是商品隱藏了，黑市發生了，政府自然要照法令處罰他們。有些地方，實行所謂社會制裁，拿違反限價的人，來遊街或站木籠，但是法令總敵不過私意，羞恥總敵不過血本。同時求的人太多了，他們希望私自得到一些東西。於是消費者先破壞政府的法令，爲滿足個人的慾望，多化幾個錢，滿不在乎，祇要貨物到手。賣方也愈因此而施其操縱手段。不是熟人，不講人情，就出了高價，還買不到東西。因爲他恐怕你是政府派來的偵探，不敢隨便賣給你。反正不做生意是不違法的；而且貨物一日一日的漲價，又何必急急於把牠賣出去呢？這個政策漸漸行不通了！於是中央將限價改爲議價，由政府招集各行業，由他們自己議定各種貨物的價格，這無異把政策的實質變更了。有些地方議定的價格，比市價還高，於是每商店的門口，都貼了「本店遵奉限價」的廣告，而他門市的價目，還可以照標價打一個折扣。這種把戲，據說重慶市玩得最妙，想起來實在有些可笑！限價政策，就如此演變到現在，好像已無人過問了！不論政府與人民，都是如此，到現在連物管會的名義也取消了，物價管制政策，也就無形宣告結束。

【糧管與物管的結末】糧食管理與物價管制，這兩個政策的重要性是一樣的。浙省糧食管理，總算得到相當的成功。至於物價管制，尤其省以下的管制，則完全失敗了。這自然由於中國工商管理沒有基礎，一向都是自由買賣，比不得糧食，它有數千年來人民納糧的習慣（指以前的丁漕），可以從農民繳到許多的實物。也就是說管制一定要有本錢、有實物，並且要直接管理生產，才能夠生效，否則就會變成空話。我認爲不能因爲此次管制的失敗，就認這種制度在中國不能實行，而是因爲中國實行的條件不夠的原故；尤其是中國人民生活太低，物質太缺乏。即使就世界上最低限度的分配量作標準，一方面窮人還是購不起，一方面仍舊供應不夠，而變成少數人的供應與操縱，這是中國經濟問題中嚴重的病象，必須就經濟制度上作根本的改革。同時增加物質的生產，才可以達到成功的目的。這次失敗的教訓，正可供將來改革的參考！

【兩個地方供應機構】地方供應機構，這裏也值得一述。浙江省的供應機構有兩個，一個是省營貿易公司。這種組織，在各省是很普遍的，而且包含的部門很多。但浙江的範圍却是很小。以前，本來是想藉他做些物資的交換，而從那裏得到財政上的補助。後來因爲省公務員生活困難，必須有一個機關辦理物品的供應，以減輕他們的負擔。因此這種公務員日用品的供應，便成了貿易公司近年來的主要業務。他們辦理的供應品，雖不能達到全部公務人員必需數量的要求，但是價格方面，要比市價低廉得多，甚至一半以上。因爲數量的不足，祇好實行定量配給制度。拿食油和豬肉來作例子，每人每月，僅可得到十二兩茶油，和一斤豬肉，有時還不能按期的供應，自然不能滿足大家的需要。而且因爲人多的緣故，在配給的時候，要排起隊來，按順序去配購。於是又有好多人感覺手續麻煩，同時因不能按期供應，而對供應機關起了好多的責難。但客觀的說，那一個國家辦理日用品的配給不要站隊，而可現成的得到東西？至於能不能按期供應，那與物品的來源，交通的情形，資本的大小，有連帶的關係。尤其在這山

城裏，遭遇的困難更多，求全責難，是很不應該的。一般人在這個有供應的地方，總覺得供應得不滿足，但離開了有供應的地方，又感覺沒有供應的吃虧了！第二個供應機關，是省合作社物品供銷處。它是由前省合作批發部改組而成，是省合作社的前身，其職責在運用業務的實效，來引發合作精神，輔導縣各級合作社的聯合組織，使產、製、運、銷等經濟行為，在民主的合作經營下，能有計劃的進行。這種工作，在中國實在非常需要。我在三十年十一月，全省合作會議時就說：「目前我國經濟上所以發生許多反常的不合理的現象，主要的原因，也就是我國沒有健全的經濟組織的緣故。」因之，物資就不易集中配給，生產與消費不易取得協調適應。「假使我們合作事業辦理得很好，合作組織能夠普遍健全樹立的話，經濟上的許多困難問題，都可得到解決。」所以在物價管制工作開始以後，為了要確立公平的價格，顧到生產者與消費者雙方的合法的利益，我在建廳召開的三十二年合作事業中心工作討論會上，主張「運用合作組織來控制物資，管理物資，是頂好的也是頂合理的辦法。」這在英國辦得很好，如上次大戰中，英國就靠了各地合作組織來定量配給食物，大奏奇效。據曼徹斯脫的「合作新聞」所載：「在食物線上，合作運動自始即保護主婦們及她們的家庭得免剝削，並保持可資利用的貨物之公平分配。」可見國民的經濟生活，如果有了一個整個的組織，對抗戰建國均能發揮很大的功能。可惜這幾年來合作事業受了貸款緊縮，財政與經濟之未能配合，軍事動盪與經營幹部缺乏等影響，合作的實效，尙未能充分發揮。不過，值得告慰的，浙省的合作幹部的服務精神，都比較旺盛，一般的輿論，也頗多稱許。也正因為有了這點可寶貴的精神，浙省的合作事業，在全國評價起來，還是算前進和較有成績的一省。省供處，也能一反一般業務機關的積弊。它自三十年成立以來，如對於九區各縣的計口授鹽，四、五、九區各縣的肥料種子，實物貸放，以及淳遂區茶葉和五區油棉的合作運銷，都盡過相當的力量。三十一年省會遷雲和後，對省級員工按月辦理日用品的定量分配，同時補助了省會員工合作社的成長。它自己並還

附設有幾個小型工廠，在極少的資金運用中，尙能起相當供應作用。

「物產調整與特產收購」在戰時，尤其在正臨前線的地方，經濟的畸形，是必然的現象。浙江自然首先發現了這個現象。建設廳於廿七年一月向省政府提案，設置戰時物產調整處。我到重慶去開會，遇到中央主管的長官談起這件事來，他們也以爲有此需要。所以後來這個組織就透過中央，而改組爲油、茶、棉、絲管理處，並設立戰時合作工作隊，配合油、茶、棉、絲管理機構，協助搶收特產及統制指導省內的物資。油、茶、棉、絲要算浙江的大宗特產，所以要把它管理起來。浙江可算得是產油的省份，單就用油說，桐油、柏油的出產，都很可觀。桐油據查年產有二十餘萬擔，與國內其他產桐油的省份來比較，自然比不上川，湘兩省，但並不少於廣西，或者還多些。這等桐油，除本地消耗一小部份外，大多數都是外銷到上海或美國。所以桐油在浙省出口貨物中，佔了最重要的地位。自從戰事發生，交通阻塞，運輸不便，銷路受了影響，價格就非常慘落了。柏油也是浙江特產的油，它不像桐油在山上成林的種植，而是在阡陌上或村落旁零星的種植，但是非常普遍。我在南京（未到浙江以前）的時候，有人約去棲霞山看紅葉，見到山上疎疎落落的那些紅柏葉，覺得很有趣，好些人甚至把它當作吟詠的題材。我一到浙江，尤其是金華蘭谿一帶，在秋冬之交，滿野都是紅葉。雖然不覺得討厭，但是太多了，就覺得平凡。柏油分皮油、青油兩種，青油係柏子仁榨出來的，可供點燈之用；皮油係柏子壳上附着白色的硬脂肪，一到冬深，紅葉落下來了，就剩下這叢叢的白粒在樹枝上，亦可點綴冬天的景緻。皮油在戰前，多數用作製造土蠟燭，戰後兼成爲製肥皂主要的原料。據查共有二十多萬擔，亦爲浙省重要的出品。

龍井茶誰都知道是西湖的特產，它不但代表杭州的茶葉，而好像是代表浙江的珍品。虎跑泉水龍井茶，可算是杭州西湖的雙絕。但是浙江的茶葉，除了龍井綠茶之外，還有紹興平水之綠茶，和溫區及玉山之白茶。兩者分佈的區域，都很廣大，除了沿海的水鄉，有山的地方，差不多都產茶。據查戰前每年

綠茶有二四五、三〇〇箱，合一四二、二〇〇市擔；紅茶有一八、三〇〇箱，合一、二〇〇市擔。自然浙江人自己用不了這許多，而是大量的銷到省外及歐美，乃至北非洲等國去。我自退出杭州之後，就沒有飲過龍井茶。但是各地山上的茶葉，年年還是照樣的生產着，價格也特別的低落。據說現在茶的價格，還不到戰前的一百倍。所以我歷年所到各地，充耳所聞，都是一片救濟茶農的呼聲。這便是要把它列入調整的範圍的一個理由。

餘姚，是浙江最大的棉花產地，也可以說是東南各省最大的產棉區。據查每年的生產量達五十餘萬擔，幸鹽與產棉是相連的，餘姚是浙江最大的鹽場——年產三百餘萬擔，——產鹽的海灘逐漸向海邊移動，距海遠一些的鹽灘，因不能產鹽，而廢棄了。這些廢棄的鹽灘，經養淡鹽殖後，唯一適宜的作物就是植棉。所以餘姚產鹽多，產棉也多。餘姚的棉花，以前曾經過相當時間的改良，而成爲他特有的品種。雖則纖維短，不大好紡細紗，但紡粗紗，織土布和作棉胎，是服用品極重要的原料。故在上海市場上，姚棉也有它單獨的行價，自從華北、華中，產棉地區相繼淪陷後，餘姚棉的地位，自然更加重要。如何的管理？如何的運用？自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浙江的蠶絲，在中國佔着首要的地位。二十六年產絲最多的杭、嘉、湖首先淪陷，剩下紹興、嵊、新各縣所產鮮繭數量，尚有一八、九〇〇市擔，仍是可觀。而且敵人對於蠶絲的統制，着着進行，不遺餘力。在太平洋戰爭未爆發前，敵人想利用江、浙出口的蠶絲，向歐美換取戰爭的必需品，來反打擊我們。他們的手段，是如何的毒辣？更加杭、嘉、湖一帶數百萬的人民，他的生活基礎，就建築在蠶絲上面，政府怎樣去救濟他，使他生活不至瀕於絕境，也都成爲戰時的重大問題。

省政府根據以上所述的情況，而決定了調整的辦法。自然地方見得到的，中央也一定見到，而且以地方的財力、人力，要解決這重要的經濟問題，是不容易甚或不可能。所以在省府創辦的初期，除了訂

定一些管理的規章之外，很多的重要工作，都未能進行。廿八年春初，中央主管機關參加了這個機構，好像是中央與省合作的性質。到了三十年春初，前項特產的收購工作，奉令劃歸財政部的貿易委員會、中央信託局、中茶公司等，直接辦理。主要的目的，是要將油、茶、絲來換取外匯，設了些專辦的商業機構，以前的行政機構就取銷了。收絲的有富華公司，收油的有復興公司，收茶的有中茶公司，收棉的有福生莊，可是商業化的性質太重了，救濟的性質就無形減低。

餘姚的棉，在廿八年的時候，賤到四角錢一斤，都沒有人要。收購的機關，總想再便宜一些，方大量收買，也計因為沒有資金的原故。如果在廿八九年，多用資金，大量收購，現在的被服問題，也許不會鬧到這樣的嚴重。三十年餘姚失陷了，敵人對於棉花的管制，十分注意。他們真是見得到，做得到。他們不但控制了華北、華中的產棉大區域，而對於這小小的餘姚，也控制得十分嚴密。他們所定的收價，相當的高，使農民不至隱匿走私，并且給協辦的偽地方政府以相當的好處，使他樂為協助。偽餘姚縣政府號稱為偽組織中的模範政府，對於此事之協辦得力，甚有關係。這是我們可作為經濟鬭爭的好資料。

油、茶、絲到現在可說是不管了。在前幾年，我所知道的，是規定收價太低，而且又不能盡量收購。我所聽到的是一片呼籲救濟的聲音。際此百物昂貴的時候，農民自然希望他的生產品，同樣的漲價，以維持他們的生活。可是因為禁止出口，或即使准許出口，也沒有這樣大的銷場，所以價格總是漲不起來。而在收購方面，恐怕有兩種前後不同的觀念：在前以為這是國家禁止出口的東西，在內地既無大量的銷路，即使給價低些，農民亦無可如何，而總得忍受下去，他們的勞力與成本，儘可不必十分顧慮。在後則以為政府儘可能的收購一些，聊盡救濟的責任。殊不知他們因積年的虧耗，已陷於崩潰的絕境，救濟已來不及了。所以弄到養蠶的人，都把桑樹砍了，改種糧食，以維持他的生命。植桐的人，都把桐樹砍了，當作柴燒；未砍的，桐子亦不去採摘，任它在山上自生自落，因為桐油的價格，還抵償不了採

子榨油的工本。種茶的人，也都不去採茶，不去整枝，讓茶樹自生自滅。這幾種特產，可說都在戰時被迫上毀滅的途徑，今後的恢復，恐怕不是短時間內可能做到的吧！

我對於這個特產收購問題，認為首先應確定兩項原則：第一、應知這幾種特產，在戰前於國家對外貿易上，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戰後將負起換取建國必需品的重任。戰時國際貿易停頓，這些特產滯銷，農村經濟發生極大的困難，政府自應盡力救濟維護，使它渡過這個難關，俾於將來仍可繼續發揮其力量。否則，農村雖然祇有自怨命運的不濟，而不敢埋怨政府，但是未來政府需要特產出口的時候，他們又有什麼力量可以貢獻給國家呢？第二、政府戰時的經濟政策到底是為謀利的呢？還是為維護國民救濟的呢？如果以謀利為目的，自然以賤收貴賣為原則，如果不是以謀利為目的，那便應根據農民生產成本以決定收購的價格，並且要盡量收購，以維持這幾種特產的生存，而使在戰後仍可發展。我覺得以前對於這兩個原則，都沒有注意到，所以得到這樣的結果。我也明知道就是以中央的力量，也未必就能將戰時特殊的情形打破，不過在事理上應該作如是的眼光，而不是含有批評的惡意。

「工廠內遷的失敗」說到戰時的工業，就得先將戰前浙江的工業情形，略為敘述一下。中國的工業，自海外通商以來，就建築在沿海、沿江的重要口岸上，內地除了一些手工業外，簡直是沒有一些機器工業。浙江距離上海太近了，它的工業也就依上海為中心。從前杭州、甯波、溫州等處，雖然也有若干具備相當規模的工廠，因為戰爭的演進，不斷的受打擊，也終於消滅了！

當杭州快要淪陷的時候，我曾對各工廠下過命令，要他們搬到內地來。但是除了強制的拆了若干機器之外，能自動遷移內地開廠的，實不多見。自然有很多的原因在裏面，而不是那樣簡單的問題。規模比較大一些的工廠，生產與消耗，都不受限於一省或一縣的。就消耗來說吧，它所需要的燃料及原料，或者要取之外省，或者要取之外國；再說它的生產品，或是要銷省外，或是要銷國外。若果勉強把它搬

進來，一定會困死。至於搬遷的损失，與內地不能找到許多熟練的技工，還是另一問題。所以工廠內遷，在浙江是失敗的，也可說合理的失敗。我二十九年到重慶，參觀過西遷工廠的出品展覽會。林繼鏞君是經濟部工礦調整處的處長，他當時將辦理工廠西遷時的困難情形告訴我，並且將入川後成功的情形也對我講了。那些廠商呼他做「工廠之母」，因為沒有他竭力主張和強制，這百數家工廠，都要淪入敵手了！他對於國家工業，自然有很大貢獻，「工廠之母」的稱呼，是頗恰當的！但我想四川是天府之國，是陪都的所在地，容納得下這些工廠的消費與生產的條件的。而且那些內遷的，都是上海或漢口三四等的工廠，若果換了頭二等的工廠，或者是換了不如四川的地方，就成問題了。

〔戰時經營的幾個工廠〕大工廠不能內遷，小工廠就隨着戰爭，而在內地漸漸的發達起來。裏面有些是政府辦的，有些是私人辦的。政府辦的要算鐵工廠、化學工廠、造紙廠、紡織廠、洋灰廠規模比較大些。鐵工廠起初僅是由杭州拆下來的幾十種機件，後來逐年擴充發展，分爲三個兵器廠，一個造船廠，一個煉油廠和一個工作母機廠。鐵工廠之所以能在很短時間內這樣的發展，完全因為造兵器的關係。在戰時兵器不怕沒有銷路，它的產品，南至閩粵，西至桂筑，北至皖甘，本省自然仍是一個大銷場。它的消耗曾經用到萍鄉的煤，上海、香港、福建的銅鐵和五金。本省的爛銅爛鐵，也都搜羅一空。因為它有這樣大量的消耗和廣大的銷路，才能造成這個地位。後來兵工部份，撥歸中央，煉油造船，就關門大吉。工作母機廠也就岌岌可危，但是我仍舊多方設法，把它維持着。因為它與我有很長久的歷史，我是這廠的董事長，並且是我研究的樂園，不忍它生命的斷絕！並且慮及有很多機械問題，無法解決。現在它正努力創造它的新生命，亦希望爲戰後內地工業創造新生命。在浙江方面已經開始的，就是研究製造水動力機。這種研究，在廿九年的時候，就計劃進行，主持研究設計的人，是廠裏的黃工程師渭川。頭一部水動機，完成於卅三年的春天，就裝置在雲和的惠雲渠，利用灌溉農田的水，來發動電力，成爲雲

和水電廠。卅三年四月間，開始放電，使這黑暗的山城，得到了光明。現正在裝置中的，還有龍泉和龍泉縣屬的安仁鎮、遂昌等三處。正在籌備中的，有松陽、慶元、縉雲等三處。在雲和已經使用了一年多，成績非常良好。在製造的技術上，以後當然不成什麼問題。這一種工業新生命的前途，真是光明而遠大的！

浙江的地質上，缺少了良好的煤礦，是工業上一個大缺點。但是在內地的河流，多是灘高水急的，尤其是浙南的甌江。如能充分利用起來，不但可以解決工業上的動力問題——是最低廉的動力——，而且同時可以解決很多的灌溉問題與航行問題，真是一舉而數得的事。我曾就甌江來估計，由下游的溫溪至龍泉，約莫是二百四十公里，中間就有一百多條灘，全江平均的坡度，估定為千分之三，則由龍泉至溫溪，就有七百二十公尺的水位差。如果按二十公里築一個水壩，可以築二十二個水壩，在每一段異的水位差，就有二十公尺，甌江流量之大，加以這樣高的水位差，發出來的動力，就可以估計出來了！我在報紙上看到美國人正在計劃揚子江上游的水電工程，這真是長江流域的一個福音，我希望這種福音，能播到浙江來。

三酸工業是化學工業之母，我們的化學工廠，就根據這種需要而建設的。創辦的是薛濟明博士，他戰前在上海辦了好多年的化學工業，要他來辦這小小的廠，自然是駕輕就熟的了。可是中間經過了不少的困難，不能如期的開工。他說：「戰前在上海辦理工廠，當廠長的祇要計劃的不錯，照着計劃裏所需要的東西，開單至洋行裏去要，或是承包出去，就沒有問題了。一切都可以按照計劃，順利的進行。現當抗戰時期，又在內地辦廠，有了那樣沒有這樣，一切都要廠長自己去設法，或自己製造，或是找尋代用的東西。一個廠長，要具有泥水木匠燒窯鐵工一切的智識。當了這個廠長，等於進了全部的工程大學，個人在戰時的鍛煉，雖然有價值，但工作却迂緩得多了！」後來工廠開工了，出品有了，但每廿四小

時，要製出兩噸的酸，這樣開工不到一月，就停頓下來。因為這幾十噸酸，在工業發達的地方，真是西江一勺，爲數太少，但是在內地，就一年都銷不了。統計自開廠以來，一共祇銷售四十噸的硫酸，那工廠就這樣的長久停頓下去。但是如果沒有這些酸，很多的小工業，就成問題。政府爲維持社會上可憐的幼稚工業，亦祇好這樣維持下去，那裏談得上發展與賺錢？記得我在廣西（十七年）也辦過一個硫酸廠，廠長是德國人，他起初的計劃，每日生產五十噸，我要他改小一些，他就改爲二十噸，我仍嫌太大，他說：「這是最小的了，如果再要小，在德國就買不到這樣小的機器！」但是後來銷路果然大成問題。經設法減到每日十噸，還是銷售不了。平時尚且如此，戰時工業，又將從何說起呢？

造紙廠是我們大國的嘗試，浙江產紙除戰前在杭州、嘉興曾設有機器造紙廠兩所外，其餘盡是用人工造紙。以前上海新聞界的聞人史量才等，曾擬在甌江下游的溫溪，設立一個大規模的造紙廠，供給上海各報所用的報紙，原因是浙南多木，可以製造木漿，並且想利用甌江急流的水力來發電，後來沒有成功。照我的觀察，這個計劃，好似空闊了一些，但是浙江要設造紙廠的觀念，就深印在一般工業人的腦中了。錢子富、朱尊民、毛乃煊，他們是中國造紙界裏面所謂中原派（即中原造紙公司），他們對於這事，非常熱心；總希望政府設立一個造紙廠，來實現他們的計劃與運用他們技術。但是機器由那裏來呢，外國買不到，祇好自己設法製造，我問鐵工廠廠長黃祝民：「能不能製造這種機器？」他說：「祇要計劃圖樣打得好，製造的技術我可以負責。」我當時心中對於彼此兩方尚有些懷疑，但是必須由他們去做，這個懷疑才可以解決；萬一失敗，亦是一種寶貴的經驗。那些機器，還可以當作廢鐵用，祇是化費一些工錢，也不致有多大損失。經了相當長的時間，遇了不少的困難，終於成功了。試驗的結果，還很滿意。用一年，敵人由麗水西進，打到離紙廠五百公尺的山上，軍隊要將紙廠破壞了，那守廠的職員，對暫編用二師的團長關震東說：「團長，請你多頂一頂，黃師長（權）的援兵就會到了，這是浙江

唯一自己設計的紙廠，亦是黃主席的心血啊！」那團長聽了這話，認為很有道理，便率領隊伍在那山頭上與敵人死拚，黃師長亦親自到來，將敵人擊退，紙廠賴以保存。這都是抗戰中難得的人員，雖然是一件小事，亦是值得稱道的。戰爭平定了，想正式開工，但是政府沒有很多的流動資金，想同主管工業的金融機關借款，他們以為太近前方，危險太大，說是沒有頭寸。這已成功的紙廠，就這樣差不多停頓了三年。最近出租商人，製造鈔票紙，現在用這廠製造的紙，印成的鈔票，已流通在市面了。那些銀行界的人們對我說：「虧得有這個造紙廠。」我想想，不免有些好笑，因為他們眼中祇見到鈔票紙，并未見到紙廠！

〔浙江省近年來的民營工業〕近年來浙江的民營工業，尙稱發達，比較有規模而新穎的，要算吳百亨的牛奶廠，與瓷磚廠。牛奶廠戰前就開辦了，戰後仍繼續經營，據說戰前他的製成品如奶油、煉乳、淡乳等，在上海市場上，極有地位，而予鷹牌煉乳，以重大的打擊。奶油更是中國廠家的獨步，而沒有人同他競爭的。戰後上海的銷路雖然斷絕了，但他的營業仍能維持。因為他用各種種方法來解決廠的困難，支持廠的生命，他利用製奶油剩下來的奶清，提煉乳糖，奶渣提煉乾酪素。精糖沒有了，他自己利用當地所產的甘蔗來提煉糖精，使他這廠內沒有廢棄的東西，沒有缺乏的東西，不為環境條件所束縛，真是難能可貴的。這個廠中，還有兩種特色：第一、它的機器設備很新，一切都是自動記錄，不易發生人為的錯誤。化驗室及圖書設備，亦相當完全。第二、牛奶的來源完全用中國水牛，並且採用民間合作飼養的方式，無須自己飼養。據說以前自己養外國牛，因為天候與飼料的關係，完全失敗了，乃改用中國水牛。經過數年的保育，改良飼料，不令耕田。每頭乳牛最多每日可出乳二十五斤，平均在十五斤左右。農民飼養一頭乳牛，在戰前奶期每日有六七角錢的收入，每年可得一百多元，利益甚為優厚。而且水牛對於肺結核病抵抗力特強，并易於飼養，這種育牛計劃，可說是成功了！西山磁器廠是戰後才創辦的

。據說：「宋代西山（溫州城西），曾出過磁器，故以此命名。」起初是請幾個江西人來當技工，一切都是照江西的老辦法來製造。後來覺得太落伍了，乃將原始的斜形遼道窯，改為轆式的圓窯，用機器煉泥，用機器及模形做坯，工作效能大為提高，形式質地也精美了。他具有很大的野心，想爭取上海和江浙最繁榮的市場，將江西瓷器壓倒。此外，還鑄電用瓷器及耐火磚。照我所見，這是中國最新式而機械化的瓷器工廠。

說起瓷器，就會聯想到龍泉宋代的哥窯。這種東西現在已成爲歷史上的遺跡。而剩下來的殘骸破片，還引起許多研究的興趣。徐縣長瀾若，曾寫了一本「哥窯與弟窯」，專門研究這些殘餘的東西。這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殘物，價錢却是很貴，創造的人，竟貽惠於八九百年以後，使無知的貧民，終年在發掘墳墓，發掘廢圩，以尋求這種殘物，供考古者的鑑賞，而賴以生活，亦可痛可笑之事！龍泉現在的瓷業不知退化衰落至若何程度，產品粗俗得不可耐。有一個過去在洋灰廠當燒窯的班長，他主持一個窯的工作，而稍加以改良。我問他：「出品比其他的窯怎樣？」他很得意的說：「自然囉！要算我們第一了。」我不禁啞然失笑！我想：「你就可算第一，若果換一個更有研究的人來改良，不是更好了麼？」但是有研究的人，就不肯到那裏去工作，中國殘餘的工業生產，可以說都是操在一班最無知識的人手裏，中國的工業，那裏能發復興和發達啊！龍泉近來有一個姓陳的鄉長，他專門研究做宋的瓷器，看起來亦很好，外行的人就被他騙過。但無非是一些玩賞的東西，於現代生活上，不發生什麼關係。

浙江還有一種特產的紙業，即油印用的臘紙。此種東西，原來是日本的特產，因爲真筆板是它首先發明的，所以這種紙業，亦爲其所獨有。高洛臘紙，就是日本貨的代表品。但中國人並不甘落後，勤業公司的風箏牌臘紙，首先起而與之爭雄長了。勤業廠本來在上海，但他所用的原料如楮樹皮、三桠皮等，都是出產在浙江的壽昌、龍游、遂昌、衢縣一帶，其他各地，也都有出產。抗戰之後，這廠就搬到衢

縣城不遠的鄉下，我曾去參觀過。據說：「自從鳳箏牌臘紙出世，日本的高洛臘紙，已經敗退下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的原料，沒有中國的好。」戰前中國全年要銷用這種紙約四十萬筒（每筒九十八張），大部份都由勤業供給，那時正是它營業鼎盛的時代。我出了幾個關於改良造紙的問題，要他研究試辦。那廠長說：「現在的工作忙不過來，不能做這些研究工作。」他所說的忙，也許是事實，但他的意思是：現在的利益，很可以滿足了，何必多找這些麻煩與多所耗費。我想：中國的私營事業，就完全以賺錢為目的，對於研究改進，向來很少注意。這就是一個例子。後來新興的臘紙廠很不少，溫州一處，大小就有數家之多，警鐘牌便是一個代表者。

李毓蒙是毓蒙鐵工廠的老闆，毓蒙鐵工廠，就以他的名字來紀念他的事業。他是一個富於鐵工經驗而又肯研究的人。他由機工出身，而到達現在的地位，這成就決不是偶然的。他這鐵工廠規模雖不算很大，但是歷史很長久，各地分廠很多。所出毓蒙彈花機，發明很早，已成為民間普遍使用的機器。他現已老了，但是他的精神並不老！他在瑞安的家鄉，辦了一個毓蒙職業學校。有機器的工場，引擎不斷的轉着，學生就是工人，先生就是工頭。他想把這個學校當作他永久的替身。唯有未曾受過完全教育的人，更加知道教育的可貴，而熱心提倡教育。好多人知道毓蒙工廠，而不知道廠主李毓蒙是一個勤懇而誠實的晚年人！

我在臨海鄉間，參觀過一個鄉下人麵粉廠，並沒有工廠應有機器設備，而祇是一個古舊的水磨，經過某村學校長王君參照科學的原理，稍為改良一下，能使麵粉的產量增加了一些，品質的精粗，也分得很清楚，而且麵粉純淨，不致摻雜細砂。這種改良的粉磨，臨海縣差不多普遍採用了。所以臨海的麵粉，非常之好。到過臨海的人，一定會想到潔白疎軟的饅頭，而垂涎欲滴。這麵粉運到粵的地方去，海關常它是洋麵粉，而照洋麵粉徵稅，理由是「為什麼土麵粉也有這樣的好？」

餘姚、黃岩、溫嶺草帽業是有名的。戰前銷到美國，就有幾百萬頂，原料是菲律賓特產的蕉蔴，不是普通的草類。太平洋戰事未發生前，溫、黃城鄉老太婆、女孩子，每個人手裏，都拿着一把草，坐在門口編織。收入雖然很微，但是太普遍了，在一個地方統計起來，就是一個很大的收入。天台縣長梁濟康想把這種手工業移到天台去，聘請技師，開設訓練班。正在訓練而快到成熟的時候，我剛到天台，曾經檢閱過一千多手是拿着未編成草帽的婦女行列。但是因為太平洋戰事爆發，原料斷絕，銷路阻塞而失敗了。黃岩、溫嶺也同樣陷於不幸的命運！

受到戰爭摧殘的手工業，除草帽業外，就算紹興的錫箔業了。據說：「操此業的人，有十多萬，因為錫沒有來源，而大半失業。」在紹興未淪陷以前，我曾經設法由廣西及大庾運到多量的錫，來維持他們的生計，紹興淪陷以後，情形更為淒慘。而與它連帶有關的紙業，亦同時受到影響。但錫箔究竟是迷信者的消耗，如果從此消滅了，未始不可減少社會之損失，剷除進步的障礙。雖然十多萬人，一時受到失業的痛苦，但也可以轉入其他行業裏去。這種工業，根本是不必維持的。

製鹽是沿海特有的工業，自餘姚淪陷之後，台州、溫州沿海各縣的小鹽場，就興盛起來。未曾到過鹽場的人，總以為產鹽的地方是何等富裕，因為他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而不知所謂富裕，僅是剝削階級的鹽商及擁有鹽場的人。所謂鹽民，可說是有史以來，就處在人間地獄裏，未曾見過天日。鹽民所住的地方，就沒有一個學校，他們的知識，永遠被封閉着，雖然受到重重的剝削，也不知反抗。他們終年受海風、海潮的襲擊，與強烈日光的薰蒸，而不覺得痛苦。至於生產工作，都是數千年來的原始方法，並沒有政府或資本家、科學家設法去改良。誰也料不到每人每日所必需的鹽，與國家最大的收入——鹽稅，是出在這些最無知識最無幸福者的手上！

【從戰爭中得到的工業經驗】戰爭是經濟激變的動力，有些是受到好處，有些是受到害處。但在中

國，尤其是在浙江工業上所受到的害處是太大了。我這裏所舉述的例子，兩方面都有，無非是想拿來作以後的參考，因此我再就從戰爭中得到的工業經驗，作以下各點的結論。

第一、抗戰自然使工業受了極度的摧殘與磨難，但亦如整個國家民族一樣，在長長的八年中，養成獨立自尊的精神。它的犧牲與損失，固然很大，亦唯其如此，乃彌覺其珍貴。

第二、戰時工業無論質與量的方面，都比不到戰前，尤其是這種戰時工業，在戰後是不能生存的。因為政府在戰前與戰時，對於工業，都未有確定的方針與計劃，而是聽其自生自滅的。如果戰後仍是如此，不但無法與戰後各國的工業競爭，連恢復以前的規模，都不易辦到。所以國家對工業的復員，要有周密的計劃，對於制度、設備、管理、扶助各方面，都要有澈底的研究和改革。

第三、一個企業的成功者，都是篤實堅忍而富有經驗的人。而這些人，往往是出身微末，在工作中心陶冶出來，很少見到是學校出身有理論研究而並具備上述條件的人。因此我覺得要發展中國工業，固然要從發展教育培養人材方面着手，但關於工業人材的教育方法，就得大大的加以改善。不但學校的設備要完善，而學校對於學生的德性陶冶，要特別注意，使成為篤實、堅毅，富於創造性而無官僚習氣的工業人員。

【戰時交通的演變】自廿六年十二月杭州失守之後，祇有富陽、餘杭以北至吳興、長興前線，和南邊隔着一條錢塘江，是壁壘森嚴，交通不便的。其餘如甯波、海門、溫州，差不多每日都有輪船到上海。上海好像是杭州敵人的後方，又好像是我們的後方。彼此往來，金吾不禁，似乎戰事就祇限於杭州的一隅，其他沒什麼關係一般。在我們的境內，浙贛鐵路還可以通至蕭山，公路更是脈絡貫通，隨處可到。我曾經坐汽車到過甯波，到過溫州，以及沿海各地。到了廿七年的下半年，才奉令將沿海一百公里以內的公路、鐵路澈底破壞。這時鐵路僅通至諸暨，至於公路，北邊僅通至白沙，建德、桐廬這一段，已

繩破壞了；昱嶺關至臨安一線，破壞的更早，東邊通至嵊縣的仙岩、奉化的溪口，及天台的縣城，南邊通至青田。依此以東的沿海地帶，各段良聲的公路，都破壞了。對於大後方的交通，在南昌未淪陷以前，浙贛鐵路可直達衡陽，接上湘桂鐵路而至桂林。它把不少的浙江情調，帶到桂林去。公路更是西通湘贛，南通閩粵。所以在抗戰的頭一兩年內，並不見得因戰事而覺得交通困難，反而覺得因抗戰而交通比較前便利得多。金華到重慶，約摸是三千一百多公里，不要說在浙桂有直通火車的時候，就是鐵路斷了，我去重慶出席會議，也是三天到了桂林，如果飛機便當的話，第四天的早上，就到了我們的陪都。我在廿九年以前，亦曾三次到了香港，祇是浙淪路上繞了一個小彎，並費不了很多的時間與遭遇何種困難。

戰事隨着時間進展，交通路線却隨着戰爭而縮短！到了三十年，浙江的公路僅剩下江山、金華、麗水、浦城的一圈，及金華、壽昌、淳安通徽州的一線。中間雖加築了遂昌、龍游及開化、淳安的兩線，但比之以前是差得太遠了。三十一年敵寇大流竄，全省的公路，又有幾段被破壞，祇剩了雲和赤石至浦城楓嶺的一百九十五公里。事後雖然修復了江山至浦城一段，及常山至淳安通皖南一段，但由臨時省會的雲和到淳安去，須經過福建的浦城，江西的廣豐、上饒、玉山，才可以到達。省內的公路和縣鄉道路，無不一破再破。鐵道僅恢復了江山到上饒的一小段，浙贛鐵路總算還留存一個模型。三十三年，湘桂、粵漢兩路的戰事發生，擴展至於贛州。浙江與大後方的交通斷絕了，好像變成東南一個孤島！

浙江的公路交通工具——汽車，在戰事一開始，就受到重大的損失。一部份是在淞滬會戰的時候，被徵調而犧牲了，一部份是撤退到後方，不願意回來。到了最近，省交通處能行駛的汽車，不到二十輛，私人的貨車，也不過二三十輛。汽車雖這樣少，而以現在的路線與經濟狀況，好像還勉強可應付。在初期因為交通汽車突然的減少，而社會所存的物資，還是很多，須要代替的工具來運輸。於是手拖的雙輪車，就應運而興了！當時政府將它編制管理，負運輸的責任。而食鹽收運處因運輸的關係，數量更多一

據說有二千餘輛），組織更為龐大。在金華、麗水的公路上，穿梭似地不絕來往，尤其是層雲到麗水這一段單行線上擁擠不堪，那時來往的汽車仍不少，在那些轉彎抹角的地方，實在是危險得很。我時常坐汽車經過這條路上，汽車必須慢慢的行，才可通過。深恐稍一不慎，就會將手車碰壞，車夫撞死，或碰下河裏去！但這種事件，始終沒有發生，真是彼此的幸運！粵漢鐵路局長陳地球，曾對此種手車隊的組織與應用，作一番詳細的考察，他曾在廣東照樣仿辦。但是後來又覺得廣東的公路，不大相宜，而且又不易得到這許多的車輛，就作罷了。

膠輪手車的時代慢慢過去了，原因是舊有的車身漸漸損壞，而它的膠胎、鋼輪，都要從上海方面補充。自從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了上海租界，對於這些東西，禁運得特別嚴厲，也許那時上海本身，就很需要這些東西，所以來源斷絕了，就無法補充。在路上行走的手車，所有車胎，都是千瘡百孔的。甚至沒有膠胎，就用兩個鋼輪在路上轆轤着走。後來兩浙鹽務局又造一種木輪的板車，木輪上加了一條破汽車胎的橡皮，也就算是一種新的發明！近來更有江西方面到來好些獨輪的手推車——又叫羊角車——，它是江西原始的陸上交通工具，他們不想改良，但是也不易損壞，除車輪上一條鐵圈邊來路品之外，其餘都是土貨，即使損壞，也容易修理或再葺，實在也有它的好處。嘗讀史，秦二世駕羊角車遊行，宮人欲求幸者，沿途灑鹽水以引羊到來，因為羊是喜歡吃鹽的。江西羊角車的到來，也就因為浙江有鹽的原故，這是浙江交通史上的一件有趣的事！

除了這些破舊的車輛之外，陸上一切的運輸，就靠老百姓的兩個肩膀了！我在登嶺（縉雲屬）至仙居的路上，見挑鹽的負仗，不下二三千人，絡繹道上。每擔鹽的面上，都蓋有一個鹽務機關的印形，挑的人就要小心翼翼的，顧着這個印形，不要將它弄壞，否則就要罰挑力，或罰錢。我在蒼嶺上，見到一個挑夫，將鹽傾倒了，印形也弄壞了，他正在一面收拾地上的殘鹽，一面很傷心地哭泣着。我問他：

「哭什麼呢？」他說：「印形弄壞了，即使重量不差，也就得不到挑力錢。兩天往來的辛苦，不但得不到報酬，還要賠上伙食，若果再要受罰，就更不堪設想了，那得不哭呢？」我想：這種防備的方法，固然相當周密，但是祇顧到本身有利的一方，而毫不顧到勞力的一方，真是一件慘酷的刑罰。你想，那樣高的脊嶺，我們徒手上下，都覺困難，他們還要把這樣的重擔，負在肩上，再加以印形的注意力，就等於驚重的負擔。這種困難的道路上，即使有一些損失，也應該加以原諒的啊！中國老話「驢馬鹽車」，是形容人們不幸的苦事，這種「牛馬鹽人」，不更是人間不幸的慘事麼？我很希望各機關當局，對於人力的運用，要同時顧到生理和人造。對於此事，當時本要請鹽務當局加以改良，後來竟忘記了，因此把他寫在這裏，藉以喚起一般使用民力者的注意！

〔幾樣汽車代用燃料〕陸路機力交通運輸除了工具之外，燃料的供給，自然是重要的問題，而且是消耗量最大的東西。以前汽車用的燃料，都是汽油，在二十八年我們就顧慮到以後燃料補充，要成最大的問題，就開始研究代替的東西。最先試用的是火油（即點燈用的礦物油），這是交通處的技術員及工人共同設計的。它的方法，祇是在機的旁邊，裝一個加熱器，將火油的溫度增高，然後專入發動機內，即可開動。但使用的結果，並不良好。據說：「容易損壞機器。而且那時火油還是民間點燈唯一的原料，價錢也並不見得便宜。它和汽油同是外國的產品，來源亦不能長久。一語話當然很有理由，但在那時祇能說「頭痛醫頭」，未來的一切，也就顧不到了。我當時對於這班創造的人，獎賞了五千元，以資鼓勵。後來在報上看見一個美國人向經濟部擬改用火油行駛汽車的建議，理由是大致相同，但是我們已經行駛很久了！

第二種代替汽油是樟腦油。也是在二十八年就開始使用了。它不須增加什麼設備，祇是將油管稍加改動，即可行駛。但它與火油一樣，必須要用汽油點火。使用的結果，據說比任何代替品都好。所以一

直到現在，還是使用着。樟腦油係提煉樟腦同時所得之油，是一種藥用油。浙江各地以前都有人提煉，產量也頗多，因為可用作汽車燃料，就大量生產起來。各地的樟樹頗多，有人估計過，全省約有一萬多株，每株可煉油三擔至四擔，這數字就很可觀了。本地人對於樟樹是迷信的，說每株都有神靈寄住。這是否民間傳說的樟柳神，却無從考據了。因為有了這種迷信，所以無論木材如何缺乏的地方，樟樹是沒有人敢砍伐的。每一村鎮附近，蒼龍可愛的大樹，就是樟樹。想不到百數十年用神道保護下來的東西，在一個戰爭中，竟把迷信打破，而把它利用起來。迷信的結果，居然有一些好處，也是一件滑稽的事情。現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樟樹差不多砍完了。我的雲和住宅附近有兩株大樟樹，他們也要來砍，我對他們說：「甯可不開汽車，不許砍我這兩棵樹。因為牠實在可愛，再要培植起來，非百數十年不可啊！」

用松香提煉汽油，是鐵工廠化驗室江工程師世倫創造的。鐵工廠為它本身所辦之燃料——柴油——及供應交通上的需要而設廠製造，起初成績很好，後來覺得不甚經濟，也許是因為收購的松香儲藏太久了，可供作汽油用的揮發物，已經揮發去了，所以質地與產量，都比初時為差。這種油並未大量的使用，用桐油製造汽油，在浙江最先是麗水的植物油料廠，規模相當的大，當初是部省合辦，後來改為私人經營，桐油是浙江大量的出產，全年約有二十多萬擔，因為禁止出口，價格甚廉，所以煉製起來，比較的經濟，在效率方面亦甚好，這等規模大小不等的煉油廠，在省內有好幾家，有些現在還能夠維持。酒精自然也是比較適用的汽車替代燃料，在外國及後方各省，都大量的設廠製造。但在浙江，因為缺乏製造的原料——糧食和糖，所以製造起來，不甚經濟，並無大量的出產。

提起煉油，我就聯想到江山的酸性白土。正在研究替代汽油的時候，我就注意到酸性白土是煉油時候重要的觸媒劑及凈淨劑。這種土，在蘭谿附近曾發現過，但是成分並不很好，而且產量不多。後來我命李振民到江山去籌備水泥廠，他在江山青灘鐵附近，發現了大量而良好的酸性白土。他如獲至寶似的

來報告我，并且作初步煉油試驗，兩得尚良好的成績。後來鐵工廠的工程師蘇步舉又繼續研究，著了一本「江山白土」的書，我爲他作了一篇序言。這備江山白土的發現與研究，在抗戰時期，是一個重要的事情，政府爲此而撥給發現者與研究者一部份的科學獎金。

湯仲銘氏的木炭汽車，民國十八年，就在廣西的公路上行駛起來了。二十五年，我在杭州，他駕駛一架用木炭的小包車到來，給我參觀試坐。他的國防經濟眼光很遠，認爲不但戰時中國的汽油沒有來源，就是平時在國家經濟上，也不合算。他希望全部的汽車，都改用木炭。但是在平時，有價廉物美多的汽油使用，誰肯用粗笨醜陋的木炭呢？所以木炭車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很多國家使用過，但是戰事一了，也就很自然的被擱棄了，仍舊改用汽油。在中國，隨着抗戰的演進，木炭汽車，乃應運而興。除了加裝一部化炭爐之外，一切都比其他燃料的供給，來得簡單而便宜。自然也有它本身許多的缺點。但在戰時，它是普遍應用的東西，不但浙江，現在却已風行全國，雖然經過好多的改進，已不是湯氏原來的設計，但一見到木炭車，就會想起湯氏來。我在桂林，曾經參觀過他的工廠，他還在那裏不斷的努力。雖然桂林的失陷會把他一切都犧牲了，但他的主張，在抗戰期內，是有重大貢獻的啊！

【水路交通】水路交通運輸的原始價值是不變的，尤其是戰時，這原始的運輸力，更得到高度的發揮。浙江水運交通，向恃沿海，自海疆不保，內河交通運輸，更居重要地位。浙江東南的內河，除了甌江比較水深而平坦，易於暢行外，其餘都是水急灘多的小河流。但是浙人利用水運的精神，是可佩服的。在甌江及其他的小河內，我們見到滿河標棧式的小船。一人或二人，或推或挽的，在與天然爭勝利。好些在外省認爲不靠通船的地方，居然也有船隻航行。此外竹筏的應用，比這些小船更大，因爲小船不能夠過的地方，它們亦能到達。二十九年冬，中央鑑於機力交通運輸的缺乏，而顧到這些原始的人力上而察，於是有全國聯運總處的設立，籌劃設立聯運管理處，想把這些人力與工具管理起來，使它發揮更

大的效力。其實它的可能力量，已經發揮淨盡，但因種種的關係，對於他們要求太苛，或是摧殘太甚，同時對於他們的動力，又不加培養，所以效力反見減少。舉一個例來說吧，甌江的小船，據查有四千多艘，若能善於使用，它的運量，自然很鉅大的。但是軍運或公運，或是有些非法的軍運、公運，所給的代價，非常微薄，那極度勞力的船伕，一飽都成問題，遑論贍養家室？更談不到圖些微利。以致船身壞了，無法修理，祇好由它壞去。甚至自己把船整沉了，另圖其他生計。也有辛苦多日，不但得不到應得的酬報，而且要負額外的賠償。我曾見過船戶出賣妻子，來賠償軍糧損耗的事情。我雖負地方行政的責任，我雖然同情他們，但也沒有辦法。因為制度和其他的關係，使我的力量不能替他們解除這等痛苦啊！

一切的替代品都比不了原來的好。一切的落伍東西，都比不了進步的好。但是在戰時，你就不能不由最好的而至最不好的，一一應用上去，這種現象，是戰爭的進步呢？還是退步呢？有許多人以為這是中國特有的潛力，而不是外國所能辦到的。中國的抗戰，中國的勝利，就寄託在這上面，謂是自己解嘲的說話，如果我們還是迷戀這些舊東西，而不知急求進步改良，真是一個極大的錯誤。這一段戰時的交通運輸演變史，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啊！

廿五 所謂游擊區

【點線淪陷與名稱的確定】淪陷區，是指被敵人佔領的地區而言。但是以往中國文字上，對於確定一種名詞，多半是概括性的和代表性的。往往一個縣城，因被攻佔而淪陷敵手，文書記載，就說是某縣淪陷，好像整個縣份都遭淪陷似的。例如浙江杭、嘉、湖的各縣縣城最先淪陷，文字上就說杭、嘉、湖淪陷了，其實淪陷的僅是那幾個縣城，或是重要的各據點。此外廣大的地區，並沒有被敵人佔領，還有我們的軍隊在那裏保衛，還有我們的政府在那裏執行政令。中央爲了要分清這種名稱的界說，所以規定凡是有敵人佔領點線的區域，不許稱爲淪陷區，而稱爲游擊區。游擊區的範圍，是包含已被佔領的點線與未被佔領的面。「游擊」是戰術上的名詞，雖然以上所說的區域，合於游擊戰，或已實行游擊戰，但是以作戰上的行動，來確定某一區的名詞，究竟還欠斟酌。否則，我們未淪陷的地區，就該名爲正規區了。因爲未淪陷的地區，萬一敵人侵入，是要從事正規戰的啊！但儘管文字上如此規定，而一般人還是叫做淪陷區，甚至政府的公文上，往往也寫成淪陷區。

【戰地黨政委員會】抗戰開始不久，我國就失陷了很多的土地。所以許多人都認爲我國軍隊，以劣勢的裝備，光是同敵人在一點一線上爭勝負，一定得不到很好的結果。於是「全面戰」與「全綽戰」的論調，就成爲當時最流行的術語。而游擊區的如何控制，游擊戰的如何展開，遂亦成爲當時人們最感興趣的問題。二十七年夏天，我因省內政治的暗潮，而到武昌去，曾對蔣先生報告，自願將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職務辭去，請求帶兵一軍或一師，到游擊區裏，從事全面戰的游擊工作。雖然那時候多少含有政潮上的衝動，目的在於辭職，可是我的確對此感有興趣，並且自信對此還有些研究。但蔣先生拒絕我

的請求。他說：「浙江現在僅有少數的縣份淪陷，你果將未淪陷的地區，切實鞏固，再從事淪陷區的游擊戰，收效一定比單獨帶兵到淪陷區去大得多。你以一省主席的地位，要指揮一軍或一師人，當然不成問題。」他這番話，當然含有不許我辭職的意思，但這個指示的道理是非常正確的，我的辭意，於是打消，回到浙江來，希望本着他的指示，而展開以後的工作。

廿七年冬天，武漢失守了，我們奉召到長沙去開會。那次會議對於如何控制廣大的淪陷區，發動敵後的全面戰爭，是重要討論題目之一，大家對此都非常注意。我在會裏，也發表好些理論，於是決定中央設立戰時黨政委員會來統一主持這個重大的工作，並在各戰區設分會。當時有人徵詢我：「願不願意到中央去擔任黨政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由蔣先生自兼）我婉辭了。這並不是我對於這個工作，一時又不感興趣，與我以前的主張有矛盾出入的地方；而是認為那時所決定的組織與職權，是辦不通的。因為那時所決定的組織，是中央有關各部門的混合體，在地方則為戰區與各省之混合體。因為職權不容易劃分清楚，若果認真執行起來，在中央，首先就與各院及行政院有關係各部門發生權責上的衝突，在地方，則與戰區及省政府的職權發生衝突。不但得不到良好的結果，反而會引起許多糾紛。我是主張淪陷區與非淪陷區截然劃分的。這個組織，（黨政委員會）應該設在淪陷區裏面，它不但是淪陷區黨政一元化的最高機關，而且要進而為淪陷區黨政軍一元化的最高機關。它祇對中央黨部行政院軍事委員會負責，而暫時與後方其他部門不發生橫的關係，如此方能因應機宜，發生迅速而偉大的效力。否則不但是一種無益的浪費，而且會增加在淪陷區內工作的困難，還不如不設的好。我的主張是如此，後來這個責任是李任潮來負責，最初他是很熱烈的做去，後來逐漸發生困難，甚至愈久愈不易應付了，不由他不冷淡下來。這機構，亦就於三十年取銷了。

【浙江初期淪陷的情形】當杭、嘉、湖首先淪陷的時候，各縣的縣政府，都以為縣城失守了，整個

的縣就算完了。那時縣長及各機關的人員，都隨着軍隊撤退到後方，祇有長興縣長王文貴還能在縣境內支撐。省政府覺得平時縣政府的組織，不能應付戰時的變態，於是將縣政府改爲行動委員會，網羅地方士紳當委員，以主任委員行使縣長的職權，這是廿七年二月所決定的辦法。但是委員會的組織，在平時已覺運用不靈，在戰時，尤其在淪陷區，自然更不適用。不久，仍把它取銷而恢復縣政府組織，不過機關簡陋了些，人員亦減少許多。不久，中央頒佈陷區縣政府的組織。同時還頒發了一個地方官吏戰時不能擅離轄境的命令，規定戰地各省，省政府不能離開省境，專員公署不能離開區境，縣政府不能離開縣境。如果擅自離境，按軍法治罪。而首先受到極刑的是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固然韓復榘之處極刑，尙有其他重要的原因，而擅離省境，却算是處死的主要原因之一。自從這個命令發佈，及韓之被處極刑，政治軍心，爲之一振，把政治上軍事上聞敵退走意志頹喪的風氣，爲之一變，這真是抗戰初期的重要關鍵。在浙江也懲辦了一個海甯縣長田履豐。因爲他被敵人壓迫，而退駐紹興，把他判處了十年的徒刑。自此之後，陷區的政權，乃重新建設起來。此中原因，自然爲了有很多冒險犯難的同志，自動在那裏奮鬥，而這個命令的頒佈和執行，使那些投機取巧的人，就不敢輕於到淪陷區裏面去嘗試，收效自匪淺鮮。

敵人在初期因爲情形不熟悉，而且爲兵力所限，在淪陷區完全是取守勢，祇是在佔領的據點內困守。據點以外，就下敢過問了。而且以爲他能控制這些要點，或要線，就可以控制全面，與我們以全面控制點線的原則，剛剛相反。所以我們在敵人據點以外，一切行動都很自由，行政的設施，和以前差不多。縱然有時敵人會發生一種「掃蕩」的工作，希望用武力來肅清我們的政權，但亦祇是一時的予我們以障礙，而不能長久如此。所以在廿七年是我們游擊區政權的恢復時期，廿八廿九兩年，則爲游擊政權的發展時期。省政府爲加強游擊區的行政工作，特於廿八年一月在天目山設立浙西行署，後來（三十二年

秋，又在天台設立浙東行署。這兩個行署，就是指揮浙東浙西游擊區行政的前方基地。省政府賦與行署主任的權力相當的大，組織亦相當的健全，這是我認為游擊區裏許多問題，都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人制宜的來處理。惟其如此，方能迅速而獲得比較良好的效果。省府遠處後方，交通通訊都不便利，若還要像平時一樣處理游擊區前方的問題，一定不能有因應機宜，與發生種種牽制的地方。也曾有些人評論賦予行署的權限，未免太大。但自實行以來，也不見有越權越分的地方。因為過份防止下級的越權越份，是容易使下級受到消極的束縛，而不能發揮它的力量。而我所希望於下級機關的積極的發揮力量，是在不越權不越份的限度之內。這種限度的遵守，是當事者應當自己斟酌的分寸，上級機關不必為之硬性規定的。

游擊區政權的確保，自然要有相當的武力來掩護。在廿六年冬浙江各地開始淪陷的時期，各縣的原有武力，多半崩潰了！因為以前各縣的武力，如警察隊、保安隊等，沒有經過這樣的濤浪，而且當大軍撤退的時候，有些失了隊伍的官兵，都聚集在游擊區內，度他們自由而優裕的生活。還有國軍遺失的武器被地方上的莠民，搜集起來，另成爲一種武力。這兩種人都是打着游擊隊的旗號，盤聚在游擊區內。雖然有時他們也會打打敵人，但是妨礙行政，擾亂治安，是經常的事。政府想樹立政權，保障人民，就先得將這些游擊雜軍，加以處理，但是空口說白話是不行的，而必須有武力作爲後盾，才可使他們就範。我與劉總司令恢先商量，決定將一部份國軍及省的自衛團隊，開入游擊區裏去。其目的：第一是打擊敵人，第二是整頓那些游擊部隊，計前後後，由杭、嘉、湖地區編出的，有李泉笙等數千人，分別在昌化、紹興等地整訓。在那時，這些游擊部隊，對民族抗戰的意識，還相當的高，所以他們還易於就範。實際上亦不由他們不就範。因為有國軍及省自衛團隊在那裏監視他。自從經過這番大整頓後，游擊區政權，才能確立。同時各縣亦重新建立地方的自衛武力，以保障自己的安全，或從事對敵的戰鬪。

行政的表現，第一是整理鄉鎮保甲，實行全面的控制。在大軍及政府撤退的時候，鄉鎮保甲，無疑的也同樣的崩潰了。但是人民對於國家政府的向心力量，是暗地存在的，縣政府一經恢復，鄉鎮保甲也就首先恢復。所以那時候游擊區各縣，除了淪在敵手的縣城，及各據點之外，其餘的鄉鎮都是服從政府的政令，與後方各縣，並沒有什麼分別。第二是整理財政，游擊區的縣份，都是浙江最富庶的地方，尤其是以田賦佔大多數，當初中央對於游擊區是免賦免稅的，這種政策，為收拾民心，或有若干作用，但為確保政權，展開鬭爭，則極有困難。因為中央及省都不能有大宗的款項來貼補游擊區的經費，除非放棄了政權和鬭爭，否則就要就地籌款。田畝捐，就是最可靠最大的收入，於是省府准各縣收田畝捐。但是當時（廿七、廿八年）因沒有中央法令，引起各方之責難與誤會，而事實上則不能不如此做去。否則，政權便無法維持。後來中央有了規定，才算是合法化了。游擊區人民對於政府的稅捐，是極踴躍繳納的。我們收稅，可以收到敵人所佔領的據點裏面，募債亦比較後方的縣份更來得容易。因為他們身受敵人蹂躪的慘痛，比後方的人民要厲害。第三是建設的工作，游擊區還談什麼建設！相反的，祇是在那裏破壞建設，如破路和阻塞河道等；但是亦有例外，海甯的海塘是要逐年修理的。抗戰以來，自不能照平時那樣歲修，因而倒塌的地方很多，情形非常危險！而海甯縣長郭兆豐、顧達一，更能在敵偽盤據下，發動人民去搶修，使這一方的人民，不至淪為魚鼈，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固然人民是為他切身的利益，敵偽亦認為是一件善事，而不來干擾，亦是戰爭中一件有趣的事。第四是教育的工作。這是我們所注意的事，我們不但要恢復以前的鄉村小學教育，同時有多數縣份，還在本縣的境內或比較安全的鄰縣境內創辦中學。偽組織在他的控制區內，也辦有各種學校，希望以教育的方法，來奴化這一批幼小者，使他們都成了馴善的順民。但是人民的國家民族觀念，不是一朝一夕可能消滅的。很多的青年，不願受奴化教育，而千辛萬苦的跑到後方來，所以偽學校的學生，為數都很少，而且那些學校裏的學生先生，心

內是明白的，表面雖不能不表示屈服，暗地裏却在爲我們做地下的工作。此外如會計制度、人事制度，還是維持着，尤其是人員控制調動，都能貫徹政府的命令。各種會議照常的開，到會的人都很踴躍，幹部訓練也不斷的舉行。有一次在天目山的浙西幹部訓練團，就調訓上千的鄉鎮長、小學校長或教師，他們歷盡艱辛，不顧一切，回到後方，領受精神或學術的訓練，回去之後，更能展開他們的救國工作！

總之：在游擊區內，一切都是從戰爭中求生存，沒有戰爭就不能生存的道理，在游擊區內，見之最確。因爲要鬭爭，一切爲了軍事，一切都針對着敵人，所以一切的問題，也就簡單起來。有些在後方容易發生的事，如黨政的不能協調等，在游擊區內部，却很少聽到，原因是敵人就在前面。

【漢奸及偽組織】當敵軍佔據一個地方，自然要招致一些爲虎作倀的漢奸，組織一種偽機構，來實行他所謂「以華制華」的毒辣政策。日本對於漢奸的豪養，是有長久歷史的。可以說自他的大陸政策決定之後，培植漢奸，就是其中的主要工作之一。駐在中國的使館領事館、特務機關、學校、工廠、商店，無一不是培植漢奸的機構。甚至對於中國在日本留學的學生，都被認爲日後可利用作漢奸的可能。他們所用的方法，無論直接間接，真是無孔不入的。中國二十多年來的內亂，許多政治上失意的人，無一不是他盡力拉攏勾結的對象，希望得以接近，或是感激他的援手，而爲所利用。下一等的人，則平時出價收買，使他們作種種間諜工作。所以在未開戰之前，漢奸間諜，已遍佈國內，戰端一開，這些大大小小的漢奸，自然大露頭角，更加活躍起來。照我的分析，漢奸的來源，可分下述幾種：第一是主張中日親善的高等人士。這些人由於自己醜惡的錯誤，而被敵人「大東亞主義」、「共存共榮」的歪曲論調所欺騙。因爲他們主張對日親善，所以敵人也同他們親近，這樣一個有野心有力量的對手，從親近着手，而實行姦騙。管你自己當初真心不真心，事後願意不願意。你還有什麼方法，擺脫他的牢籠？第二是政治上的失意者。這些人對於政治上有野心的，雖經過了失敗，但不甘雌伏，而思乘機再起，他們祇有

個人的利害，沒有國家民族的觀念，尤其是本黨執政之後，以前那些因反對本黨而失意的人，中央雖寬大爲懷，或予羅致，或既往不究，但總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時常憤懣於他已往權勢的煊赫，而思重整旗鼓，再度登場。敵人乃視此等人爲最好利用之工具，他們亦甘心爲所利用，而恬不爲怪，即在本黨政府之下，因貪污犯法而失意的人，也都是這樣。第三是日本洋行的買辦階級，和由日本人培養的學生如同文書院等。這些人久仰敵人的氣息，受着敵人的餽養。他們早忘了民族的本性，失却國家的意識，不管他現在或過去是否曾受敵人的薰陶，或爲敵人做過工作，一到戰時，他們都得走上這條路子，而敵人也一定去招致或脅迫他們走上這條路子，這是日本人最忠實的同志。第四是社會上失意的種種色色的人。如投機失敗，信用不好的商人，生活不好的律師，以及行爲爲社會所不齒的人。這些人在抗戰以前，已失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必在另一個社會的環境，才有他出頭的機會。在敵人佔領之下，社會環境改變了，他們出頭的機會也到了。第五是當地無可奈何的人。有些人是富有資產的，他沒有勇氣拋棄他的產業，遷到後方來，他爲保存自己的財產，而甘心爲敵人利用，或和敵人親近。有些是沒有財產的人，爲生活所迫，或想利用這個機會，而得到優裕的生活，或是生於斯，長於斯的鄉下人，他無法逃避，亦無法抵抗，遂走到漢奸的路上去。以上所說的五種漢奸來源，雖然不能說這五種人裏面個個都是漢奸，但我可以斷定個個漢奸都離不了這五條路線。而敵人之羅致運用，亦各盡其妙。譬如他要羅致第一類的漢奸，就利用近衛文麿的宣言，堂堂皇皇的，說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來，使那班主張親日的人，也提出他們的平日主張來熱烈附和，以表示他們不是向敵投降，而是爲了「和平救國」。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這班人，竟從我們的陣營裏投到敵人的懷抱。敵人是利用親善二字，來實行姦騙；而汪、陳、周却偏說是自由平等的戀愛。敵人對東北及華北，就不用這種方法，薄儀之被土肥原弄到東北去當傀儡，與其說是強綁，毋甯說是同意的拐逃，王克敏、王揖唐、齊燮元、王蔭泰等華北偽組織，更是送上門去出

賈，絲毫用不到那些做作。這些第二類的人物，自然要與第一類的人物有所分別。第三第四第五各類的漢奸，就是用來充實第一第二兩類大漢奸的爪牙，隨時隨地，都可供利用，以發揮其上一致的效力。這就是抗戰以來國內漢奸的概況。我要寫浙江省淪陷區裏的漢奸偽組織情形，不能不先將漢奸的全貌，作一個輪廓的素描。

敵人於廿六年冬初，佔領杭、嘉、湖，那時南京的偽組織，尙未成立，在各地要馬上組織一個省或縣的偽政府，尙有相當的困難。第一是還沒有這許多合於漢奸資格的人。第二是恐怕馬上組織，會引起當時想利用的人或當地人民的反感。所以在佔領地區，僅僅成立一個「維持會」。維持會好像是暫時性的，也好似社會性的，使這些受利用的人及老百姓起了一種模糊不清的觀念，來掩護他以後的漸進手段，時間漸久，這些被姦騙的人，雖然有所感覺，但已失身匪人，無可自脫，祇好甘心忍心的做下去。以後就隨他爲所欲爲了。所以維持會的名目，表面上是漢奸偽組織的過渡時期，其實乃是製造漢奸偽組織的準備時期；惟其是這樣，所以入彀的人，會一日多似一日。這初期的情形，到處都是如此，不獨浙江爲然。自從廿八年，近衛「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宣言發表，汪精衛由出走而出賣，而到南京去組織偽政府。敵人找到了漢奸的中心，於是由上而下的偽政府，由下而上的維持會，遂合而爲一，而偽浙江省政府主席汪瑞閻亦應運而出現了。但他並不是汪精衛的親信，而是敵人臨時拉出來的，終於爲汪逆所更換，而以傅式說繼任，這就是浙江省正式的第一任偽官。從而杭州偽市長各區偽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各縣偽縣長，都相繼出現。這一批偽組織偽官的名目，與我們中央的組織官制是一模一樣的，就表面看，真有難分真偽之感。記得我曾收到一封公事，外面寫的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鈞啓」，是某某縣政府的呈文，但拆開來看，裏面都是「謹呈主席傳」。那個署名的縣長，也不是我政府委派的，而是一個偽縣長。這些魚目混珠的事，已數見不鮮。我揣汪逆精衛之所以要將偽政府組織官制，全部照抄，也

就是收魚目混珠以偽亂真的效用。但是魚目是魚目，真珠是真珠，終究是混不過去的啊！

傅逆式說是上海大夏大學的要員，我也擔任過那個大學的校董，以前頗有過從。我得知他投入偽組織當漢奸，當時甚為驚異。而且他又在浙江當偽省主席。我當時真想寫封信問問他，為什麼一個在最高學府當過要員的人，一些國家民族思想都沒有？竟肯把清白之身，投到那永遠不能洗滌的爛污窩裏去？但是後來想想，何必多此一舉？汪、陳、周等，以他們的歷史地位與學問知識，在國內也可說是上流的了，而竟作賣身投靠的勾當，豈不是比他更無意義得多麼？這些高等的漢奸，更比不上下等的漢奸，可以用理智使他悔悟。他們是迷失了本性，正在那裏倒行逆施，亦祇有劍及履及把他們剷除，才能使一般人有有所戒懼！不久，偽杭州市長何璟就被我們愛國志士擊斃了，他可算是與偽上海市長傅筱庵是先後並臭的兩個東西，但是便宜了他。使他不能受到現在比殺身還厲害的精神痛苦，及未來的刑罰！

廿九年以後，敵人得了漢奸偽組織的幫兇，在陷區裏就活躍得多！初起是「掃蕩」，繼之以「清鄉」，再繼之以「封鎖」，希望將我方游擊區內的政權及武力，一概肅清，以實現他們預期的計劃。然而這種陰謀，都失敗了！先說掃蕩，當淪陷的初期，敵人挾他的優勢裝備，佔領我們的點線之後，就龜縮在據點內，不敢輕於舉步，尤其是夜間，簡直不敢出門。二十九年以後就改變了，不但一年內有二次或三次的定期掃蕩，而且還隨時不定期的竄擾，並且敢於在夜間進行偷襲。當初我們自然受到很多的打擊，但是終於在打擊中，得到應付的方法。我們化整為零，可在很小的區域內活動，使敵人的掃蕩工作，得不到很大的效果。他們乃隨而進行清鄉的工作。清鄉是中國內政上的名詞，必須有縣的基本組織，才可進行，單靠軍事力量是辦不通的。敵人自得了偽組織的幫兇，始能着手進行清鄉，這是偽組織對國家民族最大罪行之一。在偽中央，設有清鄉事務總局，各省設清鄉總辦，皆有漢奸的主要頭目來充當。各縣辦理保甲，實行聯保切結，在公路鐵路線上，更組織愛路團。如果有我們的政府人員及部隊到達某一

地點，或連過某一路線，保甲長及愛路團必須報告，否則要受到敵偽極刑的處罰。同時將以前在佔領據點內所實行的良民證，擴展到鄉村裏面來，敵軍對我政府人員及部隊所到的地方，則實行燒殺的恐怖政策，陷區人民，雖存心向國，但處在這種淫威之下，亦就無可如何！我們的政府及部隊所到的地方，人民頂香跪在前面，希望我們不要進去，或在那裏做破壞的工作與作戰，以免他們受到慘重的損害。我們也深體人民的痛苦，有些地方，非必要的時候，也不輕易進去。但是有些地方的人民，也有兩全的辦法，一面使我們便利的通過，或停留，一面去報告敵人，以解除他的責任。良民證也就成為我們工作人員的護身符。這些良民證，都是他們替我們代辦的。在這一個時期，我們的工作和行動，雖受了一時的限制，但日子久了，我們仍舊一樣暗地的活動，而且能使那些下級偽組織的漢奸，變為我們掩護的工具。往往我們的工作人員，被敵俘虜了，偽組織的漢奸就得盡力的為我們營救。這些漢奸，一方面怕我們當時的嚴厲處分，一方面也想留一以後下台的地步，因為他們也明知敵人日後是必敗的啊！清鄉的結果，就是這樣。敵人乃再進而實行封鎖，先把交通要點控制了，再將各縣的據點，大事擴展，主要的據點用敵人，次要的要點用偽軍，或是敵偽混合扼守。同時將滬杭鐵路及京杭國道的兩側，都用竹籬笆圍起來。主要的路口，都用兵把守。河道的橋樑，用不着的，都加以破壞，剩下來的，也都派兵把守。自然，這樣可以予我們行動上以許多困難，但是我們仍有法子行動。敵人對游擊區的三部曲——掃蕩、清鄉、封鎖——是相間相助的運用。由廿九年一直到三十二年，不斷的進行着。三十二年以後，已成了強弩之末。然而我們敵後的政權及武裝，仍是屹然的存在，到了三十二年之後，復大見活躍起來。原因是敵人已無更進一步的辦法，他亦知道整個勝敗的因素，並不在這一個區域之內，而逐漸鬆懈下來了！

【在游擊區內應付鬭爭的人事調動】敵偽在游擊區的情形，既是這樣，我們自然是針對他的種種，而隨時改變我們鬭爭的作風。自二十六年終的倉皇撤退，我們知道以前那班工作人員及組織，是不能適

應這個非常的环境，隨即改變組織，並另外換了一批新的縣長及工作人員。廿七年七月以後，政權日漸的恢復，廿八、九年就逐漸的展開；但是到了廿九、卅年遭受敵僞「掃蕩」「清鄉」的打擊，這批人又應付不下來了！不但人員要調整，而且武力亦須補充，方法亦須改變，然後才可以打開新環境，重新樹立新的力量。到了三十三年，加了一番調整補充，始能維持到今日。統計在這八年的當中，因為環境情況的不同，而影響到人事的更變。在大體上看，八年之中，人事調整了四次，也可以說是鬭爭方法的轉變。因為某一種人，僅適合於某一階段的鬭爭，過了某個階段，就得另換新人，始能應付新的環境。所謂新人，其實都是舊的青年，或下級幹部，在陷區內經過長期鍛鍊出來的人。祇有一個杭州市市長兼餘杭縣長陳純白，他是始終沒有退出過，他年紀已相當的老大，但是他是老而益壯，長久保持青年鬭爭的勇氣！

在這八年內陷區鬭爭之中，縣長殉職的，有慈谿縣長章駒，桐鄉縣長李挺、及蕭石父。桐鄉是環境最困難的縣份，所以他們的遭遇，也最不幸。此外還有紹興縣長鄧劭，於紹興城淪陷時殉職，當初因為得不到真確的消息，有人懷疑他有偷生的情事。但經過了長時間的調查，並不見他在那一方露面，而且他是一個有血性，好活動的人。如果不死，決不會長期蟄伏，而久不出頭，所以我得特別提出，以前的懷疑，實是錯誤，我們不應該懷疑一個壯烈的殉職者，使他含冤地下，而須將他旌表出來。縣長被俘虜的，也有好幾個，如嘉興縣長鄭器光，平湖縣長許敏中，海鹽縣長呂師揚，都是被俘不屈，設法脫險的。但是也有不肖的敗類，如海甯縣長謝叔銳，餘姚縣長蔣先啓，是被俘而屈服的。其他各級工作人員因對敵鬭爭而殉職的則更多了，統計先後死難的達六十六人（連政工同志在內計一百三十九人）。茲將抗戰期中本省對敵鬭爭殉難之各級工作人員姓名及事蹟列表如左，藉資表揚。

姓 名	職 別	年 齡	性 別	籍 貫	殉 難 地 點	殉 難 日 期	殉 難 經 過
趙光文 (化名沈耀)	浙江行署杭州情報組行 動員		男		杭 縣	29. 3. 5.	廿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三墩被敵憲兵拘捕經營救未得 釋放至二十八年三月五日遭敵慘殺
應清池	浙江行署特擊隊隊員		男			29. 10.	敵寇流竄執行突擊及間諜任務被俘殉職
金劍平	浙江戰時食鹽運處派 派		男		斗 門	30. 5. 21.	內派至澆渚看鹽堆搬去公物在斗門被敵殺害
黃景照	浙江戰時食鹽收運處股 長		男				以有病之身於浙東事變時仍鎮定應付治敵臨城下始逃 致受警病故
齊金福	浙江戰時食鹽收運處臨 海辦事處會計主任		男	諸 暨		30. 4. 21.	因敵寇進犯寧紹運鹽斤被敵沖散旋又被敵便衣隊追 及殺害
吳士相	電計局第二管理處主任 兼郵縣分局主任	30	男	桐 鄉	兩 頭 縣	30. 4. 23.	因浙東事變率同屬員趕赴前線指揮軍事通訊不幸身陷 敵圍被害
陳炎燮	高級話務員	26	男	杭 縣	兩 頭 縣	30. 4. 23.	隨吳主任趕赴前線指揮軍事通訊身陷重圍被擊受傷不 治斃命
王思明	話務員	24	男	諸 暨	兩 頭 縣	30. 4. 23.	隨吳主任趕赴前線指揮軍事通訊身陷重圍當場殉職
董紹坤	報務員	20	男	鄞 縣	兩 頭 縣	30. 5. 23.	全
宋一新	寧波警察總隊主辦會計 員		男		杜 岙	30. 5. 31.	被敵包圍攜帶現款被難中途失足墜傷殞命
鍾 輝	寧波諸暨站調派員		男		諸 暨	30. 4. 29.	因公出差在諸暨雨宜鄉與敵相遇被捕槍殺
凌醉泉	浙江省第二區對敵經濟 封鎖處文武分處會計員	40	男	安 徽	安 武	29. 10. 10.	因敵人進犯安武撤退時搶運公物遇敵中彈殞命
孫元明	第三區專員公署事務員		男		紹 興	30. 4. 17.	因敵寇竄紹攜帶公文物件經南門為敵截擄殺害
顧 郁 齋	杭縣調欽區署區長		男		杭 縣	30. 5. 19.	正在開會募集飛機被敵包圍俘擄旋即殺害

蕭石父	戴大鎔	王子通	陳民敦	董仲儒	王維亮	翁希文	范覺先	陳穀生	柏拔山	許仲安	徐淦泉	戴湘生	蔣洪寶	陳有德
桐鄉縣長		嘉興縣政府祕書	嘉興縣政府書記	嘉興縣政府事務員	嘉興縣政府事務員	嘉興縣政府事務員	嘉興縣政府事務員	嘉興縣政府科員	嘉興縣軍訓代辦所副所長	嘉興縣新塍區區長	餘杭縣稅務分處征收員	海寧稅務分處捐稅股長	杭縣昆市鄉第三保副保長	杭縣情報員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53	21	22	23	23	24	27	37	31	47			
			青田	泰順	泰順	泰順	潛山	江蘇	嘉興		餘杭			
陳市	西塘		新塍鎮	嘉興	嘉興	嘉興	嘉興	嘉興	嘉興	妙智橋			富陽	杭富路村口
30. 9. 16. 晨	30. 1. 2. 晨	28. 11. 13.	26. 11. 19.	26. 11. 19.	26. 11. 19.	26. 11. 19.	26. 11. 19.	26. 11. 19.	26. 11. 19.	28. 1. 23.	29. 10. 8.	30. 4. 12.	29. 12.	27. 9. 15.
因出席全省行政會議被敵包圍衛士衝殺不出以致死難	在西塘受敵苛刑威迫不屈殉職	因曾被敵人捉去過度驚恐遂致病亡故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革命駐新塍守土不屈遭敵戕害	爲率自衛隊會全挺進隊出發擊敵僞遭遇匪僞伏擊中彈殞命	爲衍編笠帽潭地方田畝捐底冊遇敵失足跌斃	遭遇敵僞被擊殞命	因公出外遇敵綁架旋即被敵嚴刑拷打壓不吐實致遭殺害	隨全軍隊出發破壞敵軍橋樑遇敵中彈殞命

王文林	余學孔	王金聲	劉斐文	葉澤治	李光杰	沈植夫	王菊廷	李挺	孫勉安	周民安	儲林甲	戈平邦	華海澄	張福洲
吳興縣行動委員會第二 游擊隊指導員	吳興縣政府科員兼特務 股長	崇德縣會計一等佐理員	崇德縣特產管理處土絲 督導員	海寧縣政府科員	海寧縣金庫辦事員	海寧金庫代理主任	海寧縣突擊股員	桐鄉縣長	平湖縣政府科員	平湖縣政府科員	平湖縣政府科員	平湖縣政府會計主任	平湖縣情報員	平湖縣情報員
	29	男	17	男	男	男	男	男	39	26	29	31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徐家埭	白龍山		紫德	海鹽				桐鄉鄉 附澤鄉	蕭山	紹興	宜興	平湖		
27. 3. 26.	30. 3. 6.	30. 8.	30. 7. 9.	29.	30. 1. 31.	30. 1. 31.	29. 4. 20.	29. 4. 14.	23. 11. 25.	28. 11. 25.	28. 11. 25.	28. 11. 25.	30. 8.	30. 8.
召集民衆組織抗敵同盟會爲漢奸率衆襲擊殉難	爲爭取湖城僞軍反正肅敵寇匪徒毒計謀害	因敵來襲機槍炮彈甚緊張於公文移藏後被迫渡河溺斃	因公被敵擄去不屈就義	被漢奸擄解刑審逼獻卷地點不供慘遭殺害	敵人進犯海鹽被擄殺害	敵人進犯海鹽被擄殺害	狙擊著名漢奸戴渭生因臂力不勝反被推倒擊斃	十四日晚在附澤鄉宅廷浜遇敵僞數十人慘被殺害	全	全	全	敵僞軍三千分六路進犯平湖包圍縣府被俘嗣許縣長脫險後旋即死難	全	被敵密捕搜出我方證件爲敵所害
									上	上	上		上	

曹信如	吳興縣政府事務員	男	吳興	29. 5. 28.	奉令下鄉公幹在下昂朱家坎遇敵殺害
蔣正綏	吳興縣練市區巡官	男			因公被敵便衣隊所擄脅迫不從卒以身殉
姚學賢	德清縣政府情報員	男			敵犯又頭該員返府途中遇敵被擊斃命
章 駒	慈谿縣長	男	北溪	31. 1. 30.	敵由相量門進擾北溪時督率隊奮抵禦身先士卒不幸殉
樓童生	定海洞奧代理區長	男			我軍克復大展後敵速援反撲該區長即爲此役殉職
胡乾生	定海賦稅征收處征收員	男	莊香	29. 4. 16.	在鄉征收賦稅遇敵登陸被捕殺害
楊誠森	蕭山衙前衛生分院主任	男		27. 7. 11.	敵僞流竄被敵俘擄不甘附逆投河而死
楊仁本	浙江省戰時政治工作人 員訓練團團員	男 諸暨	虹甕堰	27. 4. 28.	奉命過江幹政治工作召開鄉鎮保長會議爲漢奸探知途 遇預伏敵軍殺害
盧叔鎮	諸暨縣無線電台主任	男	潦溪	30. 5. 15.	因敵流竄綏道東陽蔡宅因督工搶搬機件遇敵被綁殺害
項民暉	上虞百官區署事務員	男	五夫	30. 9. 7.	爲出席區行政會議路經馬曼橋遇敵被俘殺害
鄧 初	紹興縣長	男 湖南	紹興	30. 4. 17.	紹興失守時與敵突擊被擊殉職
王 英	民政廳科員	男 杭州	松陽	31. 8. 25.	被敵俘擄不屈殺害
王道一	省政府秘書處科員	男 紹興	松陽	31. 8. 25.	全 上
吳景昆	民政廳科員	男 杭州	松陽	31. 8. 25.	被敵俘擄不屈殺害
吳慎慶	浦江縣政府事務員	男 縣	浦江		縣城淪陷時撤退下鄉遭敵俘擄不屈身殉

張貼清	楊吉臣	周民安	王新民	陳金奎	張安石	陳惠民	盧雅芬	顧麗娟	朱淑芬	陸進英	徐珏英	袁湘君	陳憶姜
三區戰地政工隊隊員	三區戰地政工隊隊員	三區戰地政工隊隊員	三區戰地政工隊隊員	三區青年營營員	吳興政工隊員	三區青年營營員	年服務團團員	年服務團團員	年服務團團員	年服務團團員	三區直屬政工隊隊員	三區直屬政工隊隊員	三區直屬政工隊隊員
18	26	22	30	20	19	24	17	17	17	17	22	21	29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海寧	諸暨	紹興	諸游	海寧	吳興	海寧	海寧	海寧	海寧	海寧	海寧	海寧	餘姚
沈海	奉化	平	崇	桐	吳	海	茶	茶	茶	茶	茶	茶	茶
蕩鹽	化寧	湖	德	家鄉	興	貼鹽	院鹽	院鹽	院鹽	院鹽	院鹽	院鹽	院鹽
28.	23.	28.	28.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27.
7.	6.	6.	3.	12.	7.	8.	8.	8.	8.	8.	7.	7.	7.
31.	7.	4.	25.	13.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敵大隊進攻海寧海鹽該員正奉令去敵後工作聞訊滿夜回隊報告行經沈蕩為敵所執不屈而死	中彈陣亡	被敵割耳挖目斷去四肢而死	奉令深入平湖縣城探取敵情為敵所執以種種酷刑逼供	敵由斜橋開趙家村該營即予抵抗該員中彈殞命	該員祖任情報工作曾為敵偽所嫉忌二十七年十二月為其祖母週神之期返家被敵探悉於夜三時捕獲嚴刑逼供不屈與父同被害	敵輪三艘截敵寇經隔塘橋青年營聞訊出擊敵以機槍掃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張澤西	省直屬第一政工大隊青年團團員	男	長興	新長	28.8.25.	該員至新塘搜捕漢奸沈長林被擊身死	
梅 聲	定海政工隊員	男	定海	定海	28.8.25.	該員親入匪窟刺探匪情被匪生擒遭斷臂而死	
李文雄	省直屬第一政工大隊第二隊隊員	男	平陽	吳興	28.10.6.	該員參加該隊在雙林敵後搜集戰利品炸彈爆發傷及要害致死	
楊文貴	省直屬第一政工大隊第二隊隊員	男	吳興	吳興	28.10.6.	全	上
姚 羣	省直屬第一政工大隊第二隊隊員	男	吳興	雙林	28.10.6.	全	上
畢李芳	省直屬政工第二大隊	男	吳興	太平橋	28.11.1.	由武隨帶赴縣轉經之壯丁三名途遇敵軍被擄至武康被害	
陳元其	省直屬第一政工大隊第二隊隊員	男	杭州	崇德	28.11.19.	被敵便衣隊殺害	
姚奇偉	嘉興政工隊隊員	男	海鹽	嘉興	29.1.5.	晨五時敵分股突入鳳橋時與敵衝殺搏鬥而死	
錢一祥	嘉興政工隊區隊長	男	嘉興	嘉興	29.1.5.	全	上
彭漢玉	嘉興政工隊隊員	男	嘉興	嘉興	29.1.5.	晨五時敵分股突入鳳橋時與敵衝殺搏鬥而死	
陳雲華	嘉興政工隊隊員	女	平湖	嘉興	29.1.5.	全	上
戴應芬	嘉興政工隊區隊長	女	嘉興	嘉興	29.1.5.	全	上
唐 悌	嘉興政工隊隊員	女	嘉興	嘉興	29.1.5.	全	上
張文華	嘉興政工隊隊員	女	嘉興	嘉興	29.1.5.	全	上
任漁樂	嘉興政工隊隊員	女	嘉興	嘉興	29.1.5.	全	上

鄭品銑	嘉興政工隊區隊長	27	男	嘉興	鳳橋	29. 1. 5.	全	上
錢學能	嘉興政工隊區隊長	20	男	嘉興	鳳橋	29. 1. 5.	全	上
林連生	杭縣政工隊隊長	32	男	杭縣	遇敵殉難	29. 1. 19.	全	
孔 堅	蕭山政工隊員	19	男	蕭山	縣城淪陷時遇敵被害	29. 1. 22.	全	
陳天柱	蕭山政工隊員	19	男	蕭山	上	29. 1. 22.	全	
孫弼藩	省直屬第三政工大隊隊員	24	男	海寧	奉令推進海北立工作據點一月二十七日因公歸隊遇敵寇被俘槍殺	29. 1. 27.	全	
王勉之	三區政工隊員	25	男	紹興	由城廂工作回隊遇敵被害	29. 2. 2.	全	
鄭建華	定海政工隊長		男	上海	在舟山合門工作被敵三面包圍擄赴上海區刑遇供不屈殞命	29. 2. 24.	全	
馮孟華	吳興政工隊員	18	男	吳興	敵偽大掃蕩時被包圍擊斃	29. 4. 5.	全	
吳文鴻	省直屬第三政工大隊隊員	35	男	分水	該員駐杭設計狙擊偽高級職員通奸逆赴湖墅購米即配備同志二人預伏擊斃偽逆後被敵包圍以機槍掃射而死	29. 6. 5.	全	
沈阿毛	省直屬第一政工大隊隊員		男	長興	我軍焚燒敵鴻橋商行時被敵偽乘機慘殺	29. 5. 31.	全	
孫乃蘋	省直屬第一政工大隊隊員		男	長興	上	29. 5. 31.	全	
朱 益	海寧政工隊分隊長	23	男	桐鄉	遇敵殉難	29. 6. 4.	全	
丁壽祺	杭縣政工隊長	36	男	杭縣	在戰地被暴徒狙擊殞命	29. 6. 20.	全	
莫長潤	蕭山政工隊員	28	男	蕭山	採取敵情被執不屈被綁至江邊用刀戮斃	28. 6. 30.	全	

來誦華	蕭山政工隊員	23	男	蕭山	江邊	29. 6. 30.	採取敵情被執不屈被綁至江邊用刀戳斃
凌雲	蕭山政工隊員	19	男	蕭山	江邊	29. 6. 30.	全
謝勃	第二政工隊隊員	23	男	鎮海	武康	29. 9. 21.	九月十六日自崇德至后塢留守處過京杭國道時被敵俘去解至武康敵司令部斬首
沈慶昌	德清政工隊長	27	男	德清	鴨哈清	29. 11. 29.	敵二百餘三面包圍被擊斃
程道生	德清政工副隊長	24	男	德清	鴨哈清	29. 11. 29.	全
王維垣	德清政工隊員	24	男	吳興	德哈清	29. 11. 29.	全
高基	海寧政工隊員	24	男	紹興	鄞寧	30. 1. 13.	在鄞鎮扁梁橋遇敵百餘互擊殉難
楊達春	平湖政工隊員	22	男	平湖	克城	30. 2.	該員派在克城區南圩鄉工作時適逢敵偽竄擾致遭捕去搜出我方證件時即被槍刺斃途中
張玉田	平湖政工隊區隊長	30	男	海鹽	公平	30. 2.	由克城區工作回隊途經平乍公路虹野段遇敵被俘不屈而死
施正金	海寧政工隊義務隊員	25	男	嘉興	鄞寧	30. 1. 13.	在鄞鎮扁梁橋遇敵百餘互擊殉難
張明達	桐鄉政工隊員	21	男	慈谿	吳江	30. 1. 16.	赴財政科領取經費途經紫雲塘朱家沙遇敵被害
鄭熙	餘杭政工隊員	22	男	無錫	餘杭	30. 3. 4.	該員於二月二十六日奉派赴嘉北召開鄉保會議商討敵對敵對敵辦法公畢復潛入石湖敵據點偵察敵情被敵俘獲先以警犬咬去其鼻手指生殖器及腹肉後以刺刀戳斃
夏建奮	定海政工隊員	21	男	鄞縣	定海	30. 3. 8.	三十年二月被俘三月八日遇害
胡中峯	定海政工隊員	20	男	慈谿	定海	20. 3. 8.	全

全

上

楊芳琴	定海政工隊員	17	女	定海	定海	30.3.8.	全	上
徐世奎	嘉善政工隊員						被敵鄧儀部隊殺害	
史志高	長興政工隊分隊長	25	男	長興	西門外	30.5.15.	三月計殺偽自衛團宗逆金毛歸途被俘不屈被殺	
柏森錫	桐鄉政工隊員	21	男	桐鄉	桐鄉	30.7.30.	因赴青島購公物遇敵便衣隊被敵殺害	
陸銀生	省直屬第三政工隊員	30	男	吳興縣	嘉興店	30.8.1.	八月一日晚赴滬杭公路敵據點王店進行工作爲敵所俘即遭槍殺	
錢鑫森	省直屬第三政工隊員	25	男	上海	嘉興店	30.8.1.	全	上
翁堅	省直屬第三政工大隊隊員	23	男	慈谿	桐鄉	30.8.20.	奉派担任錫奸大隊商酌先部政訓工作人員八月二十日在桐鄉亭子橋與敵遭遇率隊激戰壯烈犧牲	
謝鼎貴	長興政工隊員	26	男	平陽	五里橋	30.22.15.	因公自河橋埠至吳家潭中途爲敵擄去志堅不屈星夜被槍殺於五里橋	
成崇益	長興政工隊員	20	男	長興	五里橋	30.12.25.	全	上
吳隱	長興縣反敵行動工作隊第四隊隊員	25	男	長興	縣城	31.1.26.	奉命在敵區倉前街開店設計狙擊奸偽事機不密慘遭殺害	

殉職被俘人員之多，就可表示鬭爭的勇敢與激烈，浙江的陷區政權，始終能維持不替，就是這班工作人員的汗血造成的！我寫到這裏，對於他們表示無上的敬意，雖然其中有極少數的失節者，但終不能掩沒大多數人的燦爛光芒！

【游擊區的惡勢力】游擊區除了敵僞以外，還有許多的惡勢力。這種惡勢力，名目是太繁多了，總括名之曰「游雜」，不但妨礙對敵僞的鬭爭，而且是增加人民痛苦的仇敵。他們是掛着抗戰的招牌，作戕害老百姓的事實。他們是從某一方面得到一個名目，或是自己假借一個名目，而在那裏聚眾橫行。他

們沒有一定的編制，可以任意擴充；沒有餉項的來源，可以就地搜括；沒有一定的任務，可以到處轉移；沒有長官的管束，可以任意胡爲。人民既受敵僞的蹂躪，復受這種惡勢力的剝削，真可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而國軍及地方政府，因爲他們掛有名義不曉得他們的背景，就不便干涉，或是他們的力量很大，而無法干涉。三十一年以後，此種情形，更加惡化，原因是國軍後撤，地方政府不爲彼等所忌憚，而時時受他們的威脅騷擾。所以三十一年以後，陷區政權，不但要單獨與敵僞鬭爭，而且同時要與游雜部隊鬭爭。一個區境內，弄得有三個專員，一個縣境內，弄得有三個縣長（本省專員、縣長，外省專員、縣長，僞專員、縣長）的現象。各有各的部隊，各有各的勢力，我們也同他們交涉過。他們的答覆是：「同是國家的土地，任何人都能進駐。」他們已經把國家劃分的行政區域打破，國家的法令更不在他們的眼內，自然更不把我們地主的政府，放在眼中。以前國軍及地方政府也曾切實整理過，把初期的游雜敵人調到後方，加以整理。但是他們好似「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莠草，不斷的在那裏剪除，也不斷的在那裏生長，也就因爲陷區是最適宜他們生長的地方。

「游擊區民衆的負擔」游擊區的民衆，雖然沒有徵兵徵實的負擔，但是他們的負擔，要比後方重得多。至少他們有三重負擔，（一）敵僞的。（二）游雜的。（三）我方政府的。這三重負擔之下，都有很多苛細複雜的名目。那些縣份都是浙江最富庶的地方，起初不覺怎樣，後來負擔日重，而人民所賴爲生活基礎的蠶桑，根本是崩潰了，而日常開門七件事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却有三四件不能自給。他們生固不易，死亦困難。聽說杭、嘉、湖的人死了，起初是拆用房屋裏的木材，來作棺材，後來就用稻草裹着去葬，甚至有連稻草的殮葬也不可得的。勢將達到生無可居，死無以葬的地步！這種情形，尤其是在「陰陽界」的地方爲最甚。所謂「陰陽界」，就是間於敵我的地方，敵人的勢力可以到達，我們的勢力也可以到達；或者是敵我勢力都不能到達，而是游雜勢力可以涵集的地方。敵我勢力的一

來一往，直接間接都要使他們遭受痛苦與損失，再加以游雜的無厭誅求，就更不堪設想了。也有人這樣說過：「地方政府與其這樣去維持淪陷區政權，而增加人民負擔的痛苦，毋寧放棄淪陷區政權，既可減輕人民負擔的痛苦，反得到人民的懷念。」這種見解，乍然聽來，多少有些理由，而我的答覆是：若果放棄我們的政權，又何必抗戰？抗戰就是想在千難萬苦中維持自己的政權。而且人民對自己政權的負擔是有限度的，偽政權及游雜的負擔是無限度的。因為不忍人民無限度的負擔，才想極力維持自己的政權，若果放棄自己的政權，就無異使人民永陷無限負擔的地步！但在維持政權的鬭爭中，加重一些負擔，自所不免，若因此而放棄政權的鬭爭，則無異於因噎而廢食，相反的，地方政權若能確實建立，則其他的額外負擔，自可減輕。這本末的道理，一定要認識清楚，不能一概而論的。至於地方政府，所加於民衆不合理的負擔，自須切實整頓，又不得游擊區爲然了。這是我對於游擊區第一個意見。其次，我覺得我們對游擊區是太放任了，因爲放任而敵僞及游雜才能如此長久盤踞，不但使敵人有向我後方地區壓迫進攻之機會，而且使游擊區的民衆更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復次，浙江的游擊區由工作人員之堅苦奮鬥，省政府之極力支持，到現在政權還能勉強支持，同鄰省比較起來，是尚可自慰的一件事。但是演變到現在的情形，祇能說是力之未逮，不能說事不當爲，而將他放棄。我對於犧牲的工作人員，及現在還在努力的工作同志，實表示衷心之欽敬，同時對陷區人民之痛苦，更時刻不敢忘懷！

關於陷區和接近陷區受游雜騷擾的情形，第一區專員吳壽彭，曾寫了一篇「冷暑秋思」，描寫得非常真切，茲節抄一段作爲補苴：

……我們境內有兩個國家存在。這兩個國家有不同的言語，行不同的法令，用不同的幣制，不同的領袖，從不同的宗教，過不同的生活。

這不是說在中國境內有日本的存在。……

這也不是說在中國境內有偽組織的存在。……

這也不是說在中國境內有「邊區政府」的存在。……

我們所說的另外一個國，祇是沒有旗子，他除了掛我們的旗子而外，其他的典章文物是都具備了的。

這一個國家的士兵，木壳槍上掛着紅的絲帶，這一個國家的子彈是用來打放生潭中的大魚的。這一個國家的機關，印信與公事文書，祇是用來朦混，或遮眼的。這一個國家的生活，不是生產與消費，是做派與享用，藝術的權威是鬚兒戲班。這個國家的刑法，祇有兩種：一幫人運上去鹽；也許又記錯了，那是運下去的木材，遭遇緝私或海關，就攤出一疊十萬元的鈔票，同若干出壳的木壳槍，拷問是這樣進行的（被拷問的是緝私或海關）；你要鈔票還是要性命？意思是你在這兩種刑罰裏面揀一個較輕的吧。沒有死刑與徒刑。譬如打死一個人，若是老百姓，就該死無疑，若發現那是一個口袋裏有帶號的友軍，則賠款五萬元。這個國家的經濟學，是吃了公糧去派伙子來種苞蘿，再用苞蘿來餵豬；或是派柴火，因而人民不得不砍桑樹。至於挑來的桑樹，則用來燒空鍋子，因為燒到沒有時，可以再派的，自己省却用火柴做生火的麻煩工作。這個國家的組織，是非常嚴密的，運用非常靈便，譬如一些退伍文武，一些販夫走卒，一些與機關與偽機關有牽連的人，一些流氓地痞，合夥經營出口貿易這些都能夠在極困難的、破了路、壞了車的環境中，達到目的，在槍林彈雨刁斗森嚴，有戰爭危險的區域完成任務。這個國家的鈔票是關金券，這是甘當一的關金券。所以我們這一國吃四百元一月伙食的人，常常詫異說，聽得有些地方一席酒要一萬元，實在那是廿五元一席。……：新近有一個「大隊長」出喪，用了五十萬元，排場是極簡單的；實際還不比我們國民政府發給「蔣作賓」的治喪費二五千元為多，這個國家的發生送死就如此。這個國家的都會或城市

常常遷移，譬如小小的浙西一隅，就是三墩、淳渚、南澗、深壩、場口等，一連串嚇人的名勝古蹟。所以這國家的課本歷史是薄薄的，地理是厚厚的。「從前」的深壩，或者「現在」別的賭場，則早已實行命本位，台面上以金戒指做單位，有些人串着金戒指像古錢用繩串着一樣。實在我們這裏說的祇是這國家的下層組織及社會之小部份，要說完全是沒有辦法的。祇是有一件事非常普遍而透澈，這個國家以賭神爲上帝，鈔票拿來賭，金戒指拿來賭，木壳槍拿來賭，甚至生命也拿來賭，如同我們的國家要求人民以死報國，那一個國家的人民也常不惜犧牲，以效命於賭神的。這國的宗教信條，是物質重於生命，爲着搜集一袋穀子，不惜殺死三個百姓。公益祇是用以餵給私利的麥麩而已。總之：是這國家有與我們不同的生命觀念與物質觀念。

廿六 業餘生活的興趣

【我對於「六藝」的新認識】以上所寫許多回憶的往事，大都是我求學、從軍、從政的正面生活。雖然其中也附帶描述了若干生活的側影，究竟太簡略了。我想一個人的生活，除了在事業上正面表現之外，業餘的成份還很多。這種業餘的生活，不但關係個人的事業，亦足以影響整個的社會，所以有把他寫出來的必要。

周禮所謂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如果以新的觀念把它補充起來，可以包括人的生活全貌。不過這個生活的全貌，是隨時代而演進的。中國現時有許多人，對於六藝，不是缺少這一門，便是缺少那一門，有些人更以復古的眼光來衡量這個六藝，不知道隨時代演進擴展，以充實生活的內容。我以爲飲食男女，及一切社交，都可包括在禮、樂裏面；平時戰時一切戰爭方法及戰爭工具之運用，都可包括在射、御裏面；文藝科學，都可包括在書、數裏面。我們如從時代的透光鏡的正面看去，一切都可以得到正確的認識，與合理的解決。若果從透光鏡的反面看去，則一切都比原始的形態渺小而狹隘了。所以我們的生活，必須跟着時代進步。否則，便要受到種種的束縛與煩懣！

【求學時代愛好閒談】我在敘述少年生活時，已將我的個性描寫出來了。我是一個沒有受過嚴嚴親嚴師與舊觀念束縛的孩子，心目中沒有偶像和迷信。在那鄉村的自然環境裏，隨我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而決定自己的活動；也就是說自己怎樣想就怎樣做，活潑天真，很少受到身外的干涉。到了外出求學，在陸小、陸中，乃至軍官學校，我都是好自由批評——批評時事和批評人。在陸軍中學的時候，我有兩個朋友；尹作翰、秦鏡，也是好批評的人。我們時常相聚在僻靜的角落裏談天，有時談到深夜十二點鐘

被師長干涉了，才散去就寢。那些師長們，認為我們是愛說大話，而不勤學業的壞學生。到了保定軍官學校，我們還是如此。的確，因為我們在討論批評中，認為某種功課應該澈底的研究，某種功課，不應該多費心思；尤其是在考試方面，我覺得不必過於重視分數，而應另有自己的心得——某種功課的心得與功課以外的心得，以致有很多門功課都很荒疎。這不是我要掩飾自己功課不好的說法，而當時確是如此做法。這觀念，在學生時代應不應該如此，及與我以後事業的影響怎樣，我現在還不敢作肯定的斷語。我祇可說是得失兼半，和因人而異。後來到軍隊裏當下級軍官，才覺得不但以前空闊的批評論調要不得，而且連以前所認為有心得的一二門功課，一時也用不着。因為在軍隊裏，尤其是當下級軍官，一切須崇尙實際，不容誇大，不須高深。因此我得在工作中另做一番研究學習的工夫，即所謂邊做邊學，這不是我真正為學的起點，也成為我以後事業的起點。

【食色兩事應有正確認識與合理解決】一個正當廿四五歲的青年，除了他本身職務上的活動之外，總還有其他的活動。談到異性往還交際的問題，古人有「食色性也」之語，可見人生對於異性的需要和進食同樣重要。我們初到部隊裏，見到那些官長好飲花酒，叫妓女，認為太腐敗了。初來的時候，自己還是很矜持着，久而久之，遂與之合流，而恬不為怪。這與其說受了人家的引誘而墮落自己，毋寧說是基於自己天性的需要，而自然走上這條路。可以說在那個時期的人，大都是如此，固然有少數人不必出此一途，但亦有其解決的方法，而並非完全與此道絕緣。我現在回想這種活動，在旁人或以後的人看來，一定認為是不正當的行為。而在其時其人的心理，總以為正當的。縱然因為受到旁人的批評而感覺不安，但不安的心理，總敵不過生理機能上的衝動。我想今後對於這個問題，不應作虛偽的掩飾，而應有公開的認識，與正當的解決。我之所以要明白的寫出來，就是這個意思。其次，說到食字。食是一般人所認為極正常的事，我和白劍生與其他若干下級軍官同駐湖南的時候，大家都是饕餮者，雖不一定吃得

很講究，祇是分量多一些而已。但在勤儉的湖南人眼中看起來，是吃得大豐富了，而覺得驚訝！中國人素以儉爲美德，一般人祇是知道節儉的目的是在省錢，而不知道人類求進步的目的，就是爲了提高生活的享受。節儉到僅能維持生命的最低限度，把生活的樂趣，都犧牲了，那是不合理的。有些人由犧牲畢生生活樂趣而積下一些錢，在臨死前還不知享用一些，真是莫名其妙。我之所謂享用，不是過度的浪費，而是覺得社會上所謂節儉，已減至生活水準以下，而妨礙其生理之發育及意志的進取。我認爲食與色過度的抑制，或不正當的發展，皆足以妨礙身心之健康，因而影響及於整個社會與國家。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正確的認識與合理的解決！

「我愛好的幾項運動」我是生長在鄉下的孩子，覺得鄉下的孩子活動的範圍，比城市裏要大得多。上山爬樹，潛水捉魚，以及農工百藝，都有天然的學習機會。不比城市的兒童，祇能到學校裏去學習，或更沒有機會來學習。我大多數的運動基礎，都是在鄉下養成的，後來到了學校裏，都市裏，又獲得補充與改進。當十一二歲時，就學會了射擊與打獵。到了軍事學校裏實彈射擊，成績就很不錯。自然囉，這不僅是到了軍事學校才學習，而是在未入學校以前，就有了這種知識與經驗。記得二十五年杭州騎射會成立，推我首先射擊，我發了第一槍，那看靶兵把一個零分的旗號搖出來，我覺得非常驚異！我想：「恐怕是這桿槍有極大的偏差，或者是彈藥變了性。否則，在這個短距離之內，決不至於不中的。」第二槍我仍按着瞄準的射擊，結果中了十一分，（最多是十二分）第三、第四、第五槍，都是十一分。我走到靶上去檢查第一槍偏到什麼地方，原來正射在第十二圈的黑點中心，看靶兵一時大意，沒有看出來，這次射擊五槍，一共得了五十六分。我對打獵也非常有興趣，打飛鳥也相當的準，但是近年身體胖了，目力差了，興趣也隨之減退，甚至於完全沒有興趣！

中國傳說：「北人善騎馬，南人善乘船。」不是人的生性如此，而是社會的環境如此。因爲北方多

馬，南方多水的原故。但是嗜好是每人都有的，不過嗜好因環境而異就是了！我雖是南方人，而在軍隊，却有騎馬的機會，並且成爲一種嗜好，對於良馬，好似良友一般，我閒住在香港，也加入香港的馬會。有一個姓江的朋友，他是一個富商，每年都化了很多錢去買馬，養馬。我問他：「你化這許多錢，養這許多馬，是不是爲贏錢？」他說：「不是的，一個人總有若干嗜好，嗜好大半是消費的。若果想在嗜好裏賺錢，就不成爲嗜好了！我嗜好養馬，我的消耗，亦就在此，但我覺得這於我是樂得的！」我覺得他這話，很有些道理，若人的嗜好能於身心有益，或者於國家有益，就消耗一些金錢，也是值得的啊！周禮把御列爲六藝之一，是很有道理的。廿四年以後，蔣先生提倡六藝，要各省都設騎射會，那時我在杭州，就養了好多匹馬，後來到湖北，與重來浙江，都帶着牠們走。後來在金華，又從軍隊方面得到好幾匹俘獲的日本馬，當廿七八年，我在馬上的運動很多。立馬吳山馳騁中原的壯志，在馬上更表示出來！現在還留有好多騎馬的照片。三十四年，東南日報的劉湘女同志，要我在送給他的一張騎馬的照片上題字。我題了兩首「減字木蘭花」，其一云：

七年前事，戎裝立馬縱橫意，馳騁金關，勝日揚鞭上北山。前塵如昨，頓添灑照心情惡，避伏雲和，誰識伊人感慨多！

我在這詞中，固然有着環境的慨嘆，而身體生理上的變化，使我不能再有乘騎馳騁的機會，是感慨的主因。現在我寓內還養着兩匹老馬，閒常對牠望望，恐怕彼此都有遲暮的感想！

民國十六年，我已成爲「汽車階級」了！我那時這樣想：一個人坐在汽車上，不會開汽車，就等於坐在馬上，不能執馬鞭一樣，實是最無趣味的事！我在廣州時，就決意學開汽車。曾在大校場內學習了兩點鐘，就開入市裏去，坐在旁邊的司機，捏着一把汗，時時照料着我，怕我闖出亂子來。但是出於意料之外，我開入市裏去，還能開回家裏來，一些亂子沒有鬧，從此我就常常自己開車。我有兩句開車的

要訣是：「注意路上的人，控制自己的車。」和「車不避人，人會避車。祇要車的速度，不超過人躲避的速度。」後來，我在公路上駕駛速度就很快了，很多人都說我開得太快，要出危險。但是我却從來沒有出過危險，也沒有使行人受過危險。我閒住在香港，因為沒有開車的執照，都是在子夜後，等警察收班了，自己開開快車來取樂。有一日，香港總督請我吃飯，他對我說：「聽說你很喜欢在深夜駕駛汽車。」我聽了，深覺他們耳目的週密。有人勸我去領一張開車執照，我就不敢去考試，因為我祇能開前進的車，開倒車却並不很好，恐怕要當場出醜。抗戰後，我在金華的頭幾年——廿七、廿八、廿九各年，要到桂林這些地方去，都喜歡幫助司機開車，分分他的勞，多走一些路，所以人家需要三日的行程，我祇要兩日就到了。不但節省時間，而且覺得寫意。三十年後，開車的興趣就減退下來，原因是目力較差，注意力不能集中，恐怕要闖大禍。

我回憶這種運動的興趣，得到這樣的結論：一個人的技術的成功，與成功後的退步，都是由於環境及本體（即本身）物質的關係。因為有馬，便易於會騎馬；因為有船，便易於會划船，因為有汽車，就易於會開汽車，據說美國平均五個人有一輛汽車，也就是五個人中至少有一個人是能駕駛汽車的。十多歲的孩子很多會開汽車。他們的駕駛技術完全在日常生活中逐漸陶冶成功，而並不是汽車駕駛訓練班訓練出來的。我又聽得一個美國人說：「關於航空人員的大量補充，任何一國都比不上美國的容易，這不是美國因為參加了戰爭才加緊訓練出來的，而是美國平時的環境造成成功的。」他這話的確是事實，亦是至理。我想起啓蒙時候，讀的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那幾句話，性本善的「善」字，我以為應作「無」字解。習相遠的「習」字，就是指環境。性之變遷，是由環境之由近而遠。古人又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兩句話，所謂朱與墨，都是環境的種種。近某一種環境，即染某一種色彩，也就是說性的本身，當初是沒有的。後來的有，就是環境的有，是由近而遠，學習得來的。所

以我以為社會的改造，應着重環境的改造，而不是單由人心的改造可以成功的。這是說明環境與本體的關係。至於本身體質的關係，是決定對於環境的種種所能接受空間的程度，與保持時間的程度。就我本體的素質，也祇能接受我過去的一切，雖然我不能決定我以後能不能再接受更大的空間所授與我的東西，但我可以決定一個人能接受的空間，是有一定的。所謂一定，是對某一個人而言。即是某人有一定的空間範圍，而不是勉強得來的。這都是受了本體素質的限制，時間保持的限度，也同樣受到各人本體素質的限制。比如我是一個好運動的人，但是我不能成爲一個有名的運動家。因爲我本體的質，不合乎有名運動家的要求。又如我現在對於種種運動的興趣都減少了，這不是我沒有精神，而是我的體質發生了變化，已不適於已往那些運動。我現在時時有「韓肉復生」之感，並不是我沒有馬騎與沒有精神去騎馬，而是我的本質已不適於騎馬，其他一切，都是如此。這就是證明人的一切習慣、興趣、知識、能力、事功，都是基於本質，並限於環境，而不是以唯心爲出發，以精神爲決定的。所以要改進人類，改進社會，必須由本質的改進，與環境的改進着手。這是我由本身的經驗而得到的結論。

「堪輿和命相」三十四年五月間，我和東南氣象局長石延漢君談了許多關於宇宙的問題。我對於這一方面的書籍，雖也看過一些，但祇能算是一知半解。有好多不了解的問題，我想趁此機會向他領益，因爲他對此有專門研究的。在閒談中，談及看相、算命、風水等各種迷信問題。他問我信不信這些東西，我說：「有些是信的，有些是不信的。」我的信和不信，有我的解釋，而不是一般的迷信。比如看風水，我所看的是美的風水，或是實用的風水。就陽宅來說吧，一家人長久居住的地方，環境一定要有美感。因爲有了美感，就會使你一家人愉快、健康，由愉快健康而自己可以建立功業或發財長壽，或是生出好的兒女，一代一代的發達下去。否則你若住在極不美的地方，就會煩悶，疾病而死亡，而破財；生出的兒女，也要受到不美的影響，而不能發達或滅絕。在住宅的方向或水、或山、或樹，都是環境美的

條件。自然這都是天然的條件，而人爲的條件亦是重要的。如布置一個花園草地，或栽種一些樹木，開闢一個池塘，溝引一泓小水，都足以增加環境的美，也都在美的風水範圍。但我不相信方向或沙水五行的相生相尅，而是相信美感與非美感的影響。我近年來運氣不好，自己病了，大兒子死了，我的精神自然也受到很大的痛苦。好多人都說我以前在雲和住的那間屋子風水太不好了，後來我搬到雲和民族復興紀念館的新屋，余越園先生就對我說：「你搬了，我才對你說。你住的舊屋，風水太不好了，長久住下去，恐怕不利。」我笑說：「我很知道那間屋，不但天然的環境不美，後面緊靠住一個山，前面閉塞得很，望不出去，地面更潮溼得不堪。人爲的美亦談不上，屋是舊貨翻新，沒有一些新的技術，一條舊圍牆像監牢一般的圍着，園林花木，更是缺乏，而且我早就知道那是一個絕戶。當興工的時候，好多工人就在那裏病了，但是已經動了工，不便停止。造好了又不能不住。因為雲和的住屋是不易得到的呀！而且在戰時，生活不能怎樣講究，誰知道能住得多久呢？所以我就住下去了。結果一家人，你病我病，輪流不已。精神更感到不愉快。我想以前這家人的滅絕，自然因為疾病過多的原故，因為那時候還沒有『亞的平』、『撲癆母星』等特效藥呀！我們在那裏住，雖然不至如此，但是精神總不痛快。我不是相信風水的相尅，而是覺得那裏的環境是太不美了，而且是易於發生疾病的地方。」至於就陰宅說，一個人想把死者葬在美的地方，這是對死者的感情作用，而生者每年到那裏登臨祭掃，也感覺得愉快。我想這就是陰宅風水的起源，後來漸漸走到迷信的途上去了。希望死者未朽的骨頭，作爲子孫興家立業的根源，而失去了原來的初意。所謂地理風水，實在是無稽的迷信。

我所說的應用風水，亦可以說是形勢的風水。舉個例來說吧：香港是一個商業繁盛的港埠，在那裏居住的人，都是富商大賈，或是軍人富翁，可以說他們都受到了風水的好處。因為香港位在珠江口外，珠江流域的貨物，都在那裏集散，它是世界航行的要口，各國的貨物到遠東來，都要經過那裏。它有深

水的港灣，可以停泊數萬噸的大汽輪；它有很好的山陵環繞着，可以避免狂風的襲擊。這都是良好的地理形勢，也就是良好的風水，而使它成爲一個最良好的港埠，商業自然不斷的發展起來了。加以英人不斷的整理佈置；維多利亞山上青翠的樹木，點綴着閃爍的燈光；一塵不染的街道，與良好的治安，使你住在那裏，又美麗、又安樂。已住在那裏的人，固然因身心愉快而健康發達，別的地方的富翁，亦因仰慕這個愉快的天地，遷到那裏去住，而益形成它的繁榮。這就是形勢風水良好的結果。可是住在那裏的人，尤其是開闢香港的人，却不是迷信中國人所謂的風水，而是知道地理形勢與政治經濟的關係。上海、青島、漢口、天津、廣州等等大都市，都有良好的形勢風水。

看相我是相當相信的，因爲這是實質的表現，從實質的表現，可以決定這種物質功能的程度。相書上的術語，有很多都是觀察事物而得到的結論，這種結論，是相當正確的。比如我們把面前的數種不同的木頭，或是各種不同的金屬，用眼看看，用手摸摸或顛顛，就可知道它的硬度或重量用途。後來科學發達了，就用各種機械來測驗，則其結論更爲正確。又如某樣的馬，何以知其善走；某樣的牛，何以知其善耕；都是由於牛馬實質的表現，和觀察者經歷多時的觀察所得到的經驗。古傳伯樂會相馬，富威會飯牛，他兩人一定是對馬牛有經驗的觀察家，而不是迷信的星相家。看人的道理，也同看馬看牛是一樣的。某型人是聰明，某型人是愚笨，是很易從他的實質表現上判斷出來的。壯健與孱弱，就更不必說。由於他智、愚、強、弱，而可以決定他的工作與前途，也是很淺近的事理。不過現在中國一般的看相，又走到陰陽五行的路上去，並以推測他的往事與後事，以眩其神奇，則殊可不必。好多市上的相士，更以「科學相法」爲號召，殊不知他正走上反科學的路子，而想以科學來騙人，真是可笑！

我對於看相的見解是如此。我對於市上騙人的相士，也頗想研究他們的騙術。三十年六月，我在桂林，那裏有一個摸骨相士，人們都說他的相術很高明，我想他既是一個瞎子，根本就不能看，難道摸一

摸骨就會知道了麼？如果真是如此，就是神乎其技矣！我終不信天下會有這樣的事。於是我也去給他摸一摸，看他怎樣的騙法。我到了那裏，瞎子並不在場，而是一個開眼的同我談話。他先要我以五塊錢買一根籌碼，然後再到裏面去摸骨，我持籌進去，就叫那瞎子摸骨。他說：「你先交籌碼。」我說：「摸了再交不可以嗎？」他堅持要先交了籌碼再摸骨。我也祇好依從他。他接了過去，把籌碼摸了再摸，才替我摸骨。他開口批評了，自然是一番恭維的話。他說我文武全才，文官可做到簡任以上，武官可做到將官以上，我說：「我根本就不文不武，而是一個商人。」他說：「如果真的話，我的一雙瞎眼睛，任由你挖了去，並且情願退回那五塊錢。」我因為還要看他以後的把戲，不好同他爭辯，要他再詳細的摸，詳細的評。問他：「再要多少錢？」他說：「三百元。」並說：「這是在桂林摸到的第一塊好骨頭一定要這個價錢。」我心裏想：再拿三百元來看一齣戲也好。便答應他，請他再摸。摸後他就信口雌黃的亂恭維了一頓，我大笑起來。我說：「文官我早當了特任，武官我早當了上將。」他說：「是呀！我不是說文官簡任以上武官將官以上麼？」我的次兄行方在旁邊，手舞足蹈的作勢要打他。並且說：「爸爸上當了！三百元不如買一隻鷄來吃。」我同他笑着出來。

我後來想他這騙術相當的高明。起初所見那個開眼的，就是瞎子的眼睛，他對於來看相的人，已決定了等級，再給你一根有暗號的籌碼。瞎子所以先要交籌碼，然後肯摸骨，就是要先知道籌碼的等級，才好決定來人的身份。摸後再抽象的籠統的說幾句，以試探你的口鋒，並按情形開一個價錢。如果他試探是對的，你一定願接受他的價錢而任他再摸；他就將以前抽象的說法說得具體一些，你的錢就是他的囊中物了。如果不對，就各走各的路，而不相干。反正中國人一般的性格，祇要他說準了幾句，就會加油添醋的宣揚開去。如果說錯了，決不會去宣傳，所以他的名聲，就一日一日的傳開去。尤其是我在桂林，認識的人太多了，焉知沒有人預先關照了他呢？現在想起來，真是上當。但是化了三百元，看穿一

面西洋鏡，也是值得的！

算命排八字，我是不相信的，即使是有個玄妙深奧的道理在裏面。因為中國的時辰，尤其是五十年以前的時辰，根本就不可靠，他又何從推算呢？而且第一個甲子，又是從何年、何月、何日、何時算起才算標準呢？陰陽五行的道理，我也不相信，但是我還沒有科學的正確解釋。石延漢君接着說道：「這很容易，就以太陽系來解釋好了。以前的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的五個行星，陰陽是指太陰、太陽，合起來稱為七曜。這完全以地球為主的舊天文學，所謂七曜（陰、陽、金、木、水、火、土），是繞着地球走的。自從哥白尼發明了日主的學說，金、木、水、火、土及地球皆是太陽系的行星，七曜現在已變為九曜了。我們在科學上已經承認哥白尼太陽系的發明是正確的，則陰陽五行的邪說，就不攻自破了。」我聽了他的說法，不禁恍然大悟。因此，我就聯想到我們如果有正確的宇宙觀，則一切人生觀都會正確的了。誰說天文學是空虛無用的呢？

【科學技術的研究】我對於科學技術的研究，是二十八年起的。因為戰爭的需要，而使我發生了兵器製造的興趣，在全面戰與全體戰的號召之下，總是想把可以武裝的人民全體武裝起來，但是武器那裏得來呢？我也曾化了十數萬塊錢，向外國買武器，但是累月經年，才得到手，且數目有限，後繼為難。於是我轉到自己設廠製造的念頭。因為我以前（民國十四——十六年）在廣西也曾由土製槍彈，進而為機製槍彈。廣西統一事業的成功，與參加革命的力量，自己能製造武器，是一個主要的原因。中國人也富於仿造的技術天才，祇要有相當的機器設備與材料，就能仿造出來，雖然比不到外國貨那樣精巧，也還可以應付一時的用處。而且我認為製品的精粗，是時間過程上的問題，若能在長時間中不斷的努力，自然可以得到不斷的進步。世界聞名的德國克虜伯廠，起初僅是一家打馬蹄鐵的打鐵鋪。開始的簡陋，怎能限制以後的進步呢？我在「八年來的浙江軍事」一章上，已敘述設廠製槍的經過，我自己也是參加

研究兵器製造的一員，這完全由時勢的需要，使我走上這條路上去的。「需要是發明之母」，這是科學界的一句名言。我現在將研究科學技術的經過，自我的介紹出來，當然是很幼稚可笑的，而這些創造的細小東西，對於國計民生，也不能說是有很大的貢獻。而且在研究創造的過程中，成功的少，失敗的多。「失敗為成功之母」，這些失敗的經驗，倒是值得敘述，以供同好者的參考。所以我仍不願藏拙，而將我的研究科學技術的幼稚可笑的史實，寫在這裏，因為這實在是我抗戰八年中業餘生活最重要的一環呀！

「七七槍榴彈筒製造經過」廿七年上半年，我在柳州參觀四十廠的槍榴彈筒的製造。據那廠主賴瑞麟說：「這種槍榴彈是意大利的。前幾年有個意大利的軍火商到廣西攬生意，把樣品拿來試驗，覺得效力很好。當時想了種種方法，把這個樣品留下來。晝一夜的時間，拆開研究，並且把圖樣繪了下來，次日仍交還他。我們研究的結果，認為要有材料，很容易仿造，成本又便宜。如果用高價向他購買，未免太不合算。於是回復他，說這東西要不得，不願承購。那個意大利人生意做不成，反把製造的祕密洩漏了。這就是四十廠槍榴彈製造的起始。」他說得非常得意，我心中雖然想到這等作風，未免近於無賴，但是國際上採取人家的軍事祕密，本來是不講道義的啊！賴瑞麟也是我在廣西時期幫同造土槍造炸彈的主要角色。我對他說：「你真可謂花樣翻新了！」他笑道：「這是你老領導出來的呵！」我參觀之後，就轉了一個念頭，向他要了一副樣品，帶回來摹自己仿造。但研究結果，覺得不甚滿意。第一、所有原料，都是外國貨，而且製造的機器，也不易辦到。第二、射程太近，祇有一百五十公尺。我希望至少要有四百公尺的射程。同時我發現達到四百公尺的射程是可能的。因為意大利式的槍榴彈，僅是利用步槍射擊時二分之一不到的瓦斯。我若把步槍射擊時全部的瓦斯都用上，一定可以達到四百公尺的要求，於是我決心進行試驗。先是用彈管套在槍口上，管內裝一個與霰式同樣重的彈，將步槍子彈頭去了，加

以封閉。我便教工廠的技術員照這個意思去做。他們都不明白我的作用，雖經我說明用意，而他們都認為得不到好效果，暗笑我是個外行。但是我既要這樣做，他們也祇好照樣去做。等到做好了，拿去試驗，射程最遠的祇有一百多公尺。他們皆哈哈大笑。我說：「笑什麼？我的初步已經成功了！你們想：以這樣粗糙的筒，這樣笨的彈子，彈的封閉，又不嚴密，尙且得到這樣的成績；若將這些因素再加研究改良，一定可以達到目的。」於是繼續研究改良彈筒，由短而長，由長而短，經了很多的試驗，才決定他的長度爲九英寸。榴彈的形狀則由圓而尖，或由尖而改爲略圓。爲減少在筒內的磨阻力，而加了一條彈帶爲確定飛行的方向，而在尾上加了四片翼子。彈體的形狀，一共改了十三次，最後決定採用第十二次的形狀。發射彈的堵塞物，最費腦筋；用硬的東西，會撞擊彈尾，以致飛行不規則，甚至有損傷彈翼的危險。用軟的東西，則膛壓力不夠，火藥燃燒不完全，以致藥力不足，射程減少。於是我出了一個問題，要技術員去研究，我說：「發射彈的堵塞物，在膛內時，要有與真正子彈頭一樣的膛壓力，但是一到槍口，這個堵塞物就要變成灰燼，不能有一些撞擊榴彈尾的作用。」我祇能出題目，自己却不能作文章，怎樣來解答我這題目，則是技術員的事，我一概不管。其實我對這個題目的解決辦法，一些也不懂，出題目是易的，作答案却很難。我當時以爲未必做得到，但是他們居然做到了，使我喜出望外！道是最後的難關。其餘如瞄準器，射距離，調節器裝置上的美觀，都費了很多研究與改良，才作最後的決定。我現在敘述這種經過，僅費了一二小時和千百個字，而我當時製造研究改良的工作，却是經年累月不停的做，尤其是種種相互的複因，非得時常詳細的觀察，不能研究出來，往往很細微的現象，就是極主要的原因。好些技術人員，經種種的失敗，有時不免有放棄的表示，但是我總是堅持着，一定要獲得成功而後已。這個七七式的槍榴彈筒，最後是成功了。縱然不能超過日本的昭和十四年式，但比他們舊式的却好得多。凡是用過的人，都覺得相當滿意，可惜還不能通行於全國。我則因此而獲得軍事委員會頒給

的一等金質獎章。我覺得這個獎章，比我以前所得的二等雲鷹勳章，還要寶貴。因為這是我完全用心血創造得來的！

「幾種爆破武器的改良」現在的戰爭，是爆炸的戰爭。在戰場上，那一方擁有較大的爆炸力，那一方就可以得到勝利，這等爆炸力分爲三種：第一是空軍所用的高度爆炸彈，第二是陸軍用的大砲彈及地雷，第三是海軍用的大砲彈及魚雷、水雷。這種種的爆炸力，不但要以威力，而且要以數量勝，這種趨勢，在化學戰——即細菌戰或毒氣戰——未實現以前，實是戰爭中最大的威力。即使化學戰實行以後，它的威力也同樣的重要。我對於空軍作戰，曾經作過兩種研究。第一是想用高度的空炸彈來對付上空的敵人空軍。現時的空防，一是用驅逐機在上空將敵機擊落，但是必須有優勢而優良的驅逐機，才可以達到目的。二是用高射砲由地面將敵機擊落，但是高射砲隊活動的範圍受了限制，而且砲彈的重量及射擊的高度，也受相當的限制，所以高射砲隊防空，不但在中國不見得有很大的效力，就是在外國有很多精確而口徑較大的高射砲，也未見得有何了不得的作用。所以我想，如果有速度很大升得很高的飛機，飛到敵人機羣上面，將高度爆炸彈向敵人機羣作空中轟炸，在爆炸威力圈內的敵機，雖不必被破片殺傷，亦可以將它震壞。要是能命中的話，不但爆炸的威力比高射砲彈大得多，而活動範圍也廣闊得多。並且可以少數的飛機，打擊敵人的大機羣。我對於這種空炸的炸彈，曾經研究設計過，但是要有飛機作實地的試驗，而且是需要高速度與能特別升高的飛機，才可達到目的。我個人固然做不到，中國目前也還做不到。此種想像的辦法，這次戰爭中，好像也曾用過，成績怎樣，不得而詳，但總算是一種方法，可惜我們沒有機會來實驗，僅是一種想像的研究而已。第二、對付敵人的燃燒彈。如果像美國用很多的飛機，投下很多的燃燒彈，自然也可達到燒夷的目的。但這實在太不經濟了，尤其是在中國，我想最好每一飛機投下的燃燒彈，在每一區域內，都分佈得很勻，而能到處發火，不致集中在某一點點上面，致使

許多的彈，僅能發生少數的火頭。我曾看見蘇聯空軍用的「莫洛托夫麵包籃」，把好多的小炸彈，裝在大炸彈裏，投下時，乃各個分開。這樣，散佈的範圍，自然廣大得多。但我覺得這種散佈力量還是不夠，而須將大炸彈內的小炸彈，各有拋射的角度，而且要用火器噴射，使放射得更遠，分佈得更廣，才合我的經濟要求。我曾作過這種炸彈的設計，替它定出一個名字，叫「中國的香蕉」，因為它像一叢香蕉的樣子。也因不能試驗，而為空想。

地雷是防禦和阻止敵人進攻的利器，尤其是唐克車，在進攻中，最畏懼的就是這東西。稍一不慎，即致全車炸為塵粉。所以地雷雖不能攻堅克敵，却是防敵進攻的有效武器。在中國的防守戰中，敵人受我們地雷的損害很少。這不是地雷的本身沒有效力，而是我們用得太少。使用的方法，也欠研究。我覺得地雷的本身，並無須乎很大的改良，而地雷發火的裝置，尚須加以改進。我時常聽到我們的部隊說：「埋在公路上或鐵路上的地雷，不是被敵人發掘，便是沒有觸發。」其實我們所用的地雷，多半是觸發的，因為在公路上埋雷的地點，往往不一定是汽車輪所輾過的地點，即使不為敵人所發掘，其效果也等於零。因此我研究有兩點問題：第一、雷不可埋在地面，以致易於被敵發掘。但是離了路面，就沒有機會與汽車輪胎接觸。因為雷的觸發，祇有極小的一點。第二、須把雷的觸發點擴大到全路面，車輛在任何一點上滑過，都可以觸發，但這不是很容易辦得到的事。起初我曾設計一種拉發式的，但並不是用人力拉，而是用汽車自然拉發。其法：在路面上放置很多銳利的鋼鉤，每鉤都有一條繩子，連到地雷的發火器上面，汽車從路面上經過，車輪的橡膠被鋼鉤扣着，因而向前拉動，遂致發火爆炸。但這設計需很多的鋼鉤，而且不一定能將橡膠扣着，仍舊認為不滿意，乃改用電發式——不是制發式而是自動的電發。我想，可以將電池和地雷上的兩條導線，結連起來，這在平常是不接觸的，電流並不接通，但在汽車過去時，自然使電流接通而爆發。設計雖如此，結構却非常困難，總是不能滿意。但這種方法，確實安

全，又不易爲敵人發覺。我同一班技術人員研究了很久，都未得到結果。有一日，我在機槍廠內，將一條機槍彈簧，用手隨意彎弄，當時並沒有什麼目的，但在動作時，忽然覺得彈簧本身，除非用大力壓迫，隨你怎樣彎弄，每一環節內，都不致接觸。我喜歡得跳起來！於是招集那些技術員，說要做一條兩條鋼線編成的彈簧——即雙彈簧，問他們：「能否做到？」他們說：「可以做到。」並反問我：「作什麼用？」我說：「你們不要管，做好了，我再對你們說。」做好之後，我把道理解釋出來，他們才恍然大悟。隨後更加改良，可以分爲好多節，一節一節接起來，可有二三十尺長，或一二百尺長，都可以拿它放在公路面上。好像一條繩子，將它僞裝起來，就好像一條小蛇。那邊連上電池及地雷。如果車輛壓在上面，通過任何一點，彈簧被壓，電流接觸地雷，立刻爆發。屢經試驗，百發百中，我名它爲「火蛇」。

炸火車的方法，比較容易，但是敵人防備的方法亦容易，多半是用壓道車在前頭走，裝兵的列車隨後才過去，或是前頭若干個車輛不裝人，即被炸，後面的人，也不致受害。我曾經設計過一個地雷發火器，可以指定它炸任何一輛火車。比如我們預知他用壓道車，大約有若干輛，在那發火機上，就可等待壓道車過後，第二列車到時，再行爆炸。或是算定爆炸任何一輛，無須人的控制，而是自動控制。這也經過實驗，非常準確，我名之爲「火車節炸器」。此外我還覺得如果一個地雷在防禦的陣地上，爲敵人一個散兵觸發，能夠殺傷的，僅是少數人，甚至僅是一個人，代價未免太小。於是設計一種小雷爆炸，威力圈，僅有十多公尺，一個人觸發，固可把他殺害，若十多個人密集在一起，也同樣可以殺傷。我所消耗的，僅是一個很小的雷，比之用一個大雷僅殺傷少數敵人，要經濟得多。而許多小雷可以佈置一個很大的區域，被敵人觸發的機會很多。但是如果戰事停止，要把它取回來，就很不容易，而易成爲自己的危險物，我名之爲「小雷彈」。我又覺得埋在地下的雷，爆炸時，地面成爲一個漏斗孔，因而對周圍的殺傷圈，並不大。若將雷觸發後，能自動升高一公尺半——約等於一人的高度——再行爆炸，則殺

傷圈可比埋在地下爆炸，大得三四倍，也曾經設計完成，我名之爲「空炸地雷」。三十三年，我在浦城參觀英國的軍事代表團演習，就有這種空炸的地雷。但我覺得他的設計，有好些地方，還值得改良。我所見到的英國爆破技術，並不見得件件比我們高明，不過他們材料多，能不斷的試驗，不斷的改良，而且他們做事很認真，很盡職。我在旁參觀，他們當我是小學生一樣，盡心的解釋，盡力的表演，沒有一些苟且的地方。這種精神，是值得欽佩的。我對於這些殺人武器的研究，非常有興趣，有時廢寢忘餐的在那裏想。記得有一次，在天台路上，想起了一件以前好久沒有解決的東西，一時想通了，連夜開車趕回大港頭工廠內，指示他們如何的做，而居然成功。因爲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日夜盤旋在腦中，一時靈機觸發，突然得到解決，一種得意的情形，簡直形容不出來！並且怕馬上會遺忘了去，非得急急趕回作繪圖設計工作不可。但有時想到以爲可以解決的，到了實驗起來，仍是做不通，或是過一時間，自己又把以前思索的推翻了。遇到這等情形，心中總不免有些懊喪。但我並不因此而灰心，仍舊繼續去研究，而希望最後的成功。最可惜的，是費了許多腦筋研究成功的幾樣東西，都未能實地應用，來發揮他的能力。原因是本身不擔負軍事責任，應用的機會太少。而且在科學落後的中國，一向不相信中國人也會有科學的發明，因而這些東西，也未被人重視，而把它束之高閣。我曾對陳立夫先生談過，他對此亦感覺興趣，但未有時間去實做，他說：「最好我們兩人把現職擺脫不幹了，去當破壞司令，一定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

【無線電密碼機初步設計成功】密碼碼的應用，在平時所以保持國家的秘密，在戰時用來保持軍事的秘密，是非常重要的事。往往因國防外交秘密的洩漏，而影響於國家的安危，因軍事秘密的洩漏，而影響戰事的勝敗，在歷史上，是很常見的事。固然秘密之洩漏，有很多的原因，而由密碼洩漏，尤其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中國的密電碼，是太不祕密了！以前多半是用普通的明碼本，祇是在每頁的角上，編列角碼，在每頁的橫直方向，編列橫碼直碼，就算是一本密碼。比較進步一些的，也祇另印電本，將明碼本裏面的字，另行排列過，而角碼及橫直碼的編列次序，亦較為不規則而已。現時認為最機密者，不過在已編之密碼外，再加上一種不同的數字，使原來的密碼，再發生一種不同的變化，就是現時所常用的加碼法（又名二重作業）。總之：現時中國所用的密電碼，仍舊脫離不了密電本的範圍，它僅具備編列上的祕密，這種祕密的程度，是有限的，很容易推算得出來。而尚未達運用機械的祕密，與數理的祕密也。而且密碼基本的要求有三種：就是除了「祕密」之外，還須「迅速」和「經濟」。中國以往的密電本，祕密性已很有限，因為欲求祕密性之增加，或在編列之次序上，使其複雜。或用加碼法，因而譯發及譯收，就費了很大的時間。往往一件極重要而須迅速處理的問題，就在譯電的時間裏耽誤了。任何一種密電本用久了，都會不祕密，而須時常更換，尤其是很多方面通用的密本。一處遺失，即須全部更換。現在各機關密碼本之多，與時時更換，都是極不經濟的事。所以我認為現時所用的密碼本，都不合這三種基本的要求，而須加以改進。

中國過去對於他人密電之推譯——即偷譯——尚有若干人去研究，但是對於自己密電之碼，應如何研究改良，却沒有很大的成就。也無異說中國一般的密電碼，都是易於推譯的。在十八九年內戰的時期，我們所用的密碼本，都是很幼稚的。往往我們用無線電所發出的電報，都被中央方面推譯出來。我到中央談起已往的經過，賀元敬（國光）對我說：「十九年在湖南作戰，你和李德鄰、白劍生來往的電報，我們都完全知道。有一通好像你的手筆，我唸給你聽，對不對？」他唸出來，的確是我親擬的電稿，一個字也不差。令我非常詫異！那時我還不知道他是如何推譯得來，與自己所用密本，有什麼缺陷。二十六年冬，我在山西作戰，太原綏靖公署的譯電室，收到各戰場情況，以及各軍行動的電報很多。我問

他們：「是否每處都有聯絡員，或是各軍都向太原報告？」他們說：「不是的，是由無線電偷聽推譯出來的。」的確，以前中央及太原，對於這種工作，都非常注意，而養有這種技術人員。我更想起二十二年長城戰役，下達榆關部隊撤回灤河西岸的命令。第二天早上，日本的報紙，就登出來了。三十年在浙贛路作戰，劉總司令下達各部隊的命令，也是第二第三日敵人就知道。其他各處的情形，想也都是如此。可見敵人對於電報密碼的推譯技術，要比我們高明得多。所以我們大本營就有禁止用無線電拍發軍事及重要電報的命令。但是我想，這是「因噎廢食」的辦法。無線電本來是最新的通訊的方法，我們舍而不用，即使在陸地上可以用有線電，但是海戰與空戰，又怎樣呢？與其在通信器具方面作退步的避免，倒不如在密碼的技術方面，作進步的研求。我之所以要研究密碼機的原因，就在乎此。我認為這雖然是一些很小的技術，而關係國家政策的推行與軍事的勝敗，實在太大了。因此用了五年工夫，化了不少的錢，才得了一些成功。現在把我研究的過程，敘述一下：

我起初僅是想如何將現在所用的密本，變成一副機器。第一個觀念，就想將電碼本內的頁，變成活動的。第二個觀念，是想將每頁上的碼——角碼橫直碼——也變成活動的。在這機器的結構上，裝置這些活動的頁，及活動的碼，使用時，雙方約定變動的方法，而時常變動的使用，也就是要避免長用一種密碼的毛病。機器祇是一部，變化却是萬端，因此我叫做「萬變密碼機」。由廿九年開始研究，經過種種困難，到三十年始告完成，當時頗覺沾沾自喜。到重慶去開會，特地帶着去，想同那方面的人，共加檢討。在那裏會見對密碼機極有研究的魏大銘君，大家研討的結果，認為仍不能滿意。他並出示他所設計的用電示法的密碼機，就比我約好得多，但是也未到實用的程度。他所提供的「同碼不同字、同字不同碼」的原則，是密碼最重要的條件。使我在失敗之中，更增加許多認識，不但不因此灰心，而且更增加我的勇氣。三十年浙江科學獎金委員會，竟因我發明這部密碼機，而給予六千多元的獎金，我心中非

常之慚愧！因為這部機既未到實用的地步，必須更加改良。因此不願領這獎金，而將它轉移作特別獎金，以為助我完成這工作者的獎金。

我將已成而未實用的東西拋棄，另外擴充我研究的範圍。因為如果不將不合理的觀念含棄，就會受它的束縛，而不能自由。所以決心把它含棄，另創一個自由的境地。在三十、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的中間，繼續設計三種式樣的密碼機。稱曰（一）季寬甲式——鍊式加碼法，（二）季寬乙式——變位代替法，（三）季寬丙式——電示變位代替法。而電示變位代替法的季寬丙式，實得力於田子炎君之襄助。因為我祇知道密碼的原理，對於電學的原理，是外行的。所以我把以前所得之獎金，轉贈與他。這三種東西，要做起來，却不容易。不是普通工廠，可以做得到。於是帶到桂林中央無線電器材廠去製造，因為祇有那裏才有很熟練的工人與很好的材料。而顏任光君對此特別熱心，由其監製而得以完成。但是工作上，也還需要改良，才可應用。我為此事一共化了八十多萬元，亦可算是一筆大浪費，但我覺得這是值得的。我並不以此為滿意，而時時想求進步與改良。三十三年，我在浙桂途上，又想出了一種直譯式的密碼機。因為以前的無論那一種，都要將電文變成明碼，然後再變成密碼。如果無須將電文變明碼，譯電的時間，一定要省很多。這種設計，已經完成了，正在製造之中。我又想將鍊式加碼法與變位替代法兩種連成一起，則應用更廣。這種設計，亦已完成，正在製造。對密碼的設計製造，鐵工廠的黃工程師渭川幫助的力量最多，是不可少的助手。他所最感覺得麻煩的，就是正要着手製造，我的方法，又要改變了。所以有些我要他趕做的工作，他都有些遲疑，恐怕我臨時又要變更。事實上我祇要想着更好的方法，就不能不變更，因為這是試驗的過程呀！

【製造水泥的研究】水泥是國防建築的必需品。在中國過去，這種水泥廠，幾乎全部集中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如上海、龍潭、廣州、唐山、大冶等處。像浙江這樣的省份，過去根本沒有一個水泥廠，所

用的水泥，多數是從上海運來的。現在戰時國防上需用水泥很多，而過去的各大水泥廠，又都淪陷了，本省各方需要用水泥，很難買到。其價格由幾元一筒，漸增至五六百元一筒（廿九年價格）。我覺得這個問題，亟待解決，就從事研究如何製造水泥，並不斷向工業技術人員領教。但是他們的答覆，都是說並非不會製造，而是沒有大動力和大機器。同時介紹我一本關於製造水泥的書，依照書本所述，以及他們對我所說的話，確實很難做到。這使我非常失望！可是我決心要做，並不因他們及書上所說的困難而罷手，仍舊繼續想辦法。

但是擺在眼前的困難，確是很多！第一個問題，便是動力。如果沒有大動力，如何使石灰粉碎？於是使我想起了我們數千年來祖宗所習用的老法，先將石灰石燒成石灰。用水一泡，就成粉了。這樣比用六動力機械軋碎的還要細。其次我覺得不用旋轉鍛燒爐，可用別的鍛燒爐，祇要能夠燒到一千四百度，也可以有同樣功效，就決定以改良窯代替旋轉鍛燒爐。這兩個大難結解決了，在機械方面，祇要打風的設備與熔塊的磨碎設備就行，其他沒有什麼問題。我就很有把握的放膽進行。

再講到研究時間，和初次試驗。我開始研究，是在廿八年的下半年，那時天天畫圖研究各種設備。這些圖案現在想起來，實在太幼稚，那時也都沒有採用。廿九年春季，就在科學研究費裏，撥了數千元，着手試驗。直到廿九年底，纔覺得照我理想製造水泥，已完全沒有問題了！

我起初看書，是看近代水泥最新式的製造方法，覺得技術人員所告訴我的困難，是不容易解決的。後來我再從頭看起，從水泥歷史的演進着眼，得到一個見解，認為用大動力大機械的新式設備，是生產方法的進步，並不是製造的必要條件。因為需要大量生產，才要這種設備，假如不需要這種大量的生產，就無須乎這種設備了。我又在另一本書裏，看到一點證據。據云：在第一次歐戰時期，多有改用石灰窯來燒水泥，他的理由，是燃料困難，銷路不大。平時的大量生產，為的是經濟的傾銷，戰時的小量生

產，爲的是本身的需要。所以我就主張：（一）不求大量生產，（二）避免使用大動力及笨重之機械，（三）但求得次級之產品。

我在試驗成功之後，就大膽籌備設廠製造，這時已經是三十年了。擺在眼前又有幾個問題：（一）地點之選擇。水泥廠的地址，必須「三位一體」。怎麼叫做「三位一體」呢？就是石灰石、粘土和煤炭三件東西，要在廠址附近。如不能三件都有，至少要同時具備兩件。如果這三件東西，都要從別處運來，那就太不合算。結果，找到江山清湖鎮這個地方，不僅石灰石、粘土、燃料三件都具備，並且還有許多其他的好處。這是本省製造水泥最有希望的一個地方。（二）耐火磚如何得到？我們製造水泥，要燒到一千四百度，才能成功。那末，築窯的火磚，至少要耐燒一千六百度，纔不會熔化。並且還須自己先來製造。因爲市上沒有這種火磚原料，在清湖鎮附近，都可以找到。（三）人才如何羅致？起初還沒有做水泥的專門人才，有些懂得做水泥的人，覺得這種方法，非失敗不可，反而不肯來。我祇找到一位剛由大學出來學化工的學生李振民。「初生之犢不怕虎」，他居然敢冒險擔任這種工作。（四）機械如何製造？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機械，就是球磨機打風機兩種。經我鼓勵和督促後，浙江鐵工廠，也已經能夠製造了。（五）經費如何籌集，萬一失敗，如何處置？我先在某項經費內，挪借廿萬元，我固然決心進行，但是也擔心失敗。籌備進行中，無時不提心吊膽。因爲萬一試驗失敗，不但名譽不好聽，賠累也成問題。所以時常親自去監督指導。從籌備到製造，剛剛一年，可以說是很快。那末，究竟用了多少錢呢？除借用廿萬元外，又向某機關借用了二十萬元，這四十萬元，是從開始籌備到完成，所有機器用具置備等費用，全部包括在內。

上面已說過波特蘭水泥製造之程序，及在現時環境之下，水泥製造研究所得的結論。那末，浙江水泥製造之程序，又是怎樣呢？「浙江水泥」製造之程序，在理論上與波特蘭水泥的製造程序，是差不多

的。不過在設備上，減省了原料磨碎的機械設備，與鍛燒時旋轉爐的設備，所以第一步原料配合的手續，要將石灰石燒成石灰，將石灰加水消化，使成爲氫氧化鈣，乾燥後，除去水分，篩過後，便成極細的熟石灰粉。再將研細的粘土及氧化鐵，照規定的百分比加入混和，做成坯料，待其乾燥。石灰的來源，要自己築窯大量的燒成，收用民間的石灰，亦未始不可。第二步，燒成的手續，是將原料（即坯料）與燃料（煤炭或木炭）混雜，放入自己設計之堅密內打風鍛燒，大約燒至六小時，溫度到達一千四百度，即可燒成一窰。俟其冷卻，即可卸出，再裝入第二窰，繼續鍛燒。原料與燃料之比例，目前尙難得到最低之數字，大約燃料爲原料的百分之四十強，如再進一步，或尙可望其減少。第三步焙塊磨篩的手續，燒成之焙塊，俟其冷卻若干時候後，將未能燒透之部份揀出，然後將其逐次加石膏百分之二，裝入球磨機內磨碎。再經過規定之篩機，所得之細粉，按定量包裝後，水泥製造工作，即告完成。在目前因爲機械困難，許多地方，要用人工，在經濟上，自不合算。如能逐步機械化，當然不成問題。

我起初說過，我們製造的波特蘭水泥，一定有許多人懷疑用這種設備製造出來的成品，是否比得上市上的水泥呢？關於這，我可以分爲三點來說：第一、我們的製品，在原料的配合，與燒成的溫度及粉碎的程度，皆按照波特蘭水泥製造的規格，成品是不會很差。第二、在成品試驗上雖然無精密設備，但在拉力已至七百磅，不至斷裂。抗力雖未試驗，但拉力好，抗力一定不差。第三、成品在試用上亦已得使用者之好評。至於成本方面，當然要比大生產之價格爲高，但一定比市價爲低。

【竈質保溫器的試驗】此外我還有好些研究和試驗，成功的當然也有幾樣，而失敗的也不少。現在把一樁失敗的事，敘述一下。現在所用的熱水瓶，給我們很多的好處。我想：如果把它擴大起來，成爲一種很大的熱藏或冷藏器，則效用自然更大。比如我們一日的三餐飯，現在要分開三次煮，人工燃料，都不經濟。若果有很大熱藏器，則三餐飯，可以作一次煮。放在熱藏器內，可以保持它的溫度，即可以隨

時食用。同時亦可以作冷藏用，使藏在裏面的物品，不致霉壞，豈不是很經濟的事？但是玻璃的製品，就很難做到，於是我想用瓷質來製造這種大型的保溫器。因為瓷質的導熱與密度，都和玻璃差不多，而且可以大量的取用，價格亦不貴。我懷了這個理想，很久都不能實驗，因為尚未有適合這種製造的場所與技術。有一次，到溫州去參觀吳百享的西山瓷廠，覺得它的設備很新，技術亦不壞。特將我的理想向他說，並畫了一個圖形，希望他替我試驗。他對此亦認為很有價值，而感到興趣。於是立刻製成坯型。經過幾次的試驗，才把它燒成。但是真空問題，無法解決。因為沒有很好而適用的抽氣機，就不能知道它保溫的程度怎樣。吳君也曾試用過燒空自動封閉法，在理想上，當那保溫器正在窯內燃燒的時候，高熱會把夾層內的空氣排出，而成爲比較的真空。到達某一溫度時，放在出氣孔旁邊，易熔的物質就熔化了，把那出氣孔封閉起來，裏面就可成爲比較的真空。燒成之後，他自己拿來試驗。把開水沖下去，那瓶子馬上破裂起來。他研究不出破裂的原因，寫信來問我。後來我親自試驗結果，亦是如此。我認爲夾層的空气，尚未排清，因受熱而膨脹，所以把瓶身炸裂。於是拿一個完好的瓶，不沖開水，而把它打破，並沒有發出同打破電燈泡那樣的聲音。這可以證明夾層裏並不是真空。三十三年九月，溫州再度失陷，這種試驗工作就不能進行。以前試驗未成的樣品，却已經有百數十件，可算是西山瓷器廠的額外損失。但我並不承認這就是失敗，而希望不久得到最後的成功！

【研究科學技術的幾點見解】我對於研究科學技術，有我自己的幾點見解：

第一、我不是一個科學有素養的人，我是想學習，並且拿研究學習，作爲我的娛樂興趣。在旁人看起來，或者以爲費腦筋，傷身體，而我覺得即使如此，也是值得的。因爲人類都是把精神腦力向他愛好和興趣方面犧牲的啊！

第二、我對於科學技術，自認是外行。但是我並不怕旁人笑我外行而不加研究，並且希望由外行而

成爲內行。一個問題的研究，祇要不斷的研究，這外行就可變爲專家。專家不是全能的，他所成就的，祇有一部份。我不重視書本上的全能專家，而重視實行上的局部專家。

第三、我認爲研究題材的估價，是極重要的事。因爲這不是純科學的研究，純科學的研究，祇是探討某一種的真理，而無須顧及本身價值的問題。科學技術的研究，是以利用厚生爲目的。因此，就要估計它在人類、社會國家的價值如何，所以必須認識人類社會和國家各方面的需要，然後可以得到有價值的題材，因此出題目與研究創造發明，都同樣的重要，甚或出題更爲重要。有了重大價值的題目，以後的好文章，自然可用科學的技術寫出來。

第四、西諺有云：「失敗爲成功之母」，我認爲應該添上一句：「浪費——指研究試驗的浪費——是經濟之母」。許多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往往恐怕失敗，失敗就是浪費，不但個人不能負擔這種浪費，就是團體與政府，如果看不透這個關鍵，也不肯負擔這種浪費。但我以爲在百件研究試驗當中，能有一件成功，則九十九件失敗，不算得是浪費。一百個人中，有一個人成功，九十九個人失敗，也不算得失敗。能有更大的失敗，才有更大的成功，能有更多的浪費，才有更經濟的收穫！

第五、一件事物的創造發明，包括很多的專門學問，而不是個人可以完全瞭解與精到，必須若干人共同努力，方可完成。諺云：「三個臭皮匠，湊成諸葛亮。」這句話很有道理。因爲從事現代的科學研究，必須有研究的組織。拿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我祇能出題目，或是決定一些重要的原則及要求。如果這個題目裏面有關數理的工作，要請教數理的人才，有關電氣的工作，要請教電工的人才，有關機械的工作，要請教機械的人才，有關繪圖的工作，要請教繪圖的人才。類此種種有關的工作，都非得請教他人不可。這些人才，與其說是我的助手，毋寧說是我的先生。不管助手也好，先生也好，總之，這些人都是不能缺少，否則，就難以成功！

第六、「神祕」二字，是阻礙中國科學昌明物質發達的絆腳石。什麼「祖傳」「秘製」這一類的話，在中國社會是很流行的。往往一種研究的工作，因為祕不公開，使旁人不能參加意見，而至於失敗。甚至自己永遠在那不通的路上走，而不知回頭。我以為這種傳統的不良習俗，一定要加以改正。在國家，要設置研究的指導顧問機關與人員，來補救與協助，然後才可以不致虛費時間腦力與金錢。此外實驗設備的設置，研究費的補助，都是極重要的問題。如此才能使研究公開，而得有良好的結果。

第七、中國科學技術落後，無可諱言。迎頭趕上，祇是一種口號，而不是一種方法。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近，是行動的定律。我們固然要有趕上人家的勇氣，但是要想趕上人家，總得在後面努力，才可達到目的。我們必須有基礎的訓練，才可以升高及遠。所謂基礎的訓練，一方面是科學理論之修習，一方面是工作經驗的養成。我們現在對科學的理論修養，固然非常幼稚，工作經驗，也是萬分淺薄。甚至有些人有了一些理論，而輕視經驗，或是有了一些經驗，而忽視理論，都是要不得的偏見。現在世界上雖然有許多人家造成的新機械工具，我們可以用金錢把它買來，但是理論與經驗，是買不來的，必須自己去學習與歷練。尤其是創造與發明，非是完全求諸自己不可的啊！我本着自己經驗得到的一些意見，抒述於此，以就正比我更有經驗的人士。

【我對於詞的見解和學填的動機】詩詞在中國舊文學中，居於一個重要的部位。唐宋兩朝的詩詞，好像已經登峯造極，以後的人都以它為圭臬，很少能別創一格的。唐宋的詩詞有兩個特色：第一、外景寫得真；第二、內情抒得暢。令人讀了，猶如身歷其境而引起共鳴。又因各個詩人詞人的心境環境，各有不同，於是蔚為各種不同的風格和情調。後來的人雖極力揣摩仿效，縱然在格調方面能練得純熟，畢竟因時代不同，處境各異，總難產生同樣韻味的作品。所以要拿唐宋或某一代詩詞來衡量現代的詩詞，未免有削足就履的困難。古人的遺墨，容易引起後人好奇的學習與崇拜，我想他們當初寫作的時候，是

不會存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意念，而是用來發抒個人當時的情感的。這些作品，因為有它自身的價值，遂被保存下來，成為後人遵奉的圭臬。古人無意中留下來的詩詞規格，使後人窮年累月去追求，而終不能脫離他窠臼的白，不知是古人無心的罪過，抑或是一種有益人類生活的東西，那就很難說了，因為它不是科學的真理，可以演繹為人類福利的源泉。但詩詞在唐宋時代，到底有了什麼益處，現在又有了什麼益處，這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所以我對於詞，雖然一時有所好，但我認為這是歷史上留下來的文人無益的嗜好，在個人，或者可藉以發抒情感，在國家則是無關隆替的東西。

然而這是我最近的想法，在往昔仍不免受古人無意的引誘。當我在保定讀書的時候，天天受軍事訓練，極感枯燥。蓮花池是保定的名勝區，那裏有戲館、酒菜館、也有圖書館。在閒暇的星期日，都得到那裏去逛逛，以調劑生活。在那個舊的圖書館裏，所蒐藏的，都是舊的書籍。其中有很多我是看不懂的，而且覺得沒有趣味。有一次，我找到一部歐陽修的全集，裏面有很多的詩和詞，我對於詩的體味，覺得太刻板了，不是五言，便是七言，不是古詩，就是絕律。而且太正面化了，不能滋潤我枯燥的情緒。而對於他的長短句——詞，却覺得細膩活潑。當時我最愛的是他那首「浪淘沙」：「五嶺麥秋殘，荔子初丹，絳紗囊裏水精丸。可惜天教生處遠，不近長安。往事憶開元，妃子偏憐，一從魂散馬東關。只有紅塵迷驛路，滿眼驪山。」他能以一點小東西，烘托出一個國破家亡，人亡物在的淒涼景況，真是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我是嶺南人，讀了之後，感受尤為深切，而使我對他的詞發生了興趣。固然他的詞是以柔和細膩見稱的，在全部宋詞中雖不能說是翹楚，亦能自成一格，使初讀的人感覺滿意。當時我並沒有學習填詞的意思，而是藉此來潤潤口舌。後來閱讀的範圍雖擴大了一些，仍不外是以前的作用，從未執筆試填過一首。也因為離開學校之後，經常過着緊張的軍事生活的緣故。廿二年秋，奉命巡視內蒙，接觸那種廣漠寂寞的塞外風光，目睹方燃未盡的北國烽烟，即使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也曾發生無限的感慨！

我曾讀辛幼安寄陳同甫的「破陣子」一詞云：「醉裏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似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這種悲壯的詞句，在那種情景中吟誦起來，是分外的逼真動人，容易挑起旅人的愁思，而想藉此一洗自己胸中的積鬱。於是執筆學填一首「滿江紅」，固然不工，亦求一時的快意而已。詞云：

漢代雄圖，慷慨嘆，華疆日蹙。試披閱輿圖依舊，慘變顏色。長白山前箕子地，而今偏樹仇讎。鐵，灑沙場，熱血似春潮，荒郊碧。懷壯志，愁無益；邁前驅，何顧惜。說甚窮荒能把英豪隔，白骨敷成千里轍，長車直駕無停息。看旗揚，絕塞捲陰霾，青天白。

這就是我填詞的處女作。從此每當有興致的時候，也隨便填作。這種粗獷的詞句，祇是聊以發抒自己的情感，和作為一二友好的談助，實不能登大雅之堂。李立民兄說我以往所填的詞，有些「怒髮衝冠」的樣子，近年以來，火氣漸脫。他的意思，怒髮衝冠是要不得的，爐火純青，溫柔細膩，規格嚴謹，才是詞人之詞。岳武穆的「滿江紅」，並不是詞選中的第一流作品。蘇東坡的「銅雀鐵板」，也嫌過於粗放。我對於這種論調，頗不以爲然。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其心境，而心境是隨年齡環境而變遷的。在某一種心境之下所填的詞，不是其他的人所能模仿，也不是他自己後來所能再寫的。所以論詞祇能就作者當時的心境着眼，而不能就論者的主觀來評定的。因為這是作者真情的吐露，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是不易知道的呀！就我個人來說吧，十幾年前的詞，現在我已填不出來了，這不是我覺得那時的詞填不好而不肯再填，而是我的心境已隨時代而改變了，實在填不出從前所填的詞句來。反過來說，假使我現在還是一個三十多歲好勇鬪狠的人，來評定我自己前後所作的詞，我想一定是認為以前的豪放合口味，以後的就未免覺得頹唐無味了。因為立民兄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他是以現在的心境，看我以前的詞呀！質之立民兄，未知以爲然否？

古人說：「詩言志，歌永言。」好像詩詞之類，都是用來發抒自己的懷抱的，同時又是娛情作樂的方法。而實際上並不能完全達到這些作用。我們填詞，往往爲了一字一句的推敲，費了多少工夫與心血，而所得到的字句，未必即是由衷之言。甚至有的是違心之論，或是雕琢之作。我常覺得通常寫一二千字的散文，費二三小時，就可完篇，而填一首詞，有時用了二三日的工夫，還得不到好句，何苦耗費這種時間與心力呢？這真是生活上的矛盾現象！自從我們幾個人好以填詞作消遣之後，引起許多人對於詞的愛好，而亦步亦趨的來學習。我們自己已中了前人的遺毒，而不顧再遺留給別人，可是却在不知不覺中流傳開去了。我在這本「五十回憶」中，有若干處均附上一二首詞，我的本意是想用抽象的方法，來表示我的心境和環境，並不認爲這是我的文藝創作。

「在雲和與各詞友的唱和」我對於詩詞的和韻，曾以「屈打成招」和「借尸還魂」這兩句話來形容其意義。好好的一首詞意，因爲要硬湊成幾個韻脚而把詞意變更了。好像一個犯人被壓迫在三木之下，逼他照審判官的意思來招供。這些屈打所成的供詞，並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呀！借尸還魂，是借人家的軀壳來接續自己的生命。和韻便是要借人家已成詩詞的韻脚，一字不易的來重做。中國的字義，好多是相同或相通的，也可以說有好多字的意義是大同小異的。和韻的詩詞，就用這些大同小異的文字，套上人家已成詩詞的形式，也就是備着人家的原韻原意，稍爲改變一下，就算是自己的作品。真正能超脫原作者的意思的，是難乎其難。所以和韻愈多，則格調愈下，就如借尸還魂一樣，雖然仍是一個人，而軀壳却是人家的。我對於和韻，雖持如此的見解，但也不能避免這個陳套。卅二年六月間與孫養廬、江眉仲兩兄在小順別墅盤桓了兩天，彼此唱和頗多。因天不作美，連日多雨，夜間無月，大煞風景。臨別時，我填了「臨江仙」一闕，以誌其事。詞云：

亂世不迷山裏路，溪聲日夜潺潺。可憐水淺更多灘，桃花浮不住，留客雨風殘。翹首吟懷無

皓月，雲煙堆滿千山，這回應覺與闌珊。再期文酒會，秋思勾生寒。
養瓊和詞云：

來似白雲杳杳，去如流水潺潺，千重煙樹萬重灘，檐花如有恨，偏照鬢絲殘。寄與祇應好鳥，排愁不礙青山，莫因無月意闌珊，初更窗外雨，詞味比清寒。

眉仲和詞云：

莫道當頭難見月，溪聲雨後潺潺。忽聽幽咽水流灘，多情翻別調，肯惜燭花殘。歲月萬樓留小住，雲煙愛此屏山，美人環珮去闌珊，暮將修竹倚，翠袖怯生寒。

卅三年冬，雪和大雪兼旬，冰凍不解。與余越園、李立民、胡穎之、薛好樓、鄧治歐、徐淵若諸子又有和韻之作。那些被屈打出來的招供，大家不但不以為苦，好像久上刑庭的老犯，不要屈打而順利的供出來。有的更和作至六七韻之多。茲選輯幾闕如下，以博讀者一笑：

燭影搖紅

紹 竑

新年大雪。

殘臘山城，雪嚴鐵日封簷雀。誰將苦酒當屠蘇，長夜消寒酌，隔歲渾如隔昨。道新年，兒童最樂。綵衫人俊，爆竹紅殘，街頭戲賊。八載韶光，烽塵半壁淪飄泊。湖山一片盡敷棉，冷遠征砧薄，遞報魚更三窟。獨聞人，難眠淚落。梅芳有訊，鴻雁捎書，別時曾約。

前調

余紹宋

和李公韻，象謝葉集館主人招宴。

不道新年，門庭闌寂，堪羅雀。雪深三尺，斷行人，有酒和誰酌？矯首西南非昨。細思量，已殊苦樂。羸身窮谷，蘭足荒山，衝寒徒蹻。莫漫多愁，天涯何處容安泊。已能高臥復何求，笑事噴衾薄，暮地開絨歡躍。又生憎，繽紛灑落。青樽紅燭，孤負居停，難酬佳約。

前調

李立民

和季公韻。

十里黃雲，驚寒陣陣歸林雀。八荒同色了無塵，映雪迎年酌。那得情懷似昨。喜今朝，倚聲共樂。春風詞筆，吟到空山，趺然閒蹻。剪水裁冰，尊前不用多評泊。（成句）幾家爆竹響窮檐，年索歡衷薄，好訪山陰暮躍。數枝斜，小園離落。素妝初褪，花信漸催，舊游重約。

前調

鄧治歐

奉和季公韻。

頃刻花開，漫天誤認投林雀。熏籠繡幌翠屏遮，細把銀瓶酌。是際心情異昨。算年來，都無此樂。香泥軟美，路暗前村，履艱還蹻。身世如舟，偶然遇勝時停泊。依稀尋向灞橋東，凍忘衣裳薄，度引詞情閃躍。便歸吟，胸懷灑落。明朝來否，更待明朝，向東風約。

前調

胡穎之

敬和季公韻。

寒透簾垂，檐前飛噪尋巢雀。煎茶煮酒燕泥爐，卻自勞斟酌。玉戲依然似昨。感天意，人心共

樂。故教做冷，有腳陽春，欲行還賸。溪潤流漸，歸舟暫向汀洲泊。騎驢待去探梅開，未覺氈裘薄。暮想雲陰龍躍，戰爭罷，敗鱗紛落。擘箋呵凍，好待結盟，重聯游約。

前調

薛元燕

敬和李公韻。

羣玉岩峴，依稀更見西飛雀。銷金作帳未銷寒，扶醉還重酌，漫道心情勝昨。趁風絮，霎時恣樂。江山無限，此意誰知，循環頻躑。歌管迎年，滄洲何事愁羈泊。一甌清冽出陶家，不比春醪薄，早晚峴臺騎躍。好安排，珠燈錯落。斷橋孤嶼，霽雪繁花，猶堪酬約。

風入松

紹竑

冒雪過立民兄寓所，見越園先生畫松巨軸，率題案和。

一株蒼勁倚天參，拔地挺巖峴。千秋溪壑仍如舊，羣芳盡，底事凋殘。風雨漫來西北，濤聲盪動東南。昨宵雲陳擁高寒，飛雪掩重山。枝頭白了猶凝翠，難低首，滿壓冰丸。孤傲又誰伴我，幾人另眼相看？

前調

李立民

盤空天矯碧天參，獨立俯重巖。風雷挾筆縱橫意，留餘日，雪滿雲殘。壁上龍蛇飛動，槎枒東北西南。託根高處不勝寒，曲曲擁屏山。凝開清額憑揮麈，新詞疊，如走珠丸。消受一年臘盡，好拚濁酒同看。

前 調

胡穎之

酒酣還自畫幃參，老幹聳嵌巖。墨痕滴翠飴枝葉，同消受，雪虐風殘。移向寒柯堂畔，栽來水碓村南。記曾蹤嶺共消寒，萬樹擁湖山。老鱗待化龍飛去，空篩影，冷月如丸。逸韻且驚琴聽，穠姿漫把花看。

前 調

薛元燕

風高欲抱素琴參，一曲動蒼巉。絕塵標格成孤往，任岩阿，日冷雲殘。百劫甯驚歲晚，萬株漫憶湖南。（西湖萬松嶺有李公舊邸）似聞鸞鶴訝巢寒，霏雪正彌山。植枿張蓋爲誰好，待相伴，凝綠梅丸。解識擎天筆意，疑回魚手重看。

前 調

鄧冶歐

龍蛇飛動勢相參，千尺聳危巖。玉簪翠蓋幢幢立，探忘却，歲暮冬殘。且共持觴醉蟹，恰當露雪東南。滿堂動色氣猶寒，烟霧起江山。長風屈鐵精靈聚，定來歲，松子如丸。旁有梅花爲伴，霜禽欲下偷看。

滿江紅

紹 竑

雲龍旅中雜感。

日暖雲和，沿江湖，龍淵劍跡。回頭望，路盤窮峪，渡橫赤石，流水頓添春意滿，飛香已見梅

花翼。照料陽，殘雪滿峯尖，參天白。團圓月，懸霄碧。華燈影，重重色。算人天此夜，樂春愁
奮。歌舞聲中還帶酒，陣時歡笑殊今昔。暮驚心，大陸走龍蛇，獅駝息。

前調

李立民

老去心情，回首處，相如倦跡。但託興，夷由今古，膏盲泉石。野哭千家聞戰伐，仇離忍見分
飛翼。惜年光，細雨溼梨花，驚頭白。把酒盞，沾痕碧。染衣袂，征塵色。儘春光爛漫，疏狂猶
奮。姚紫燭紅依舊是，韶華人事都非昔。等閒來，隨意學尋芳，遲消息。

前調

薛元燕

上苑春風，多少夢，欲尋無跡。山郭外，清暉寒罩，泉聲咽石。不斷花枝紛照眼，相逢燕侶皆
連翼。趁裙腰，一道入雲深，千巖白。南浦水，悠悠碧。芳草地，萋萋色。儘長吟低唱，慢愁才
奮。鷄塞鄉心知幾處，蘆溝劍氣應猶昔。料衣冠，此會安定危，烟塵息。

前調

鄧治敏

獵騎春驕，揚鞭處，都成奇遇。人道是，歌搖山岳，聲摧金石。煙起似添雄虎竄，雲開待展鯨
鵬翼。漫回頭，落日看郊原，荒荒白。陽關水，鄰鄰碧。離離草，油油色。豈天能解語，春豈秋
奮。宇宙幾番風更雨，河山兩戒今猶昔。便明朝，牙帳捷書回，羽難息。

前調

徐淵若

五采龍文，摩挲處，已成陳迹。空見說，生公妙法，點頭頑石。玉樹猶歌商女曲，雲天待展春風翼。倚黃昏，吹笛瑣窗前，梅花白。春衫薄，離痕碧。團圓月，淒涼色。閒畫堂誰念，歲時豐齋。火樹銀花燈似畫，玉簪瓊佩人猶昔。漫呻吟，按盡問何時，烽煙息。

減字木蘭花

紹 竑

越園先生爲立民先生作棠梨館圖，詠此誌慶。

梅桃已謝，萬樹梨雲籠晝夜。夕照明霞，靜待風搖數落花。莫嫌花落，嫩綠嬌黃春不瀾。月又東牆，涼動繁陰味細香。

前 調

李立民

和季公韻。

俊慚諸謝，肯讓芳園春宴夜。綺爛餘霞，紉白披紅共坐花。秋千院落，料峭風來寒薄薄。月影過牆，冷豔輸梅綢細香。

廿七 五十的一年

【纔過四九壽辰又臨不幸年頭】三十二年秋天，我在雲和度四十九歲生辰，省府祕書處同仁填了一首「莊椿歲」詞爲我祝賀。詞云：

龍飛鳳舞名區，振衣直上風烟表。出郊小隊，八州士女，相迎來道。指點安危，一杯錯落，幾番談笑。料駐車坐愛，青山紅樹，憑打疊，吟秋藁。江國馳聲偏早。識旌旗，舊林猿鳥。長安日近，武昌魚美，頻煩夢繞。重下錢塘，甲兵十萬，待舒胸抱。喜吳霜鬢淺，隔籬喚酒，與花同好。我和他們一首，就借用「八千里路雲和月」這個典故爲起句。詞云：

八千里路雲和，月圓今夕光天表。獅醒未睡，魚蒼隱約，賓來遠道。兩浙機樞，一時際會，相逢歡笑！想鄂王豪氣，功名塵土，都當作，狂吟藁。五十人生猶早，正中天，奮飛鵬鳥。渡江萬楫，投鞭填海，扶桑遍繞。整頓湖山，那時願了，共舒懷抱。作長虹痛飲，鑑湖美酒，壽吾同好。時光一天一天的過去，轉瞬又是民國三十三年！這一年，在整個的國家，臨到了抗戰八年中最嚴重的階段；而我個人呢，也是達到了最不幸的一個關頭。我的大兄德芳，在這年的春天，患病曲江，我夫妻二人，都在浙江。一個十七歲的學生，病倒他鄉，是多麼痛苦的事！雖然那裏也有很多親友，很熱心的照料他，但是我們心裏，總時時刻刻的遠念著。我的妻子，實在放心不下，便從雲和趕赴曲江。但從她到了那邊，很久的日子，也沒有什麼好的消息報導給我，使我更加焦急！到了三月間，我奉召赴南岳開會，便繞道到曲江去看他，病況雖然沒有什麼大變化，但是也不見得沒有什麼起色。我回來的時候，他伸出骨瘦如柴的手，與我握別，却沒有一句言語，祇是目不轉睛地望著我，也許他也知道這是最後的

一別了！同時我呢，也這樣的想着。這個死別般的生離，是如何的悲痛啊！我回到浙江，時常有電給我妻子，問她：「爲什麼不時常有電報或電話給我？」她的回答是：「沒有什麼可說的呀！」無論什麼事情，到了無言可說的時候，總不會有好現象，這是無可疑義的。五月間，我又奉召到重慶開會，道經曲江，汽車一直馳進醫院裏去，見到我的妻子，即口就問她：「情形怎樣了？」她說：「今日清醒一些，他時常念着你快要到來了。」我同次兒行方去看他，神氣果然很清醒，除了問候我之外，還同他的弟弟說了兩句笑話。我們見到這種情形，也相當的安慰，便上街去走走。在一個朋友家裏，忽然接到醫院的電話，說是病情突變得厲害！急忙趕回去，見他的神情慘變得可怕極了。我也知道他先前的清醒，就是俗間所謂「迴光反照」，實在是一種危險的景象，果然，他從此就昏迷下去，而終於不救了！父母愛子之心，是無所不至的。何況這孩子確算得是一個好孩子，不但平時孝友勤奮，洵有一些執犄的習氣，並且在學校裏自己很節儉，而把節省下來的錢，幫助朋友，尤其周濟淪陷區的小朋友。他死了之後，那些朋友，還有信來請他救濟。在病中，據看護的人說：「死前半個月，就昏迷亂語，但是他母親一進他的臥室，就停止了，好像立刻清醒的樣子。」他從小就沒有逆過他母親的意思，到病危的時候，還是不欲使他母親常時受過度的痛苦而溘然死去，真是一個值得寶愛的孩子啊！我最後看他一次，醫生告訴我：「祇是數小時的問題了！」我忍痛的離開病房，含淚寫下一首輓聯，預備刻在他的墓碑上：

忠孝志難成，日落河西流永恨！
死生猶在限，春殘粵北輪孺兒！

他死在曲江的河西醫院，其時正是春末也。以後我總想爲他寫一兩首輓詞，但是一執起筆來，情緒悲亂，無法遏止。延了好久，才填了一首「鷓鴣天」，詞雖不佳，意極沉痛，從此我就把他漸漸淡忘下去。那首詞也就是想作痛極而忘的意思。

我在重慶，開完了十二中全會，繼續又參加第一次全國行政會議。那時湘北的戰事已發動了，就情

報判斷，知道敵人的企圖，不僅在長沙，而是要打通粵漢、湘桂兩鐵路線。情況一日緊一日，開會的情緒，也一日淡一日。東南的軍政首長，不等會議終了，就離渝東回。我到了桂林，對於我住在桂林的家小，應該準備遷到什麼地方，當時煞費躊躇。我既判斷敵人企圖先打通湘桂線，再打粵漢線，同時判斷敵人以後對於粵漢路東（浙、贛、閩）要實行掃蕩，並且可能的還再打通浙贛線，完成他在南中國對盟軍登陸的作戰交通體系。這樣，浙江的處境，比三十一年五月間的大流竄，還要困難。我個人責任在身，無論如何，不能離開省境。但是一家老幼，在那種局勢之下，總不能不預先想一個安頓的辦法。我想了再想，仍舊以不要家小東來爲合宜。同時我也作萬一的希冀：敵人終將成爲「銀樣蠟槍頭」，深刻不到桂林，而會自己退回去的。所以我決定仍教他們留在桂林，看看情勢再說。我臨行告訴他們說：「萬一敵人佔領衡陽，就得趕緊準備撤退。」並指示他們兩條路：一是回到容縣的鄉下，那是偏僻所在，不是軍事政治的目標，從來就未受過軍事的影響。抗戰後也未有敵機轟炸過，比較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可是這次出乎意料之外，廣州灣的敵人會由化州高州，經容縣而出平南，使這個我認爲洞天福地的地方，也受到蹂躪。）第二條是走黔桂路，先在廣西的邊地上看看，而貴陽，而重慶，一步一步的退去。結果他們是走的第二條路。你想一家二十口，單憑一個女人作主，雖然自己也還有一些交通工具，但在數十萬軍民湧退之下，情形是何等的困難！她到了桂黔邊境之後，就沒有消息了！這時，我因爲身體不好，到南平去養病。自己的身體是那樣的不好，而家屬又是在顛沛流離中，心裏的焦急難受，真非言語所能形容！在無聊煩悶之中，填了幾首詞，其中一首「菩薩蠻」云：

客身遠去心仍住，焦思每共秋雲聚，烽火阻衡陽，鷓鴣啼斷腸！
山中桐葉落，月在疎林角，
山外劍津聲，鏗鏘鳴不平。

我在南平病稍痊可，仍回到雲和，不久又因事到鉛山去。這時已是十一月了。在那裏才得到我家小

的消息，知道他們尙滯留在貴陽，心中爲之稍慰！由鉛山轉赴衢州、龍游去視察，一則我已有一年多未到那裏，同時我的五十生辰快到。一般人對於五十壽辰是很重視的。不但自己，還有一般朋友親戚也一定要替你熱鬧熱鬧。事先，我已聽得有許多僚友，希望在我生日這一天，大家歡聚一番，也算是替我慶祝的意思。這等深厚的情意，我是很感動的，但是我那時的環境，和個人的心境，實在是太壞了。西南方面，正是烽烟遍地時候，敵騎已逼近貴州獨山，甚至重慶方面，也相當震動。而我自己呢，在這一年之內，真有些像家散人亡的光景！（抗戰以來，我所私幸的是有限的一點薄產，尙未遭受到損失。但這次却吃了一個大虧。我一向不知從事家人生產，尤其抱有一種「無房主義」。覺得住人家的房子，反比住自己的房子，更自由些。在內地，如南甯、上海、南京、杭州、武昌，雖然住得很久，總未購置一點房屋。過去祇有在香港買了幾間小屋，供閑散時歇足之地。後來因時常經過桂林，每次擾累朋友，心裏很覺不安。又因桂林是一般人所認爲後方安全區域，那時正在日漸繁榮中。經許多朋友的勸說，一時轉了個「欲把桂林作桃源」的念頭。便於三十一年春天的時候，在那裏也買了一所住宅。因爲有了這所房子，所以三十一年受浙敵的壓迫，便把家小送回桂林。更想不到這次瘋狂的敵人，竟會施出困獸之智，侵略桂林。我這一所小小的房子，連帶一部份家私，都斷送在裏面。我買這所房子，代價是八萬塊錢，雖然這個數目，在戰前纔抵得三四千元，在那時却終是一個很大的數字。而且這三年來，桂林的房價又漲了不少，加以附帶着家私的損失，總使我有未能免俗的耿耿於心！固然，偌大的桂林，損失千萬數千萬的，不曉得有多少，我這一點損失，又算得什麼？可是我爲什麼不堅持我的「無房主義」，而竟遭這種損失呢？這也算的是宗旨不定自取其咎吧！）那裏還有心情做這等強爲歡笑的事情？於是想到中國社會有一個避壽的辦法，在我這環境心境兩不痛快時候，這個辦法，倒頗可採用。這樣一想，便定了個出巡避壽的主意，而出巡的目的地，則在衢江一帶。因爲衢州正在召開五區行政會議，親往參加，倒是

一舉數得的辦法。在生日的前幾天，乘汽車到了江山，換乘民船到衢州。在船上填了好幾首詞，都是以江山爲背景的。因爲江山船娘，是以前文人名士口吟的資料，現時雖然是船破人空，但也不妨借它來作爲吟咏的想像資料，而與大自然的環境配合起來。其中有「臨江仙」一闕云：

烟雨迷濛江渚隱，剪波雙槳橫斜。船移如入萬重紗，一層看未了，又把逐層遮。竟日行行終不盡，離離亂草平沙。江山幾姓此浮家。八旗名士筆，錯寫美人麻。

這詞末段的意思，是因爲以前滿洲名士祝寶廷，曾有過「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之句，我想把他翻翻案，亦是一時無聊之作。

到了衢州，參加了那第五區的行政會議。住了數日，又乘船到龍游去視察，旋復回來。那日正是十月小陽春的天氣，風和日麗，溫暖異常，把大地的春意都撓起來了，但隔日又恢復那嚴冬的景象。我在船上，就把小陽春作爲起句，填了一首「多麗」。詞云：

小陽春，一番春意宜人。莽東流，烟迷紅樹，連天雲水相親。下錢塘，幾疑路阻；西湖好，待掃胡塵！異地情懷，臨流極目，七年期待而今。想堤上柳殘人靜，葉落度黃昏。祇剩得照空孤月，深夜鐘聞。掛歸帆暫停征棹，更須逆溯蘭津。鷺鷥飛聲喧舟子，殘陽隱寂寞漁村。默念行舟，往來順逆，個中勞逸平分。看隔日乾坤幻變，冷暖亦前因。閒情緒儘堪收拾，聊付詞存。

我回到衢縣，次日正是我的生辰，姜專員心白（卿雲），要留我在那裏住，並且爲我祝壽，我拒絕了。我說：「我要在旅途中度過這一日。」次日清早三四點鐘，就乘船到江山去。那天早上，我們的船，在風雨交加中解纜了，洪濤滾滾北流，朔風蕭蕭南吹，正象徵人們在五十關頭掙扎的情形，中間有順利的地方，也有逆轉的地方。誰能努力掙扎，誰就得到最後的勝利。起初，舟子們有些畏縮，恐柔軟的順風，敵不過洶湧的逆流，我鼓勵他們努力的前進，人定可以勝天，洪流及時的退縮了，朔風却不斷的

吹來。在這情景之下，詞思轟地起來，我當時即填了一闕「破陣子」出示姜專員。用寫實的筆調，來形容我的內心，他也爲之嘆賞。詞云：

五十年來身世，鷄鳴風雨江山。回首處，半程雖過，念來茲，時事方艱。凌寒鬢就斑。擊楫中流破，揚帆逆上千灘。願與洪流爭進退，聊把蕪詞祝壽筵。驚聲破曉顏。

船終於在黃昏時候，順利的到了江山，程縣長運啓招待我們進晚餐，旁的都沒有什麼，就是飯堂內點了兩枝紅色的大蠟燭，桌子面上，還備了兩盤染有紅色的包子，我想這就是他們爲我祝壽的儀式了。我既不言做壽，他們亦不敢替我祝壽，那對紅蠟燭，一直點到天明。而我的五十壽辰，就是這樣悄悄的度過去。次日，繼續冒着風雨，回到龍泉。

我在這五十年當中，幼小的時候，受到父親偉大的愛護與啓示，十三歲，我離開了家庭，以後的三十六個年頭中，我在家鄉，居留的時間，統共算起來，不到六個月。我追隨着中華民國三十四年的變亂的歷史，載沉載浮的在那波濤裏掙扎，中間不知犧牲了多少不幸者的性命？而我呢，一滴血也未流過，而今依然健在。想起來，實在是幸運得很！在我過去五十年的歷史，自我的批評，是沒有什麼價值可言，但是歷史總是教訓人的，它不但不斷的教訓我自己，而且是我每個人都要受到他自己的歷史的教訓。我受了自己歷史的教訓，應該如何的改進自己，以求在今後未盡餘年中，再寫下光明燦爛的新頁。所以我要寫這篇「五十回憶」的主意，是要以自己的歷史，來教訓自己的將來。

【我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好多人都以爲到了這個年紀，大可以養尊處優，居移氣養移體的過下半世的享受生活。或者以爲剩餘的日子無多，大可以不必愛惜而任它消磨過去。我見到好些以前的人物，都是如此下場，而我的意見却正與此相反。我檢討自己的以往，僥倖嘗試的場合實在太多了，整個三十四年的民國歷史，可說就是像我這一班人在僥倖嘗試中演出來的。國家民族所冒的危險，和所受的損失是

太大了！若這班僥倖過嘗試過的人，就此轉變到消極的方面而丟手不幹，豈不是再要來一班人，重新經過同樣僥倖和嘗試，甚或永遠的僥倖嘗試下去麼？國家民族能不能經得起再度三次的僥倖嘗試，國際環境，能不能容許我們再次三次的僥倖嘗試，就成很大的問題了。我自己覺得每經過一次僥倖和一番嘗試，無疑是進步了許多。到了現在，才是將要成熟的時候。如果在這個時候，自己放棄了自己應盡的責任，固屬可惜，國家放棄了一個行將磨煉成熟的人，也不能說不是一個重大的損失。所以我以後還得努力去追求自己更大的進步，除非我身體的本質是不能進步了。我很恐慌，我到了老年會盤旋而不進步，或是走到一條很糊塗退化的道路上去。我希望到生命最後的一日，頭腦仍舊是清醒的，行動仍舊是輕鬆的，而不願糊糊塗塗的生存和死去，我對於社會上的人，也都是如此希望。我認為科學是人類正確的認識，要想不走錯路，一定要在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上加以認識。我的科學根底固然很差，但在科學的觀念上，是不至於摸不到門路。在我這本「五十回憶」當中，由我的本身體驗而發為我的感想，我認為「物質」是宇宙間一切現象的表現，沒有物質，就是沒有宇宙和各種的現象。但是中間的關係非常複雜，非從科學的探討，不能明瞭宇宙的真相，與物和物間的關係。無數的物質與其發出無數量的能，就是形成宇宙種種現象的因素。人類是宇宙萬物的一種，因人類知識技術的發展，對於宇宙的一切，已相當的了解。人類與宇宙萬物，祇有類屬的分別，並沒有超物類的區別。人類要將自己當作普通的物看待，用一般研究物質的方法，來研究人，然後才能得到人的真理。同時，明瞭人與物的關係——即物與物的關係，然後可以運用物質創造物質，而增加人類的知識技能，和生活的幸福。這就是我個人的人生觀與宇宙觀。